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室

卜憲群 楊振紅 主編

簡帛研究

二〇〇六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六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專輯

簡帛研究

二〇〇六

簡帛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室

卜憲群 楊振紅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 2006 / 卜憲群, 楊振紅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633-7819-7

I. 簡... II. ①卜... ②楊... III. ①簡(考古)—中國—文集 ②帛書—中國—文集 IV. K877.0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58215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 541001)
網址: <http://www.bh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廣西桂林市臨桂縣金山路 168 號 郵政編碼: 541100)

開本: 880 mm × 1 240 mm 1/16

印張: 22.5 字數: 46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2 000 冊 定價: 9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帛研究系列圖書

尊敬的讀者：

您好！我社簡帛研究系列圖書已出版以下品種，如在當地書店無法購買，請致電我社郵購部（0773-5806962）或在當當網、卓越網上購買。謝謝您的關注！

書 名	定 價	作 者
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	20.00	高敏 著
額濟納漢簡	880.00	魏堅 主編
漢簡研究	39.80	[日]大庭脩 著 徐世虹 譯
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上下冊）	248.00	李學勤 謝桂華 主編
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	88.00	李學勤 謝桂華 主編
簡帛研究二〇〇四	98.00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主編
簡帛研究二〇〇五	88.00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主編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	68.00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主編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	36.00	蔡萬進 著
漢代行政記錄（上下冊）	80.00	[英]魯惟一 著 于振波等譯
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增訂版）	39.80	廖伯源 著
居延漢簡研究（上下冊）	80.00	[日]永田英正 著 張學鋒 譯
秦漢刑罰制度研究	36.00	[日]富谷至 著 柴生芳等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營銷中心

電話：0773-2802508 傳真：0773-2802139

目 錄

試論郭店楚簡形成的年代

——通過“親親”與“尊尊”來考察…………… [日]吉田篤志/1

試談郭店楚簡中不同手蹟的辨別…………… [美]李孟濤/10

《上博竹書（五）》零識…………… 李天虹/30

里耶秦簡的文書形態與信息傳遞…………… [日]藤田勝久/35

《周易》研究的課題與方法…………… [日]池田知久/51

帛書《刑德》分野說略考…………… 陳松長/73

秦漢簡中的“冗”、“更”與供役方式

——從《二年律令·吏律》談起…………… 楊振紅/81

秦漢的官奴婢和漢文帝刑制改革…………… [韓]林炳德/90

秦漢簡牘《日書》所見占盜方法研究…………… 宋豔萍/104

避諱字與出土秦漢簡帛的研究…………… [美]來國龍/126

《奏讞書》題名等諸問題之再研究…………… 李 力/134

張家山漢簡《津關令》“越塞闌關”諸令考釋…………… 陳 偉/147

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的納音術初探…………… 楊 英/155

懸泉漢簡中的“懸泉置”…………… 張德芳/169

漢代文書行政和傳遞體系

——以“元康五年詔書冊”為中心	[韓]金慶浩/183
天長西漢木牘述略	楊以平 喬國榮/195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河堤”釋義	曹旅寧/203
西漢長安“孝文廟”位置考	侯旭東/206
漢簡三種量詞初探	張顯成 武曉麗/210
漢簡所見西漢優撫措施	王文濤/233
漢代簡牘中的告地策資料	汪桂海/242
長沙出土的簡牘及相關考察	宋少華/249
走馬樓吳簡人口管理初探	李均明/263
關於長沙吳簡“刑”字解讀的意見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釋文探討之一	王 素/274
再說吳簡中的丘	于振波/282
新發現的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遺址性質初探	劉海旺/293
懷念謝桂華先生專欄	/302
徵稿簡約	/355

試論郭店楚簡形成的年代 ——通過“親親”與“尊尊”來考察

[日]大東文化大學 吉田篤志

前言

關於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在簡報（《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7期）裏已推定是“戰國中期偏晚”，已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的《前言》裏認為“郭店楚簡的年代下限應略早於墓葬年代”。對此，學界有不同的看法。還有，雖然出土狀況不明但與郭店楚簡內容和字體近似的上博楚簡，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的《前言》裏，依據科學的年代測定的標本推定是“戰國晚期”，認為是“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公元前278年的“白起拔郢”以前），但這也有問題。對於這兩個楚簡今後有必要從各種視角更進一步討論。本文試從思想史的觀點加以考察。

所謂“親親”就是重視親族、血親、父子、兄弟等家族間的紐帶，認為是第一的行為，這對於重視孝、悌等家族道德的儒家而言是很重要的思想。所謂“尊尊”就是尊敬君主，把君臣間的紐帶視為第一的行為，這對重視忠的規範意識的法家而言是很重要的思想。一般講，“親親”和“尊尊”並列使用的場合很多，常用於相對的意識形態裏。但是在漢代以後隨著皇帝支配體制的確立，顯然“尊尊”超越過了“親親”。

如果把“親親”和“尊尊”用其他相對的語彙來表現的話，有“國”與“家”、“君臣”與“父子”、“忠”與“孝”、“外”與“內”、“公”與“私”等。這裏在將這種

相對性的概念放在腦海的同時，以下將傳世文獻所見的“親親”和“尊尊”，特別是《春秋》三傳和郭店楚簡中的儒家系文獻中出現有“親親”“尊尊”的《六德》《唐虞之道》《成之聞之》等加以比較，來考察其形成的年代。

一、傳世文獻裏所見的“親親”與“尊尊”

首先，最初出現“親親”這種想法的代表文獻有《論語·子路篇》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在直躬這一段話裏雖沒有見到“親親”這樣的辭彙，但是在“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這樣的看法中，已是把親族的紐帶紮根於家族制主體的“親親”之中了，這是自不待言的。其次《詩經·小雅·伐木》的小序裏有這樣一段話：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因爲《詩經》小序成書的年代不是那麼早，所以把這個“親親”視爲最早出現的“親親”詞語，大概有些問題。作爲比較早的文獻，“親親”一詞見於《孟子·告子下篇》：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闢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闢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在《盡心上篇》裏：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七篇在《史記》孟子傳裏有“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這段話，漢代認為是孟子自著，應該視為是較早時期形成的。《公孫丑下篇》有“吾聞之也，君子以天下儉其親”。這一段話，和上面《盡心上篇》的“（君子之）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有同樣的看法，應該承認孟子和孔子一樣都有“親親”的立場。

“親親”一詞在其他文獻中也有，在《禮記·文王世子篇》裏有：

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在《喪服小記篇》裏有：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在《大傳篇》裏有：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

在《中庸篇》裏有：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又在《周禮·天官·大宰》裏有：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周禮》形成的年代通常認為可能比《禮記》晚一些，關於《禮記》的形成年代，通過和《禮記》緇衣篇的內容大抵一致的郭店楚簡《緇衣》的出土，以及被認為和郭店楚簡的形成年代及出土地點都一樣的上博楚簡《緇衣》的出現，可以證明在戰國晚期已確實存在，上面所提到的《禮記》諸篇應該也是同樣時期的可能性非常高。

其次，作為出現“尊尊”的代表性文獻《韓非子·五蠹篇》裏有：

楚之〔人〕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在這裏所見的直躬、令尹的故事，也散見於《莊子·盜跖篇》、《呂氏春秋·當務篇》、《淮南子·泛論篇》等，只是內容多少有差異。都是沿襲上述《論語·子路篇》的故事。還有，在內容上多少有些差異的魯人、仲尼的故事，散見於《韓詩外傳》卷十、《新序·義勇篇》等，這明顯地是沿襲因“管鮑之交”而有名的《列子·力命篇》的“管仲嘗歎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這樣的故事，對比“君之直臣”的直躬和“君之背臣”的魯人，這是對抗儒家“親親”而主張“尊尊”。這可以理解爲《韓非子·五蠹篇》的“尊尊”是適應于從戰國晚期到秦、漢間的君權強化的需求的思想體系。

還有，散見於上述《禮記·喪服小記》、《大傳》諸篇的“尊尊”一詞，另外，在《禮記·文王世子篇》裏有“尊君”，在《中庸篇》裏有“尊賢”，在《周禮·天官·大宰》裏有“尊貴”等，特別是《中庸篇》裏因與“親親”對立而強調“尊賢”，所“尊敬”的對象不是君主而是賢者。由此而知《中庸篇》是主張採用賢者的政治政策，強調注重道德的德治的。若按照《禮記》、《周禮》有可能是在戰國晚期到秦、漢間形成的來考慮的話，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本來的“親親”與作爲面向國家統一而必然的“尊尊”，有併存的現象。

二、春秋傳所見的“親親”與“尊尊”

下面我們就《春秋》三傳所見的“親親”和“尊尊”舉幾個例文加以討論。

《春秋》隱公元年記載：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隱公元年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

《穀梁傳》隱公元年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

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所謂《公羊傳》的“成公意也”和《穀梁傳》的“成公志也”，在《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後面本來應有“公卽位”的經文，在這裏沒有寫，應該視爲，因世子桓公年幼的關係，年長的隱公暫時行使國政，等將來讓桓公繼承國政，是爲了成就這樣意志的緣故。《公羊傳》的“隱之立爲桓立也”是尊重隱公對桓公的仁慈的心情，是站在重視家族兄弟間的紐帶“親親”的立場上的。與此相對，《穀梁傳》則認爲隱公的意志是“探先君之邪志”，把國政讓桓公繼承是“成父之惡”、“輕千乘之國”，是“小惠”“小道”的行爲，是“不正”“非正也，邪也”。也就是說，這是違背了先君之命令實行“小惠”，破壞支配秩序，從“尊尊”的立場來看這是無法容忍的行爲。

《春秋》隱公四年記載：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左氏傳》隱公四年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醢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犛羊肩，蒞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春秋》祇記載了衛公子州吁殺害君主完（桓公）坐上了國君地位的武裝政變和其後被處刑之事而已，但《左傳》卻是很詳細的記載了整個經過。石碏處罰武裝政變的州吁和輔助州吁的石厚（石碏之子），闡述了破壞秩序之行爲即使是自己的兒子（石厚）也無法原諒，主張所謂“大義滅親”這樣的“尊尊”。只是，“大義滅親”這個命題是否適用於整個《左傳》，還是應該討論的問題。

《春秋》哀公三年記載：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傳》哀公三年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

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這是衛的蒯聵（靈公之子、輒之父）和輒（靈公之孫、蒯聵之子）為繼承王位所引出的一出紛爭。依《公羊傳》，靈公沒後，大夫石曼姑接受靈公的命令想立輒，但是惹靈公生氣而被放逐的蒯聵對此不服，受晉的援助進攻戚（衛邑），石曼姑得到齊的援助圍攻戚。

《公羊傳》以此為“伯討”（何注：方伯所當討），是把防止蒯聵的攻擊、保護輒正當化。“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尊從王父靈公的命令、不尊從父親蒯聵的命令（拒絕行為），亦即是所謂“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靈公的命令是“王事”，比蒯聵的命令“家事”優先，為了“王事”而犧牲蒯聵和輒的父子之親也是可以的，它講述的是公事優先於私事，“尊尊”優先於“親親”。只是，《公羊傳》從整體來看是取“親親”的立場，這裏可以讀取為是向“尊尊”的傾斜，亦即向國家秩序的意向。

《春秋》文公二年記載：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穀梁傳》文公二年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文公在太廟（周公廟）祭祀（《公羊傳》為祫祭、《穀梁傳》為祫祭與嘗祭、《左傳》杜注為背祭）時，把父親僖公的牌位升在比先君閔公更上位，“先親（僖公）而後祖（閔公）”（《公羊傳》“親”作“斑”），在昭穆制度上是“逆祀”。昭穆制度在保持由父子相續的祭祀儀禮的秩序上是重要的制度，僖公是閔公的異母兄，但因為繼閔公之後為君，從制度上來看就成了閔公為父僖公為子。這種顛倒順序是昭穆制度的崩潰沒有祖先的意思。沒有祖也就沒有天，這是漠視於崇拜對象的天的行為，是從“不以親親害尊尊”這樣的“春秋之義”脫逸的行為。也就是說，《穀梁傳》在維護昭穆制度上，強調“尊尊”的立場，比起對於僖公的親勿寧是對於閔公的尊要優先。

三、郭店楚簡所見“親親”與“尊尊”

在郭店楚簡裏可以看到幾篇表現有“親親”和“尊尊”這樣的觀念。首先考察《六德》。

1《六德》第二六號簡至第二七號簡：仁，內也。義，外也。禮樂，共也。內立父、

子、夫也。外立君、臣、婦也。

2《六德》第二九號簡至第三〇號簡：爲父絕君，不爲君絕父。爲昆弟絕妻，不爲妻絕昆弟。爲宗族殺（失·疾）朋友，不爲朋友殺宗族。

3《六德》第三〇號簡至第三一號簡：人有六德，三親不斷。門內之治仁（堦·恩）楸義，門外之治義斬仁。

上引1“內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婦也”，2“爲父絕君，不爲君絕父”，3“三親不斷”等，都是標榜血族優先的“親親”；3的“三親”是1的“父、子、夫”，相當於2的“父、昆弟、宗族”。將上述整理後，列如其下（記號“>”是前者比後者優先）。

- ① 仁>義（仁，內也。義，外也……門內之治仁楸，門外之治義斬仁）
- ② 父、子、夫>君、臣、婦（內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婦也……三親不斷）
- ③ 父>君（爲父絕君、不爲君絕父）
- ④ 昆弟>妻（爲昆弟絕妻，不爲妻絕昆弟）
- ⑤ 宗族>朋友（爲宗族殺朋友，不爲朋友殺宗族）

這樣在《六德》中濃厚地表現著以血族血緣優先的“親親”爲主體的儒家思想，沒有明確主張“尊尊”。正像李澤厚氏所指出的那樣，“竹簡明確認爲‘仁內義外’、與告子同、與孟子反。竹簡給我的總體印象，毋寧更接近《禮記》及荀子”（《初讀郭店楚簡印象紀要》，《李澤厚哲學文存》下編，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再錄），“仁，內也；義，外也”這樣的“仁內義外”說，從孟子反對這觀點來看，很可能屬於儒家思想中與孟子思想對立的荀子思想系統的著作，其形成的年代也與荀子接近。

下面來看《唐虞之道》和《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第四號簡至第一〇號簡有：

夫聖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親也。時事山川，教民有敬也。親事祖廟，教民孝也。大學之中，天子親齒，教民弟也。先聖與後聖，考後而甄（歸）先，教民大順之道也。堯舜之行，愛親尊賢。愛親故孝，尊賢故禪（播）。孝之放（方·殺），愛天下之民。禪之流（傳），世亡隱德。孝，仁之冕也。禪，義之至也。六帝興于古，咸由此也。愛親忘賢，仁而未義也。尊賢遠親，義而未仁也。古者虞舜爲事瞽瞍（瞽），乃弋（戴·戈·戈）其孝，忠事帝堯，乃弋其臣。愛親尊賢，虞舜其人也。

在《成之聞之》第三一號簡至第三三號簡有：

天降（詳·證）大常，以理人倫。制爲君臣之義，著（作）爲父子之親，分爲夫婦之辨。是故小人亂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倫以順天德。

《唐虞之道》的“愛親”和“父子之親”是以親族關係的紐帶視為第一的想法，《成之聞之》的“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闡述的是建立社會的、家族的秩序，亦可以說是建立儒家秩序的典型。和這個《成之聞之》的說法類似的有《孟子·滕文公上篇》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子·天論篇》的“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淮南子·泰族篇》的“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等，但是《孟子·滕文公上篇》裏是把“父子之親”放在“君臣之義”的前面，可知父子間的家族秩序為優先。而《成之聞之》的“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和《荀子·天論篇》、《淮南子·泰族篇》等一樣，比起“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更優先地被考慮，可以認為君權強化的意識已很明顯了。它說明《成之聞之》是在儒家本來的“親親”意識中不得不引進了法家要素很強的“尊尊”，接受以“君臣之義”為優先的法家思想的影響，應視為是戰國晚期形成的。

還有，在《唐虞之道》裏“愛親”和“尊賢”對稱並列，“愛親”的辭彙散見於《左傳》（莊公二十七年）、《孝經》（天子章）等儒家文獻和《管子》（七法篇、形勢篇）、《韓非子》（難二篇）等諸子文獻，但卻不與“尊尊”和“尊賢”對稱並列使用。“尊賢”的辭彙在《論語》（子張篇）、《孟子》（公孫丑上篇、萬章下篇、告子下篇）、《荀子》（儒效篇）、《墨子》（非命中、下篇）、《莊子》（山木篇、庚桑楚篇）、《管子》（幼官篇、幼官圖篇）、《晏子春秋》（內篇問下）、《韓非子》（難三篇、問辯篇）、《呂氏春秋》（長見篇、義賞篇）等文獻均可看見，但是也不是和“親親”“愛親”相對使用。上面所提到《禮記·中庸篇》裏“親親”和“尊賢”並列使用，關於不是“尊尊”而是“尊賢”的理由前面已有過敘述，從這一點看，《唐虞之道》和《中庸篇》有同樣的思想傾向，很可能是從戰國晚期到秦、漢間形成的。此外，和《中庸篇》一樣“親親”和“尊賢”相對使用的情況，在《墨子·非儒下篇》、《呂氏春秋·先己篇》、《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中各有一處出現。

結論

從“親親”向“尊尊”比重的傾斜，可以說是從儒家的家族主義向法家的國家主義推移，也是從重視家族秩序向重視君臣秩序的移動。它和從戰國晚期到秦、漢間諸國統一的時間性推移為一個軌道。從上述《論語》《孟子》的“親親”到《韓非子》《穀梁傳》的“尊尊”，夾在其中間位置是“親親”和“尊尊”並存的上面所提的《禮記》的諸篇，和以“親親”為基礎同時也引進了“尊尊”的《公羊傳》，或者是一方面主張“大義滅親”

的“尊尊”並同時也用“親親”這樣辭彙的《左傳》。若是此推論成立的話，上面所說的郭店楚簡，應該是和《禮記》諸篇以及《公羊傳》《左傳》一樣，是從“親親”向“尊尊”的推移期形成的看法，應該說是妥當的。

（該文是 2006 年 3 月 14 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作學術報告）

（王震中 譯校）

試談郭店楚簡中不同手蹟的辨別^①

[美] 芝加哥大學 李孟濤

在簡帛古籍研究中，正確區分不同的手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不同手蹟的辨別是對簡帛進行分編與綴合的有效標準之一，從而可以對簡帛進行正確排序，恢復簡帛古籍的真實面貌。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尊德義》和《六德》諸篇的研究中就直接面臨着分編與綴合的問題^②。進而，關於《老子》丙篇與《太一生水》篇究竟是屬於同一篇文獻還是單獨兩篇文獻的問題也是學者們討論的焦點。這一問題不僅涉及到古文獻的產生與流傳，而且還有可能影響到我們總體上對中國早期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全面看法。崔仁義的釋文把《老子》丙篇與《太一生水》兩組竹簡當作同一篇文獻^③。王博則強調，不能僅僅因為這兩組竹簡具有相同的章法佈局和相同的文字風格就認為它們屬於同一篇文獻。作為該觀點的補充論據，他注意到，在《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諸篇中也存在着相似情況的問題。^④然而，陳偉等學者對此提出的相當不同的編聯主張很明顯地說明，該篇的原貌並非是確定無疑的。^⑤此外，即使竹簡的編聯問題順利地得以解決，我們仍然無法從寫本學的角度確定一篇寫本（即載體單元）是由多篇還是單篇（或者更少）文本單元組成

① 本文係“儒學復興：第三屆國際簡帛研討會”（Monunt Holyoke College, U. S. A. : 2004. 4. 23-25）論文（修訂版）。在此，我非常感激該次研討會的組織者邢文先生對我的熱情邀請及其對本文提出的銳識；另外，我還要特別感謝孫進女士為本文英文版的漢譯工作付出的辛勤努力。

② 本文所引郭店楚簡的排序與定名均以《郭店楚墓竹簡》（荊門市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1998）為準。這樣做有利於保證注釋的明確性，但並不意味着該書對郭店楚簡的排序和定名沒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③ 崔仁義：《荊門郭店楚簡〈老子〉研究》，科學出版社，1998。

④ 王博：《關於郭店楚墓竹簡分篇與連續的幾點想法》，《中國哲學》21（2000），250頁。

⑤ 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83-108頁。

的。^①我懷疑郭店楚簡中《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諸篇是用同一文字風格寫成的，卻未必僅僅出自同一人之手；而《老子》丙篇和《太一生水》兩篇實際上書寫手蹟相同，因此，最有可能是由同一抄寫者寫成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認為《老子》丙篇和《太一生水》屬於同組的假設也就可以得到支撐了。

其次，一旦將竹簡整理復原問題解決了，我們就可以通過觀察其書法特徵而在竹簡產生模式方面獲取更多的信息。如果能夠得知哪些寫本（或其中的某些部分）是用同一手蹟寫成的，也就最可能出於同一抄寫者之手，進而，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瞭解這些文獻的書寫者遵守了怎樣的標準。我們知道了書寫過程中的隨意性和統一性有多大程度，就可以幫助我們判斷簡文中出現的異體字、假借字、與今本文獻的差異等問題。另外，在遇到篇幅較長的簡帛滙編時，如果能夠得知其中的哪些部分是由同一人書寫的或是由屬於同一書寫學派的人書寫的，將有利於我們瞭解此文獻滙編的編排結構與各篇文獻在其中位置的意義。

中國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簡帛古籍通常包含有不同的辯論內容。例如，在馬王堆和郭店兩地出土的簡帛文獻中都有一個共同的也是最顯著的特徵，即它們都是由儒家文獻和道家文獻組成的。幾十年以來，許多學者一直懷疑，戰國時期不同思想學派的區別，很可能是反映幾代學者的觀點而當時的學派未必有確定界線。正如 Mark Csikszentmihalyi 和 Michael Nylan 指出的，中國早期文獻應當被看作是不同學者在不同情況下對不同專門問題的闡釋。^②無論如何，即使這些文獻並未體現出彼此間相互排斥的意識形態，它們的確都關注於不同的主題，主張不同的政治觀點或廣義上對生命的態度，並通過依附於不同的權威使自身的理念得以採納和發揚。因此，如果我們能夠確定這些文獻中的哪一部分是由同一人書寫，在同一地域內創作，並採用相同的成書標準，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答出一些錯綜複雜的問題，諸如怎樣準確地理解這些文獻在當時所代表的內涵以及為什麼它們會被埋葬於同一個墓中。這些文獻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是墓主生前曾經研習或者使用過的，或者是墓主生前即安放好以供其逝後在陰間享用的祭品，也可能其中的一部分或全部都是專為喪禮而特別製作的等等，存在着諸多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要將某一墓葬中埋藏的文獻滙編作為涵有意義的編排去理解，探索每篇文獻作為組成部分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則不但要關注文獻內容，還要關注簡帛的許多物質性特徵，如竹簡在墓葬中的位置，竹簡書寫用的材料與章法、文本佈局、文字的類型與風格

① 有關文本單元與載體單元之間關係的討論詳見 Marc Kalinowski 馬克，‘La production des manuscrits dans la Chine ancienne: une approche codicologique de la bibliothèque funéraire de Mawangdui 古代中國寫本製造：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馬王堆墓葬文獻’，Asiatische Studien/Etudes Asiatiques 亞洲研究 LIX (2005.1)，131-168 頁。

② Mark Csikszentmihalyi and Michael Nylan: “Constructing Lineages and Inventing Traditions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 in Early China,” T’oung Pao 通報 89. 1-3 (2003)，59-99 頁。

以及作為更狹義上的“可視性書手運動的表徵”的文字書法特徵，在字體、字形及正字法等層面上的謹慎勤勉程度，斷句與修正特徵等等。那些在上述特徵中具備共同性的以及可能由同一書寫學派或同一抄寫者書寫的簡帛文獻，最可能當時被看作內容上相互關係密切，而相反地，它們與按不同標準製造的文獻關係可能較遠。

以郭店竹簡為例，如果我們參照李零在其《郭店楚簡校讀記》中按文字風格進行的分組，就可得到佈局和內容上相近的五組。^①看到這些截然不同的文字風格會使我們推斷這些文獻是由不同的抄寫者書寫的。雖然這個結論實際上有可能是正確的，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並非是一個完全合理可靠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排除同一抄寫者使用不同風格的文字書寫不同的文獻。職業抄寫者通常有可能掌握多種類型與風格的文字書寫技能^②。

因此，我們有必要在理解和描述簡帛手蹟的過程中，盡可能清晰地區別出文字類型、文字風格、手蹟三個層面的內涵。我認為，文字類型是指那些文字中一貫具有的相同的形態學性質。如，在結字與字型上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基於那些對不同文字偏旁的共識性，從而使之在特定範圍內具有易識性。漢字中不同類型的古文字通常是指那些在不同的文字發展過程中特有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字，或者是指特定地域或特殊用途的特有文字（均與書寫材料的質地及當時流傳文獻的實際情況有關）。^③郭店楚簡的文字類型應當屬於戰國楚系文字^④。

關於文字風格。我認為，文字風格是在特定文字類型中所蘊含的某種文字模式。文字風格隨着文字的字體結構或單個筆畫統一性和精確性不同程度的變化而變化。這種變化也有可能隨着書寫速度、間隙疏密、文字傾斜度及其它諸因素的變化而變化，而這些因素都

①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凡例3-5頁。郭店竹簡中書寫格式相同而寫本載體佈局差異最大的是《老子》三篇及《太一生水》和《語叢四》諸篇。然而，他們不但文字風格相似而且簡文內容上都相互關聯。李零稱《語叢四》的“內容屬於廣義的道家”。（44頁）

② 公元前二世紀早期的張家山漢簡中有一條規則記載，一名職業抄寫者必須精通八種文字類型的書寫（即八體），可能就是許慎在《說文解字·敘》所說“八體”。亦見李學勤《試說張家山簡〈史律〉》（《文物》2002年第4期，69-72頁）及《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46頁第475簡和203頁）。

③ 文字類型的概念及其與文字風格的區別還需要進一步細化。我認為，此處的術語“文字類型”（通常叫做“字體”）是指由不同標準構成的定義範圍，在某些方面其定義是相互交叉重疊的。如“金文”通常被認為是文字類型的一種。然而，這主要是就其文字書寫的材質以及書寫方法而定的廣義概念。這是對其實際應用上明確定義，但對此種文字的時間與空間定義則全無表述。“篆書”作為一種文字類型非專指某載體或地域特徵而作出的定義，亦指漢字系統的發展過程中某一特定階段。這些例子表明，祇有在更狹義的範圍內定義文字類型才有可能得到一個更清晰的概念（例如，公元前4世紀晚期的中山王墓兵器銘文）而這種狹義的定義方式會因此類型的標本文字太少而無法起到作為排序標準的作用。

④ 李學勤先生對此已有陳述，即《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兩篇中樸素的文字風格不屬於楚文字。見Sarah Allan and Crispin Williams (eds.) *The Guodian Laoz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artmouth College, May, 1998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178頁（中文版對照：邢文編譯《郭店老子：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學苑出版社，2002，188頁）。由於缺乏古文字研究的功力，我無法對此提出自己的觀點。要讓人信服地同意這類觀點的判斷結果，我們必須瞭解使這一論點成立的具體特徵。

是可適用於辨別不同手蹟的準則。文字類型與文字風格這兩個層面的區別在於，多種手蹟可能同時具有同一文字風格的特徵（而其具有同一文字類型的特徵更多）。文字風格，作為文字類型和某種獨特手蹟之間的介質，可以典型地表現出某一特定學派抄寫者的風格，甚至是代表整個時期那一地區的典型文字特徵。總體而言，在各種不同的文字風格中進行書法分析時，我們應當優先使用那些中性的描述性術語，而不是那些按其藝術價值分類的術語。

下面，以李零按文字風格分類法為基礎，我將郭店竹簡的文字風格區別為四種（將李零分類中的頭兩種文字風格隸屬於一種）：

文字風格	竹簡編聯	風格特徵
A	《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	規整，有序，謹飭（慎密）
A/A*	《語叢四》	介於A與A*之間的風格
A*	《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	風格A之不規則、草體形式
B	《唐虞之道》《忠信之道》	質樸、靜穆、率真、方筆直線
C	《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	奔放、飛逸（流暢）、雄厚、雍貴、跳躍、柳葉狀筆畫
D	《語叢一至三》	規整、富於裝飾、修長、古意（仿青銅兵器銘刻）

第三層面，是使用某種獨特的手蹟表現某種特定的文字風格。在某些文本較長的寫本中普遍存在着這樣一種現象，即有一個或多個文本採用了同一文字風格但由多人書寫而成，這樣，其文本中就包含有不同的手蹟。如上所述，手蹟是指文字在某種特定文字風格中多種相同特點的表徵化。而不同手蹟的表現方式則必須在那些比特定文字風格特徵更加細微的環節中才能尋找到。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能將某一“手蹟”的概念與某一“獨特書寫者”的概念相混淆。不同的抄寫者，即便他們受訓於同一學派並從那裏繼承了同樣的運筆結字方式，也很難達到如此高度的一致，以致無法分辨出它們出於不同的手蹟。實際上，遇到這種例子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另一方面，一個書寫者可能會在一生中的不同時期使用不同的手蹟^①。由於簡文的各個部分好像是在同一時期內寫成的，因此很難將同一篇簡文中的不同手蹟歸於一人之手。而這些觀察結果對於古代簡帛文字來說，也許具

① 每篇獨立的書法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程度不同的變化性。但西方書法研究者通常認為，某人書法的非結構性細節性特徵在其少年至老年過程中保持着較大的穩定性，反之，在其青年與老年時期，甚至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其書法特徵就可能產生相當大的變化。如在青少年時期，其書法發展方向基本趨於固定的字形，而晚年則通常鑒於身體狀況的波動而使其書法風格變得缺少規律。通常書寫速度的減慢會導致個別筆畫與線條的不穩定性。我們同時還觀察到一些相互影響的其它因素。書法水準的高低有時還依賴於書寫者的年齡（沒有達到一定高度書法水準的青年人或是由於缺乏練習或體弱而失去書法水準的老年人）。因此，如果只知道一篇書法作品卻不瞭解其當時的背景情況，則很難區別出“稚嫩的遲疑和衰弱的顫抖”（Albert S. Osborn, *Questioned Documents* 《質疑文獻》Albany, N. Y.: Boyd Printing Company, 1910, 98頁）。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因為雖然使用不同手蹟書寫成的不同簡文很可能是不同書寫者寫的，我們還是不能完全排除同一人在他一生中的不同時期完成那些簡文的可能性。

通常來說，在由文字拼寫而成的文獻中進行文字筆蹟的分析時，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已趨於從對文字的概括印象轉向具體細節。這些相關的細節範圍從簡文的佈局特徵（例如空間的利用、文字的大小、文字間隙等）到字體與正字法的特性以及單獨筆畫的特徵（如書寫速度、用力程度、用墨飽和度、補筆頻率、筆畫間的連接與傾斜度）。尤其是運筆結字方面的特徵例如筆畫次序、筆畫的狀貌，雖然不能作為筆蹟分析的唯一標準，但將為我們提供最重要的信息。

簡帛文獻中不同手蹟的區別迄今面臨著一些特殊的問題。其中最尖銳的一個應當就是，在古文字書法研究中特別缺乏基於已被驗證或實踐過的準則。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現有的書法研究方法都是因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而形成的。因此，祇有對其中的部分方法進行必要的修改後才能適用於古代簡帛文字的研究。筆相學雖然也是研究書寫者按其書寫習慣而形成的書法作品，但這種方法的着眼點是筆蹟如何反映書寫者的心理，完全不同於我們的研究目的。刑事鑒識筆蹟學的目的則針對於偽作的鑒別，因而更多地注重於抄寫者有意識地對其書法所起的影響。偽作鑒別無疑會在簡帛文字研究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例如上海博物館 1996 年從香港古玩市場購獲的戰國楚竹簡，確定其真實性的學者承擔了非常重大的責任。無論如何，在簡帛研究中，我們在鑒別那些被懷疑為偽作的簡帛時，幾乎找不到一個已知的獨特的由同一手蹟寫成的樣品作為參照。在中國傳統中，筆蹟的評估主要重視其書法的整體圖景，或多或少地將其視為一種藝術形式的表現，因而，大多都從藝術的角度作出評論。以上粗略推想的三種方法中，的確有某些共同的關注點（如傳統的書法研究是與偽作的鑒別和文字中書寫者個性的表達等問題有關），其中的某些方面對簡帛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簡帛研究與西方遠古時代和中古時代寫本研究有某些共同點，然而我們所從事的簡帛研究卻面臨著鉅大的不利因素，即我們對中國古代當時的簡帛製作方式、具體條件及社會背景一無所知。無論如何，除非有充分的證據可以作出解釋，無論是古代漢字簡帛還是西方中世紀文獻，我們都沒有根據聲稱書寫者力求在其書法中表現自身個性，或者他們試圖創造出精美燦爛的藝術作品，或者是經常地摹仿他人的筆蹟。一般來說，我們寧可假設這些書寫者是受過專門訓練的技工，他們必須遵守特定的並非其自身選擇的書寫慣例。他們的書法必須理解為高度的非個性化。

由於可供使用的原始簡帛古籍相當之少，使得我們對於簡帛筆蹟研究存在鉅大障礙，

① 此外，在簡牘帛書中，如果這種變化並非僅僅出現在某一支簡中，那麼至少存在着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後來的同一個人將他生前早就寫好的附加簡或修改簡或替換簡編入了該組。

因為對文字細節的判斷原則上必須基於對原始簡帛寫本的詳細審察，而這種審察即使是高清晰度的相片和高倍放大鏡加起來都無法替代的。^①不過，如果無法借助於原始寫本，我們還可以利用最好的複製品，但必須意識到其內在不準確性因素。更大的困難來自於軟筆書寫用具。我們可以很容易就確切地判斷出西方中世紀文獻的書寫者所持羽莖或鋼筆的角度；而要通過用毛筆書寫的簡帛文字的筆畫來判斷書寫者的持筆角度，則是相當困難的。另一方面，在大多數硬筆書法中，通過近距離觀察書寫載體，就可以得知書寫者手臂的重量與壓力；而通常在軟筆書法中，需要借助於高倍放大鏡甚至顯微鏡，從水平表面上筆畫的形狀來說明書寫者手臂的垂直縱向運動。

另一個問題是，區別不同的手蹟需要對反復出現的各種字元元素進行觀察。即使是再短的拼寫文字文本也會提供給我們相當數量可供比較的字元。在由文字拼寫而成的寫本中進行文字筆蹟的分析不依賴於文獻的內容，因為尺寸和形狀基本相同的字母會重複出現在完全不同的詞語當中。在漢字文本中，書法分析必須依賴於出現最多的文字以及頻率最高的文字偏旁^②。某種獨特書法的文字特徵對區別不同的手蹟並非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常見的、簡易的字形特徵基本體現了書寫者運筆過程中的習慣，這些特徵相對於那些複雜字形中所體現出的高度的有意識選擇性特徵更具參考價值。

下面列舉的，是我認為同一篇簡文中不同手蹟的例子。我將通過這一例證歸納出一些有助於辨別簡帛古籍中不同手蹟的可行性基本原則。

在郭店《老子》甲篇前 10 支簡中，第 5 簡和第 6 簡由於多種原因顯得尤為突出（見圖 1）。兩支簡的文字在整體印象上缺乏平衡（此以“手蹟 B”和“手蹟 A”分別表示相反的兩種手蹟，下同）；與前後各簡相比，其文字風格充滿活力，筆畫較厚重、擁擠。觀察第 5 簡和第 6 簡中某些文字和個別筆畫具有相同的特徵。這兩支竹簡文字筆畫看上去用墨厚度缺乏控制，與其它各簡不同。也就是說，書寫者在起筆時較為用力，充滿動感，使得筆畫首部都非常明顯；將筆畫延伸後，毛筆迅速抬起以致於筆畫尾端尖銳，使得一些原本是橫畫的近乎呈三角形；如，手蹟 B 𠂇或𠂈與手蹟 A 𠂉或𠂊的對比等。^③這一特徵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簡中尤為明顯（如《民之父母》、《容成氏》和《恆先》等）。

在“八”“口”“曰”等以及相似的字形中，我們還可觀察到結字筆畫狹窄、迅速的特徵：如手蹟 B 中𠂇或𠂈與手蹟 A 中𠂉或𠂊的對比可見^④，手蹟 B 中間偏左的偏旁“口”與左

① 尤其是文字中筆畫的數量和順序無法根據照片作出準確的判斷。

② 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些偏旁由於在文字中所處位置不同，及與文字組合的不同引起了大小與形狀上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的發生則遠遠多於拉丁字母在文本拼寫中的變化。

③ 以上圖例出現的順序為：手蹟 B #1.5.24, 1.6.24；手蹟 A #1.10.19, 1.12.2。每個文字編碼由圓點分為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的數位分別代表所引文字的位置：竹簡所在組的編號（據《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所在行（即竹簡）的編號、所在行的文字序號。下同。

④ 圖例出現的順序為：手蹟 B #1.6.6, 1.6.8；手蹟 A #1.14.3, 1.1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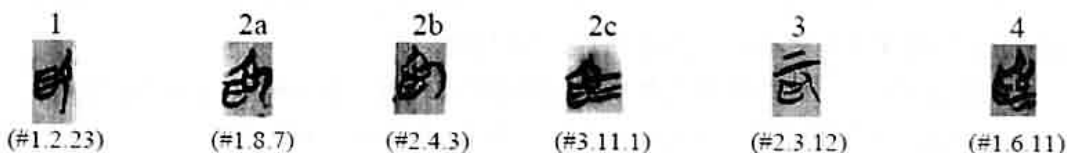
上角的偏旁“大”都較窄，且較短的橫畫明顯下彎，與手蹟A中同樣位置的偏旁不同。諸如“古”、“足”等字中亦存在這一明顯的特徵：如手蹟B中𠂔或𠂔與手蹟A中𠂔或𠂔的對比^①。

在A*文字風格的竹簡中，《老子》甲篇中被認為屬手蹟B的第5簡和第6簡之獨特特徵，也有典型代表性。如下圖所示^②：



或許有人會懷疑，那些使第5簡和第6簡文字區別於其它前後各簡的文字特徵應當歸結於書寫者使用了不同的工具、不同品質的墨水以及不同表面的書寫載體，而所有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的可能性上）有可能卻不一定代表書寫手蹟的變化。那麼，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將展示出另一些文字特徵。因為那些不同的特徵都在寫本的同一段出現，所以這些特徵變化的原因是無法用書寫工具和書寫載體的不同品質作解釋的。

無論是作為單字或是文字的一部分，在郭店楚簡中文字風格為A類的竹簡中出現了4種不同的“為”字的類型。（見圖2）：



如圖2所示，通常情況下，《老子》甲篇中之“為”字通常使用類型1（其它各處未見）和類型2；《老子》乙篇中之“為”字使用類型2和類型3；而《老子》丙篇和《太一生水》中的“為”字則僅使用類型2；《語叢四》中的“為”字既有類型2又有類型4。而《老子》甲篇中有一個“為”字使用了類型4，是個明顯的例外。在《老子》甲篇和《太一生水》中再無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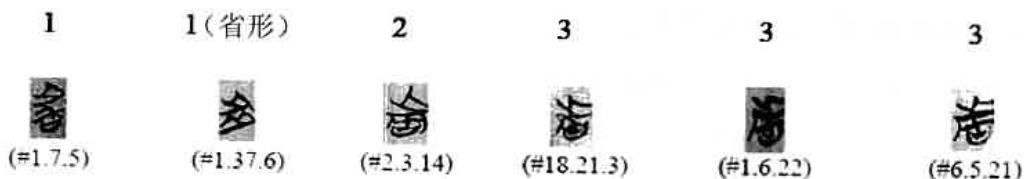
類型4重複出現在《語叢四》（即採用過渡性A、A*文字風格書寫的一組竹簡）中，而且在用A*文字風格書寫的四組竹簡（即《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中，類型4“為”標準表明，類型4是與A文字風格不同的A*文字風格特徵。僅僅觀察《老子》甲篇第6簡中“為”字的特例使用，並不表明這一定是一種不同的手蹟，因為（正象在此簡文其它各處一樣）同一書寫者可能偶爾也使用一次類型2的“為”字。但是，如果簡文

① 圖例出現的順序為：手蹟B #1.5.6, 1.6.7；手蹟A #1.11.8, 1.2.4。

② 圖例出現的順序為：《緇衣》#5.30.5, 5.42.21, 5.39.4, 5.28.1, 5.28.6, 5.35.10, 5.35.17；《魯穆公問子思》#6.3.1；《窮達以時》#7.12.7。

的特定部分中同時出現了多種文字特徵的變化，就必須將其視為不同手蹟的表現了。

“者”字是一個更加複雜的例子。下面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者”字（見圖3）：



如圖3所示，《老子》乙篇、丙篇和《太一生水》（類型2）中，“者”字不同於《老子》甲篇（類型1）中之“者”字；《語叢四》中的“者”字（類型3），與類型2的“者”字僅略有區別，《老子》甲篇第6簡中那個例外的“者”字與此十分相近，也屬於類型3。象上述“爲”字的例子一樣，這種在《老子》甲篇當例外的字形也常見於文字風格A*的簡文。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甲篇中無論是完整或是省略書寫的“者”字都具備的特徵即其橫畫均上斜，而此特徵不出現於第六簡。此大約20°—25°的上斜橫畫是《老子》甲篇中書寫手蹟的典型代表，詳見下例。

“之”是竹簡中出現最多的文字。該字均由四畫組成，其中有兩畫從左上頂部至右下底部。其它由頂部至底端的一畫和剩餘由左向右的一畫，暫不考慮其傾斜度，且稱之為一豎和一橫（見圖5a-b）。我們會再一次發現，《老子》甲篇第5簡和第6簡中“之”字的一豎和一橫不同於其前後所有其它各簡中的“之”字。此處的“之”字，其一豎和一橫之間的角度大約為80°，幾乎成直角；反之，在《老子》甲篇其它各簡的“之”字中，此兩筆之間則呈40°—70°的銳角。然而，《老子》乙篇、丙篇和《太一生水》、《語叢四》諸篇中，“之”字一豎與一橫之間呈80°的寬角是較常見的。這一不同特徵並不是通過對文字的表像觀察就能顯示出來的，因為這些竹簡中整個文字的傾斜度亦經常變換，以至於那些主要的豎畫通常近似或正好是垂直的，而有時橫畫偶爾也近乎呈水平狀。因之，“之”字這一顯著特徵，並不是指該字中某一筆畫相對於欄邊之間的角度，因為這一角度很容易會隨着書手的書寫位置的輕微變化或者移動了書寫載體而變化。真正能夠區別不同手蹟的關鍵在於文字中各元素間的相對關係，即與書寫者受訓及研習過程中書寫習慣流變緊密相關的特徵，而不是與諸如書手的書寫位置這種受外部影響而產生的變化相關。雖然文字中筆畫間的相互關係是辨別不同手蹟的重要準則，但作為次要準則的文字整體傾斜度也應當予以考慮。在《老子》甲篇中，文字的整體傾斜度為20°—25°，正如“者”與“之”字中的橫畫，就幾乎比其它三篇簡文中的所有“者”與“之”字中的橫畫角度陡得多。另外，在《老子》甲篇的手蹟中，“之”字的豎畫總是與兩條對角綫交錯並與兩條對角綫左側底部的橫畫相牽連。這樣的豎畫都有很明顯的首部，可見毛筆的方向在起筆之後迅速改變，拖向左側而

非一直向下。正是這種方向的改變引起了豎畫與橫畫之間的銳角。而在其它書寫手蹟中，“之”字的豎畫首尾呈尖細狀，在輕微地彎曲後幾乎挺直向下，這樣豎畫的中部變得較為粗厚，使人想起有點象柳葉型的筆畫：

手蹟 A



(#1.10.26)

其它手蹟





(#1.6.10)



(#2.9.24)

《老子》甲篇第 6 簡的“此”字，其寫法與簡文中其餘“此”字截然不同（見圖 6）。雖然該字左側偏旁“止”的結構在《老子》甲篇中典型的屬手蹟 A 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一致，但這種手蹟的文字傾斜度也不同於第 6 欄及其它同一文字風格竹簡中的“止”。以《老子》甲篇第 10 至第 11 簡為例，“此”字左手偏旁橫畫的傾斜度（ 27° — 28° ）與“之”和“者”字中橫畫的傾斜範圍相當。《老子》甲篇手蹟中，“此”字右側偏旁的傾斜度為 54° — 61° ，而在《太一生水》中，該字的偏旁傾斜度為 82° — 85° ，而《老子》甲篇的第 6 簡中該傾斜度則為 101° 。也就是說，無論從文字與欄邊之間位置關係的次要準則，還是從文字中各筆畫之間位置關係的重要準則來看，第 6 簡中的“此”字與其它各簡的“此”字都是顯著不同的。從“此”字左右兩側偏旁的相對角度來看，在第 10 簡和第 11 簡中，分別為 26° 和 29° ，此處其左側的“止”字偏旁為常用字形，其簡化形式的角度為 55° ；而在其它手蹟的簡文中，該傾斜度則為 71° — 100° 。象以前所舉諸例一樣，《老子》甲篇中所用的書寫手蹟即 55° 明顯不同於其它風格 A 或風格 A* 簡文中的書寫手蹟。而《老子》甲篇第 6 簡文字的特徵則比其前後各簡更類似於例舉的後一種手蹟的特徵。

從客觀判斷的可能性來看，以上類型的細節性研究方法看上去似乎沒有必要或者顯得過於誇張，但這些方法最終的確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可供採信的準則，使我們在難以判定各種不同手蹟的構成特徵時有所依據。正是由於抄寫者們的書寫方式不同於機器列印，才不斷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變性。因而，我們應當確定各書寫者其所寫字的具體的變形程度。祇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真正地區別出某種手蹟不同於其它的特徵。這樣做與其說是排斥研究寫本的主觀因素，倒不如說是為區別不同手蹟的主觀判斷提供證據。所有這些判斷標準都祇是基于可能性，那些無法用不同手蹟解釋的異體字或者與不同手蹟變化相異的字例，應當視為同一種手蹟的變體。

例如，“與”字的底部從  到  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但這種變化不能用作是風格 A 簡文中區別不同手蹟的準則（見圖 7a）。同在第 35 號簡上的兩個“與”字（1.35.19 和

1.35.19.24), 其底部分別使用了𠂔和𠂔, 且與今傳本《老子》第44章文首有“與”字的並行段相對應(包括1.36.4及鄰簡):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此處, 我們不能將該變化形式視為判斷不同手蹟的準則, 原因即在於, “手”旁形狀的變化看不出有規律可尋, 與其它各種變化並不相符(見圖7b)。起初看來, “也”字的不同字形是可以用來辨別《老子》甲篇與其它四種用同一書寫風格的簡文。《老子》甲篇中的“也”字似乎具有其獨特的特徵(見圖8): 其頂部右側下行的筆畫略微向左側彎曲, 通常切合於文字的左半部而不是呈尾形筆畫。而後四篇簡文中的“也”字, 該筆畫從偏左側起筆, 然後向右下方呈對角綫運筆, 最後形成尾形筆畫, 構成了兩個不同方向筆畫相交而成的角度。這一區別儘管非常明顯, 但仔細觀察後就會發現, 這是一個漸進的變化過程。再者, 這兩種字形在風格A*簡文中某一點上交替出現的情況, 不能用“不同抄寫者所為”來解釋。

總之, 在同文字風格A的竹簡中(《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和《語叢四》), 《老子》甲本的手蹟明顯區別於其它各種寫本。然而, 其中的第5簡和第6簡卻使用了一種非常相似於A*風格簡文的不同手蹟, 並顯示出眾多不同的特徵。我們發現《老子》甲本使用了不同於其它各篇的A種手蹟, 比發現其第5簡和第6簡使用了B類手蹟還重要。這一發現使得下面這一假設成為可能, 即《老子》甲篇之所以在有關《老子》文本的竹簡中佔有突出重要的位置, 不僅僅是由於其竹簡最長且佈局精細, 更由於其出自另一人之手。對此, 我們可以推想出如下原因: 在《老子》甲篇的製作過程中, 使用A類手蹟的書寫者中途被臨時替換為採用B類手蹟的書寫者, 或者是這兩組簡後來由於受損或發現存在錯誤而被替換。理論上還有一種可能性: 在1993年竹簡出土後的整理復原過程中, 第5簡和第6簡也被錯誤地編入現在的位置, 但是由於文本的連續性我們可以排除這種可能性。有關《老子》甲篇中存在手蹟變化的原因研究, 已遠非本論文所涉及的範圍, 有限的資料恐怕會使解開謎底的希望微乎其微。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 上述討論涉及到判斷不同手蹟的各種獨特特徵有: 不同的總體印象、不同的筆畫特性、某些文字的形態學差異、文字與欄邊的相對傾斜度、文字中各筆畫間的角度, 等等。在適用過程中, 某一單獨的變化特徵本身是不能作為判斷準則的, 而應當是各種獨特特徵在與前後各簡相對照下同時存在才可以作出推斷。尤其是因為我上述的觀察僅局限於文字形態學與執筆方式的研究, 所以, 祇有各種特徵的同時變化才能推斷不同手蹟。對一種手蹟的鑒別通常應當基於更加寬泛的基礎之上, 包括佈局特徵如文字尺寸及空間疏密、分章句讀等。鑒於這些特徵有較大的不規律性, 出現較少, 因此, 相對於從對應文字的拼寫上尋找規律而言, 歸納出各種手蹟變化的獨特性是更加困難的課題, 有待

於進一步深入研究。^①

綜上所述，試將辨別不同手蹟的設想和適用原則陳述如下：

1. 解決各種不同手蹟的推斷問題時，不僅應當考慮文本的整體印象，還要關注文字各種具體特徵。無論如何，雖然我們應當力求基於客觀證據，但總還是免不了參入一定的主觀因素，因此，我們最後以可能性大小來作出決定。

2. 作為判斷不同書法特徵的重要前提，我們必須非常熟悉不同時期不同文字的各種特徵，這樣便不至於錯誤地將某一特定的特徵理解為是某個特別的抄寫者個人所為，而事實上，這種特定的特徵可能是當時在一群人中通用的慣例。

3. 上述各種設想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對抄寫者的判斷。除非我們能夠發現一些可信的理由證明他們的確曾這樣做過，否則，即使他們的書法發生了較大變化，也不會出現在同一文本中各種文字特徵同時發生變化的情況。

4. 如果上述諸特徵中僅有其中一種變化，我們則不能輕易地將其歸因於書寫者。僅僅某一種特徵上的區別，通常不能將其作為辨別不同手蹟的充足依據。因為每種手蹟的鑒別都應當基於各種不同特性的綜合反映，那些獨特的綜合性也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作出相應的判斷。並且，已有的各種特徵應當具備一定程度的持續性，使之可以清楚地與其它手蹟區別開來。

5. 由於書寫者故意選擇而引起的字形變化，在判斷不同手蹟的過程中屬於次要準則；而那些受過專門訓練，通過手臂的習慣性連筆引起的字形變化，則可以作為判斷的重要準則。相對於結構性特徵，文字中單個筆畫的不同特性等非結構性特徵更具標準性。相關聯的參數比孤立的參數更有可比性（例如當書寫者改變他的位置時，該簡的文字與簡邊的角度也會發生變化，而同一文字中各筆畫之間的角度仍然會體現出他自身的書寫習慣）。

6. 一個抄寫者的手蹟會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而且，一個職業抄寫者似乎能夠掌握不同的文字類型、不同的文字風格。因此，不僅不同的文字風格，甚至不同的手蹟也並非一定代表是由不同書寫者書寫成的。

7. 文字類型越是質樸、率真，便會越多地顯露出該類文字的手蹟特徵。而在文字風格端莊、富於修飾的文本中（例如《語叢一至三》、《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由於書寫者在個別筆畫上有意識地做了處理，其手蹟特徵顯示出的是更多有意識的變化，因此，很難鑒別其中哪些部分是由同一書寫者書寫而成的。

（孫進 譯）

^① 例如，有人會認為，《老子》甲篇中兩個蝌蚪符的出現應當作為一個獨特的特徵。然而，符號出現的頻率就會顯得太緩慢而無法對整篇簡文內容作出合理的推論。與《老子》甲篇的簡文長度相比，《老子》乙篇的長度祇有其三分之一，而《老子》丙篇和《太一生水》篇則祇有其四分之一的長度。因此，在篇幅較長的《老子》甲篇中出現的這兩個蝌蚪符不一定代表不同的標點符號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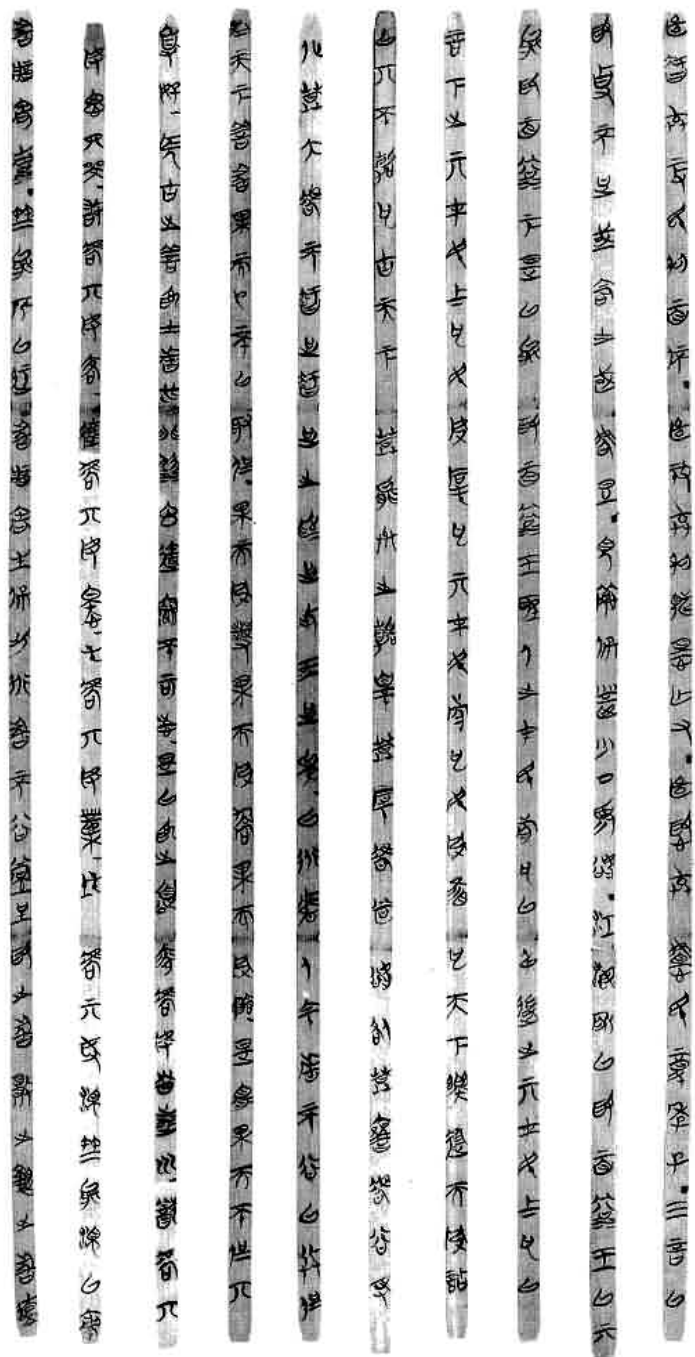


圖 1:《老子》甲篇 1-10 簡 (文物出版社, 1998)








































<i>Laozi A</i>		<i>Laozi B</i>	<i>Laozi C</i>
1.01.18		1.13.18	
1.02.01		1.14.12	
1.02.23		1.14.14	
1.03.02		1.15.14	
1.03.09		1.17.06	
1.06.11		1.17.21	
1.08.07		1.21.17	
1.08.21		1.22.02	
1.10.22		1.25.26	
1.11.07		1.29.14	
1.13.02		1.32.03	
1.13.06			
		2.03.12	
		2.03.23	
		2.04.03	
		2.04.07	
		2.06.03	
		2.07.10	
		2.08.01	
		2.08.14	
		2.10.05	
		2.15.10	
			<i>Tai yi sheng shui</i>
			4.07.10 
			<i>Yu cong 4</i>
			18.05.07 
			18.08.08 
			18.14.13 
			18.16.09 
			18.25.12 

圖 2 《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語叢四》簡文中之“爲”與“愚”

<i>Laozi A</i>	<i>Laozi B</i>	<i>Laozi C</i>	<i>Yu cong 4</i>
1.06.22	2.03.09	3.06.15	18.05.06
1.07.05	2.03.14	3.11.03	18.08.03
1.08.09	2.07.09	3.11.08	18.08.07
1.10.01	2.15.16	<i>Tai yi sheng shui</i>	18.16.14
1.10.10	2.15.21	4.04.05	18.17.06
1.10.17		4.04.13	18.19.01
1.10.24		4.04.21	18.20.01
1.10.29		4.05.01	18.21.03
1.27.05		4.05.08	
1.27.09		4.05.16	
1.33.5		4.06.01	
1.37.6		4.09.07	
1.37.12		4.09.11	
		4.11.04	
		4.14.01	
		4.14.10	

圖3 《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語叢四》簡文中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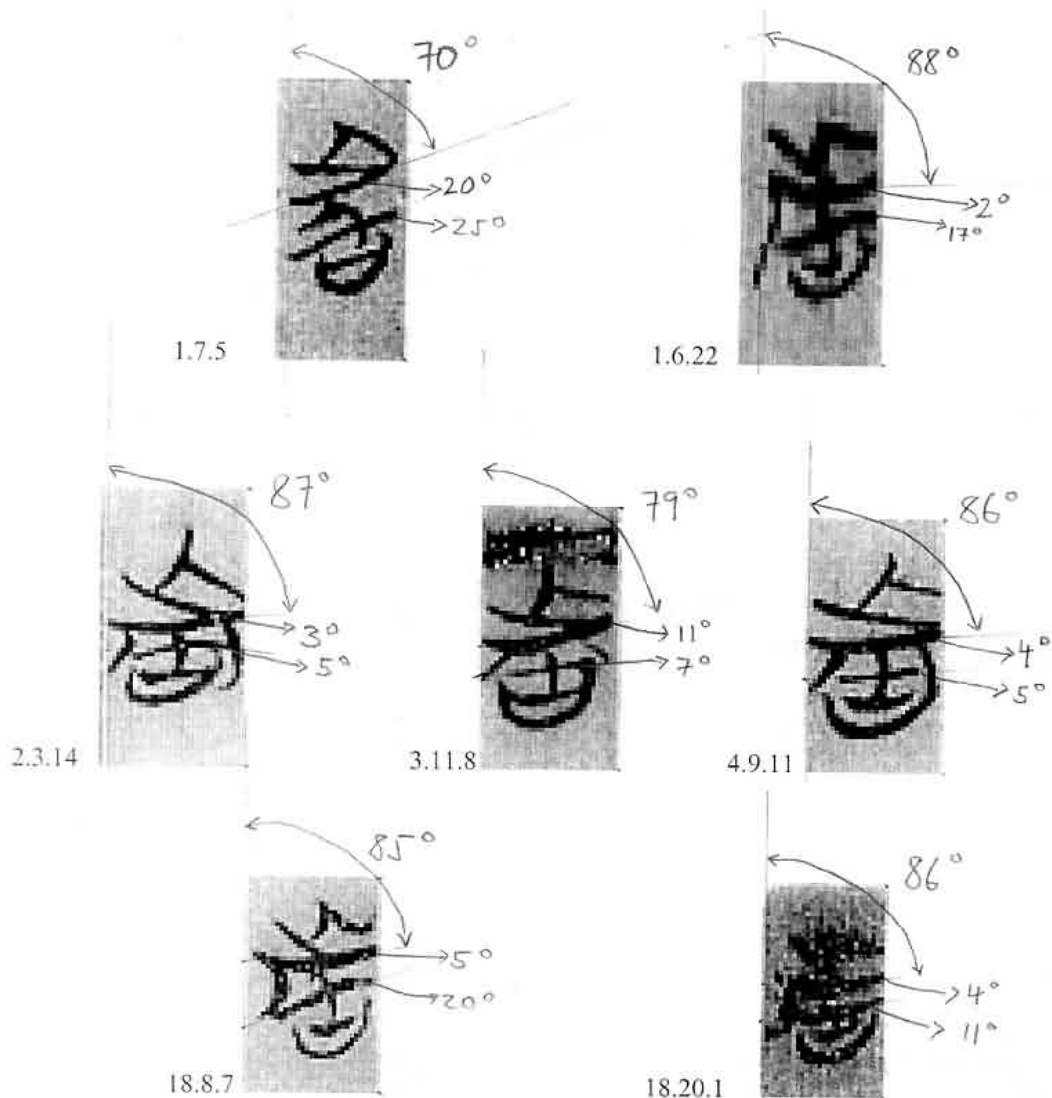


圖4 《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語叢四》簡中，“者”字的上斜筆畫及文字的傾斜度

Laozi A			Laozi C			Laozi B			Yu cong 4		
1.2.7	𠄎	1.16.3	𠄎	1.34.21	𠄎	3.1.6	𠄎		4.11.17	𠄎	
1.3.15	𠄎	1.16.9	𠄎	1.37.14	𠄎	3.1.11	𠄎				Yu cong 4
1.3.23	𠄎	1.16.15	𠄎	1.37.19	𠄎	3.1.15	𠄎		18.3.2	𠄎	
1.4.3	𠄎	1.16.21	𠄎	1.38.1	𠄎	3.1.19	𠄎		18.3.10	𠄎	
1.5.12	𠄎	1.16.27	𠄎	1.38.9	𠄎	3.5.8	𠄎		18.4.6	𠄎	
1.6.10	𠄎	1.17.7	𠄎	1.39.7	𠄎	3.5.13	𠄎		18.5.3	𠄎	
1.8.5	𠄎	1.17.12	𠄎			3.7.5	𠄎		18.6.1	𠄎	
1.8.22	𠄎	1.19.2	𠄎		Laozi B	3.7.14	𠄎		18.8.11	𠄎	
1.10.23	𠄎	1.19.19	𠄎	2.2.12	𠄎	3.9.14	𠄎		18.9.1	𠄎	
1.10.26	𠄎	1.20.15	𠄎	2.3.5	𠄎	3.10.6	𠄎		18.10.3	𠄎	
1.10.28	𠄎	1.20.23	𠄎	2.3.17	𠄎	3.10.14	𠄎		18.10.10	𠄎	
1.11.1	𠄎	1.21.26	𠄎	2.6.7	𠄎	3.11.2	𠄎		18.11.5	𠄎	
1.11.18	𠄎	1.22.3	𠄎	2.6.11	𠄎	3.11.5	𠄎		18.14.11	𠄎	
1.12.7	𠄎	1.23.12	𠄎	2.9.24	𠄎	3.11.7	𠄎		18.15.1	𠄎	
1.12.14	𠄎	1.25.27	𠄎	2.10.13	𠄎	3.11.10	𠄎		18.15.10	𠄎	
1.12.25	𠄎	1.26A.5	𠄎	2.16.11	𠄎	3.12.11	𠄎		18.18.3	𠄎	
1.13.12	𠄎	1.26B.4	𠄎	2.16.18	𠄎	3.12.21	𠄎		18.19.4	𠄎	
1.13.24	𠄎	1.27.4	𠄎	2.17.1	𠄎	3.13.9	𠄎		18.20.5	𠄎	
1.13.28	𠄎	1.27.8	𠄎	2.17.8	𠄎	3.14.1	𠄎		18.27.13	𠄎	
1.14.23	𠄎	1.31.19	𠄎	2.17.15	𠄎		Tai yi sheng shui		18.27v.6	𠄎	
1.15.3	𠄎	1.33.3	𠄎			4.8.14	𠄎		18.27v.9	𠄎	
1.15.13	𠄎	1.34.6	𠄎			4.10.6	𠄎		18.27v.11	𠄎	
1.15.29	𠄎	1.34.11	𠄎			4.10.13	𠄎		18.27v.14	𠄎	

圖 5A 《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語叢四》簡中的“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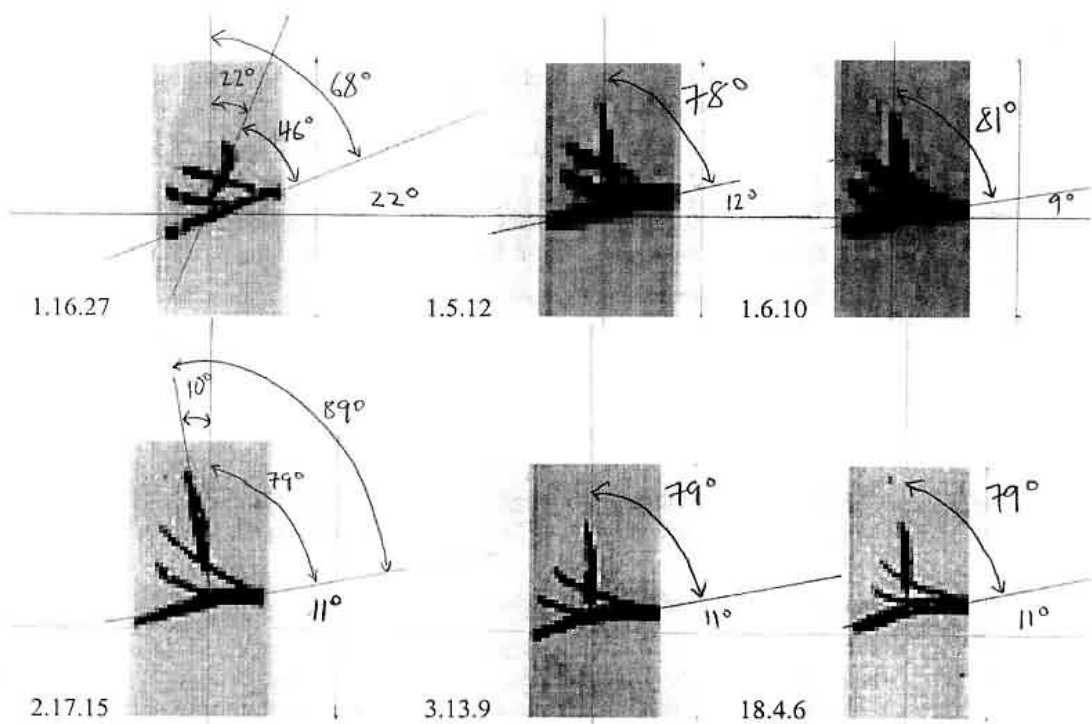


圖 5B “之”字的上斜筆畫與筆畫間的角度，在手蹟 A（《老子》甲篇）與手蹟 B（《老子》甲篇之簡 5 與簡 6，《老子》乙篇、丙篇，《語叢四》）中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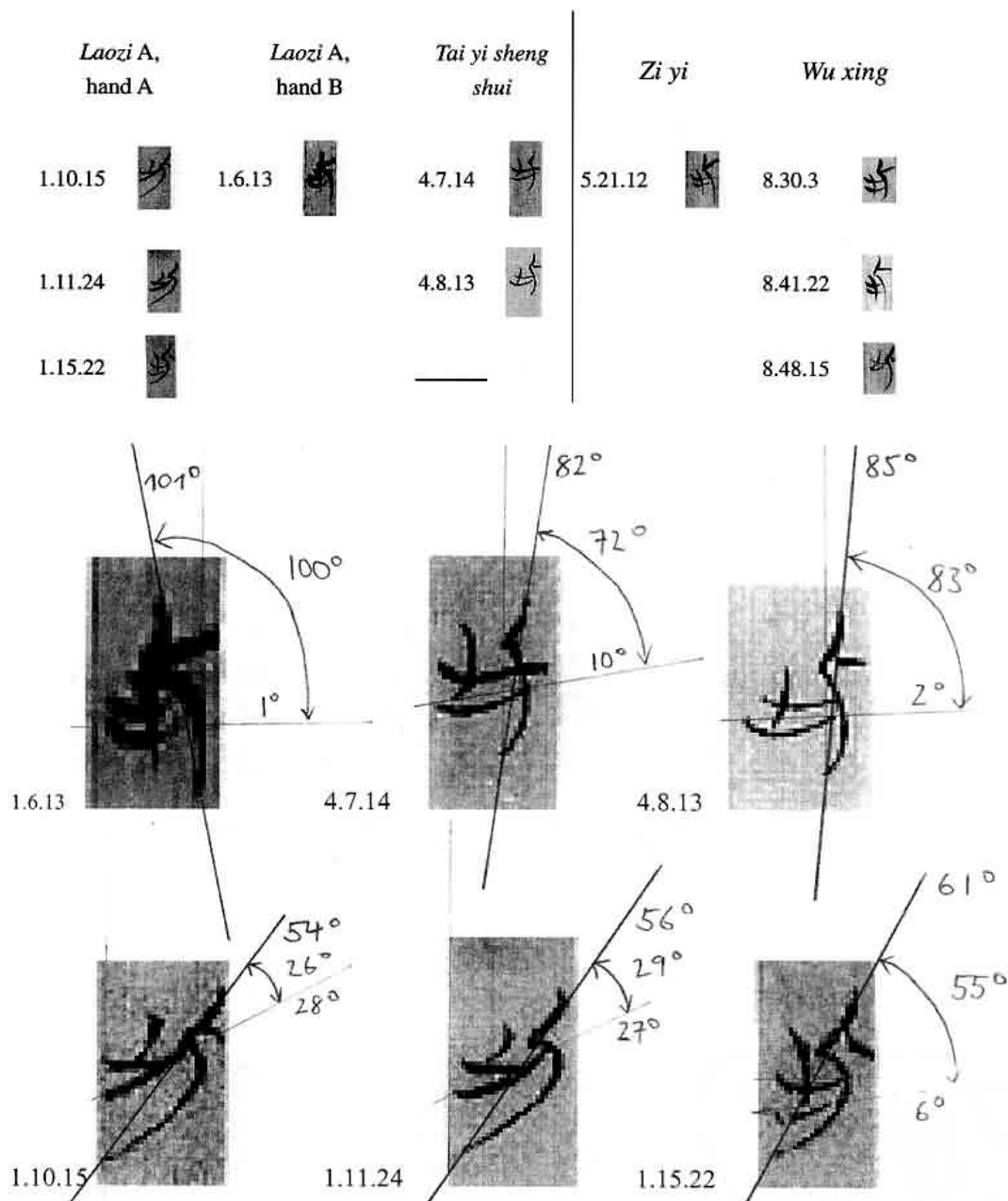


圖6 《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語叢四》簡中的“之”字

Laozi A		Laozi B		Yu cong 4	
1.5.11		2.4.13		18.12.2	
1.20.24		2.4.20		18.13.5	
1.23.18				18.13.13	
1.35.19		Laozi C		18.14.10	
1.35.24		3.4.14			
1.36.4					

圖 7A:《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語叢四》簡中的“與”字

Laozi A		Laozi B		Laozi C		Yu cong 4	
1.1.16		2.2.10		3.1.5		18.2.4	
1.15.27		2.7.6		3.2.1		18.5.15	
1.19.27		2.7.12		3.3A.4		18.14.5	
1.20.3		2.10.12		3.3A.12		18.16.5	
1.21.1		2.16.22		3.3B.2		18.22.17	
1.22.24						18.23.9	
1.26A.2				Tai yi sheng shui		18.26.4	
1.31.14				4.14.2			
1.37.23				4.14.11			

圖 7B 《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語叢四》簡中的“又{有}”^①字

① 曲括弧{}是專指某一詞,不論簡文中用何字代表這個詞。在此,我遵循裘錫圭先生著《文字學概要》中古文字釋例標準。

<i>Laozi A</i>				<i>Tai yi sheng shui</i>			
1.3.19		1.24.4		1.39.1		4.2.1	
1.3.28		1.24.8		1.39.9		4.2.10	
1.4.8		1.24.17				4.2.19	
1.4.12		1.25.3		<i>Laozi B</i>		4.3.3	
1.4.17		1.25.6		2.3.7		4.3.12	
1.4.21		1.25.10		2.4.1		4.3.21	
1.5.5		1.25.13		2.6.5		4.4.10	
1.13.7		1.25.16				4.4.18	
1.15.16		1.25.19		<i>Laozi C</i>		4.5.13	
1.15.32		1.25.22		3.2.9		4.5.21	
1.16.6		1.25.25		3.2.21		4.6.6	
1.16.12		1.26A.3		3.5.6		4.10.3	
1.16.18		1.30.10		3.5.21		4.10.10	
1.16.24		1.34.13		3.7.12		4.10.19	
1.16.30		1.34.23		3.9.15		4.11.20	
1.17.20		1.37.5		3.11.18			
1.17.25		1.37.9		3.12.13		<i>Yu cong 4</i>	
1.18.3		1.37.11		3.12.19		18.21.15	
1.18.8		1.37.16				18.27v.3	
1.19.12		1.38.14					
1.20.19		1.38.22					

圖 8 《老子》甲、乙、丙篇、《太一生水》、《語叢四》簡中的“也”字

《上博竹書（五）》零識

武漢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李天虹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對《上博（五）》的部分字詞進行探討。如認為《競建內之》“不出三年，糴人之怀者七百邦”當讀為“不出三年，狄人之附者七百邦”，適與《尚書大傳》“三年，編髮重譯至者六國”相應。認為《鮑叔牙與隰朋之諫》“至惡何，而尚不時克”當讀為“至惡苛，而尚不時使”，語可參《論語·學而》“使民以時”、《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等。

關鍵詞 上博五 字詞 考釋

一

《競建內之》2、4-3-8 號簡原釋文（為方便起見，引用釋文儘量採寬式，下同）^①：

……隰朋曰：群臣之罪也。昔高宗祭，有雉雉於隰前，謨祖己而問……高宗命

傳說，量之以祭，既祭焉，命行先王之灋……不出三年，糴人之怀（背）者七百邦。

整理者指出，簡文所記高宗祭祀之事，見於《尚書·高宗彤日》。《書序》：“高宗祭成

① 簡序編排從陳劍說，陳文原序為簡 2-7-4-3-8，為簡便起見本文引述有省略，參看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簡帛網，2006年2月19日。

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發重譯至者六國。”

𠄎，整理者未釋。已有研究者隸定爲“𠄎”，並據《尚書》讀爲“彝”，可從。^①

𠄎，簡文原從“邑”，整理者以爲是地名。𠄎，整理者讀爲“背”或“倍”。

今按，將簡文與《尚書大傳》相關記載對比分析，可知簡文之“𠄎”當讀作“狄”。“𠄎”从“翟”聲，古音“翟”屬定母藥部，“狄”屬定母錫部，聲母相同，韻部相隔稍遠。但古書“翟”、“狄”通用之例甚多，不勝枚舉。^②𠄎，讀作“背”或“倍”於文意不通，疑當讀爲“附”。古音“不”是幫母之部字，“附”從“付”聲，是幫母侯部字，二字聲母相同，韻部相隔稍遠。但古書有“不”聲字與“付”聲字通用的例子。《詩經·小雅·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不當作拊，……古聲不拊同。”《禮記·月令》“蟄蟲壞戶”，《呂氏春秋·仲秋紀》“坏”作“俯”^③。簡文“不出三年，狄人之附者七百邦”，適與《尚書大傳》“三年，編髮重譯至者六國”相應。^④

二

《鮑叔牙與隰朋之諫》7號簡原釋文：

鮑叔牙答曰：“齊邦至惡，死而尚秋（揪）其刑，至欲食而尚厚其斂，至惡何，而尚不時𠄎（變）。”

季旭昇先生將上段文字標點爲^⑤：

鮑叔牙答曰：“齊邦至惡死而尚秋其刑；至欲食而尚厚其斂；至惡何而尚不時𠄎（變）。”

並讀“秋”爲“修”，解“何”爲“負荷”。

今按，從句例看季先生的斷讀比整理者合理，只是分號似應改爲逗號。讀“秋”爲“修”亦通。“修刑”一語見於傳世文獻，如《史記·周本紀》：“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

① 季旭昇：《上博五筭議（上）》，簡帛網，2006年2月18日；劉樂賢：《讀上博五（競建內之）劄記》，簡帛網，2006年2月20日。

② 參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469-470頁。

③ 參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366、434頁。

④ 陳劍讀“𠄎”爲“服”，亦通，參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

⑤ 季旭昇：《上博五筭議（上）》。

《秦本紀》：“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何，疑當讀爲“苛”。《玉篇》草部：“苛，政煩也。”又疑爲“擾”意，《國語·晉語一》“朝夕苛我邊鄙”，韋注：“苛，擾也。”

不時，此語古書常見，意爲“不以時”。夏，當讀爲“使”。《春秋》成公十八年“築鹿囿”，《左傳》：“書，不時也。”杜注：“非土功時。”《論語·學而》“使民以時”，《集解》引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禮記·檀弓下》“使之雖病”，鄭玄注“使”：“謂時繇役。”《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三

《季庚子問於孔子》4號簡原釋文：

且管仲有言曰：君子恭則遂，驕則侮，備言多難。

整理者謂“備”意爲防備、戒備，“備言多難”意爲“要戒備言多患難”。

按，這裏的“備”，疑爲“盡”之意，“備言”猶古籍中的“盡言”。《儀禮·特牲饋食禮》“尸備荅拜焉”；《禮記·檀弓上》“士備入而后朝夕踊”，鄭玄注：“備猶盡也。”《漢書·五行志中》：“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又陳偉先生認爲，“備言”亦可理解爲詳說。《漢書·杜欽傳》：“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杜預《春秋左傳序》：“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四

《季庚子問於孔子》6—7號簡原釋文：

夫書者，以著君子之德也；夫詩也者，以誌君子之志；夫義者，以斤（謹）君子之行也。君子涉之，小人觀之。君子敬成其德，小人毋寐。

整理者讀“義”爲本字，讀“斤”爲“謹”，又謂“斤”有“仁、明察、謹慎等意”。

按：本段的前三句是排比句，書、詩都是具體的東西，而“義”是抽象的概念，所以我懷疑“義”應當讀爲“儀”。“儀”可指禮儀，但在這裏也可能指記載禮儀的文字或文

章。“斤”和“謹”古音相同，都是見母文部字。“謹”有“恭敬”意。《玉篇》言部：“謹，敬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但從前面“以著”、“以誌”的用語看，讀為“謹”似有不妥，姑存疑待考。

涉，入也。《左傳》僖公四年：“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漢書·高帝紀》“涉魏而東”，顏注引晉灼曰：“涉猶入也。”“涉之”、“觀之”的“之”，應指“書”、“詩”和“儀”。

毋，簡文原作“母”，疑讀為“晦”。母、每古音相同，都是明母之部字；從“每”之字，楚簡文字常從“母”。寐，疑讀為“昧”。晦、昧為同義詞。《詩·周頌·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晦，昧也。”鄭箋：“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左傳》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杜注：“昧，昏亂。”《尹文子》佚文：“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簡文“晦昧”大概類似於今之“懵懂”、“愚昧”。


那麼這段簡文的大意是說，“書”是著君子之德的，“詩”是記君子之志的，“儀”是“斤”君子之行的。君子深入其中，小人觀而視之。君子敬以成其德，小人懵懂昏昧。

五

《弟子問》5號簡原釋文：

子曰：“小子，來，取余言，……”

同篇15號簡所記也是孔子之語，其云“回，來，吾告汝……”，整理者指出可與5號簡互參。

按，“取余言”文意難明。所謂“取”，原簡作，與“取”字寫法不完全一致，其右旁上部也有可能是“口”，頗疑此字是“叩”之訛體。“叩（聽）余言”和15號簡的“吾語汝”語意相當。

六

《弟子問》11號簡原釋文：

宰我問君子，曰：“予，汝能慎始與終，斯善矣，……”

原簡“子”下有一短橫“-”，從釋文看，整理者認為是表示句讀的符號。

按，上引語句是一段文字的起始。按照《論語》的文例，同一段文字內，凡孔子答弟子問，第一次的答語“曰”前都有“子”字，以後的答語前或省略“子”，如：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憲問》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顏淵》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雍也》

兩相比較可以推測，此簡“子”後的“-”很可能是表示重文的符號。同篇 19 號簡以雙短橫“=”表示重文，但不能證明這裏的“-”一定不是重文符，郭店《老子乙》就是以“=”、“-”兩種符號表示重文。那麼，此簡的釋文或許當改為：“宰我問君子，子曰……”

七

《三德》5 號簡原釋文：

變常易禮，土地乃坼，民乃蠹死。

“蠹死”的讀法整理者存疑。

今按，“蠹死”疑當讀為“夭死”。古音“蠹”是曉母宵部字，“夭”是影母宵部字，非常接近。《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湖北隨州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云：“七月並居申，以行秋氣，必寒；溫，民多疾病，五穀夭死^①。”

（附記：本文將 2006 年 2 月發表於簡帛網的數篇小文刪改而成，文中個別觀點與大約同時發表在網上的一些學者的觀點相同，在此不一一說明。）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85 頁，文物出版社，2006。

里耶秦簡的文書形態與信息傳遞

[日] 愛媛大學 藤田勝久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的特徵如下：1. 里耶秦簡是有關長江流域洞庭郡所屬遷陵縣的資料集。由於很多文書有紀年和日期，因此可以結合年代對南方社會進行具體的分析。2. 木牘正反面的文字可以連續識讀。因此除了書寫錯誤外，沒有文字前後順序顛倒的錯簡，可以復原文書的形式及具體處理程序。本文想從文書形態和信息傳遞這一視角，考察其作為第一手資料的文書形式。本文特別考察了行政文書的信息傳遞。它有兩種形態，一是帶有收信和發信記錄、實際處理的形態，二是像⑨1—12文書那樣，僅將郡下達給縣的部分製成副本保存下來的形態。我推測，除陽陵縣和洞庭郡保存有副本外，接到洞庭郡文書的遷陵縣，在傳達的文書和抄本之外，還將其內容製成副本保存下來。這種文書形態除表明當時是以縣為基層行政組織外，還包含着極有意思的內容。

關鍵詞 里耶秦簡 文書形態 信息傳遞 郡縣

序 言

里耶秦簡是從湖南省龍山縣里耶故城的一號井坑出土的，大約三萬六千枚。^①据说包含了從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到秦統一，直至二世皇帝二年（前 208）的連續紀年。因此，僅從文字數量來看，里耶秦簡的字數超過了《史記》全書，是總括全部秦代史（始皇帝、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龍山縣里耶戰國秦漢城址及秦代簡牘》（《考古》2003 年第 7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嶽麓書社，2007）。

二世皇帝)的資料集。因此,現在雖然祇有三十多枚樣本資料被公佈,但圍繞歷史地理、文書的形式、秦代的地方官府、法制和行政等問題,已有若干論文和注釋發表。^①筆者在《里耶秦簡和秦代郡縣社會》(2005)一文中,也就古城和井坑的地理位置、資料的性質做了簡單的展望。^②

里耶秦簡的特徵如下:

1. 里耶秦簡是有關長江流域洞庭郡所屬遷陵縣的資料集。而且,不管它是怎樣被置於井坑中的,由於很多文書有紀年和日期,因此可以結合年代對南方社會進行具體的分析。

2. 木牘正反面的文字可以連續識讀。發掘簡報稱一枚牘上記錄一項內容的木牘有很多。^③因此除了書寫錯誤外,沒有文字前後順序顛倒的錯簡,可以復原文書的形式及具體處理程序。古墓竹簡和漢代邊境竹簡,很少有用細繩連結的冊書,進行連綴復原非常困難,與其相比,里耶秦簡的優點就可凸顯出來。^④

如上所述,從里耶故城井坑中出土的里耶秦簡,是保留秦代紀年的系列資料,並且多數文書可以單獨解釋,是極好的資料集。而且,從年代上看,它是連接戰國睡虎地秦簡和漢代張家山漢簡的資料。因此,本文想從文書形態和信息傳遞這一視角,考察其作為第一手資料的文書的形式。

隨着公佈的里耶秦簡的增多,可以預想對資料進行編年將成為可能。這應是按年代順序編纂的資料集。而且隨着各年代資料的增加,遷陵縣官府的構成人員便可以隨之明瞭,甚至能夠逐年復原人員構成情況。^⑤更重要的是,可以搞清楚遷陵縣這一地區是怎樣傳遞信息的。我們不僅要瞭解里耶秦簡包含了什麼信息,而且有必要搞清楚出土資料在社會背景中的意義,其線索就是木牘的文書形態。關於遷陵縣的文書往來,即使祇是樣本資料,也可反映它的若干特徵。

因此,本文在按木牘的形態和功能加以理解的同時,還嘗試復原遷陵縣信息傳遞的情況。進而以此為模型,重新考察古墓資料(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周家臺秦墓資料、張家山漢簡等)的特徵。這一視角是在縣級社會中確定出土資料地位的“資料學

① 前揭《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里耶秦簡講讀會:《里耶秦簡注釋》(《中國出土資料研究》8,2004),《里耶秦簡研究筆記》(《中國出土資料研究》9,2005),初山明:《龍山里耶秦簡》(2004年12月,木簡學會討論會報告),同氏:《湖南龍山里耶秦簡概述》(《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研究》,京都大學出版會,2006)等。

② 拙稿《里耶秦簡和秦代郡縣社會》,《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19,2005。

③ 前揭《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等。

④ 居延漢簡等冊書的特徵,在大庭脩《秦漢法制史》(創文社,1982)、《漢簡研究》(同朋舍出版,1992,徐世虹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同朋舍出版,1989)裏已有說明。

⑤ 馬怡:《里耶秦簡選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5年11月),按年代順序進行了注釋;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J1⑧157和J1⑨1-12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蹟和原存放形式》(《簡帛》第一輯,2006),對書寫的筆蹟等方面進行了考證。

方法”的嘗試。^①

一、有關遷陵縣文書的形態

里耶故城位於洞庭湖上游沅水支流酉水北岸。據推測，秦時它可能是洞庭郡所屬遷陵縣的城郭。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這裏出土的資料，或是傳遞給遷陵縣的，或是在此縣內處理和保管的，或者是郡或其它縣傳遞來的文書副本。下面試將已刊佈的里耶秦簡樣本資料中有關遷陵縣的文書，按內容和形態作如下分類：^②

- (一) 單獨使用的形態：曆譜、九九（乘法表）、習書等。
- (二) 中央下達的文書：詔書、命令、法令等。
- (三) 地方郡縣的行政文書：有關洞庭郡和縣的文書。
- (四) 地方向中央報告的文書：上計、賬簿等。
- (五) 封檢、標題簡等。

屬於（一）類的木牘有⑥1正面的“九九”表，它是唯一的單獨的表。在它的背面，寫有“以行郵”等的習書。周家臺秦墓出土的“曆譜”表，也是在單獨的木牘上書寫的，其上記錄了二世元年各月朔日的干支。^③這些木牘上的內容都和出土地無關，不是直接反映傳遞情況的文書。然而，“九九”表是進行行政計算的基礎，這和張家山漢簡中的《算數書》一樣，可以說是和官府職務有關的資料。^④“曆譜”雖不是反映傳遞過程的簡，但它同樣是秦王朝文書行政的基礎資料。因此，“曆譜”和“九九”表，也可以說是中央下發、傳遞給地方官府的資料。

第（二）類，中央下達的文書，通常有皇帝的詔書、中央丞相、御史下達的命令、法令等。^⑤但是，里耶秦簡中目前還沒有發現記錄詔書內容的資料，中央的命令也祇在①65、①66文書中作為物資運輸的規定被引用。雖然還不清楚是用竹簡還是木簡、木牘傳遞的，但肯定是中央下達給地方的資料。

第（三）類，地方郡縣的文書，有圍繞洞庭郡和縣的文書。其中有包含收信記錄、發

① 拙稿《中國出土資料和古代社會——以資訊傳遞為視角》（《資料學方法探討》4，暨大大學法文學部，2005），提出應超越僅從制度史和文書分類去理解遺迹資料、從思想史和文獻學的角度來考察古墓資料的視角，而將出土資料放在縣級社會中進行全面評價。

② 前揭拙稿《里耶秦簡和秦代郡縣社會》中，以曆譜、中央傳遞的命令、郡縣內部的文書為中心，對這些形態做了說明。本文探討的範圍稍有擴大，特別關注郡縣內的信息傳遞和保存。

③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開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

④ 關於《算數書》，除彭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注釋》（科學出版社，2001）外，還有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研究會（大川俊隆、岡山茂彥、小寺裕、角谷常子、田村三郎、田村誠、張替俊夫、吉村昌之）的注釋（《大阪產業大學論集》人文學科編，2002—2005）。

⑤ 關於這一點，在前揭拙稿《里耶秦簡和秦代郡縣社會》已簡單涉及。

信和處理的文書，從中也可以看到中央的信息。此類文書在里耶秦簡中有多種形式，包括洞庭郡和縣的實時往來文書，以及在遷陵縣內處理的文書。對此可做進一步的分類（參看卷末圖）。

第一種形式有：1. 如①65、①66，是郡傳遞給縣的。這兩簡的共通之處是，正面都記錄了 A 洞庭郡守告知縣嗇夫、卒史、假卒史、屬尉的同一內容。而在它的背面，B 左側記錄了日期和“~以來”的收信，C 右側記錄了處理指示、日期和“~行”等發信。而且，每個上面都有“某手”的書寫人的署名。這是從郡傳達到縣而後由縣處理的形式，郡和縣都記有“它如律令”的指示。這一形式和從他縣傳遞到遷陵縣的⑨984 文書（西陽守丞告遷陵丞），以及縣傳遞給所屬部門的⑧156（遷陵守丞下少內）等相同。

2. 縣下屬機構上報縣廷的文書。例如⑧152，A 正面記錄縣少內守向遷陵縣告知已收到“直書”。根據“文書收到後回復”的指示，少內守作出了“今書已到”的報告。與之相對應，文書背面 B 左側記有日期和“~以來”的收信，當然還有“某手”的署名。這裏沒有 C 的發信，因此應祇是收信的抄本。^①文書中有“敢言之”這一上報時用語。

這種形式的文書還有⑧134（司空上報縣）、⑧157（啟陵鄉夫上報縣）、⑨981（田官守上報縣）、①69（啟陵鄉上報縣）等例子。據此可以再次確認一點，即縣是行政的基礎單位，鄉不是獨立的機構。

3. 遷陵縣通過鄰縣回復郡的例子。例如⑧158，A 正面的內容是，遷陵縣守丞告知發往西陽縣的“直書”已送達。背面祇記錄了日期和“~行旁”的發信。它雖然是直接寫給鄰縣的文書，但據此可推想這封文書本來是通過郡傳遞的“直書”，或者是傳達給郡的。

此外⑧154 是遷陵守丞按照“令曰：恆以朔日上所買徒隸數”的規定，通過郵人向上級報告的文書，它也是上報郡的文書。

第二種形式，圍繞洞庭郡和縣的文書中，也有沒有記錄收信和發信的文書（⑨1-12）。關於這一點，將在下一節中進行詳細討論。

第（四）類，地方向中央報告的文書。根據史書和居延漢簡可知，郡呈遞給中央的資料有上計和郡縣的賬簿等。^②這種形式中，⑧133“卒算簿”是在縣和司空之間傳遞的。⑧147 記有遷陵縣“今八月見驚臂百六十二”，有賬簿的用途。

第（五）類，是封檢和標題簡資料。^③以下是關於這方面的資料：

⑥2 正：遷陵以郵行「洞庭」^④

① 筆者猜測，“四月甲寅”（九日）首先從鄰縣西陽縣收到了“御史書”，因為它是與少內有關係的內容，所以少內先等待文書到達的報告，然後在“四月丙辰”（十一日）通過鄰縣向洞庭郡報告收到文書。

② 這種形式，前揭永田氏《居延漢簡研究》有詳細探討。

③ 參見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十大考古新發現陳列》，承蒙湖南省博物館陳松長先生提供。

④ “J”表示另起一行。

⑧153：「御史問直絡常程書（圖版：《湖南十大考古新發現陳列》，湖南省博物館）

⑧155：「廷主」戶發」

⑨983：酉陽洞庭（圖版：《湖南十大考古新發現陳列》）

二、關於⑨1—12 文書的內容

以上就郡縣文書，特別是第一種形式，即向遷陵縣傳遞文書，而將收信、處理發信記錄製成抄本的木牘形態進行了說明。不過在公佈的樣本資料中，作為第二種形式，有未記錄遷陵縣收信和發信的文書。它們是⑨1—12 的系列文書，都是關於移交管理陽陵縣債務勞役者內容的。這些文書，在書寫形態上稍有不同。

例如，如果將報告和處理的年月的順序，按 A、B、C、D 排列的話，⑨1 的正面是三十四年四月的記事（A、B），背面是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的記載（C、D）。

正面 A：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

B：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廚敢言之。

背面 C：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陽陵守慶敢言之。

D：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尉騰謂遷陵丞。

筆者推測，木牘正反面所記的年代，⑨1—12 並不一定完全相同，從其形態和內容來看，⑨2、4、5、6、8 五枚文書的形式，可能是最典型的模式。下面是⑨4 的例子：

正面 A：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

B：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廚敢言之。

C：卅四年八月癸巳朔甲午，陽陵守丞欣敢言之。

背面 D：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尉騰謂遷陵丞。

正面是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的記載（A、B、C），背面是三十五年的記載（D）。但是第二種形式的文書，不僅沒有記載收信和發信，此外還有一個共同特徵，即第一種形式的文書都是在比較短的天數內處理的，而這批文書傳遞了約三年的時間。現在我們來通過⑨4 例來看看其形態。

⑨4 正面：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陽陵孝里士五（伍）哀有貲錢千三百卅四。哀戍洞庭郡，不智何縣署。今為錢校券一上，調言，洞庭尉令哀署所

縣責以受陽陵司\空\，不名計。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爲報。已嘗責其家=貧弗能入。乃移戍所。報署主責發。敢言之。

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廚敢言之：寫上謁報\。署金布發。敢言之。／僇手卅四年八月癸巳朔甲午，陽陵守丞欣敢言之。至今未報，謁追。敢言之。／堪手

⑨4 背面：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尉鱗謂遷陵丞：

陽陵卒署遷陵，以律令從事，報之。／嘉手

以洞庭司馬印行事。』敬手

這裏，筆者擬從與以往解釋的分歧，以及以往學者提到的睡虎地秦簡的相關規定，對這個文書的內容加以說明。^①首先列出文書的大意：

⑨4 正面的大意：（向洞庭郡彙報有關陽陵縣債務勞役者的文書）

A：三十三年（前 214）四月辛丑朔、丙午（六日）。司空騰敢言之：“陽陵縣下里的士伍衷，有貲錢 1344。衷現在洞庭郡作戍卒，但不知道被分配到哪個縣。於是，現在製成一份‘錢校券’上報，請求回復。洞庭尉命令衷所屬縣，從陽陵司空那兒受理此事，但司空不名計。問由哪個縣的官府計算並交付官署，報告他的計年。已經責成其家交納這些貲錢，但是家貧不能交納。於是移交給戍卒所在的戍所處理。文書題署‘主責（負責的部門）發’上報。”敢言之。

B：四月己酉（九日），陽陵守丞廚敢言之：“已經寫了上報的文書並上報，請求回復。題署‘金布發’（金布負責）上報。”敢言之。僇手

C：三十四年（前 213）八月癸巳朔甲午（四日），陽陵欣敢言之：“至今沒有上報，請求追加（的指示）。”敢言之。堪手

⑨4 背面的大意：（洞庭郡給遷陵縣的命令）

D：三十五年（前 212）四月己未朔，乙丑日（七日）。洞庭段尉鱗謂遷陵丞：“陽陵卒被分配到遷陵縣者，按照律令的規定，將其上報。”嘉手。

以洞庭司馬印行事。敬手

文書是始皇三十三年四月六日，洞庭郡所屬陽陵縣司空發出的，寄往陽陵縣官府。內容是本籍爲陽陵縣的士伍某人，遺留有債務錢（貲錢）1344，他在洞庭郡作戍卒，但不知道被分配在哪個縣。因而，司空製成“錢校券”向縣報告。在⑨134 正面有爲出租公船而寫

① 這裏參考了前揭《里耶秦簡註釋》和馬怡《里耶秦簡選校》。但對“謁報……發”這一段，目前的理解解釋不通，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的“校券”^①，“錢校券”大概是除記載人名、縣、里、爵外，還記載有關賞錢的“校券”的文書。

如上所述，將縣債務勞役者情況，通過縣向郡報告的是司空，而據睡虎地秦簡《司空律》，在秦代，縣司空負責包括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在內的勞役的管理。^②

有罪以賞贖及有責於公，以其今日問之，其弗能入及賞，以今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官作居賞贖責而遠計所官者，盡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數告其計所官，毋過九月而齎（畢）到其官，官相新（近）者，盡九月而告其計所官，計之其作年。

司空律，一三三至一四〇簡

讀書班的譯注將後一段解釋為司空通過陽陵縣，向洞庭郡尉請求收回其在他縣的賞錢：

[陽陵縣]向洞庭郡尉報告：請郡責成某人所屬縣徵繳，交給陽陵縣司空。司空因為不能計算，故詢問在哪個縣計算駐紮時間。請求回復。已經責令其家，然其家貧窮無法償還。於是馬上移送戍卒駐紮的縣。回信的時候請寫上“主責開封”。

譯注將前半部分理解為司空對縣的回答，後半部分理解為要求洞庭郡從駐紮地移送債務錢。然而，在這裏有幾處不甚明瞭。

的確，此例是因不知道戍卒的駐紮地，作為處理債務錢的前提，因此有必要首先確定駐紮地。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即以縣司空的身份，是否能向上級機關的郡要求回復。而且按照譯注的理解，就變成請求郡回復戍卒駐紮地的調查，甚至負責部門的指示。雖然郡的回復中記有“主責開封”的要求，陽陵縣的文書中也有“金布開封”的要求，但是縣對郡是否能這樣進行指定呢？這不應是縣回復郡的表達方式。

因此，我在前揭大意中，將其理解為前半部分是上級機關下達的確認戍卒駐紮地的命令，“今”以下的報告是對它的回答。^③

若此，則變成了洞庭郡尉已經讓陽陵縣將戍卒移交給其所屬縣，而司空沒有計算。之後，陽陵縣由於要確認戍卒的駐紮地，故下達給負責其勞役的司空。於是司空製成戍卒的“錢校券”向上報告，由於不知道其駐紮地，故有一半的命令無法執行。文書中還附錄了

① ①34 正面：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櫟敢言，前日言，隴陵舊陰狼假邊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拖。」以求故荆積瓦，未歸船。狼屬司馬昌官，謁告。昌官令狼歸船。報曰：狼有逮在復獄已卒史「衰、義所。今寫校券一牒上。謁言之卒史衰、義所問狼船存所。其亡之為責（債）券移邊陵弗□□屬」謁報。敢言之。/□月庚辰，邊陵守丞敦狐卻（卻）之。司空自以二月假（假）狼船，何故□□辟□，今而」請曰：謁問復獄卒史衰、義。事已不智（知）所居。其聽書從事。/慶手。即令□□行司空。

② 這一點，在前揭《里耶秦簡譯注》中已經指出。

③ “已嘗其家。家貧弗能入”後，有的有“乃移戍所”的文字，有的沒有。此外，③3 正面“有物故弗服毋聽流辭。以環書道遠”和③9 正面“貢有流辭，弗服毋聽。道遠毋環書”的文字不同。

戍卒的家族不能代替其還債的情況。

接到司空報告的陽陵縣，將司空的報告原封上報郡，正是在這時寫下“金布發”。“發”，在居延漢簡中是開啟文書的官吏記錄的副本，里耶秦簡的收信也有“某發”。由於此處不是封檢和收信的形式，因此它或許是“金布負責”即責任所在的意思（後面將敘述“署某發”的形式）。^①

這裏是由縣的金布負責此事並進行回復的，正如以往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睡虎地的《金布律》七六簡中，有關於還清債務的規定：^②

有責於公及賞贖者居它縣，輒移居縣責之。

可推測此處的“金布”，應是與財務有關的內容，或是與縣財政有關的部門。前文的“主責（負責的部門）”指的應就是縣的金布，它是縣的下屬機構。^③由縣的金布負責文書事宜，可能是因為它負責債務方面的財政。

可是為何郡里不馬上處理這個文書，一直到第二年仍沒有解決，以致陽陵縣在三十四年八月再一次向郡請求指示。這可以從前文中有“至今未報”，之後有“謁追”的文字看得出來。對此，讀書班譯注根據睡虎地秦簡《行書律》，將“謁追”解釋為做調查。以下是《行書律》184—185簡：

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以輒相報也。書有亡者，亟告官。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書廷辟有日報，宜到不來者，追之。行書

睡虎地秦簡注釋將“追之”理解為“應加追查”。據此譯注將上文解釋為向郡請求追加調查。但是，C部分是請求對B部分進行回復，B部分祇是附上了A文書進行上報的。而且，A文書似乎是關於確定駐扎縣後令其採取移交措施的內容。因此在前揭大意中將其解釋為“根據文書追加指示”，而沒有解釋為對戍卒的駐扎地再次進行調查。也不能認為

① 關於“手”和“發”，里耶秦簡中有“某手”和“某發”的形式。以前的解釋，書寫“手”的人，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和書寫者是同一人，二是書寫人簽名的原樣謄寫。“發”，依照居延漢簡的研究，理解為打開（封泥），即“開封”之意。因為認為它是在收信木簡上記錄的“發”，所以才這樣解釋的吧。（前揭永田氏《居延漢簡研究》，168頁。）的確，在里耶秦簡中，③152背面、③157背面和③981背面都有“人名+發”的形式。但是，像“擔當？+發”，是發信意義上的“發”，就不能理解為開封，如在③156，“署金布發”的“發”就是發信的意思：

四月丙午朔癸丑，遷陵守丞色下少內議案致之，書到言，署金布發。它如律令。/欣手/四月癸丑，水十一刻//下三，守府快行少內

此外，③155標題簡的標題中有“廷主戶發”，這和《湖南考古新發現陳列》列舉的木牘（長18.5釐米，寬3釐米）中的“廷戶發”是相同的例子。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315—318頁中，介紹了這一系列的資料，他們將其理解為：司空的報告中是“開封”的意思，之後的處理是由“金布”作為負責者。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

③ 在縣的下屬機構中，負責財政的官員還可以見到有少內，但和金布的關係仍不明瞭。

下屬縣向上級機關郡要求回復調查結果。

還有一個問題，即為何洞庭郡和陽陵縣之間往來的文書會在遷陵縣出土。就目前所見到的第一種形式的文書而言，這些文書的出土地一定是在和郡往來文書的陽陵縣。背面的 D 部分已說明了這一點。此簡表明三十五年四月，洞庭郡假尉向遷陵縣下達了命令。

譯注將其解釋為“陽陵縣的戍卒被分配到遷陵縣。根據律令進行報告”。而在研讀班片野氏的說明中^①將其解釋為，洞庭郡在同一天將陽陵縣的催促函一起送交給戍卒駐扎的遷陵縣，要求陽陵縣“計算出勞役時間，移送給陽陵縣”。即洞庭郡要求遷陵縣在三十四年八月到三十五年四月之間，查明戍卒的駐扎地，並進行處理。這種情況下“以律令從事”的文意中包含有對 A 文書所見勞役計算等進行處理的意思。

但是，“以律令從事”通常是“根據律令的規定行事”的意思，僅此是不包含具體指示的，因此必須將其解釋為附錄的文書。因此 D 部分祇是說“陽陵卒有分配到遷陵者，按照律令的規定進行上報”，而不一定知道遷陵縣是否就是戍卒的駐扎縣。而且，若據睡虎地秦簡《金布律》“貨贖者居它縣，輒移居縣責之”，它就不是計算債務錢送交本籍的規定。雖然可設想《金布律》針對的是去他縣服刑勞役的情形，但是，⑨1—12 中為何分配到郡內的縣的戍卒是按照勞役對待的？駐扎地不明或許就是原因之一。總之，我認為，由於不清楚戍卒駐扎何縣，因此洞庭郡要求所屬各縣確認陽陵卒的駐扎地，然後上報，這些文書中的一份傳達給了遷陵縣。

如果是這樣，對遷陵縣來說，A、B、C 的文字，祇是說明郡命令的內容。對遷陵縣來說重要的不是兩年內陽陵縣和洞庭郡往來的文書，而是對於三十五年四月正面記載的郡下達的確認戍卒駐扎地的命令必須回復處理的情況。因此遷陵縣有必要將此命令傳遞給下屬的司空等進行確認。從目前的形式推測，這樣的文書正面記載的應是洞庭郡下達的命令，背面記錄的則是收信和發信（參看文末圖）。

這不僅僅限於⑨4。下面我們將考察⑨1—12 全部文書的流程，並探討其意義。

三、書寫形態和信息傳遞——處理和保存

表 1 揭示了⑨1—12 文書所見發信和收信的流程。表中沒有記載陽陵戍卒的人名和債務錢金額等，祇關注洞庭郡和陽陵縣、遷陵縣之間往來文書的傳遞情況。^②據表可看出其經歷了下列過程。

首先，這一系列文書全部是從 A 司空騰的報告開始的。其日期從始皇三十三年三月二

① 片野竜太郎：《里耶秦簡所見債務勞役》，前揭《里耶秦簡研究筆記》。

② 關於戍卒的人名和與債務錢的關係，前揭《里耶秦簡註釋》和片野氏前揭《里耶秦簡所見債務勞役》中進行過整理。

十七日开始到四月八日止。因而，報告應是三月末起草的，但不是由縣司空獨自開始作文書的。此次有關陽陵戍卒的報告和“錢校券”的提出，也許是對以前郡或者是縣所下命令的回復。其根據即里耶秦簡（16）9 在“•今……”前有“令曰移籍”之語，因此它應是對命令的回復。司空騰接到三月末以前發出的確認駐扎地不明的陽陵卒的命令，然後依次進行回復。

收到報告的陽陵縣，由 B 中的守丞恬、廚、穴三人，在數日後依次進行處理並向上報告。報告應是通過郵或縣送往洞庭郡的，收信的應是郡守或郡尉府。就是在此時附上了記有“金布發”的標題簡，陽陵卒的“錢校券”可能也是這時附上的。^①至此為第一階段。

三十三年四月，從陽陵縣發出的一系列文書，一直沒有得到洞庭郡的答復，就這樣過了三十三年的年末，臨近三十四年年末的九月了。九月是進行上計等結算的時間。因而陽陵縣從三十四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二日，再一次遞交了請求 C 的指示的文書。處理文書的人和上次不同，是守丞慶、欣和陽陵的邈。將這次處理的時間和先前處理陽陵卒的時間加以對比，可以看出報告早的未必處理得早。例如，六月申請的，在四月九日處理；七月申請的則在四月二日和九日處理；而八月申請的，從四月二日開始到十日處理。因此三十四年陽陵縣發往洞庭郡的文書，是將手頭上的名單按順序進行整理的，與處理順序沒有什麼關係。祇是，由於沒有司空騰處理以外的名單，可知同類文件是放在一起保存的。

表 1 ⑨ 1—12 文書的處理和保管

陽陵縣；司空和縣廷、縣廷和洞庭郡的文書的副本〔保管〕	
報告和處理的日期	陽陵縣的處理
A 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司空騰 3/27→4/2（⑨11） 3/28→4/2（⑨2,3,9） 4/6→4/8（⑨4,8） 4/6→4/9（⑨1,5,10,12） 4/8→4/9（⑨7） 4/8→4/10（⑨6）	B 始皇三十三年 4/2 陽陵守丞恬 （⑨2,3,9,11） 4/8 陽陵守丞廚（⑨4,8） 4/9 陽陵守丞廚 （⑨1,5,7,10,12） 4/10 陽陵守丞穴（⑨6）
陽陵縣上報的日期	陽陵縣的處理

① ⑧155“廷主戶發”的形式，或許就是這一形式。

C 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6/25 陽陵守丞慶（⑨1） 6/29 陽陵守丞慶（⑨10） 7/28 陽陵遼（⑨3,12） 8/1 陽陵遼 （⑨2,5,6,7,8,9,11） 8/2 陽陵守丞欣（⑨4）	B 始皇三十三年 4/6→4/9 4/6→4/9 3/28→4/2, 4/6→4/9 3/27→4/2, 3/28→4/2, 4/6→4/8, 4/6→4/9, 4/8→4/9, 4/8→4/10 4/6→4/8
洞庭郡對陽陵戍卒總體調查的指示〔保管〕	
D 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4 月 7 日 從洞庭郡假尉到遷陵縣的文書：同一日期	
遷陵縣；作成一系列的文書〔遷陵縣的副本〕 D 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4 月 7 日 →另外做成處理文書 推測向縣的下級機構傳遞，上報給洞庭郡	

之後，洞庭郡過了三十四年年末，到次年的四月，終於給遷陵縣送去了全部的回復文書（D 文書）。這個日期和最初陽陵縣司空列出戍卒名單的日期很近。因此，在秦代，除年度末的結算期外，或許在四月前後每半年還要進行一次結算。無論如何，三十五年四月，確認陽陵戍卒駐扎地的文書送達了遷陵縣。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戍卒的名單在洞庭郡和陽陵縣兩地都長期保存着。這就是為什麼陽陵縣距第一次報告一年多以後，到三十四年六月至八月，再次提交去年的戍卒名單的原因。洞庭郡也是在三十五年四月，一次性對三十四年六月到八月的文書進行了處理，由此可知郡尉也保存有陽陵戍卒的名單。據此來看，這些送往遷陵縣的文書，很可能不是陽陵縣在三十三年四月最初發出的文書的副本，而是第二次在三十四年六月到八月間送出的文書的副本。洞庭郡保存了上述文書（A、B、C）和名單，並且郡尉在三十五年四月對它們進行了處理，製成了文書（D）。然後，在遷陵縣附上了“洞庭司馬”封印的記錄。它和記有收信和發信的文書不同，是了解保存形態的寶貴例子。

我們知道⑨1—12 文書在陽陵縣和洞庭郡均有保存。在遷陵縣保存的是文書的副本形式。正如其中的五件是在正面書寫 A、B、C 的那樣，它是將回復郡的文書連續記載下來。為了將郡的命令與其區別開來，而將 D 寫在背面。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縣會將這份文書進一步向下屬機構傳達，祇是這一形式的文書沒有保留下來。因此，除與縣的下屬機構、上級郡之間的文書往來外，這樣的文書應是為了保存而書寫的。在里耶秦簡的樣本資料中，除封檢和標題簡、賬簿等之外，這種保存的形態是唯一的形態。換句話說，像⑨1—12 文書

這樣沒有收信和發信形式的系列文書，除了陽陵縣和洞庭郡外，遷陵縣也以同樣的形式保存着。這些由井坑出土的里耶秦簡將成為理解古墓出土資料特徵的綫索。

關於這種保存的形態，筆者曾對①65、6的文書和睡虎地秦簡《語書》竹簡進行過比較。^①在《語書》的前半部分中，記錄了秦王“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的紀年，南郡郡守向所屬縣、道、嗇夫下達命令，其末尾記有“以次傳，別書江陵布，以郵行”的文字。這和①65、6文書中洞庭郡守發布給各縣的命令極為相似。里耶秦簡的情況是，遷陵縣從鄰縣那兒接到郡的命令、並進一步傳達給本縣下屬機構，如果僅將正面的文書製成副本進行保存，那就與《語書》的形式完全相同了。因此，睡虎地秦墓的隨葬文書，或許原來是書寫在木牘上、由縣處理的文書。郡下達的命令事後有必要保存正面的文字，而負責此事的安陸和鄢縣令史的墓主，就將其寫在竹簡上保存下來。在這裏，我們可以發現里耶秦簡這樣的現實行政文書和古墓隨葬文書之間的交叉點。

同樣，⑨1—12 文書也給研究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漢代案件的信息傳遞以啟迪。^⑩《奏讞書》的案例大體可以分爲秦代以前和漢代兩種。漢代有南郡的案件，關於南郡的文書有下列表達方式。“敢言之”即爲“敢讞之”，此外，還有“謁報。署某發”的形式，這一點與里耶秦簡文書完全相同。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沅、丞嘉敢獻之……敢獻之，調報。署獄史曹發。吏當……廷報：當腰斬。（案件1）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戌，江陵丞驚敢讞之……敢讞之，謁報，署史詹發。吏當……
(案件2)

十年七月辛卯朔甲寅，江陵餘、丞驚敢獻之……敢獻之，謁報，署獄史屠發。
吏當：…… 廷以聞，武當黥為城旦，除視。 (案件 5)

關於其含義，可作如下推測。“謁報”是請求回復的意思，“署某發”是爲了表明主管機構。因此，這些案件反映的是中央廷尉下達的“廷報”判決。將這些判決按照判例的樣子書寫的東西，就應是《奏讞書》。

《秦讞書》中年代最近的是高祖十、十一年與南郡有關的三個案件的資料，它們記錄

① 拙文《中國古代史中的秦、巴蜀、楚——長江流域的出土資料和地域文化》，（《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2，2003）。

② 《奏讞書》的形式，可以參照池田雄一編《奏讞書——中國古代的審判記錄》（刀水書房，2002）、小嶋茂稔《讀張家山出土〈奏讞書〉劄記》（《亞非歷史社會研究》2，1997）、拙稿《長江流域的社會和張家山漢墓》（《資料學方法探討》3，愛媛大學，2004）。而前揭馬怡《里耶秦簡選校》中，也指出《奏讞書》中可見“謁報。署某發”的形式。這裏有相同的用語，是南郡的縣具體呈報的。據此，如果說“謁報”有“請求回復”的意思，那麼“某署發”記錄的應是負責的小組。案件2“署如廢發”和案件5“署獄如廢發”的“如”字照片是不太清楚。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都修改為“史”。

了南郡所屬縣發信、中央廷尉作出回復的形式。因此可以認為這三件文書和里耶秦簡一樣是爲了保存中央的回復，而將其寫在竹簡上的。祇是“敢言之”的用語變成了“敢讞之”，大概是因爲里耶秦簡反映的是屬於丞相、御史系統的郡縣往來的行政文書，與之相對，《奏讞書》則是反映和廷尉之間往來的審判案件吧。由此可知，一部分古墓資料是將真實的文書抄寫下來保存的。

像這樣，將里耶秦簡和古墓資料加以比較，我想可以更好地理解秦漢社會中的文書傳遞。我們將其形態歸納如下：

1. 帶有收信和發信記錄，反映處理情況的抄本的文書
2. 沒有收信和發信記錄，用作保存的文書
 - ①律令等資料（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的律令）
 - ②行政文書的內容（睡虎地秦簡《語書》）保存文書的副本
 - ③審判案件的副本（《奏讞書》中的漢代案件）

這些形態，可以進一步追溯到戰國時的楚，它們與包山楚簡的文書簡很相似。^①在包山楚簡的文書簡中，《集筭言》的15—17簡以及132—135簡有關陰侯之地的案件，就是正面記錄文書，背面記錄收信和發信。這正是帶有收信和發信記錄的文書形態。“疋獄”與“受期”被認為是記錄年月和處理情況的抄本，其中有“A 讞之，B 李（理）”這種形式的署名。由此看來，包山楚簡是反映與戰國時期楚國中央左尹的職務有關的、實際文書傳遞和處理情況的早期資料。楚國的左尹與秦漢時期的廷尉職責相近，由於它和丞相、御史等行政系統的文書傳遞形態相同，我們據此可以了解它們與地方之間的信息傳遞。

里耶秦簡是反映秦代丞相、御史系統所屬郡縣信息傳遞的資料。然而在地方郡縣資料中，與文書傳遞相伴的，是處理文書的抄本和爲了保存內容而書寫的資料。也正因爲如此，作爲郡縣吏的睡虎地秦墓的墓主，保存了與部分郡縣行政文書形式相同的《語書》等。但是，睡虎地秦墓和張家山漢墓的墓主保留更多的是中央下達的法令，以及用廷尉系統的判例等案件製成副本的保存文書。它們是秦漢時期信息傳遞的一部分，將其與里耶秦簡的形式進行比較，也是重新理解古墓資料特徵的一個線索。

在古代社會的信息傳遞中還有兩個大的課題。一是在中國古代縣構成的基層社會中，與縣一級社會庶民有關的命令和信息，是通過什麼樣的手段傳遞到社會末端的庶人。這實際上是公文書的內容是如何運作的問題。二是在官方的文書等情報外，公、私人間連結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是如何傳遞的。除了部分像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和張家山漢墓《算數

① 參照拙文《包山楚簡和楚國的信息傳遞——紀年與社會體系》（《中國研究集刊》別冊特別號，總38，2005）。此後，承蒙廣瀨薰雄氏告知，李零《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中，對“A 讞之，B 爲李（理）”進行解釋，但是，對將“李（理）”理解爲“某某承擔”等，尚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書》那樣的與行政事務相關的書籍外，還應有另一種一般途徑的書寫和傳遞。^①對這種古代社會中的信息傳遞，必須重新進行全面的考察。

四、結 語

本文對見於里耶秦簡樣本資料的文書形態進行了分析，特別考察了行政文書的信息傳遞。指出它有兩種形態，一是帶有收信和發信記錄、實際處理的形態，二是像①1—12文書那樣，僅將郡下達給縣的部分製成副本保存下來的形態。我推測，除陽陵縣和洞庭郡保存有副本外，接到洞庭郡文書的遷陵縣，在傳達的文書和處理的抄本之外，還將其內容製成副本保存下來。這種文書形態一方面表明當時縣為基層行政組織，同時還包含着其它極有意思的內容。

保存形態反映的是古墓隨葬資料的保存狀況。例如，睡虎地秦簡《語書》和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件中的一部分，的確真實傳遞了郡給縣的文書傳遞的形態。因此可以推定，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的部分內容，是郡縣吏將傳達到縣的文書按照原樣作為副本書寫、保存下來的。雖然與睡虎地秦簡《語書》的行政文書系統不同，《奏讞書》記錄的漢代案件反映的是中央廷尉系統，但在傳遞文書的形態上兩者使用了完全相同的用語。里耶秦簡的形態為古墓隨葬資料信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搞清楚行政文書和司法案件的傳遞，也給闡明《史記》、《漢書》等文獻的素材和編撰提供了線索。^②司馬遷編撰《史記》時，利用了很多漢王朝所藏的舊資料，從出土資料的信息傳遞來看，成為其素材的文書和書籍應與中央官府的太常、丞相和御史、廷尉的資料有關。《史記》一類文獻，多取材於中央的資料，而與大量的地方郡縣行政文書少有共通性，關於這一點，今後擬進一步將《史記》、《漢書》等文獻與出土資料進行比較研究。

图：遷陵縣的文書

(一) ①65、①66 文書的形態（將郡下達的命令在遷陵縣處理）

<p>A 作成的年月：廿七年（前 220）二月丙子朔庚寅 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等</p> <hr/> <p>以令的規定為基礎，下達執行徵發傳送委輸的命令</p>	正面
---	----

① 關於書籍的傳遞，前揭拙文《中國古代史中的秦、巴蜀、楚》中已簡單涉及，這是我今後想要研究的課題。

② 關於《史記》的取材和出土資料，拙文《簡牘、帛書的發現和〈史記〉研究》，（《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一，2002），和《簡帛發現與〈史記〉研究》（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以及拙文《〈史記〉的素材和出土資料》（《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二十，2006）中有所論及。

C 由遷陵縣傳達的指示（日期、發信）／某手

B 末尾收信記錄（日期、～以來）／某手

某手

背面

（二）⑧152 文書的形態（遷陵縣少內給縣的回復）

A 卅二年（前 215）四月丙午朔甲寅
少內守告知已收到遷陵縣“直書”

正面

B 四月甲寅日中，收信的記錄（日期、～以來）／某發 某手

背面

⑧157 文書的形態（在遷陵縣內部處理）

A 卅二年（前 215）正月戊寅朔甲午
啟陵鄉夫向縣上報的內容

正面

C（縣向啟陵鄉傳達命令）／某手 發信的記錄（日期、～行）

B 末尾受信記錄（日期、～以來）／某發

某手

背面

（三）⑧158 文書的形態（遷陵縣通過鄰縣對郡的回復）

A 卅二年（前 215）四月丙午朔甲寅
遷陵守丞告訴西陽縣已經收到“直書”

正面

B 四月丙辰旦，發信的記錄（日期、～行旁）

某手

背面

圖：⑨1—12 文書

⑨4 文書的形態（郡給遷陵縣下達的命令、內容的副本）

A: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	(向陽陵縣廷的上報)
B: 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廣敢言之。	(陽陵縣向洞庭郡的上報)
C: 卅四年八月癸巳朔=日。陽陵邀敢言之。	(向洞庭郡的上報)

正面

D: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尉鵬謂邊陵丞。 以洞庭司馬印行事。(封泥的抄本)]	某手
---	----

背面

⑨4 處理文書的木牘的形式(基於推測)

A: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尉鵬謂邊陵丞。 (郡給邊陵縣的命令)
--

正面

C (由邊陵縣傳遞給下級機構的副本)(日期、發信)/某手 [以洞庭司馬印行事。(封泥的抄本)]
--

背面

B 末尾收信的記錄(日期、~以來)/某手	某手
----------------------	----

(*A、B、C、D表示年月順序。)

(戴衛紅 譯)

《周易》研究的課題與方法

[日]大東文化大學 池田知久

內容提要 本文利用上海楚簡《周易》、馬王堆帛書《周易》、睡虎地秦簡《日書》等新出土資料，從經典、經學內在的歷史發展與外在的周邊文化和社會兩方面，對《周易》的原貌以及經典化的過程進行探討。直至戰國末，《易》僅是流行於民間的由卦畫、卦名、卦辭、爻辭構成《六十四卦》的占卜書，從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期，《易》開始儒教化、經典化的進程，其作為五經或六經面世則更晚。

關鍵詞 通行本《周易》 《日書》 馬王堆帛書《周易》 上海博物館楚簡《周易》 占筮的儒教化

在各種儒教經典中，除了《詩》、《書》較早被賦與很高地位外，其它的如《禮》、《樂》、《春秋》、《易》都是在戰國末期以後才被作為“經”來對待。在整個西漢儒教國教化過程中，雖然上述經典的價值、意義不斷提高，但是直到西漢後期，五經尚未被認為是具有絕對價值、意義的經典。

因此，這一時期經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要對以下問題，即五經的本來面貌是怎樣的，它們是在什麼原因、條件和背景下成為經典的，它們經歷了怎樣曲折的經歷才上升為五經的，從經典、經學內在的歷史發展與外在的周邊文化和社會兩個方面，進行科學、

實証研究。而且，在進行這樣的研究時，必須盡力排除戰國末以來各種文獻不斷經典化、西漢時期儒教國教化、以及此後直至清代末持續的儒教正統化背景下，對各種經典的過度讚美以及伴生的神話、傳說，努力探明這些經典的真實面貌。祇有這樣，才可能盡可能準確地描述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基礎上的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國古代學術史的發展。

在我看來，探求漢代以前五經等儒教經典真相的研究，直到 21 世紀的今天也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依然沒有從西漢時開始的對經典的特殊對待，對經典的過度讚美以及相伴的神話、傳說的信仰中解放出來。在《詩》的研究方面，1919 年格拉耐 (Paul Marcel Granet) 的《中國古代的祭祀與歌謠》(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為我們提供了從傳統經學解釋中解放出來的優秀範例，我認為有必要對所有的經典都進行這樣的研究。這種探討，在出土資料大量發現的今天，也更容易進行。

二

首先，我們將《周易》在戰國末期之前的古貌與儒教化、經典化後的樣貌進行對比，主要根據《周易》的內在表達和思想，對其歷史發展進行內在探討。

《周易》至晚在戰國時代常常被單稱為《易》，將其稱為《周易》是從西漢初期開始的。稱為《易經》可能是西漢後期以後的事情。

《易》原本是古代存在於民間的占卜書籍和技術體系，是對例如交友、就業、結婚、生育、疾病、旅行、祭祀等這些人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問題的吉凶、禍福進行占卜的書。近年在中國陸續從地下出土了大量從來不為人知的珍貴資料，這些新出土的資料中就包含了很多上述《易》及《日書》、《式法》(從《陰陽五行》改稱)、《五星占》、《歸藏》等書籍。這些書和《易》性質大體相同，是廣義的占卜書，在戰國至西漢的時代，下自庶民上至王侯、貴族，人們運用各種各樣的占卜度過日常生活。

因此，至戰國末期的古本《易》，應當是僅僅由卦畫、卦名、卦辭、爻辭構成的簡單的《六十四卦》。一方面，它與此前的殷、周時代的甲骨卜辭不同，甲骨卜辭占卜的是王朝的重大事件，如與異民族的戰爭、左右年穀(收成)的天氣、王家的祖先祭祀等的吉凶、禍福；另一方面它也與此後逐漸完善的《周易》和《易經》不同，《周易》、《易經》包含了被儒教化的高度形而上學等的哲學、陰陽五行的自然哲學、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等。特別是對後者，要正確地理解。

讓我們列舉後者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通過內在的方法，來考察《易》這一占筮書的儒教化、道德化廣言之即宗教的世俗化過程吧。《周易》的一些卦辭中有“元亨利貞”

的句子。此句在戰國末至西漢初成書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後文簡稱為“馬王堆帛書”《周易》），日語直譯為“元いに亨る、貞うに利し”，即“萬事順遂，利于卜問”。對於研究馬王堆帛書《周易》等的研究者而言，這已為定說。若詳加論述，“元”為副詞，是大大的意思。“亨”為動詞，是天、鬼神滿足卜問者願望的意思。“利”為助動詞，是做什麼有利、可以有利於做什麼的意思。“貞”是動詞，為卜問之意。

但是，通行本《周易·乾卦》的古文解釋將此句解釋為：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這種解釋將“乾，元亨利貞”訓為“乾是元、亨、利、貞也”或“乾有元、亨、利、貞”，取“乾卦中有元、亨、利、貞四德”之意。因此可以說，這一解釋從本句中原有的作為占筮的宗教內容剝離開來，有將其作為《乾卦》四德具象化、儒教道德化的特徵。特別是將“貞”字作為貞正之德這樣儒教道德的解釋，與西漢初期前的“貞”有本質不同，西漢初期以前各種占筮書的貞原封繼承了殷代甲骨卜辭中“貞”的意義，即占人向天、鬼神詢問吉凶。這恰好是《易》儒教化、道德化，以及宗教意義的《易》世俗化的反映。而且，它應當是文帝後半期到武帝時期的儒家所做的工作。

由此引起聯想的是《春秋左氏傳》襄公九年中的一段記載：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這是《春秋左氏傳》作者關於《隨卦》的“元亨利貞”的解釋。與上述通行本《周易·乾卦》的古文傳解釋相比較，可知占筮的儒教化、道德化有了進一步深化。這樣進步的解釋，不用說肯定不是春秋時代襄公九年這麼早時期的思想的反映，它應當是比上述《乾卦》古文傳形成的文帝後半期至武帝時更晚的時期形成的。

此外，戰國末至西漢前期成書的《馬王堆帛書易傳·繆和篇》中有“元者，善之始也。

吉者，百福之長”（《渙卦》六四爻辭的解說，第十九行），以及“亨者，嘉好之會也”（《謙卦》卦辭的解說，第三十九行），《二三子問篇》中也有“元，善之始也”（《坤卦》六五爻辭的解說，第二十二行）。如前所述，這些句子在此後通行本《周易·乾卦》古文傳中作為《乾卦》的四德而被公式化了，它或許應當是尚未完成的試行錯誤的殘留。換言之，馬王堆帛書《易傳》中雖然僅限於“元”、“吉”、“亨”這些個別字，但是這種“元亨利貞”句子的具象化、儒教道德化的試行錯誤已經開始了，此後，通行本《周易·乾卦》的古文傳將這種個別的試行錯誤作為《乾卦》的四德加以綜合而公式化，之後的《春秋左氏傳》的作者再進一步利用它在穆姜傳說的結尾添加了儒教道德的深刻內容。

三

在通行本《周易》的經傳中，與上述“乾，元亨利貞”句型相同或類似的句子非常多。其中“利”這個詞，本來是修飾其後跟著的動詞或動詞句的助動詞，是對做什麼有利，或有利於做什麼的意思。“利”作為助動詞，也寫作“利以”或“利用”，它們在意思上沒有區別。大致而言，戰國末到西漢初期，“利”、“利以”、“利用”是可以與“可”、“可以”、“可用”通用的助動詞。

僅僅根據通行本《周易》的經文就可以很容易地確認這一事實。下面列舉與此相關的特別引人注目的七條材料（1—7），來證明這一點。因為“十翼”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所以這裏只列舉其中的一部分。

1—（1）：《觀卦》六四的爻辭中有“利用賓于王”，《姤卦》九二的爻辭中有“不利賓”，表明“利用”與“利”之間沒有區別。

2—（1）：《蒙卦》上九的爻辭中有“不利為寇”，《益卦》初九的爻辭中有“利用為大作”，《同卦》六四的爻辭中有“利用為依遷國”，表明“利”與“利用”之間沒有區別。而《乾卦》的象傳中還有“天德不可為首也”之句。

3—（1）：《漸卦》九三的爻辭中有“利御寇”，其象傳中有“利用御寇，順相保也。”此外，《蒙卦》上九的爻辭中有“利御寇”，其象傳中有“利用御寇，上下順也。”以上兩處象傳，因為都是原樣引用經文，從這裏可以認為“利”與“利用”沒有區別。

4—（1）：《謙卦》上六的爻辭中有“利用行師”，其象傳中有“可用行師，征邑國也。”表明“利用”與“可用”沒有區別。此象傳也是原原本本地引用經文。

5—(1)：《損卦》的卦辭中有“二簋可用享”，《困卦》九二的爻辭中有“利用享祀”，表明“可用”與“利用”是沒有區別的。

6—(1)：《需卦》的卦辭中有“利涉大川”，《訟卦》的卦辭中有“不利涉大川”，《同人卦》的卦辭中有“利涉大川”，《蠱卦》的卦辭中有“利涉大川”，《大畜卦》的卦辭中有“利涉大川”，《頤卦》六五的爻辭中有“不可涉大川”，《同卦》上九的爻辭中有“利涉大川”，《益卦》的卦辭中有“利涉大川”，《渙卦》的卦辭中有“利涉大川”，《中孚卦》的卦辭中有“利涉大川”，《未濟卦》六三的爻辭中有“利涉大川”等等，以上的資料表明“利”與“可”沒有區別。

7—(1)：《乾卦》九二的爻辭中有“利見大人”，《同卦》九五的爻辭中有“利見大人”，《訟卦》的卦辭中有“利見大人”，《蹇卦》的卦辭中有“利見大人”，《同卦》上六的爻辭中有“利見大人”，《萃卦》的卦辭中有“利見大人”，《升卦》的卦辭中有“〔利〕用見大人”，《巽卦》的卦辭中有“利見大人”等，除了《升卦》卦辭中的“〔利〕用見大人”一例外，其它八例均為“利見大人”。《升卦》卦辭的“〔利〕用見大人”，根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後文略稱為上海楚簡《周易》）與《馬王堆帛書周易·訟卦》的卦辭，考慮“利”字脫落，應該補上（參照7—(2)），因此“利”與“利用”也就沒有區別了。

以上僅僅根據通行本《周易》的經文，對“利”這一助動詞的用法進行了實證性的考證。然而，我們今天所能利用的最古的《易》，有近年出土的成書於戰國末到西漢初期的《周易》，即上海楚簡《周易》、馬王堆帛書《周易》和阜陽漢簡《周易》。對這三種《周易》絕不能忽視。

1—(2)中《觀卦》六四的爻辭，馬王堆帛書作“□用賓于王”，阜陽漢簡作“利用□”。此外，《姤卦》九二的爻辭，上海楚簡作“不利寘(賓)”，馬王堆帛書作“不利賓”。這些“利”的用法，與通行本似乎沒有不同。

2—(2)中《蒙卦》上九的爻辭，上海楚簡作“不利爲寇”。關於《益卦》初九的爻辭，馬王堆帛書作“利用爲大作”。而關於《益卦》六四的爻辭，馬王堆帛書作“利用爲家遷國。”這些“利”的用法，與通行本沒有差異。

3—(2)中《漸卦》九三的爻辭，馬王堆帛書作“利所寇”。這裏“利”的用法，與通行本也無異。

4—(2)中《謙卦》上六的爻辭，上海楚簡作“可用行市(師)”。據此可以追加一個“利用”與“可用”沒有區別的例子。

5—(2)中《損卦》的卦辭，馬王堆帛書作“二巧(簋)可用芳”。而關於《困卦》九二的爻辭，馬王堆帛書作“利用芳祀”。這些“利”的用法，與通行本無異。

6—(2)中《需卦》的卦辭，上海楚簡作“利涉大川”，馬王堆帛書作“利涉大川”。關於《訟卦》的卦辭，上海楚簡作“不利涉大川”，馬王堆帛書作“不利涉大川”，阜陽漢簡作“……不利涉大……”。此外，關於《同人卦》的卦辭，馬王堆帛書作“利涉大川”。而《蠱卦》的卦辭，上海楚簡作“利涉大川”，馬王堆帛書作“利涉大川”。關於《大畜卦》的卦辭，上海楚簡作“利涉大川”，馬王堆帛書作“利涉大川”。關於《頤卦》六五的爻辭，上海楚簡作“不可涉大川”，馬王堆帛書作“……川”。《同卦》上九的爻辭，上海楚簡作“利涉大川”，馬王堆帛書作“……涉大川”。關於《益卦》的卦辭，馬王堆帛書作“利涉大川”。關於《渙卦》的卦辭，上海楚簡作“利涉大川”，馬王堆帛書作“利涉大川”。關於《中孚卦》的卦辭，馬王堆帛書作“和(利)涉大川”。關於《未濟卦》六三的爻辭，上海楚簡作“利涉大川”，馬王堆帛書作“利涉大川”。由上可知，以上三種出土資料《周易》中的“利涉大川”，與通行本的相應之處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7—(2)中《乾卦》九二的爻辭，馬王堆帛書作“利見大人”，阜陽漢簡作“見……”。《同卦》九五的爻辭，馬王堆帛書作“利見大人”。此外，關於《訟卦》的卦辭，上海楚簡作“利用見大人”，馬王堆帛書作“利用見大人”。關於《蹇卦》的卦辭，上海楚簡作“利見大人”，馬王堆帛書作“利見大人”，阜陽漢簡作“利見……人”。《同卦》上六的爻辭，上海楚簡作“利見大人”，馬王堆帛書作“利見大人”。而關於《萃卦》的卦辭，上海楚簡作“利見大人”，馬王堆帛書作“利見大人”。關於《升卦》的卦辭，馬王堆帛書作“利見大人”。關於《巽卦》的卦辭，馬王堆帛書作“利見大……”。由此可以追加一個“利”與“利用”沒有區別的例子，即《訟卦》的卦辭。

順便提一下，近年新出土了許多在秦、漢時代廣泛存在、流傳的《日書》資料，並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這些《日書》可以說是與《易》性質大體相同的廣義的占卜書。這裏，列舉其中非常類似的“利”的用例，來進行考察。

4—(3)中通行本《周易·謙卦》上六的爻辭是“利用行師，征邑國”，上海楚簡

作“可用行師（師），征邦”，這在4—（2）中已經談到。與此相通的句子，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除”（七正貳）中有“達日，利以行師（師），出正（征），見人”。這句話的前半句是“利以行師（師），利以出正（征），利以見人”的意思。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的第一句“利以行師（師）”，是出現在占卜君主等派遣軍隊採取軍事行動可否的占辭中的表達方式。在《周易》通行本《豫卦》的卦辭中有“利建侯，行師。”上海楚簡作“利建侯（侯），行師（師）”，馬王堆帛書作“利建侯（侯），行師。”此外，通行本《復卦》上六的爻辭有“用行師，終有大敗”，馬王堆帛書作“用行師，終有大敗”。除《復卦》上六的爻辭“用行師”另當別論外，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和《周易》諸本中的“利以”、“利用”、“利”、“可用”這四種助動詞，可以說是沒有區別的。

第二句“利以出正（征）”也是占卜派遣軍隊征服他國可否的占辭。“出征”一詞，在《周易》中，通行本《離卦》上九的爻辭中有“王用出征”，馬王堆帛書作“王出正（征）”。這些句子裏沒有出現“利”字另當別論，由於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的“利以出正（征）”和《周易》通行本《謙卦》上六的爻辭“利用征邑國”內容幾乎相同，因此，“利以”與“利用”之間應當沒有區別。另外，“行師，出征”在《日書》中是經常被占卜的重要題目，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除”（一九壹）中有“平達之日，利以行師徒，見人，入邦。”九店楚簡《日書》（三〇）中有“未、申、酉（酉）、戌、亥、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是胃（謂）達日。利（利）目（以）行師（師）徒，出正（征），尋（得）。目（以）祭，少（小）大吉。生子、男吉、女必出元（其）邦。逃人不尋（得）。利（利）目（以）於寇（寇）逃（盜）”。這些內容與意義也和《周易·謙卦》上六爻辭的內容與意義幾乎相同。因此，《易》大體上應當是與《日書》性質幾乎相同的廣義的占卜書，從當時民間大量存在、流布以《日書》、《易》等進行占卜這一背景，可以推測在戰國末期以後，儒家特別從中提取《易》而不斷加以精練，通過寫作《易傳》而將《易》儒教化了。

第三句“利以見人”是占卜可否與他人會見的占辭。這在《周易》諸本中是以7—（1）與7—（2）引用的“利見大人”“利用見大人”這樣的句型出現的。如果將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與《周易》諸本加以比較，就會發現“利以”、“利”、“利用”作為助動詞具有同樣的功能（參照7—（3））。

7—（3）《周易·乾卦》九二爻辭等出現的“利見大人”“利用見大人”之類的句

子，在各種《日書》中也多見到。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除”（六正貳）中有“陰日……以見君上，數達，毋咎以見君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稷辰”（四四正）中有“斃……不可以見人”。同書乙種（六三）中有“徹、大徹……不可以見人”。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吏”（一六六陸）中有“己丑，以見王公，必有拜也”，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入官”（二三六貳）中有“甲寅、己丑、乙巳，皆可見人”，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除”（一五）中有“羸陽之日，利以見人”，九店楚簡《日書》（四一、四二）中有“凡不吉日，利（利）目（以）見公王與貴人”。上述各種《日書》中，睡虎地秦簡甲種“除”的“見君上”，睡虎地秦簡甲種“吏”的“見王公”，九店楚簡的“見公王與貴人”，表示的是與《周易》的“見大人”相同的事情，指與君主、貴人會見之事。此外，各種《日書》中的“見人”，與《周易》的“見大人”稍有不同，是指一般地廣泛地會見他人，但可加以參考。通過這些資料，可以確定《周易》諸本的“利”、“利用”，和《日書》諸本的“可以”、“利以”相當。另外，對這裏引用的各種《日書》抱有極大興趣的課題，在《周易》中成為占筮課題的也不少。例如，“祭祀”在《周易·困卦》九五爻辭中，“取（娶）婦”、“取（娶）妻”在《蒙卦》六三爻辭、《咸卦》卦辭、《姤卦》卦辭中作“取女”，“亡者，得”在《隨卦》六三爻辭中作“隨有求，得”，在《隨卦》六四爻辭中作“隨有獲”，“作大事”在《益卦》初九爻辭中作“爲大作”。

作為助動詞的“利”，本來是形容詞。當時民間將其作為判斷有利性的助動詞來使用，在《易》或《日書》中殘留了這樣的例子。而且，“用”、“以”為介詞，是起承接作用的詞，實際上，如果考察一下具有同樣構造的“利用”、“利以”、“可以”、“足以”、“易以”、“難以”等助動詞的古老用例，就會發現“用”、“以”明顯起著介詞作用。但到了後代，“利以”、“可以”、“足以”、“易以”、“難以”等用得越來越多，“用”、“以”的介詞作用逐漸減少，“利以”、“可以”、“足以”、“易以”、“難以”等遂變成一個助動詞來使用了。即便在今天的現代漢語中，“可以”、“足以”、“難以”等作為助動詞來使用的情況也沒有消失。不用說，這些助動詞的意義和用法有所不同，“利”、“利用”、“利以”是判斷有利性的助動詞，相對而言，“可”、“可以”是判斷許可性的助動詞，等等。因此，《易》或《日書》中的“利”、“利用”、“利以”與“可”、“可用”、“可以”，嚴格來說其意義、用法當然也有所不同，但這裏主要著眼於大局而言。隨著時間的流逝，其中的“利”、“利以”、“利用”也無法作為助動詞存續下來，結果先是從口語的世界中不再使用，最終在文言的世界中也銷聲匿跡。導致“利”、“利用”、“利以”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之一，從上述考察來看，或許就是《易》

的儒教化、道德化。

四

下面主要從外在方面考察，戰國至西漢間的思想家們是如何對待《易》這部書的，以及同時代的書籍中關於《易》留下了怎樣的記載。

《易》這部文獻，本來是占筮的書，到戰國末期還未成為儒教的經典，與儒家沒有任何關係。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們，自其鼻祖即春秋末期的孔子以來，到戰國時代的孟子、荀子等都幾乎沒有明確地言及《易》。作為引用《易》或言及《易》的例子，在《荀子》中僅有四條，即：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之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非相篇》）

《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大略篇》）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大略篇》）

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大略篇》）

在這四條中包含了三條的《大略篇》，是成於戰國末到西漢初期的荀子的門徒之手的雜錄^①。

第一，關於《咸卦》的評論文章，對儒家《易》的研究（即《易傳》著作），似是受道家的謙讓思想影響以後的思想，它形成的最早時間不會超過戰國末期以後^②。這些文章中，包含了與通行本《周易·彖傳》相同的“咸，感也”、“柔上而剛下”兩篇。但是《彖傳》

① 關於《荀子·大略篇》到《堯問篇》六篇是成於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期的荀子門徒流派之手的雜錄，參見內山俊彥：《中國古代思想史における自然認識》，第四章附《荀子後學》，創文社，1987。李學勤《帛書〈周易〉與荀子一系〈易〉學》認為荀子對《易》進行了很好的研究，但沒有這樣的事實。荀子確實知道《易》，但還未將其作為經典來對待。關於《荀子》對《易》的定位問題，請參見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上世期（上）諸子時代，第十章二“易的儒教化”（《武內義雄全集》第八卷，角川書店，1978），戶田豐三郎《易經注釋史綱》前編，一，二，二“易的儒教化”（風間書房，1968）等。

② 《易傳》中頻繁出現的“謙讓之德”，本來是道家開創的思想，到戰國末期，儒家在研究《易》的過程中從道家那里吸收過來。參見拙文：《〈周易〉與“謙讓之德”》，收入《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

中原有的最重要的思想，即由二元原理合一的萬物生成論^①，卻未包含在內。這是《彖傳》及其他文獻中多處出現的引人注目的新思想，作為構成世界的二元原理，列舉“天地”、“剛柔”、“男女”等，由它們的合一來說明“萬物”的生成或發展的生成論哲學。例如，《泰卦·彖傳》中有：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咸卦·彖傳》中有：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姤卦·彖傳》中有（在《彖傳》的其他卦，如《否卦》、《恆卦》、《歸妹卦》等中也有）：

姤，遇也，柔遇剛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繫辭下傳》中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序卦傳》中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與這些思想雖然相同，但是更古樸，可以看作是其原型的文章，在《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中有：

天地因（混），萬勿（物）潤。男女購（構）請（精），而萬物成。

以上各種資料中的“天地”、“剛柔”、“男女”，相當於《咸卦·彖傳》中明言的“陰陽”二氣，無非是其《周易》式的或文學性的表現。由這種以二元原理的“陰陽”合一形成的萬物生成哲學，是戰國末期以後的《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道家或陰陽家所提倡的，在戰國儒家中祇被《荀子·禮論篇》所引用：

① 作為構成世界的二元論原理而對舉“天地”“剛柔”“男女”等，由其合一而說明“萬物”的生成與發展，這是通行本《易傳》中彖傳多處出現的引人注目的生成論哲學。關於這個問題，參見以下兩篇拙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研究》，二、（一）“《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釋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3冊，1994；《〈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五、（三）“《帛書周易》要篇と通行本《易傳》との異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1995。

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

也不過是爲了說明荀子特有的“性僞合而天下治”的思想而順便提及的。而且，在西漢初期的儒家也沒有論及這樣的生成論哲學。因此，我想這一哲學在儒家看來不過是從道家、陰陽家那兒借來的借用品，但在戰國末期至西漢初期成書的《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中開始嘗試思索，此後，到《彖傳》成書的文帝後半期到成帝期才逐漸完備。因此《荀子·大略篇》這篇文章，大概出現在《彖傳》整理成書以前，爲《彖傳》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第二，《小畜卦》初九爻辭的引用，已經在《春秋》中用於歷史解釋，從直至戰國時代本是作爲占筮的《易》中完全分離出來。而且，《春秋》文公十二年的“秦伯使遂來聘”，與《公羊傳》的“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有密切關係。這種《小畜卦》的引用，必須從它能夠作爲支撐以《春秋》和《公羊傳》爲首的儒教經典的根基來確定《易》的地位，而《易》的這一地位是在戰國末期以後才開始形成的^①。

第三，“善爲易者不占”這句話，從它將《易》與《春秋》、《詩》、《禮》並舉來看，很明顯《易》已被視爲經典。而且，這句話雖然未必是單純地否定“占卜”，但是在這裏卻援用了道家式的反論邏輯或辯證法邏輯，採取貶低實際的具體的“占卜”的價值，並力圖在更高的層次上超越它的態度。這種態度應該認爲是道家思想或黃老思想盛行時代（戰國末期至西漢初期）的產物。另外，可以參照《荀子·天論篇》中的下段論述：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在荀子中，否定了將雩祭、卜筮等作爲“神”意味的巫術、宗教意義，而將其納入“文”意味的儒教文化的框架內初次得到肯定。

剩下的《非相篇》那段話，歷來被懷疑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而是其後學之作^②。這段話主張儒家的“君子”應該將“先王之禮義”積極地向外“言”，它在批判像道家那樣“不言”、“無言”的“腐儒”的時候，引用了《坤卦》六四的爻辭。“不言”、“無言”哲學不用說是先秦以來道家所提倡，例如，王弼本《老子》第二章、第四十三章中有“不言

① 參見拙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五（四）“世界の‘要’を把握する《易》—《帛書周易》のその1”。

② 參見戶田豐三郎《易經注釋史綱》，前編，一，二，二“易の儒教化”的分析。

之教”，第五十六章中有“知者不言”，第七十三章中有“不言而善應”等，《莊子·齊物論篇》中有“大辯不言”、“不言之辯”，《德充符篇》中有“不言之教”，《天道篇》中有“知者不言”，《田子方篇》中有“不言而信”，《知北游篇》中有“夫知者不言”、“不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徐無鬼篇》中有“不言之言”、“不言之辯”，《外物篇》中有“得意而忘言”，《寓言篇》中有“無言”，《列禦寇篇》中有“勿言難”、“知而不言”等，這樣的資料不勝枚舉。但是，到《老子》或《莊子》以後，被儒教化了的《易傳》也受道家哲學的影響而變得支持“不言”、“無言”了。新出土的馬王堆帛書《易傳》中，引用《坤卦》六四爻辭作注釋的有三處。其一，《二三子問篇》載：

易曰：“聒（括）囊，無咎無譽。”孔子曰：“此言箴（緘）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過，多事多患，□□□以衍矣，而不可以言箴（緘）之。元（其）猷（猶）‘聒（括）囊’也。莫出莫入，故曰：‘無咎無譽。’二丘（三）子問曰：‘獨無箴（緘）於聖〔人之口乎。孔子曰〕：‘聖人之言也，德之首也。聖人之有口也，猷（猶）地之有川谷（谷）也，財用所繇（由）出也。猷（猶）山林，陵澤也，衣食，家□〔所〕繇（由）生也。聖人壹言，萬世用之。唯恐元（其）不言也，有（又）何箴（緘）焉。’”

其二，《易之義篇》云：

“聒（括）囊，无咎。”語无聲也。

其三，《易之義篇》云：

易曰：“聒（括）囊，无咎。”子曰：“不言之胃（謂）也。”□□□□〔何〕咎〔之〕又（有）。墨（黜）亦“毋譽”。君子美元（其）慎而不自著（著）也，淵深而內（納）元（其）華。

引人注目的是，三者都將《坤卦》六四的爻辭作為“不言”的問題來注釋，這與《荀子·非相篇》有共通處。不過，《易之義篇》中的二例因為高度評價了“不言”，毋寧說與道家的“不言”“無言”的哲學很相近。如果將前文所引《荀子·非相篇》的論述看成是對儒家內部出現的受到道家這種影響的“腐儒”的批判的話，就很容易理解了。相反，《二三子問篇》的說法與《荀子·非相篇》主張的“君子”應該“有言”的宗旨幾乎相同，但是，其將“箴（緘）口”的主體區分為“小人”和“聖人”兩種情況來分析，等等，比《荀子·非相篇》的議論更加深入詳細。那麼，《二三子問篇》的論述很可能是在《荀子·非相篇》的基礎上寫成的。大體而言，《荀子·非相篇》的上述論述，可以說是與《馬王堆

帛書《易傳·二三子問篇》、《易之義篇》大體同時代的作品^①。而且，包含《二三子問篇》、《易之義篇》的馬王堆帛書《易傳》六篇與此後將這些整理而成的通行本“十翼”，基本上是荀子以後出現的儒家作品（成書年代在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期）。

《荀子》一書在列舉經典時，雖然也有在“詩書禮樂”後加上《春秋》而連稱“禮樂詩書春秋”或“詩書禮樂春秋”的情況（《勸學篇》、《儒效篇》），但只稱“詩書禮樂”的情況更多（《榮辱篇》、《儒效篇》）。《春秋》的地位之所以這樣不穩定，是因為它是最晚成為五經的，直到荀子時才開始成為經典，所以在當時是最不受重視的經典。《春秋》作為經典，地位不穩定的狀態可能以後也持續了一段時間^②，這樣的經學史或經典形成史的研究必須建立在正確把握各種史實的基礎上，冷靜地探求各種經典的歷史發展。而說到《易》，《荀子》中還未完全將其視為經典。因此，《易》的儒教化、經典化的真正進行，應當是在荀子以後的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期，而將《易》作為五經或六經中的文獻面世應該更晚。另外，“詩書禮樂”這一詞語，在《論語》和《孟子》中一次也未出現。儘管如此，在最近的研究者中，以《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中“孔子”說的一段話中出現“詩書禮樂”一詞等為根據，推測是孔子以六經傳世，從孔子時起“詩書禮樂易春秋”和“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已經存在了，這樣的研究者增加了，但筆者對這種簡單的研究態度從根本上感到懷疑。

最後想探討戰國時代結束後、秦始皇時代是如何對待《易》的問題。《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寫道：

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公元前 213 年接受法家丞相李斯的獻策發佈挾書律的經過。由此可見，發布挾書律的主要目的，在於杜絕知識分子以談論《詩》、《書》的形式批判政治，為此也禁止在民間藏《詩》、《書》或諸子百家之書，假如到這時《易》已經完成儒教化、經典化了，添加了儒家思想的《易傳》的“十翼”已經作成的話，那麼，《易》應該與“史官”或“《詩》、《書》、百家語”一起禁止收藏。但是，作為“卜筮”之書的《易》被免於禁止了。這樣的話，此時即使相當於《易》經文的《六十四卦》作為文獻或許已經成書，但是，不能不認為《易》的儒教化、經典化尚未進行，添加進儒家思想的《易傳》的

① 參見拙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五、（五）“《易》と孔子と關係づけ—《帛書周易》要篇の中心思想 その2”。

② 參見日原利國《春秋公羊傳の研究》，一、一“春秋および春秋學”，創文社，1976。

“十翼”也未作成。而且，根據稍後的《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的《易家總序》：

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也證明直到秦代，《易》尚未成為儒教的經典，還處在卜筮的階段。

五

再往前追溯，考察、探討一下春秋末期的孔子或《論語》是如何看待《易》的。

首先，孔子作“十翼”即《易傳》的十篇（《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這種說法，其原型可能源自《史記·孔子世家》的下段記載^①：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在春秋末期至西漢初期約三百年間的文獻中完全看不到這一說法，直到西漢武帝時的《史記》孔子世家才被著於竹帛。進而想到它的藍本是否存在什麼地方，於是到處尋找，結果在《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中發現了如下記述：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貢曰：“夫子它（他）日教此弟子曰：‘意（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繫（繫）。’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繇（敏）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臯（矩）方也。前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元（其）要者，不越（跪）元（其）難。尚書多勿（物）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元（其）用也，〔而樂元（其）辭也。〕□□□必於□□。”

但是，這段文字與《史記·孔子世家》之間，不得不說還有相當的距離。由於《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成書於戰國末至西漢初期，因此應當認為，孔子到晚年好《易》或作“十翼”之類的說法，不是以春秋末年孔子活動傳達出的歷史事實為基礎的傳承，而是西漢初期《易》儒教化、經典化產生出來的神話、傳說（fiction）^②。

① 孔子作“十翼”的明確記載在易緯《乾坤鑿度》卷下：“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曰：‘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願師於姬昌，法旦。’”參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校緯書集成》卷一上《易上》，明德出版社，1981。

② 關於“十翼”非孔子所作，參照以下論著。內藤湖南：《易疑》，收入全集本第七卷《研幾小錄 一名支那學叢考》，策摩書房，1970；錢穆：《論十翼非孔子作》，收入《古史辨》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李鏡池：《易傳探源》上，二、“易傳非孔子作底內證”，收入《古史辨》第三冊；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第十章，二、“易之儒教化”；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時代》，四、“孔子與易並無關係”，收入《青銅時代》，科學出版社，1957；本田濟：《易學—成立と展開—》，第一章，第一節“通説とその批判”，平樂寺書店，1960。

而且，相傳孔子讀過《易》本身作為歷史事實也極可疑^①。應當認為它也是為了將《易》儒教化、經典化的需要而編造出來的孔子傳說故事之一。

本來關於孔子本人，正如《論語·雍也篇》所載：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同書《述而篇》亦載：

子不語怪力亂神。

他對巫術、宗教基本上採取批判的態度，這成了以後的原始的儒家思想的傳統。孔子讀過《易》的證據是《論語·述而篇》：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經典釋文》對此處的“易”字解釋說：

易，如字。魯讀易為亦。今從古。

證明《魯論語》的“易”是“亦”的意思，據此，《論語·述而篇》可以讀作：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

此外，在漢代的“外黃令高彪碑”中有：

恬虛守約，五十以教（學）。

此句顯然是依據《論語·述而篇》而寫的，因此那段文字本來不是“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應該是“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原來的解釋，以其中的“易”字作為一個根據，相信春秋末期的孔子讀過《易》而且作了《易傳》。對此進行批評並提出新讀法的，是從近代李鏡池的《易傳探源》等開始的。這一主張並不僅僅限於正確的讀法是“亦”、讀作“易”是錯誤或假借的這種圍繞一字之差的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的問題，而是以此為基礎，提出孔子當時學過《易》的傳說並非當時（real time）出現的歷史事

① 以孔子為首的先秦時代的儒家思想家們在戰國末以前未將《易》作為經典，關於這一點請參以下論著：津田左右吉：《易の研究》，第一章“周易”，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六卷“儒教の研究 一”，岩波書店，1965；錢穆：《論十翼非孔子作》；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第十章二“易の儒教化”；金谷治：《秦漢思想史研究》，第四章第二節“《易傳》の思想”（三），日本學術振興會，1960；本田濟：《易學—成立と展開—》，第一章第一節“通説とその批判”；戸田豐三郎：《易經注釋史綱》，前編，一，二“易の儒教化”。

實等等，應當將其理解為這是自戰國末期開始的《易》儒教化、經典化的產物，將《易》與孔子勉強結合在一起是附會出的一種說法，將其提升為高級批判（higher criticism）的問題。進而，證明這種主張的正確性的一天終於到來了。這就是稱作《定州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一書的出土與出版。1973年，河北省定縣的《定縣四十號漢墓竹簡》中出土了《論語》，據推測墓主人是生活在西漢後期、死于宣帝五鳳三年（前55）的中山懷王劉脩。不用說，這是現存最古的《論語》。其中的《述而篇》中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毋大過矣。

新的出土資料證明瞭李鏡池等的主張是正確的。

另外，如果從《論語》中查找“亦可以……矣”的語法，可以看到在《雍也篇》中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在《顏淵篇》中有：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在《子路篇》中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路篇》中還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路篇》中也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在《憲問篇》中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從語法上看，冠有“亦”字的“亦可以……矣”的說法，比沒有冠“亦”字的“可以……矣”的說法明顯地要妥當和自然。

作為孔子讀過《易》的另一個證據，是《論語·子路篇》中的：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

這裏所說的“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是《恆卦》九三的爻辭，它在孔子的話中被引用。但問題在於，《子路篇》的這一南人有言章是否真的是春秋末期時孔子說過的話，它事實上是何時寫的。

首先必須要搞清楚，充當《論語·子路篇》主旨的南人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這句話，本來是什麼意思。對此雖然從來就有兩種解釋，這裏存在著在國教化了的儒教正統經典《易經》的重大影響下產生誤解的過程。其一，解釋為“對於沒有恆德的人，巫醫不能施行治療或占筮”，這是源於鄭玄《論語注》等以來的通說。但是這種通說，是被上述《易經》的重要地位所誤導，過於擡高中國古代社會中巫醫的地位。其二，釋為“人如果沒有恆德的話，不能讓其擔任巫醫的工作”，這是皇侃《論語義疏》所引一說或朱熹《論語集注》所主張的不同說法。而根據對近年出土的《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的研究，初次判明後者才是本來的正確意義。其探討如下：

眾所周知，通行本《禮記·緇衣篇》中有一段記載和上引《論語·子路篇》的記載大體相合：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在這段記載中，是將“南人”所說“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這句話當作“古之遺言”來評價的，同樣，“古之遺言”句在上引《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中也可以見到：

尚書多勿（物）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

因此，“古之遺言”的內容在馬王堆帛書《要篇》中也與“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相同，或者應該與此類似。而馬王堆帛書《要篇》的下文在以此為前提的同時，又進行了如下論述：

子曰：“易我後元（其）祝人矣，我觀元（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元（其）爲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元（其）爲之史。史巫之筮，鄉（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吾求元（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元（其）後乎。”

在後者中，行“筮”之“史巫”沒有“數、德”（通行本《禮記·緇衣篇》的“恆”也是其一）成了論題，而“史巫”以“筮”而占卻沒有成爲論題。據此判斷，《論語·子路篇》的南人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就應當解作“人如果沒有恆德的話，不能讓其就任巫醫的工作”^①。

其次，作爲通行本《禮記·緇衣篇》“南人有言章”原型的資料，現在已經出土、發現了兩種，將《論語·子路篇》與這三者進行對照、比較，可以推測出《子路篇》之文實際上是何時寫的。其一，郭店楚墓竹簡《茲（緇）衣》：

子曰：“宋人又（有）言曰：‘人而亡貢（恆），不可爲卜筮（筮）也。’其古之遺言壘（與）。龜畚（筮）猷（猶）弗智（知），而皇（況）於人虐（乎）。’《寺（詩）》員（云）：‘我龜既猷（厭），不我告猷。’

其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紂（緇）衣》：

子曰：“宋人又（有）言曰：‘人而亡亓（恆），□員（云）：‘我龜既猷（厭），不我告猷。’

上海楚簡《紂衣》中雖然有很多缺字，但將其看作與郭店楚簡《茲衣》幾乎同文應該沒有問題。而且，將這四者加以對照、比較，可以推測出如下結果。

第一，郭店楚簡《茲衣》與上海楚簡《紂衣》的宋人有言章，在引用“子”（孔子）的言論之後，在章末只引用《詩·小雅·小旻篇》，四者中其文章構成最單純古樸。

第二，與此相對，通行本《禮記·緇衣篇》的“南人有言章”，在引用“子”的話之後，在章末不祇引用了《詩·小雅·小旻》篇，還引用了《書·兌命》篇與《易·恆卦》九三爻辭、六五爻辭，文章結構變得複雜，經過了經學的精煉。包括上述情況在內，我們考察一下通行本《禮記·緇衣篇》諸章中經典的引用情況，就會得到如下結論：

A—a型：僅引用一條《詩》的，計十一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

① 參照：《支那學文叢》第一部，《續說巫補遺》，みすず書房，1973；拙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研究》，二，（一）“《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釋文”；及拙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五，（一）“《帛書周易》要篇の成書年代”。另外，《論語》子路篇的“不占而已矣”是“人而無恆者”不能占筮他者的意思。

有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

A—b型：引用了二條《詩》的，計一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即第四章。)

A—c型：一條也沒有引用《詩》、《書》的，計一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即第八章。但根據郭店楚簡《茲衣》，這一章應為A—a型。)

A型合計十三章。

B—a型：只引用一條《書》的，計二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即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但根據郭店楚簡《茲衣》，其中的第十二章為C—a型。)

B—b型：引用二條《書》的，計一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即第十三章。)

B型合計三章。

C—a型：引用一條《詩》之後，再引用一條《書》的，計二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即第五章、第十章。)

C—b型：引用了二條《詩》之後，再引用一條《書》的，計一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為第十七章。)

C—c型：引用了一條《詩》之後，引用了一條《書》，其後又引用一條《詩》的，計一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即第七章。但根據郭店楚簡《茲衣》，這一章為C—a型。)

C—d型：引用了一條《書》之後，又引用一條《詩》的，合計二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即第三章、第十八章。但根據郭店楚簡《茲衣》，這二章均為C—a型。)

C型合計六章。

D型：引用了一條《詩》後，再引用一條《書》，之後又引用《易》的，計一章。(按照郭店楚簡《茲衣》的章編號，即第二十三章。但根據郭店楚簡《茲衣》，這一“南人有言章”為A—a型。)

D型合計一章。

通行本《禮記·緇衣篇》的“南人有言章”，引用了《詩》、《書》和《易》，不屬於上述A、B、C任何一種類型，而成為特殊的D型。因此，“南人有言章”，即便在通行本《禮記·緇衣篇》諸章中，其文章構成也是最複雜、最受到經學精煉的，從這一點來看，它可能是整個二十三章中成書年代最晚的作品。

第三，郭店楚簡《茲衣》與上海楚簡《紂衣》各章對經典的引用有如下規律：

A型：只引用了一條或兩條《詩》的，合計十四章。

B型：只引用一條或兩條《書》的，合計三章。

C型：引用了一條或兩條《詩》之後又引用一條《書》的，合計六章。

包括A型的宋人有言章，概言之較為單純而古樸，但在各章末尾所引用的文章構成上，看不出破綻和混亂。因此，郭店楚簡《茲衣》與上海楚簡《紂衣》，無疑正是通行本《禮記·緇衣篇》的藍本，後者是後代將前者進行加工，而使文章構成複雜化並經過經學洗煉而成書的文獻。現在中國一般將郭店楚墓竹簡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視為戰國中期即公元前300年以前抄寫而成的。筆者不贊成這一通行說法，而認為是在公元前250年代以降的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期成書的^①，無論如何，當時的郭店楚簡《茲衣》與上海楚簡《紂衣》諸章，雖然頻繁引用《詩》、《書》，但是卻未引用一條《易》。其原因不外乎當時的《易》尚未成為儒教的經典，與儒家尚無任何關係。與此相對，通行本《緇衣篇》的宋人有言章，最早在此章中引用《易》，應當是在《易》漸漸成為儒教經典的時代（馬王堆帛書《易傳》六篇成書之後，即比文帝後半期還晚的時代），因為它能夠以孔子的言論為根基而不斷獲得權威地位。

第四，將《論語·子路篇》的宋人有言章，與通行本《緇衣篇》的宋人有言章、郭店楚簡《茲衣》的宋人有言章、上海楚簡《紂衣》的宋人有言章進行比較，由於它沒有引用《詩》、《書》，因此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最單純、古樸的。但是，其一，其“宋人”與通行本《緇衣篇》相同，與更早的郭店楚簡《茲衣》和上海楚簡《紂衣》的“宋人”不同；其二，在引用《易》這一點上，也與通行本《緇衣篇》幾乎相同，比更早的郭店楚簡《茲衣》和上海楚簡《紂衣》沒有引用《易》不同；其三，《易》的《恆卦》九三爻辭未冠以“易曰”的形式，將其融在孔子的言論中，這與通行本《緇衣篇》的“宋人有言章”冠以“詩云”、“兌命曰”、“易曰”，經過經學的洗煉與炫耀權威的生硬不同。基於以上三點，我推測《論語·子路篇》的“宋人有言章”，比通行本《緇衣篇》的“宋人有言章”或許成書稍晚些。

因此，《論語·子路篇》的“宋人有言章”，實際上並不是春秋末期孔子言論的文章，而是比西漢文帝後半期還要晚的時代的文獻，這樣，就沒有一個能夠作為列舉孔子讀過《易》的證據了。

六

如上所述，直到戰國末的古本《易》，祇是由卦畫、卦名、卦辭、爻辭構成的簡單的《六十四卦》，它與以後的《易經》（特別是《易傳》）不同，尚不包含高度的形而上學

① 參照拙文《郭店楚簡〈窮達以時〉の研究》，收入池田知久編《郭店楚簡儒教研究》，汲古書院，2003。

等的哲學、陰陽五行的自然哲學、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等。關於民間日常生活的占筮的古本《易》，不包含高度的哲學、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等，是理所當然的。它們在戰國末以降的《易》的儒教化、經典化的進程中，儒家思想家們認知了《易》並拿來作為自己的經典，通過研讀《易》的《六十四卦》，以及撰寫它的注釋《易傳》，將其思想加入到經文《六十四卦》本身的解釋或各種《易傳》之中。

現在，除了通行本《易經》外，我們能夠見到的新出土的《易》的文本還有戰國末至西漢初期成書的上海楚簡《周易》，西漢高祖時期到文帝前半期（截至公元前168年）成書的馬王堆帛書《周易》，高祖期至文帝前半期（截至公元前165年）成書的阜陽漢簡《周易》。這些是迄今為止的最古的《易》。通過對它們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加正確地把握《易》的經文《六十四卦》和注釋書《易傳》的形成過程，《易傳》各篇所包含的儒家思想的内容與特徵，總之即《易》的儒教化、經典化過程。

為了正確地把握《易》的儒教化、經典化過程，這些新舊資料中最重要的是，馬王堆帛書《周易》中所包含的《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這六篇《易傳》，以及通行本《周易》所包含的“十翼”即十篇《易傳》。這些大體上都是戰國末到西漢初期、或以後的儒家思想家們對《易》的經文《六十四卦》不斷地作注釋，將其從民間純粹的占筮之書蛻變、發展為鮮明的儒教經學思想著作的《易》。闡明這種蛻變、發展經歷了怎樣的過程，是《周易》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儒家的思想家們在戰國末期以後，捨棄了此前對巫術、宗教的批判傳統，而將《易》作為經典來接受，讀《六十四卦》並撰寫注釋書《易傳》。導致這種態度一變的理由之一，無疑是為了應對當時的政治狀況，即前述秦始皇時代對知識分子實行彈壓政策，不允許其收藏《詩》、《書》或諸子百家之書，也不允許談論《詩》、《書》。由於當時允許民間收藏的祇有“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因此他們將卜筮之書《易》作為經典來接受，假借讀《六十四卦》而給其作注釋，來繼續進行自己的思想活動。但除了這種政治上的理由外，應當也有將儒教的思想內容加以改造，使之適應新時代的這種思想上的動機。

當時的儒家思想家們，為了對本來無關的《易》賦予儒教的意義，使其儒教化、經典化，在許多方面進行了種種努力。例如，說鼻祖孔子從春秋末開始就好讀《易》，而且作了“十翼”的注釋等等，編造了將孔子與《易》聯繫在一起的故事^①，杜撰了孔子作為楷模來仰慕的作為儒家象徵的周文王和周文化與《易》結合在一起的故事^②（其名稱從《易》改

① 詳細情況請參照拙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五、（五）“《易》と孔子との關係づけ——《帛書周易》要篇の中心思想 その2”。

② 詳細情況請參照拙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五、（五）“《易》と孔子との關係づけ——《帛書周易》要篇の中心思想 その2”。

為《周易》，就反映了這一情況的變化^①，在給《易》作注釋的過程中，在“十翼”中不斷地加進了《六十四卦》本來不具有的儒教的高度的哲學、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等等。而且，在上面列舉的各事項背後，存在著以下思想上的原因。

第一，從來不善於形而上學思考的儒家，採用《易》作為經典，以作《易傳》為媒介，在自身的思想內部大量導入了道家“道”的形而上學，其結果是為其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消除了不安因素^②。第二，引用儒家鼻祖孔子的言論和之後儒家思想家們的言論，使儒家的整個思想體系從根基上獲得支撐，而成為經典。即對五經《詩》、《書》、《禮》、《樂》、《春秋》逐漸加以完善，成為優越的最高的經典^③。第三，改變了以往對原本為占筮之書《易》的巫術性、宗教性基本上進行批判的傳統態度，為了達到象數家的法則性哲學的“數”或儒家道德的政治性的“德”這樣的必要基礎階段，將自己內涵中包攝的儒家思想的世界加以豐富化^④。而第三點，成為西漢後期到東漢以《易》和《春秋》為基礎的儒教災異說化、讖緯說化的先驅。

可以肯定，經過以上種種努力，《易》的儒教化、經典化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其中為了添加儒教高度的哲學、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等內容，在西漢初期，《周易》已被認為是孔子讀過且作了注釋的儒教正統的文本，是儒教信奉者必須學習的經典。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五經中《易經》所佔的地位不斷提高，過了西漢中期，《易經》就上升到五經首座的位置。而此後，直到近代，在作為舊中國統治思想的儒教中，《易經》長期保持著這一首座的地位，其理由主要在於它發揮著第一哲學的功能這一點上。

① 詳細情況請參照拙論：《〈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研究》，二、（一）“《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釋文”；拙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五、（一）“《帛書周易》要篇の成書年代”。

② 詳細情況請參照拙著：《老莊思想》，7。“《易傳》の道器論——帛書《易傳》繫辭篇と通行本《周易》繫辭上傳”，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1996；及拙著《〈莊子〉——“道”の思想及其演變》第六章第3節“《易傳》の道器論——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繫辭篇》”，第六章第3節“《易傳》の道器論——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繫辭篇》和通行本《周易·繫辭上傳》，國立編譯館，2001。

③ 詳細情況請參照拙論《〈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之思想》，五、（四）“世界の‘要’を把握する《易》——《帛書周易》要篇の中心思想 その1”。

④ 詳細情況請參照拙論《〈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之思想》，五、（六）“《易》を媒介とする占筮の包攝——《帛書周易》要篇の中心思想 その3”。

帛書《刑德》分野說略考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 陳松長

內容提要 帛書《刑德》的雲氣占部分中有一段關於分野的記載，但這部分分野記錄與傳世文獻中的分野記載多有不同之處，本文在比較了帛書和傳世文獻種種不同之後認為：

帛書的分野說並不是原始或早期未經整齊劃一的分野說。因為有關分野的理論，起源很早。早在《周禮·春官·宗伯》中，就有“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以觀“天下之妖祥”的記載，《左傳》中也有參星配于晉而稱晉星，大火星配于殷而稱商星的記載，這說明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就嘗試著以天上的星象來代指地上的疆域，以闡揚其天地一體、妖祥互見的觀念和認識。

帛書《刑德》中的分野記載並不是專為著述而抄寫的分野體系，而應是在漢高祖十一年這個特殊的年頭裏，漢初的星占家因兵戰的需要而為軟侯編制的分野情況，它跟《刑德》甲本一體，都應是在漢高祖十一年這個多事的年頭裏為軟侯利蒼跟隨劉邦東征西討的戰事服務的。

關鍵詞 帛書 刑德 分野說

馬王堆帛書《刑德》的甲、乙本中都有一段關於分野的記錄，其甲本作：

房左驂，汝上也。其左服鄭地也。房右服，梁地也。右驂，衛。婺女，齊南地也。虛，齊北地也。危，齊西地也。營室，魯。東壁，衛。婁，燕。胃（胃），魏氏東陽也。參前，魏氏朱縣也。其陽，魏氏南陽，其陰，韓氏南陽。畢，韓氏晉國。觜觿，趙氏西

地，罰，趙氏東地。東井，秦上郡。與鬼，秦南地。柳，西周。七星，東周。張，荆北地。

乙本因是抄錄甲本的^①，故其內容基本相同，為便於比較，我們也錄之如下：

房左驂，汝上也。危，齊西地也。營室，魯。東壁，衛。婁，燕也。胃（按，此為帛書抄錯之行，因抄手抄到此發現抄漏了很多文字，故另起一行重抄。）

房左驂，汝上也。其左服鄭地也。房右服，梁地也。右驂，衛。婺女，齊南地也。虛，齊北地也。危，齊西地也。營室，魯。東壁，衛。婁，燕。胃（胃），魏氏東陽也。參前，魏氏朱縣也。其陽，魏氏南陽，其陰，韓氏南陽。畢，韓氏晉國。觜觿，趙氏西地，罰，趙氏東地。東井，秦上郡。與鬼，秦南地，柳，西周。七星，東周。張，荆北地。

現在所知，這是中國出土文獻中最早的星宿分野記錄，儘管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之十二的《占書》殘簡中，也有一些分野的記載，但其時代比帛書要晚，而且在完整性方面也無法與帛書相比。因此，將之與傳世文獻中的分野記載作些比較，多少能揭示出漢初人的空間觀念和對星宿分野的認識和應用。

為便於展開，我們無妨先就帛書的一些文字作些簡單的考釋：

“房”，二十八星宿名之一。《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亦曰天驕，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是知帛書中的“左驂”、“左服”、“右服”、“右驂”都是房宿四星的專稱。

“汝上”，汝水。在今河南省境內。《漢書·地理志》：“高陵，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按，高陵在今河南省臨漳縣西。

“魏氏東陽”，“魏氏”指魏國，古人在國名、國號後繫以“氏”字，代指其國者多見。“東陽”，地名，春秋時屬晉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趙勝率東陽之師以追之。”地望在今山東省恩縣西北。“魏氏東陽”指三家分晉之後的屬魏國的東陽一帶。

“參前”，指參星的前面。“其陽”，指參星的南面。“其陰”，指參星的北面。

“南陽”，戰國時，南陽為韓、魏接壤之地，故兩國皆有“南陽”之地。

“韓氏晉國”，指韓國所分的晉國之地，即指韓國之疆域。

“罰”，星名，即參星中的罰星。代指參星。《史記·天官書》：“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正義》：“罰，亦作伐。”帛書《五星占》的土星行度表中，位於“觜觿”和“東井”之間的星名也寫作“罰”，可見當時確

^① 見拙文《帛書〈刑德〉甲、乙本的比較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可將罰星代指參星。

“西周”、“東周”，地功能變數名稱，非朝代名。《史記·周本紀·索隱》：“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微弱，西周與東分主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據《史記》可知，周考王曾封其弟揭于王城故地，是為河南公，亦稱西周君，至東周君二年，秦遷西周君于愚狐聚，遂滅西周。周考王末年，河南惠公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是為東周君，蓋其時王居洛陽下都，自洛陽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曰東周，赧王崩之翌年為東周君元年，至七年秦滅之，遷東周君于陽人聚，周室遂亡。可見所謂“西周”即所謂“王城故地”，即今之洛陽之地；而“東周”則在洛陽的東邊鞏縣一帶。

首先，我們注意到，帛書中的二十八宿祇出現了“房、婺女、虛、危、營室、東壁、婁、胃、參（罰）、畢、觜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等十六宿，其所對應的地域也很具體，為便於比較，我們且排列如下：

房左驂、左服、右服、右驂	汝、鄭、梁、衛
婺女	齊南地
虛	齊北地
危	齊西地
營室	魯
東壁	衛
婁	燕
胃	魏氏東陽
參前、其陽、其陰	魏氏朱縣、魏氏南陽、韓氏南陽
畢	韓晉
觜觿	趙氏西地
罰	趙氏東地
東井	秦上郡
輿鬼	秦南地
柳	西周
七星	東周
張	荆北地

很顯然，這裏的分野，既不是嚴格地按二十八宿來分野，也不是按列國國名或九州、十二州的州名來與星宿對應，而是按具體的地望或地域來分野，如其中衛分為房右驂和東

壁兩宿，齊則共分婺女、虛、危三宿，魏共分胃、參兩宿，趙共分觜、參兩宿，秦共分東井、與鬼兩宿等，都與傳世文獻中所記載的分野情況有所不同，對此，劉樂賢先生曾作過這樣的分析：

帛書的分野說給人一種這樣的印象：其星宿與地望都比傳世文獻所記更為具體和詳細。傳世文獻的分野說已將星宿固定為二十八宿，而不以某宿內部的星名與地望相配。帛書的分野說則不限於二十八宿本身，而常以某宿內部的一些星名與地望相配。傳世文獻的分野說已將地望歸納為整齊的列國國名或九州、十二州，帛書則好用某國的某一方位或某一具體地域與星宿相配。由此，似可作出如下推測：帛書所記載的可能是比較原始或未經整齊劃一的早期分野學說，傳世文獻所記載的是經過後人整齊劃一的分野學說，故二者在細節上有些差別。^①

劉先生的分析應該說是比較好地指出了帛書分野說的特點，但他據此所作出的推測則未免太簡單了一點。

首先，所謂傳世文獻所記載的分野學說也並不是整齊劃一的。如《史記·天官書》所載的分野學說就有好幾種，一種是以北斗作為一個中介星象來分野的系統，這或許是最原始的分野體系，如：

斗勺	自華以西南
斗衡	中州河、濟之間
斗魁	海岱以東北

在此之後，還有用恆星來進行分野的學說，如：

秦	太白	狼、弧（井、鬼）
吳、楚	婁惑	鳥衡（柳）
宋、鄭	歲星	房、心
燕、齊	辰星	虛、危
晉	辰星	參、罰

所謂按十二州的格局劃定的分野體系應該是比較晚出的一種，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記載如下：

角、亢、氏	兗州
-------	----

① 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48頁。

房、心	豫州
尾、箕	幽州
南斗	江、湖
牽牛、婺女	揚州
虛、危	青州
營室、東壁	并州
奎、婁、胃	徐州
昂、畢	冀州
觜、參	益州
東井、輿鬼	雍州
柳、七星、張	三河
翼、轸	荊州

按，其中的“南斗”所對應的“江、湖”和“柳、七星、張”所對應的“三河”也並不是整齊的十二州的概念。

在《淮南子·天文訓》中，載有按列國國名的分野體系：

角、亢	鄭
氐、房、心	宋
尾、箕	燕
斗、牛	越
女	吳
虛、危	齊
室、壁	衛
奎、婁	魯
胃、昂、畢	魏
觜、參	趙
井、鬼	秦
柳、星、張	周
翼、轸	楚

應該說，在形式上看起來，這個分野體系的對應是整齊劃一的，但稍加分析，就發現這類分野學說仍是很混亂的，對此，馮時指出：

它表現出的是一種十分混亂的組合，燕的分野已與過去同齊共分虛、危的情況不同，而分有尾、箕，吳的分野也與過去同楚共分柳宿不同，而分斗、牛、女，燕、趙、吳三國分野比鄰，已講不出任何道理。^①

對這種分野學說的混亂情況，邢義田先生曾作過很好的分析。他認為：

地區的劃分，隨著時代而有所不同，因而分野說也就難以形成一定的標準，就以《史記·天官書》及《漢書·地理志》所記上的兩者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就有很大的出入。

因為是傳承流派的不同，這一類假科學的設計，就會有種種不同的排列法，譬如八卦的兩種排列方法，無法調和，便只好用先天八卦和後天八卦兩種不同的名稱來解釋。二十八宿的方位，因為觀測時間和月份的標準不同，也會出了差異出來。譬如斗牛應在丑方，漢代丑屬牛當然和二十八宿有關，但《漢書·地理志》所載，“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魏地，觜、參之分野也”，“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趙地，昴、畢之分野也”，“燕地，尾、箕分野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魯地，奎、婁之分野也”，“宋地，房、心之分野也”，“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楚地，翼、轸之分野也”，“吳地，斗分野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這就和《史記·天官書》多少有些出入。若依照《史記·天官書》，那就是：“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轸，荊州。”大致看來差不多，其實其中就有許多不同處。

今就其顯然不同的來說，如同：

角、亢、氐，《史記》以為兗州（山東），《漢書》以為韓氏（河南）

房、心，《史記》以為豫州（河南），《漢書》以為宋地（蘇北）

室、壁，《史記》以為并州（山西），《漢書》以為衛地（河南）

奎、婁、胃，《史記》以為徐州（蘇北），《漢書》以為魯地（山東）

觜、參，《史記》以為益州（四川），《漢書》以為魏地（山西）

其中就差異很大，若再就東西南北的方位來說，那就東面地方，所應的星宿可能在西；西面的地方，所應的星宿反而在東，更顯然這種配置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所以梁玉繩的《史記志疑》說：以宿配州，或多或少，地廣者星反少，地狹者星反多。《淮南子·

① 馮時：《星漢流年——中國天文考古錄》，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天文訓》，《漢書·地理志》，以郡國配二十八宿，嗣後言分野者，雖有異同，遞為祖述；唐李淳風、僧一行更辟發無疑，而獨不宗史記……占地於天，必天應乎地而始驗，乃揚州在南而斗牛在北；青州在東，而虛危在北；冀州在北，而昴畢在西；雍州在西，而井鬼在南；往往相反而不相應……故宋周密《癸辛雜識》以分野為疏誕也。

其實分野說和二十八宿值日法，都同樣是屬於“占星術”的一種，並非嚴格地從地理學者的立場以某一節氣中某一時辰地理的位置和天象經度相應為標準來創造出來的，其基礎上當然‘疏誕’。不過古人確實相信，也就使得二十八宿的值日法及分野說具有民俗上和社會上的意義，因而它們的來龍去脈，甚至和科技上的關係都值得檢討了。^①

邢先生的分析，應該說是很好地揭示了古代分野說並不科學的本質，既然它是“占星書”的一種，那其分野的目的也就是想借天象來解釋“天下之妖祥”，因此我們並不能用地理學者的眼光來衡量和檢測其分野的科學性，而應該努力去解釋這類分野說後面所蘊涵的所謂“民俗上和社會上的意義”。准此來思考和認識帛書《刑德》中的分野說，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

首先，帛書的分野說並不是原始或早期未經整齊劃一的分野說。眾所周知，有關分野的理論，起源很早。早在《周禮·春官·宗伯》中，就有“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以觀“天下之妖祥”的記載，《左傳》中也有參星配于晉而稱晉星，大火星配于殷而稱商星的記載，這說明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就在嘗試著企圖以天上的星象來代指地上的疆域，以闡揚其天地一體、妖祥互見的觀念和認識。因此，比起前述以北斗或恆星來進行分野的體系來，帛書的分野說顯然不是什麼原始的分野體系。

其次，這種分野說既然不是什麼原始的分野體系，為什麼又與傳世文獻中所記載的分野說有如此多的不同呢？這主要是因為它並不是專為著述而抄寫的分野體系，而是在漢高祖十一年這個特殊的年頭裏，漢初的星占家因兵戰的需要而為軫侯編制的分野情況，它跟《刑德》甲本一體，都應是在漢高祖十一年這個多事的年頭裏為軫侯利蒼跟隨劉邦東征西討的戰事服務的。

我們曾經專門討論過帛書《刑德》甲、乙本的撰抄年代，明確指出：帛書《刑德》甲本完全是為漢高祖十一年這樣一個特殊的年分撰制的。^②那麼，漢高祖十一年又是一個怎樣不尋常的年份呢？據史書記載，在這一年內，相繼有趙相國陳豨反於代地、淮陰侯韓信謀反於關中、梁王彭越謀反於梁，淮南王黥布反於淮南，真可謂多事之秋。這年漢高祖更是

① 見勞幹《漢晉西陲木簡新考》校記，史語所專刊甲種之二十七，1985。

② 見拙文《試論帛書〈刑德〉甲、乙本的撰抄年代》，《國際儒學研究》第11輯，2001年3月。

疲于平叛勘亂，勞師動眾。可以想見，在這樣一個戰爭不斷的年份，作為一個因戰功而在孝惠二年封侯的利蒼來說，必然是在高祖麾下衝鋒陷陣的一位將軍，作為將軍，自應深諳刑德法來占測戰爭的勝負與否，因此，星占家為其特製一份可供查核而實用的刑德法圖譜和分野圖應該是極平常的事。而從上面所引述的幾個事件的地望來看，也並不難看出帛書分野所指的實際意義。代屬趙國，即今山西省的東北部，是觜觿和參（罰）宿的分野，關中屬秦，乃東井、輿鬼的分野，梁是房右服的分野，淮南在楚的北面，是張的分野，這些地域正是劉邦平叛勘亂、往來征戰的地方，作為劉邦的戰將，自當非常熟悉這些地望和分野，由此我們對帛書分野中為什麼缺少吳越等地分野的原因也就有了比較可信的解釋，因為這年的大事都在平叛戰事之中，故吳越等地的地望及分野自可略而不記。

秦漢簡中的“冗”、“更”與供役方式

——從《二年律令·史律》談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楊振紅

內容提要 秦漢簡中屢見“冗”與“更”同時出現的情況，它們是表示供役方式的一組用語，相當於唐代的“長上”和“番上”。冗指長期供役，更指輪更供役。其適用人群包括官吏的各種散職、到官府供役的丁、夫、色役、隸臣妾等。

關鍵詞 秦漢簡 《二年律令·史律》 冗 更 供役方式 長上 番上

張家山漢簡^①《二年律令·史律》下列簡中有“冗祝”、“冗之”語：

以祝十四章試祝學童，能誦七千言以上者，乃得爲祝，五更。大祝試祝，善祝、明祠事者，以爲冗祝，冗之。（簡479）不入史、卜、祝者，罰金四兩，學得二兩。（簡480）

整理小組注釋：

冗，散。《睡虎地秦墓竹簡》有冗吏，《周禮·樞人》賈疏：“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吏”，可參考。（81頁）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本文所引均爲此版本。

由此可以看出，整理小組注釋此律時參照了睡虎地秦簡^①整理小組的意見。

睡虎地秦簡中多次出現冗字，整理小組的注釋不甚一致，現一一羅列如下：

1.《秦律十八種·廩苑律》：“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庸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耨夫壹酉（酒）束脯，為旱（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許田耨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減絮，治（筭）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筭）卅。廩苑律”（30—31頁）

整理小組注釋：“冗，散。冗皂者，應包括上文牛長及為皂者。”（31頁）

2.《秦律十八種·倉律》：“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粟。小城旦、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嬰兒之母（無）母者各半石；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粟之，禾月半石。隸臣田者，以二月月粟二石半石，到九月盡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隸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倉”（49頁）

3.《秦律十八種·倉律》：“更隸妾節（即）有急事，總冗，以律粟食；不急勿總。倉”（50—51頁）

整理小組注釋：“更，輪番更代。更隸妾，當為以部分時間為官府服役的隸妾。”“總冗，把零散的聚集到一起，即集合。”（51頁）

4.《秦律十八種·金布律》：“都官有秩吏及離官耨夫，養各一人，其佐、史與共養；十人，車牛一兩（輛），見牛者一人。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人，養一人；十五人，車牛一兩（輛），見牛者一人；不盈十人者，各與其官長共養、車牛，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予）車牛、僕，不盈七人者，三人以上鼠（予）養一人；小官毋（無）耨夫者，以此鼠（予）僕、車牛。糴生者，食其母日粟一斗，旬五日而止之，別緝以段（假）之。金布律”。（58—59頁）

整理小組注釋：“冗，《正字通》：‘猶多也。’”“都官之佐、史冗者”譯文：“都官的佐、史人數多的”。（59頁）

5.《秦律十八種·工人程》：“冗隸妾二人當工一人，更隸妾四人當工【一】人，小隸臣妾可使者五人當工一人。工人程”

整理小組注釋：“冗隸妾，疑為做零散雜活的隸妾。”（74頁）

6.《秦律十八種·司空》：“百姓有母及同姓（生）為隸妾，非適（謫）罪毆（也）而欲為冗邊五歲，毋賞（償）與日，以免一人為庶人，許之。●或贖遷（遷），欲入錢者，日八錢。司空”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本文所引均為此版本。

整理小組注釋：“冗邊，據簡文應為一種戍防邊境的人。”（91頁）

7.《秦律十八種·效》：“倉屬（漏）朽（朽）禾粟，及積禾粟而敗之，其不可食者不盈百石以下，評官嗇夫；百石以上到千石，貲官嗇夫一甲；過千石以上，貲官嗇夫二甲；令官嗇夫、冗吏共賞（償）敗禾粟。禾粟雖敗而尚可食毆（也），程之，以其耗（耗）石數論負之。效”（《效律》中一段簡文與此基本同）。

整理小組注釋：“冗吏，群吏。”（97頁）

8.《效律》：“官嗇夫、冗吏皆共賞（償）不備之貨而入贏。”

整理小組譯文釋冗吏為“眾吏”。（113頁）

9.《效律》：“官嗇夫貲二甲，令、丞貲一甲；官嗇夫貲一甲，令、丞貲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貲、評如官嗇夫。其它冗吏、令吏掾計者，及都倉、庫、田、亭嗇夫坐其離官屬於鄉者，如今、丞。”

整理小組譯文釋冗吏為“群吏”。（123—124頁）

10.《秦律雜抄》：“冗募歸，辭曰日已備，致未來，不如辭，貲日四月居邊。●軍新論攻城，城陷，尚有樓未到戰所，告曰戰國以折亡，段（假）者，耐；敦（屯）長、什伍智（知）弗告，貲一甲；伍二甲。●敦（屯）表律。”

整理小組注釋：“冗募，意為眾募，指募集的軍士。《漢書·趙充國傳》稱為‘應募’。”（145頁）

可以看到，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多在“散”的意義上解釋冗，此外則取“多”、“眾”、“群”的意思。

山田勝芳曾推測前揭例2中的“冗”是“居”的意思，“更”與一般指輪番服徭役的“更”義同，“冗隸妾”與“更隸妾”是一組對比關係，前者指在官府長期拘禁使役，後者指從家來番上勞動者。隸臣妾雖然來源於犯罪沒官者，但是祇有夫婦都是隸臣妾的場合才令其“冗居”，丈夫居家祇有妻子是隸妾及有孩子的場合，則是以“更隸妾”的形式從事勞作。前揭例3中的“冗”雖然有無特定職務的意思，但是這裏應指居家不去官府進行更番者。^①

廣瀨薰雄撰文討論《史律》中的踐更問題時，列舉前揭例5《秦律十八種·工人程》等，亦認為“冗”與“更”是相對的用語，意味著沒有固定的服役義務，《史律》中的“冗祝”指沒有踐更義務的祝。他還認為《二年律令》

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歲予告六十日；它內官，卅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

① 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汲古書院，1993，374頁，注88。

二歲壹歸，予告八十日。（簡 217）

諸內作縣官及徒隸，大男，冬粟布袍表裏七丈、絳絮四斤，袴（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袴（袴）丈八尺、絮（簡 418）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粟禪，各半其丈數而勿粟袴（袴）。夏以四月盡六月，冬（簡 419）以九月盡十一月粟之。布皆八稷、七稷。以裘皮袴（袴）當袍袴（袴），可。（簡 420）

中的“內”（標加重符者）均應釋為“冗”。簡 418 中的“冗作”可能與前揭例 2《秦律十八種·倉律》中的“冗居”意思相同，指沒有特定服務內容的勞役。^①

山田勝芳、廣瀨薰雄兩氏的意見值得重視，秦漢時期的“冗”、“更”確是一組相對的概念。但是兩氏的解釋仍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筆者同意山田氏的前一部分意見，亦贊同廣瀨氏將《二年律令》簡 217、418 中的“內”釋作“冗”。但是，對於山田氏對例 3“冗”的解釋，以及廣瀨氏對“冗”的解釋則持不同看法。

冗，古作“冗”。《說文·宀部》：

冗，楹也。從宀儿。人在屋下，無田事也。《周書》曰宮中之冗食。

段玉裁注：周書的“書當作禮，轉寫之誤。《周禮·稟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許偁之，涉校人宮中之稍食而誤，記憶之過也。”^②徐鍇繫傳“楹”作“散”。此外，《周禮·地官·稟人》：“稟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賈公彥疏亦說：“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稟人供之，因名冗食者。”《漢書·食貨志下》載，王莽“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這裏的“冗作”也與“縣官衣食之”有關。後代多在閑散的意義上解釋“冗”字。

以“散”來解釋“冗”，在後代可能沒有太大的問題，然而，結合秦漢簡中冗、更常常作為一組概念來使用，這樣解釋秦漢時期的“冗”恐未盡其意。從詞義上看，《史律》中的“更”指更役，“更”取輪番、更替的意思。^③那麼，與其相對，“冗”就應當指不更

① 參見廣瀨薰雄《張家山漢簡所謂〈史律〉中有關踐更之規定的探討》，《人文論叢》2004 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注 8。

② [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40 頁。

③ 關於《二年律令·史律》中更、踐更的意義，學界看法不同。整理小組在簡 478“六更”下注釋說：“六更，踐更六次。”臧知非將《史律》中的五更、六更等理解為免除更役的次數。見氏撰《從張家山漢簡看“月為更卒”的理解問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6 期。曹旅寧認為這裏的“踐更”是“遷擢升降”的意思，“更”是卜、祝的等級。見氏著《張家山漢律研究》，“張家山漢簡《史律》考”，中華書局，2005，181 頁。廣瀨薰雄認為《史律》中的更數表示的是踐更輪到的比例，即踐更幾個月輪到一次，最大的更數是十二更，踐更的就更期限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月，踐更的“更”不限於更卒，在一般庶民的場合，指的是徭役；在官員的場合，指的就是官員的日常業務。見前揭氏撰《張家山漢簡所謂〈史律〉中有關踐更之規定的探討》。筆者基本贊同廣瀨氏的意見。

代、長期居官府供役的意思。這一推測是否可以成立呢？

漢唐時期，從官吏到普通百姓到刑徒、賤民，為官府供役都有兩種形式，一種為長期供役，一種為分番更代供役。由於材料相對豐富，唐代的情況較為清楚。唐代將長期供役或供職形式稱“長上”，將以輪番更代形式供役或供職稱“分番上下”、“番上”或“短番”。《唐會要》卷六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

（元和十四年）其年六月，史館奏：“當館楷書手，准元敕，同集賢例，五考足放選。今選務集賢年數仍舊，當館更加三年，同弘文館例，八年放選。緣當館一例長上，弘文館分番上下，事理實屈，請依元敕處分。”敕旨，依奏。^①

史館採取的是“長上”的方式，而弘文館採取的是“分番上下”的方式，這裏“長上”與“分番上下”是相對的。所謂上即上直供事，下即下直歸家。《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樂令》：

凡樂人及音聲人應教習，皆著簿籍，覈其名數而分番上下。（短番散樂一千人，諸州有定額。長上散樂一百人，太常自訪召。關外諸州分為六番，關內五番，京兆府四番，並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兩番並上……）皆教習檢察，以供其事。（若有故及不任供奉，則輸資錢以充伎衣、樂器之用。）^②

樂人及音聲人分短番和長上散樂兩種，短番散樂根據名數分番上下。唐代的“番”與漢代的“更”意思相同。《漢書·蓋寬饒傳》載蓋寬饒任衛司馬時，對衛士“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顏師古注曰：“更猶今言上番也。”結合《二年律令·史律》中關於太、卜、祝分成不同的更數踐更，以及《奏讞書》關於樂人踐更外樂的記載^③，可以推想漢唐時期史職人員和樂人的任用、供事情況沒有太大的變化，祇是名稱改變了而已。既然唐代的分番是與長上相對的用語和供職形態，而漢代的更相當於唐代的番，那麼，與更相對的冗是否相當於唐代的長上呢？

前揭例5《工人程》中“冗隸妾”、“更隸妾”、“小隸臣妾”是連續排列下來的，由於三者均是在“隸妾”前冠上“冗”、“更”或“小”的名稱，冗隸妾兩人可抵一個工，更隸妾四人可抵一個工，小隸臣妾五人才可抵一個工，冗、更、小表現為一定的等差，冗高於更，更高於小。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等差？小隸臣妾顯然是由於年齡小的原因，因此勞

① [宋]王溥：《唐會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12頁。

②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406頁。

③ “四月丙辰，黥城旦譚氣（乞）鞠，曰：故樂人……（簡99）踐十一月更外樂，月不盡一日下總咸陽……（簡106）”。《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100-102頁。

動能力和技術都有限，故五人才可抵一個工。而冗隸妾和更隸妾的差距，按照前文的推測，恐因冗隸妾為長期服役者，更隸妾是分番短期服役者。冗隸妾由於長期服役，技術熟練，對環境也更為瞭解，因此工作效率一般來說高於輪更供役的更隸妾。例2《倉律》“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中的“其從事公”、“其不從事”語可證當時隸臣妾並非一定長期服役，故國家制定了專門的法律，規定隸臣妾祇能在服役期內得到廩食。因此，將“冗”理解為“長上”，例5可以得到較好的解釋。

漢代長安城未央宮出土的骨簽也表明“冗工”比普通“工”的地位要高：

始元年河南工官令覓郤石丞福

文成護工卒史直作府魯夫突

工伏紀冗工世工乙客工益

造（345:3:01277）

始元二年河南工官守令石守丞畢護工

卒史不害作府魯夫月伏相冗工充昌

□工□造（349:3:31746）

始元四年河南工官守令石守丞常侍覓

護工卒史堯令史月作府魯夫魏

伏喜冗工樂安世工宗造（353:3:06449）^①

簽文中官吏與工匠的名字都按一定的順序排列，一般按尊卑排先後，即在紀年之後，首列工官令之名，依次為丞、護工卒史、掾、魯夫、佐、令史、冗工、工。^②冗工的地位顯然高於工，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工是定期更代地服役，而冗工是長期服役者。唐代的匠也分長上與短番。《新唐書·百官志三·將作監》：“長上匠，州率資錢以酬雇。”“短番匠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四人，明資匠二百六十人。”

將冗理解為“長上”，可使前揭睡虎地秦簡均能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例如《倉律》“嬰兒之母（無）母者各半石；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月半石”，意為隸臣妾產下的嬰兒如果沒有母親的，每月稟禾半石；雖然有母親，但其母親長期在官府居作，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107、108頁。

② 吳榮曾：《西漢骨簽中所見的工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市漢長安城遺址保管所編：《漢長安城遺址研究》，科學出版社，2006，584—585頁。但是，吳先生說有技巧者方能稱得上工，條件不夠的為冗。（585頁）筆者持不同意見，“冗工”排在“工”前，按照簽文的排列順序，冗工的地位應高於工。

亦可稟禾月半石。《倉律》“更隸妾節（即）有急事，總冗，以律稟食；不急勿總”條，整理小組對更隸妾的解釋大致是正確的，更隸妾是指輪番更代去官府服役的隸妾。但是，對總冗的解釋則不適當。總冗即在一定時間內彙集到官府居作。《金布律》：“都官有秩吏及離官畜夫，養各一人，其佐、史與共養；十人，車牛一兩（輛），見牛者一人。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人，養一人”，這裏佐、史冗與不冗者待遇也不同，冗者即長期任職的，十個人可以配備一個“養”，如果不是冗者，則和都官有秩吏、離官畜夫合在一起配一個“養”。《廄苑律》中的“冗皂者”指長期為皂的人，《司空》中的“冗邊五歲”意為長期戍邊達五年，《效》、《效律》中的“冗吏”指長期為吏的人，《秦律雜抄》中的“冗募”即長期應募者。

因此，《史律》中的“冗祝”，應理解為長期在官府供事的祝，“冗之”意為讓他們在官府長期供役。冗祝與更祝相對。更祝在漢代表現為祝五更、六更、八更、十二更等形式。《漢官》記錄太祝的吏員情況：

太祝員吏四十一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九人有秩。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①

其中的祝人應即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冗祝，長期供事于太祝府，一部分為更祝，以輪更的形式供職。

《史律》載冗祝是太祝從祝中挑選“善祝、明祠事者”擔任的，因此，冗祝的待遇較之普通的祝要高。唐代官吏長上者的待遇也要高於番上者。《唐會要》卷九十一《內外官料錢上》載：“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給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錢等”，其中即包括“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上”，而沒有番上者。《唐會要》卷一百《歸降官位》載“貞元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置懷化大將軍”，其屬官中有“懷化執戟長上，正九品，料錢十一千文。歸德執戟長上，從九品，料錢十千文”。《通典》卷第三十五《職官·俸祿·祿秩》：“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祿俸之制”，“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准官皆降京官一等給，其文武官在京長上者則不降。”不僅如此，根據《新唐書·百官志三·太常寺·太樂署》

凡習樂，立師以教，而歲考其師之課業為三等，以上禮部。十年大校，未成，則五年而校，以番上下。有故及不任供奉，則輸資錢，以充伎衣樂器之用。散樂，閏月人出資錢百六十。長上者復徭役。音聲人納資者歲錢二千。博士教之，功多者為上第，功少者為中第，不勤者為下第，禮部覆之。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

①《漢官》，[清]孫星衍輯、周天遊點校本，中華書局，1990，2頁。

年滿考少者，不敘。教長上弟子四考，難色二人、次難色二人業成者，進考，得難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為業成。習難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皆入等第三為業成。業成、行脩謹者，為助教；博士缺，以次補之。長上及別教未得十曲，給資三之一；不成者隸鼓吹署。習大小橫吹，難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諫。內教博士及弟子長教者，給資錢而留之。

可知，樂人和音聲人長上者可以免除徭役，由此反推，短番者是不能免除徭役的，即他們除了番上的義務外，還需要服其它徭役。漢代的情況則可以從《二年律令·行書律》中郵人等情況窺知。

《二年律令·行書律》有簡文說：

一郵十二室。長安廣郵廿四室，敬（警）事郵十八室。有物故、去，輒代者有其田宅。有息，戶勿減。令郵人行制書、急（簡 265）書，復，勿令為它事。畏害及近邊不可置郵者，令門亭卒、捕盜行之。北地、上、隴西，卅里一郵；地險狹不可郵者，（簡 266）得進退就便處。郵各具席，設井磨。吏有縣官事而無僕者，郵為炊；有僕者，段（假）器，皆給水漿。（簡 267）

這裏的郵人是長期任役者，“復，勿令為它事”表明他們任郵人後，相應地可以免除其它勞役。簡 268 還專門針對蜀、巴、漢中等地區的郵人制定了優惠政策，規定：

復蜀、巴、漢（？）中、下辨、故道及難劍中五郵，郵人勿令縣（徭）戍，毋事其戶，毋租其田一頃，勿令出租、舁囊。（簡 268）

蜀、巴、漢中等地區的郵人除了可以免除本人的徭、戍義務外，還可免除以戶為單位徵發的賦役，免除一頃土地的田租、舁囊稅。因此，漢代的冗者即長上者由於其長期供役，在賦役等方面也享有一定的優惠政策。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就供役方式而言，冗、更是一組相對用語，但是在更大的範疇內，它們又是作為“員”即國家正式任命的職事官、吏的對立面而存在的，適用的群體主要包括勳官、武散官、四品以下文散官、流外番官、衛士^①、在官府供役的丁、夫（如郵人唐幹力、白直、仗身、庶僕、親事、帳內、執衣、防閑、邑士、士力、門夫等）、雜色人（如工、

① 參見《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官人無故不上”條：

諸官人無故不上及當番不到，（雖無官品，但分番上下，亦同。下條準此。）【疏】議曰：官人者，謂內外官人。“無故不上，當番不到”，謂分番之人，應上不到。注云“雖無官品”，謂但在官分番者，得罪亦同官人之法。下條準此者，謂“之官限滿不赴”及“官人從駕稽違及從而先還”，雖無官品，亦同官人之法。

劉俊文箋釋：“按官人分番者，唐制，除諸衛分番宿衛者外，勳官、武散官及四品以下文散官亦皆分番上下。”劉俊文：《唐律疏議箋釋》，中華書局，1996，717—718 頁。

樂、醫等)、徒隸(如隱官、隸臣妾、番戶、雜戶)等。史書在記錄漢唐時期各級政府吏員時通常有兩種數字,如前揭《漢官》所載太祝吏員即被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稱“員吏”,共計四十一人,由百石二人、斗食二人、佐二十二人、學事一人、守學事一人、有秩九人構成。既然稱“員吏”,應指正式編制內的職吏。一部分不稱“員吏”,由一百五十名祝人、二百四十二名宰、六十名屠構成。既然與“員吏”對舉,則應屬番吏、衛士、雜役等。再如,《漢官》載:

太宰“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三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七十三人,衛士一十五人。”

大予樂令“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一人斗食,七人佐,十人學事,四人守學事。樂人八脩舞三百八十人”。(2頁)

南宮南屯司馬“員吏九人,衛士百二人。(北宮門蒼龍司馬)員吏六人,衛士四十人……凡員吏皆隊長佐”。

未央殿“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4頁)

這些官署的屬員都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員吏”,而南宮南屯司馬條明確說“員吏”皆隊長佐,顯然屬於正式的職吏;一部分則由宰、屠、樂人、八脩舞、衛士、卒騶等構成,漢代的衛士由傳籍的成年男子輪番擔任,可以確定不是官吏,宰、屠、樂人等在唐代屬雜色人,在漢代的地位亦不會太高。冗、更主要適用於後一群體。《史晨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甯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今日拜謁孔「子……國縣員尤吏無大小,空府竭寺,誠俾來觀……」^①

明確將“員冗”並舉。冗、更即適用相對於“吏員”的廣義的“冗”的群體,其中也包括各種散官、散吏。

① 高文:“‘冗’,即‘冗’字。”高文:《漢碑集釋》,注釋【二一】,河南大學出版社,1985,350頁。

秦漢的官奴婢和漢文帝刑制改革

[韓]忠北大學校 林炳德

內容提要 在秦代，幾乎所有的罪人被處以無期徒刑，即成為官奴婢，這種刑罰制度不能對無限制增長的官奴婢的數量作適度的調節。尤其是國家所需要的勞役刑徒的勞動力是隨時變化的，僅通過把官奴婢出借給民間或讓隸臣妾自己維持生計的方式很難適度地調節勞役刑徒的勞動力。最終不可避免地要通過賣出和買入來調節官奴婢的數量。另一方面，漢初施行的土地制度也經過繼承、贈與或買賣的過程，逐步地被大土地制度所取代，在這一過程中盛行的人身買賣暴露出了官奴婢賣出系統的弊端。官奴婢賣出系統的瓦解很難對勞役刑徒的數量進行調節，最終將導致官有勞動力的過剩狀態，即官有勞動力的閑置。

關鍵詞 雲夢秦簡 二年律令 里耶秦代簡牘 戍邊刑 人身買賣 官奴婢

一、出土文獻和秦漢法制史研究

關於雲夢秦簡的研究，大體從 20 世紀 70 年代後半期開始到 80 年代一直非常活躍^①。其後很大程度上主要以進入 21 世紀之後公開發表的新出土文獻對雲夢秦簡進行補充研究。新出土的文獻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在湖北省江陵張家山漢墓群中發現的有關法律關係的簡牘張家山漢簡^②。其中，在 247 號墓中出土的竹簡被視為雲夢睡虎地秦簡以後竹簡發掘史上

① 雲夢秦簡，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以下簡稱《秦簡》。

② 《二年律令》和《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略稱作《二年律令》、《奏讞書》。

最大的成果，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重要資料。

另外，2002年6月在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戰國古城遺址1號井裏，發現大量秦簡，且部分簡牘已公開發表^①，其中包含有與秦代刑徒相關的內容。裘錫圭和李成珪、曹旅寧等學者根據秦律中有關奴隸要賣給官府的條款，提出如果奴隸主所擁有的奴隸本來就是从官府買入，那麼奴隸主可以要求把奴隸再度賣給官府的假說。^②里耶秦簡中包含了能夠證明這種假說的劃時代的內容。根據這些資料，我認為對秦漢勞役刑徒的性質和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歷史意義有重新考量的必要。

眾所周知，秦律出土以後，關於秦刑徒的無期、有期說存在較大的爭論。該爭論以1977年高恆的觀點發表為開端。高恆在1977年提出秦刑徒以至漢文帝刑制改革以前的刑徒不存在刑期^③，這是雲夢秦簡研究史上劃時代的新理論。此後，“秦漢刑徒無期說=官奴婢說”經過于豪亮、吳樹平、李裕民、唐贊功、徐鴻修、栗勁、霍存福、張金光等人的整理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④。在我看來，繼張金光之後的秦漢刑徒無期說乃至官奴婢說，與其說是對個別不同史料的分析上有差異，不如說是解釋上存在差異。張金光綜合整理發表“秦漢刑徒無期說=官奴婢說”是在1985年，距離1975年秦簡發表已經過了十年，此時中國和日本對雲夢秦簡的研究幾乎已達到“小康”水準。簡單說來，在中國，無刑期說比有刑期說更有力，在日本，如果說除若江賢三外^⑤，事實上幾乎所有學者都站在無刑期說即官奴婢說的立場也不為過^⑥。在韓國也是無刑期說佔上風^⑦。但是，筆者至今一直認為漢文帝以前的勞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一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下文記作《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

② 該看法是裘錫圭在1981年發表的《戰國時代社會性質試探》（原載《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編《中國古史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後收入裘錫圭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387—429頁）一文中首次提出。里耶秦簡的事例證實了這一看法。對此，曹旅寧在《從里耶秦簡看秦的法律制度》（《秦文化論叢》11輯，三秦出版社，2004，277—278頁）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最近，曹旅寧再次對裘錫圭見解的可靠性作了評價（曹旅寧：《張家山漢簡〈亡律〉考》，氏著《張家山漢律研究》，中華書局，2005，151頁）。李成珪：《秦的身分秩序構造》，《東洋史學研究》23，1986，63頁。

③ 高恆：《秦律中“隸臣妾”問題的探討——兼批四人幫的法家“愛人民”的謬論》，《文物》1977年第7期，後收入氏著《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

④ 張金光：《關於秦刑徒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期。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對“刑徒制度”進行了再整理。其他學者的文章出處省略。

⑤ 若江賢三：《秦律における勞役刑の刑期再論（上）》，《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25，1992。若江賢三：《秦律における勞役刑の刑期再論（下）》，《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27，1994。

⑥ 例如按照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二年律令》注釋的情況（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釋注稿その（一、二、三）》，《東方學報》76、77、78，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2005，2006）都持刑徒無期說的觀點。初山明的身分刑說（初山明：《秦の隸屬身分とその起源》，《史林》65-2，1982）或富谷至提倡的不定期刑說（富谷至：《秦漢の勞役刑》，《東方學報》55，1983；富谷至：《ふたつの刑徒墓—秦—後漢の刑役と刑期—》，《中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京都，1987）也基本都採取了無期徒刑說=官奴婢說的立場。秦漢勞役刑無期說（官奴婢說）以後被堀敏一（堀敏一：《雲夢秦簡にみえる奴隸身分》，氏著《中國古代身分制—良と賤—》，1987）進行了整理，但沒有提出特別的意見。勞役刑徒中，特別解釋了鬼薪白粲特殊性的宮宅潔（宮宅潔：《秦漢時代の爵と刑罰》《東洋史研究》58-4，2000）也基本站在勞役刑無期說的立場。

⑦ 中國和日本主張秦漢勞役刑無期說之際，韓國也發表了相關的論文，任仲燮、李成珪、崔德卿等學者都贊同秦漢勞役刑無期說乃至官奴婢說。

役刑徒是有刑期的，我承認我的觀點有不周之處，但是以往主張秦漢勞役刑無期徒刑說的見解也並非完全正確。首先，在《二年律令》公佈以前，主張無期徒刑說的論者們認為不存在刑期，刑期的概念是在漢文帝十三年才出現的，但《二年律令》中的戍邊刑已經有了刑期。“戍邊二歲”刑^①就是例證。除“戍邊二歲”刑外還出現了“戍邊四歲”、“戍不盈四歲”等^②字樣。秦律中也出現了“戍二歲”^③的字樣，並同樣存在著跟漢律中的“戍邊二歲”或“戍邊四歲”相同的有期勞役刑徒。“戍邊二歲”或“戍邊四歲”即需要從事二年或者四年築城和修城的強制勞動，意味著存在明確的有期勞役刑徒。^④里耶秦簡中也出現過賞餘錢8046錢、1728錢，賞錢2688錢、11271錢等字樣^⑤。賞餘錢是作為賞罰的應支付罰金的未繳納部分^⑥，在里耶秦簡中有一件文書涉及到製作錢校券向以勞役代替罰金的士五毋死追討其所欠賞餘錢8064錢的內容。眾所周知，依據秦律，用勞役來代替債務或罰金，每天值8錢，比如一個應交納賞錢11271錢的人，在“家貧不能入”的情況下，需要用勞役來代替，那麼按照每天8錢計算^⑦，則足足需要1408.875天，即相當於四年的時間。如果按照每天6錢計算，則要超過五年。而用五年以上的勞役來代替賞錢，可以說就是有期勞役刑徒。由此可見，在漢文帝刑制改革以前也存在有期刑徒，祇是名稱及形式和後代有所不同。從里耶秦簡和刑徒磚來看，居賞刑佔了很大的勞動力比重。不過從現有的史料看，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的勞動力比重同戍邊刑和居賞刑相比哪個更大，目前還不能斷定。

下面這個問題更為重要，即勞役刑徒的供給和需求。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勞役刑徒是無期的官奴婢，由於沒有刑期，官奴婢的數量無限制地增加便成為問題的焦點。而漢文帝十三年的一天，突然將無期徒刑徒全部變為有期，那麼原本應由無期徒刑徒承擔的勞役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解決呢？如此革命性的劃時代的舉措可行嗎？對於這一點，到目前為止那些主張無期徒刑徒的論者們，除富谷至外^⑧都強調無期變為有期這一“劃時代的變化”祇是表面現象。秦漢的勞役刑徒儘管沒有刑期，但皇帝定期下達赦免令，等於實行刑期確定的不定期刑，“刑徒的勞動力大幅度減少，而漢文帝時勞役刑有期化怎麼可能實現呢？”

① “盜出黃金邊關，吏、卒、徒部主者智（知）而出及弗索，與同罪；弗智（知），索不得，戍邊二歲。”（《二年律令》，19頁，76簡）“……吏將徒，追求盜賊，必伍之，盜賊以短兵殺傷其將及伍人，而弗能捕得，皆戍邊二歲……”（同上，28頁，141簡）“諸不為戶，有田宅，附令人名，及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邊二歲……”（同上，53頁，323簡）“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同上，36頁，210簡）

② “……爵戍四歲及繫城旦舂六歲以上罪，罰金四兩……戍不盈四歲、繫不盈六歲……”（同上，22頁，96—97簡）。

③ “戍二歲”（《秦簡》，133—134頁）。

④ 邢義田：《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論秦漢的刑期問題》，《台大歷史學報》31，2003；邢義田《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台大歷史學報》36，2005）中做了無期和有期並存的論證。

⑤ 依次為[9]1正、[9]3正、[9]6正、[9]7正，根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的分類。

⑥ 與此相關的推斷，詳見任仲燾《秦漢律的罰金刑》，《中國古中世史研究》15，2006。

⑦ 有罪以贖及有債於公，以其令日問之。其弗能入及償，以令日居之……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秦簡》，84頁。）

⑧ 富谷至：《ふたつの刑徒墓——秦～後漢の刑役と刑期-》，《中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京都，1987，576—577頁。

這是在《二年律令》公佈以前對此問題的唯一思考和研究。

最近有關古墓中出土的中國古代律令的一些新觀點相繼提出。1970 年以後，古墓中出土的中國古代律令有雲夢睡虎地秦律、雲夢龍崗秦律和江陵張家山漢律。2003 年在甘肅省玉門花梅鄉發現的建造於 4 世紀末的西涼、北涼古墓中也有晉律出土，不過它與此前出土的簡牘律令不同，是寫在一種織物上並貼在棺材蓋上。雖然出土法制史料的運用使秦漢法制史研究得到了飛速發展，但古墓出土的法制史料究竟有多少是對史實的如實描寫目前還存在疑問。富谷至認為，“如果這些簡牘不是地下的而是從地上的漢代官署遺址出土的話，那麼它們可以看作是與官署的行政、司法相關的文書及記錄，但實際上公物是不可能作為隨葬品埋葬於地下的，也根本沒有把司法行政的記錄埋於地下的理由。因此，隨葬的法律原本很可能另有目的，所謂的第二目的是獲得書寫物。這個推測僅局限於個人書寫的條文，還有些摘抄和摘錄都可以得到確認。《二年律令》由二十七篇法規構成，而少的祇有一篇，同三十篇以上的律令相比，在數量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祇能說是從現存的法令集中任意抽出的”。^①法律文書、律令條文以及律令的注釋之所以都以隨葬品的形式埋於地下，是因為墓主人想要用它們來阻擋惡靈，祈求平安，驅除壞的徵兆。^②這一見解與一般將其視為實際使用的文書或簿籍以及墓主人生前使用過的書籍等看法根本不同^③。他還指出有必要關注那些不及《敦煌漢簡》或《居延漢簡》行政文書詳細的以《雲夢秦簡》為代表的秦代法制史研究的具體現象^④。如出一轍，宮宅潔指出利用“出土法制史料”進行研究的話，應該注意到，法制中所描寫的國家社會的面貌歸根到底不能超出其本來面目，現實世界不是按法制的規定來發展的。^⑤例如，《二年律令》中的“戶律”記載了關於土地登記和繼承的詳細規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爵位的高低來進行田宅的分配。在這里，沒有爵位的人能分到一頃田地。但是與張家山漢簡同時代的鳳凰山漢墓出土的《鄭里稟簿》中記錄的各戶口下的耕地面積大部分都在五十畝左右，甚至也有祇有八畝的情況（當然通常認為這是特例），居延漢簡也是如此。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與《二年律令》“戶律”規定相符的事例，

① 富谷至：《漢墓出土的法律—なぜ法律を副葬するのか》，《中原の律令と社會・文化》，2006（忠北大學校中原文化研究所主辦國際學術大會）。

② 富谷至：《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竹簡—とくに〈二年律令〉に關して—》，《木簡研究》27，2005，248—249 頁。富谷至：《緒言—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によせて—》，《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朋友書店，2006。2001 年《二年律令》公佈以後，取得的主要相關研究成果是秦漢法制史研究，而未能掀起對整個秦漢史研究的空前熱潮。古墓出土的法制文書，特別是最近正在活躍研究的《二年律令》是十分重要的史料，現在對其全面的研究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注釋書的發刊達到了頂點（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班：《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注稿その（一，二，三）》，《東方學報》76、77、78，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2005、2006。富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譯注篇—》，朋友書店，2006。）

③ 初山明：《雲夢睡虎地秦簡》，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

④ 鷹取祐司：《漢簡所見文書考—書・檄・記・符—》，富谷至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朋友書店，2003，119 頁。

⑤ 宮宅潔：《〈二年律令〉研究の射程—新出法制史料と前漢文帝期研究の現状—》，《史林》89-1，2006，71 頁。

因此律文的實效性本身就值得懷疑。^①甚至某些授予田宅數額的規定超出了各階層人民所能擁有的田宅限額，因而無法施行。^②對中國古代家族制度有深入研究的尹在碩也指出，先秦以來涉及的關於女性的認識及現實的女性活動，跟與女性相關聯的法律規定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背離的。^③

出土的公文書通常能夠反映歷史事實，可以為新觀點和新認識提供佐證。湖南省龍山縣里耶古城出土的里耶秦簡，有多達三萬六千枚的龐大公文書資料，與雲夢秦簡和《二年律令》等古墓出土的法律文書相比，它包含了有關法律的實際執行和貫徹的鮮活史料。雖然現在祇公佈了三十餘枚簡文，但是與歷史地理、地方官府、法制和行政等相關的多篇論文已經發表。

在已公佈的三十餘枚公文書中，關於戍守遷陵縣的陽陵卒的內容佔了大部分，公文書大體上都是陽陵縣向洞庭郡上報或者是洞庭郡向遷陵縣下達的形式。不單有地方郡縣間的行政文書，還有地方向中央上報的上計和賬簿，反過來還包含中央下達的詔書、命令和法令等。里耶秦簡記述的時期相當於從秦王嬴政二十五年統一時期到二世皇帝二年，而雲夢睡虎地秦律和雲夢龍崗秦律可以相互比較，同時通過秦的法律制度的實際施行可以把握其現實面貌，這也對有關《二年律令》的認識產生了影響。通過《里耶秦簡》中勞役刑徒的配置，賞、贖的執行，上計的處理等實際的法令的執行過程，可以鮮活地窺見秦漢勞役刑徒的性質，也可能形成關於賞、贖的新認識^④。

二、關於有期刑體系形成的討論

滋賀秀三^⑤認為，身體受損者被社會排斥，受肉刑者祇能終身為奴隸身份，初山明在此基礎上認為，肉刑廢止的同時之所以出現刑徒的有期化，正是由於無期的勞役和肉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秦代刑徒特徵如下：(1)肉刑或耐刑等對身體施加刑罰；(2)穿著紅色的衣物；(3)戴腳鐐等刑具。這些方式也是區分外觀體貌上“恆久的變形”和“一時的變形”的標志。漢文帝刑制改革中廢止了一般人和其它刑徒特徵中恆久的身體變形，祇保留了一時的變形。肉刑即恆久的身體變形的廢止，摒棄了對人身體的毀損改變，最終去除了原始的刑罰屬性。身體毀損者被社會排斥變為官有奴隸，這些轉化成奴隸身份的刑徒，其前身是

① 宮宅潔：《〈二年律令〉研究の射程—新出法制史料と前漢文帝期研究の現状—》，《史林》89-1，2006，71頁。

② 于振波：《張家山漢簡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漢代的實施情況》，《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尹在碩：《中國古代女性的社會的役割和家内地位》，《東洋史學研究》96，2006。

④ 任仲燭最近發表的關於贖刑和罰金刑（任仲燭：《秦漢律的罰金刑》，《中國古中世史研究》15，2006；任仲燭：《秦漢律的贖刑》，《中國學報》54，2006）的詳細研究也是依據里耶秦簡的資料進行的。

⑤ 滋賀秀三：《中國上代の刑罰についての一考察—誓と盟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國法制史論集—法典と刑罰—》，創文社，2003。

肉刑和無期徒刑的混合體，與之相應，肉刑的廢止必然意味著無期勞役刑的消亡。^①

韓樹峰認為，秦漢徒刑的等級序列應為死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從秦及漢初肉刑和徒刑的關係來看，肉刑的比重在逐漸減小，徒刑的比重在逐步加大，最終過渡到以徒刑為主、肉刑為輔。在秦律中，肉刑既可以和鬼薪白粲等重徒刑並用，也可以和隸臣妾等輕徒刑並用，而在《二年律令》中，肉刑祇能附加於城旦舂這樣的刑徒身上。肉刑的地位進一步降低，最終到漢文帝刑制改革時廢止。而肉刑的廢除和有期徒刑的出現是互為關聯的，肉刑的廢除是無期改為有期的前提條件，肉刑不除，勞役刑就祇能是無期的，祇有肉刑廢除後，徒刑的有期化才可能實行。肉刑的廢止和徒刑由無期向有期的轉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漢文帝的刑法改革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並非僅僅因為漢文帝受到緹縈救父義舉的感動而採取的突兀之舉。^②

宮宅潔認為，雖然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等勞役刑的刑名稱謂各有由來，但從勞役刑徒所從事的勞動來看，涉及到伐木、鹽鐵生產、採銅鑄造、手工業、宮殿建設、道路橋梁的修築、陵墓營造、邊境守備、磚瓦製造等，很難區分。從出土的文獻看，城旦所從事的勞動不單涉及城垣的築造，還包括官府的建設和修復、守衛官署以及傳送、運輸等職責。

甚至“居費”者也要服城旦舂的勞役^③，實際上和城旦舂的勞役強度沒有區別^④，即除了司寇外，從刑徒分配的勞役種類和勞動強度上，很難看出刑徒間待遇的差異，祇能從勞役的頻率和勞動的環境等方面去尋找。宮宅潔最近將勞役刑徒的待遇和差異進行了分析，如下表^⑤：

	城旦舂的配偶	城旦舂的子女	隸臣妾的配偶	隸臣妾的子女	司寇的配偶	司寇的子女
沒收處分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居住地	家族解體。不能民里居住。	家族解體。不能民里居住。	家族不解體，但不能民里居住。	家族不解體，但不能民里居住。	民里居住。	民里居住。
刑徒的地位		繼承		繼承		不繼承
土地授予 (對戶主)	無		無		有	

① 初山明：《秦漢刑罰史研究の現状》，氏著《中國古代訴訟制度の研究》，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6。

② 韓樹峰：《秦漢徒刑散論》，《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人大復印資料《先秦秦漢史》2005年第5期）。

③ “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拘櫜櫛。”《秦簡》，84頁。

④ 在秦始皇陵西側發現的趙背戶村的刑徒墓的事例也能證明這些人的勞動強度有多高。

⑤ 宮宅潔：《有期勞役刑體系的形成—〈二年律令〉に見える漢初の勞役刑を手がかりにして—》，《東方學報》78，2006。

在這裡，城旦舂和隸臣妾突出的差異是二者的配偶和子女沒收和不沒收之間的不同。在此，宮宅潔進一步地說明了漢文帝的緣坐制度與改革是相關聯的。漢文帝的緣坐改革不僅僅廢止謀反罪的緣坐制度，也包含了《二年律令》中的廢止沒收制度。其含義如下：(1)沒收措施的有無是區分城旦舂和隸臣妾最大的要素，這意味著沒收的消失；(2)沒收制度的廢止意味著官有勞動力的減少，沒收制度的消失引發的官奴婢供給的減少意味著國家將損失大批官有勞動力。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即無期向有期的改革也意味著官有勞動力的減少。勞役刑體系的變更，沒收制度的廢止，戍卒制的廢止等均是與國家勞動力尤其是官有勞動力的組織微調相關的舉措。^①

三、刑徒的勞動力配置及其運營

我同意宮宅潔提出的漢文帝的刑制改革與國家勞動力的重新組織和活動形態密切相關。在這裏，我想簡單地談談勞役刑徒的勞動方式問題。

(1) 城旦舂衣赤衣，冒赤幘(氈)，枸櫞櫛杖之。仗城旦勿將司；其名將司者，將司之。舂城旦出繇(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閭外；當行市中者，回，勿行。(《秦簡》，89-90 頁)

(2) “隸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子，責衣。”(《秦簡》，87 頁)

(3) “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粟。”(《秦簡》，49 頁)

(4) “冗隸妾二人當工一人，更隸妾四人當工【一】人，小隸臣妾可使者五人當工一人。”(《秦簡》，74 頁)

(5) “有罪以贖及有責(債)於公，以其今日問之，其弗能入及賞(償)，以今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凡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其日未備而被入錢者，許之。”(《秦簡》，84-85 頁)

通過上面秦律的(1)-(5)條可知，第一，城旦舂被嚴格監管，斷絕家族關係，有特定的居住空間，同時需要經常地投入到勞動中。與此相比，隸臣妾可以維持家族關係，有的需要在官府勞作，有的不需要在官府勞作，不勞作時官府不供給糧食。即意味著不在官府服勞役的時候，為了自己家族的生計，他們需要獨立地尋求經濟來源。另外，向妻子收取衣服的事例可以證明，至少一部分人擁有獨立的私營經濟。第(4)條是通過勞動力價值

① 以上均參照宮宅潔的前揭論文。

的規定將隸臣妾區分為大隸臣妾、冗隸臣妾、更隸臣妾、小隸臣妾可使、小隸臣妾不可使者等。第(5)條是關於居貨贖責的規定，服役過程中要維持其家族的生活基礎，秦律中規定在服役的居貨贖責者如遇農忙時期，可以短時間離開，回家從事農作耕種。

上述規定都和秦代的全民勞役徵調體制相關，可理解為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人的勞動力。因此，如何根據其身份和能力合理高效地榨取勞動力，同時使官府的負擔和費用最小化，便成為勞動力組織和管理的關鍵所在。勞動力管理不同於軍隊管理，為了最大限度地確保官府勞動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效率地榨取勞動力，同時減少經費負擔。如果官有勞動力超出官府所需，勢必造成對官府財政的浪費，而把一部分刑徒轉化為非官有，其維持費就可以轉嫁給刑徒家族自身。

里耶秦簡表明所有勞役刑徒都歸縣管理，其中有徵發各屬縣的勞役刑徒運輸洞庭郡的武器到內史及巴郡、南郡、蒼梧等地的指示文書，文書中引用了關於徵發刑徒和黔首的相關律令規定^①，勞役刑徒是首先徵發的對象，而普通的“耕田之民”即黔首受到國家的保護，強調農忙時不能徵發黔首，祇有在特殊的緊急情況下才能徵發黔首，而且即使徵發也要遵循“省”、“少”的原則，儘量少徵發，如果有意多徵發，負責的官吏會受到處罰。不過官屬勞役刑徒的徵發同普通的勞役徵發相比需要支出更多的衣食費用^②，自然也需要追加更多的管理經費。徵發什麼樣的刑徒從事什麼樣的勞役，則是由總體的勞動量和所需的人力規模來決定的。刑徒由所屬縣的縣司空管理，且有專門的名簿記錄，如果估算的工作量和投入的勞動量不符，負責的官吏將以“不察”論處。^③刑徒雖然以縣為單位進行管理，但也會到與所屬縣有友好關係的其它縣從事勞役，在這種情況下，以郡為單位，根據縣與縣之間的工程量的差異安排投入的勞動力。例如里耶秦簡中有陽陵縣管理刑徒的司空委託郡幫助追討自己屬下的陽陵縣宜居鄉士伍毋死所欠“貲餘錢”的內容：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陽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貲餘錢八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今為錢校券一，上謁言洞庭尉，令毋死署所縣責以受陽陵司空……”(《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14頁)

即對縣來說，一方面要管理自己屬下的內部的必要的刑徒勞動力，另一方面也要管理來自

① “……·今洞庭兵輸內史及巴、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貨、贖責(償)、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田時駁(也)，不欲興黔首，嘉、穀、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貨、贖責(償)、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有可令傳兵，縣不令傳之而興黔首，[興黔首]可省少弗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言名史泰守府。嘉、穀、尉在所縣上書，嘉、穀、尉令人日夜端行。他如律令。”(里耶秦簡[16]6正，《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12頁。)

② “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勞與垣等者，旦半夕參……不操土攻(功)，以律食之。”(《秦簡》，51頁)。

③ “欲以城旦舂益為公舍官府及補繕之，為之，勿灑。縣為垣事及灑有為駁(也)，吏程攻(功)，贏員及減員自二日以上，為不察。上之所興，其程攻(功)而不當者，如縣然。度攻(功)必令司空與匠度之，毋獨令匠。其不審，以律論度者，而以其實為縣(徭)徒計。”(《秦簡》，76-77頁。)

郡等更高一級的行政部門所配給的勞役刑徒；從郡的角度看，需要根據中央政府的有關規定，對所屬各縣的勞役刑徒進行合理的調配、徵發和管理，必要時需核查數量，各個環節之間是相互緊密聯繫的。無論中央政府還是郡和縣，都是通過高度發達的、周密的文書行政來適時把握勞動力的調配。不過，縣和郡以及中央政府所需要的總體勞動量每年、每季度甚至每個月都是不同的。

國家爲了保護“耕戰之民”，需要維持適當的人力而供養大量的無期徒刑徒勞動力，實際上花費巨大。如上所引，秦律中規定“隸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子，責衣。”“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可見國家爲維持和管理勞役刑徒是多麼費盡心思壓縮開支。秦律中規定“嬰兒之母(無)母者，各半石；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月半石”(《秦簡》，49頁)，似爲撫養未成年官奴婢投入了很多經費。“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段(假)者，段(假)之……”(同上，48頁)，也規定國家爲了壓縮扶養官奴婢(不可使者)的開支，制定了向民間出租官奴婢的制度。但是罪人幾乎全是無期徒刑徒，即秦代處罰官奴婢的刑罰制度無法對無限制增長的官奴婢的數量進行適當的調節，尤其是國家所需要的勞役刑徒的勞動力在進行大規模土木工程或有大規模災害發生的時候是得不到保證的。向民間出租官奴婢和隸臣妾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使勞役刑徒的勞動力的調節更加困難。總之，國家需要能夠適當的調節其所需勞役刑徒的勞動力數量的保障系統，即有必要通過官奴婢的賣出和買入來調節。

四、官奴婢賣出系統的破產

眾所周知，在《二年律令》的戶律里規定了從20級爵的徹侯到1級爵的公士，都授與田地和宅地。爲使官職高的人的官秩和爵位相對應，還規定應賞賜衣物、棺槨和酒食等。

《二年律令》傳律中還規定了5級“大夫”以上和4級“不更”以下的老人可以享受特殊賜予的年齡標準^①，從1級爵到20級爵都有等級嚴格的衣物、棺槨、酒食、田地和宅地的授與。但在《二年律令》中沒有關於按爵授予奴隸的規定。有爵者授與的田宅數量多，自然需要很多奴婢。那麼，如何獲取奴婢呢？根據下列有關史料，可知至少在秦代是通過購買勞役刑徒(官奴婢)來獲得奴隸的。

(1) “某里士五(伍)甲縛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驕悍，不田作，不聽甲令，謁責公，斬以爲城旦，受買錢。’訊丙，辭曰：‘甲臣，誠悍，不聽甲。甲未嘗身免丙。

① 《二年律令》，354、355、356、357簡。

丙無病也。無他坐罪。’令令史某診丙，不病。令少內某，佐某以市正價賈丙丞某前……”

《秦簡》，259 頁

(2) “某里公士甲縛詣大女子丙，告曰：‘某里五大夫乙家吏。丙，乙妾也。乙使甲曰：丙悍，謁黥刺丙。’”

《秦簡》，260 頁

(1)、(2) 是關於向官府報告請求處罰自己的奴婢的內容。在這裏，國家為何以市場價買入奴隸主的奴婢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可以看出國家有義務以市場價買入奴隸主驕悍的奴婢。與此相關，里耶秦簡亦有下列值得關注的內容：

“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遷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恆以朔日上所買徒隸數。’●問之，毋當令者。敢言之。” 《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12 頁，[8]154 正

這裏的“徒隸”是指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李學勤指出，所謂“恆以朔日上所買徒隸數”，意即秦代法令要求每月朔日上報買進徒隸的數量。^①本文開頭提到裘錫圭和李成珪、曹旅寧根據秦律中有關官府買賣奴隸的條款，提出了如果奴隸原來就是从官府買入的，那麼奴隸主有權要求官府再次買回奴隸的假說。^②如果不是從官府買入的話，那麼官府同意以市場價買入驕悍的奴隸就毫無道理可言。可見，國家所有的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無期徒刑徒即官奴婢，可以市場價進行販賣，販賣的價格和條件等會形成契約，經過登記備案後，官奴婢便轉換為私奴婢，品質不好的，奴隸主有權利提出退貨的要求。上引簡文中的“買”可以理解為“買入”和“賣出”，對官府來說是賣出，而對購買者來說則是買入，但李成珪認為把這裏的“買”理解為“賣出”更為妥當。^③通過這一制度規定的實施，國家可以掌握徒隸即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賣出的數量，如果國家能夠據此適當調節勞役刑徒的數量和勞動力分配的話，我一直感到困惑的勞役刑徒的供給和需求問題，以及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舉措就不難理解了。至少可以確定，在秦代就通過勞役刑徒的賣出來調節官奴婢的數量，因而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就不會造成官奴婢的數量會在某一天突然大幅度減少的狀況。

我至今還沒有完全理解《說文解字》中“奴婢皆古之罪人也”之說的含義。不过如果仔細考察前面提到的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即官奴婢通過以市場價在市場上進

① 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 年第 1 期，78 頁。

② 《秦簡》和《二年律令》中有奴婢被懲罰後“黥顏頰、界主”的事例。“人奴擅殺子，城旦黥之，界主”（《秦簡》，183 頁。）“城旦舂、鬼薪白粲有罪（遷）。耐以上而當刑復城旦舂，及曰黥之若刑為城旦舂，及奴婢當刑界主，其證不言請，誣（《二年律令》121 簡）人，奴婢有刑城旦舂以下至（遷），耐罪、黥（顏）頰界主，其有贖罪以下及老小不當刑、刑盡者，皆答百。刑盡而賊傷人及殺人，先自告也，棄市。”（《二年律令》122 簡）總之，肉刑以上的處罰不是由奴婢主而是在官府執行的，在官府執行肉刑後，官府還給原所有者。我認為這種規定與國家的官奴婢的賣出有聯繫。

③ 李成珪：《秦·漢刑罰體系的再檢討》，《東洋史學研究》85，2003，8 頁。

行販賣而轉換為私奴婢的情形，可以看出《說文解字》中的這一說法指出了秦漢交替時期奴隸的合法來源，而主張秦漢勞役刑為無期徒刑的論者們的見解，都是從將奴婢視為罪人開始的^①。如此看來，如果參照雲夢秦簡和《二年律令》中“黥類(顏)界主”的具體事例，就不難理解《二年律令》中有關逃亡奴婢的各項規定了。

李成珪強調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使官奴婢大幅度減少，導致這一時期的官營手工業也發生了質變。^②例如，漢元帝即位初期，“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③這正是由於官營手工業對民間開放而使得原本從事官營手工業的官奴婢勞動力出現閑置的事例。在官營手工業對民間開放造成官奴婢勞動力大量閑置的情況下，確保官奴婢生成的刑罰體系就再也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因此通常認為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對刑期的設定和官營產業的縮小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④我贊同李成珪將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刑期的設理解為是一種消除先前官奴婢制度的低效性和浪費性因素的舉措。不過他認為，漢文帝時期出現的官奴婢勞動力閑置以及官營手工業勞動力需求有所減少的現象，並不是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設定刑期的根本原因。另外，我對將漢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中刑期的設定視為劃時代舉措這一評價有不同看法。因為，根據目前的資料來看，秦代的勞役刑徒隨時可以在市場上進行買賣，如果國家每月朔日嚴格把握其數量，並確保這個系統能嚴密正常運轉的話，一開始就不存在官奴婢無限增加的情形，爾後也不會出現因為有期徒刑的確立而使官奴婢大幅度減少的狀況。據此我認為漢文帝時期這一系統沒有正常運轉，也就是說可以推測當時官奴婢的買入需求很可能正在衰退。秦漢交替時期連年的戰亂導致了社會的極度混亂和民生破敗，從下述記載中可以窺知當時的嚴峻形勢：“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⑤由此可見，連年的戰爭使無數民人瘋狂逃離本籍地，四處躲避藏身，秦始皇時期陳平冊封地的居民達到了3萬餘戶，但到此時已不過5千戶，即人口銳減到不足全盛時期的17%。秦漢交替時期的混亂導致民生凋敝，而根據當時的律令規定，逃離本籍地並躲藏起來便犯了逃亡罪，由此在法律上產生了大量的罪人。在這一過程中，無數良人通過人身買賣淪為奴婢，同時也有一部分奴婢在混

① 沈家本收集並列舉了把奴隸看作罪人的觀點的史料，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卷一，中華書局，1985，385—389頁。另外，堀敏一在《中國における良賤身分制の成立過程》（《中國古代の身分制—良と賤—》，汲古書院，1987，124—128頁）中，對把罪人看作奴婢的漢代史料進行了分析。

② 李成珪：《秦·漢刑罰體系的再檢討》，《東洋史學研究》85，2003，70—71頁。

③ 《漢書》卷七十二《貢禹傳》。

④ 宮宅潔的觀點雖然稍有不同，但也認為“勞役刑有期化”、“戍卒令”的廢除、“收”的廢止、文帝後四年實現的“官奴婢解放”等都意味著官有勞動力的減少，以官有人員的削減來減輕國家的負擔。

⑤ 《漢書》卷四〇《陳平傳》。

亂中獲得了解放，變成良人。下面是相關的史料：

(1)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漢書》卷二四《食貨志》）

(2)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饉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漢書》卷一《高帝紀》）

(1) 雖然是漢高祖三年（前 200）6 月的一時舉措，但它容許人身買賣。^① (2) 是漢高祖五年夏五月的詔書，內容是容許“不書名數”的逃亡者登記戶籍，因人身買賣淪為奴婢者全部恢復為庶人。在《奏讞書》案例 2 和案例 5 中記載楚時為限制逃亡者容許逃亡的奴婢登記戶籍，這與 (2) 的舉措是相關的。^② 重新梳理 (2) 的內容，可以看到：第一，逃到山林的流民回到原籍可以恢復其原來即秦時的爵位和田地；第二，由於饑饉而自賣淪為奴隸者，皆免為庶人；第三，這些舉措帶有模仿秦朝土地制度和軍功爵制度的意味。^③ 《二年律令》中記載，早在戰國時代各國就已經實行授田制度，土地分為已墾、未墾和不可墾，禁止授與不能耕作的土地，容許賜予的田宅可以繼承和買賣，對不同爵位者的不同授田數額等都有詳細的規定。由於有同授田制度密切相關的戶籍制度管理，在漢的所有百姓都要進行戶籍登記，如若非法逃離本籍地將受到嚴厲處罰。^④

綜上所述，(1) 是漢高祖三年實行的詔書的內容，與其說它和奴婢相關，不如說是容許庶民將子女賣作奴婢。(2) 是 (1) 之措施實行兩年後出臺的，規定由於饑饉而自賣為奴婢的庶人，可以恢復原來庶人的身份，這當然與授田制度和爵制的整頓有關，都是為了把沒落的良人再度恢復為良人的舉措。如果說 (1) 是國家為解決秦漢交替時期連年混亂狀況而在一段時間從法律上容許不法的人身買賣的話，那麼在兩年之後即漢高祖五年所推行的措施 (2) 則是對 (1) 的更正，它與授田制的全面實行是相對應的，是為了確保編戶齊民而讓沒落的良人能夠重新恢復為良人的措施。

① 林炳德：《魏晉南北朝的良賤制》，《歷史學報》142，1994。

② 飯尾秀幸：《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をめぐって》，《專修人文論集》56，1994，99 頁。

③ 臧知非：《西漢授田制度與田稅徵收方式新論——對張家山漢簡的初步研究》，《江海學刊》2003 年第 3 期，143 頁。另外，關於高祖五年詔的分析參照李開元《前漢初年における軍功受益階層の成立》（《史學雜誌》99-11，1990）。

④ 冨谷至：《漢代の「傳」について》，《古シルクロードの軍事・行政システム—河西回廊を中心にして》22，2005；宋真：《漢代通行證制度和商人的移動》，《東洋史學研究》92，2005。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這段描寫表明到漢代工商業已得到了很大發展。在漢文帝時期，由於有更加積極的恢復農業的政策，一般認爲最起碼農民的生活應該不再窮困，但事實並非如此，《漢書·食貨志》記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以上內容是晁錯對漢文帝時期農民悲慘生活的詳細描寫，由於受經濟壓迫，農民們債務纏身，最終“賣田宅鬻子孫”。雖然在《二年律令》中有嚴格禁止人身買賣和誘拐人口的規定^①，但實際上從漢初開始人身買賣就已經很盛行了，自漢初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料中出現了諸如“鬻賣妻子”，“有賣鬻男女者”，“或賣鬻男女以爲僕隸者”，“貧者賣妻兒”，“民皆賣鬻兒女”，“民有嫁妻賣子”，“質妻賣子”，“乃有質賣妻兒”等眾多人身買賣的事例。前引“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一段史料，亦是典型實例，清晰反映出秦漢交替之際乃至漢朝初年依然戰亂頻仍，局勢混亂，人身買賣盛行，以至漢高祖頒布詔書將其合法化。在《奏獄書》案例4中有漢初混亂時期奴隸爲保護自己而尋求大人物庇護的事例，即在漢高祖十年，女子“符”逃亡，詐稱自己“未有名數”，而“自占書名數”成爲大夫明的“奴隸”。大夫明把女子“符”嫁給隱官“解”做妻子。像這樣通過人身買賣使良人奴婢化的情形早在漢初即已存在，其後隨著工商業和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正如晁錯在《漢書·食貨志》中指出的那樣更加盛行。根據《二年律令》中授田制度的規定，所受田地可以繼承、贈與和買賣，因此授田制度是土地國有制向私有制的過渡形態^②。由於所受田地可以繼承、贈與和買賣，且按等級佔田，大大小小的軍功地主們便可以憑藉和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權剝奪或者以低廉的價格強買庶民的土地，農民從政府那里獲得的土地難以長久維持而迅速地破產，以致呈現出董仲舒所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的社會狀態^③。正是允許買賣和贈與的土地制度的存在，導致了以大土地所有者的增加和民營手工業的發達爲特徵的漢代社會面貌。而通過不法人身買賣使良人奴婢化的現象在這一過程中更是逐漸增加，到漢文帝時期已然十分盛行。官奴婢勞動力大量閑置的問題

① “強略人以爲妻及助者、斬左止（趾）以爲城旦”（《二年律令》194簡）“…恐獨人以求錢財，盜殺傷人，盜發冢（塚），略賣人若已略未賣，僇（矯）相以爲吏，自以爲吏以盜，皆磔。”（同上，65、66簡）“智（知）人略賣人而與買，與同罪。不當賣而私爲人賣，賣者皆磔爲城旦舂，買者智（知）其請（情），與同罪。”（同上，67簡）。

② 臧知非：《西漢授田制度與田稅徵收方式新論》，《考古》2003年第6期。

③ 臧知非：《西漢授田制度與田稅徵收方式新論》，《考古》2003年第6期。。

日益突出，亟待解決，在這種形勢下推行的以有期刑代替無期刑的舉措，致使官奴婢的買入和賣出系統崩潰，可以看作是應對和改善官奴婢體制低效性的無奈之舉。

秦代以勞役刑徒為中心的嚴謹高效的勞役徵發體制在秦漢交替時期因戰亂導致的戶籍紊亂和民人逃亡而走向瓦解。通常認為勞役徵發體制可以使勞動力閑置最小化，而官奴婢賣出系統在這一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漢初實行的土地國有制也經過繼承、贈與或買賣的過程而逐漸被大土地所有制所取代，在這一過程中盛行的人身買賣暴露了官奴婢賣出系統的弊端。官奴婢賣出系統的崩潰難以對勞役刑徒進行數量調節以致帶來國家不必要的官有勞動力的過剩狀態，即官有勞動力的閑置化。從這一點上說，將勞役刑徒從無期轉換為有期的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之舉了。史書記載將漢文帝時期的所有改革都歸功於漢文帝本人，但事實上所有改革都是基於現實要求而施行的^①，史書中關於漢文帝受緹縈救父義舉所感動而推行刑制改革的描寫，塑造了漢文帝的“仁君”形象，他所採取的各項政策乍一看符合“仁君”的評價，但他的意圖是為減輕國家負擔而削減過剩的勞動力，恐怕不能夠僅憑詔書中“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幾句冠冕堂皇的文辭來肯定他的改革。他重新設定的以“笞五百”、“笞三百”的刑罰來代替斬左趾和劓鼻的肉刑也難以看作是真正為了人民而採取的革命性的“緩刑”舉措。根據前引《漢書·貢禹傳》中“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的記錄，漢文帝設定刑期之舉似乎並沒有達到真正削減過剩勞動力的目的。無論如何，我認為不論是漢文帝刑制改革中的城旦舂、隸臣妾、鬼薪白粲，還是先前的無期刑徒即官奴婢的刑期設定，依然有許多遺留問題。根據規定，漢文帝以前的所有官奴婢都設定了刑期，那麼其後出現的官奴婢是怎麼回事呢？無論是刑期的設定也好，還是漢文帝劃時代的改革也罷，為什麼其後還會同樣有關於官奴婢過剩的記載呢？可以確定的是在漢文帝將無期勞役刑徒即官奴婢的刑期設定之後，官奴婢並沒有消失。我認為如果把漢文帝的舉措理解為設定無期勞役刑徒的刑期而將其轉變為有期刑徒，那麼在刑制改革之前刑徒和官奴婢並沒有分別，正是通過刑制改革之後才將二者區分開。肉刑的廢止縱然有緩刑的意圖，但刑期的設定絕不是出於緩刑的考慮。

總之，我認為由於漢文帝時代包括漢文帝刑制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上存在諸多問題，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能把漢文帝視為英雄人物。現在所公佈的里耶秦簡的內容祇佔總體的0.1%，以後隨著里耶秦簡的繼續公佈和涉及文帝、景帝時期的張家山336號墓出土簡牘的公開發表^②，應該有助於進一步真實地把握包括秦代、漢代及秦漢交替時期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國家勞動力組織徵調的變化以及漢文帝時代的諸項改革。

① 前揭宮宅潔文，58頁。

② 根據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張家山三三六號墓現正在湖北省荊州博物館進行整理，其中包含漢律及其十五種律名。

秦漢簡牘《日書》所見占盜方法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宋艷萍

內容提要 秦漢時期，盜竊一直是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除了通常的偵察緝拿盜賊的方法之外，還流行著數術占盜法。秦漢簡牘《日書》中記載了大量占盜數術資料，歸結起來，占盜方法有天干占盜法、地支占盜法等八種主要方法。利用擇日術占盜的種類如此之多，有它深刻的社會原因。迷信思想是秦漢時期擇日術盛行的溫床，而“天人合一”思想是秦漢時期迷信思想的重要體現和理論來源。占盜法遵循了五行相克和地支六沖原理。擇日術反映了人們的據愿思維，占盜法反映了人們急於捕獲盜賊、追回失物的強烈愿望，是一種典型的據愿思維。地支占盜法是一種具象代換思維，二十八宿占盜法運用了符號代換思維。占盜法的應用者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官吏，另一個是普通百姓。以擇日術占盜祇是秦漢捕盜的輔助形式，主導形式還是正面的調查追蹤，但占盜術在秦漢時期被廣泛應用還是應當肯定的。

關鍵詞 秦漢簡牘《日書》 占盜方法 擇日術 迷信 天人合一

秦漢時期，盜竊一直是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統治者採取嚴密防範的態度，制定嚴刑峻法以鎮壓之。翻閱秦代法律文書，與盜有關的法律非常之多，懲罰也很嚴厲，如《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害盜別微而盜，駕（加）罪之。’•可（何）謂‘駕（加）罪’？•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剝（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遷）

之。求盜比此。”盜賊分贓一錢就要處以斬左足的肉刑，可見秦代對待盜竊行為懲罰的嚴酷。

除了通常偵察緝拿盜賊方法之外，秦漢時期還流行著數術占盜法，出土簡牘《日書》為我們瞭解這些提供了契機。《日書》所含內容很廣，是關乎日常生活各個方面趨吉避凶的簡明擇日手冊，占盜法是其中重要內容。通過出土發行的秦漢簡牘《日書》，我們可以窺知秦漢時期如何運用擇日術占捕盜賊。

—

在所公佈的秦漢簡牘中，有《日書》者主要有：睡虎地秦簡、周家台秦簡、放馬灘秦簡、尹灣漢簡、孔家坡漢簡、江陵王家臺漢簡等。翻閱這些《日書》，可以看到很多與占盜相關的內容，歸結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

（一）天干占盜法

在所見秦簡《日書》中，天干被用作占測盜者的時間依據。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中，是根據天干占測盜者名字：

甲盜名曰籍鄭壬贗強當良。·乙名曰舍徐可不詠亡戇(憂)。·丙名曰籍可癸上。·丁名曰浮妾榮辨僕上。·戊名曰匿為勝祗。·己名曰宜食成怪目。·庚名曰甲耶相衛魚。·辛名曰秦桃乙忌慧。·壬名曰黑疾齊謹。·癸名曰陽生先智丙。

甲日盜者的名字為籍鄭壬贗強當良，乙名曰舍徐可不詠亡戇(憂)，這些名字是隨意編排還是另有所據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丙日名字中有癸，庚日名字中有甲，辛日名字中有乙，癸日名字中有丙，所以我們懷疑這些名字在排列時加入了五行成分。

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盜》中，有根據天干占測盜者的另一套方法：

盜：

甲亡，盜在西方，一字間之，食五口，其疵其上得□□□□□其女若母為巫，其門西北出，盜三人。

乙亡，盜□□□□□□□□方，內盜有□□人在其室□。

丙亡，為間者不寡夫乃寡婦，其室在西方，疵而在耳，乃折齒。

丁亡，盜女子也，室在東方，疵在尾□□□，其食者五口，□。

戊亡，盜在南方，故盜，其上作折其□齒之其□。

己亡，盜三人，其子已死矣，其間在室。

庚亡，盜丈夫，其室在西方，其北壁臣，其人攢黑。

占測各天干日盜者的性別、盜者人數、所居住的房屋方位及家庭人數、盜者的體貌特徵等。可惜本篇缺少了辛、壬、癸三日的佔文。

放馬灘秦簡中亦有以十天干推測盜者的簡文：

甲亡，盜在西方，一於中，食者五口，疵在上，得，男子矣。

乙亡，盜□□三人，其一人在室中，從東方入，行有遺矣，不得，女子也。

丙亡，盜在西方，從西北入，折齒，得。男子矣，得。

丁亡，盜女子矣，在東方，其行在正，已索失，不得。

戊亡，盜在南方，食者五口，一於間，男子矣。亡作不得，亡莫而得。

己亡，其盜在，為人黃皙，在西南，其室三人食，其一人已死矣。女子矣，得。

庚亡，其盜丈夫矣，其室在北方，其北偏也，其室有黑桷。男子，不得。

辛亡，盜不得，外盜矣，女子矣。

壬亡，其盜可得矣。若得，必有死者，男子矣。青刈。

癸亡，其盜女子矣，必得。為人操不靖。

對比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盜》和放馬灘以天干占盜簡文，兩者內容相似，且甲、丙、丁、戊日盜賊所在方向兩簡一致，兩者可以相互參考。

（二）地支占盜法

在《日書》中，利用地支占盜比用天干占盜內容要詳盡得多。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

盜者：

子，鼠也。盜者兌（銳）口，希（稀）須（鬚），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藏（藏）於垣內中糞糞下。·多〈名〉鼠鼯孔午耶。

丑，牛也。盜者大鼻，長頸，大臂（臂）臃而僂，疵在目，藏（藏）牛廄中草木下。·多〈名〉徐善間以未。

寅，虎也。盜者壯，希（稀）須（鬚），面有黑焉，不全於身，從以上臂（臂）臃梗，大疵在臂（臂），藏（藏）於瓦器間，旦閉夕啟西方。·多〈名〉虎豸羆豹申。

卯，兔也。盜者大面，頭顙（顙），疵在鼻，藏（藏）於草中，旦閉夕啟北方。·多〈名〉兔鼯陸突垣義酉。

辰，盜者男子，青赤色，為人不穀（穀），要（腰）有疵，藏（藏）東南反（坂）下。車人，親也，勿言已。·多〈名〉獾不圖射亥戌。

巳，蟲也。盜者長而黑，蛇目，黃色，疵在足，藏（藏）於瓦器下。·名西萑亥旦。
午，鹿也。盜者長頸，小脰，其身不全，長耳而操蔡，疵在肩，藏（藏）於草木下，必依阪險，旦啟夕閉東方。·名徹達祿得獲錯。

未，馬也。盜者長須（鬚）耳，為人我我然好歌無（舞），疵在肩，藏（藏）於藁囊中，阪險，必得。·名建章丑吉。

申，環也。盜者圓（圓）面，其爲人也鞞鞞然，夙得莫（暮）不得。·名責環貉豺干都寅。

酉，水也。盜者蘭而黃色，疵在面，藏（藏）於園中草下，旦啟夕閉，夙得莫（暮）不得。·名多酉起嬰。

戌，老羊也。盜者赤色，其爲人也剛履，疵在頰。藏於藁蔡中土中，夙得莫（暮）不得。·名馬童郭恩辰戌。

亥，豕也。盜者大鼻而栗（剝）行，馬脊，其面不全。疵在鬢（要），藏（藏）於園中垣下，夙得莫（暮）不得。·名勝孤夏穀□亥。

此篇詳細敘述了十二地支盜者的體貌特徵、性情、藏匿地點、捕獲時間宜忌及盜者的名字。十二地支與十二個動物相連，這是十二生肖的最早記錄。值得注意的是，盜者的名字中，都含有一或兩個地支，劉樂賢先生以表格形式展示出這一現象：

地支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名字中地支	午	未	申	酉	亥	戌	亥	丑	寅	酉	辰	戌	□亥

他指出：“從上表看來，名字中的地支排列實際是有次序的。基本上是按午、未、申……排列下去的。其中午日下沒有地支，可能是漏寫了‘子’，酉日下的‘酉’可能是‘卯’的誤寫。亥日下面空缺之字很可能是‘巳’。”^①我非常同意劉先生的觀點。根據這一觀點，排除多餘地支，重新列表如下：

地支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名字中地支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可以看出，所有地支日都與對應名字中地支在地支表中呈對應關係，也就是地支六沖，后文將詳及。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中亦有與本篇相似的內容：

子，鼠矣。以亡，盜者中人取之，藏穴中糞土中。爲人鞍面小目，目擺擺，廣頰，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276—277頁。

圖目。盜也，所入矣，不得。

丑，牛矣。以亡，其盜從北方禧大息，盜不遠，勇桑矣，得。

寅，虎矣。以亡，盜從東方入，又從之，藏山谷中。其為人方頤然扁然，名曰“輒”，曰“耳”，曰“志”，曰“聲”。賤人矣，得。

卯，兔矣。以亡，盜從東方入，復從出，藏野林草茅中，為人短面。出，不得。

辰，蟲矣。以亡，盜者從東方入，又從出取者，藏豁穀、窖內中，外人矣。其為人長頸小首小目，女子為巫，男子為祝名。

巳，雞矣。以亡，盜者中人矣，藏因屋屎糞土中、蹇木下。其為人小面長赤目，賤人矣，得。

午，馬矣。盜從南方入，又從之出，藏中廐廡多十□□……

未，羊。盜者從南方，又從出爾，在牢園中。其為人小頸大腹出目，必得。

申，猴矣。盜從西方爾，在山谷。為人美不擒，名曰“環、遠、所、矣”，不得。

酉，雞矣。盜從西方入，復從西方出爾。在因屋東屎水旁，名曰“灌”，有黑子侯。

戌，犬。爾在積薪糞蔡中，黑單，多言，旬子宮得。

亥，豕矣。盜者中人矣，爾在屏園方及矢。其為人長面折靨赤目長髮，得。

也以十二地支占盜，記載盜者逃亡的方向、長相、特徵、性別、匿藏去處、相距路程、同伙人數、生與死、所盜財物是否還在或已銷贓、能否抓獲等。此處亦有十二種動物，劉樂賢先生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中以表格的形式對睡虎地《日書》、放馬灘《日書》及漢代以後十二生肖的流行說法進行了比較。圖表如下：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睡》	鼠	牛	虎	兔	□	蟲	鹿	馬	環	水	老羊	豕
《放》	鼠	牛	虎	兔	蟲	雞	馬	羊	猴	雞	犬	豕
流行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犬	豕

雖然此時地支所配動物與後世有出入，但也相差不大，說明十二生肖在秦漢時期已基本定型。

孔家坡漢簡中亦有地支占盜的資料：

盜日：

子：鼠也。盜者兌（銳）口，希（稀）須（鬚），善□，□有黑子焉。藏（藏）安內中糞蔡下，女子也。其盜在內中。

丑：牛也。盜者大鼻……藏（藏）牛牢中。

寅：虎也。盜者虎狀，希（稀）……不全於中，以上大辟（臂）藏（藏）。其盜決，

疵善，象（喙）口，東臧（藏）之史耳若所（？）。

卯：鬼也。盜者大面，短象，臧（藏）草□□。盜者小短，大目，勉（免）口，女子也。

辰：蟲也……□中，□於器間。其盜女子也，為巫，門西出。

巳：虫也。盜者長而黑，虫目而黃色，臧（藏）瓦器下。其盜深目而為口、輕足。

午：鹿也。盜者長頸，細胫，其身不全，長躁躁然，臧（藏）之草木下，販（販）險。盜長面，高耳有疵，男子也。

未：馬也。盜者長頸而長耳，其為人我（娥）我（娥）然，好歌（歌）舞，臧（藏）之芻藁廩（廩）中。其盜禿而多口，善數步。

申：玉石也。盜者曲身而頡（邪）行，有病，足胫，依販（販）險，殺之。其盜女子也，禿，從臧（藏）西方，藏（壓）以石。

酉：水日。盜者言亂，黃色，臧（藏）之園中草木下。其盜男子也，禾白面，間，在內中。

戌：老火也。盜者赤色，短頸，其為人也剛履（愎）。臧（藏）之糞蔡之中，裏（壤）下。其盜出目，大面，短頸，男子也。

亥：豕也。盜者大鼻而細胫，長脊，其面有黑子，臧（藏）園中墳垣下。其盜女子也，出首，臧（藏）室西北。

我們把孔家坡漢簡中地支及動物加入劉樂賢先生上述列表：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睡》	鼠	牛	虎	兔	□	蟲	鹿	馬	環	水	老羊	豕
《放》	鼠	牛	虎	兔	蟲	雞	馬	羊	猴	雞	犬	豕
《孔》	鼠	牛	虎	兔	蟲	虫	鹿	馬	玉石	水	老火	豕

我們發現，孔家坡漢簡和睡虎地秦簡地支對應的動物大部分相同，而與放馬灘秦簡差別較大，孔家坡漢簡和睡虎地秦簡都出土於湖北，而放馬灘秦簡出土於甘肅，這或許是地域原因造成的。對比睡虎地秦簡和孔家坡漢簡地支占盜簡文，兩者內容非常相似，故可相互參考。

天干地支往往結合在一起記日，為什麼秦簡在占盜時要把天干和地支分開？劉樂賢先生認為：“這當然是為了使以天干為依據占盜者名字和以地支為依據占盜者名字兩種方法不至於互相矛盾。”^①他這種解釋很有道理。楊英認為：“這兩種盜者名在占盜時是共同運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277頁。

用的。具體在占測盜者情況時有可能是這樣：根據某日的干支，先查出該日地支所對應的獸，得知盜者形貌的大概特徵、藏身之處和可能的名字，再根據天干查可能的名字，二者綜合，求得盜者之名。”^①她的說法也有其道理。但據劉樂賢先生指出，敦煌遺書《六十甲子推吉凶法》（斯 6258）中也有占盜的記載。如：

亥時，盜者男子，赤色，取之北行□□下欠□食口十八……

這裏的地支表示時辰而不是表日，亥在五行中屬水，北方亦屬水，看來這裏也是依據了五行原理。敦煌遺書用地支表示時辰，其實，用地支表示時辰在睡虎地秦簡中已經出現，《日書》乙種《見人》中有：

【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莫（暮）食巳，日中午，晡未，下市申，春日酉，牛羊入戌，黃昏亥，人定【子】。

學者們一致認為，“這是迄今為止關於十二時最早的記載，又是以十二辰表示十二時最早的記載”^②。這說明，至少到戰國晚期，已經出現十二地支表十二時的現象。在傳統文獻中，相關記載不甚明確，祇是在《史記·曆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右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其中的子時、酉時、午時、卯時應當指時辰，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見人》時辰出現的時代比《史記》早得多，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不可能不知道這一史實，在他的著作中出現時辰不足為怪。到了東漢時，十二地支表十二時已經非常成熟，王充的《論衡·調時篇》中記載：“一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王充明確提出一日分為十二時，日出卯和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見人》篇相同，平旦寅可補充《見人》篇的殘斷之處。另據《後漢書·律曆下》記載：“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余，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以法除之，所得算之數從夜半子起，算盡之外，則所加時也。”這裏提到夜半子，和《見人》中人定為子不同。《見人》篇中人定為子可能是十二辰的最初形式，到漢代夜半子基本定型，《後漢書》所載便為例證。

既然地支可表時辰，我們有理由懷疑睡虎地秦簡和放馬灘秦簡中的地支占盜法中的地支也表示時辰，正如劉樂賢先生指出的那樣：“實際上，本篇的十二地支完全可能與上引敦煌遺書一樣是記十二時。”^③此外，劉樂賢先生還為我們提供了另一有力證據：“我們在

① 楊英：《秦簡日書〈盜者〉芻議》，《秦文化論叢》第十二輯，三秦出版社，2005，500頁。

② 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注釋，其它學者如劉樂賢、于豪亮等先生都持這種說法，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天津出版社，1994，278頁；于豪亮《秦簡〈日書〉記時記月諸問題》，載《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352頁。

③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天津出版社，1994，278頁。

居延漢簡中發現一條殘簡，很可能就是占盜者的。該簡云：

☐屬夜半者，男子取之。其人兌（銳）喙、爪、須、☐目善☐乳人事數人也。姓孤氏字子

☐孫口臧（藏）之內中嬰間立中☐

“這裏出現了‘夜半’，顯然是以時辰推測盜者。”^①我們從“取”、“臧（藏）”等字眼可以窺知這是篇占盜的數術資料。這裏的占測文字和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及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的以十二支占盜的形式非常相似，而且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中“子，鼠也。盜者兌（銳）口，希（稀）須（鬚），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藏）於垣內中糞蔡下。·多〈名〉鼠驪孔午郢”，和居延漢簡夜半時辰的盜者形體特徵如此相似。如前所述，漢代夜半為子時，居延漢簡夜半時辰的盜者字子，這應當不是巧合，而可能與子時的子有一定關聯。這就驗證了上述居延簡文為占盜文無疑，同時也為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中地支為時辰提供了證據。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篇中先列出十二地支盜者情況，接著就是十甲子日盜者情況，如果此處地支是記時辰，那麼占盜就可以具體到某一天的某個時辰，這樣就能更精確地掌握盜者情況。

（三）以地支日為依託的特定日占盜法

在睡虎地秦簡《日書》及放馬灘秦簡《日書》中，都可以見到特定日占盜簡文。所謂特定日，就是日者為占測吉凶方便，為日子規定下特定的名稱，人們根據這些特定日決定行事宜忌，這些特定日都以地支為依託。

建除家是選擇家中一重要派別，睡虎地秦簡《日書》甲乙種有四套建除家的擇日表格，甲種的兩篇題名為：《除》、《秦除》，它們的區別是“‘秦除’是秦的建除，‘除’則是楚的建除。”^②乙種兩篇題名為：《除乙》、《徐》，《除乙》內容與甲種《除》相同，而《徐》與甲種《秦除》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建除家的擇日表格，是根據每月每地支日對照一個特定的日名，每個日名都有做事的吉凶臧否。在這四套建除家的擇日表格中，甲種《除》和《秦除》都有特定日與占盜有關。如《除》中：“外害日，……之四方野外，必耦（遇）寇盜，見兵。”外害日如之四方野外，一定會遇到寇盜，所以行動時應避開此日。與外害日對應的地支日為：十一月未，十二月申，正月酉，二月戌，三月亥，四月子，五月丑，六月寅，七月卯，八月辰，九月巳，十月午。

《秦除》中有兩個特定日與占盜有關：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277頁。

②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29頁。

除日……攻盜，不可以執。

開日……言盜，得。

在除日祇可攻盜而不可執之，在開日可以得到盜賊。與除日對應的地支日為：正月卯，二月辰，三月巳，四月午，五月未，六月申，七月酉，八月戌，九月亥，十月子，十一月丑，十二月寅。與開日對應的地支日為：正月子，二月丑，三月寅，四月卯，五月辰，六月巳，七月午，八月未，九月申，十月酉，十一月戌，十二月亥。

在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除》中，也有一特定日與占盜有關：

開日……可以言盜，盜必得。

這裏的開日和睡虎地秦簡中的開日內容基本相同，而且對應的地支日兩者完全相同，這說明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除》和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建除》派系相近或相同。

在孔家坡漢簡《日書·建除》中，也有兩個特定日與占盜有關：

執日……可以逐盜，圍得。

開日……言盜，必得。

此處開日占盜內容及對應地支日都與睡虎地秦簡和放馬灘秦簡相同，但孔家坡漢簡另一與占盜有關的特定日是執日，這與睡虎地秦簡為除日不同，可能由於時代差異所致。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有《稷辰》，學者一致認為稷辰就是叢辰^①，叢辰是選擇家中另一重要派別。《稷辰》的形式和《除》相似，都是根據每月每地支日對照一個特定的日名，看來建除家和叢辰家並非存在天壤之別，祇是在占測內容上稍有不同而已。《稷辰》中與占盜有關的特定日是陰，相關內容為：

陰……生子，男女為盜……正月以朔，多雨，歲中，毋（無）兵，多盜。

陰所對應的地支日為：正月二月巳未，三月四月未酉，五月六月酉亥，七月八月亥丑，九月十月丑卯，十一月十二月卯巳。

孔家坡漢簡中也有一組擇日術與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稷辰》形式和內容基本相同，可以斷定也是叢辰家的擇日術，其中有一日與占盜有關：

陰日……以生子，為盜。

這裏的特定日名和對應的地支都與睡虎地秦簡相同，占文內容也基本相同。

除建除家、叢辰家的特定日外，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還有一特定日與占盜有關，

^① 饒宗頤、李學勤、劉樂賢等先生都主此說，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天津出版社，1994，58頁。

“凡斂日，利以……擊（執）盜賊”，斂日是執盜賊的好日子，對於捕盜者來說不容忽視。斂日對應的日子為“夏三月丑斂，春三月戌斂，秋三月辰斂，冬三月未斂”，據劉樂賢先生考証，春三月的“戌”應為“戊”^①，這樣斂日所依託的也都是地支日。

（四）二十八宿占盜法

二十八宿從先秦時期就廣泛運用於擇日術中，利用二十八宿占盜便是其中一術。《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中有二十八宿做事吉凶的詳細記載，其中與占盜相關的內容為：

角：斗乘角……逐盜、追亡人，得。

[亢：]斗乘亢……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攝（氐）：斗乘]攝（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房：斗乘]房……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心：斗乘心門有客，所言者]……逐盜、追亡人，不得。

[尾：斗]乘尾……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箕：斗乘箕……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斗：斗乘斗……占逐盜、追亡人，得。

牽 = （牽牛）：斗乘牽 = （牽牛）……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婺 = （婺女）：斗乘婺 = （婺女）……占逐盜、追亡人，不得。

[虛：斗]乘虛……占逐、追亡人，弗得。

[危：斗乘]危……占逐盜、追亡人，弗得。

[營 = （營室）：斗乘]營 = （營室）……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東辟（壁）：斗乘東辟（壁），門有客，所言]……占逐盜、追亡人，不得。

[奎：斗乘]奎……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婁：斗乘]婁……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胃：斗乘胃……占逐盜、追亡人，得。

卯（昴）：斗乘卯（昴）……逐盜、追亡人，不得。

畢：斗乘畢……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此（觜）：斗乘此（觜）……（按，整理小組在注釋“亡”時說：“據文例，‘亡’字之上原脫‘逐’、‘盜’、‘追’三字，‘亡’字之下原脫一‘人’字。本占項應書在‘病者’這一占項之前。”）

[參：斗]乘參……占逐盜、追亡人，不得。

[東井]：斗乘東井……占逐盜、追亡人，得。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175頁。

[與鬼：斗]乘與鬼……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死。

[柳：斗乘柳，門有客]……占逐盜、追亡人，不得。

[七星：斗乘七星，門有客]……占逐盜、追亡人，得。

[張：斗乘]張……占逐盜、追亡人，得之。

翼：斗乘翼，門有客……占逐盜、追亡人，得。

軫：斗乘軫……占逐盜、追亡人，不得。

周家臺秦簡是把二十八宿放在司盤上的，從綫圖（一）（省略）我們可清晰看出二十八宿與天干、地支及時的對應關係，因有時辰相對照，這裏的天干地支應表日無疑。周家臺秦簡中有二十八宿與時的具體對照表，表格如下：

夜半	夜過半	雞未鳴	前鳴	雞後鳴	雞旦	平旦	日出	日出時	早食	食時	晏食	廷食	日未中
虛	癸 _{II} （癸女）	牽 _{II} （牽牛）	門	箕	尾	心	房	抵（氐）	亢	角	軫	翼	張
水							〔木〕						
北							東						

（接下表）

日中	日過中	日失（昃）	舖時	下舖	夕時	日竟〔入〕	日入	黃昏	定昏	夕食	人鄭	夜三分之一	夜未半
七星	柳	與鬼	東井	參	此（觜）鰲（鰲）	畢	卯（昴）	胃	婁	奎	東辟（壁）	營 _{II} （營室）	危
火							金						
南							西						

從上表可看出，二十八宿和每個時辰是一一對應的，而表中的五行和方位，在古人眼中也與時間有密切關係，整理小組援引《淮南子·天文》對其注釋曰：“北方水也，……

其日壬癸”、“東方木也……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日丙丁”、“西方金也……其日庚辛”。所以周家臺秦簡《日書》中的二十八宿應當是指時間。

明晰了二十八宿與每日每時有對應關係，我們再回頭看與占盜相關的簡文。簡文曰：“角：角乘角，……逐盜、追亡人，得”，這是占測角這一時間逐盜情況的占文。如何確定角等二十八宿所代表的具體時間，簡文為我們提供了占測的鑰匙：“求斗術曰：以廷子為平旦而左行，數東方平旦以雜之，得其時宿，即斗所乘也。”根據這個求斗術就可在司盤上找到與每宿相對應的天干地支日及時辰，每宿中都有占測逐盜的得失與否，據此就可安排逐盜時間了。

（五）孤虛占盜法

利用孤虛之術占盜亦是秦代占盜方法之一，據《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二六〇簡記載：

☐以孤虛循求盜所道入者及藏（藏）處。

秦簡整理小組對“孤虛之術”注釋道：“按本段簡的書寫格式，‘以’字之上所缺一或二字，故以☐示之。‘孤虛’，古代方術語。《史記·龜策列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駰《集解》：‘《六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句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即為虛。’《後漢書·方術傳》‘孤虛之術’，李賢《注》：‘孤為六甲之孤辰。若甲子句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此處當指孤虛地支所在的方向。”這一注釋為我們說明了“孤虛之術”的含義，非常有價值。

二六〇簡下無孤虛之術的具體內容，但同時出土的其它簡文可以補足此憾。三五五至三六〇簡記云：

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道東南入。

甲戌旬，申酉為孤，寅卯為虛，從西南入。

甲申旬，午未為孤，子丑為虛，從南方入。

甲午旬，辰巳為孤，戌亥為虛，從西北入。

甲辰旬，寅卯為孤，申酉為虛，從南方[入]。

甲寅旬，子丑為孤，午未為虛，從北方入。

三六一至三六二號簡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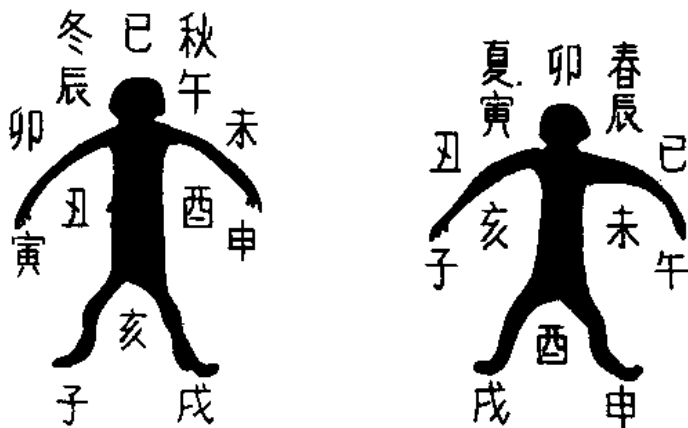
·甲子亡馬牛，求西北方；甲戌旬，求西方；甲申旬，求南方；甲午旬，求東南方；甲辰旬，求東方；甲寅旬，求北方。

對於二六〇簡與三五五至三六〇號簡及三六一至三六二號簡之間的關係，陳偉先生做了非常精闢的論斷：“整理者於三五五號簡‘甲子旬’下注釋說：‘六甲孤虛法’參見《日書》二六〇號簡注釋。”已指出彼此的關係。不過，這兩組簡與二六〇號簡之間應該有更多的關聯。三五五至三六〇號簡所謂‘道東南入’、‘從西南入’等等，指的就是前者的‘盜所道入’，也就是用孤虛法占斷的盜者前來的方向。三六一至三六二號簡所記，指的就是二六〇號簡的‘藏處’。”^①

三六一至三六二號簡所涉及盜竊的內容為馬和牛，利用孤虛之術占盜的內容應當很多，而不僅僅是馬、牛，但馬和牛為當時中下層百姓的重要生產資料，因其重要而被特別強調罷了。

（六）生子占盜法

睡虎地秦簡《日書》有《人字》，如下圖：



該篇附有文字：

人字，其日在首，富難勝毆（也）。夾頭者貴。在奎者富。在掖（腋）者愛。在手者巧盜。在足下者賤。在外者奔亡。

整理小組釋“字”為“生子”，這是一篇占卜生子吉凶的圖文，按照人出生日支所居人字圖中身體部位來預測命運。在所附文字中，“在手者巧盜”這句話發人深思。巧，《說文》釋為“技也”，《廣韻》釋為“能也，善也。”巧盜便是擅長偷盜的意思。手部對應的地支日為：冬、秋二季的寅、申日，春、夏二季的子、午日。

在孔家坡漢簡中也有一套生子占卜法，題目是《生子》，是根據地支日測定生子的吉凶、

^① 陳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五集，黃山書社，2003年6月。

命運及壽命長短。其中與占盜有關的簡文是：

午生子，八日、二月二日不死，爲大夫。六十九年以辛未死。女二日、五月六日不死，善盜。五十年以辛未死。一曰善田。

午日生的女子善盜。睡虎地秦簡《人字篇》中春夏二季的午日生子是“巧盜”，巧盜和善盜意思相同，看來午日生子就是與盜相關。在信奉者的眼中，生在這些日子的人天生有盜竊的技能，所以當盜竊案發生後，這些人便成爲最大嫌疑，很可能成爲官府的重點排查對象。

（七）神龜占盜法

《尹灣漢墓簡牘》中有一副完整的烏龜圖，旁有一段占測吉凶的文字，整理者據其內容擬名爲《神龜占》，以後學者也都沿用了這一稱謂。《神龜占》的內容如下：

·用神龜之法：以月竟以後左足而右行，至今日之日止，問。

直右脅者，可得，姓朱氏，名長，正西。

直後右足者，易得，姓王氏，名到，西北。

直尾者，自歸，爲莊氏，名餘，正北。

直後左足者，可得，爲朝氏，名歐，東北。

直左脅者，可得，爲鄭氏，名起，正東。

直前左足者，難得，爲李氏，名多，東南。

直頭者，毋來也，不可得，爲張氏，正南。

直前右足者，難得，爲陳氏，名安，正（西）南。

據劉樂賢先生研究，“這是一種根據日序占測盜者的數術，其方法是：將神龜分爲八個部位，以其後左足爲起點，按逆時鐘方向數日數，從當月的朔日數到占測的那一天，看位於神龜的什麼部位，然後再到占測文字中去查看相應的結果”^①。占測結果包括盜者能否捕得、姓氏、名字及盜者所處方向等，詳細具體、簡單易行。

（八）特定時辰占盜法

在尹灣漢簡中，有這樣一個表格：

·行德行時	甲乙	丙子	戊己	庚辛	壬癸
雞鳴至蚤食	端	德	刑	罰	令
蚤食至日中	令	端	德	刑	罰

① 劉樂賢：《尹灣漢墓出土數術文獻初探》，《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176頁。

日中至舖時	罰	令	端	德	刑
舖時至日入	刑	罰	令	端	德
日中〈入〉至雞鳴	德	刑	罰	令	端

這是把一天分爲五個時間段，每個時間段在不同的天干日中名稱不同，如甲乙日雞鳴到蚤食這段時間稱爲端時，而丙子日這段時間則稱爲德時。與占盜有關的特定時辰爲德時，根據表格，它對應的天干日及時間段爲：甲乙日的日中〈入〉至雞鳴，丙子日的雞鳴至蚤食，戊己日的蚤食至日中，庚辛日的日中至舖時，壬癸日的舖時至日入。德時的古文爲：

以德時請謁見人喜成以行大利數者毋罪□□疾者不死亡盜不得生子必吉

天干日和特定時辰配合占盜法若和上述神龜占盜法相配合，便能更準確地掌握盜者的情況。

二

利用擇日術占盜的種類有如此之多，說明秦漢時期這種數術方法是被廣泛使用的。每種現象都有它深刻的社會原因。秦漢時期以天干地支、星宿、孤虛等方法占盜，含有濃厚的迷信色彩，這與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有直接關係。由於科技的不發達，當時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很迷信。秦始皇篤信神仙，妄求長生不老之藥，他還自稱“真人”，躲入密室修煉，目的爲活得長久些。燕齊的方士因而被重視，光候星氣者就有三百多人。秦漢時期皇帝每逢大事都要擇日、占卜，舉幾個例子以茲說明：

《史記·淮陰侯列傳》：（劉邦欲封韓信爲大將，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

《漢書·高帝紀》：“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後漢書·光武帝紀》：“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靈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

《後漢書·明帝紀》：“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在皇帝的示範下，臣民都紛紛效仿。可以說，篤信擇日術是秦漢時期普遍的社會風氣。正如王充在《論衡·譏日》中分析的那樣：“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眾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

可以說，迷信思想是秦漢時期擇日術盛行的溫床，而“天人合一”思想是秦漢時期迷信思想的重要體現和理論來源。“天人合一”思想認為，天的變化和人事的變動相互感應。這種思想從先秦時期就有了，如《管子·五行篇》中“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這種思想到秦漢時期發展成為系統的理論。“天人合一”思想在秦漢時期在很多學說中都有體現，與盜賊有關的學說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天人感應”說。所謂“天人感應”說又稱“災異”說，是通過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來比附人類社會的興衰治亂，用以說明人類行為與天變災異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的學說。這種“天人感應”學說的理論體系創立於漢代公羊學，對漢代政治、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公羊家董仲舒認為人與天同類，“以類合之，天人一也”^①。所以“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②，盜屬惡事，與天之災異等惡徵相感。參看《史記》、《漢書》等漢代文獻，“災異”說與人事相比附的例子比比皆是，僅舉兩個與盜賊有關的例子以茲說明：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龔）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息夫躬）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訖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黷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二、“風”說。這是風家所持的觀點，認為人間政事和天風相互感應，天會根據人事變動生成不同的風，盜賊也會感應相應之風，王充指出“六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

① 《春秋繁露·陰陽義》。

②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

感應之而起。’”^①人們通過觀風就可知盜賊發生及發展的情形。

三、時令說。這種觀點認為每個季節都要執行相應時令，若有違背就會出現各種災變，如：“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呂氏春秋·季秋紀》、《淮南子·時則訓》亦同。）如果季秋行冬令就會國多盜賊。

四、星象說。這種觀點認為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人事相對應，星宿異常人事就會無常，《史記·天官書》有這樣的記載：“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史記正義》在注釋弧時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盜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狼角變色是多盜賊的徵兆，弧矢向狼星移動及弧矢不直狼，都是盜賊滋生的動因。《漢書·天文志》也有同樣的記載。星宿與盜賊相感應之例在文獻中非常多見，如：

《漢書·天文志》：“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有內亂，讒臣在旁。’”

《後漢書·順帝紀》：“（順帝陽嘉元年閏十二月）戊子，客星出天苑。辛卯，詔曰：‘聞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可以看出，秦漢時期世人都相信星宿變化和盜賊存在對應關係，周家臺秦簡《日書》以星宿占盜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五、日食說。這種學說把所發生的日食現象與盜賊等人間災難相比附，借日食等異常現象批評政治過失。文獻中的例子有：

《漢書·睦兩夏侯京翼李傳》：“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露，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

① 《論衡·變動》。

爲治邪，亂邪？’”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九年春正月辛(亥)[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己酉，詔曰：‘比歲不登，民多饑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微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

六、陰陽和諧說，這種說法認爲盜賊的有無和陰陽和諧與否有直接對應關係，如：

《漢書·地理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少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漢書·嚴安傳》：“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

《後漢書·順帝紀》：（漢順帝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疚如疾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以上與盜賊有關的思想反映了秦漢時期人們的基本心態，那就是人們普遍相信盜賊與天的預示有一定關係，要想捕滅盜賊，必須聽從上天的啟示，這種啟示的表現之一便是擇日術。擇日術的存在並被應用，在秦漢“天人合一”的大背景下順理成章。西漢末期和整個東漢時期，讖緯盛行，甚至佔據了國家指導思想的無上地位。讖緯是公羊學“天人感應”思想的濫觴，在讖緯影響下，整個東漢政治、社會生活都籠罩在迷信色彩之中，擇日術作爲迷信思想的一種，也在這種大背景下被推波助瀾並取得合法地位。

仔細研究秦漢《日書》所見占盜文，在擇日時彷彿有規律可循。在睡虎地秦簡《日書》天干占盜法中，丙日盜者名字中有癸，庚日名字中有甲，辛日名字中有乙，癸日名字中有丙，在五行中丙屬火，癸屬水，兩者五行相克。庚辛屬金，甲乙屬木，在五行中也是相克的，這說明，地支日與盜者名字遵循了五行相克原理。

在睡虎地秦簡《日書》地支占盜法中，根據以下表格：

地支日（或時）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名字中地支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可以看出，所有地支日都與對應名字中地支在地支表中呈對應關係，也就是地支六冲。地支六冲是指子午冲、丑未冲、寅申冲、卯酉冲、辰戌冲和巳亥冲。在《易》卦中，若出現冲，多主冲散、決裂、侵犯、襲擊等等。

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的《人字圖》中，根據季節，十二地支分佈在人身上的不同部位，如春夏季（參見前圖），整個人字圖像是以左手為起點呈順時針方向的地支分佈圖。占文中“巧盜”者在手部，而手部對應的地支日為：冬、秋二季的寅、申日，春、夏二季的子、午日。子和午，寅和申都是相冲關係，這裏遵循的原理似乎也是地支相冲。讓我們再看孤虛占盜法，周家臺秦簡三五五至三六〇號簡（見前引），甲子旬中，戌亥為孤，辰巳為虛，戌和辰相冲，亥和巳相冲，也就是說當戌亥為孤時，與之相冲的辰巳為虛。同樣，申酉與寅卯相冲，午未與子丑相冲，所以它們互為孤虛。從此我們可以清晰看出，所謂孤虛占盜法，遵循的是地支六冲原理。

從以上分析可知，秦漢《日書》占盜，遵循的是五行相克和地支六冲等原理，克和冲都是需忌諱的事，如說某女克夫命，某人和某人相克，冲著了什麼等。盜者名字與天干日五行相克，或與地支相冲，這或許是日者認為他犯罪的原因所在。盜竊案發後，祇要根據與天干日五行相克或地支相冲的人名查找就可以捕獲盜賊了。

擇日術反映了人們的據愿思維，即“以愿望為主導根據的思維”。而“愿望是人們對自身或對象的某種狀態主觀上肯定、希望或否定、抹煞的意識傾向……愿望在人認識自身與對象、決策自己的行為時，往往起著非常鉅大的作用——根據作用”^①。人們都希望社會安定，豐衣足食，子孫昌盛，福祿雙全，凡事都稱心如意。為實現這種美好愿望，人們在做事前都希望擇個黃道吉日。擇日術便是建築在人們這種據愿思維之上，並成為人們趨吉避凶的重要工具。占盜法反映了人們急於捕獲盜賊、追回失物的強烈愿望，是一種典型的據愿思維。

睡虎地秦簡和放馬灘秦簡都有地支占盜法，盜者的體貌特徵、藏身處特點，甚至名字都與對應的生肖動物特徵相似，其實這是一種具象代換思維。所謂“具象代換思維是以具體形象為代象對某種本象展開代換的代象型思維”^②。這裏便是以鼠等動物為具體形象對盜者特徵進行代換，日者們根據動物的形象及生活習性代換成盜者的形象及活動規律，為的是讓人們對盜者有更直觀的印象。這可能是生肖的最初含義，經過後人不斷豐富和發展，生肖便與其原意越來越遠了。

鼠與盜賊相比附在傳統文獻中可找到例証：

① 蘇富忠：《思維科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280頁。

② 同上，169頁。

《漢書·五行志》：“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為巢，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

這和秦簡中以鼠為盜者的具象代換之思維相同。

二十八宿占盜法運用了符號代換思維，“符號代換思維是以人創造的具有系統結構的符號體系為代象來代換一系列本象的代象型思維”^①。“符號是由人創造、操作、運用的具有系統結構，並有著廣泛代換能力的代象。”^②在擇日術中，二十八宿已不是實際的星宿，而成為一種符號象徵，正如劉樂賢先生指出的：“《日書》中的星宿不可理解為實際天體，這是我們的一貫看法。本篇的二十八宿也不會是天空中實際運行的二十八顆實星，而祇是日者們手中的一套符號。”^③二十八宿是被人們創造出的具有系統結構的符號體系，日者們正是以這種符號體系與人事的吉凶臧否進行代換，於是二十八宿便成為預示吉凶的符號標志，無論在出土文獻還是傳統文獻中，都可找到大量例証。

占盜法之多，從側面反映了秦漢時期盜賊的繁熾，這是當時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龍堅毅先生在分析秦盜賊成風之原因時歸結為三點：“（一）連年戰爭造成社會生產力的破壞，災害頻繁。（二）秦政府濫用民力，百姓負擔沉重。（三）秦末法律貫徹並不是很徹底。”^④盜賊成風是占盜法存在並被廣泛應用的動因。

占盜法的應用者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官吏，另一個是普通百姓。從出土有《日書》的秦簡看，墓主主要是中下級官吏，拿《睡虎地秦簡·日書》為例，簡的主人叫喜，他歷任安陸禦史、安陸令史、鄢令史及鄢獄史等地方官吏。《日書》甲種放置於墓主人頭側，在古代人觀念中，頭部是身體最尊貴的部位，把《日書》放於頭側，可見對其非常重視。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甲、乙種與《墓主記》一起放在墓主人頭部右上方，據《墓主記》推測，墓主曾參加過重要軍事戰爭，應當是當地的官員。周家臺三十號秦墓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級官吏。龍崗秦簡墓主人應是一個職掌雲夢禁苑管理具體事務的小吏。尹灣漢簡的墓主任東海郡功曹史。秦漢《日書》基本上發現於地方官吏之墓，說明地方官吏對其非常重視並在實際中應用之。

① 蘇富忠：《思維科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175頁。

② 同上，175頁。

③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114頁。

④ 龍堅毅：《從秦簡〈日書〉看秦人盜竊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2期，50—51頁。

秦漢時期地方設有專門的捕盜官吏，名為求盜：“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應劭曰）除了求盜，各級官吏都有捕盜的責任和義務，盜竊案發生後，如何順利及時捕獲盜賊是擺在地方官員面前的急迫任務，這不光是他的職責問題，還是他的政績及官位遷免問題。如果不能及時察覺和捕獲盜賊，各級官吏都要受到相應處罰，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捕律》：

盜賊發，士吏、求盜部者，及令、丞、尉弗覺智（知），士吏、求盜皆以卒戍邊二歲，令、丞、尉罰金各四兩。令、丞、尉能先覺智（知）、求捕其盜賊，及自勅，論吏部主者，除令、丞、尉罰。一歲中盜賊發而令、丞、尉所（？）不覺智（知）三發以上，皆為不勝任，免之。

因官吏不能及時捕盜而受到譴罰的例子在傳統文獻中很多，現舉《漢書·吾丘壽王傳》以茲說明：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征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強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且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吾丘壽王因盜賊縱橫不能控制受到皇帝的責難，後來他與公孫弘在辯論盜賊繁多與民挾弓弩的關係時，直接把罪責推給了郡國二千石，這種觀點得到了皇帝的贊同。正是由於統治者這種指導思想使然，從上到下一級級下壓，下層官吏成為直接擔負捕盜責任者。在正常偵察追捕方法無效的情況下，由於責任的重要性和複雜性，為及時捕獲盜賊，地方官吏有時要求助於迷信方術，擇日術便是其中重要方法之一。所以皇帝及上級官吏所施的鉅大壓力，是下級官吏急於捕盜不得已求助擇日術的直接原因。

擇日術為官吏所應用，從《日書》的其它部分亦可得到証實。在秦漢《日書》中，有很多關於入官、請謁的擇日條目。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的《吏》和《入官良日》及乙種中的《入官》等，是專門針對官吏的擇日條目，內容非常詳盡。在放馬灘秦簡《日書》

中亦有《入官忌》，也是專門為官吏所設擇日條目。其它簡牘，如武威漢簡、居延漢簡、馬王堆帛書中也有大量關於入官、謁見的擇日數術材料。如此多的資料證明，《日書》的應用者中必然包括官吏無疑。

對於大型盜竊案件，官府要查辦，但對百姓失竊的小物品，官府未必都能理會。官府即使理會，能否捕獲盜賊、追回失物還是問題，“為奸邪盜賊者死刑，而奸邪盜賊不止者”^①的現象一點也不誇張，所以百姓自主追盜現象應當普遍存在。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求助於擇日術順理成章，《日書》為他們提供了很多占盜方法。百姓占盜的內容是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比如周家臺秦簡中利用孤虛之術占亡馬、牛便是例子。百姓應當也是占盜法的實際應用者，甚至使用頻率及重視程度上要超過官吏。官吏相對百姓來說還是佔少數，從《日書》看，擇日術的內容包括五穀、婚喪、嫁娶生子、出行、築房等，都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所以百姓應當是《日書》的主要應用者。

當然，以擇日術占盜祇是秦漢捕盜的輔助形式，主導形式還是正面的調查追蹤。在所見文獻中，秦漢時期關於盜竊的法律已相當成熟，在《睡虎地秦簡》及《張家山漢簡》等出土簡帛中，有針對盜竊及相關行為的各種處罰規定。我們不能因出土簡牘中出現了諸多與占盜有關的擇日術而顛倒了它們應有的位置，但占盜術在秦漢時期被廣泛應用還是應當肯定的。由於占盜法主觀因素太重，把其作為捕盜依據，容易造成冤假錯案。由於篇幅所限，不再贅述，本人將另文詳及。

① 《商君書·畫策》

避諱字與出土秦漢簡帛的研究

[美] 佛羅里達大學 來國龍

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用科學實證的方法，以人類學的一般理論和有關秦漢避諱的具體史實，提出秦漢避諱的一般原則的假設，即秦漢避諱的範圍是給皇帝看的民間上書、進呈書，以及皇帝的詔書等官方文書，這些文書是要求避諱的；而其它領域的文書和著述，則不用避諱。因此，我們在用避諱字的有無來判斷出土文獻的年代時，首先要對文本的性質有所瞭解。如果是公領域的文本，那麼避諱字的有無可以作為斷代的依據；但如果是私領域的文本，我們就不能直接用避諱字來斷代，而要仔細考慮避諱的緣由，幫助我們瞭解文本的年代與傳抄歷史。希望在今後的研究中，不斷用考古發現的實際材料來驗證，看歸納出來的這些原則是否經得起考驗。

關鍵詞 秦漢避諱 公領域 私領域 文本年代 科學假設與實證

秦漢文獻中的避諱字，從宋代以來，就成為考據學家鑒別版本、考鏡源流、確定文本年代的重要工具。但是傳世典籍由於經歷代傳抄和有意迴改，有時候很難確定哪些是原來的避諱，哪些是後來迴改，因而使秦漢時期的避諱研究難以深入。^①陳垣在《史諱舉例》中對於秦漢避諱祇能說“其法尚疏”，後來胡適指出了秦漢避諱的複雜性，但也祇是籠統地說“兩漢人臨文不諱”、“四百年避諱寬大”，没能對避諱的原則作清理。70年代以來，秦漢簡帛的發現為避諱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但由於自始就對秦漢避諱現象的複雜性認

① 劉殿爵：《秦諱初探—兼就諱字論古書中之重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1988)，217—289頁。

識不足，簡單套用後代嚴格避諱的標準來作為判斷秦漢文獻年代的依據，因此造成許多混亂。最近日本學者影山輝國甚至認為，避諱字幾乎不能用來斷代。^①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出土簡帛為主要依據，試圖對秦漢避諱的現象進行初步清理。秦漢文獻並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套避諱的固定規則，因此我們只能就有關史實和出土簡帛進行推測與歸納。在方法上，本文採用科學實證的方法，即根據觀察到的現象，提出假設，然後再用考古發現的實際材料去驗證，看歸納出來的規則是否經得起考驗。本文認為，秦漢簡帛的研究，首先需要確定文本的性質，然後才能看避諱字是否可以作為判斷文本年代的標準。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這裏所說的避諱字是指筆諱。也就是在使用文字寫作或抄寫文書時，遇到涉及尊長“私名”的時候，敬避尊長的“私名”。這當然是要到發明文字以後才會有的現象。商周時期可能就已經有筆諱，商周甲骨、金文很少見帝王的名字，銘文一般只是尊稱王或廟號、諡號，而不直稱王的名字。雖然商周避諱的材料不多、不夠，但我們卻不能像胡適那樣，直接斷言商周完全沒有避諱制度。秦漢以後官僚制度興起，文字的使用面越來越廣，因此筆諱才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正如學者指出的：“諱例的疏密、諱律的寬嚴，實與中央集權的強弱相輔而行。”^②

與筆諱相對的口諱，則有更早的淵源。筆諱當是口諱的延伸，是以口諱為基礎的。私名是相對於他人而言，與個人的身份緊密相連。避諱人名以示尊敬，是很普遍的社會現象。西方的人類學研究，自摩爾根以來，就注意到美洲、大洋洲、非洲、亞洲等原始部族避諱人名的現象。^③日本自古以來就極為重視人名與稱謂，至今依然如此，成為其重要的文化特色，反映在日常語言、宗教、社會、政治的各個方面。^④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人名避諱。在商周時期，與避諱人名相聯繫的，還有對人像的迴避。不但直呼其名不敬，而且人像和人名一樣，常常是施行“詛咒”這類巫術的主要媒介。

其次，我們討論的避諱，主要是君諱（或稱國諱、公諱），是指臣下迴避秦漢時期皇帝的名字。與君諱相關的另一種避諱即家諱。家諱一般可能多是口諱，但是某些文人著書立說的時候，把口諱延伸到筆諱。例如，東漢末高誘《淮南鴻烈解敘》就指出，淮南王劉安“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漢銅鏡出於淮南故地，有銘文把常語“長相思”改作“脩相思”，學者多以為此類鏡作於淮南王劉安時，甚或作於劉安淮南銅

① 影山輝國：《關於漢代的避諱》，《簡帛研究 2002-200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92—298 頁。

② 范志新：《避諱學》，臺灣：學生書局，2006，369 頁。

③ 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蓀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76—77 頁；納日碧力戈，《姓名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④ Herbert Plutschow, Japan's name cul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names in a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 Folkestone, Kent: Japan Library, 1995.

鏡作坊，因此避劉安父諱。^①又如，司馬遷著《史記》避父諱“談”字，在《趙世家》改“張孟談”為“張孟同”，《佞幸列傳》改“趙談”為“趙同”。^②但是，《李斯列傳》的“韓談”，《晉世家》的“桓叔生惠伯談”，《孟子荀卿列傳》的“談天衍”，《魯仲連鄒陽列傳》中的太史公曰，“談說於當世”等多處，卻又不避談字。這有可能是避諱不盡，或後人回改；也可能是筆諱的家諱制度不嚴。馬王堆漢墓(M3)出土的竹簡帛書《養生方》《十問》有“蒼”字，《老子》甲乙本和《經法》也都有“倉”字（利蒼為M3墓主之父）。這個情況有很多種可能的解釋，還沒有定說。但是，今後出土簡帛的避諱字研究，應該多注意類似的情況，因為出土文獻往往有比較清楚的出土地點和時間序列，對於瞭解文獻的傳抄、生產、流傳等環節可能會有幫助。

傳世文獻對於秦漢的避諱制度沒有明確的記載，幾乎所有秦漢避諱的定說，都是依據漢唐傳注。但有些舊注的說解是有問題的。比如，秦莊襄王諱楚，最早見於東漢舊注：《漢書·高帝紀下》“荆王臣信等十人”，下注引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中華版，58頁）。《呂氏春秋·音初》“周昭王親將征荆”下，高誘注：“荆，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荆’。”以後的注家大多跟從此說。祇有晉代的晉灼指出：“《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唐代顏師古也同意這個說法。于省吾在《雙劍謬呂氏春秋新證》卷一更進一步引西周金文例證，說明秦莊襄王以前，楚已稱荆，或荆楚連文。所以，此處指楚為荆的“荆”，不一定是避諱字。由此可見，確定哪些是避諱字，哪些不是，不能盲目信從舊注。秦漢的避諱多代以義同或義近字。哪些是語言變遷的同義互換，哪些是真正的避諱字，也需要審慎考慮。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詞彙研究》中指出，以“滿”代“盈”（漢惠帝諱盈）是語言發展的趨勢。雖然漢代以後，避諱確實對“滿”字的推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實際上，在戰國後期，“滿”已經表現出強勁的勢頭。^③對於漢高祖劉邦的避諱字“邦”與“國”，也有學者提出類似的說法。^④但是，這一說法還缺乏堅定的證據。我們必須有確實未經回改的出土文獻材料證明，在漢高祖之前，“國”已經成為“邦”的同義詞，才能確定這個說法。如果沒有這樣堅定的證據，此說還值得再考慮。

胡適在《兩漢人臨文不諱考》雖然正確指出了“避諱制度和它種社會制度一樣，也曾經過長時期的演變，在那長期的歷程上，有時變寬，有時變嚴，有時頗傾向合理化，有時又變的更不近人情”，而且“我們不能輕易採用後世的嚴格避諱標準來做考訂古代文獻的

① 高去尋：《評漢以前的古鏡之研究並論淮式之時代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4（1948），8—14頁。

② 陳新會（垣）：《史諱舉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26—27頁。

③ 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詞彙研究》，華夏出版社，2002，211—216頁。

④ 黃金貴：《方·邦·國——古漢語詞義辨析》，載浙江語言學會編：《語言論叢》，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方法”^①，但是，他沒有對漢代避諱的原則作清理。“四百年避諱寬大”，到底寬大到什麼程度？說“兩漢人臨文不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因為這等於說，避諱沒有原則可循，避不避諱“臨文”而定。我們認為，一種制度能夠實行，就會有一定的原則。後來發生變遷，可能造成這些原則前後不一，自相矛盾，但是，這些基本的原則確是我們瞭解此項制度的基礎。作為避諱制度的原則，首先不是嚴或不嚴的情況，而是避諱的範圍的問題：有些領域要求避諱，有些地方則不用避諱，或可避可不避。

關於秦漢避諱，最主要的史料是《漢書·宣帝紀》的記載：宣帝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中華版，256頁）。從這一條史料可以推斷出三條避諱的基本原則：一、漢宣帝時的避諱原則是“生而諱名”，“避今上諱”；二、避諱是強制性的，不是可避可不避，不避諱是犯罪；三、至少在給皇帝上書時必須避諱。因此，我們可以假設，秦漢避諱的範圍是給皇帝看的民間上書、進呈書、皇帝的詔書等官方文書（我們姑且稱之為公領域），這類文書是要求避諱的；而其它領域（可稱私領域）的文書和著述，則不用避諱。

當然，有一種可能是，這些原則都是漢宣帝時期才開始，所以不能適用到其它時期。但是我想，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我們知道，秦漢時期已經有避諱制度，《漢書》所說的也只是宣帝改名，並不是宣帝改革以前的避諱制度。更何況，即使宣帝時的避諱制度與以前或以後的有出入，我們也可以用出土簡帛的實物材料來不斷驗證和修正這個假設，使之趨於完善。下面就以出土秦漢簡帛為例，看如何運用上述原則來解釋其中的避諱問題。

近四十年來，秦漢簡牘出土不少，為研究秦漢避諱制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的竹簡中就有避秦諱的例子。學者討論較多的是其中的《編年記》和《語書》。《編年記》共五十三簡，逐年記載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統一全國的戰爭過程等大事，和墓主人喜的生平經歷。原簡分上下兩欄，上欄記昭王元年到五十三年，下欄從昭王五十四年到秦始皇三十年。下欄沒有寫完，到第37簡而止。整理者認為，從字體來看，昭王元年到秦始皇十一年的大事，大約是一次寫成；不過，這一段時間內附載在國家大事之後的有關喜及其家事的記載，卻和秦始皇十二年以後的簡文一樣，字蹟較粗，可能是後來續補的。從《編年記》看，喜生於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在秦始皇時，十九周歲時進用為史，歷任安陸御史、安陸令史、鄢令史及鄢獄掾。秦始皇十二年，正是喜開始任獄掾的那一年。也就是說，這一本《編年記》是喜任鄢獄掾以後才開始使用，並將自己的家事追記上去。學者討論《編年記》中的避諱，大多舉第30簡下欄的記載為例：

① 胡適：《兩漢人臨文不諱考》，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0卷，《胡適集外學術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48—149頁。

[今]廿三年，興，攻荆。

整理者引本文之前曾提到的《呂氏春秋·音初》高誘注，以為此處的“荆”字是避秦始皇的父親莊王之諱。這一年是秦始皇二十三年。因此有學者以此判定這是秦始皇時避已經死去的莊王之諱，這樣秦代就實行“卒哭而諱”（即“生不諱”，死後才避諱）。^①對於“卒哭而諱”，顧炎武等就已經誤解其義，范志新《避諱學》已有駁正（164—167頁）。“卒哭而諱”本是指人死虞祭後，成為鬼神，敬避鬼神之名。和我們這裏所說的口諱、筆諱的避諱制度其實是兩回事。“生不諱”與我們前面討論的避諱的基本精神相矛盾，是極不合理的設想。但至於人死後是否還繼續避諱，避諱延續多久，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從《編年記》用“荆”字的現象，不能推斷出秦代的避諱是“卒哭而諱”這樣的結論。更重要的是，誠如上文所述，這裏的“荆”字根本就不能確定是避諱字。

《編年記》中另外經常引起討論的例子是其中的“正月”。秦始皇諱正。《史記·秦始皇本紀》：“生始皇……名為政。”《集解》：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正義》：“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二年]端月。《索隱》：“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云端月也。”但是，《編年記》有三處用“正月”：

簡3下欄：五十六年，後九月，昭死。正月，逮產。

簡14下欄：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

簡25下欄：十八年，正月，恢生。

以上簡文中的“正月”部分都是續補時書寫的。高敏已經指出，之所以直書“正月”而沒有因避秦始皇諱改為“端月”，是因為這一部分是喜的私人文書（儘管是接寫在記載國家大事的編年記上）^②，所以不用嚴格避諱。《編年記》對於死去的秦王用諡號稱“昭王”、“孝文王”、“莊王”，秦始皇稱“今”，這可能是當時的書寫習慣。《編年記》的後半部分可能屬於私文書，因此可以不避諱。這和我們前面關於秦漢避諱制度的假設是一致的。

睡虎地秦簡中值得討論的還有《語書》。《語書》寫在16簡上，是秦始皇二十年（前227）四月初二，南郡守騰頒發給本郡各縣、道的一篇公文。其中多處避秦始皇諱，改“正”為“端”，如“矯端民心”、“自端”、“公端之心”，所以是“避今上諱”。

從以上兩個例子來看，秦代避諱大致是遵守我們的假設，雖然“公”與“私”的領域問題還可以進一步再界定。

① B.J. Mansvelt Beck, "The First Emperor's Taboo Character and the Three Day Reign of King Xiaowen," *T'oung Pao* LXXIII (1987), pp. 68-85.

② 高敏：《雲夢秦簡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14頁。

下面我們來談談馬王堆出土簡帛的避諱情況。《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字體介於篆隸之間，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則是隸書。以下是馬王堆帛書中使用漢初三皇帝諱字的情況：

《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

	老子	五行	九主	名君	德政
邦（高祖）	22	1	16	11	0
盈（惠帝）	9	0	1	2	1
恆（文帝）	25	1	1	0	0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老子	經法	十大經	稱	道原
邦（高祖）	0	0	0	0	0
盈（惠帝）	9	1	4	2	3
恆（文帝）	29	14	16	2	2

很明顯，《老子》甲本不避高祖劉邦的諱，而《老子》乙本避劉邦諱。甲本卷後古佚書與乙本卷前古佚書的避諱情況也相似。前面已經提到，有學者試圖證明，以“國”代“邦”是語言的自然發展。但是，我們現有的所有以“國”代“邦”的例子，沒有一個是漢代以前的。因此，漢初文書以“國”代“邦”不是巧合，而應是避劉邦諱。而且，《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是非常系統而完全避“邦”字的，不大可能是偶然所致。

根據以上現象，前人的研究到這裏就馬上下結論。第一種意見主張“卒哭而諱”，認為甲本抄寫於高祖劉邦卒年以前（因此不用避劉邦諱），乙本則抄於惠帝或呂后時期（所以避劉邦諱，而不避惠帝、文帝諱）。^①而第二種意見主張“避今上諱”，認為甲本是劉邦稱帝以前抄寫（因此不用避劉邦諱），乙本則是在劉邦稱帝之後，劉盈稱帝之前抄成（所以避劉邦諱，而不避惠帝、文帝諱）。^②還有第三種意見，認為“漢初避諱未嚴”，如唐蘭認為《老子》甲本是漢初高祖末年或惠帝、呂后時期抄寫的，當時避高祖諱未嚴，而《老子》乙本是在文帝初年抄成。唐蘭斷代的主要根據是字體^③，即《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字體與同墓所出有文帝三年紀年的《五星占》很相似，抄寫年代可能在文帝時期”^④。

前面兩種意見都是在這些文本是嚴格避諱的基本前提下而進行推論的。雖然從睡虎地

①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出版說明》，文物出版社，1974；龐樸：《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之謎》，《文物》1977年第4期。

② 高亨、池曦朝：《試談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文物》1974年第11期；李裕民：《馬王堆漢墓帛書抄寫年代考》，《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4期，99-101頁。

③ 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

④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出版說明》，文物出版社，1980。

秦簡的避諱情況，李裕民已經注意到了秦代官方文書避諱較嚴，私人作品避諱未嚴的現象，但他進一步認為漢初的避諱嚴於秦代，因此帛書《老子》乙本等也都避劉邦諱。

但是，這一基本前提的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首先，這一假設沒有充分考慮秦漢避諱的複雜性，正如胡適所批評的那樣，簡單地套用後代嚴格避諱的標準，來作為判斷秦漢文獻年代的依據。其次，正如影山輝國所指出的，出土秦漢簡帛的實例表明，秦漢時期私領域的抄書基本上沒有避諱。^①

但是，影山輝國更進一步，竭力把所有的避諱字解釋成為語言發展的同義互換，試圖完全推翻用避諱字來斷代出土秦漢簡帛的可能性。這一點，本文並不認同。雖然秦漢的避諱制度比較複雜，我們不能輕易使用避諱字來判定文本年代，但也不能否認在一定的條件下，避諱字還是可以作為文本斷代的標準。這個條件就是，文本必須是屬於公領域的文書。公領域的文本必須避諱，因此，是否避諱就可以作為斷代的標準。至於如何界定公領域，目前還沒有很好的完整的解答，有待今後進一步研究。

至於私領域的文書，在避諱問題上，則是可避可不避，所以避諱字的有無不能作為斷定文本抄寫或寫作年代的標準。但是，如果私領域的文本也避諱，這樣通過考慮避諱的性質，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其它歷史因素。比如，馬王堆《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系統地避高祖劉邦諱，而且字體與抄於文帝三年的《五星占》相似，但是又不避惠帝諱、文帝諱，在以前的研究中，這些都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現在從我們假設的前提出發，因為是私人抄書，不用避諱，《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就可以依字體定為文帝三年抄本。而且，《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避劉邦諱的現象，就有可能是因為原來的底本是抄成於高祖劉邦在位期間，而且還是公領域內的文本，很有可能是漢中央政府供皇帝和近臣使用或分發給臣下的抄本。史籍記載漢初河間獻王劉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因此得以收藏整理很多書籍，可與漢朝廷的收藏媲美。淮南王劉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書、編書。漢初朝廷或許已有專門的寫書官，抄寫文書典籍。書籍在收藏與流傳的過程中都會留下一定的烙印。避諱字就有可能成為研究文本之間關係的一種重要資料和手段。劉殿爵對《史記》中有關秦的記載、《呂氏春秋》、《韓非子》三書秦諱的分析，已經開始了這樣的嘗試。^②

這樣，光從避諱字的角度來考慮，《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與《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一個不避劉邦諱，一個避劉邦諱，就不是時代早晚的問題，而是兩個可能是同時流傳的不同版本。當然，從字體考慮，或許也可以分出時代先後來。

綜上所述，我們在用避諱字的有無來判斷出土文獻的年代時，首先要對文本的性質有

① 影山輝國：《關於漢代的避諱》，《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92—298頁。

② 劉殿爵：《秦諱初探——兼就諱字論古書中之重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1988），217—289頁。

所瞭解。如果是公領域的文本，那麼避諱字的有無可以作為斷代的依據；但如果是私領域的文本，我們就不能直接用避諱字來斷代，而要仔細考慮避諱的緣由，幫助我們對文本歷史的瞭解。這個想法當然還祇是一個假設，需要在今後的簡帛研究中不斷經受檢驗。如果我們能不斷拓開思路，合理假設，小心求證，應當可以繼續推進秦漢簡帛中避諱現象的研究。

《奏讞書》題名等諸問題之再研究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 李力

內容提要 “奏”、“讞”二字為同義詞或近義詞，由其構成的“奏讞”這一複合詞應與之意義相近：作為動詞，即向上級請示報告之意；作為名詞，指請示報告的文書或指請示報告之事。其當源於“奏讞”這一司法程序。《奏讞書》之題名，當為其正本原有，且是法定名稱。今見《奏讞書》的性質，是有關向上級請示報告的司法文書彙編，且為抄本，其應另有正本。《奏讞書》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其編訂過程可能包括兩個階段，最終形成可能是在漢初。

關鍵詞 奏讞書 題名 性質 制作時代 編排形制

目前，關於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史料價值已經形成共識，但是學界對其題名及其性質等問題仍有爭議。本文擬在整理先期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探討其題名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問題。

一、關於《奏讞書》的題名

《奏讞書》與《二年律令》同出於棺內竹簡之中，有簡 228 支。其書題寫在《奏讞書》末簡（簡 228）背面，作“奏讞（讞）書”。整理小組注釋：“奏讞書，全書篇題，寫於末

簡背面。”^①

如何理解《奏讞書》題名之“奏讞”一詞呢？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認識。

(1) 整理小組從上級官府“議罪”的立場考證“讞”字，主張應訓其為請或疑。^②

對此，彭浩質疑：“《奏讞書》中少數案例不屬於奏讞而是審訊記錄，它們被編入書中的原因尚須研究。”^③日本學者小嶋茂稔認為，彭氏從《奏讞書》所收案例的性質，注意到整理小組對篇題的理解不夠充分，這一意見很有啟發性。^④汪桂海、蔡萬進則不贊同彭浩的質疑。^⑤

客觀地講，整理小組把著眼點放在“讞”字上，其不足之處在於：祇考慮“讞”字而忽略“奏”字，未將“奏讞”作為一個詞來把握，因而無法將書題與其所收案例在整體上統一起來。

(2) 張建國從“奏”字入手考察“奏讞”一詞，提出在《奏讞書》中，“除了讞的部分案例外，還有奏的部分文案”^⑥。

蔡萬進“不敢苟同”張說，通過對傳世和出土秦漢文獻中所見“奏讞”一詞含義的考察，認為“《奏讞書》之名與收錄文書性質正相一致”，“奏讞”在漢初已經成為一個固定用語，因而張說站不住腳。^⑦

誠如其所批評，張建國之說分“奏”、“讞”兩事，與“奏讞”在漢代已發展為一個合成詞相矛盾。不過，張說已認識到整理小組之說的片面性，這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3) 汪桂海、李均明與劉軍從下級官府向上級報告的角度，抓住貫穿於《奏讞書》的關鍵點來理解：案件有“疑”、“難”，因而要“向上級報告”。^⑧

①《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231頁。又，彭浩《湖北江陵出土前漢簡牘概說》（[日]大庭脩編輯：《漢簡研究的現狀と展望》，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93，110頁）曾說“書題在首簡的背面”，富谷至據《文物》1995年第3期《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二）》，推測彭浩的解說可能有錯誤（《秦漢刑罰制度的研究》，同朋舍，1998，18頁，注9；柴生芳、朱恆暉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序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9頁注①）。按，彭浩後在《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已更正。從圖版看，簡228之簡首有殘缺，其首字僅可見一半（下半部），整理小組釋之為“奏”字，無誤，但第一道編繩下是否與“二年律令”篇題一樣有“■”符，不得而知。或許其篇題之前原本無“■”符，與《二年律令》不同的是，《奏讞書》通篇祇見用“●”符而不見用“■”符，而且其中沒有章名。這是否也意味著什麼呢？應當引起注意。

②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文物》1993年第8期。《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3頁之【說明】。

③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

④[日]小嶋茂稔：《讀江陵張家山出土〈奏讞書〉劄記》，《アジア・アフリカ歴史社會研究》第2號（1997），4-5頁。

⑤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87頁。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35—36頁。

⑥張建國：《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式初探》，《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

⑦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33-35頁。

⑧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87頁。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258頁。李均明：《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是一部判例集》，載張伯元主編：《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7頁。

(4) 日本學者宮宅潔從整個案件的訴訟過程考慮，認為《奏讞書》所收二十二個案例的共同點在於，無論其有無疑義都要向上級報告。^①

(3)、(4) 兩說均圍繞“向上級報告”來理解《奏讞書》這一題名，或許更接近於《奏讞書》原編者的意圖。

由上可知，各家關於“奏讞”一詞的認識不一，因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關於“奏”字，《說文》：“奏，進也”，“上進之義”，學界對此並無爭議。而“讞（讞）”字，並非張家山漢簡獨見，睡虎地秦簡已有多處，大致有以下兩種用法：

其一，《秦律十八種·徭律》簡 121-122 有三例：①“縣毋敢擅壞更公舍官府及廷，其有欲壞更殿（也），必讞之。”②欲以城旦舂益為公舍官府及補繕之，為之，勿讞。③縣為恆事及讞有為殿（也）。”整理小組注釋：“讞（音硯），即讞字，《後漢書·申屠蟠傳》注：‘請也。’”^②學者也多認為，該“讞”字是向上級請示的意思。^③

其二，《法律答問》簡 53-54：“‘有投書，勿發，見輒燔之；能捕者購臣妾二人，毆（繫）投書者鞠審讞之。’所謂者，見書而投者不得，燔書，勿發；投者【得】，書不燔，鞠審讞之之謂毆（也）。”整理小組注釋：“讞（音硯），《說文》：‘議罪也。’古書也寫作讞或獻。”^④該“讞”字為秦簡新增字^⑤，是與治獄有關聯的讞之事例^⑥。

由此可見，起碼在戰國晚期的秦國和秦朝，除“議罪”之義外，“讞”字也有“請示”之義。漢初的“讞”字，亦當源於此。這是針對案情有疑難而言的，故後世亦訓為“疑”。《廣雅·釋言》：“讞，疑也。”王念孫疏證：“疑之言擬議也。”^⑦

從秦漢時期的用例看，“讞”字當時是否可以直接訓為“疑”字，目前尚不能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奏”、“讞”二字，均係動詞，為同義詞或近義詞，由兩者所構成的複合詞“奏讞”，應與之意義相近。“奏讞”一詞，作為動詞，即向上級請示報告之意；作為名詞，即指請示報告的文書或指請示報告之事。因此，該詞當源於“奏讞”這一司法

① [日]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日]棚山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91 頁。按，池田雄一專門考察“讞”、“讞”兩字字形在字書中的變遷及讀音，最後確認其在日語中的讀音。參見[日]池田雄一編《奏讞書——中國古代的裁判記錄》，刀水書房，2002，15-27 頁。又，關於“讞”字在傳世文獻中的用法，參見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故訓彙纂》，商務印書館，2003，1345、2157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47、48 頁。

③ 魏德勝：《雲夢秦簡與〈說文〉的用字》（《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巴蜀書社，2002，280 頁）、《〈睡虎地秦墓竹簡〉辭彙研究》（華夏出版社，2003，21 頁）；[日]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291 頁注②。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106 頁。

⑤ 郝茂：《秦簡文字系統之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349 頁。

⑥ [日]池田雄一：《江陵張家山〈奏讞書〉について》，《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 中國古代的國家と民衆》，汲古書院，1995，115 頁。

⑦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五下，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158-159 頁。

程序，後來引申用為對於一般事項的請示報告。這樣的用例，在傳世文獻中也並不少見。^①

據考，“奏讞”在漢初即是一個規範的固定用語，其義由高祖七年“讞疑獄詔”而起。^②以張家山漢簡所見，結合《史記》、《漢書》的用例分析，它至遲在漢初已成為一個合成詞。不過，認定其義起自高祖七年恐有不妥，因為從《奏讞書》案例十六（高祖六年新郢縣上報重審的謀殺案）可知，在西漢王朝正式建立（高祖五年）後，奏讞制度就已經實施。高祖七年的“讞疑獄詔”，祇不過是以詔令形式將各地發生的“讞疑獄”統一規定下來。然而，漢初的“奏讞”制度或許沿襲自秦律，因而“奏讞”一詞的形成和使用，也不排除有始於秦的可能性。但這一點仍有待於新史料的證實。

正如學者所歸納的，“奏讞一詞從狹義上來看，是指漢高祖七年時實施的疑難案件上奏的制度。從廣義上來說，就是疑獄的意思，《奏讞書》作為篇題應指廣義上的疑獄，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涵蓋其全部的內容”^③。這與《奏讞書》二十二則案例的形式特徵是吻合的^④。因此，以“奏讞”為題名，是與其整個體例安排相一致的。

在作為題名的“奏讞書”一語中，“書”是其中心語，“奏讞”是一個複合動詞，修飾“書”。從字面解釋，該題名就是有關“奏讞”之“書”。但是，此處的“書”字究竟是何意，整理小組並未注釋。作為篇題的組成部分，該“書”字如何理解也是很重要的。

從目前所見簡牘的語境來分析，大致可有兩種理解：一為書籍，一為文書。前者是其發掘者、整理者的理解，這從《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前引2001年整理小組對於簡228的注釋，以及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第一段的行文，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是從考古學、文獻學的角度對出土資料進行的分類，即書籍類。後者是一般性的理解，如張建國、汪桂海以及李均明、劉軍與蔡萬進。^⑤

① 經電腦檢索，見於《史記·儒林列傳》、《酷吏列傳》、《漢書·兒寬傳》、《張湯傳》、《後漢書·郭躬傳》、《魏書·刑罰志》、《隋書·趙綽傳》、《北史·趙綽傳》、《舊唐書·刑法志》、《新唐書·百官志》、《刑法志》、《李昭德傳》、《宋史·仁宗一》、《甯宗一》、《職官志三·刑部》、《刑法志一》、《刑法志三》、《后妃傳下·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傳》、《王存傳》、《章誼傳》、《尤袤傳》、《遼史·耶律儉傳》、《金史·宣宗紀中》、《刑法志》、《明史·楊繼盛列傳》、《宦官列傳一·劉瑾列傳》、《奸臣列傳·陳瑛列傳》、《清史稿·刑法志一》、《王拯傳》、《傅鼎傳》。

②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35頁。

③ 曹旅寧：《〈奏讞書〉考述》，氏著《張家山漢律研究》，中華書局，2005，273頁。

④ 即：（1）“最接近原件式樣的當為第三例”；（2）“郡府上報廷尉的奏讞格式當如第十四則案例所見”；（3）“有些案例，形式簡單，表述精練，甚至省略了許多具體的犯罪事實，而僅摘錄主要事實及結論”，“《奏讞書》所見此類形式的案例凡八則，皆無通行文書必備的時間要素，實際上已條款化，絕非奏讞書的原始面目”；（4）“所引三則奏案，側重點不在定罪量刑上，而是突出案件的偵破過程、方法及糾正錯案，所以有關行為情節之描寫細緻入微，篇幅較長，尤以第二十二則案例所見最典型”；（5）“所引二則春秋案例亦有其特殊性，其一涉及炊事食品，以重複操作及試驗方式檢驗告訴的合理與否，無疑可補正律條款所缺；其二，涉及儒者等特殊人群，具參照意義”，“儘管有以上種種差異，《奏讞書》二十二則案例仍有明顯的共性，即每則皆為針對疑難案件的奏文，祇是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而已”。（李均明：《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是一部判例集》，《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13—17頁。）

⑤ 張建國：《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式初探》，《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87-88頁。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185—186頁。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36頁。案：睡虎地秦簡有“語書”，整理小組注釋：“語書意為教戒的文告。”（《睡虎地秦墓竹簡》，16頁）“文告”，亦即文書。

對“奏讞書”之“書”字的這兩種理解，倒是符合簡帛文獻學的分類，即按簡牘帛書內容的性質來劃分，可分為：（一）書籍；（二）文書。^①

不過，僅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和《奏讞書》而言，究竟何者為書籍，何者為文書，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張顯成按其內容性質，將《二年律令》歸入“書籍”一類中的“史書”項，《奏讞書》歸入“文書”一類中的“司法類文書”。^②而李均明、劉軍則按其自身性質分簡牘文書為“書檄類”、“律令類”等，並將《二年律令》歸入“律令類”之中，將《奏讞書》歸入“書檄類”之“書”中。二者都是文書，非書籍。^③汪桂海僅將《奏讞書》納入漢代官文書之“司法文書”中^④。顯然，將《二年律令》歸入“書籍”類是不合適的。

仔細推敲，關於“奏讞書”的這兩種理解，相互間也並不矛盾；但是，應該分清其不同語境下的不同含義，把話說得更明確些，否則就容易產生誤解。另外，張建國與蔡萬進的理解，還算是扣住了“奏讞書”之“書”這一中心語，其它的幾乎都將重心放在“案例”或“案例彙編”上，並沒有從正面解釋該題名。這是僅從其文書的內容來說的。如此解釋題名，恐怕是不夠充分的。

完整的理解應該是這樣的：“奏讞書”作為題名，是指向上級請示報告案件審判情況的文書。同時，其彙編成冊者，也可稱為《奏讞書》。因此，較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今見《奏讞書》中包括了二十二件有關向上級請示的司法文書，從中可以見到二十二個案例。如此，就要重新審視《奏讞書》的性質。

二、關於《奏讞書》的性質

目前的研究“現狀是，仍舊沒有充分討論《奏讞書》是有怎樣性質的史料這一問題，祇是正在積極地進行利用《奏讞書》的實證研究”^⑤。但是，不解決其性質問題，將會影響實證研究的深入。關於《奏讞書》的性質，迄今大致有以下幾種看法。^⑥

①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226頁。

②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228、247-249頁。案：該書將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語書》，視為書籍類之“史書”。與下注李均明之說比較，恐怕值得商榷。

③ 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252、371頁。按，該書出版時，《二年律令》尚未公佈，故其中無法具體列出，其中已指明這點。又，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列入“律令類”之“律”，《語書》在“書檄類”之“書”中單列，《法律答問》在“律令類”中單列，《封診式》單列入“律令類”之“式”。

④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87頁。

⑤ [日]小嶋茂稔：《讀江陵張家山出土《奏讞書》劄記》，《アジア・アフリカ歴史社會研究》第2號（1997），1頁。

⑥ 這裏的歸納未必準確，祇是為了敘述方便。日本學者的相關歸納，參見[日]宮宅潔《漢代諸讞考——理念・制度・現實——》，《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1號（1996），30頁注41。[日]小嶋茂稔：《讀江陵張家山出土《奏讞書》劄記》，《アジア・アフリカ歴史社會研究》第2號（1997）。

“議罪案例彙編”說。李學勤及整理小組持此說。1985年的概述，基於對“讞”字的理解，認為“竹簡《奏讞書》正是這種議罪案例的彙集”。而“睡虎地秦簡有《封診式》，書的性質是作為文書格式的若干案例。《奏讞書》案例的內容一般比《封診式》更為重大”，“在一定意義上可視為‘比’的濫觴”。^①2001年仍堅持此說。^②這已為簡帛文獻學者所接受。^③

“議罪案例的選編”說，或“部分奏讞案例彙編”說。彭浩主張此說。在1992年日本關西大學漢簡研究國際專題討論會上，彭氏提出：“奏讞是漢代治獄的一種制度。凡縣道官治獄所見疑難案件須上報至郡斷決，所不能決者移送廷尉，廷尉不能決者，奏聞皇帝裁決。《奏讞書》是這種議罪的選編，共有二十多件。它是治獄官吏學習法律、斷治獄事的必讀書籍。”^④小嶋茂稔評論說，從推測《奏讞書》在被完成之前為凡例集這點上看，可以說這是一種新見解。^⑤不久，彭氏又說“把一些奏讞案例彙編成冊，就形成了《奏讞書》”，“是供縣、郡司法官學習法律和斷治獄事使用的”。^⑥前後兩說，略有差異。由此來看，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過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其性質的困惑，以及由此造成的對其性質認識的不確定性。

“奏書”、“讞書”兩類說。張建國提出此說。這也是今見直接反對整理小組之說者。他強調，整理小組“議罪案例的彙集”說似乎欠妥，其解釋並不全面。這部《奏讞書》“除了讞的部分案例外，還有奏的部分文案，也許我們可以分別稱它們為‘奏書’和‘讞書’，所以不妨在理解時將它們視為兩類。以上所說的一些案例屬於上奏文書即奏書，它們之所以需要上報，大概是因為犯罪者是長吏，有些還具有較高的爵位，或者是死刑案件必須上奏朝廷批復，這些雖然不存在疑問，但審判機關是不能直接根據審判結果執行刑罰的”，而“請求上級批准是這類文書的特性”。“至於‘讞書’，當然也需要上報，但上報的目的，是要求上級解答疑問”，“而上級接到讞書後要‘報’即回答該案應適用什麼罪名或什麼刑罰，這一套程式在史籍中通常記載成報讞。所以，請求上面就疑難案件作出決斷是這類文書的特性”。^⑦

蔡萬進認為，“奏書”和“讞書”兩類說是站不住腳的。^⑧另外，曹旅寧也批評說“這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文物》1993年第8期。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3頁【說明】。

③ 其又說：“是供官吏工作參考或學吏者閱讀應用的文書，猶今供司法部門在辦案量刑時參考的案例彙編。”見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249頁。

④ 彭浩：《湖北江陵出土西漢簡牘概說》，《漢簡研究的現狀與展望》，127頁。

⑤ [日]小嶋茂稔：《讀江陵張家山出土〈奏讞書〉劄記》，《アジア・アフリカ歴史社會研究》第2號（1997），4—5頁。

⑥ 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

⑦ 張建國：《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式初探》，《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

⑧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32—35頁。

仍未完全解決名實相符的問題”，而“《奏讞書》最後一則‘典羸告曰’的最後一簡背面有《奏讞書》的題名，說明在編者的心目中，秦時的這個微難獄、兩個復審案以及兩個用東周的素材編成的疑案故事也是屬於奏讞書的，學者把奏讞書分為奏書、讞書兩個部分顯然是不能成立的”^①。

客觀地講，彭浩、張建國對整理小組的批評有一定道理，蔡氏、曹氏對張建國的批評也有合理之處。

“疑難案件的報告”說。李均明等主張。認為《奏讞書》屬於“書檄類”之“書”的一種，是“有關疑難案件的報告”^②。

“審判記錄”說。宮宅潔所持。他認為：“在‘向上級報告（即讞）的審判記錄’這一共同點下，以各種不同的專案將性質不同的史料聚集起來，這就是《奏讞書》。所以在利用它的時候，有必要將各個案件為何會被記錄下來的原由加以分析”^③。同時“必須將問答形式的法律運用注釋書之傳統（雲夢秦簡《法律答問》等）的系譜納入視野”^④。

“審判案件集”或“判例集”說。池田雄一、富谷至、李均明的認識。池田認為，《奏讞書》彙集了春秋時期到西漢初期所作的判決。那些沒有順利裁決的複雜案件，也記錄了從告訴至判決的過程。^⑤而且《奏讞書》就是編者以作為治獄或製作讞的指南、參考之公文書為基礎編輯而成的。^⑥富谷至主張，《奏讞書》是“從春秋至西漢時代二十餘件之審判案件集”^⑦。李均明也認為，《奏讞書》“皆為有關疑難案件的審理報告及批復，是迄今能見到的最早的判例集”。^⑧

“私人性的備忘錄”之說。小嶋茂稔的看法。他提出，與其把《奏讞書》看作一部彙集而成的書籍，不如說其內容分成若干類，而且它們可以說是形形色色的；可以搞清楚的是，很難簡單地把它視為“有一定目的所編的且具有統一性的書籍”。該墓主按照自己職務的需要而製作為私人性備忘錄的可能性相當大。因為是從原資料摘出來需要的部分，所以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就成為恣意性很強的史料。^⑨

“私家性質的法律案例彙編”說。曹旅寧提出。其理由是，從其編排看，“顯然帶有

① 曹旅寧：《〈奏讞書〉考述》，《張家山漢律研究》，268、270頁。

② 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252頁。

③ [日]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291頁。

④ [日]宮宅潔：《漢代請讞考——理念・制度・現實》，《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1號（1996），30頁注41。

⑤ [日]池田雄一：《〈奏讞書〉解題》，《奏讞書——中國古代的裁判記錄之“序章”，3頁。同：《江陵張家山〈奏讞書〉について》，《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 中國古代的國家と民衆》，122頁。

⑥ [日]池田雄一：《江陵張家山〈奏讞書〉について》，《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 中國古代的國家と民衆》，122頁。

⑦ [日]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序言”，13頁。又，中文本《秦漢刑罰制度研究》，“序言”，7頁。

⑧ 李均明：《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是一部判例集》，《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13頁。

⑨ [日]小嶋茂稔：《讀江陵張家山出土〈奏讞書〉劄記》，《アジア・アフリカ歴史社會研究》第2號（1997），20頁。按，其還推測，可能“是由被葬者的前任所傳下來的內部製作的手冊”。同上，27頁注釋59。

雜抄的性質，這與張家山漢簡中‘津關令’和在居延地灣出土的西漢施行詔書目錄按年代編排正好相反”^①。

雖然以上諸說有分歧，但是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大類：（1）“奏書”、“讞書”類；（2）案例或判例彙編（集），或審判記錄，或疑難案件報告類；（3）“私人性的備忘錄”。可見，大多數學者是將目光放在《奏讞書》的內容上。顯而易見，這幾乎都是從用途和功能的立場來思考的。

但是，如果認為其編纂的目的是出於“私人性的”，就很難說得通。因為在“法令由一統”的帝制時代，嚴禁任何個人私自造法律，同樣恐怕也不許個人隨意編纂與法律和審判有密切關係的司法文書。認定“私人性的”出發點，主要是從該奏讞書的用途方面考慮的，顯然是將今見《奏讞書》與其正本混為一談了。

準確地講，正如前所述，若從題名來分析，考慮其性質時應該將著眼點放在文書上。實際上，整理小組最後也多多少少認識到了這一點：“不少案例是完整的司法文書，是當時的司法訴訟程式和文書格式的具體記錄。兩個春秋時期的案例並不是司法文書，祇是事例的記述。”^②因此，簡言之，今見《奏讞書》的性質，就是有關向上級請示報告的司法文書彙編。

還要注意到這樣一個比較一致的傾向：今見《奏讞書》為抄本^③。可以肯定，今見竹簡《奏讞書》必是抄本，是墓主生前審判時使用過的本子。此外，朝廷另外當有一個《奏讞書》正本^④，供各地郡縣官吏複製、抄寫，用以學習和指導審判工作。當時，“也祇有廷尉有條件將這些奏讞而來的文書‘以類相從’，彙編成冊”^⑤。但是，各郡縣是以什麼原則來選擇和抄寫的，其情況不詳。

三、關於《奏讞書》的製作時代和編排形制問題

這是兩個緊密相關的問題。關於時代問題，具體包括兩個層次：一是今見《奏讞書》所收二十二件文書，其各自的制定成文時間；二是作為一個整體，《奏讞書》的編訂年代。

其一，由於《奏讞書》的“作用應為供官吏工作參考，或學吏者閱讀的文書程式。所輯

① 曹旅寧：《〈奏讞書〉考述》，《張家山漢律研究》，270頁。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3頁【說明】。

③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文物》1993年第8期。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88頁。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45—46頁。曹旅寧：《〈奏讞書〉考述》，《張家山漢律研究》，270頁。李均明：《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是一部判例集》，《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13頁。

④ 蔡萬進的提法是“足本的《奏讞書》”（《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46頁）。“足本”對應“節本”，“抄本”則對應“正本”。“正本”一詞較為準確，因此這裏使用“正本”。

⑤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45頁。

案例均係實有”^①，其成書自然就在各案例所屬的時代^②。因此，可以斷定，各件文書的製作成文時間基本上與該案件發生和審理之際的時間相近，而比之略晚一點。

關於各個案例的時間，(1) — (16) 為漢高祖六年至十一年（其中，6-13 屬於高祖時期，無具體時間）。而 (17) — (22) 中，除了 (19)、(20) 之外，或認為其中祇有三個是秦的，另一個係漢初的；^③或認為這四個都屬於秦^④。(18) 為秦代初期（秦始皇二十七至二十八年），(22) 為戰國時期的秦國（秦王政六年）。比較有爭議的是 (17)、(21)。

關於 (17)，目前有兩說：一為戰國時期秦國說^⑤，一為秦代說^⑥。無論如何，確定其屬於秦則是沒有問題的。

關於 (21)，也有兩說：一為漢初說^⑦，一為秦代說^⑧。或認為“此案屬秦或漢初都有可能，所反映的社會關係應該是秦到西漢初”^⑨。筆者的意見傾向於秦代說^⑩。

此外，關於 (19) — (20) 所屬的時代，情況則略微複雜些。1985 年的概述最早認定此“兩條係春秋時期案例”^⑪。後來，李學勤、彭浩及其主持的整理小組仍堅持此說^⑫。李均明贊同其屬春秋時期^⑬。而宮宅潔則認為，(19)(20) 均假託為春秋時期的案件。“前者假託為衛之史猷審理之案”，而“與此主旨同一的內容又見《韓非子·內儲說下》，取代衛君的是晉文公與平公。由此可見，這是一個主旨相同而祇有人物替換、流傳甚廣的史話，

①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文物》1993 年第 8 期。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96 頁。

②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96 頁。

③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下）》，《文物》1995 年第 3 期。李均明：《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是一部判例集》，《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13 頁。

④ 彭浩：《談〈奏讞書〉中秦代和東周時期的案例》，《文物》1995 年第 3 期。周守晉：《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5 頁。

⑤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下）》，《文物》1995 年第 3 期。《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22 頁注〔1〕。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40 頁。曹旅寧：《張家山漢律研究》，151、273 頁。

⑥ 彭浩：《談〈奏讞書〉中秦代和東周時期的案例》，《文物》1995 年第 3 期。張建國：《關於〈奏讞書〉的幾點研究及其它》，《國學研究》第四卷，530 頁。黃人二：《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第十七簡釋》，簡帛研究網，2002 年 3 月 9 日。

⑦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下）》，《文物》1995 年第 3 期。陳公柔：《雲夢秦墓出土〈封診式〉簡冊研究》，《燕京學報》新三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40 頁。徐世虹：《漢簡所見勞役刑名資料考釋》，《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一輯，巴蜀書社，1999，92 頁。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96 頁。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40 頁。曹旅寧：《〈奏讞書〉考述》，《張家山漢律研究》，285 頁。

⑧ 彭浩：《談〈奏讞書〉中秦代和東周時期的案例》，《文物》1995 年第 3 期。張建國：《關於漢簡〈奏讞書〉的幾點研究及其它》，《國學研究》第四卷，539-540 頁。〔日〕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290 頁。〔日〕池田雄一：《秦代之律令について》，《紀要》中央大學文學部史學科 42 號（1997），71-73 頁。〔日〕學習院大學漢簡研究班：《秦代密通・盜傷事件——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を讀む》，《學習院史學》第 39 號（2001），120 頁。

⑨ 邢義田：《秦或西漢初和秦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 247 號墓〈奏讞書〉簡 180-196 考論》，《經義折獄與傳統法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4-5 日，8-1 頁。

⑩ 詳見拙作《張家山漢簡所見“隸臣妾”身份再研究——以〈二年律令〉和〈奏讞書〉為根據》，待刊。

⑪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⑫ 彭浩：《湖北江陵出土西漢簡牘概說》，《漢簡研究的現狀與展望》，172 頁。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下）》，《文物》1995 年第 3 期。《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3 頁。

⑬ 李均明：《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是一部判例集》，《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13 頁。

不能據史獸的出現而而斷定此案為春秋衛國的審判記錄”。^①彭浩後來則主張，(19)的成文時間約在戰國時期，(20)的成文時間約在東周時期。^②裘錫圭也提出，《奏讞書》(19)(20)為託名，其所反映的，實際上恐為戰國較晚時期的情況。^③曹旅寧認為，(19)(20)這兩個案例是用古代的素材比照當時罪名編成的。^④蔡萬進認為，(19)(20)雖係漢人轉述，但必有所據、所本。^⑤

春秋時期，衛國和魯國是否確實有這樣的案子存在，今難以考證。另外，其是否託名，現在也祇是學者的推測，仍有待進一步證實。不過，至少可以斷定，今見這兩份文書都已不是從司法文書原件（假定曾有過這樣的案子）中摘錄的，而是據某種素材改編的，其改編時代最早當在戰國晚期，晚則在秦朝，至遲也可能在漢初。

學者就其排列結構，有種種推測。如，彭浩曾指出，“就《奏讞書》全部簡文來看，其編排次序大致是年代較早的案例居後，年代較晚的在前，也就是說，西漢時期的案例位於全書的前部，秦代案例位於其後，兩件東周時期的案例則插編在秦代案例中。在全部 22 件案例中，西漢時期的有 16 件。這種編排與西漢時期的司法需要是相適應的”。^⑥整理小組最後確認，今見《奏讞書》“包含春秋至西漢時期的二十二個案例。大體上是年代較早的案件排在全書的後部，較晚的案例則排在前部”。^⑦李均明也說，“就時代而言，《奏讞書》包括春秋案例二則、秦始皇前後案例三則、西漢初時案例十七則。簡冊大體按年代的早晚順序排列，年代晚的居前，年代早的居後，尤其漢初的案例基本按年代由晚及早排列，但漢以前的案例有些混雜，如秦案例之間夾雜了春秋案例”。^⑧

為何以此順序排列，整理小組並沒有詳細說明。宮宅潔則推定，前半部分是漢代案件，後半部分是春秋至秦案件，這種年代近者排在前的排法，可能是從書名位置類推出來的。^⑨

這種結構很有可能是基於編輯時期的司法實踐的需要，但是否可以認為這實際上反映出其編輯的過程或其成書是分為兩個階段來進行的呢？

其二，作為一個整體，《奏讞書》的編訂年代如何？有以下不同的看法。

彭浩說：“似乎可以認為，同時在一個墓葬中出現了《奏讞書》和《二年律令》，應反

① [日]宮宅潔撰、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289—290 頁。

② 彭浩：《談〈奏讞書〉中秦代和東周時期的案例》，《文物》1995 年第 3 期。

③ 裘錫圭：《先秦古書中的錢幣名稱》，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集，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20 頁“附記”。此文承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張忠偉先生相告，在此致以謝忱。

④ 曹旅寧：《〈奏讞書〉考述》，《張家山漢律研究》，271—272 頁。

⑤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44—50 頁。

⑥ 彭浩：《談〈奏讞書〉中秦代和東周時期的案例》，《文物》1995 年第 3 期。

⑦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3 頁。

⑧ 李均明：《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是一部判例集》，《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17 頁。

⑨ [日]宮宅潔撰、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291 頁。

映它們形成的時間是相近的，即在呂后時期已經形成了。”^①宮宅潔則“推測是在高祖十年至惠帝初年書寫的”。^②蔡萬進“認為《奏讞書》的編訂年代有可能在高祖十一年八月至惠帝二年蕭何去世之間，惠帝二年至呂后二年間已在各級官府和司法機構流傳，並被官吏抄寫學習。它的編訂與蕭何‘摺摭秦法，作漢律九章’有可能是同時的，內中秦漢案例並存也同時與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的原則一致”。^③

宮宅潔與蔡萬進所界定的時間比較接近。尤其是，後者推定由蕭何所編纂。這是很有可能的。其說或可從。

那麼，朝廷當時是如何編選《奏讞書》的呢？目前，基本可以確認的是，“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諸奏讞案例並非奏讞文書原件照錄，編錄者為適應《奏讞書》體例和發揮《奏讞書》教育功能作用的需要，在官府保存的奏讞文書原件基礎上曾進行剪裁加工，其原始形態，隨著里耶秦簡文書實物今後的大量公佈而有望復原”。^④

另外，宮宅潔也質疑：其“整體內容是否一次性書寫的”？^⑤這種質疑發人深省，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性。因此，是否可以這樣假設：與《二年律令》的編訂進程相似，《奏讞書》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其編訂過程可能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

第一階段，開始於秦，甚至戰國晚期的秦國早已有類似的編訂工作，（17）、（22）可能就是在那時編纂整理的；秦代繼續沿用這一傳統，（18）、（21）即是秦代所編纂的；而（19）、（20）這兩個東周時期的案例，則可能是秦統一天下後，在全國推行秦律的過程中，參考並吸收他國法制文化成果的結果。關於這一點，可供參考的是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所附《魏戶律》、《魏奔命律》。^⑥而從文書程式上講，《奏讞書》與睡虎地秦簡《封診式》也有相近之處。^⑦這實際上也正是秦漢時期編纂這類文書的延續性的一種反映。

① 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

② 詳見[日]宮宅潔撰、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288頁。

③ 詳見蔡萬進：《奏讞書編訂成書年代蠡測》，《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39—141頁。同：《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50—54頁。

④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144頁。

⑤ [日]宮宅潔撰、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288頁。

⑥ 關於《為吏之道》的性質、寫作時代和國別，有不同看法。詳見：①《睡虎地秦墓竹簡》，167頁。②高敏：《秦簡〈為吏之道〉中所反映的儒法融合傾向——兼論儒法諸家思想融合的歷史演變》，《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238—252頁。③舒之梅：《珍貴的雲夢秦簡》，《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5頁。④黃盛璋：《雲夢秦簡辨正》，《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⑤張永成：《秦簡〈為吏之道〉之版式及其正附文問題》，《簡牘學報》第10期，（臺北）簡牘學會，1981，67—70頁。按，各說均為推測。但將魏律抄錄於此，當與墓主從事審判有關，由此可見秦國法律借鑒魏國法律之事實。正如李解民所說：“秦簡特別抄錄了這兩條《魏律》，表明秦政府在對付這類人方面還缺乏辦法而需要國外的借鑒。”（《睡虎地秦簡所見魏律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987年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1頁。）

⑦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上）》，《文物》1993年第8期。

第二阶段，漢初承秦制，大規模整理、編纂這一類文書，逐漸、隨時地增加新的文書，(1) — (16) 就是當時新增編的。

據研究，《奏讞書》的材料來源，至少有三：①漢高祖時期全國各地郡縣道呈送廷尉的奏讞；②漢元年蕭何所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③先秦諸子著作或儒家經典。(1) — (16) 來自①，(17)、(18)、(22) 當也取自②，(19)、(20) 雖係漢人轉述，但必有所據、所本，肯定源於③。^①此說在某種程度上，又與上述《奏讞書》編訂於兩階段的假說，有部分相合之處，可供參考。

“依簡牘通例，‘奏讞書’三字應係漢初時人對該簡冊的正式稱謂。”^②因此，不論《奏讞書》是分秦、漢兩個階段完成的，還是在漢初一並編訂的，其最終的形成或許就是在漢初。這也可以與其出土時所見卷冊的形制相合。

據《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所示，《奏讞書》屬 E 組，在竹簡區的右上部分，其左上方按逆時針方向，依次與《曆譜》(B 組)、《二年律令》(C 組)、《脈書》(D 組)、《蓋廬》(G 組) 零星地相鄰接，其下部為《引書》(I 組)。與《二年律令》不同的是，它出土時卷制的形態保留得較為完好。^③其篇題獨立書寫在全卷最末一支簡的背面，屬於“傳統所說‘篇題在後’”。其卷冊收卷所採用的是不常用的收卷法，“從文首開始卷，卷好後首簡在卷捆中心，文末簡在卷捆外面”。說明當時篇題的書寫位置，“處於比較隨意而不固定的階段”^④。

由《竹簡整理號與出土號對照表》可知，《奏讞書》簡的極少數由於擠壓竄入下邊的 I 組(約 30 支)。^⑤《二年律令》之編聯存在的問題較多，相對而言《奏讞書》的編聯則做得較好。

不過，還須注意的一點是，富谷至曾經提出，必須認識到《奏讞書》與《二年律令》，即使同是與法律有關的冊書，其性質也是不同的：前者是作為檔案簡，後者則是被編纂而成的律書。法律的各條文在某個階段被彙集完成後成為編纂物、書籍，這也可以從文獻史料有關律令編纂的說明窺其一斑。但是，在其之前的階段是作為檔案簡，它很快就會以書籍的形式固定下來。就是說，《奏讞書》、《封診式》還有《秦律十八種》這樣的檔案，在某個階段會成為《二年律令》式的書籍，換言之，最後所寫的標題終於就寫在首簡的背面。^⑥

可以說，《奏讞書》這一題名，當為其正本原有，而且是其法定名稱。與《二年律令》的情況一樣，在帝制時代的初期，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剛建立不久，承擔管理國家和社會

①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44—50 頁。

②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32 頁。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附錄二。

④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166、168、170 頁。

⑤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附錄一，314—316 頁。

⑥ [日]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序言”，15—16 頁。又，中文本《秦漢刑罰制度研究》，“序言”，9—10 頁。

事務的官吏，如何更好地運行法律？皇帝怎樣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司法權？這成為擺在統治者面前的重要問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封診式》，就是當時解決這些問題的措施之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功能也應當如此，也“有可能是奏讞制度確立伊始西漢政府首次從事的大規模整理奏讞案例的司法活動的產物”。^①

正如日本學者池田雄一所說的，“《奏讞書》的出現恰恰是‘法治’國家出現的反映。不言而喻，這是為擔任審判的官員編纂的書籍。因為有枉法的官吏存在，所以編纂這樣的書籍就變得十分必要”。^②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奏讞書》這一題名不可能是私人所確立的；《奏讞書》正本及其抄本，也絕不會是由個人所編纂的。

四、結論

綜上所述，圍繞《奏讞書》的題名及其性質、製作時代和編排行制問題，可形成如下的認識：

第一，“奏”、“讞”二字，均係動詞，為同義詞或近義詞，由兩者所構成的複合詞“奏讞”應與之意義相近，即向上級請示報告之意，也指請示報告的文書或請示報告之事。其當源於“奏讞”這一司法程式，後引申擴大為一般事項的請示報告。在漢初即是一個規範的固定用語，但其形成和使用也不排除有始於秦的可能性。《奏讞書》這一題名，當為其正本原有，而且是其法定名稱。“奏讞書”，是指向上級請示報告案件審判情況之文書，也可作為其彙編成冊者之名稱。

第二，今見《奏讞書》的性質，是向上級請示報告的司法文書彙編，且為抄本。它是墓主生前審判時使用過的本子。此外，朝廷當另有一個《奏讞書》正本，供各地郡縣官吏複製、抄寫，以用來學習和指導審判工作。

第三，从目前所見《奏讞書》簡冊的形制，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假說：與《二年律令》的編訂進程相似，《奏讞書》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其編訂過程可能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第一階段，開始於秦，甚或戰國晚期的秦國已有類似的編訂工作，而秦代繼續沿用，這一傳統。第二階段，漢初承秦制，大規模整理、編纂這一類文書。但是其最終的形成，或許是在漢初。

（附記：本文根據《簡帛研究》匿名評審編輯提出的寶貴意見修改。特此致謝！）

①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69頁。

② [日]池田雄一：《〈奏讞書〉解題》，《奏讞書——中國古代的裁判記錄》之“序章”，6頁。

張家山漢簡《津關令》“越塞闌關”諸令考釋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陳偉

內容提要 本文所謂“越塞闌關”諸令指以下四條：488—491 號簡、494—495 號簡、496—497 號簡和 523—524 號簡。

論文結合紅外線拍攝的影像資料，對簡文的釋文、解讀作了一些調整。如將 488—491 號簡中的兩處“傳”字改釋為“傳”，把“以傳令闌令論”的“令闌”看作上文“令以闌出入”的省略表述，全句理解為“用比傳‘令以闌出入者’的令論處”；又如其最後一句讀作“繕治塞，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從而與《行書律》的 266 號簡可相比照。

論文探討了幾個相關問題：一、“越塞闌關”諸令針對的，是“塞”及“塞之津關”，對內地諸關並不適用。二、“塞之津關”的通關，採用“符”、“傳”；而內地諸關只用“傳”。三、“越塞闌關令”不是單一的令，而包含有一些相對獨立的令，比如闌關令、越塞令、令闌令。四、令通過比附和擴展，得以適應各種複雜的情形。

關鍵詞 二年律令 津關令 越塞 闌關 傳

在張家山漢簡《津關令》中^①，關於“越塞闌關”之令一共有四條。其中最核心的是編號為“一”的令，寫在 488—491 號簡上。另外三條由 494—495 號簡、496—497 號簡和 523—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圖版 47—50 頁、釋文注釋 205—210 頁。

524 號簡寫成。其中最後一條保留有“廿三”的編號，居中二條的編號已殘，按整理者排列順序，我們姑且稱之為“令四”、“令五”。

對“越塞關關”諸令的正確解讀，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漢初邊塞的建設與管理，同時也可更好地瞭解令的結構和引用。

在整理小組開創性的工作之後，對這組令文解讀作出貢獻的學者，有謝桂華、李均明、王子今、王偉及張家山漢簡研讀班諸位先生和楊建博士。他們的意見，將在涉及時作交待。還應說明的是，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荊州博物館、日本早稻田大學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合作研究張家山法律簡，用紅外線設備拍攝竹簡影像，吸納學界研究成果，形成了新的釋文和注釋。在文字考釋方面，何有祖君做了大量工作。《津關令》部分的初稿，由魯家亮君負責；這一部分的修訂、定稿，由彭浩先生負責。他們的工作，為小文寫作提供了便利。對他們三位具體意見的引述，也一一作出說明。

下面先抄錄簡文，然後再作討論：

一、御史言：越塞關關，論未有令。·請關出入塞之津關，黥為城旦舂；越塞，新左趾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贖耐。令、488 丞、令史罰金四兩。知其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傳，令以關出入者，與同罪。非其所【當】為【傳】而擅為傳出入津關，以489 傳令關令論，及所為傳者。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軍吏卒乘塞者，禁(?)其□婢、馬牛出田漁(?)□牧。繕治 490 塞，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制曰：可。491

【四】、相國、御史請緣關塞縣道群盜、盜賊及亡人越關垣、離(籬)格(落)、塹、封、刊，出入塞界，吏卒追逐者得隨出入服迹窮追捕。令 494 將吏為吏卒出入者名籍，伍以閱具，上籍副縣廷。事已，得道出入。所出人盈五日不返，伍人弗言將吏，將吏弗劾，皆以越塞令論之。495

【五】、相國上內史書言，請諸詐襲人符傳出入塞之津關，未出入而得，皆贖城旦舂；將吏知其情，與同罪。·御史以聞。·制 496 曰：可，以關論之。497

廿三、丞相上備塞都尉書：請為夾谿河置關，諸漕上下河中者，皆發傳，及令河北縣為亭，與夾谿關相直。·關出入、越之，及吏 523 卒主者，皆比越塞關關令。·丞相、御史以聞，制曰：可。524

塞的含義比較複雜。《漢語大詞典》給出的相關義項有三：①險要之處。多指邊界上可以據險固守的要地。《左傳》文公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陸機《辯亡論下》：“東負滄海，西阻險塞。”②指邊界。《荀子·強國》：“今秦……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楊倞注：“趙樹松柏，與秦為界。”③構築要塞。《書·秦誓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孔傳：“崤，晉要塞也。”孔穎達疏：“築城守道謂之塞。”^①其實，“塞”還有一種由以上諸義複合而成的意涵，指在邊境地帶由天然屏障和人工建築組成的防線。如《史記·秦始皇本紀》：“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正義云：“謂靈、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又《蒙恬列傳》云：“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又《匈奴列傳》云：“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澗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令四稱“緣關塞縣道群盜、盜賊及亡人越關垣、離（籬）格（落）、塹、封、刊，出入塞界”，表明了塞界的具體構造。“越”字以下，原釋文作“越關、垣離（籬）、格塹、封刊”。注釋云：“離，以柴竹等做的蕃籬。格塹，用作邊界的深溝。封刊，作為邊界標志的樹木。”楊建博士改讀作“越關垣、離（籬）格（落）、塹、封刊”，解釋說，“關垣、籬格、塹、封刊”皆當為沿關塞修治的防禦工事或標記。關垣，即沿關塞修築的土牆。籬格，格讀為“落”，指籬笆。《國語·晉語八》：“以藩為軍，攀輦即利而舍。”注：“藩，籬落也。不設壘壁。”離格（即籬落）為關塞外圍的防護屏障。塹，防禦用的壕溝。《墨子·備城門》：“塹中深五尺，廣比扇。”封刊，《尚書·禹貢》：“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漢書·地理志》師古注：“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為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②楊建之說，顯然更為合理，但還有兩點值得推敲。第一，離格（籬落）不一定是關塞外圍的防護，而可能就是塞的一部分。第二，“封刊”古無成辭，疑亦當斷讀。封，指積土為界^③，與“塹”指掘地為限正好相對。刊，才是斫木為界。由此可知，漢初的“塞”就是由關牆、籬落、壕溝、土堆、被砍斫的樹木等因素構成或標志的。所謂“越塞”，當是指從這些禁止通行的地方出入邊界，與“關關”正好相對。

整理小組指出：關，《漢書·汲黯傳》注引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關。”應該指出的

①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縮印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1238頁。

②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簡釋》，《楚地出土簡帛思想研究（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③ 《急就篇》卷三：“頃町界畝畦埒封。”顏師古注：“封，謂聚土以為田之分界也。”

是，由下文可知，“闌關”是一個縮略語，完整表述是“闌出入塞之津關”。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所謂“闌關”既指“闌出入關”，也指“闌出入津”。第二，這裏的“津關”特指位於邊塞者。

“越塞”與“闌關”的處罰不同。前者“黥爲城旦舂”，後者則是“斬左止爲城旦”。這大概是因爲“闌關”屬於體制內犯罪，而“越塞”則是對法令的徹底踐踏。^①

“論未有令”的“令”字，原釋文缺釋。謝桂華先生認爲似可補釋作“令”^②。據紅外線影像，其說是。^③

“吏卒主者”至“與同罪”，是對責任者的處罰。《奏讞書》案例八記云：“奴宜亡，越塞，道戍卒官大夫有署出，弗得，疑罪。廷報：有當贖耐。”^④應該正是根據本令而治罪。

令、丞、令史，爲縣級官員職名。^⑤令一 490 號簡提到“縣邑傳塞”，令四 495 號簡提到“上籍副縣廷”，令廿三提到“令河北縣爲亭”，可見漢初在邊塞一帶，縣是基本的行政和軍事機構。

“非其”至“傳者”一句費解。原釋文作：“非其所口爲口而擅爲傳出入津關，以傳令闌令論，及所爲傳者。”所缺二字，依文意補。^⑥“以”字之下，即 489 號簡末尾，張家山漢簡研讀班以爲殘去一字，將文句改讀作：“以口傳令、闌令論。及所爲傳者，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軍吏卒乘塞者。”^⑦《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亦然^⑧。其所以如此，大概是原釋文無法通讀。不過，在“以”字後加上什麼字而可讀通簡文，似乎不易設想。看圖版和紅外線影像，此簡末端已缺，但“以”字之下殘片尚有約一釐米長，並無墨迹。因而原釋文以“以”爲 489 號簡末之字，應該是恰當的。再說，令一是有關“越塞闌關”的第一道令，如果說“闌令”勉強可與“闌關令”聯繫的話，“傳令”或者“口傳令”則完全難以說明。問題可能出在 490 號簡首字的釋讀上。這個字恐怕不能釋爲“傳”，而當釋爲“傳”。在《二年律令》中，“傳”字大致有兩種寫法，一種右旁上部作“父”，與“傳”字區別明顯；另一種略呈“十”形（如 358、362、363 號簡

① 李均明先生已指出：“知越塞之罪重於闌關，故刑加一等。”（《漢簡所反映的關津制度》，《歷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② 謝桂華：《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校讀舉例》，《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③ 這是何有祖君的意見。

④ “道”屬下讀，參看拙文《張家山漢簡雜識》，《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⑤ 令史爲秦及漢初縣廷的主要屬吏。參看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下，齊魯書社，1984，170—171 頁。

⑥ 這是何有祖君的意見。

⑦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⑧ 文物出版社，2006，83 頁。

所書)，與“傳”字相近。從文意著眼，此字恐當釋為“傳”，依附義。^①令關令，應該是指上文“及假予人符傳，令以關出入者，與同罪”一段文字。“令關”即“令以關出入”的省略說法，“令”為動詞。令廿三說“比越塞關關令”，與此類似。《漢書·刑法志》記高祖七年詔云：“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師古曰：“傳讀曰附。”此詔說“傳所當比律令以聞”，是指司法實踐中的行為。而由令一、令廿三可見，這種方法在立法中也有用到。

“縣邑”至“出入”一段，原釋文作：“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人、軍吏卒乘塞者，□其□□□□□日□□牧□□塞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幾乎不可通讀。“縣邑”後一字，恐亦當改釋為“傳”，依傍義。“傳塞”即靠近、位于邊塞，與“緣邊”（19號簡）、“近邊”（266號簡）、“緣關塞”（494號簡）略同。《後漢書·西南夷傳》有“附塞夷鹿芴”，可見“傳（附）塞”為漢人成辭。“官屬”後的“人”字，王偉先生已指出當為“屬”字末筆誤釋或排版之誤。^②“官屬”應與“關吏”連讀，大概是指備塞都尉和關吏的屬吏。通過研判圖版和紅外線影像，“其”前一字疑是“禁”；“其”後第二至第五字應是“婢馬牛出”；原釋“日”之字應是“田”；“田”後一字疑是“漁”，“田漁”指狩獵、捕魚；“牧”後二字當是“繕治”。^③“出”指出塞。“田漁（？）□牧”是“□婢馬牛”出塞所作的事情。屬於《行書律》的266號簡說：“畏害及近邊不可置郵者，令門亭卒、捕盜行之。”視此，可知令文“郵”指“郵人”，“門亭”指“門亭卒、捕盜”，分別是置郵之所和未置郵之所的行書人。這是相關文句改讀的理由。

令四“伍人閱具”的“人”，當改釋為“以”。^④這條令文斷讀上的困擾有二：一是自“關”至“刊”一處，我們的意見已見於上述；二是“所出人”一處。原釋文作：“事已，得道出入所。出人盈五日不反（返）……”^⑤王偉先生以為：這裏的“人”字似為“入”字形近之誤。“得道出入所”一句文義未足，加“出人（入）”二字始足。而“出人盈五日不返”與上文不合，上文言“吏卒追逐者得隨出入服迹窮追捕，令將吏為吏卒出入者名

① 裘錫圭先生在討論尹灣漢簡《神烏傳（賦）》時指出：漢人所寫文字，有把“專”旁寫得像“專”旁的。開始釋讀尹灣簡牘時，曾把“神烏傳”、“列女傳”釋為“神烏傳”、“列女傳”（《〈神烏傳（賦）〉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後收入《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這對令文釋讀極有參考意義。

② 王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編聯初探——以竹簡出土位置為綫索》，簡帛研究網，2003年12月21日，後刊於《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謝桂華：《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校讀舉例》。

③ 禁、婢、馬、田、繕治，是何有祖君所釋。牛，為彭浩先生所釋。

④ 這是何有祖君的意見。

⑤ 原釋文“已”作“己”，當是筆誤。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已指出當作“己”。

籍”，可知有出、入兩種情況，故此處也不當僅言“出人”^①。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則說“出人盈五日不反”當釋為“出入盈五日不反”^②。今按，原釋文“人”字不誤，但宜將“所”字改屬下讀。^③這樣，王偉先生所指“‘得道出入所’一句文義未足”的問題便不復存在。令文前面說“出入”，後面只說“出”，其實也好理解。在一般狀況下，只能通過關口出入，“越關垣、離（籬）格（落）、塹、封、刊，出入塞界”為“越塞”，被嚴令禁止。但在追逐群盜之流時“得道出入”。道，由，即在群盜之流出入的地點出入。在追捕行動結束後，如果是入塞，那就已經返回了；祇有出而不入，才屬於“不反（返）”，會受到追究，當事人、伍人及其將吏，都按“越塞令”論處。

與令四一樣，令五也是對令一的補充。詐，欺騙，作假。襲，大概作因仍、承襲解。

“以闌論之”的“闌”，原釋文未釋。從殘存筆劃看，姑釋為“闌”。^④這條令文解讀上的問題不大。讓人疑惑的是，“詐襲人符傳出入塞之津關”，自當屬於“闌關”。這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與令一所云“假予人符傳，令以闌出入者”為對應之事。如果“以闌論之”的“闌”字所釋不誤，更直接證明這一點。然而，比之“越塞”處以“黥為城旦舂”、“闌關”處以“斬左止為城旦”，“贖城旦舂”當是輕一些的處罰。同樣是“闌關”，何以處罪不一？我們猜想，這條令文所說的“詐襲人符傳出入塞之津關”應該只是策劃中的事（也許已實施“襲人符傳”）。“未出入而得”不是指未達成出入的目的，而是指未實施出入計劃即被發覺。漢律對圖謀犯罪與犯罪已遂的處罪往往不同。如21號簡說：“賊殺人，鬪而殺人，棄市。”22號簡則說：“謀賊殺、傷人，未殺，黥為城旦舂。”201號簡說：“盜鑄錢及佐者，弃市。”208號簡則說：“諸謀盜鑄錢，頗有其器具未鑄者，皆黥以為城旦舂。”令五未明言“謀”，才令人費解。

令廿三是在夾谿河置關的規定。整理小組注釋說：“夾谿關在今陝縣，位於黃河之南，其北為西漢河北縣。”此注顯然是以漢河北縣（治今山西芮城縣西）所在而作的推論^⑤。其地遠離邊界，非關備塞都尉事。“河北縣”當指河北之縣。這意味著夾谿河應該位於東西走向的黃河河段，也就是河套地區的黃河河段。通過《二年律令·秩令》可知，這一河段的東部，大約自西安陽（治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南黃河北岸）以東，是西漢初期西北邊境

①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編聯初探——以竹簡出土位置為綫索》。

② 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193頁。

③ 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注稿（三）》（《東方學報》第78期，2006）亦如此斷讀，請參看。

④ 這是何有祖君的意見。

⑤ 本文地望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二冊相關圖幅，地圖出版社，1982。

的所在^①，形勢正好相符。夾溪關當設在黃河南岸，對過的北岸有亭相守。其職責，當是稽查過往船隻，防止無傳通關（關）或強行通過（越）。這與陸地的關、塞和河道上橫渡的“津”均不盡相同，所以對違反者是比照“越塞關關令”處分。

在對“越塞關關”諸令逐一疏釋之後，我們來嘗試探討幾個在“越塞關關”諸令中帶有共性的問題。

第一，“越塞關關”諸令針對的，是“塞”及“塞之津關”。“塞”大致指邊界。那些位於內地的津關，則一般只稱“津關”，而不用冠以“塞”字。504號簡說：“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買馬關中。有縣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為書告津關。”^②506—507號簡說：“其買騎、輕車馬、吏乘、置傳馬者，縣各以所買名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各以馬所補名為久久馬，為致告津關，津關謹以籍、久案閱，出。”509號簡說：“關外郡買計獻馬者，守各以匹數告買所內史、郡守，內史、郡守謹籍馬識物、齒、高，移其守，及為致告津關，津關案閱。”513—514號簡說：“郎騎家在關外，騎馬即死，得買馬關中人一匹以補。郎中為致告買所縣道，縣道官聽，為質告居縣，受數而籍書馬識物、齒、高，上郎中。即歸休、徭使，郎中為傳出津關。”521號簡說：“魯中大夫謁者得私買馬關中，魯御史為書告津關。”這些說“津關”而非“塞之津關”的令文，對象都是位於“關外”的郡縣、官宦和封國，適足為證。

《津關令》中也有同時針對“塞之津關”與內地諸關的令條。492號簡云：“其令扞關、鄖關、武關、函谷、臨晉關及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黃金、諸莫黃金器及銅。”扞關、鄖關、函谷、武關及臨晉關是關中與關外諸郡之間的關卡^③。“諸其塞之河津”，則大概是指位於邊塞上的黃河各處渡口。又506號簡云：“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扞關、鄖關、函谷、武關及諸河塞津關。”“諸河塞津關”，大概是指黃河和邊塞上的各處津關（包括位於內地的黃河津關）。在這種情形下，臨晉關也被包括在內^④，所以沒有像492號簡那樣專門提到。不言而喻，“越塞關關”諸令，只對邊塞津關適用。祇有同時提到“塞之津關”（如“諸其塞之河津”、“諸河塞津關”）和內地津關的令文，才對所有津關適用。

瞭解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雖然《津關令》強烈顯示出內地諸關對於關中與關外諸郡的區隔作用^⑤，但無論如何，對“塞之津關”控制的嚴厲程度，遠非內地諸關可比。^⑥這

① 參看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學術月刊》2003年第1期；辛德勇《張家山漢簡所示漢初西北隅邊境解析》，《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買，原作“置”，從謝桂華先生改釋（見《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校讀舉例》）。

③ 參看王子今、劉華祝《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所見五關》，《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④ 臨晉關在今陝西大荔縣東的黃河西岸。

⑤ 參看拙文《張家山漢簡〈津關令〉涉馬諸令研究》，《考古學報》2003年第1期；王子今、劉華祝：《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所見五關》。

⑥ 李均明先生已指出，關作為分界綫上的門，包括國界和區域界。見《漢簡所反映的關津制度》，《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對於認識漢初政治版圖的層次，饒有意義。

第二，在將針對“塞之津關”與內地諸關的令文分別之後，我們也就發現，在人員通關文書的使用上，二者是有區別的。在“塞之津關”方面，提到了“符”（491）、“傳”（489、490、523）或“符傳”（489、496）。而在內地諸關方面，則只是說到“傳”（498、502、512、518）。^①《居延漢簡釋文合校》65·7說：“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第八。”李均明先生引述說：“此例所見為專門用以出入金關的符，僅署編號，未署持用人。此類符常用於與該關津關係密切，即屬同一轄區的人員使用。”並指出令一所云“得以符出入”即屬此類。^②現在可以補充的是，符大概祇用於“塞之津關”的通行，至少在《津關令》頒行時期如此。

第三，“越塞關關令”不是單一的令。在令一中，實際上包含有三個相對獨立的令，即①關關令；②越塞令；③令關令。我們姑且稱之為子令。“越塞令”在令四中被引述，“關關令”在令五中被引述，“令關令”則在令一後段被引述，足以表明這些子令可以單獨使用。令廿三引述的“越塞關關令”，可能如整理小組注釋所云，是令一之“省稱”，但也可能是指越塞、關關兩個子令。

第四，在另一方面，雖然令一作為“越塞關關”諸令的核心部分，已比較完備，但在實踐中卻難免有其局限性。作為彌補的辦法，令文顯示了兩點：令的擴展和比附。令四規定追逐罪犯的吏卒，可以越塞；但若盈五日不返，伍人不舉報，將吏不効治，都以“越塞令”論處。令五對圖謀關關者確定了與實際關關不同的刑罰。雖然二者都屬於令的擴展，但令四使越塞令具有更多的內涵，令五則實際形成了一個新的子令。在令的比附方面，有令一“非其”至“傳者”一段，以及令廿三，這些使得“越塞關關”諸令更加完備，從而更好地適應各種複雜的情形。《漢書·宣帝紀》“令甲”注引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又《杜周傳》記云：“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也表明了令的這種靈活性。

（附記：本文修改中得到彭浩、劉樂賢先生指教，魯家亮、何有祖二君亦提有建議。“神烏傳[賦]”之例即承劉樂賢先生賜告。）

① 這裏祇是說人的通關，關於馬匹用傳，未統計進來。512號簡（令十三）說“諸以傳出入津關而行產子、駒未盈一歲，與其母偕者，津關謹案實籍書出入”（產、駒，是何有祖的意見），大概兼指人傳和馬傳。

② 李均明：《漢簡所反映的關津制度》，《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

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的納音術初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楊英

內容提要 本文對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的納音術作了初步考察，對律呂名及它們的順序及納音術背後的涵義作了梳理。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的納音術以律呂與“三十時”及時氣的結合關係為核心，服務於吉凶占驗。從銀雀山漢簡看，當時的納音術脫胎于周代王官的樂律學，但在數術發展的大背景下它已成為數術的一種，跟周代王官樂律學比，其中的樂律學專門知識極大地減少，而占測吉凶的成分則大大增加。它是從周代王官樂律學到漢代京房納音術之間的中間環節。

關鍵詞 律呂 納音 時氣 樂律學

1972年出土於山東臨沂的銀雀山漢簡中有大量珍貴的資料，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晏子》、《六韜》、《尉繚子》等，它們早已在古籍版本的源流與校勘、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兵法等的研究等領域發揮出了鉅大的作用。其中的《陰陽時令占候類》為研究漢初的數術、迷信和一般的思想狀況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珍貴資料，惜《銀雀山漢墓竹簡》至今只出版了第一輯，包括《陰陽時令占候類》在內的許多佚書尚未正式出版，直至目前，研究者祇能使用吳九龍先生的《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進行研究。《陰陽時令占候類》內容駁雜，整理者將之分為十二種：一、曹氏陰陽；二、陰陽散；三、禁；四、[三十時]（加方括號的為整理者所定名）；五[迎四時]；六[四時令]；七[五令]；八[不時之應]；九[為政不善之應]；一〇[人君不善之應]；一一[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一二[占書]。^①其中，關於《三十時》已有李零先生《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進行過研究，^②裏面還涉及到了三十時與納音的關係，確是眼光敏銳之作。筆者試圖在此基礎上，對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的納音術進行初步考察，以探討當時納音術的大概面貌及其跟其它數術的關係，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納音術及其淵源簡介

在本文開始正式考察銀雀山漢簡的納音術之前，有必要首先對什麼是納音術以及它的發展脈絡作一個簡要交待。納音術是一種根據某一時令下“音”和“氣”的關係推測吉凶的古老方術（在它發展成熟時期，納音是跟五行、六十甲子緊密結合在一個圖式中的），最初源于周代王官的樂律學。在周代，納音術曾作為王官樂律學的一部分而存在。戰國以降，它隨著各種知識和技藝的下移散出王官，成為當時衆多數術迷信的一種。到西漢京房時，納音術與納甲說融合，最終發展成熟。下文簡要介紹一下它的發展過程。

納音術濫觴于周代。周代王官樂師掌握著專門的樂律學技藝，《周禮·春官·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即鑄造編鐘要根據樂律學發聲原理決定青銅的劑量。著名的曾侯乙編鐘由65件大小不等的編鐘組成，音階跨度達五個八度又一個大二度，中心音域十二個半音齊全，可以自由轉調。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我們，正因為王官樂師們手中掌握著高超卓越的、早就系統化並上升到理論高度的樂律學，才能按劑量鑄造出規模完整、音階結構細微而完美的成套編鐘。這種系統化并上升到理論高度的樂律學，是後來納音術的最重要基礎。

除了複雜完備的樂律學之外，周代王官樂師還掌握著以五音十二律組成的樂曲達到“和”的方法。《國語·周語》記載周景王的樂師伶州鳩論音律：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律”是古人心目中最自然、最標準的有條理軌迹，故“立均出度”根據音律，這體現了古人希望儀軌法度達到“和”的境界。伶州鳩說：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音相保曰和，細

①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242—243頁。

② 該文見《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亦見李零《中國方術續考》附錄。

大不逾曰平。如實，而鑄之金，磨之石，系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

這個“和”講的是以十二律相配讓樂音相和的意思。“鑄之金，磨之石，系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是讓樂音相和的具體方法，也是納音術得以產生的最初的、最重要的理論根源。因為古人認為金石絲竹等樂器各因其自然性狀有一定聲音，這些聲音在五音十二律體系中有不同的位置^①，用它們演奏“八風”（韋昭注為八方之風）並讓之相和，是周樂的最高境界。而“八風”有疾勁寬緩之別，伶州鳩認為使用金石絲竹匏瓦革木等材質的樂器相配演奏“八風”，就做到了讓它們發的音高低陰陽相和。納音術的基本原理就是根據奏一定的“音”，或歌一定的“風”，其結果是否合乎“和”而產生的——合乎“和”為吉，不合則為凶。在春秋時期就有這樣的具體應用，《左傳》襄公十八年記載晉人聽說楚師來了，很緊張，晉國樂師師曠說沒有關係：“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竟，多死聲，楚必無功。”師曠通過歌南、北之風，由“風”所反映的勢力強弱占測晉、楚師力量的強弱，結論是楚國大軍必勞而無功。此即為處於濫觴階段的納音術。但在春秋時期，王官樂師的主要職掌是掌握樂律學專門知識和以耳音辨五音十二律，處於濫觴階段的納音術僅作為周代王官樂律學的一部分而存在。而且在周代，各種專門的知識和技藝世系很少著于竹帛，我們幾乎看不到有關王官樂律學的文獻記載，以至於現代音樂史家王子初先生說：“（曾侯乙編鐘）數千字的樂律銘文，作為一部記載早已失傳了的古代樂律學的文獻，是最為珍貴的。”^②而納音術作為附翼於樂律學占測吉凶的方術，就更不見於先秦文獻的記載了。

到戰國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各種知識和技藝散出王官，樂律學因太過專門，跟現實生活關係又遠，其主旨到漢初終於失傳。^③但樂律學所要體現的“和”的思想，隨著戰國天人之學的大發展而有了更豐富、更深刻的內涵，因此納音術不但沒有失傳，且跟當時流行的數術緊密融合。五音十二律與月份、干支的融合對應成為“和”的內容，納音術從此成為占測吉凶的數術的一種。饒宗頤先生這樣說：“納音的手續，是把六十甲子、按照六甲的順序，配合十二律、五行之五音而成。先區別陽律、陰呂二組，分為二圖，一陽生於子，起于甲子之仲；一陰生於午，起于甲午之仲，由子、午以推陽與陰之律，陽律起

①《國語·周語》伶州鳩這樣分析金石、絲竹等樂器的發音規律：“……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一聲。”伶州鳩認為編鐘音高，即“尚羽”，絲竹音低，即“尚宮”。宮、角、羽、相當於dol、mi、la，正合乎金石樂器發音高，絲絃樂器發音低的原理。至於革木，因為沒有音的高低之分，因此韋昭注：“革，鞀鼓也。木，祝敔也。一聲，無清濁之變也。”

②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193頁。

③《漢書·藝文志》：“周衰俱（禮樂）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又《漢書·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於甲子而終於癸亥，陰律起於甲午而終於癸巳，以五音十二律，納六十甲子……”^①饒先生所指的納音，即戰國時期已經流於數術的納音術。劉樂賢先生《五行三合局與納音說》在此基礎上補充了銀雀山漢簡的納音材料^②，這些成果大大提高了學界對納音術的認識水平。本文不揣簡陋，試圖再探討一下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有關納音術的內容，並談談自己的認識。

下文首先對有關銀雀山簡《陰陽時令占候類》有關納音的簡文作些考釋。

二 簡文補遺

要想考察銀雀山簡中的納音術，前提是必須對銀雀山簡中提及律呂名的簡作準確釋讀。這一工作李零先生在考察銀雀山漢簡《三十時》時已涉及^③。但銀雀山簡中涉及納音術的並不限於《三十時》，其它部分也有涉及納音術的，如簡 0884：“……必有廢法社稷（稷）。不盡二日，奏大呂……”^④該簡出自《曹氏陰陽》。此外簡 0290 提到“音”跟吉凶的關係，它出自《占書》（詳下文）。而且，李零先生的文章重點在研究《三十時》中的時氣內容，對簡文中提到的律呂未遑作過多深入。筆者試對《陰陽時令占候類》中幾條涉及納音術的簡繼續作些考察，下面首先談談自己在閱讀這些簡時的體會。

（1）簡 0248：……祠。入之三日，奏蕤賓，天不陰雨，不吉，利有入也。麥秋苗生（陰·四）

此簡以“入之三日”為分界，此前講的是前一個時節的狀況，從“入之三日”開始為另外一句，講的是跟“蕤賓”相應的時節的狀況。不過下文“麥秋苗生”跟所奏音律“蕤賓”不相合，因為蕤賓對應的是五月，五月無論如何不是秋天，因此，“麥秋苗生”疑為“麥秀苗生”之誤，因目前的研究條件無法窺見簡文圖板，這只是筆者的蠡測，有待資料更充分時進行進一步研究。

（2）簡 0305：……可禱祠入之 = 日奏應鍾，天戴圓，天不陰雨，主人不吉。雞（鶉）鳴帛覽（智）民人入室，執（蟄）蟲求穴，可築不可（陰·四）

該簡文意殘缺不全，此處的重文號有可能是“二”或“三”的訛誤，因為通篇《三十時》為由“入之（或“不盡”）三（二、一）日，如何如何”的句子組成（詳下文），從文

① 饒宗頤：《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中華書局，1986，264 頁。

② 《江漢考古》1992 年 1 期。

③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2000，411—412 頁，下同。

④ 本文此處所引銀雀山漢簡均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下同。

意看，此處不應是重文號，而有可能是“入之二日，奏應鐘，天戴圓，天不陰雨，主人不吉”，意思是入了某個時節二（三）日之後，假如奏應鐘之律，出現天不下雨的情景，那麼主人將不吉利，這裏的“二”或“三”成了重文號，為抄手大意之故。

（3）簡 0306：……之，可以嫁女，不可取（按，此處應缺重文號）婦=蚤（早），操令。下六，可為宮室、嫁女、取婦禱祠入六畜。入之三日，奏林鐘，天必……（陰·四）

此簡“取婦早操令”令人費解。李零先生斷為“不可取婦早，取婦早操令”，但未作過多解釋，筆者以為斷句應為：“不可取婦早，取婦早，操令。”此簡講的是某個時段“上六”的宜忌（上六、下六見下文），意思是這期間若要早取婦，必須“操令”才行。《三十時》中其它簡也有“取婦早操令”，簡 4941：

……□戰客勝。殺人不報。可為齋夫、嫁女。不可取（娶）婦=蚤（早），操令
又簡 0950：

……可□（為）齋夫，操令者。不可□（為）小齋夫□……

簡 0950 這條提到的不是“操令”，而是“操令者”，“操令者”是執掌時令的人，跟齋夫并列。那麼，0306 和 4941 的“操令”，應即執操時令的意思，意思是想要早娶婦就得執操時令才行。

（4）簡 0773：……不盡三日，奏黃鐘，天立方，鶉（鶉）鳴畢，筆（陰·四）

此句“不盡三日”的“不盡”即“某個時節之後”，表示尚未完結。“天立方”則跟簡 0305 的“天戴圓”相對。方、圓各表示陰陽，具有數術意義。黃鐘為十一月子，為《月令》仲冬之月。“鶉”指的是自然界之鶉鳥。先秦時期的古人亦稱天空中南方七宿為“鶉火”，它應淵源于古人觀察鶉鳥的生活習性，因天空中夏日所見於南方之七星組狀如鶉，起寂所現時間跟鶉類似，因此被命名為鶉。到秋冬日，鶉火息，鶉鳥不鳴，因此為“鶉鳴畢”。

（5）簡 0890：……不鳴，水。入之一日，趣（奏）夷則，天不陰雨（陰·四）

李零先生斷句為“不鳴水”。按，應為“不鳴，水”。“不鳴”即某鳥不鳴之意，《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鶉旦不鳴”，此處“不鳴”因簡文殘缺，看不出是哪種鳥，但文意跟《月令》仲冬之月描述的鳥不鳴類似。“水”為發大水之意。“不鳴”

和“水”都是不按時行令的凶咎。

(6) 簡 1949: ……呂。大浩(鵠)至, 天不陰雨, 民多……(陰·四)

該簡李零先生認為是南呂。按, 十二律呂中, 大呂、仲呂、南呂皆帶“呂”字, 此處判斷應為哪個呂的關鍵在於“大鵠至”。大鵠即大的鴻鵠, 是一種黃色的棲水天鵝, 屬於候鳥。候鳥飛至在春天, 而候鳥秋日飛走過冬, 一般不用“至”字。三“呂”中, 大呂對應十二月, 仲呂對應四月, 南呂對應八月, 因此這個“呂”有可能是仲呂。

以上是筆者對銀雀山漢簡中幾條提到律呂的簡的一點想法, 因《三十時》殘缺不全, 十二律呂未曾全部出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不止《三十時》, 《陰陽時令占候類》的其它殘篇也零星涉及到納音術(見下文), 它們跟《三十時》中的納音簡有著共同的靈魂。下面我們就根據這些零星的資料管窺銀雀山簡所見的納音術。

三 銀雀山簡所見的納音術

由於銀雀山漢簡的原始編連已失, 依靠竹簡的原始編連探尋篇章的原貌已不可能。但所幸提到納音數術的這幾條簡大部分出自《三十時》, 而《三十時》的原始內容應是按時令順序排列的, 且簡文中有“民人入室”、“麥秋(秀)苗生”之類跟時令相關的辭句, 因此, 它們之間原先應是組成了一段有一貫內容、有邏輯順序的文字的。而且, 雖然《三十時》對一年的劃分法跟通常將一年劃分為十二月有所不同, 但《三十時》中存在的十二律呂跟十二月對應十二律呂一樣, 都是按“氣”的狀態分佈的。而十二律呂與十二月的對應, 傳世文獻《史記·律書》、《淮南子·天文訓》等都有記載。因此, 根據《三十時》的零星內容和所提到的律呂名, 來考察銀雀山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納音簡的內在邏輯和當時納音術, 仍是可能的。傳世文獻《史記·律書》、《淮南子·天文訓》中十二律呂跟十二月份、十二地支的對應是:

月份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律呂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鐘

“三十時”是跟一年十二月不同的歲時劃分法, 它見于《管子·幼官》, 流行於齊地(見下文), 李零先生已根據《三十時》的內容復原了三十時與四季、物候的對應表, 但表中未將十二律與三十時的對應列入。筆者根據簡文復原的“三十時”跟律呂的關係, 對應如下表:

律呂名	對應之“時”
黃鐘	1時、2時、3時上六(30日)
大呂	3時下六、4時、5時(60日)
太簇	6時、7時、8時上六(90日)
夾鐘	8時下六、9時、10時(120日)
姑洗	11時、12時、13時上六(150日)
仲呂	13時下六、14時、15時(180日)
蕤賓	16時、17時、18時上六(210日)
林鐘	18時下六、19時、20時(240日)
夷則	21時、22時、23時上六(270日)
南呂	23時下六、24時、25時(300日)
無射	26時、27時、28時上六(330日)
應鐘	28時下六、29時、30時(360日)

這樣，根據十二律呂的順序和它們跟“三十時”的對應關係，銀雀山簡《陰陽時令占候類》提到納音的簡（它們散見於《三十時》、《曹氏陰陽》、《占書》等散篇的殘簡中）可以這樣排一個順序：

- (1) 黃鐘：簡 0773：……不盡三日，奏黃鐘，天立方，雞（鷄）鳴畢，筆
- (2) 大呂：簡 0884：……必有廢法社稷（稷），不盡二日，奏大呂……
- (3) 太簇：簡 0050 ……金。殺人不報，日夜分離之物也。蕤（蕤）狸（埋）分異，

菱（祓）除。入之三日，奏大……

- (4) 夾鐘：缺。

- (5) 姑洗：簡 2436：……[不]盡三日，奏古（姑）洗。精列登堂……

- (6) 仲呂：簡 1949：……[仲]呂。大浩（鵠）至，天不陰雨，民多……

- (7) 蕤賓：簡 0248：……祠。入之三日，奏蕤賓，天不陰雨，不吉，利有入也。

麥秋（秀）苗生

- (8) 林鐘：簡 0306：……之，可以嫁女，不可取婦=蚤（早），操令。下六，可爲宮室、嫁女、取婦、禱祠、入六畜。入之三日，奏林鐘，天必……

- (9) 夷則：簡 0890：……不鳴，水。入之一日，趣（奏）夷則，天不陰雨

- (10) 南呂：缺。

- (11) 無射：簡 2055：……鳴。可（爲）美事。人之曰。奏毋（無）射，大

- (12) 應鐘：簡 0305：……可禱祠。入之二日，奏應鐘，天戴圓，天不陰雨，主人不吉。雞（鷄）鳴帛斃（智）。民人入室，執（蟄）蟲求穴，可巢不可

李零先生在《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中已經做過按十二律呂順序的排列，筆者也已將自己的一些猜想列入上面的排列。從《陰陽時令占候類》這些零星簡的排列，我們大約可以獲知以下資訊：

首先，當時各家數術流派傳承中都有納音術。《三十時》為我們提供了當時人們將律呂納音跟時氣、物候的相應變化相結合以佔驗吉凶的情景。但除了《三十時》外，《曹氏陰陽》也出現了“大呂”。《曹氏陰陽》是曹氏所授的一種陰陽書，內容講天地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丘陵、年月日時）和萬物（草木、鳥獸蟲魚、五穀六畜、人）的陰陽，以及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生相剋、互為德刑的關係^①。《曹氏陰陽》出現“大呂”說明納音術是戰國以來的多家數術流派傳習中都有的內容，說明納音作為一種專門技藝，從春秋戰國到漢代，不管如何流變，一直不絕如縷地傳承。

其次，從銀雀山《陰陽時令占候類》看，律呂納音與時“氣”變化之間是有固定關係的。“三十時”將一年三百六十日分為三十段，每段十二日，這十二日又被分為上六、下六。銀雀山簡 3258：“……二日一時，六日一節……”（實際上應是“……[十]二日一時，六日一節……”），是指十二天構成一“時”，六日構成一“節”，它跟《管子·幼官》分一年為三十時的劃分法屬於一個系統。在此基礎上，十二律呂通過“三十時”的分割被分攤在一年三百六十日中，這種分攤已見上表。十二律呂跟時氣的變化聯係在一起，從簡 1931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簡 1931：

……十四時，百六十八日，音，閉氣也。民人居……

此簡提到的納音所對應的“氣”是“閉氣”。“閉氣”是《三十時》形容“氣”狀態的詞之一。銀雀山《三十時》形容“氣”狀態的詞有生氣、柔氣、盛氣、殺氣、剛氣等。銀雀山《三十時》出於齊地，它跟《管子·幼官》記載的一種行於齊地的“三十時”屬於同一個系統。銀雀山簡《三十時》的“閉氣”可能是跟《管子·幼官》所謂的“絕氣”相類。《幼官》：

十二，絕氣下，下爵賞（第十時）；十二，中郢，賜與（第十一時）；十二，中絕（即“絕氣”之中段），收聚（第十二時）；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第十四時）。

其中第十時正當二十四時的立夏，怎麼會“絕氣下”呢？黎翔鳳《管子校注》認為：“天氣之長，至夏至而斷止，是為‘絕氣下’。”^②筆者以為，從春分開始陰陽氣均，而後陽氣日盛，但臨到夏日，那個代表春天的“陽氣”就要盛極而衰，“絕氣”即陽氣將要衰絕的

①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2000，395—396 頁。

② 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153 頁。

階段，三十時中的第十時在二十四氣中相當於立夏，此時的陽氣即將衰微，所以叫“絕氣”。“閉氣”則比“絕氣”更進一步，形容陽氣漸閉。因為按“三十時”的劃分法，十四時168日為中暑，此時已過立夏，漸漸要到夏至，陽氣漸閉，因此叫閉氣。簡1931認為，十四時一百六十八日是“閉氣”之際，所奏律呂的納音反映的也是“閉氣”的情況。這說明在《三十時》的時令系統中，跟某一“時”相對的必有某一律呂，而這一律呂反映的是“氣”的生、絕、閉、剛、殺等狀態。

不僅如此，我們還可從《三十時》和“上六”、“下六”的上下文看出律呂納音是跟刑德聯係在一起的，如：

簡1682：……卅六日，夏沒。上六，生；下六，刑。可為耨夫……

簡2608：……日，春沒。上六，刑，以伐客勝；下六……

簡0789：……可口（為）耨夫、嫁女、取（娶）婦、禱祠。下六，刑，以戰客……

這幾條簡，均有相應律呂與之對應。簡1682屬18時216日，上六、下六對應律呂分別為蕤賓、林鐘。蕤賓為陽律，為生；林鐘為陰呂，為刑，完全相應。簡2608李零先生納入11時132日，對應律呂為姑洗。至於簡0789，因為內容殘缺，無法將之列入三十時的具體時段，但它原先在三十時中肯定是有自己的位置的。律呂跟刑德相結合在簡2436中也有反映，下文將具體探討。

總之，銀雀山簡《三十時》中的上六、下六內容一方面反映了律呂納音被插入各“時”，進而跟一年“氣”的運行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已跟刑德結合。這是一個日益發展完善的數術系統。相比之下，《管子·幼官》中的三十時尚無上六、下六，也沒有提到刑德，是其濫觴狀態。

第三，銀雀山納音簡屢屢提到“不盡三（二）日”和“入之三（二、一）日”。“不盡”和“入之”相對應，它們反映了《三十時》中“節”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意義。筆者以為“不盡”為一“節”盈餘之意，“不盡二日”即一節之後二日；“入之”為一“節”之內之意，“入之三日”，即進入某一節之後三天。“不盡”和“入之”均跟時氣的變化聯係在一起。如簡2014：“……英。不盡二日，地力盡下，故葬。”說明某一節之後二日“地力盡下”。從“不盡”和“入之”屢屢出現於銀雀山簡《三十時》看，銀雀山《三十時》的內容比《管子·幼官》中的三十時要細化得多，其中不但有《幼官》沒有的納音內容，吉凶休咎也比《幼官》所描述的複雜。

以上幾點，是銀雀山簡的納音術的基本框架。我們可以在這一框架之下，對以上帶律呂名的簡文所蘊含的意義再作稍深入些的解釋：

1 黃鐘：簡 0773：……不盡三日，奏黃鐘，天立方，鶉（鶉）鳴畢，筆

此簡表明，在某節（應為1時、2時、3時上三日之內）之後的三日，奏黃鐘之律，因此時為冬，相應地“天立方、鶉鳴畢”。對“天立方”並不能理解為天的形狀是方形。蒼天浩浩無窮，怎麼會是方形的呢？這跟古人對“方”的認識有關。古人認為方、圓為陰陽之數，方為陰、圓為陽，《三十時》的撰寫者認為此時“天”的性質是“陰”，它應是“方”那個屬性，這叫“天立方”。“鶉鳴畢”即鶉鳥此時不鳴，它是跟奏黃鐘的冬季相應的物候現象。

2 大呂：簡 0884：……必有廢法社稷（稷），不盡二日，奏大呂……

此簡出自《曹氏陰陽》而非《三十時》。該簡描述了某節之後的二日奏大呂會有某某吉凶，但因簡文殘缺，看不出是什麼吉凶。前文的“必有廢法社稷”不是跟“奏大呂”有關的吉凶。該簡的句式、內容與《三十時》中的納音簡基本相同，說明當時納音術傳承的知識來源是共同的。

3 太族：簡 0050：……金。殺人不報，日夜分離之物也。葬（葬）狸（埋）分異，芟（拔）除。入之三日，奏大……

此簡提到“日夜分離之物也”講的是“氣”還未到“太族”時的狀態。“殺人不報”，意即即便殺人也不會受到報應。簡 2061 “……人（入）之地者，其將必有死亡之罪，殺人有報”，跟此條的“殺人無報”正相對。0050 條簡前半段提及的“時”尚在太族之前，陰氣甚於陽氣。當時的數術認為，雖然殺人產生陰氣，但此時陰氣勝於陽氣，所以殺人也就不會有報應。“葬（葬）狸（埋）分異，芟（拔）除”即在此時可以葬埋、可以拔除。因為此段對應的是太族之前的大呂，即三十時中的3時下六、4時、5時，此時已漸到春天，陽氣漸滋，即可葬埋、祛除，以消除凍餒橫死者所剩的凶氣（屬陰）。這樣的認識在當時的數術中是很普遍的。雲夢秦簡《日書·稷辰》中有類似內容：“正陽，是胃（謂）滋昌……可葬狸（埋）。”即逢正陽日可以葬埋。雖然《稷辰》的年代比銀雀山簡《三十時》稍早，而且《稷辰》正陽日演算法不是按該月所逢“氣”的陰陽狀況，而是按某月中某日的地支來推，但是應該看到，它跟銀雀山簡中的納音術都是數術朝不同方向進一步發展的產物。雖然它們推算的具體方法不一樣——銀雀山簡側重於以“三十時”的變化來推算“氣”的狀態，《稷辰》則側重於用干支推算，這是戰國時期數術得到大發展，各種推算方法繁榮的表現。此外還應該看到，《稷辰》中的在“正陽”之際葬埋，跟銀雀山簡 0050 在太族相應之時“葬埋、分異”均有共同的古老淵源，那就是從三代起即有的傳統，即《月令》記載

春日要存諸孤、掩骼埋胔、安萌芽，養幼少^①之類。

4 姑洗：簡 2436：……[不]盡三日，奏古（姑）洗。精列登堂……

此簡的意思是：某節之後三日奏姑洗之律，相應地“精列登堂”。“登堂”為數術術語，在《淮南子·天文訓》中有一段與之有關的內容：

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

《天文訓》此段講的是刑德。從此段看，刑、德一年間是在室、堂、庭、門、巷、術、野之間遊徙的。雖然這段《天文訓》的歲時分割法的基礎跟銀雀山簡《三十時》不同——它是根據一年十二個月劃分的，而不是根據“三十時”，但銀雀山簡的“登堂”跟《天文訓》說的“德在堂則刑在術”本質是一致的。它描述的也是某物在“三十時”下“150日”時的遊徙狀態，用了“精列登堂”這句話來描述。“精列”是什麼未詳，簡 4941 亦見“精列”：“……口戰客勝。殺人不報。可為畜夫、嫁女。不可取（娶）婦=蚤（早），操令；不可冠、帶劍、入人民，不可出貨。入之三日，精列。”此“精列”二字含義未詳，但它也同樣是遊徙的某物，疑跟《管子·內業》說的“精”有關。若真如此，說明“精”在齊地不僅有對它的哲學描述^②，還有對它登堂、入室狀態的數術推算。

5 蕤賓：簡 0248：“……祠。入之三日，奏蕤賓，天不陰雨，不吉，利有入也。麥秋（秀）苗生”

蕤賓對應五月、午和三十時中 16、17 時及 18 時的上六。此時奏蕤賓，若天不陰雨則不吉利，但有利於收進物事。此時正是麥苗抽穗之際，下面大概是要說跟麥苗收成有關的吉凶事宜，但因簡文殘損，具體內容已不可知。

6 應鐘：簡 0305：……可禱祠。入之二日，奏應鐘，天戴圓，天不陰雨，主人不吉。簌（鶻）鳴帛霓（智）。民人入室，執（蟄）蟲求穴，可築不可

此條提到的應鐘對應十月亥和“三十時”中的 28 時下六、29 時、30 時。簡文提到“民人入室，執（蟄）蟲求穴”，正是十月秋收之後天氣轉寒，人民入室，蟄蟲需要尋找洞穴過冬的情景。《詩·豳風·七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室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

① 《禮記·郊特牲》追憶周代“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楊振紅《〈月令〉與秦漢政治再探討——兼論〈月令〉源流》（《歷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對此有詳細論述，可以參看。

② 《管子·內業》：“凡物之精，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人。”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穹室熏鼠，塞向墮戶”，即十月份天氣冷了，塞上屋子上的窟窿，熏室內的蟋蟀、老鼠洞讓它們出來，填上門窗的縫隙以便在室內過冬。此簡遠承《豳風·七月》此意，說其時奏應鐘，天如戴圓，假如天不下雨，主人不吉。下文則說此時天氣轉冷，人民入室，蟲蟻尋穴，有相關的宜忌。

以上是幾條提到律呂名的簡，它們都是跟一定的時氣和吉凶聯係在一起的。除了這些具體提到律呂名和相應的“時”及吉凶的簡之外，還有總結納音術的簡文（簡 0290），這部分簡文的內容和性質將在下文詳細討論。

四 從周代王官樂律學到納音術

上文探討了銀雀山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納音術的狀況，雖然這些簡零星殘缺，但我們大致可以窺見時人憑藉著他們心目中時氣和律呂的結合規律來佔驗吉凶這一思路。筆者以爲，銀雀山簡《陰陽時令占候類》中提到的納音術是當時各種納音方式中的一中，在當時數術發展的大背景下，有將十二律呂納入三十時的納音法，本文考察的銀雀山簡中蘊藏的納音術即爲此種；也有將它們納入六十甲子運行的方法（饒宗頤、劉樂賢先生均已提及）。因爲戰國天人之學的大發展，對宇宙格局的描述是有多種模式的，或用五星於二十八宿之間的運行，或用干支化合之局，或用刑德等等，《淮南子·天文訓》就記載了多種這樣的模式。這些模式各自又都能用“數”（包括計量數、干支數、五行方位數等）的變化來表示。十二律呂通過“數”的變化引入這些模式，於是便有了各種看上去甚有差異的納音術，而它們的原理都是一致的。

納音術到戰國時期流於數術，跟周代的王官樂律學必已產生了本質區別。在周代，王官樂律學不是爲佔驗吉凶服務的，它是以歷代樂師們的經驗積累爲基礎的、爲了製造編鐘、編磬和各種絲竹管弦樂器的系統化專門知識，讓這些樂器在演奏和運用中體現禮典的莊嚴凝重和“禮”的和諧境界。而納音術則不同，它的核心是爲了佔驗吉凶。納音術從附翼于王官樂律學的一種音律與“和”“風”的配伍知識，變成利用“音”與時令的配伍占測吉凶的方術，這一過程的核心是：通過戰國天人之學中對“氣”的認識日益複雜，將五音十二律引入五行的配伍。在周代，王官樂律學的核心知識有二：一是一定律呂的音高和律管長度之間的關係，二是律呂和“氣”之間的關係，這二者均是通過“數”表現的。首先看第一點。《史記·律書》保存的律呂的音高和律管長度之間的關係數值是：

黃鐘 $8+1/7 \approx 8.143$

大呂 $7+0.5+1/3=7.833$

太簇 $7+2/10=7.2$

夾鐘 $6+0.7+1/3=7.033$

姑洗 $6+4/7=6.571$

仲呂 $5+0.9+2/3=6.566$

$$\text{蕤賓 } 5 + 0.6 + 2/3 = 6.266$$

$$\text{林鐘 } 5 + 4/10 = 5.4$$

$$\text{夷則 } 5 + 2/3 = 5.666$$

$$\text{南呂 } 4 + 8/10 = 4.8$$

$$\text{無射 } 4 + 0.4 + 2/3 = 5.066$$

$$\text{應鐘 } 4 + 0.2 + 2/3 = 4.866$$

從數值看，從黃鐘到應鐘的律管是漸次縮短的。考古發現有若干戰國律管的實物。1986年10月，江陵雨臺山21號墓出土了4件律管。研究者根據殘損銘文推測，M21:17-1為新鐘律管，M21:17-2為姑洗律管，M21:17-3為文王律管，M21:17-4因殘損過甚無法確知，但該套律管跟曾侯乙鐘銘文屬於統一樂律體系。新鐘管相當今天的^bF調或^bG調，姑洗管相當於今天的C調，文王管相當於今天的E調^①。這些殘存的戰國律管實物反映了當時律管作為定音高的儀器仍被使用，而使用它們的背後，則反映了周代王官的樂律學到戰國時期仍然保存。

但是，戰國時期得到發展的並不是律管的數值這種古老知識，而是樂律學中律呂和“氣”的關係。古人很早就依靠律管候氣。馮時先生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舞陽賈湖骨笛並不僅僅是滿足人們音樂需要的樂器，它們是用來候氣的^②。上文所引《國語·周語》伶州鳩說“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六氣”即《左傳》昭公元年秦國醫和說的“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的互動“分為四時”，說明周代王官的樂師對“氣”的運行和音律的關係已有了相當深入的、系統化的認識。戰國時期這類知識得到了極大發展，五星在二十八宿中的運行、五行旺相休囚死、十二支化合局都是為了精緻地表明“氣”的某種狀態。納音也在這種背景下，隨著音律跟“數”的關係被引入各種格局。我們看見的銀雀山《陰陽時令占候類》中提到的納音簡，就反映出納音術存在於《三十時》框架中。而且《三十時》的這個框架已經不是最簡單粗糙的了，而是頗為成熟。

經由這樣的過程，納音術已完全偏離了王官樂律學，成了為占測吉凶服務的工具。戰國時期禮典湮廢，金石雅樂急劇衰落，為之服務的樂律學技藝失去了附著的土壤。於是，剩下的那些知識，比如律呂音高跟律管長度的關係，律呂跟“氣”的關係，便自然而然地附屬於大大發展的數術而存在。從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類》看，當時的納音術將律音看作吉凶休咎的憑據。如簡0290：

出。其音大而數，其罰乃大而極，其音小而秣，其罰乃小而久。春贏（通雷）會旦，為大襄，為亂，為役（陰·一二）

此簡出自《占書》。從“為大襄，為亂，為役”看，它是一段總結納音術規律的文字。

① 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284頁。

② 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94—197頁。

“其音大而數”的“數”通“擻”，爲抖擻之意；“其音小而秣”的“秣”可通“怵”，局促之貌。“大而數”和“小而秣”均爲形容在某特定時氣下律管發聲狀態的詞句。看樣子，當時用律管（或別的音高標準器）於一定時氣所得的音還要經過分辨，音大而抖擻，則罰大而極；音小而局促，則罰亦小。以音的大、小辨罰，亦遠承周代王官專職人員以耳力辨別音色的原則。《周禮·春官·典同》：

凡聲高，聲磬，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通達很達的聲高而悠遠），微聲喆（細微的聲音暗啞），回聲衍（回聲有波地散射），侈聲沓（散漫的聲無力），弇聲鬱（鐘體中間寬則聲鬱悶），薄聲甄（鐘體薄則聲呆垂），厚聲石（鐘體厚者發聲如石）。

《典同》此處列舉了正聲、下聲、陂聲、險聲等十一種不同的聲狀，它們跟所鑄青銅鐘的不同質地和鐘體相聯係。將聲狀區分得如此精細，足見在技藝世襲的周代，王官樂師之耳音聽辨過人，其樂律學的技藝有相當部分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到戰國時代，青銅編鐘急劇衰落，樂律學幾乎失傳，對聲狀的分辨遠不及王官樂師那麼專業和講究。於是便出現了銀雀山簡 0290 簡單地以大、小分辨音的情況。而且，《典同》中對聲狀的分辨是應青銅編鐘演奏的需要而生的，銀雀山簡 0290 則完全爲了求得吉凶，這說明古老而成就卓越的王官樂律學終因離生活太遠而淡出。然而，生活的需要、對吉凶的意欲瞭解和把握仍然在人們心中一貫地存在，這就使得人們將散出王官的專學之一——納音術，變成了爲日常生活服務的工具。於是，我們就在銀雀山簡中看見了納音術的內容。

五 結語

本文對銀雀山簡中的納音術作了簡要的考察。雖然銀雀山簡的相關記載寥寥，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當時的納音術的大致面貌。納音術以律呂與時氣的結合關係爲核心，服務於吉凶占驗。從銀雀山漢簡中的納音簡看，納音是作爲時氣的輔助而存在的次要角色。《管子·幼官》記載的“三十時”尚無納音術，而銀雀山簡《三十時》已摻入納音術，其時代肯定在《幼官》之後。但《三十時》的主體內容是按時氣占候吉凶和做事的宜忌，納音只是作爲輔助手段。但即使是次要的手段，也是構成數術之河中最抽象的那縷支流。它是從周代王官樂律學到漢代京房納音術之間的中間環節，正是有它不絕如縷的傳承，才有後來精密完備的京房納音術。而西漢京房的納音術，是將六十納音（十二律各配五音）更精緻地引入納甲說而形成的。

懸泉漢簡中的“懸泉置”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張德芳

內容提要 對兩漢時期的“置”，由於文獻記載之闕略，過去的理解多有不盡全面和準確之處。本文通過懸泉置出土的懸泉漢簡，對懸泉置的管理體制、人員編制和成份構成、內設機構、置與驛、置與郵、置與廄、置與廚、置與騎置、置與傳舍、車馬配置以及懸泉置與其它諸如“魚離置”、“遮要置”的關係和各置在河西走廊的分佈狀況，作了初步考察。旨在通過對懸泉置的分析，從上述幾個側面對研究兩漢時期的“置”提供一些新的認識。

關鍵詞 秦漢史 西北史地 驛置機構 懸泉漢簡 懸泉置

對兩漢時期的“置”，過去研究不夠是由於文獻記載過於簡略。懸泉漢簡^①是對懸泉置日常活動的詳細記錄，通過這些材料，我們可以對懸泉置的情況作出較為詳盡的描述。它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機構，它的隸屬關係如何、管理體制怎樣、人員規模多大、基本設施多少、運行機制如何以及有哪些社會功能，等等。通過這樣一個典型個案的研究，有助於我們解剖麻雀，從個別到一般，深化對兩漢“置”的認識。

① 懸泉漢簡中把“懸”直寫為“縣”，古通。本文在引文中依原文作“縣”，在筆者敘述中則一律作“懸”。

(一)

置，甲骨文、金文中無此字，《說文》：置，“赦也，從网直”。甲骨文、金文中有“德”。《逸周書·官人篇》、《易·系辭上》、《大戴禮記》、《荀子》等都有把“德”通假爲“置”的例子。置作爲郵驛機構，大概從春秋時期就有了。《孟子·公孫丑上》：“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朱熹《四書集注》云：“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朱熹把“置”和“郵”並列，都作名詞解。可見，“置”至遲在孔子的時代就已同“郵”聯係在一起了。

漢魏文獻中，對具有郵驛功能的置大致有三種詮解：一是置即驛也，即後世的驛站。《史記·孝文本紀》：“太仆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漢書·曹參傳》：“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師古曰：“置，若今之驛也。”《劉屈氂傳》：“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後漢書·和帝紀》：“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李賢注曰：“置謂驛也。”《郭太傳》：“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注云：“置亦驛也。”顯然，置和驛同實而異名，指同一件事物，看不出兩者的區別。二是置即郵也。應劭《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雖取設置之意，但置也成了郵的代名詞，置和郵是不同時代的同一個事物。三是作爲動詞解，指根據需要按一定地區、路線和距離設置郵、驛及同類性質的機構。不過後經演變，“置”由動詞變成了名詞，成了郵驛機構的總名，還設官分職，變成了具有多種功能的正式機構。如《史記·田儋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集解》引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廐置，置馬以傳驛也。”這是說養馬以擔任驛遞任務的地方叫廐置。《漢書·文帝紀》：“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注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馮奉世傳》：“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這是說設置驛站的地方叫“置”。《續漢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劉昭注曰：“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傍郡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縣置屋二區。有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上州郡。”這是說有郵、驛同設一地的地方叫“置”。總之，按照這種解釋，置，包含了設置在同一地點的郵、驛、廐等多個機構，或者說具備了上述多種功能。

(二)

懸泉置遺址在今敦煌市和瓜州縣交界處，瓜敦公路六十公里處公路南側兩公里的地方。東經 95° 20′，北緯 40° 20′。此地漢代屬敦煌郡效穀縣轄境，軍事上屬宜禾都尉的駐防範圍。根據漢簡記載，懸泉置在行政上隸屬效穀縣，再上屬於敦煌郡。全稱應是“敦煌郡效穀懸泉置”。有時前面不冠“敦煌郡”，而只作“效穀懸泉置”。大多情況下則直稱“懸泉置”。如：

- | | |
|-----------------------|-------------------|
| 簡 1：●敦煌郡效穀縣泉置□※ | II 90DXT0113①: 22 |
| 簡 2：●元始五年十一月效穀縣泉置見穀茭簿 | II 90DXT0214①: 25 |
| 簡 3：●縣泉置竟寧元年十一月傳馬出入簿 | I 90DXT0110②: 26 |
| 簡 4：縣泉置以亭行 勑 | I 90DXT0109③: 1 |

懸泉漢簡中除了大量關於懸泉置的記載外，還頻繁出現對魚離置和遮要置的記載，顯然後者同前者一樣屬於同類性質的機構。它們的方位從東往西，曰魚離置，曰懸泉置，曰遮要置。大致相隔三十公里，一字擺在通衢要道上。那麼，在敦煌境內，像這樣的機構究竟有多少，簡文中有記載：

簡 5—簡 8：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辛丑，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憲、丞破胡謂效穀書言：甘井驛馬一匹，病狂；縣泉驛馬一匹，傷控，不可用。行軍書有有到，擇騎馬厚輕者二匹補傷，敦煌養食，毋令羸瘦。遣 II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長史憲、丞破胡謂縣：律曰：諸乘置，其傳不為急及乘傳者驛駕□令葆馬三日。三日中死，負之。郡當西域空道，案廄置九所，傳馬員三百六十匹計，以來死者 II 三百六十八匹，過員八匹。令、長、丞不憂親嚴教主者吏馬飲食不得度，病不以時醫治，馬死者以故衆多，甚毋狀，縣泉置尤劇，已論丞、嗇夫，書到，案赦以來當負馬者，趣責馬齒五歲以上至十二歲、高 II 五尺八寸以上、豐厚任用者，守丞行縣見所償馬如律令。^①

II 90DXT0115③: 79—82

這四枚簡應是內容連貫的一個冊書。其中前一簡和後三簡之間有缺簡。簡文有：“郡當西域空道，案廄置九所，傳馬員三百六十匹計。”如果我們把懸泉置也理解為一處廄置，或者說懸泉置包含了類似廄置的話，那麼敦煌郡像這樣的置從東到西共有九處，它們應該

① “II”為兩簡相接處。

等距離地擺放在交通線上，發揮同樣的作用。這九處廩置，除上述所言魚離置、懸泉置、遮要置外，還有淵泉置、廣至置、效谷置、龍勒置等。

簡 9：入錢五百廿三錢，以給卒作席入。神爵二年六月乙丑，縣泉奴御方戶李譚、安世受淵泉置齋夫□。
II 90DXT0314③: 83

簡 10：甘露元年七月甲午朔甲午，廣至置丞彊友移縣泉書曰：遣齋夫禹御筭福持傳馬送丞相史任卿所，送敝車過，稟穢麥小石七石六斗。齋夫禹。
I 90DXT0114③: 25

簡 11：敦煌長史襄行太守事、庫令王兼行丞事，謂龍勒民貲輸敦煌侯奉馴，廣至置丞畢書言。騎馬二百。
V 92DXT1812③: 10

簡 12：七月辛巳，徒復作廿一人，入六人受效谷置。其三人養，三人病，凡廿七人。定作廿一人積…
II 90DXT0113④: 72

簡 13：六尺函經百，龍勒置五十。※
I 90DXT0112②: 88

這九所置，我們在懸泉漢簡中祇能看到上面的七所。不過，近年敦煌縣博物館在玉門關一帶又陸續採獲三百多支漢簡，其中有玉門置的記載。如此，還有一置，是否為冥安置，亦未可知。敦煌郡共六縣九置，平均每縣一個半，全國各縣設置多少是否與此相仿，抑或敦煌地區地處邊遠，地廣人稀而自有其特殊之處，尚不得而知。

(三)

懸泉置的日常工作由置齋夫總領其事。其上除了受效穀縣的直接領導外，敦煌郡還要派員來監領。所派人員一般為郡太守屬吏，如守屬、都吏、史等，以保證太守府對懸泉置的直接領導。不僅懸泉置如此，其它如遮要置、魚離置亦如此，這在簡文中可以得到證明。

簡 14：本始三年七月丁丑，為郡監領縣泉置。亭長國敢言之莫府，謹
I 90DXT0114③: 33

簡 15：……太守守屬光監縣泉置，移效穀。案神爵四年四月中太守府移
I 91DXT0309③: 119

簡 16：五鳳元年五月癸酉，太守守屬光監縣泉置，移效穀，府調□□□□□
I 91DXT0309③: 92

簡 17：五鳳二年八月辛巳朔庚辰，敦煌郡守騎千人禹、獄守丞有兼行丞事敢言之監領縣泉置都吏李卿治所，謹案，置一□置前坐盜賊直百滿以上，論司寇輸府徒屬縣泉

置。掾德、令史博、書佐尊。

II 90DXT0114③: 525

簡 18: 出米六升。六月甲申以食監置都吏宋卿，再食東。

II 90DXT0216②: 633

簡 19—簡 22:

監遮要置吏張禹，罷。|| 守屬解敞今監遮要置。|| 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丁酉，敦煌太守彊、長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告史敞，謂效穀，今調史監置如牒，書到聽與從事如律令。|| 三月戊戌，效穀守長建丞 謂縣泉置嗇夫，寫移書到如律令。/ 掾武、守令史光、佐輔。

II 90DXT0216②: 241—244

以上簡 19—簡 22 是一封完整的檔案，從中可以看到敦煌太守府下文到效穀縣，效穀縣又下達到懸泉置任免監置人員的行文過程。可能解敞從懸泉置調監遮要置，否則任免遮要置監置人員，何以要把文件下達到懸泉置？至於郡府所派監置人員究竟行使什麼樣的職權，尚無準確的材料記載，但郡府對各置的重視程度和直接領導則是無疑的。這是懸泉置以及其它各置管理體制的一大特點。

(四)

懸泉置作為一個公務機構，其服務人員有多少，構成情況如何，規模的大小，漢簡中有反映：

簡 23: 甘露二年八月戊午朔乙丑，敦煌長史奉憲行太守事，謂郡庫□□□……書告縣泉置，官卒徒御卅七人，確二合皆敝盡，不可用，調給有… II 90DXT0216③: 54

該簡是敦煌郡根據人數多少從郡庫中為懸泉置調給生活用具的文件。左半有刮削，留下的右半能看清楚的是“廿七人”。但據字形所佔位置可斷定為“卅七人”無疑。這“官卒徒御卅七人”應該就是懸泉置平時的人員規模。有時可能會有增減，但這個數字應該是懸泉置人員總數的一個常數。從內部管理看，懸泉置的主管官吏是置嗇夫。簡中提到懸泉置嗇夫的簡有二百五十三支，懸泉嗇夫的簡九十八支。二百多年中，有名字可考的懸泉嗇夫有四十五人。^①簡文如：

簡 24: 入錢六百以賦七月更。元康三年八月辛酉朔壬戌，廢御高心里張丁受縣泉

① 嗇夫賞、嗇夫定、嗇夫尊、嗇夫敞、嗇夫奉德、嗇夫牛敞、嗇夫並、嗇夫慶、嗇夫章、嗇夫譚、嗇夫長、嗇夫光、嗇夫就、嗇夫弘、嗇夫褒、嗇夫乃始、嗇夫昌、嗇夫禧、嗇夫賀、嗇夫訢、嗇夫博、嗇夫欣、嗇夫奉光、嗇夫孫章、嗇夫忠、嗇夫丹、嗇夫捕、嗇夫鳳、嗇夫遂成、嗇夫遂、嗇夫申奴、嗇夫護、嗇夫實、嗇夫福、嗇夫衛之、嗇夫賽、嗇夫幸光、嗇夫建、嗇夫李卿、嗇夫樊、嗇夫孟丹、嗇夫得之、嗇夫順、嗇夫溫少孫、嗇夫奉。

置喬夫弘。

V92DXT1812③: 16

簡 25: 永光元年六月丙寅朔丁卯，縣泉置喬夫奉光、佐建敢言之，謹移四月盡六月兵簿一編敢言之。

V92DXT1410③: 23

懸泉置的吏員除置喬夫外，還有置丞、置佐等，他們是喬夫的副貳，協助處理置務。

簡 26: 入穡麥小石卅七石五斗。永光五年十一月壬子，縣泉置佐建受廣至樂世里龍明。

I 90DXT0116②: 61

簡 27: 入穡麥小石五十六石二斗五升。永光五年十一月壬子，縣泉置佐建受廣至富昌里陳世。

I 90DXT0116②: 127

簡 28: 出粟一石。馬五匹，送羌王索盧椽，東。元始五年十一月癸丑，縣泉置佐馬嘉付敦煌御任昌。

II 90DXT0113①: 4

簡 29: 五鳳二年十一月己卯朔甲申，縣泉置丞可置敢言之府，傳馬三匹，病狂，醫治不能瘡，日益劇，終不可用，十月乙丑關書縣，請刺賣。喬夫忠、佐閭、廣宗。

II 90DXT0114⑤: 1

簡 30: 甘露四年十一月甲辰朔辛未，縣泉置丞祿敢言之，謹移十月盡十二月粟簿一編，敢言之。據廣意、佐世。

II 90DXT0115④: 33

服務於懸泉置的下層人員有卒、御、奴、徒、復作等。簡文如：

簡 31: 縣泉卒龐聖來，二石三斗九升，紫。

II 90DXT0114③: 230

簡 32: 印曰效穀丞印。年九月辛丑縣泉卒□以來。

II 90DXT0114④: 394

簡 33: 板檄一封，酒泉大守章，詣敦煌大守府。甘露五年正月戊申日出時，縣泉御顧順受魚離御虞臨。

II 90DXT0214③: 185

簡 34: 出粟六斗。馬三匹，送史曹衛卿、書佐宋卿。綏和二年八月壬辰，遮要置喬夫嘉付縣泉御忘。

II 90DXT0213②: 33

簡 35: 入粟六斗。鴻嘉四年十一月癸丑，縣泉奴便受遮要喬夫護。

II 90DXT0113③: 7

簡 36: 入糜二，馬一匹送都吏。元始二年六月壬寅，縣泉奴狗奴受遮要紫。

II 90DXT0114②: 110

簡 37: 入粟一斗五升。鴻嘉二年五月丙戌，縣泉徒孫襄受遮要置喬夫慶，以食行

書馬一匹。

II 90DXT0111①: 95

簡 38: 鴻嘉四年十二月丁卯，縣泉置徒張陵受遮要置衛夫護。

II 90DXT0212②: 19

簡 39: 皂復禰一領。書一封，廣至長印。七月丁巳，縣泉置復作定付遮要御解未央。

V 92DXT1410③: 121

簡 40: 乘廿一輶傳，餘皆完。建昭四年四月癸亥，縣泉復作周安受遮要徒趙弘、假佐趙中。□□□。

II 90DXT0216②: 571

大致來說，傳遞信件、接送行旅、駕車喂馬、伐茭割草以及其它各種雜務，主要是由這些人承擔的。

(五)

置和驛並不完全等同。懸泉置包含了懸泉驛，驛應是置的一個內設機構。驛有驛佐、驛騎、驛小史、驛卒等。其職責主要是承擔公文快遞。簡文如：

簡 41: 陽關都尉明上書一封。甘露元年十一月丁酉日中時，縣泉譯騎德受平望譯騎□□，日中時付遮要譯騎。

I 90DXT0114③: 5

簡 42: 敦煌玉門都尉千秋上書一封。初元五年二月辛亥日下舖時，縣泉驛小史毋知受平（望）譯小史惠。到日莫舖時付廣至萬年譯小史。

V 92DXT1311③: 272

簡文中譯、驛相通。不僅懸泉置設驛，遮要置、魚離置亦有驛。而且簡文中看到的驛還有：平望驛、甘井驛、臨泉驛、田聖驛、萬年驛、毋窮驛等。這種情況正說明驛是置的一個附屬機構，置和驛有區別。

簡 43: 入東軍書一封，玉門都尉上。建平三年四月癸卯定昏時，遮要驛吏並受甘井驛音。

II 90DXT0214②: 266

簡 44: 西域騎都尉上書一封，四月丁亥蚤食時，縣泉驛騎□付魚離驛騎□。

V 92DXT1311④: 47

簡 45: 臨泉驛丁護受平望驛。

II 90DXT0114③: 383

簡 46: 入粟斗五升。陽朔二年四月癸卯，臨泉驛卒赦之受遮。

I 90DXT0210①: 88

簡 47: 玉門都尉上書一封。五鳳二年十二月己巳蚤食時，縣泉佐□□田聖驛騎達。

II 90DXT0212S: 33

簡 48: 丞將萬年驛佐善康到界上□牒。

VI 91DXF13C②: 17

(六)

懸泉置有廄，廄有廄畜夫、廄佐、廄御、廄徒、馬醫等，亦應是懸泉置的一個內設機構，其職責主要是飼養馬匹。

簡 49: 出粟四斗五升，送軍候令吏二百。建始二年十一月丙戌，縣泉廄畜夫欣付遮要徒賈尊。

II 90DXT0111③: 29

簡 50: 陽朔元年三月戊申朔戊申，縣泉廄畜夫敢言之，謹移三月旦見傳馬如牒，敢言之。

II 90DXT0112③: 128

簡 51: 建始二年九月乙酉朔癸丑，縣泉廄畜夫欣敢言之，廷達就家萬年里朱青、千秋里李畢已牛車各一兩，載粟小石八十四石，謹受如牒。敢言之。

II 90DXT0214②: 63

廄是置的附屬機構，但又有專門職守。懸泉簡中能看到的敦煌境內的廄有：敦煌廄、龍勒廄、廣至廄、冥安廄、效穀廄、淵泉廄、懸泉廄、魚離廄、遮要廄。除懸泉、魚離、遮要三置有廄外，各縣也都有廄，所以廄置連用，廄置驛騎連用，大概主要是由於它們性質相似，關係密切的緣故。

(七)

懸泉置的附屬機構還有廚，廚有廚畜夫、廚佐等。主要負責食糧出入和行旅膳食，也兼其它工作。

簡 52: 出錢四百，以買死馬肉二匹。其一匹名曰逐善，一匹名曰破石。十一月戊寅，畜夫李光、廚畜夫宮、佐順賞市。

II 90DXT0114②: 90

簡 53: 元康四年十二月甲寅朔戊辰，縣泉廚畜夫時敢言之，謹移正月盡十二月丁卯鷄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I 90DXT0112③: 131

簡 54：出正月司御御錢四百。甘露四年二月癸亥，縣泉廚佐憲付司御徐光。

II 90DXT0114③: 219

簡 55：縣泉置河平三年十月廚杯器物名籍。𠂔

II 90DXT0215②: 404

簡 56：入穢麥百卅三石。十月辛卯，廚佐定受乾齊萬歲里馬罷軍。

II 90DXT0215④: 10

簡 57：縣泉置元康三年七月廚食器簿。

II 90DXT0313③: 1

同樣，廚作為置的一個附屬機構，除懸泉置外，還可在魚離置和遮要置中找到例證。

簡 58：□□辰，縣泉畜夫建付魚離廚佐憲𠂔。

II 90DXT0216②: 395

簡 59：□輸大守府謁報言之。卒史趙卿自付遮要廚□□傳到縣……

V 92DXT1712④: 25

在簡文中能看到的廚還有：龍勒廚、廣至廚、淵泉廚。它同置的建置和分佈相吻合的情況也說明廚是附屬於置的。

(八)

懸泉置的內設機構還有騎置，簡文有：

簡 60：縣泉置騎置，西到平望騎置五十里𠂔，東出廣至萬年騎置卅𠂔。

V 92DXT1411②: 55

簡 61：效穀甘井騎置一所，第二，馬三匹，吏一人，小未傳三人。

II 90DXT0115③: 32

簡 62：效穀遮要騎置一所，第三，馬三匹，吏一人，𠂔。 V 92DXT1812②: 103

簡 63：效穀平望騎置一所，第四，馬三匹，吏一人，小未傳三人。

II 90DXT0216②: 341

簡 64：凡騎置四所，所三人，馬三匹，從養百……

II 90DXT0216②: 578

《漢書·李廣傳附李陵》：“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西域傳下》：“張掖、酒泉道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事實上，騎置並非一般的驛騎、驛馬，而是專門為皇帝和朝廷投送軍情急報的機構。金關簡中有“[力]書一封騎置馳行[力]”、

“皇帝璽書一封，賜使伏虜居延騎千人光。制曰：騎置馳行，傳詣張掖居延使伏虜騎千人光所在。毋留，留，二千石坐之。從安定道。元康元年四月丙午日入時界，亭驛小史安以來，望□行。”^①

置中有傳舍，供行旅住宿，是附屬於置的內設機構。傳舍有傳舍畜夫、傳舍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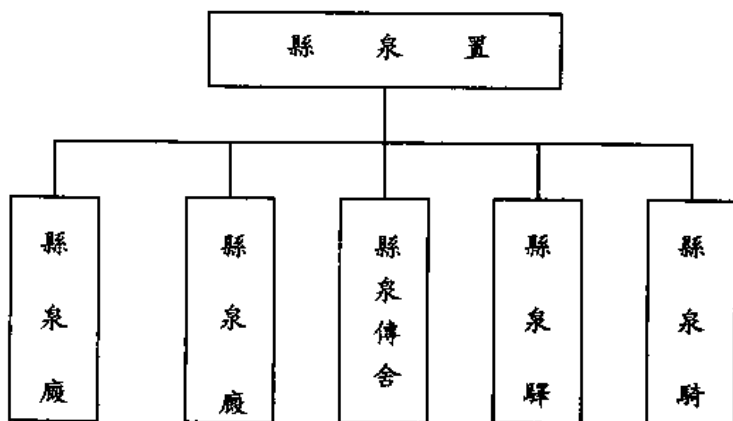
簡 65：某年正月乙未朔甲辰，縣泉傳捨畜夫某。謹移床席簿一編敢言之。□之告之□某。

II 90DXT0214③: 266

簡 66：入千人范君所買脂二百五十三斤二兩。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癸亥，縣泉傳捨假佐審、護衆受魚離傳舍假佐杜赦。

V 92DXT1312③: 64

懸泉置內設機構示圖



(九)

對一些公文信件的傳遞，懸泉漢簡中多次出現懸泉置以郵行的記錄。並出現了懸泉郵、懸泉郵人的簡文。如：

簡 67：■右三月卅四人。其十六人東東，三人流不知處，一人吏，一人論，二人死，廿一人在部下，十二人瓜田，三人作郵人。

II 90DXT0114②: 171

簡 68：入東軍書一封，敦煌中部都尉臣鄧上，詣行在所，綠緯完。居攝二年十月癸亥夕時，縣泉郵人欽受平望郵人鄧同。即時遣張欽行。

II 90DXT0114③: 7

① 兩簡簡號分別是：73EJT10:319、73EJT21:1。

簡 69: 永始二年八月癸未朔庚戌, 陽關都尉_※家別名籍一編敢言之。九月甲寅, 郵卒雲以來。長史前_※ II 90DXT0114③: 235 (節引)

簡 70: 永始二年六月甲申朔壬辰, 敦煌都水守_※奴婢名籍一編敢言之。六月乙未, 郵卒雲以來。長史前_※ II 90DXT0214②: 16 (節引)

簡 71: 入西書八, 郵行。縣泉郵孫仲受石摩郵牛羌。永平十五年三月九日人定時。

VI 91DXF13C①: 5

簡 72: 出西書一, 郵行。書河南丞印章, 三月五日起蒲驛□落淞頭, 詣□一簡嚴詣府。永元十四年四月廿九日日中三刻盡時, 縣泉驛佐吾武付毋窮驛佐魏勾。

VI 91DXF13C②: 7

簡 73: 入西書□□□二, 郵行。□□四月廿九日起長詣府。永平十五年三月四日夕時, 縣泉□□□長印□□。三月四日夕時。

VI 91DXF13C②: 13

簡 74: 入東書二封, 郵行。書一, 西部督郵印, 詣東部督郵; 書一, 小府印, 詣廣至; 一封摩□印√廿七日起。九年四月廿九日食時分盡, 縣泉郵_※謝受寄人。□□□部李李子亭部。

VI 91DXF13C②: 14

從上引簡文中可以看出, 郵人、郵卒、懸泉郵的記載, 紀年最早的在新莽時期, 其它大多也是東漢。沒有紀年和難以準確判斷時代的此類簡, 大致也在此時。所以, 應劭《風俗通》中“漢改郵爲置”的記載, 有一定根據, 祇是不全面。準確地說, 應該是“並郵入置”, 郵和置並不同, 祇是郵的功能由置所代替, 而置除了郵的功能外, 還有其它功能。此其一; 其二, 漢並郵入置, 也祇是西漢的情況, 到新莽東漢時, 似乎又恢復了郵的建置, 祇是這種郵已附屬於置。上述簡文中石摩郵、懸泉郵、平望郵的出現, 就說明了此類情形。

(十)

懸泉置的車輛, 主要是傳車, 其次是牛車。傳車大約有十至十五輛。《傳車置輦簿》就是記錄傳車完弊情況的簿冊。該冊雖有殘斷, 但基本面貌是完整的。

簡 75—簡 84

※□敦煌 ※

※故完可用 ※

※乘 敝可用

第四傳車一乘 敝可用

第五傳車一乘 輦完 輪輹 敝盡會輹四折傷不可用𦰩

第六傳車一乘 輦左軸折 輪輹敝盡不可用 𦰩

輦輦一 左軸折

輦輦一 左軸折 𦰩

輦輦一 左軸折

陽朔二年閏月壬申朔癸未，縣泉置嗇夫尊敢言之，謹移傳車車輦輦簿一編敢言之。

I 90DXT0208②:1-10

簡 85：縣泉置見傳馬卅三匹。其十三匹留置，卅四傳車十乘遣吏御持□𦰩。

I 91DXT0309③: 289

簡 86：縣泉置遣吏持傳車十乘，馬廿五匹，皆駕三被具蓋，蓋重屏泥割 𦰩。

II 90DXT0215②: 439

簡 87：傳車十乘完。

V 92DXT1310③: 106

簡 88：𦰩□敦煌，傳車十乘，馬十三匹到遮𦰩。

V 92DXT1310③: 133

簡 89：𦰩傳車十五乘。問充所𦰩。

II 90DXT0215③: 139

簡 90：十二月餘傳車十五乘，其一乘右輪傷；一乘右輪傷三輹，輦敝盡，左輹傷；一乘右軸折傷；一乘左□敝傷；四右輪輦敝盡。

VI 92DXT1222②: 28

從上列簡中可以看出，一般情況下，懸泉置有傳車十乘。所謂十五乘者可能包括了那些“敝盡”不能用者。祇是為上報而清點充數。至於傳馬，按簡 5-8 的記載，額定四十匹。但各個時期變化比較大，少的時候祇有二十多匹，多的時候達到五十多匹。下面簡文中有些可能記載不全，但我們都把它列出來，大致能看到這種變化的幅度。

簡 91：綏和元年正月庚午朔。縣泉置嗇夫賞敢言之，謹案置見傳馬廿一匹，皆羸瘦。

II 90DXT0113②: 35

簡 92：𦰩辛丑廚佐憚以食傳馬廿二匹，驛馬三匹，牛六。𦰩 II 90DXT0215④: 72

簡 93：出糴麥九石六斗，其一石六斗加食，丙午以食傳馬廿三匹，驛馬三匹，牛五。

II 90DXT0115④: 2

簡 94：七月餘傳馬卅匹。

II 90DXT0313S: 15

簡 95：今餘傳馬卅二匹，其三匹假中部都尉，一匹假中部尉丞，見廿八匹。

II 90DXT0115③: 47

簡 96：𦰩□見傳馬卅二匹，上駕五。

II 90DXT0111②: 23

簡 97: 出芟三百一十五石, 以食傳馬冊二匹。十一月己卯盡戊申冊日, 積千二百六十匹, 匹一鈞。

II 90DXT0113④: 69

簡 98: 凡傳馬冊三匹。✱

II 90DXT0111①: 73

簡 99: 凡傳馬冊四匹。其一匹假匈奴譯, 見冊三匹。✱

II 90DXT0213①: 8

簡 100: 凡傳馬冊五匹。✱

II 90DXT0113③: 45

簡 101: 縣泉置三月旦見傳馬冊六匹。其一匹過二月丁未送謁者郭君, 西到遮要置病中, 盡三月戊申死, 今見傳馬冊五匹。

II 90DXT0112③: 127

簡 102: 出芟三百六十石, 以食傳馬冊八匹積千四百冊匹一鈞。

I 91DXT0309③: 232

簡 103: 正月餘傳馬冊九匹。二月甲子盡壬辰廿九日, 積千四百廿一匹。

II 90DXT0216②: 237

簡 104: 凡傳馬五十五匹。

V 92DXT1812②: 65

懸泉置大宗的物資運輸要雇民間就人就車, 但日常生活中, 拉運糧料芟草和薪水要靠自己的牛車。所以除了供養傳馬驛馬外, 還要養牛, 牛車也是懸泉置的基本裝備。這些牛車除了日常生活所需外, 有時候也接送客人:

簡 105: 縣泉置本始五年四月官牛名籍✱

I 90DXT0209⑤: 3

簡 106: 縣泉置元康三年九月官牛簿

II 90DXT0111④: 1

簡 107: 出芟百石。以食官牛七, 積二百牛, 牛二鈞。

I 91DXT0309③: 179

簡 108: 己巳, 出穰麥小石十五石一斗。以食傳馬譯馬官牛。

II 90DXT0214③: 205

簡 109: 縣泉置初元年十月官牛車簿

V 92DXT1311③: 134

簡 110: 右官牛車五兩牛六頭

I 90DXT0210①: 21

簡 111: 二月餘官牛車五兩。其三折傷, 二完。✱

II 90DXT0114⑥: 30

簡 112: 九月餘官牛車五兩。其三兩幣盡, 二兩完。

V 92DXT1311③: 9

簡 113: 六月餘官牛車五兩。其一兩幣, 毋軸。四兩完。✱

V 92DXT1311③: 299

簡 114: 三月餘官牛車五兩完。

V 92DXT1311④: 10

簡 115: 謹案所假官牛車五兩為傳馬載芟運薪水皆報

I 90DXT0210①: 66

可以看出, 懸泉置額定牛車一般有五輛, 要駕服這些車輛, 還要豢養一定數量的牛。這也是研究懸泉置時不可忽視的問題。

通過上述簡文的考察, 懸泉置是一個具有廄置、騎置、驛置、傳置、廚、郵、傳舍等

多種功能的機構。它由郡太守派員監領，隸屬效穀縣，由置嗇夫管理日常工作，並有官徒卒御三十七人，內設多個具有上述功能的下屬機構，有傳車十到十五輛，有傳馬四十匹左右（有時多到五十多匹，有時少到二十多匹），還有官牛和牛車。主要負責朝廷使者、全國各地因公過往人員甚至路過此地的戍卒、刑徒等各類人員的食宿接待和迎來送往。同時也負責接待西域各國和中亞一帶來漢地通好、朝拜、經商的貴族、使者和商賈隊伍。傳遞軍情急報和公文信件是懸泉置的一項基本任務，但不是它的全部。通過對懸泉置的解剖，舉一反三，我們可以看到兩漢時期的置在當時的分佈、功能及其社會作用。過去注家把兩漢文獻中的置單純詮解為驛和郵是不全面的，給後人對置的理解帶來了誤區。

漢代文書行政和傳遞體系 ——以“元康五年詔書冊”為中心

[韓] 成均館大學 金慶浩

內容提要 古代中國的文書行政是通過發達和完備的地方行政制度及統一文字而形成的行政體系。在各地出土的簡牘中，把皇帝的命令傳遞到地方最下級的詔書、法律文書之類的下達文書和把地方的實情向中央報告的簿書或爰書等上計文書佔了大部分。命令的傳遞和地方行政的詳細報告是通過文書實現的，而系統的文書行政制度又使帝國的運營顯得更加順暢。“元康五年詔書冊”向我們生動地展示了典型的文書傳遞體系和國家權力向地方最下級機關的滲透。“元康五年詔書冊”揭示了漢代文書行政的大原則，徹底地遵守原則便是形成中央集權國家體系的基礎。

關鍵詞 居延漢簡 “元康五年詔書冊” 秦簡行書 《二年律令·行書律》 文書行政

一、問題之所在

古代中國的文書行政是由發達完備的地方行政制度及統一的文字構成的行政體系。秦始皇每天要看完約一石的報告書才睡覺，^①《睡虎地雲夢秦簡》說所有報告祇能採用文書形式，《行書律》和《內史雜律》對文書的發、收及遺失等作出了相關規定，這些都從側面證

①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258頁）

明秦代國家的命令是通過文書行政來實現的。^①此外，睡虎地雲夢秦簡、里耶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尹灣漢簡、張家山漢簡等也生動地展示了以文書行政為媒介的秦漢時期中央集權統治結構的實態。^②

在各地出土的簡牘中，把皇帝的命令傳遞到地方最下級的詔書、法律文書之類的下達文書和把地方的實情向中央報告的簿書或爰書等上計文書佔了絕大部分。像這種命令的傳達和對地方行政詳細的報告是通過文書實現的，而系統的文書行政制度又使帝國的運營顯得更加順暢。由此可以看出文書涉及面廣，內容多樣。其主要內容不僅涉及法律、地方行政、官吏的職責行使等相關行政文書，還包括關於日書、^③節日的簡。因此，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秦漢時期行政文書簡的研究，^④特別是與文書行政有關的文書的傳遞等相關問題。^⑤而且，通過簡牘研究進一步明確了地方行政、法律及各種制度以及日書等的性質，試圖克服文獻資料的局限性，有助於提高對古代中國社會面貌的新認識和理解。^⑥

因此，本文試圖以多種簡牘研究為背景，重新探討“元康五年詔書冊”。^⑦以往的研究，多把注意力集中於詔書的復原。筆者之所以重新關注“元康五年詔書冊”，是因為從這一資料中可以了解文書的傳遞過程及其具體的情況。

二、“元康五年詔書冊”的傳遞體系

展示了詔書的實際形式和文書行政的“元康五年詔書冊”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即上

- ① 睡虎地雲夢秦簡整理小組：《睡虎地雲夢秦簡》（以下稱《秦簡》，文物出版社，1981）“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也）”61頁；“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聽請。”62頁。
- ② 請參閱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治：《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吳弼驥、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東海縣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文物出版社，2001。拙文將上述資料分別簡稱為：居延漢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尹灣漢簡、張家山漢簡。
- ③ 下列兩個出土簡牘可證明：第一，沒有出土法律文書，祇出土了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以及二世元年的占卜類的關沮秦漢墓簡牘（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第二，除了出土大量的行政文書外，還出土了《神龜占》、《博局占》、《刑德行時》、《行道吉凶》等占書的尹灣漢簡。此外，有關居延漢簡可以參閱以下論文：胡文輝：《居延新簡中的〈日書〉殘文》，《文物》1995年第4期；魏德勝：《居延新簡、敦煌漢簡中的“日書”殘簡》，《中國文化研究》，2000，春之卷。
- ④ 對秦漢時期簡牘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關於從簡牘的發現到最近的研究動向，主要可參閱以下文章：徐蘋芳：《中國漢簡的發現與研究》，載《漢簡研究的現狀與展望》（大庭脩編輯：1992年漢簡研究國際討論會報告書，陝西大學出版部，1993）；富谷至：《二十一世紀的秦漢史研究—簡牘資料—》，載《岩波講座世界歷史3》，岩波書店，1998。
- ⑤ 鷗飼昌男：《居延漢簡にみえる文書の傳遞について》，《史泉》60，1984；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汪桂海：《漢代文書的收發與啓封》，《簡帛研究》第3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高榮：《秦漢郵書管理制度初探》，《簡帛研究2002-200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⑥ 有關論著已有很多，但專門研究居延漢簡的可以參考以下專著：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永田英正：《居延漢簡の研究》，同朋社，1989。
- ⑦ 大庭脩：《居延出土の詔書冊》，《秦漢法制史の研究》，創文社，1982。

奏文〔(10.27)、(5.10)〕, 皇帝的認可〔(332.26)〕, 執行下達文書〔(10.33), (10.30), (10.32), (10.29), (10.31)〕。^①

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書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寢兵大官抒井更水火進鳴雞謁以聞布當用者●臣謹案比與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別火 10.27

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長安雲陽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寢兵不聽事盡甲寅五日臣請布臣以聞 5.10

制曰可 332.26

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10.33

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少史慶令史宜王始長 10.30

三月丙午張掖長史延行太守事肩水倉長湯兼行丞事下屬國農部都尉小府縣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守屬宗助府佐定 10.32

閏月丁巳張掖肩水城尉誼以近次兼行都尉事下候城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守卒史義 10.29

閏月庚申肩水士吏橫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長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令史得 10.31

上奏文的主要程序是按照“大史丞定→大常蘇昌→丞相魏相”的順序, 把有關部門呈交上來的意見最終通過御史大夫丙吉的審查上奏給皇帝。皇帝對此認可(“制曰可”)後, 元康五年二月十一日, 御史大夫又把執行文書傳遞給丞相, 57 天後, 即四月九日到達河西走廊南邊甘肅省戈壁(GOBI)沙漠以南今金塔縣地區的肩水候官並執行。^②詔書具體的傳遞路程或許可以通過《居延新簡》E. P. T. 59:582 簡及《敦煌懸泉置漢簡》II 0214①:130 簡的內容得到確認。詔書從“長安→安定高平(天水平襄)→武威(姑藏)→顯美→日勒→冊丹→屋蘭→鐐得(或經氏池)→昭武→祁連置→表是→肩水候官”的路徑傳送。

①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敦煌文藝出版社, 2001)第1冊《圖版選》卷上, pp.81-82, 169 頁。但 5.10 的照片, 書上沒有刊登, 另用以下資料中的照片: 富谷至:《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國古代一書記の文化史》(岩波書店, 2003), 124 頁。

②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 地圖出版社, 1982, 33 頁, 5-②、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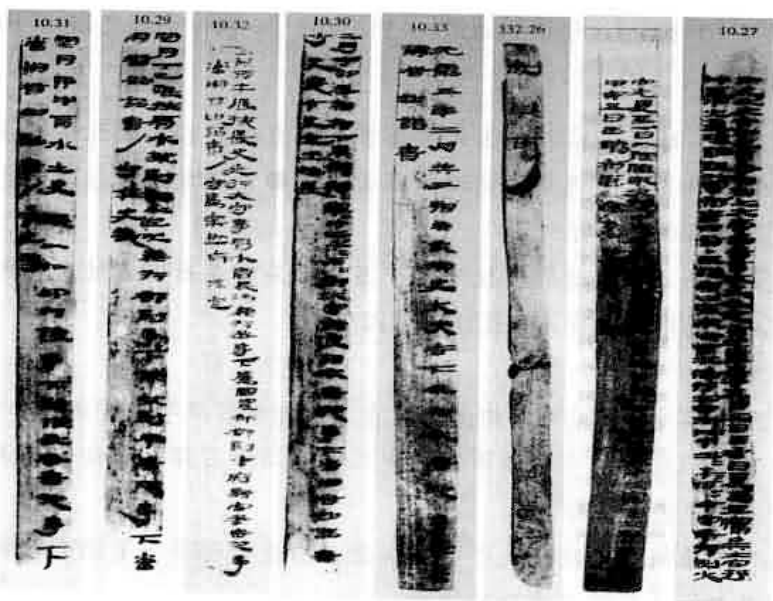


圖 1 《元康五年詔書冊》

在“皇帝→御史大夫→丞相”的傳遞過程中，估計“元康五年詔書冊”被抄寫過一封。但在“丞相→中央官府或者郡太守”的傳遞過程中形式不同。據《漢書·地理志下》“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平帝時期郡國有 103 個。若平帝時期郡國有 103 個的話，下達給郡國的“元康五年詔書冊”至少有 103 封以上，其中一封是傳遞給張掖郡的。這份詔書是傳達給隸屬於張掖郡的 10 個縣^①和 2 個都尉府即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的。而且傳達給都尉府的文書又送達了候官，傳達給縣的文書又要把詔書的內容傳達給鄉里。郡縣將詔書傳給下級單位鄉里時，不是以下達文書的形式，而是以照搬詔書內容的“扁書”的形式，告之鄉里的一般百姓的。分析有關“扁書”的簡牘會發現，爲了讓百姓能熟知其內容，一般挂在鄉里的門外能看見的地方。^②因此獲得皇帝承認的詔書通過以上傳遞體系到達縣以後，在鄉里又通過“扁書”的方式使國家權力和皇帝的命令能下達到末端組織鄉里。

如果根據東海郡出土的尹灣漢簡的內容來理解這種詔書傳遞的話，很容易推測張掖郡

① 據《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1613 頁，張掖郡下轄縣共有 10 個，冊丹縣的名稱在居延漢簡裏沒有出現。

②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2000ES7S:4A（187 頁）：“十一月壬戌張掖太守融守部司馬橫行長史事守部司馬焉行丞事下部都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明白大扁書鄉市里門外謁舍顯見處令百姓盡知之如詔書到言”；《居延漢簡》簡 139.13（230 頁）：“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庫丞登兼行丞事下庫城倉口用者書到令長丞候尉明白大扁書鄉市里門亭顯見”；《敦煌漢簡》1365（142 頁）：“知令重寫令移書到各明白大扁書市里官所舍門亭隧埃中令吏卒民盡訟知之……”可參閱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扁書、大扁書考》，中華書局，2001。

可能採取與東海郡管轄下的 18 個縣和 170 個鄉的文書傳遞一樣的方式。因此，二月十一日頒發的詔書到達每個地區的時間雖然不同，但經過 50 多天的時間，皇帝的命令可以傳到從東海到西北邊境的所有地區。這可以從“永始三年詔書”^①或者“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令”^②得到確認。

若說皇帝的詔書能在 50 多天後可到達邊境地域，那麼當時是否有可能實施有效率的中央集權統治呢？首先，我們將探討與此相關的秦簡《行書律》的文書傳達規定和有關記載^③，因為它不僅明確規定要記錄文書的出發和到達時間，官府間還互相報告。還有，如果文書傳遞過程中發生事故的話，會對此進行追究調查。這樣的文書傳遞規定在漢代被原原本本地繼承下來，以居延漢簡 157·14 的內容可以為例。

北書三封合檄板檄各一 其三封板檄張掖大守章詣府
合檄牛駿印詣張掖大守府牛掾在所
九月庚午下鋪七分臨水卒副受卅并卒弘雞鳴時當曲
辛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時三分□行一時二分

該簡向我們展示了北書 3 封和合檄、板檄的書信各 1 通的傳遞過程。它不僅記載了文書的發信者和收信者，還記載了文書的傳遞距離（界中），實際所用時間（定行），是否超過規定時限等。^④而且，居延漢簡內容中“留遲○時解何”^⑤的詞句，揭示了如果在文書規定的時間內沒有到達，將會有處罰。與此相關，張家山漢簡《行書律》裏規定“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過半日至盈一日，笞百；過一日，罰金二兩”，1 日的文書傳遞距離是 200 里；規定“不中程”即文書傳達延期時，要受處罰。

強調文書傳達的嚴格性和正確性的漢簡的內容中，似乎不允許文書傳遞的延期。秦簡“命書（詔書）”及文書署“急”字^⑥，就表示特別緊急的情況，漢簡也採用了“急件”或“密件”的標記^⑦，以顯示詔書文書的重要性。像“人定（21—23 點）”，“夜大半（凌晨

① 請參閱大庭脩《漢簡研究》（同朋社，1992）第 1 章《肩水金關出土の〈永始三年詔書〉冊》，23—41 頁。

② 請參考初世實《居延漢簡〈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考古》1980 年第 2 期；袁錫圭：《關於新出〈甘露二年御史書〉》，《考古與文物》1980 年第 3 期；《關於新出〈甘露二年御史書〉一文的更正信》，《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 3 期；朱紹侯：《對〈居延漢簡〈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令〉考述〉的商榷》，《河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 年第 4 期；楊炯：《〈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令〉冊釋文輯校》，《簡牘學研究》（第四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

③ 《秦簡》104 頁：“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至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毀（也）。書有亡者，亟告官。隸屬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書廷辟有曰報，宜到不來者追之。行書”

④ 高恆：《漢簡牘中所見令文輯考》，《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397—398 頁。

⑤ 《居延漢簡》133.23（223 頁）：“臨水卒戎付誠勞北隄卒則界中八十里書定行九時留遲一時解何。”；231.2（374 頁）：“界中八十里書定行十里留遲一時解何。”

⑥ 《秦簡》103 頁：“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不急者，日驚（畢），勿敢留。留者以律論之。行書。”

⑦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132—133 頁。

1 點左右)”，“雞鳴(凌晨 2 點左右)”^①等這樣的文書傳遞時間，說明在深夜裏也要傳遞文書。^②根據漢代對以詔書為代表的行政文書的規定，可以知道其執行的徹底性。對“元康五年詔書冊”等此類詔書到達地方最下級機構要 50 多天的事實，沒有必要去追究其文書傳遞的迅速性和嚴格性。因為從詔書的性質來看，它本來就是給了充分的時間才頒佈的。

但是依據“1 日=160 里”的文書傳達規定(“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EP. S4, T2:8A)^③和“1 日=200 里”的規定(張家山漢簡《行書律》)以及從長安到肩水候官的詔書的到達時間是 57 天的事實，其間距離應該是 9120 里或者 11400 里。但是參考懸泉置到長安的距離是 4080 里的記載，長安到肩水候官的距離與之差異不應那麼大。根據《居延新簡》E. P. T. 59:582 和《敦煌懸泉置漢簡》II 0214①:130 的內容，長安至肩水候官的距離可以整理如下：

長安 → 安定 高平(929 或天水 平襄 1250) → 武威(姑藏, 1449) → 顯美(75) → 日勒(301?) → 冊丹(87) → 屋蘭(120?) → 緄得(?或經由氏池 104) → 昭武(62) → 祁連置(61) → 表是(70) → 肩水候官(360.7 或懸泉置 462) (單位：里)

長安到肩水候官的距離大約是 3,600 里，按詔書到達的速度“1 日=160 里(200 里)”的基準計算的話，需要 22(18)天左右。那樣的話，和詔書上的 57 天會相差很多。這樣的差異可能是由於“元康五年詔書冊”的內容不是和國家的統治有關的緊急事務，而是對日常生活有關的節日(夏至)的規定。那麼節日的內容用詔書規定後向各地方傳達的事實，說明國家權力不是單純從巫術的角度，而是把它作為統治手段運用。而且皇帝不僅僅是享有最高權力的統治者，而是主宰宇宙秩序的超越者，用詔書傳遞和節日有關的內容也就不難理解了。^④

筆者關注“元康五年詔書冊”的另一問題是，如何將文書傳遞過程中御史大夫予以定位。丞相和御史大夫作為向地方官署傳遞詔書的主體並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俸祿比丞相低的御史大夫從皇帝那裏直接接到詔書後再向丞相傳遞這一過程。^⑤為了更具體地瞭解這一點，以敦煌懸泉置漢簡的相關記載作為參考。現在已經報告和整理的懸泉置漢簡當中，詔書、律令、司法文書等，與政治有關的文書約 44 件，這當中能相對較好地顯示出文書傳遞

①《居延漢簡》104.44(175 頁)：“三月丁未人定當曲卒樂受收降卒散夜大半付不侵卒雞鳴五分付吞遠卒蓋”

②反映在漢簡裏的時制，可以參閱下列論著：陳夢家：《漢簡年歷表》，載《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中華書局，2003，181—199 頁。

③張俊民：《〈二年律令行書律〉淺析》，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 9 輯，2004，343—346 頁。

④金東駿在他的研究中《〈漢代的節日與地方統治〉》，《東洋史學研究》69, 2000 提出這樣的主張：漢代的卜日和臘日等節日是由國家權力制定的。這是以皇帝作為超越的權力者要展現自己最高的權威的一種強制性國家事務。並且其具體內容由國家權力製造的日曆裏被標記頒佈到全國。日期每年有改動(53 頁)。該論文詳細論述皇帝對節日的介入，源於作為時間的主宰者的皇帝權力。(57 頁)

⑤《史記》卷六〇《三王世家》(2105 頁)：“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

體系的簡是“尚書丞昧死以聞：制曰：可。（下略）”（87—89C：11）；“正月庚子，丞相玄成下小府、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少史通、令史舜”（0214①：129）；“制曰：下大司徒、大司空（下略）”（II 0214②：556）；“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憲，承制詔侍御史曰（下略）”（I 0112②：18）等，但已充分顯示詔書傳遞體系集中於丞相和御史大夫。

簡 87—89C：11 引用了有關軍功褒賞的詔書的一部分，尚書令把此報告給皇帝。簡 0214①：129 的主要內容不太明確，是有關元帝永光二年（前 42）至建昭三年（前 36）6 年間歷任丞相韋玄成將詔書傳遞給百官的內容。簡 II 0214②：556 是成帝建始元年（前 32），關於有關馬的增殖和飼料的詔書傳達給大司徒（丞相）、大司空（御史大夫）。簡 I 0112②：18 是哀帝建平四年（前 3）五月八日赴任的玉門都尉忠路過懸泉置住宿時，所携御史中丞下達的詔書。但是御史大夫下達詔書的時候其對象沒有相當於卿級的官職；而丞相下達詔書的時候，如“元康五年詔書冊”10.30 或敦煌懸泉置漢簡 0214①：129 則表明，卿級的官職是主要對象。

皇帝的詔書通過比丞相地位低的御史大夫傳遞給丞相的原因和御史大夫的職掌有密切關係。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記載，“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御史大夫處在上卿的位置上，起着輔助丞相的作用。但是御史大夫的又一任務，是其下的中丞掌管“圖籍秘書”，即皇帝的詔書、以公卿為首的臣下的奏章（“公卿奏事”）等。此外，御史中丞“在殿中蘭台”。《漢書·張湯傳》“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條下如淳注和顏師古注^①指出，御史住在宮闕裏，擔當着文書的管理工作。相比丞相府在宮外，御史大夫在宮內起草詔書和律令，得到皇帝的批准後再傳達給丞相。因此這樣的文書制度裏除了上述的“制詔丞相、御史”以外，單獨使用“制詔御史”用語的淵源就在於此。“元康五年詔書冊”和同一時期頒布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②很好地揭示了在文書傳遞中御史大夫的性質。這個簡冊是丞相少史和御史守少史聯名簽署的詔書。但是“張掖太守移書令”裏祇有“如御史律令”的記載，而沒有“如丞相律令”的記載。這也許是因為御史大夫直接負責皇帝詔書的執行，以防止詔書的內容在從中央傳遞到地方的過程中被歪曲，並以此貫徹國家的權力。而且曾任御史大夫的人往往後任

① 《漢書》卷四二《張湯傳》（2093 頁）顏師古注引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② 請參閱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初世賓：《居延簡冊〈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考古》1980 年第 2 期。

丞相職這一點可以說明，擔當着皇帝的文書行政的御史大夫還負責丞相府。^①一元的文書起草和頒佈體系，反映了當時的統治意志。

而且，武帝時由於對四夷的征伐和邊郡的擴張而引發的頻繁戰爭和制度的變化，國家要處理的事務也日益增加。^②這樣的文書如果都要得到武帝的裁可，自然需要處理此事務的官吏和機構。因此，在宮內和皇帝關係密切的御史大夫除了監督刺史外，作為處理公卿上奏的官員，雖然俸祿比丞相低，但在文書行政方面卻下傳詔書，起着中樞作用。^③這樣的現象在武帝以後尚書體系的出現和功能的強化上也可看到。

三、“行〇〇事”的意義和地方統治

從“元康五年詔書冊”的下達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文書不是以太守府的負責人——太守的名義發送的，而是代行太守職責的長史延和代行郡丞的肩水倉長湯借太守的名義下達給肩水都尉府的。而且我們可以知道肩水都尉府裏城尉誼代行都尉的職責。那麼不以太守的名義下達文書，而是以一種代行職務的“行〇〇事”的形式，其具體原因是什麼呢？

“行〇〇事”是指太守或都尉等機構的負責人“不在”機構的時候，由屬吏來代替履行其職責。^④太守的“不在”我們可以理解為長時間的出差或者空缺。問題在於太守空缺的場合。官吏的空缺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不在署”；第二，“未到官”；第三，免職等。對官吏來說“不在署”或免職，原則上不太可能，而空缺發生的可能性只能縮小為“到官”的相反面“未到官”的情況。即受“遣”的官吏非常順利地到達赴任地的時候，要報告“到官”。那麼尹灣漢簡裏記載的“況其邑丞孔寬”、“蘭旗左尉孫吉”、“蘭旗右尉鄭尊（？）”、“陰平丞成功禁”、“建鄉丞虞賀”、“新陽丞上官由”6人“未到官”的事實^⑤，意味著被派遣的官員尚未到達赴任地。因此“未到官”意思是官職的缺員。^⑥

以上舉例說明的是官吏不在的情況。發生在地方長吏身上，無論處於何種情況，如“元康五年詔書冊”裏出現的太守空缺這樣的情況，則會引起行政上嚴重的問題。秦時，在軍

① 《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下》記錄的人物中，從元帝期（元鼎年間）到平帝期（元始年間），御史大夫被任用後，又被任用為丞相在全體(?)33名中有19名，佔56%。

② 《漢書》卷六四《嚴助傳》(2775頁)：“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舉賢良文學之士。”

③ 《漢書》卷一《高帝紀》(71頁)關於“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的記載，《漢書補注》(王先謙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5頁)裏解釋道：“是時未有尚書，則凡詔令，御史起草，付外施行。”

④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538—541頁。

⑤ 《尹灣漢簡簡牘》：“東海郡下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99頁。

⑥ 據鶴岡昌男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當時東海郡的屬吏有12.6%的缺員。((《漢代郡太守の持つ人事權について—地方長吏の缺員を視點に—》，載富谷至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朋友書店，2003，279—280頁。)

政上或是治獄方面，縣的上級機關無法對其發揮作用^①，而漢時則不同。漢代的郡府作為縣的上級審查機關逐漸擔當起職責。^②而且與漢初不同的是，武帝以後國家政策的變化自然要求地方行政的強化。因此郡變為連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即“上意下達”和“下意上達”的“環節”作用的機關。像這樣隨著文書行政的強化，郡的功能強化是實行中央集權統治的必需條件。但是為了有效的運行國家體系，國家權力警惕郡太守和地方豪族結合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且空缺時要防止郡的行政上出現失誤。《史記》卷三〇《平準書》（1420頁）：“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漢書》卷八六《王嘉傳》（3490頁）：“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從文帝時官吏的變動極少，到武帝以後太守被部刺史或者司隸頻頻彈劾，在職期間不超過數個月的記載，可以知道中央政府對太守的控制的增強。

除了太守較短的在任期間以外，當時以張掖郡為首的河西地域的習俗被認為和其它偏僻的邊境地區一樣^③，從地理上的特性來看，人們不願意遷徙到該地區^④，可以預見任命到此地的太守很容易就空缺。即使是太守空缺，經過頒佈“元康五年詔書冊”的宣帝期間，郡逐漸成為行政功能的中樞機關，功能也得到強化。^⑤我們可以從裁決的主體由縣轉移到郡的事實，或者作為郡的行政文書（上計文書）的尹灣漢簡《集簿》、《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屬吏設置簿》等發現，屬吏的增加反映了郡功能的強化^⑥。因此如果現在太守處於空缺的狀態，那麼被前任太守任用的屬吏們可以代行其職責。即使新任太守赴任，由於宣帝以後任用地方勢力世家豪族當官吏的傾向逐漸明顯^⑦，新任太守積極地把他們招進太守府。

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元康五年詔書冊”裏出現的“行〇〇事”的屬吏張掖長史延、肩水倉吏湯、張掖肩水城尉誼、肩水士吏橫等人是實際負責郡的職責的人物。在居延簡 23 枚“誼字簡”中與之有關的簡可能是居延新簡 E. P. T52:410A “戊辰朔戊子，居延都尉誼，

① 李成珪：《秦的地方行政組織及其性格——縣的組織及其機能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31, 1989, 82—83 頁。

② 請參閱以下資料：《張家山漢簡》《奏讞書》（217 頁）“蜀守淑（讞）……佐啓……”；（219 頁）“書名數皆耐為隸臣妾……”，“七年八月己未江陵丞言……”；（223 頁）“御史書以廿七年二月壬辰到南郡守府……”

③ 《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下》（1644—1645 頁）：“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人稀”。

④ 請參閱：邢義田：《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徙刑》，《秦漢史論稿》，東大圖書公司，1987，428—429 頁。

⑤ 重近啓樹：《前漢の國家と地方政治——宣帝紀を中心として》，《駿臺史學》44，1978。

⑥ 有關分析可以參考以下論述：金秉駿：《漢代太守府屬吏組織的變化及其性格——以江蘇省連雲港出土的尹灣漢簡的分析為中心》，《古代中國的理解 3》，知識產業社，1997，298—326 頁。

⑦ 《漢書》卷七六《韓延壽傳》（3210 頁）：“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郡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卷八三《朱博傳》（3401 頁）：“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有關論述可以參閱：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下冊），102 頁；池田雄一：《漢代における地方小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36，1972；《中國古代における郡縣屬吏制の展開》，《中國古代史研究》4，雄山閣，1976。

丞……”。根據“元康五年詔書冊”的內容，肩水城尉誼已經兼任肩水都尉的職責，經過一定期限以後，很有可能晉升為肩水都尉或者居延都尉。因此 E. P. T52:410A 裏出現的“誼”可以解釋為肩水都尉誼晉升的情形。與肩水士吏橫有關的簡有 1 枚。從居延漢簡 10.17 “顯美傳舍斗食嗇夫莫君里公乘謝橫，中功一，勞二歲二月，今肩水侯官士吏代鄭昌成”內容可以看出，橫居住在張掖郡顯美縣莫君里，歷任傳舍、斗食、嗇夫等職。^①

我們知道居延簡裏可以確認是執行“行〇〇事”職責的屬吏大部分是晉升者。^②宣帝以後，豪族任為屬吏的傾向和成為屬吏後的晉升，可以理解為其對所擔當職責的熟悉和國家權力對其業績的關注。具備地域性基礎的豪族成為屬吏後，作為國家體系的一員，能更加有力地實施其任務，即使太守空缺時傳遞下來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會照樣實施。“元康五年詔書冊”就反映了這樣的情況。代行太守或者都尉職責的制度的完備，使反映國家權力統治意志的文書能順暢地上下傳遞。順暢的文書流通使中央和地方互相交集，防止了行政上的空白和國家權力出現漏洞的現象，維持了中央集權的統治體系。

四、結束語

根據《秦簡》《內史雜律》中“所有的報告必須用文書”的記載可知，秦以文書為媒介實施文書政治。秦統一以後，秦始皇的命令被徹底地貫徹到地方最下級，同時地方最下級向中央迅速報告的體制，以“命令”和“上奏”的形式得以實施。秦始皇的文字統一，文書的規一化，文書傳遞方法等的完備，是中央集權國家體制建立的前提條件。同時，為了宣諭皇帝的命令，採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各地區刻石碑，這也是統一帝國和中央集權國家體系的產物。

漢繼承了秦的大部分制度，文書行政制度也不例外。這樣的文書行政傳統除了通過本文提到的“元康五年詔書冊”之類的詔書類外，還可以通過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製作的《孔廟百石卒石碑》和《乙瑛碑》的碑文得到確認。^③眾所周知，此碑文的內容是說魯國大臣乙瑛為了管理孔子廟，常設百石卒史，言及定期祭祀和費用問題，而且這些內容被認可並得以實現。即由“上奏文→認可（制曰可）→執行下達文書”構成。像這樣在簡牘上

① 關於張掖肩水城尉誼、肩水士吏橫等人以及有關簡的內容，從下面的文章中可得到幫助：李振宏、孫英民著：《居延漢簡人名編年》“元康元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57—58 頁。

② 漢代官吏的升級問題可以參考：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創文社，1982）第 4 篇第 6 章《漢代における功次による昇進》。

③ 高文：《漢碑集釋》（河南大學出版社，1985）《乙瑛碑》，172—180 頁。

或是碑文上的文書已不是單純的文書，而是帶有一定目的頒佈的文書。因此簡牘並不是單純的紀錄，而是包含記載事項、發送人、收取人等基本要素的文書。簡牘文書中的詔書明確反映了國家權力的統治意圖。

“元康五年詔書冊”向我們生動地展示了典型的文書傳遞體系和國家權力向地方最下級機關的滲透。御史大夫下達給丞相的詔書祇有 1 封，但通過丞相傳遞給郡級行政單位的多達 100 多封，而且可以很容易推想，傳遞給鄉、里或侯官的詔書是以幾何級數增加的。1 封或為數不多的“元康五年詔書冊”，好像墨汁溶於水一樣擴散開去。

在文書傳遞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御史大夫的定位。丞相和御史大夫作為詔書傳遞的主體已很明確，但俸祿比丞相低的御史大夫直接從皇帝那裏接到詔書，然後傳遞給丞相。主要原因是御史大夫的宮內位置及其職能。與此相關，不能忽視的是，從景帝執政時期到武帝執政期，本應主導政局的丞相職務的怠慢：^①武帝時重用側近官僚，建立控制官僚的制度；^②以及輔助皇帝、參與參謀立案政策的大多是像郎中之類的宮廷內的官吏。^③由此可以看出，御史大夫的地位和昭宣帝之後得到強化的尚書體制有著密切的聯繫。

以上考證說明二月十一日皇帝認可的詔書，在 57 天後的四月九日抵達肩水候官，並予以執行。但從詔書的認可到邊境地區的執行上所需的規定時間，也有可能變得更短。因為通過與張家山漢簡《行書律》文書傳遞有關的“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的規定、顯示出敦煌懸泉置漢簡 V1611③:39 中懸泉置到長安距離的“長安四千八十…”記載、以及可推定長安到肩水候官距離的居延新簡 E. P. T. 59:582 與敦煌懸泉置漢簡 II 0214①:130 的記載，我們可以整理出以下的結論。詔書是經過“長安→安定、高平(或者天水、平襄)→武威(姑藏)→顯美→日勒→冊丹→屋蘭→麟得(或經過氐池)→昭武→祁連置→表是→肩水候官”，約 3,600 里的路程和 18-22 天的時間才可傳達。

傳遞體系和御史大夫的地位問題，可以從“元康五年詔書冊”中“上奏文”10.27、5.10 中窺知。而詔書的傳遞過程可見文書 10.33、10.30、10.32?、10.29、10.31。但是該詔書的內容非關國家統治，而是和一種傳統的節日（夏至）有關。就是說即使是有關習俗

① 《史記》卷九六《張丞相列傳》（2685 頁）：“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後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嫋嫋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② 富田健之在他的文章中（《前漢武帝期二降における政治構造の一考察—いわゆる内朝をめぐ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9, 1981）指出武帝為了實現自己的政策，讓自己身邊的一幫人與現成的官僚集團相對抗。同時重視“中”（身邊的側近官僚集團）和“外（丞相、御史大夫、九卿）”的區別，皇帝站在中間與兩方保持距離。雖然有這樣的區別，我們考慮御史大夫以檢查皇帝統治政策的實現以及傳達文件的職責，比“外朝”有更多的機會接近皇帝和辦理詔書，因此可以算成皇帝的親衛官僚。

③ 森谷一樹：《皇帝と百官のあいだ—宮庭と官制組織—》，《日本漢學史學會報》第 4 號，2003，15—18 頁。

的事情也要得到皇帝的認可後，憑藉詔書的形式和程序，傳遞到全國各個地方。“元康五年詔書冊”揭示了漢代文書行政的原則，徹底地遵守原則便是形成中央集權國家體系的基礎。除了西北地區發現的簡牘以外，如果探討最近全中國各個地區出土整理的簡牘的內容的話，在揭示歷史“事實”時能進一步探明漢代統治結構的性質。筆者再一次關注“元康五年詔書冊”的理由就在於此。

天長西漢木牘述略

安徽省天長市博物館 楊以平 喬國榮

2004年11月，天長市安樂鎮常莊、紀莊村民組在挖蓄水塘時，發現西漢古墓一座，我們聞訊后立即組織專業人員前往現場。因農民挖塘採用機械作業，古墓已遭破壞。經我們搶救性清理，出土遺物一一九件，包括壺、鈐、洗、釜、燈、碗、帶鉤、銅鏡等銅器八件；鎮、劍、削等鐵器七件；鼎、盒、壺、罐、甕等陶器八件；奩、案、樽、盆、盤、杯、勺、硯、盒等漆器四十七件；盆、木俑等木器十五件；以及木牘三十四枚。在這些豐富的隨葬遺物之中，尤以三十四枚木牘價值最高。

這批木牘共書寫二千五百字左右，出土於墓室頭廂，且伴有漆硯盒，盒內裝有青石板硯和圓形研墨石，硯面留有墨汁。木牘保存較為完整，少數殘缺；既有兩面書寫文字的，也有一面書寫文字的。字體為隸書，部分木牘字跡不太清晰。木牘長22.2—23.2釐米，寬3.6—6.9釐米。其內容豐富，包括文書、信件、藥方、帳單、名刺等。整理時，我們按照木牘的原始排列編了三十四個序號。

一、文書

政府文書一枚，屬簿籍類，編號為01，長22.7釐米，寬6.9釐米。兩面均寫有文字。A面題為“戶口簿”。“戶口簿”三字橫式墨書，隸體，字跡工整，字體較大；正文豎排，八行，一百二十二個字，字體較小。

戶口簿

- 戶凡九千一百六十九少前 ①
- 口四萬九百七十少前 ②
- 東鄉戶千七百八十三口七千七百九十五 ③
- 都鄉戶二千三百九十八口萬八百一十九 ④
- 楊池鄉戶千四百五十一口六千三百廿八 ⑤
- 鞠(?)鄉戶八百八十口四千五 ⑥
- 垣雍北鄉戶千三百七十五口六千三百五十四 ⑦
- 垣雍東鄉戶千二百八十二口五千六百六十九 ⑧

卿

戶口簿是政府的一個重要的管理檔案，是一級政府上報的戶口統計報表。天長出土的戶口簿記錄了一個縣的戶口狀況。戶口名簿下角有一“卿”字，說明本戶口名簿不是上報之本，而是本級政府最高長官的審核本，被確認後，作為戶口統計年報底冊檔案被保存下來。在戶與口的總數後標有“少前”二字，是與上年度相比，本年度戶口少於上年度。雖未注明具體數字，但表明該縣人口在流失。

B面題為“算簿”。“算簿”書寫形式與戶口名簿一樣，正文九行一百一十五字，字跡較小。

算簿

- 集八月事算二萬九復算二千卅五 ①
- 都鄉八月事算五千卅五 ②
- 東鄉八月事算三千六百八十九 ③
- 垣雍北鄉八月事算三千二百八十五 ④
- 垣雍東鄉八月事算二千九百卅一 ⑤
- 鞠(?)鄉八月事算千八百九十 ⑥
- 楊池鄉八月事算三千一百六十九 ⑦
- 右八月 ⑧
- 集九月事算萬九千九百八十八復算二千六十五 ⑨

卿

算簿是以戶口名簿上統計的人口為依據，統計全縣年徵收口算錢份額，根據各鄉上報的口算錢份額合計並進行復核。秦漢時期，十月是一年的歲首，九月是一年的年終月，一

切統計工作以九月爲限。算簿上的記載證實了“八月案比”制。“八月案比制源自秦，農田、人口統計皆在八月進行，西漢承襲之。”^①“集八月事算二萬九復算二千四十五”，“集九月事算萬九千九百八十八復算二千六十五”，天長出土的算簿記錄了一個縣一年所徵收口算錢的統計和核實情況，八月統計一年徵收口算錢份額爲 20009 算，因年齡或其它原因免除了 2045 算。九月爲上級政府核實月，經核實實際一年徵收口算錢份額爲 19988 算，比統計數少 21 算，復算 2065 算，又比統計數多了 20 算，這說明統計數與核實數是有誤差的。

二、信件

私人信件十六枚，編號分別爲 04、05、06、07、10、11、12、15、16、18、20、21、23、25、26、33。

其中 10 號木牘，長 23 釐米，寬 6.7 釐米，兩面均寫有文字。

A 面（六行，一百二十個字）

- | | |
|-----------------------------|---|
| 賁且伏地再拜請 | ① |
| 孺子孟馬足下賁且賴厚德到東郡幸毋恙賁且行守丞 | ② |
| 上計以十二月壬戌到雒陽以甲子發兵廣陵長史卿俱□以賁且家 | ③ |
| 室事受（？）辱左右賁且諸家死有餘罪毋可者各自謹而已家毋 | ④ |
| 可鼓者且完而已賁且西故自亟爲所以請謝者即（？） | ⑤ |
| 事復（？）大急幸遺賁且記孺子孟還（歸）亡桃事願以遠謹 | ⑥ |

B 面（四行，五十八個字）

- | | |
|-----------------------------|---|
| 爲故書不能盡意幸少留意志還（歸）至未留東陽毋使還（歸） | ① |
| 大事寒時幸進酒食□察諸賁且過還故縣毋緩急 | ② |
| 以吏亡勅毋它事伏地再拜 | ③ |
| 孺子孟馬足下 | ④ |

06 號木牘長 22.6 釐米，寬 6.5 釐米，兩面均寫有文字。

A 面（六行，一百零三個字）

- | | |
|---------------------------------|---|
| 使前孫霸□因使□奉謹伏地再拜請 | ① |
| 謝卿馬足下甚□厚（？）□玉体毋恙謹（？）因道（？）卿幸時有教以 | ② |

① 李均明：《關於八月案比》，《出土文獻研究》第 6 期。

藥事霸幸甚謹(?) □教卿藥丸四百□付張長子寒時不來 ③
霸願卿為侍前者幸強酒食近衣炭以安萬年霸伏地幸 ④
甚有來往幸賜教使霸奉聞卿玉体毋恙伏地再拜 ⑤
卿馬足下 ⑥

B面 (二欄, 共六行, 二十三個字)

謹伏地再拜請書 ①

謝卿馬足下 ②

(以上為第一欄)

□王孫 ①

□□□ ②

□□□ ③

謝卿 ④

(以上為第二欄)

12號木牘, 長22.8釐米, 寬4.8釐米, 兩面均寫有文字。

A面 (四行, 七十一個字)

孟腹(體)不安善少論被宜身被至北視病不宵(肖)伏病幸毋重罪幸甚幸甚 ①

賤弟方被宜身至前不宵(肖)伏病謹使使者幸□伏地再拜 ②

請 ③

孟馬足下寒時少進酒食近衣炭慎病自愈以□□幸甚幸甚 ④

B面 (四行, 三十二個字)

米一石雞一隻 ①

賤弟方被(?)謹使使者伏地再拜 ②

進 ③

孟外廚 野物辛卯廷被幸甚幸甚 ④

15號木牘, 長22.4釐米, 寬5.7釐米, 兩面均寫有文字。

A面 (四行, 五十四個字)

卿體不便前日幸為書屬宋棣使橫請 ①

東陽丞莞橫宜身至□下迫不給謹請司空伏非(罪)幸謁伏地 ②

再拜謝因伏地再拜請病

③

□馬□足下

④

B 面 (兩行, 三個字)

進

①

謝卿

②

這些木牘以私人信件為主。受信人叫孟，多數信件是向孟問安並祝願其病愈康復。祇有編號為 10 號的信件講了一個政治事件“甲子發兵”，寫信人叫賁且，信中提到了幾個地名：東郡、雒陽、廣陵、東陽。

三、賬單

賬單共四枚，編號為 08、17、19、22。

其中 17 號木牘，長 22.8 釐米，寬 6.7 釐米，兩面均寫有文字。

A 面 (兩欄)

□

①

棧安翁口口四雉一隻

②

棧卿石四斗

③

棧安君石鳴一

④

棧口人口斗鳥一

⑤

□□□□雉一隻

⑥

(以上為第一欄)

□□忠(?)梁米

①

董父酒一□□楊二隻

②

朱仲□四斗□□一隻

③

蔡□□楊四隻

④

陳□麋一

⑤

陳中父(?)麋鳴(?)一隻

⑥

(以上為第二欄)

B面（兩欄）

□少翁□楊二隻 ①

猿少君雉一隻 ②

莞卿角一枚 ③

（以上為第一欄）

□ ①

匠 ②

旁（？） ③

（以上為第二欄）

這張賬單，實際上是一張禮品記錄單，是孟生病時親朋好友探視帶來的禮品。賬單上有很多野生動物，如野雞、麋鹿，還有一些不知名的動物，說明本地區西漢時期野生動物種類繁多。

四、藥方

藥方兩枚，編號為09、13。

其中13號木牘，長20釐米，寬6釐米，一面書寫文字。

桔梗一兩。 ①

烏喙三果（顆）。 ②

甘草三尺。白□一兩。 ③

□一升 ④

□百枚 ⑤

（以上為第一欄）

飴五升 ①

杖五升。 ②

蕒四兩。 ③

（以上為第二欄）

藥方的用藥量較大，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用過的藥方，究竟能治什麼病，不得而知。但就此方可知，西漢時期的醫藥水平已達到一定的高度。

五、名刺

名刺共四枚，編號分別為 03、14、24、30。

其中 14 號木牘，長 20.6 釐米，寬 5.3 釐米，上方殘缺，一面書寫文字。

□□伏地再拜 ①

□進書 ②

□孟馬足下 ③

（以上為第一欄）

□□孟 ①

謝漢 ②

進 ③

東陽 ④

謝孟 ⑤

（以上為第二欄）

03 號木牘長 22.7 釐米，寬 6.7 釐米，兩面均寫有文字。

A 面（兩行，十一個字）

謹伏地再拜進書 ①

孟馬足下 ②

B 面（一行，四個字）

孟馬足下 ①

名刺在西漢時期稱為“謁”或“刺”，相當於現代的名片，是當時社會通用的一種文書形式^①，天長漢墓出土的名刺分兩欄，第一欄書有持帖人與對方的名，“□□伏地再拜”、“□馬足下”，這種形式像是書信的開頭與結尾。第二欄直接寫持刺人與對方的姓與名，“謝漢”是持刺人姓名，“東陽”是對方居住地，“謝孟”是對方姓名。第二欄具有名刺的所有要素。

① 劉洪石：《“謁”“刺”考述》，《文物》1996 年 8 期。

六、其它

此外，還有七枚木牘，編號分別為 02、27、28、29、31、32、34。由於不能明確其內容，我們將其列為“其它”。

其中 02 號木牘，長 22 釐米，寬 6.6 釐米，上方殘缺，一面書寫文字。

□□伏進言歲足下今得公孫翁曲臧 ①

□□七寸賈錢四千四百毋中梁為取廣 ②

□□人來上告齊予錢人賈以為齊如軍 ③

這座墓葬北鄰東陽古城遺址（今江蘇省盱眙縣馬壩境內），所出木牘中又多次出現“東陽”二字，如 14 號、24 號木牘書寫有“進·東陽”，10 號、25 號木牘書寫有“留東陽”、“東陽丞”。《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條目下有東陽縣，臨淮郡遺址在今安徽省鳳陽縣境內。由此可見，該墓葬地當屬漢代臨淮郡東陽縣，墓主人或即東陽縣人。但因墓中未出印章，不能明確墓主人的姓名與身份，只能從遺物銘文和木牘兩方面去考證。首先，根據本地區已發掘的墓葬^①，西漢時期當地人有把姓氏寫在隨葬漆器上的習俗，而該墓出土的漆耳杯、漆盆、漆盤內底側有墨書“謝子翁”三字，故墓主人應為“謝”姓。其次，7 號木牘 B 面寫有“孟馬足下”，10 號木牘寫有“孺子孟馬足下”，“孟”應是墓主人的名或字。11 號木牘寫有“謝孟馬足下”，14 號木牘寫有“東陽·謝孟”。從這些木牘文字中，我們可以推知，墓主人叫“謝孟”，是東陽縣掌握一定權力的官吏。

雖然這批木牘目前還有很多難解之處，許多內涵我們還無法知曉，但它為我們研究漢代的戶籍管理、賦稅徭役、社會習俗、醫藥狀況以及書法藝術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意義重大。

① 安徽省文物研究所、天長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長縣三角圩戰國西漢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 年 9 期。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河堤”釋義

華南師範大學法學院 曹旅寧

內容提要 2001年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的“河堤簡”的性質，學術界有不同的認識。本文認為“把河堤開為耕地”的說法可能與事實有一些出入，《河堤簡》中的這些堤實際上可能是圍湖造田或墾殖江河兩岸以及圍墾江河沙洲所形成的村落田地。

關鍵詞 《河堤簡》 圍墾 堤垸

《考古》2005年11期刊登彭浩先生《〈河堤簡〉校讀》一文，對2001年出版的由陳松長先生整理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編題為“四、河堤簡”的二十四枚簡牘重新釋文、標點，解說了若干古算術語及計算方法、並據地名推斷了其年代和性質，指出《河堤簡》大約是西漢早期南郡彙集各縣把河堤開為耕地的統計文書。^①彭浩先生的結論應該是正確的，但文章中所說“把河堤開為耕地”可能與事實有一些出入，筆者擬據相關文獻記載做一點疏說。

河堤的首要功能是防範洪水。如《史記·河渠書》：“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河堤既用以防洪，自然不能被開墾為耕地，因為這樣做無疑是自毀長城。但是河堤還有築堤垸圍墾田地的意思，即後世所謂堤垸。如《史記·河渠書》：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① 陳松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86—94頁。

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這段話除了提及興修水利外，還涉及有圍墾土地的活動。我們注意到《集解》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也。”《索隱》：“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于少府。”此河壩棄地即河邊地、甚至是河中的沙洲。開闢耕地後需築堤壩保護。

由以上可知，水患、堤壩與圍墾土地三者間有著必然聯繫。據顧頡剛先生《浪口村隨筆》“河患”條的記載，早在1938年童書業先生就在致顧先生的書信中指出：“西周時代黃河水患不見於記載。春秋以來，河患亦少見。當時沿河耕地尚少，河身尚寬，故水患較後世爲少。戰國以後，人口增多，齊、魏、趙等國爭作堤防以辟農地，河身漸束，與水爭地之政策行，甚至以鄰國爲壑，於是河患乃盛。東漢以後，遂成中原累世不休之鉅患。”顧先生則由黃河聯想到長江：“此書所論極是，憶前數年長江常泛濫，論者多歸咎於洞庭湖沿岸新辟之田畝日多，江水無所滯聚所致，河患之來亦當爾也。”^①《河堤簡》中的這些堤實際上可能是圍湖造田或墾殖江河兩岸以及圍墾江河沙洲所形成的村落田地，祇有這樣理解，《河堤簡》的文義才能講得通。

我們還注意到二十四枚簡牘按排列順序除了提到鄉一級的河堤外，還提到了鄉以下的堤名有南均堤、口靡堤、桃丘堤、徹丘、京（？）口堤、？中堤、嬰堤、兼堤等，結合簡文中“三百人分之，人得四十四畝四十六有（又）三百分步七十二”，說明這些鄉或比鄉級別低一等的地方實際上都是堤壩。我們知道，南郡轄地爲今湖南、湖北之一部。湖南、湖北江河縱橫，湖泊眾多，湖北更有千湖之省的稱呼。這裏的河堤實際上是南郡在江湖地帶擋水圍墾用的堤壩。每個堤壩即相當於一個或若干個自然村，在今天的洞庭湖區俗稱“洲子”。而且《河堤簡》中提及的田畝數字也爲上說提供了佐證。1973年在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一批簡牘。這批簡牘年代大概多數屬於景帝初年。即使其中有年代較早的東西，估計也不會早於文帝晚年。其中的鄭里稟籍所反映的田畝數字，稟籍所記民戶共二十五戶，能田者六十九人，人口一百零五人上下，田地六百一十七畝，平均每戶有地二十四畝七分弱，每個能田者合九畝弱。每一個人合六畝弱。^{②③}而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平帝元始二年全國墾田數爲8 270 536頃，戶數爲12 233 062，口數爲59 594 978，平均每戶合六十七畝半以上，每口合十四畝弱，反映西漢前期的土地兼並情況已相當嚴重。而《河堤簡》

① 顧頡剛：《浪口村隨筆》“河患”條，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25頁。

② 裘錫圭：《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7期；現據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550、553頁。

所反映的人均佔有土地卻有四十四畝之多，與同屬南郡江陵地區的鄭里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合理的解釋是鄭里屬於開發年代已久或丘陵地區，而《河堤簡》中所反映的地區則為新墾殖的堤垵地區。

（附記：本文完成後，偶然得讀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石泉文集》512—522 頁所收《江漢平原的垵田興起於何時》（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 年 1 期）一文，始知學術界對垵田的出現有不同見解。林承坤、陳欽鑾在《下荆江自由河曲形成與沿邊的探討》（《地理學報》25 卷 2 期）一文中認為，西晉時，荆江堤垵開始大規模地興建起來。日本學者森田鳴在《清代湖廣水利灌溉的發展》（《東方學》20 輯，1960）中認為，垵田是隨著明代江南移民大量遷入長江中游地區而出現的。石泉則認為，垵田的出現當不晚於 13 世紀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間。而根據我們的考證，早在西漢初期江漢平原便已有垵田。不過石泉前揭文所引用的元代前期林元《重開古穴記》[同治《石首縣志》卷七“藝文志”]中有“增築內垵之新興堤”可為我們理解《河堤簡》提供參照。）

西漢長安“孝文廟”位置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侯旭東

內容提要 自古人們就認為西漢長安祭祀孝文帝是在孝文帝生前所建的顧成廟，其位置在漢長安城南。根據《漢書》及懸泉漢簡，至少證明漢元帝以後已改在長安東南七十里的霸陵旁的孝文廟進行祭祀活動。

關鍵詞 西漢 顧成廟 孝文廟 宗廟祭祀 長安

“孝文廟”又稱“文帝廟”，是西漢王朝用來祭祀孝文帝劉恆的宗廟。漢景帝即位後曾經下詔要求郡國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之廟”^①，因此，在漢元帝改革宗廟制度以前，都城長安及不少郡國均建有包括孝文廟在內的先帝宗廟。^②這裏僅就長安所設立的“孝文廟”的位置問題做一考察。

《漢書·文帝紀》載，文帝四年“作顧成廟”，服虔在注此條時說：“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如淳與顏師古等《漢書》注家亦紛紛對該廟為何名為“顧成”加以解釋，至於“廟”的具體位置則未提出新見。《三輔黃圖》以下的多數著述則沿用了服虔的說法，並進一步將此廟視為後代皇帝祭祀文帝的宗廟。今本《三輔黃圖·宗廟》云：“文帝廟，號顧成廟。孝文四年作顧成廟，在長安城南”云云^③。注家已經注意到這

①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436頁；又見《漢書》卷五《景帝紀》，138頁。

② 郡國祖宗廟的分佈情況，參周振鶴《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第二編《宗教文化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61—63、75—78頁。

③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注》卷五，三秦出版社，1995，294頁。

段關於文帝廟位置的記載根據的是服虔的《漢書》注。此後提供更進一步位置信息的是北宋宋敏求的《長安志》。《長安志》卷十《唐京城四》講到唐長安休祥坊時說：“坊內有漢顧成廟餘址，廟北漢奉明園”^①，後人多根據這段記載確定顧成廟的位置，並認為顧成廟就是後來西漢皇帝祭祀文帝的宗廟之所在，進而確認長安孝文廟的具體方位。^②

據《長安志》，今人推定顧成廟位於今天西安市玉祥門以西一公里左右，大慶路以北一帶。^③根據地圖及文獻，顧成廟在長安城南面的覆盎門的正南方，直線距離不過 3.25 公里，西漢一里合 419.4 米^④，合漢里也祇有 7.7 里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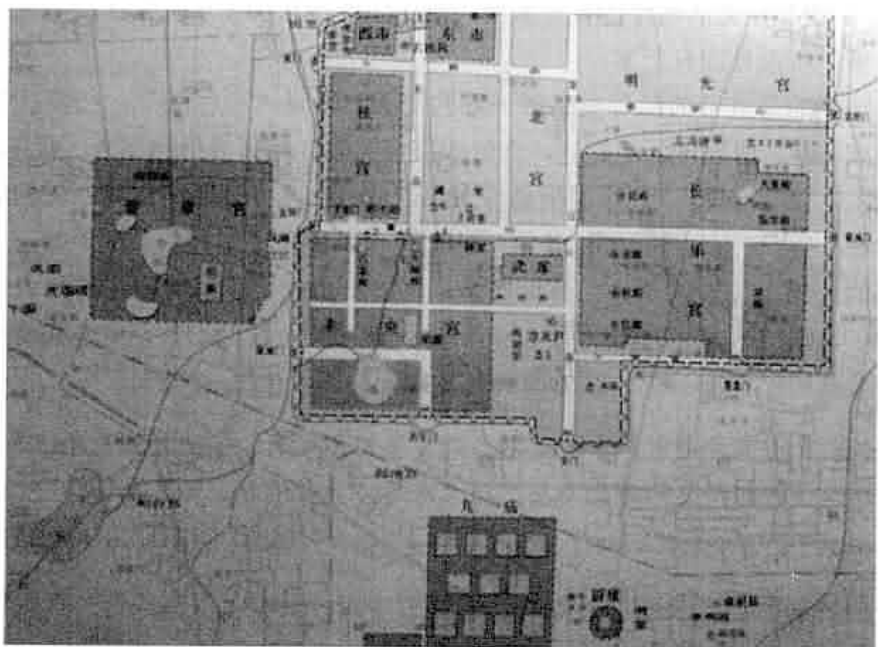


圖 1 西漢長安城圖（文獻）^⑤

不過，此說並不準確，沒有考慮到宗廟位置的可能變化。至少西漢元帝以後就已經不在顧成廟祭祀文帝，而改在霸陵旁的孝文廟。此前情況，囿於資料，難以確知。學者頻頻引用的《漢書》卷七三《韋賢傳附韋玄成傳》中班固在陳述元帝時祖宗廟狀況時就有明確

① 見《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127 頁。

② 如王柏中、楊曉明《論漢代國家宗廟設置的特點》，《鞍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1996 年 9 月，17 頁；王柏中：《論漢代皇帝宗廟設置的特點》，《遼寧大學學報》第 29 卷第 2 期，2001 年 3 月，66 頁。

③ 持此說的如何清谷前引書，294—295 頁；焦南峰、馬永崑：《西漢宗廟芻議》，《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6 期，51 頁；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7 頁；劉慶柱、李毓芳：《漢長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43 頁；姜波：《漢唐都城禮制建築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7 頁。

④ 距離據下圖測算；漢里與今里的折算據聞人軍：《中國古代里畝制度概述》，《杭州大學學報》第 19 卷第 3 期（1989 年 9 月），123 頁。

⑤ 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55 頁。顧成廟位於圖中右下角，九廟及辟雍東側。

的表示。其文云：

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並為百七十六。

据此計算，到元帝時，京師共有九所祖宗廟，分别是自高祖下至宣帝七帝各一所，外加太上皇與宣帝父親悼皇考各一，文帝廟顯然名列其中。更重要的是這些在京師的祖宗廟均是“各自居陵旁立廟”，即設立于陵墓旁邊，孝文廟自然也應在霸陵附近，而霸陵在長安東南七十里^①，並非在遠離霸陵的長安城南。班固生活在東漢初年，去西漢不久，祭祀先帝又屬朝廷大事，所說自應有所本。

值得一提的是宣帝的父母史皇孫夫婦的陵園，名為“奉明園”，按照《長安志》的記載位於顧成廟北。而據班固的記述，宣帝即位後八年，尊其父為悼皇考，並在陵園旁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②，該廟稱為悼考廟。或許宣帝立廟時就近將原先的顧成廟改為祭祀其父的廟。《長安志》或是不清楚這一前後變化，而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

近年敦煌懸泉發現的“失亡傳信冊”，更進一步肯定了孝文廟在霸陵附近的說法。該冊書保存了西漢成帝永光五年（前 39）御史大夫下發全國的追查使者遺失傳信的文書，其中一枚涉及祭祀孝文廟事宜。茲先轉引簡文如下：

永光五年五月庚申，守御史李忠監嘗參祠孝文廟，守御史任昌年，為駕一封輶傳，外百冊二。御史大夫弘謂長安長，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II 90DXT0216②：866^③

餘下內容與討論孝文廟位置無關，不贅引。如《漢書·韋玄成傳》晉灼注所指出的，“嘗麥祠”是朝廷日常對先帝進行的二十五祀之一，五月祭祀^④，說明此孝文廟確是當時朝廷日常祭祀的先帝宗廟。而李忠等前去監督祭祀需要“舍傳舍”，並由御史大夫頒發傳信，表明孝文廟與長安的距離並非很近。傳舍是設在縣以上的治所的官方招待機構^⑤，從長安至孝文廟一定會途經一縣，並要在傳舍休息一夜，否則無需勞動御史大夫下發傳信。而前面所說的顧成廟位於長安城南，兩地間有一奉明縣，但據《長安志》，廟不過在城南七里多，

①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注引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435頁；《漢書》卷四《文帝紀》師古注曰“霸陵在長安東南”，134頁。

② 《漢書》卷六三《戾太子傳》，2749頁。

③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9頁，並據張德芳《懸泉漢簡中的“傳信簡”考述》，《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8頁引謝桂華說改訂釋文。

④ 參張德芳上引文，77—78頁。

⑤ 濱口重國對此做過專門研究，見所著《漢代的傳舍——特に其の設置地點に就いて》，原刊《東洋學報》第22卷第4號，1935，收入所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946—964頁。孫毓棠：《漢代的交通》，收入所著《孫毓棠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361頁。

自長安城內駕車到達費時很短，以一天分為十六時，一時行十里計算^①，用不了一時（1.5小時）即可抵達。完全可以在祭祀当天前去監督，無需在傳舍住宿。

西漢初年的法律規定“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②，霸陵與長安的距離正好是一天的行程，朝發長安暮至霸陵，需要休息一晚，第二天舉行祭祀活動。這枚傳信簡所說的“舍傳舍”就應是舍霸陵縣的傳舍。

關於文帝廟的方位，文獻中其實另有一說，值得注意。程大昌《雍錄》卷八“廟陵·文帝”云“顧成廟，在長安城南，又《方輿志》在金塢北，大道南”^③，王應麟《玉海》卷九七“郊禮·宗廟”“漢顧成廟”亦引《方輿記》曰：文帝廟在金塢北，大道南^④。《方輿記》又稱《方輿志》，南唐徐鉉著，一百三十卷^⑤，是一部記述南北各地地理沿革的著作，宋代的地理著作常加引用。但前書認為是指顧成廟，而據後者，原書實際說的是文帝廟，程大昌卻想當然地與顧成廟混為一談。不過兩書所引並不完整，無法確定文帝廟的大致方位。而《太平寰宇記》卷二五“雍州·萬年縣”說“金塢在縣北苑內，漢文帝廟在金塢北，大道南”，宋敏求的《長安志》卷一一“萬年”則云“金塢在縣北，漢文帝廟在其北一作縣北苑北”，兩說均應是依據《方輿記》。無論“縣北”還是“縣北苑北”，均應在萬年縣的北部。萬年縣在宋代長安城東面，據宋代的方位推測，該文帝廟應在宋代長安城東北方向，接近霸陵。此文帝廟蓋是指上面所考訂的陵園附近的宗廟。不過，徐鉉此說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影響。

儘管顧成廟可能終西漢一朝一直存在，但其中祭祀對象或許前後有變化，至少元帝以後朝廷祭祀文帝的孝文廟指的是長安東南七十里霸陵旁的宗廟，並非城南的顧成廟。

① 數據據汪桂海考證的傳遞官文書速度中最慢的一種，見所著《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188—189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二年律令·徭律”，文物出版社，2006，64頁。

③ 黃永年點校，中華書局，2002，178頁。

④ 影印本，廣陵書社，2003，1760頁。

⑤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5156頁，卷四四一《文苑傳三·徐鉉傳》，13049頁。明初王禕著《大事記續編》多次引用《方輿記》，此書或許亡於明代。

漢簡三種量詞初探

西南大學文獻研究所 張顯成 武曉麗

內容提要 本文以《居延漢簡補編》、《額濟納漢簡》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的漢簡為研究材料，全面清理研究了其中的量詞，並對其中的數量表示法進行了研究，認為簡帛在漢語量詞史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價值，應當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關鍵詞 漢簡三種 量詞研究 數量表示法

一、概說

量詞是表示事物或動作的數量單位的詞，它經常和數詞結合在一起使用。^①具有豐富的量詞，是漢語不同於其它印歐語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漢藏語系中諸多語言的特點^②），所以，研究漢語的量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先秦兩漢是量詞產生發展的源頭，對於漢語量詞發展史的研究頗具重要意義。但是，由於傳世的先秦兩漢文獻有關量詞的材料太有限，這段時期量詞的研究一直不太令人滿意。現在，大批的簡帛文獻不斷出土，為先秦兩漢量詞的系統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一是出土數量大，據我們初步統計，20世紀初以來出土的簡帛已達22萬枚（件）左右，約700萬字，這一數字是十分驚人的，是原來完全

① 前人時賢給量詞下過不同的定義，或偏重於從意義的角度定義，或偏重於從功能的角度定義，或偏重於從意義和功能兩個角度定義，我們這裏是從後一角度予以定義的。

② 當然，漢藏語系中也有一些語言量詞很不發達。

想象不到的；二是簡帛中有大量的量詞材料，特別是其中有不少當時人記當時事的量詞材料，有大量在同期傳世文獻中見不到的量詞。所以，系統地研究簡帛量詞，對先秦兩漢量詞斷代史的研究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本文擬以《居延漢簡補編》（以下簡稱《居補簡》）、《額濟納漢簡》（以下簡稱《額漢簡》）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的漢簡（以下簡稱《港大簡》）為研究對象，對這三種材料中的量詞進行系統整理研究，以期對先秦兩漢量詞的研究有所裨益。下面先簡要介紹這三種材料的有關情況。

《居補簡》。由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牘整理小組編，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九”之名於1998年發表。《居補簡》主要來源於1930至1931年在額濟納河沿岸漢代邊塞中出土的那一萬余枚簡牘。編者將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的居延漢簡作了徹底清理^①，重新刊佈圖版和釋文。所謂“補編”是補勞榦先生的《居延漢簡一圖版之部》和《居延漢簡一釋文之部》未收或刊佈不全的部分，包括：（1）勞書未發表者；（2）勞書有釋文，缺漏圖版者，以上共1153枚；（3）國家圖書館（即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居延簡30枚；（4）1930、1934年黃文弼發現的羅布淖爾簡58枚；（5）1944年夏鼐、閻文儒在敦煌小方盤城北郭小丘上所掘76枚簡；（6）1945年11月夏鼐、閻文儒於武威南山刺麻灣所掘的木簡7枚。以上（4）（5）（6）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居延以外地區出土的漢簡。為示區別，《居補簡》在（3）類簡的編號前冠以“C”（如：C27），在（4）類簡編號前冠以“L”（如：L3），在（5）類簡編號前冠以“T”（如：T14N1），在（6）類簡編號前冠以“LMW”（如：LMW1）。

《額漢簡》。魏堅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這是1999至2002年間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文獻，共500餘枚。這是繼1930至1931年間發現的第一批居延簡及1972至1982年間發現的第二批居延簡之後的第三次重大發現。根據出土簡牘紀年可知，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簡居多。內容與以往出土的居延簡類同，以行政文書居多，涉及漢代的政治、軍事、經濟諸領域，也有如王莽登基詔書、分封單于詔書、行政條例等新史料，而有關名籍、債券契約等的內容也多異於舊簡，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港大簡》。陳松長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出版。收錄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歷年收購入藏的簡牘259枚中的240枚（不包括殘片8枚及空白簡11枚）。除戰國簡10枚（編號1-10）、東晉“松人”解除木牘1枚（編號240）外，全是漢簡（編號11-239）。漢簡包括以下五類文獻：

日書。存簡109枚。屬西漢簡。為選擇時日，占斷吉凶的實用手冊。內容與睡虎地秦

① 居延漢簡由於歷史的原因，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後於1965年11月23日由臺灣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接收回歸祖國，存放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簡《日書》、新出孔家坡漢簡《日書》多可對應。據簡中“孝惠三年”（前 192）的明確紀年可知，這批簡應為公元前 192 年以後所抄寫。

遺策。存簡 11 枚。爲隨葬物的清單。

奴婢廩食粟出入簿簡牘。69 枚。詳細記載了“壽”、“根”、“貝”等人給家奴廩食粟出入的情況和家奴每月食粟的多少。據簡中“元鳳二年”（前 79）的明確紀年可知，這是一批西漢中期的簡。

“河堤”簡。26 枚。記載了一些河堤的具體大小和規模。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看到的嶄新材料。

“序寧”簡。14 枚。這是記載漢代子女爲父母居家服喪的文獻，這是一批內容罕見的木簡。此簡中亦有明確紀年，即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

上述《居補簡》《額漢簡》《港大簡》三種材料，《居補簡》《額漢簡》均屬於居延漢簡，《港大簡》也為文書性質，三種材料不光均寫成於漢代，而且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語言特徵，故我們選取這三種材料進行量詞的研究。^①

本文所引簡文材料，除了盡可能注明行第號外，還使用了以下符號：

(),表示前一字是通假字、異體字、古字、俗字等,括弧內寫出相應的本字、通行字、今字、正字等;

□，表示無法釋出和辨識的殘缺字，一“□”表示一字。

☐, 表示殘缺字字數無法確定者;

【 】,表示補出殘缺字,所補之字置於此號內:

()，表示改正訛誤字，改正之字置於此號內；

☐, 表示原簡折斷處。

另，爲便於排印，所引簡文，個別的生僻字改作通行字，個別生僻的通假字也徑出本字。

下文擬分“量詞”、“數量表示法”、“餘論”幾部分來討論。

二、量詞

量詞可按照表示事物的數量和表示動作行為的數量分爲名量詞和動量詞兩大類。其中名量詞又可下分爲：“自然單位量詞”、“度量衡單位量詞”、“面積單位量詞”等幾個小類，有些小類下還可分類。現逐一簡述如下。

① 且《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的十枚戰國簡和一枚東晉木牘中也未發現有價值的量詞。

壹：名量詞

(一) 自然單位量詞

自然單位量詞可分為“個體單位量詞”和“集體單位量詞”兩類。前者表示所量對象是個體事物；後者表示所量對象是集體事物，或為成雙成對的事物，或為兩個以上的集合體。

A. 個體單位量詞

1. 匹₁：表示馬、驢、騾類動物單位的量詞。如：

(1)《港大簡》奴婢康食粟出入簿 198：“口牝三百六十七。徵什五匹，八分去二，匹七分。去駒二百五十二除劣馬卅十匹，定息二百一十五。”

(2)《居補簡》N120A：“馬一匹驢牡齒六歲高五尺八寸。”

(3)又 136.5：“養馬二匹積廿四日。”

它如：《居補簡》121.6、481.22、N120A、L1、L41、L70。

2. 枚：相當於量詞“個”、“塊”、“根”、“隻”等，這是在漢代運用範圍極其廣泛的一個量詞。如：

(1)《居補簡》L55：“二福（幅）巾三枚。”

(2)《額漢簡》99ES17SH1:12：“用枰柱五百一十枚。”

(3)《港大簡》河堤簡 224：“口口大四章，長丈八尺，二枚。杠材大四章，長二丈二尺，三枚。前後柱大四章，長丈五尺，六枚。棟前後楣大三章五寸，長二丈六尺，六枚。椽材大章五寸，長丈七尺，卅二枚。口材大四章，長五尺，九枚。口材得二尺，長四尺，廣五寸，九枚。凡六十七枚。”^①

它如：《港大簡》河堤簡 225；《居補簡》76.52；《額漢簡》99ES17SH1:33、2000ES7SF1:18、2000ES7S:9A、2000ES14SF2:5。

3. 歲：表示年齡單位的量詞。如：

(1)《額漢簡》2000ES9SF3:10：“齒九歲詣城倉。”

(2)《居補簡》306.19：“文年廿三歲，長七尺五寸，鱗得成漢里。”

(3)《港大簡》日書簡 78：“產一日，八十日不死，女子八十九歲辛亥死。”

它如：《港大簡》79、80、81、82、83；《居補簡》L1、N120A。

4. 兩₁（輛）：表示車乘的單位，後作“輛”。《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

① 關於本簡長度單位“章”的釋讀，和“楣”、“椽”的意義，請詳下文長度單位量詞“章”條。下同。

孔穎達疏：“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史記·貨殖列傳》：“其輅車百乘，牛車千兩。”簡文如：

(1)《居補簡》39.7：“車一兩。”

(2)又C30：“校甲渠正月盡三月四時出折傷牛車二兩。”

(3)《額漢簡》2000ES9SF3:10：“車一兩。牛一頭，黃字，齒九歲。”

它如：《居補簡》37.53、121.21。

5. 封：表示封緘物的量詞。《漢書·遊俠傳·陳遵》：“治私書謝京師故人……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如：

(1)《居補簡》72.1：“私書一封□多（？）。”

(2)又180.36：“□事（？）二封（？）。”

6. 幅：表示布帛、紙張等物的量詞，簡文寫作“福”，通“幅”。如：

(1)《居補簡》L55：“二福（幅）巾三枚，垂□。”二幅巾，蓋指由二幅布合成的巾。

不過，作為量詞，這裏的“福（幅）”還不夠典型，暫置於此。

7. 頭：表示牛等牲畜類動物單位的量詞。如：

(1)《額漢簡》2000ES9SF3:10：“車一兩，牛一頭，黃字，齒九歲。”

(2)又2000ES9SF3:4B：“（胡虜）入肩水塞，略得焦鳳牛十餘頭，羌女子一人。”

(3)《居補簡》121.21：“牛二頭。”

8. 編：表示書卷單位的量詞。如：

(1)《額漢簡》2000ES9SF3:2（上）：“始建國三年二月癸亥朔壬戌，第十隧長育敢言之，謹移卒不任望候名籍一編，敢言之。”

(2)《居補簡》306.20：“月乙卯朔乙亥，肩水候丞更得敢言之，都尉府謹速移卒一編，敢言之。”

(3)又C15：“建平二年七月丙戌朔甲寅，錢□名籍一編，敢言之。”

它如：《居補簡》30.14、122.30。

9. 領：表示衣物的量詞。如：

(1)《額漢簡》2000ES7SH1:13：“□襦一領，裘一領。”

(2)《居補簡》L54B：“絳（？）袍一領，絡逕一兩。”

(3) 又 509.3: “袍一領，泉履一兩。”

它如：《額漢簡》2000ES7SH1:17；《居補簡》8.2、C22。

10. 級：表示砍下的人頭的單位的量詞。秦制，戰爭中斬敵首一，賜爵一級，稱為首級。後以“級”為所斬之首的量詞。《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

李賢注：“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如：

《額漢簡》2000ES9S:8：“三日捕斬胡虜，凡截頭百五級……”

11. 齊（劑）：表示藥物計量單位的量詞，“齊”為“劑”的古字。《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如：

《額漢簡》2000ES9SF4:14：“謹飲藥五齊，不愈（愈），唯治所請醫診治。”

12. 石₁：表示官俸的計量單位量詞；官俸與官階相聯，故秦、漢又用為表示官位品級的量詞。《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顏師古題解：“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如：

(1) 《額漢簡》99ES17SH1:20：“掾吏百石以上過隧長輒宿。”

(2) 又 99ES17SH1:16：“□者以先請相中二千石以先。”

(3) 又 2000ES9SF4:23A：“□自言功勞者與計偕吏千石以下及比者自。”

(4) 《居補簡》5.3+10.1+13.8+126.12：“徵吏二千石。”

13. 分：指整體中的一個或數個等分的量詞，今也寫作“份”。如：

(1) 《額漢簡》2000ES14SF1:5：“□一分，石膏二分，□□二分，□參一分，弓一分，厚朴一分，杏亥（核）中人（仁）一分，並合。”這是藥方，指每種藥在該方劑中各佔多少等分。

(2) 《居補簡》L39B：“人參二分。”這也是藥方殘簡。

14. 合：表示有蓋盛物器的單位量詞。合，有“合閉、合攏”義，故可指有蓋的盛物器，所以可用為量詞，後作“盒”。如：

(1) 《港大簡》遣策124：“檢（奩）一合，盛食。”

(2) 又129：“檢（奩）一合，盛□。”

15. 人：表示人的單位量詞。如：

(1) 《居補簡》139.15：“田直卅六萬，奴一人，直九萬田。”

(2) 《額漢簡》99ES17SH1:26: “□宋等五人，皆證恭朴強牝上自傷。”

(3) 《港大簡》日書37: “至□□者，恆使之北(?)伯，各爲更事□，各戶一人。”

此詞甚多，它如：《額漢簡》99ES16SF2:11、99ES16SF3:1A(上)、99ES17SH1:7、2000ES7F1:33、2000ES7F:23；《居補簡》81.1、229.37、257.35、274.14、306.21、481.22、L33；《港大簡》28、37、131、132、134、135、136、137、141，等。

B. 集體單位量詞

16. 兩₂：表示鞋、襪等成對的衣物的量詞。《詩·齊風·南山》：“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孔穎達疏：“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簡文用例如：

(1) 《額漢簡》2000ES7SF2:3: “□民武即從嚴立賈白布綳一兩，直三□。”

(2) 《居補簡》N114: “坐亡布複綳一兩。”

(3) 又 L54B: “絳(?)袍一領，絡逕一兩。”

它如：《居補簡》8.2，509.3。

17. 束：表示捆繫在一起的東西的集體單位量詞，相當於量詞“捆”。《詩·小雅·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穀，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如：

(1) 《港大簡》河堤簡 225 正：“三月令其室人儋(擔)菅二百餘束廟中蓋之，毋令人見也。”

(2) 《額漢簡》2000ES7SF1:3: “出茭百七十束，直錢百七十。”

18. 具：表示成套器物的集體單位量詞，一具相當於一套。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 315: “博一具。”博，博具，成套使用，故用量詞“具”。又 34: “角弩一具。”弩也爲成套者，故用量詞“具”。如：

(1) 《額漢簡》99ES16SF2:5A: “居攝二年三月乙未，第十部吏□買弩一具。”

(2) 又 99ES16SF2:5B: “居攝二年三月乙未，第十六隧長韋卿從第十部吏買弩一具，賈□一百□□。”

(二) 度量衡單位量詞

度量衡單位量詞又可分爲長度單位量詞、重量單位量詞和容量單位量詞三類，以下分別簡述之。

A. 長度單位量詞

19. 匹₂：表示布匹長度單位的量詞。《說文·匚部》：“匹，四丈也。”王筠句讀：“古之布帛，自兩頭卷之，一匹兩卷，故古謂之兩，漢謂之匹也。”《漢書·食貨志下》：

“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如：

(1) 《居補簡》56.42：“口二匹一丈。”“匹”前當是表示布類的名詞。

(2) 《額漢簡》2000ES9SF4:22：“第九隧卒史義角布一匹，買錢五百。”

(3) 又2000ES14SF2:5：“口帛匹八尺四寸。羊偉一枚。口絮十斤四兩。口布匹八尺”

20. 丈：表示長度單位的量詞。兩漢1引等於10丈（西漢和新莽合2310釐米，東漢合2375釐米），1丈等於10尺（西漢和新莽合231釐米，東漢合237.5釐米），1尺等於10寸（西漢和新莽合23.1釐米，東漢合23.75釐米）。如：

(1) 《港大簡》河堤簡224正：“杠材大四章，長二丈二尺，三枚。”

(2) 《額漢簡》2000ES7S:14B：“第七隧承索十丈，一完。”

(3) 《居補簡》56.42：“口二匹一丈。”

此詞較多，它如：《居補簡》203.65；《額漢簡》99ES17SH1:12、2000ES7S:14A、2000ES9SF3:8、2002ES12SH1:2；《港大簡》224。

21. 尺：表示長度單位的量詞。1尺等於10寸，西漢及新莽1尺爲23.1釐米，東漢爲23.75釐米。如：

(1) 《港大簡》河堤簡224背：“材得二尺，長四尺，廣五寸，九枚，凡六十七枚。”

(2) 《額漢簡》2000ES14SF2:5：“口帛匹八尺四寸。”

(3) 《居補簡》121.14：“長七尺二寸，黑色。”

此詞較多，它如：《居補簡》14.15、142.15、203.65、245.7、306.19、N120A、L1；《額漢簡》99ES17SH1:2、2000ES14SF2:5。

22. 寸：表示長度單位的量詞。1寸等於10分，西漢及新莽1寸爲2.31釐米，東漢爲2.375釐米。如：

(1) 《港大簡》河堤簡224背：“材得二尺，長四尺，廣五寸，九枚，凡六十七枚。”

(2) 《額漢簡》2000ES14SF2:5：“口帛匹八尺四寸。”

(3) 《居補簡》N120A：“馬一匹驃牡齒六歲高五尺八寸。”

此詞甚多，它如：《居補簡》14.15、121.14、142.15、203.65、245.7、274.10、274.11、306.19、540.8、L1；《額漢簡》2000ES14SF2:5。

23. 里：表示長度單位的量詞。古以三百步爲一里，後亦有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者，今以一百五十丈爲一里。《孔子家語·王言》：“周制三百步爲里。”清顧炎武《日知錄·里》：“《穀梁傳》‘古者三百步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漢代一里約合一百八十

丈。如：

(1)《港大簡》河堤簡 221：“宜成河堤，凡三百廿里廿六步，積七十一萬九千六百一十八【步】。”

(2)《居補簡》L24：“絕水草五百里。”

(3)《額漢簡》2000ES9SF4:47：“北去第九隧一里百五十步。”

此詞甚多，它如：《居補簡》120.41、120.46、236.18、486.82、L25A、T17N31；《額漢簡》2000ES9SF4:47、99ES17SH1:12；《港大簡》河堤簡 11、201、206、207、208 等。

24. 步₁：表示長度單位的量詞。步，作為古代的一種長度單位，其制歷代不一。《小爾雅》：“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為紀……六尺為步。”漢代一里為三百步，而又約合一百八十丈，據此推算，簡文中一步長度應為六尺，應該用的是秦制。如：



(1)《港大簡》河堤簡 207：“北鄉河堤，凡七十二里七十步，積廿萬七千卅步。”

(2)又 210：“若鄉河堤，凡廿十里百六十步，積六萬四千五百卅五步。”

(3)《額漢簡》2000ES9SF4:47：“南去其隧一里百五十步。”

此詞甚多，它如：《居補簡》236.18、564.29；《港大簡》河堤簡 201、205、206、207、210、211、212、213 等。

25. 韋：也作“圍”，計算圓周長度的量詞單位，直徑一尺為韋，同“圍”。《字彙補·韋部》：“韋，與圍同。”《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陸德明釋文：“百圍，李云徑尺為圍，蓋十丈也。”如：

(1)《額漢簡》2002ES12SH1:2：“二，長二丈，大二韋，臥內屋梁與炊內屋相。”

(2)《港大簡》河堤簡 224：“□□大四韋，長丈八尺，二枚。杠材大四韋，長二丈二尺，三枚。前後柱大四韋，長丈五尺，六枚。棟前後楣大三韋五寸，長二丈六尺，六枚。榱材大韋五寸，長丈七尺，卅二枚。□材大四韋，長五尺，九枚。”楣，《爾雅·釋宮》：“楣謂之梁。”郭朴注“門戶上橫櫟。”榱，《爾雅·釋宮》：“楣謂之榱。”郭朴注：“屋簷。”《說文·木部》：“櫟，榱也。”

上引簡文的“韋”字，原字形有兩種（詳圖一）。整理者推測，此字可能是“尋”字的異體字。我們認為，當釋“韋”。其理由如

圖一 簡文“韋”字：

字形之一： 字形

之二：



圖二 “韋”字小篆：



次：

“韋”字《說文》小篆字形爲韋（詳圖二）。從字形上看，簡文字形與《說文》小篆相近，只不過簡文寫得較隨意，且簡文是篆隸間文字。再者，簡文字形與其它簡帛所見相近，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40正：“韋（圍）城”，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165：“裹以韋臧（藏）”，《養生方》19：“善裹以韋”，銀雀山漢墓竹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840：“兵樂韋鞮（韠）之事”，《敦煌漢簡》1686：“尚韋二兩”、164：“束大一韋”，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6正二欄：“乘與黃韋篋”，張家山漢簡《算數書》91：“取梟程十步三韋束一”，等等。故從字形上看，釋“韋”爲是。

其二，從簡文意義上看，也當釋“韋”。由簡文內容可知，簡文記錄的是爲建房而準備的各種長短粗細的木材的數量，此字描述的是木材的粗細程度，即木材的周長。文獻表明，描繪樹木周長多用長度單位量詞“韋”（或作“圍”），不用“尋”，除上舉《莊子·人間世》外，再如：《漢書·成帝紀》：“是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韋以上。”顏師古注：“韋與圍同。”《山海經·海內西經》卷十一：“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洛陽伽藍記·城北》卷五：“《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等等。而表直綫距離用“尋”不用“韋（圍）”，《詩·魯頌·閟宮》：“是斷是度，是尋是尺。”鄭玄箋：“八尺曰尋。或云七尺、六尺。”《史記·張儀列傳》：“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司馬貞索隱：“七尺曰尋。”《廣韻·平侵》：“六尺曰尋。”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臨部》：“程氏瑤田云：度廣曰尋，度深曰仞，皆伸兩臂爲度，度廣則身平臂直，而適得八尺；度深則身臂曲，而僅得七尺。其說精覈。尋、仞皆以兩臂度之，故仞亦或言八尺，尋亦或言七尺也。”

所以，上舉簡文中的該字是表計算圓周長度的量詞單位“韋”。

B. 重量單位量詞

26. 石₂：表示重量單位的量詞。一百二十斤爲一石。《漢書·律曆志上》：“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秦制、漢制一石等於四鈞（秦合30360克，西漢合29760克，新莽合28560克，東漢26400克），1鈞等於30斤（秦合7590克，西漢合7440克，新莽合7140克，東漢6600克）。如：

（1）《居補簡》C27：“度用銅四千八百廿三石一鈞廿三斤，已入八百六十三石三鈞十二兩，少三千九百。”

27. 石₃：計算弓弩強度（即弓弩力量）的單位量詞。《荀子·議兵》：“魏氏之武卒，

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如：

(1)《居補簡》L52：“五石具弩一。”

(2)《額漢簡》2000ES9SF3:19：“卒周充六石具弩一，今力六石二匚。”

(3)又99ES17SH1:9.A：“六石弩，五石弩，四石弩，三石弩。”

此詞較多，它如：《居補簡》N75、311.11；《額漢簡》2000ES7SF1:23、99ES17SH1:5.A、99ES17SH1:5.B、2000ES7SF1:23，等等。

28. 鈞：表示重量單位的量詞。一鈞等於三十斤，秦合7590克，西漢合7440克，新莽合7140克，東漢6600克。如：

《居補簡》C27：“度用銅四千八百廿三石一鈞廿三斤，已入八百六十三石三鈞十二兩，少三千九百。”

29. 斤：表示重量單位的量詞。一斤等於十六兩，秦合253克，西漢合248克，新莽合238克，東漢220克。例如：

(1)《居補簡》158.14A：“□□當出□□□肉廿斤市巾□斤。”

(2)又306.10：“五十一紙重五斤。”

(3)《額漢簡》2000ES14SF2:4：“第十四隧脂二斤。”

此詞較多，它如：《居補簡》265.14A、272.23、T17N8、C27；《額漢簡》2000ES14SF2:5、2000ES9S:20A、2000ES7SH1:8、2000ES7SF1:45A。

30. 兩₃：表示重量單位的量詞。一兩等於二十四銖，秦制約合15.8克，西漢約合15.5克，新莽約合14.9克，東漢約合13.8克。如：

(1)《居補簡》C27：“度用銅四千八百廿三石一鈞廿三斤，已入八百六十三石三鈞十二兩，少三千九百。”

(2)《額漢簡》2000ES9SF3:23A：“第九隧膠二挺重十三兩。”

(3)又2000ES14SF2:5：“匚絮十斤四兩。”

C. 容量單位量詞

31. 石₄(大石、小石)：表示容量單位的量詞。一石等於十斗；石，即漢代所謂“大石”。從簡文可知，漢代除“石(大石)”外還有與之相對應的“小石”，兩者容量比為0.6:1，即0.6大石=1小石。這在《居延漢簡甲乙編》已有所反映，如：148.15：“凡出穀小石十五石，為大石九石。”又148.41：“入糜小石十二石，為大石七石二斗。”又273.9：“入糜

小石十二石，爲大石七石二斗。”又275.21：“入廩大石八石七斗，爲小石十四石五斗。”小石是相對大石（即石）而言的。若用“小石”量物，根據所見簡文，一般表述爲“小石+數詞+石”，即第二個“石”爲“小石”之“石”的復指；若簡文中有“小石”而用“大石”量物，爲區別於小石，則用“大石+數詞+石”的用法。1大石=10大斗，1小石=10小斗（下文“斗”條將有述）。如：

（1）《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133：“平稟大石三石，爲小石五石，二月、三月食。”

（2）《額漢簡》99ES16SF2:1：“今糴粟小石六石，直三百六十。”

（3）又99ES16SF2:3：“入糴粟小石廿六石，直千五。”

此種用法甚多，它如：《港大簡》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4、145、157等（以上各牘均多見）。

如果簡文中沒有“小石”而單用“石”，那麼“石”即指“大石”，1石=10斗。如：

（4）《額漢簡》2000ES7SF1:65：“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5）又2000ES7SF1:10：“令史王宗十一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6）《居補簡》177.8：“用穀十三石五斗二升少。”

此種用法甚多，它如：《額漢簡》2002ES18SH1:7、2000ES7SF1:11、2000ES7SF1:14、2000ES7SF1:38、2000ES7SF1:127、2000ES9SF4:21、2000ES14F2:5、2000ES18SH1:7、99ES16ST1:12、99ES17SH1:30。

在《居補簡》中，沒有大石、小石之分，全部用“石”，如：23.3、42.2A、61.8、76.65、78.23、540.3、N75、L40、L70、T17N11等。

32、斗（大斗、小斗）：表示容量單位的量詞。秦漢一斛等於十斗，一石也等於十斗，一斗等於十升。據《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和西北出土簡可知，在漢代也有大斗、小斗之分，如《居延漢簡甲乙編》308.11：“田【小】斗五斗二升，爲大斗田。”又534.7：“田大斗五斗二升。”又273.25：“府食以八月出穀，到征和四年二月十五日度盡，餘有小斗二斗。”又273.4：“餘穀小斗二斗二升。”並且，大斗配合大石使用，小斗配合小石使用。簡文中若有大石或小石出現，則大石或小石後若有下一容量單位便只寫作“斗”，不再寫作“大斗”或“小斗”，如下文所舉《港大簡》：“大石四石五斗，爲小石七石五斗。”根據簡文推測，原來傳世文獻中所見的漢代的“斗”應該就是大斗。需要說明的是，簡文中大斗和小斗與傳世文獻所載是不同的。“大斗”非傳世文獻中所謂的“容量大于標準量的斗”或者“三斗爲大斗”，小斗也非傳世文獻中所謂的“容量小于標準量的斗”。

如：《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漢書·貨殖傳》：“蒼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顏師古注：“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舊唐書·食貨志上》：“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關於簡文的大斗小斗的具體容量和比例關係，結合簡文大石、小石考察，則可知：大石：小石=0.6：1，即一小石等於0.6大石。大斗：小斗=0.6：1，即一小斗等於0.6大斗。1大石：1大斗=10：1，即1大石=10大斗。1小石：1小斗=10：1，即1小石=10小斗。簡文中斗（大斗、小斗）的用例甚多，僅以《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爲例舉如下：

（1）131 正：“君告根稟得家大奴一人，大婢一人，小婢一人，凡三人，用粟大石四石五斗，爲小石七石五斗，九月食。”

（2）132 正：“利家大奴一人，大婢一人，小婢一人，稟大石四石五斗，爲小石七石五斗，十月食。”

（3）又：“利家大奴一人，大婢一人，小婢一人，稟大石四石五斗，爲小石七石五斗，十一月食。”

（4）又 136 正：“根稟緹家大奴一人，大婢一人，小婢一人，凡三人，三月食，用粟大石四石五斗，爲小石七石五斗。”

以上四條簡文均爲：大石四石五斗（4.5 大石）=小石七石五斗（7.5 小石）。則其大石、大斗與小石、小斗的比例爲：4.5 大石：7.5 小石=1：0.6。用此比例去驗算所有的簡文，除個別抄寫有誤外，均是相合的。例如驗算上文所舉《居延漢簡甲乙編》中的以下例子：

（5）148.41：“入廩小石十二石，爲大石七石二斗。”驗算：7.2 大石（7 石 2 斗） $\div 0.6=12$ 小石。相符。

（6）275.21：“入廩大石八石七斗，爲小石十四石五斗。”驗算：8.7 大石 $\div 0.6=14.5$ 小石（14 石 5 斗）。相符。

僅《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中有關大石、小石、大斗、小斗的簡文就頗多，現以 135 牘中的幾例再來驗算一下：

（7）“根稟利家大奴一人，大婢一人，小婢一人，四月、五月食，用粟大石九石，爲小石十五石。”驗算：9 大石 $\div 0.6=15$ 小石。相符。

（8）“服稟予哉粟大石一石五斗，爲小石二石五斗。”驗算：1.5 大石 $\div 0.6=2.5$ 小石（2 石 5 斗）。相符。

（9）“貝稟服家大婢一人，小婢一人，五月盡，七月用粟大石七石五斗，爲小石十二

石五斗。”驗算： $7.5 \text{ 大石} \div 0.6 = 12.5 \text{ 小石}$ （12石5斗）。相符。

“（大）斗”、“（小）斗”簡文中出現次數甚多，如：《居補簡》8.11、18.17、23.3、26.27、77.74A，《港大簡》131、147、148、149、150、151、153、154、155（以上各牘均多見），《額漢簡》2000ES7SF1:38、2000ES7SF1:65、2000ES7SF1:27，等等。

33. 參：字亦訛作“彖”。表示容量單位的量詞，僅見於《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根據簡文中大小石比率的关系可以算出，所謂“參”，是將大石換算成小石後的餘數單位。大致是“一參”相當於大石的二升，也就相當於小石的三升三還有餘數（ $3\frac{1}{3}$ 小升， $\frac{1}{3}$ 小斗， $\frac{1}{30}$ 小石），故為方便計數，採用了這個特殊的容量單位來省略許多尾數的麻煩。再者，參，有“三”意，故推測是有意選用此字來表示三分之一。簡文用例如：

（1）151：“在粟大石五石，為小石八石三斗一參，已，大奴一人，大婢一人，使奴一人，凡三人。”據簡文驗算： $5 \text{ 大石} \div 0.6 = 8.3 \text{ 石} + \frac{1}{3} \text{ 小斗}$ 。一參為 $\frac{1}{3}$ 小斗。相符。

（2）173 正：“服粟大石二石五斗，為小石四石一斗二參。大婢一人，小婢一人，凡二人。”據簡文驗算： $2.5 \text{ 大石} \div 0.6 = 4.1 \text{ 小石} + \frac{2}{3} \text{ 小斗}$ 。一參為 $\frac{1}{3}$ 小斗，故二參為 $\frac{2}{3}$ 小斗。相符。

（3）131 正：“根粟昌邑家大奴一人，大婢一人，使婢一人，七月食，用粟大石五石五斗五升，為小石九石二斗一彖（參）半彖（參）。”據簡文驗算： $5.55 \text{ 大石} \div 0.6 = 9.2 \text{ 小石} + \frac{1}{2} \text{ 小斗}$ 。一參為 $\frac{1}{3}$ 小斗，半參為 $\frac{1}{6}$ 小斗， $\frac{1}{3} \text{ 小斗} + \frac{1}{6} \text{ 小斗} = \frac{1}{2} \text{ 小斗}$ 。相符。

此詞甚多，如：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51、153、154、155（以上各牘均多見）等等。

34. 升：表示容量單位的量詞。十分之一斗，秦漢 1 升為 200 毫升。簡文中“小石”後均無“升”這一單位，若有餘數，則用“參”。“升”用例如下：

（1）《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 172：“昌邑粟大石八石七斗五升，為小石十四石五斗二參半參，已。大奴一人，大婢一人，使奴一人，使婢一人，小奴一人，凡五人。”據簡文驗算： $8.75 \text{ 大石} \div 0.6 = 14.5 \text{ 小石} + \frac{2}{3} \text{ 小斗} + \frac{1}{6} \text{ 小斗}$ 。二參為 $\frac{2}{3}$ 小斗，半參為 $\frac{1}{6}$ 小斗。相符。

（2）《額漢簡》99ES17SH1:30：“□粟七石三斗三升少。”

(3)《居補簡》177.8:“用谷十三石五斗二升少。”

此詞甚多，它如：《居補簡》8.11、18.17、19.48、78.24、108.29；《港大簡》31、147、148、149、150、151、153、154、155（以上各牘均多見）；《額漢簡》2000ES7SF1:11、2000ES7SF1:10、2000ES7SF1:14、2000ES7SF1:65，等。

35. 斛：多用於量糧食容量單位量詞。一斛為十斗，南宋末年改為五斗。《儀禮·聘禮》：“十斗曰斛。”如：

(1)《額漢簡》2000ES7SF1:66：“□□二□一斛四斗□□□。”

(2)《居補簡》231.63：“第二隊長史臨十一月食三斛。”

(3)《居補簡》306.2：“□凡大斛二百五十六斛。”

它如：《居補簡》156.19、486.28。

(三) 面積單位量詞

36. 畝：表示土地面積單位的量詞。周制六尺為一步，橫一步，直一百步為一畝，即一百平方步為一畝。商鞅變法規定：五尺為步，橫一步，直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即二百四十平方步為一畝；漢因秦制。如：

(1)《額漢簡》99ES16SF2:1：“關都里張齊十三畝，已交茭錢三百六十。”

(2)《額漢簡》99ES16SF2:3：“田一頃八十七畝。”

(3)《港大簡》河堤簡 222 正：“凡堤能治者六百廿一里二百卅步，積三百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一十二步，□田一□二頃五十七畝（畝），百九十二步。”

37. 頃：表示土地面積單位的量詞。百畝為頃。如：

(1)《額漢簡》99ES16SF2:3：“田一頃八十七畝。”

(2)《港大簡》河堤簡 222 正：“凡堤能治者六百廿一里二百卅步，積三百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一十二步，□田一□二頃五十七畝（畝），百九十二步。”

38. 步₂：表示土地面積單位的量詞。如上“畝”條所述，商鞅變法規定：五尺為步，橫一步，直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即二百四十平方步為一畝。也就是說，“平方步”是“畝”的下級單位，與“畝”的進位是二百四十（240）。^①今從簡帛可知，此制沿襲了很長時間，至少兩漢三國時期一直沿用。也就是說，古人在用“步”表長度單位的同時，也用“步”

^① 作為面積單位的“步”，在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中甚多，可詳見拙文《張家山漢簡中量詞》，載《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巴蜀書社，2007。

表面積單位“平方步”，亦即古人在表示面積時是不說“平方步”的，而是說“步”，其書寫形式語音形式與長度單位量詞“步”同。面積單位量詞“步”用例如下：

(1) 《港大簡》河堤簡205：“莫陽鄉徹丘隄，凡八里百廿步，積七千五百六十步。術（率）廣三步，積七千五百六十步。”積，面積。率，即規格、標準，此處指河堤的寬度標準。第一、三個步是長度單位，第二、四個步是面積單位（以下幾例同）。古者長度一里等於三百步。簡文意為：莫陽鄉徹丘隄，長度共八里百廿步（ $300\text{步} \times 8 + 120\text{步} = 2520\text{步}$ ），實際面積是七千五百六十平方步。按堤寬三步之標準計算，面積應是七千五百六十步（ $2520\text{步} \times 3\text{步} = 7560\text{平方步}$ ），實際與此相符。

(2) 又 208：“北鄉京口堤，凡卅二里六十步，積七萬九千八百步。術（率）廣八步少半步，積八萬五百步，【畸】多，實七百步。”畸，指河堤不規整。簡文大為：北鄉的河堤，總共長度是三十二里六十步（ $300\text{步} \times 32 + 60\text{步} = 9660\text{步}$ ），實際面積為七萬九千八百平方步（79800平方步），按照寬八步少半步（ $8\frac{1}{3}\text{步}$ ）的標準來計算，面積應該是八萬五百平方步（ $9660\text{步} \times 8\frac{1}{3}\text{步} = 80500\text{平方步}$ ），是因為不整齊的地方太多，實際相差七百平方步。

(3) 又211：“若鄉口堤，凡九里百五十二步，積萬八千步。術（率）廣六步少半步，積萬八千六十二步大半步，畸多，實六十二步，大半步。”此句大致意思為：河堤長九里百五十二步（2852步），實際面積八千平方步。按照寬六步少半步（ $6\frac{1}{3}\text{步}$ ）的標準來計算，面積應為一萬八千六十二步大半平方步（ $2852\text{步} \times 6\frac{1}{3}\text{步} = 18062\frac{2}{3}\text{平方步}$ ），是因為不整齊的地方太多，實際相差六十二平方步又大半平方步（ $62\frac{2}{3}\text{平方步}$ ）。

它如：200、201、202、204、206、207、209、210、212、213、215、221、223。

貳：動量詞

表示動作行為的計量單位的量詞稱為動量詞。簡文中的動量詞祇只一個，但顯得十分珍貴，因為動量詞產生較名量詞晚，這對於研究動量詞產生時間是頗重要的。

39. 通：表示動作行為次數的量詞，相當於“遍”或“次”。劉向《說苑·正諫》：“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如：

(1) 《額漢簡》2000ES7SH1:4：“[]界亭常月十日廿日晦日夜舉苴火各一通。”界亭固定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及月末的最後一天的晚上點燃火把一次。

(2) 又2000ES9S:14：“[]□□□三日復舉苴火二通。”

(3) 又2002ESCSF1:18A：“下一苴火一通。”

三、數量表示法

要研究數量表示法，必須涉及數詞問題，故下文先簡要談談簡文的數詞情況，再談簡文的數量表示法。

（一）數詞

數詞是表示數目的詞。下面分基數、序數、分數、概數等四個方面來簡介：

1. 基數詞

在這三種材料的簡牘中，基數詞已基本齊全。其中“十”以下的整數中，“二”又用“兩”來表示，“四”也寫作“𠄎”。如：

（1）《港大簡》日書78：“產一_日，八十日不死，女子八十九歲半辛亥死。”

（2）《居補簡》8.2：“葛絲二兩。”

（3）《額漢簡》2000ES7SF1:29B：“米三斗_𠄎。”

（4）《港大簡》遺策125：“囊四_𠄎，盛_𠄎，_𠄎一_𠄎，盛_𠄎。”

（5）《額漢簡》99ES17SH1:26：“_𠄎宋等五人皆證恭朴強_𠄎上自傷。”

（6）《居補簡》18.1A：“薪（？）六_𠄎槍（？）十_𠄎。”

（7）《港大簡》日書76：“【日】五夜十一。正月大，日七夜九。三月大，日九夜七。五月大，日十一夜五。七月大，日九夜七。九月【大】，日七夜九。”

（8）《額漢簡》2000ES7SF1:23：“第七隧六石弩系承弦八完。”

（9）《額漢簡》99ES17SH1:2：“入兩行二百。”

（10）《居補簡》479.1：“始建國地皇上戊三年三月。”

“十”以上的數中，“十五”也寫作“什五”或“一十五”；“二十”寫作“廿”；“三十”寫作“卅”；“四十”寫作“卅”（廿、卅、卅均是合文）。如：

（11）《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198：“口牝三百六十七：征什五匹，八分去二，匹七分去駒二百五十二除劣馬卅十四，定息二百一十五。”

（12）《居補簡》123.59：“_𠄎定負二十四。”

（13）又13.9：“庸同縣延陵大夫陳遂成，年廿九，第廿三車。”

(14)《額漢簡》99ES16ST1:1-8:“輔廣土(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

(15)又99ES16SF2:11:“卒卅八人。”

(16)《額漢簡》2000ES7SF1:18:“三十。”

(17)《額漢簡》2000ES41SF2:“大石二百卅石。”

此外,也出現了將“一十四”寫作“一三”類形式以及將“三十”寫成“卅十”,“四十”寫成“卅十”的不規範形式,這是原來未見的現象,也可能屬下層書手之所為。如:

(18)《額漢簡》又99ES16ST1:10:“始建國一三年三月乙酉朔己丑第十候史褒敢言之:初除,即日視事。敢言之。”

(19)《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149:“庚子壽入稟粟小石卅十石,入京中。”

(20)又132正:“凡出粟大石卅十石七斗五升。”

(21)又198:“劣馬卅十匹。”

(22)《居補簡》162.20:“豆卅 卅 卅。”

“一百”也用“百”、“一千”也用“千”、“一萬”也用“萬”,即省略“一”。如:

(23)《港大簡》奴婢廩食粟出入簿179:“出粟大石百卅五石五斗,以(己)稟。”

(24)《居補簡》264.31:“第四隧長奉千二百。”

(25)《居補簡》C10A:“綏和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用錢萬一千三百卅。”

此外,《居補簡》中出現了用“十千”表示“一萬”的形式。如:

(26)《居補簡》T17N9:“十一千八百匹(?)。”十一千,即一萬一千。

2. 序數詞

多用基數詞來表示序數,同時在《額漢簡》中也大量出現了把詞綴“第”放在整數詞前面來表示順序的典型用法,如:

(1)《額漢簡》99ES17SH1:38:“閏月己卯第十七候。”

(2)又99ES16ST1:13:“第十三隧長王良。”

(3)《居補簡》81.1:“右館陶第卅車十人。”

3. 分數

(1)用“分母+‘分’+量詞+分子”的形式表示幾分之幾。

《港大簡》河堤簡222背:“實三百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二步。三百人分之,人得卅

四每（畝）卅六步，有三百分步七十二。□□堤卅九里二百廿二步。”

（2）用“半”表示二分之一；用“少半”表示三分之一；用“大半”表示三分之二。如：

1) 《港大簡》河堤簡172：“昌邑稟大石八石七斗五升，爲小石十四石五斗二參半參。”

2) 又211：“若鄉口堤，凡九里百五十二步，積萬八千步。術（率）廣六步少半步，積萬八千六十二步大半步，畸多，實六十二步大半步。”^①

4. 概數

（1）“數”用在動詞或者名詞的前面表示概數。如：

《額漢簡》99ES16ST1:1-8：“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土（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

（2）數詞或數量短語後加“餘”表示概數。如：

《額漢簡》2000ES9SF3:4B：“（胡虜）入肩水塞，略得焦鳳牛十餘頭，羌女子一人，將西渡河。虜四騎止都倉西，放馬；六十餘騎止金關西。”

（二）數量表示法

簡文的數量表示法大致可歸納爲以下幾類：

1. 名詞+數詞。如：

（1）《居補簡》160.21：“出錢卅買盆二。”

（2）《額漢簡》2000ES7SF1:45B：“肉八百。”

① 《港大簡》河堤簡26枚，涉及到“大半”、“少半”詞的有6枚，整理者的標點和對簡文的理解大都有誤，現表列如下：

簡號	整理者的標點	正確的標點	簡文意義
201	六步，少半步	六步少半步	$6\frac{1}{3}$ 步
208	八步少半步	八步少半步	$8\frac{1}{3}$ 步
209	八步，大半步	八步大半步	$8\frac{2}{3}$ 步
211	六步，少半步	六步少半步	$6\frac{1}{3}$ 步
212	七步，少半步	七步少半步	$7\frac{1}{3}$ 步
213	六步，大半步	六步大半步	$6\frac{2}{3}$ 步

以上是我們對原簡核算後得出的結論。上述除201簡核算後與原簡文所言結果不合，其它均相合；201簡應該是存在計算錯誤，並且，祇有將該簡理解爲 $6\frac{1}{3}$ 步時，才和該簡所言結果最爲相近。其次，僅從整理者的標點可知，整理者對同一簡文形式的標點是不一致的（或在第一個“步”後點斷，或不點），這本身就說明整理者的標點有問題，對文意的理解有問題。

(3)《港大簡》遣策120：“小餅三，盛著杯，沐。”

2. 數詞＋名詞。如：

(1)《居補簡》81.1：“右館陶第卅車十人。”

(2)《額漢簡》2000ES7SF2:7：“居延卅井遮竟隧。”

(3)《港大簡》日書25：“□□□以戊午、己未，是禹之取桀【山之女爲】妻之日也，必一子死。”

3. 名詞＋數詞＋量詞。如：

(1)《居補簡》65.4：“黍米一斗”

(2)《額漢簡》2000ES7SF1:3：“出茭百七十束，直錢百七十。”

(3)《港大簡》遣策124：“檢(奩)一合，盛食。”

4. 數詞＋量詞＋名詞。如：

(1)《居補簡》177.16：“用谷廿七石六斗，其十六石粟，十一石六斗麥。”

(2)《居補簡》177.17：“凡谷卅一石，其十九石四斗粟，十一石六斗麥。”

(3)《額漢簡》2000ES7SF1:23：“第七隧六石弩系承弦八完。”

它如：《居補簡》19.84、274.10、274.11、L55；《額漢簡》99ES17SH1:9A。

5. 數詞＋量詞。如：

(1)《居補簡》121.14：“長七尺二寸，黑色。”

(2)《額漢簡》2000ES7SF1:10：“十一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3)《港大簡》河堤簡207：“北鄉河堤，凡七十二里七十步，積廿萬七千卅步。”

6. 數詞單用。即單用數詞來表示數量。如：

(1)《額漢簡》99ES16ST1:1-8：“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

(2)《港大簡》河堤簡200：“南鄉南均堤，凡十八里百七十步，積五萬五千六百五十步。衡(率)廣十步，積五萬五千七百步，畸多，實五十。”

7. 量詞單用。即單用量詞來表示數量，通常相當於“‘一’＋量詞”或“‘每’＋量詞”的省略形式，即省略了數詞“一”或副詞“每”。如：

(1)《居補簡》8.11：“斗六升。”

(2)又18.17：“斗三升少。”

(3)《港大簡》河堤簡224正：“□□大四韋，長丈八尺，二枚。”

通過以上可知，漢語中的諸多數量表示形式簡文大體都有。不過，最成熟的“數詞＋量詞＋名詞”形式卻相當少，僅幾例；而“名詞＋數詞”、“數詞＋名詞”、“名詞＋數詞＋量詞”等形式仍佔多數，所以，簡文的數量表示法仍處於未完全成熟時期。

四、餘論

以上我們對《額漢簡》、《居補簡》、《港大簡》這三種中的量詞進行了清理研究。通過對這些簡文量詞的整理，還可以提出以下兩個問題來簡要討論：

（一）關於漢語史上量詞的成員問題

漢語量詞史上到底共有多少量詞，各個階段時期的量詞構成情況如何，這些是漢語量詞史上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在研究量詞史時必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然而，這一問題實際上解決得並不太好，特別是對先秦兩漢時期量詞構成基本情況的認識，過去主要依據傳世文獻來進行研究，結論難免會有些問題。今從《額漢簡》、《居補簡》、《港大簡》中的量詞來看，證明我們過去對先秦兩漢量詞數量的認識是需要修正的，因為內中就有我們原來未曾知曉的量詞。例如上文所舉簡文中的以下量詞：

合：表示有蓋盛物器的個體單位量詞。合，有“合閉、合攏”義，故可指有蓋的盛物器，所以可用為量詞。

大石、小石：漢代表示容量單位的量詞。大石，即傳世文獻中所謂漢代的“石”，等於十斗（大斗）。小石，與大石相對。大石與小石容量比為0.6:1，即0.6大石=1小石。

大斗、小斗：漢代表示容量單位的量詞。也有大斗、小斗之分，大斗配合大石使用，小斗配合小石使用。1大石:1大斗=10:1，即1大石=10大斗。1小石:1小斗=10:1，即1小石=10小斗。

參：漢代表示容量單位的量詞。是將大石換算成小石後的餘數單位，大致是一參相當於大石的二升，也就相當於小石的三升三還有餘數。

以上量詞特別是大石、小石、大斗、小斗，完全出乎預料，帶給我們信息的沖擊力，完全是震聾發聵性的。

（二）關於一些量詞意義產生演變的途徑問題

量詞研究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要儘量弄清楚每一個量詞意義產生發展演變的途徑，這既是漢語單個量詞發展史研究的需要，也是整個漢語量詞發展史乃至整個漢語辭彙發展史研究的需要。今從《額漢簡》、《居補簡》、《港大簡》中的量詞來看，過去我們對一些量詞意義產生演變的途徑的認識需要修正。以下僅舉量詞“分（份）”為例來進行簡要的討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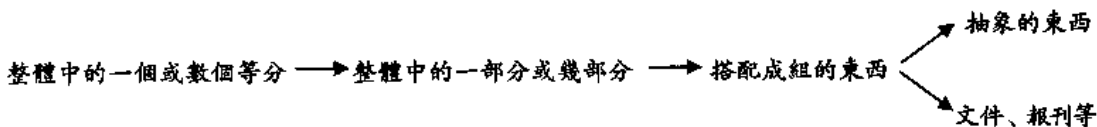
量詞“分”現在又可寫作“份”。今語中此量詞有以下幾個意義（以下均寫作“分”）：

1. 指整體中的一個或數個等份。如：老王把全部財產都處理了，平均分成五分，給老大一分，老二一分，老三一分，老兩口自己兩分。
2. 指整體中的一部分或幾部分。如：老張將每月的工資 1500 元分成三分，一分 600 元，用於家庭日常生活開支；一分 400 元，寄給老家的父母；一分 500 元，存入銀行以備日後急用。
3. 指搭配成組的東西。如：他吃了兩分盒飯。／春節給各部門領導拜年，共送了九分禮。
4. 指抽象的東西。如：老張的那一分情誼真是太寶貴了。／他沒有這分福氣。
5. 指文件、報刊等。如：本合同雙方各執一分。／買了一分《人民日報》。

由上文可知，簡文中的量詞“分”指整體中的一個或數個等分。如上文所舉《額漢簡》2000ES14SF1:5：“☐一分，石膏二分，□□二分，□參一分，弓一分，厚朴一分，杏亥（核）中人（仁）一分，并合。”這一藥方的量詞“分”，指將該劑藥分為若干等份之後其中的一個或幾個等份。

傳世典籍中量詞“分”最早見於明代，其意義是“整體中的一部分或幾部分”和“搭配成組的東西”。如《水滸傳》第五三回：“那分麵卻熱，老兒低着頭，伏桌兒吃。”《醒世恆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自明日為始，我教當直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今從簡文可知，量詞“分”早在漢代就已產生，傳世典籍中所見的此量詞比簡帛文獻晚了一千多年。^①

簡文中的量詞“分”不僅在該量詞的產生、起源方面具有重要研究價值，而且在該量詞意義發展演變方面也具有重要研究價值。今從漢簡可知，量詞“分”最早的意義是“等分”（整體中的一個或數個等分），今語中的上述幾個意義都是從簡帛時代的“等分”義發展而來。其發展演變過程應當是：



① 關於量詞“分”產生的時間問題，據我們從其它簡帛材料分析所知，該量詞在先秦就已產生，詳拙文《馬王堆醫書中的新量詞》，《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二期，《船山學刊》雜誌社，2005年12月。

這樣一來，量詞“分”意義發展演變的途徑也就清清楚楚了。

通過上文對《額漢簡》、《居補簡》、《港大簡》中的量詞的初步探討說明，簡文給我們帶來的有關量詞的信息是非常可喜的，簡文中的量詞無論是在整個漢語量詞的產生發展演變史的研究方面，還是在單個量詞產生發展演變史的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啟示我們，先秦兩漢距今太遠，文獻流亡佚太多，文獻傳抄亦易使之“失真”，故在大量簡帛文獻問世的今天，我們應當充分重視簡帛量詞的研究，改變過去研究漢語量詞時主要依靠傳世文獻的做法，應當對簡帛中的所有量詞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尤其要重視當時人記載文獻中量詞的研究，重視其中口語性文獻、應用性文獻的量詞研究，方利於漢語量詞史的研究。

漢簡所見西漢優撫措施^①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王文清

內容提要 西漢的優撫措施建立在軍功爵制基礎上，面向全體官兵；在論功行賞的原則下，對現役軍人及其家屬的優撫，主要包括在給立功將士的賞賜中。政府禮葬死亡將士，撫恤其家屬。戍邊軍人家屬受到優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漢軍功爵制有嚴格的高低等級界限，優撫措施也體現出顯著的等級差別，反映了西漢社會的等級性特徵。

關鍵詞 漢簡 西漢 優撫 軍功爵

軍人優撫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有關，但關係最直接的是獲取戰爭的勝利和保衛國家的安全。有戰爭就勢必有傷亡，統治者爲了鞏固軍隊、穩定社會，無一不把做好軍人及其家屬的優待撫恤工作視爲一項重要政策，以此換取士兵效命疆場。迄至戰國，優待撫恤思想和優撫措施日益豐富起來，各諸侯國普遍廢除了世卿世祿制，代之以軍功賜爵制。無功不賞，“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②，已成爲各諸侯國政治生活中的一般準則。在軍功爵制下，國家優撫的範圍是所有將士，並不僅僅是貴族和將領。西漢的優撫措施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出土漢簡中的資料大大豐富了西漢軍人優撫措施的內容。以往對此很少關注，有必要進行專題探討。

① 該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成果，項目編號：06JA770012。

② 《史記》卷七九《范雎列傳》。

一、包含在軍功賜爵中的優撫措施

與現代社會系統和完善的優撫制度不同，西漢政府的優撫措施有相當多的內容包含在軍功賜爵制度中。^①根據《商君書·境内》等文獻的記載，秦時受爵與佔有土地、住宅、役使庶子（無爵的平民）等實際利益緊密相連。在重視軍功和沒有軍功不能封侯上，秦漢制度是相同的。漢初，沿用秦二十級爵制，有不少功臣得到封侯的獎賞，並獲賜食邑。如曹參被封為平陽侯，食邑 10630 戶；^②樊噲封舞陽侯，食邑 5400 戶；^③周勃封為絳侯，食邑 8180 戶。^④西漢建立後，漢高祖劉邦接連頒佈了“以有功勞行田宅”和“復從軍吏卒”兩道詔令，精減軍隊，組織軍隊大量復員，這是漢初恢復經濟的重要措施之一。西漢政府賜給復員的軍吏卒爵位，按爵位賜予不同數量的田宅，有七大夫（第七級爵）以上爵位的人都可以食邑，收取若干戶租稅；^⑤七大夫以下者，免除本人及全家的賦稅、徭役。呂后執政時，發佈賜爵詔令，取消了祇以軍功賜爵的限制，把“賜民爵”和“賜吏爵”分開。文、景時期，由於大規模的戰爭較少，軍功賜爵不如以前突出，主要實行賜民爵的制度。漢武帝為鼓勵將士與匈奴奮勇作戰，又把軍功賜爵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規定：為重賞軍功，特設武功爵。將士因功獲爵後，給以“厚賞”，可以免役、封侯、做官，也可轉賣爵位，“諸禁網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但推行不久即自行取消，因此後人對武功爵的級數也不甚清楚。

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西漢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漢簡，詳細記載了西漢軍功賜爵的律文^⑥，補充了文獻記載的不足：

斬捕首虜二級，拜爵各一級；斬捕五級，拜爵（068、375）各二級；斬捕八級，拜爵各三級；不滿數，賜錢級千。斬首捕虜，毋過人三級，拜爵皆毋過五大夫，必頗有主以驗不從法狀。（356、243、340）

上述簡文的內容有這樣三點：一、明確規定了賜爵一級至三級的斬捕數量。二、對賜爵的級數和等級作出限制。孫家寨殘簡中多次提到：“爵毋過五大夫（第九級爵）”（373）、“斬首捕虜，毋過人三級，拜爵皆毋過五大夫”（356、242、340），“捕虜拜爵滿五大夫，

① 現代軍人由於享有薪金、醫療、優撫等待遇，立功者獲得的獎賞遠沒有古代豐厚。

② 《史記》卷五三《蕭相國世家》。

③ 《漢書》卷四一《樊噲傳》。

④ 《史記》卷五七《絳侯世家》。

⑤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注引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

⑥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大通上孫家寨漢簡整理小組：《大通上孫家寨漢簡釋文》，《文物》1981年第2期。

欲先罷者，許之”（342）。另外，還有一條提到“爵毋過左庶長（第十級爵）”。顯然，漢代在實行二十等爵制時，是有嚴格的等級界限的。《漢書·高帝紀》高帝五年詔規定：“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孫家寨漢簡與文獻記載不同，可能是後來又做了修改。不過，吏民所獲爵位一般不能超過高爵的原則並沒有變，但超過的級數可以轉讓給兒子和兄弟，也算是惠及家人吧。^①爵分高低，體現了漢代社會鮮明的等級性特徵。三、考核軍功時，有專人負責核查，嚴格按照軍功爵制辦事，以杜絕弄虛作假，違法冒功。

孫家寨漢簡還有這樣兩點規定：一、按斬捕對象的級別賜爵。“能斬捕君長有邑人者，及比二千石以上，賜爵各四級；其毋邑人，及吏皆千石以下至六百石，賜。”^②說明賜爵標準不僅按斬捕的數量，還要看斬捕對象的身份，被斬捕者級別高，就重賞，級別低，則輕賞。二、集體斬捕者集體賜爵。如漢簡規定，“虜什二人以上，拜爵各一級；不滿”^③，這是獎賞集體俘虜敵人的條文，意思是如果活捉敵人十二個以上，則“拜爵各一級”，即每人賜爵一級，“不滿”，就不賜爵，可能是賜錢。

此外，西漢“論功拜爵”時，還有斬捕首虜級數的折算規定。在殘簡中，有這樣一條材料：

二級當一級；以爲五大夫者，三級當一級。首虜不滿數者，藉須復戰。軍罷而不滿數，賜錢級。（359、349）

這條木簡上下殘缺。但其中提到：“二級當一級；以爲五大夫者，三級當一級。”所謂“二級當一級”和“三級當一級”，從上下文意來看，是指斬捕首虜級數的折算規定，即在一定情況下，爵位等級不同的，斬捕首虜的數目有不同的折算規定，如五大夫這一等級，斬捕首虜三級算作一級。如果沒有達到上述規定的數字，則“藉須復戰”，即等到下一次作戰時達到規定數目爲止；如果到整個戰爭結束，還沒有達到規定者，則祇能賜錢若干，而不能拜爵。

上述簡文說明，西漢軍功授爵是不區分軍官與士卒的，祇要斬首捕虜，都可以論功拜爵。也就是說，西漢的優撫措施面向全體將士。雖然有“二級當一級”和“三級當一級”等限制一般士卒獲得高爵的規定，但士卒畢竟可以通過軍功而獲得爵位。低爵同樣可以表示政治上的榮譽及地位，可以充當小吏，獲得“復及身及戶”、減刑、“乞庶子”等待遇。孫家寨漢簡出土於西漢晚期墓中，但墓中漢簡記載的軍功賜爵制度與文獻所述西漢前期軍功賜爵的精神相符，後來又在此基礎上做了修改增補。隨著獲爵者待遇的變化，對軍人及

①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劉劭《爵制》云：“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賞與子若同產。”

②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大通上孫家寨漢簡整理小組：《大通上孫家寨漢簡釋文》，《文物》1981年第2期，22頁。

③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大通上孫家寨漢簡整理小組：《大通上孫家寨漢簡釋文》，《文物》1981年第2期，22頁。

其家屬的優撫也相應變化。

二、禮葬死亡將士，撫恤家屬

西漢優撫政策規定：對死亡將士要以禮安葬，葬具由軍隊和地方政府提供。漢王四年（前203）八月，劉邦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①目的是顯示對士兵的關愛，使“四方歸心”。八年十一月，劉邦針對在平叛戰爭中陣亡將士的安葬問題，又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槨（小棺材），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②這兩條詔令成為漢代的法律條文，《漢書·高帝紀下》臣瓚注：“初以槨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又引《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槨，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由漢高祖親手制定的這項政策，終漢之世一直在貫徹執行。此舉是漢代獎勵耕戰、優撫軍人政策的重要內容，對戰死的將士，不是棄之山野，而是由政府提供葬具安葬，並用驛站的車馬將屍體送回死者家鄉。禮葬死人的目的是為了激勵活人，鼓勵活著的將士更加英勇殺敵，使死者的家屬得到安慰，以獲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這一制度漢代以後多沿例不改。

大量漢簡文表明，各級屯戍組織對吏卒的死亡都非常關注。正常的因病死亡，要及時上報病死爰書。^③對於暴病死亡、因意外傷害而突然死亡者，要上報具體的驗屍報告。^④吏卒死亡後，區別情況給予適當的安置。如果是陣亡，除了安葬死者，還要撫恤其家屬，錄用死者後嗣一人為吏，賜給奴婢。如下簡：

各持下吏為羌人所殺者賜葬錢三萬其印綬吏五萬又上子一人名尚書卒長

奴婢二千賜傷者各半之皆以郡見錢給長吏臨致以安百姓也早取以見錢 267·19

死者應當不是一般士兵。一般士兵家屬的安排不會有如此優厚的待遇，大概一如上引漢王四年、八年劉邦兩次詔令的規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說：“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那些羽林孤兒大概也不是普通戰士的子孫。這

① 《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

②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③ 謝桂華、李均明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言之謹移成卒病死爰書（198.9）。”（文物出版社，1987，310頁）《居延新簡》：“始建國天鳳二年二月戊辰朔戊寅第十泰候長良敢言之謹移成卒病死爰書旁行衣物券如牒敢言之”（48：13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文物出版社，1990，140—141頁）

④ 《居延新簡》：“□□內郡蔭邑焦里田亥告曰所與同郡縣□□□死亭東內中東首正偃胃冥口吟兩手捲足展衣□□□當時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實疾死審皆證□。”（58：46，352頁）“□□實士吏強兼行候事敢言之爰書成卒潁川郡長社臨利里樂德同縣安平里家橫告曰所為官牧囊他□戊夜僵卧草中以□行謹案德橫口到囊他尉辟推謹毋刀刃木索迹德橫皆證所言它如爰書敢。”（57：85，343頁）

也是一種撫恤陣亡將士家屬的方法，就是培養其後代成為特定的職業人群，以保障其生活。還有“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長從如此”^①，期門是一種類似於羽林孤兒的士兵，當屬於同一撫恤範疇。

如果是因病正常死亡，則按照規定清理死者遺物，買棺材裝殮，并書刻死者籍貫、姓名，妥善處理後事。如下簡（未注出處者，均見居延漢簡）：

1. 壽王敢言之戌卒巨鹿郡廣阿臨利里潘甲疾溫不幸死謹與
 2. 櫬橫參繫堅約刻書名縣爵里櫬敦參辦券書其衣器所以收
 3. 竟寧元年戌卒病死衣物名籍
 4. 戌卒魏郡內黃東郭里詹奴
 5. 出物故
 6. 三石具弩一完 囊矢銅鏃五十完
 7. 幡一蘭莞 各一負索一完 ●凡大小五十五物
 8. 五鳳二年一月壬子朔丙子
 9. 甲渠候官五鳳四年戌卒病不幸死用櫬橫帛象致
 10. 戌卒鱣得安國里毋封建國病
 11. 官襲一領 錢二百卅
 12. 官袴一兩 絲一兩 錢二百四十……
- 7·31
 49·17, 217·26
 418·2
 267·4
 287·24

戍邊將士享有料理親屬喪事的喪假。有人稱這種做法是古典人道主義精神的關懷，其實這也是對軍人優撫的一種表現。基層戍吏在戍守期間，如果家中親屬病逝，可以按照軍令回家奔喪，謂之“取寧”。簡 160·16 說：“□甲渠候長願以令取寧即日遣書到日盡遣如律令。”該簡中“以令取寧”、“盡遣如律令”說明西漢戍邊軍隊中有關於“取寧”一類的法令存在。所以，有親屬去世，戍卒都可以請假回家料理喪事。

- 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己卯甲渠士吏彊以私印行候事敢言之候長鄭赦父望之不幸死
癸巳予赦寧敢言之 57·1A
- 第廿一燧尊母不幸死詣官取急三月癸巳食時入 264·10
- 第卅八燧長蒲母死旨官寧三月□ 59·39
- 第廿七燧長宣妻不幸死詣官取急…… E.P.T48: 138²
- 重追木中燧長徐忠同產姊不幸死寧日盡移居延一事一封正月丙戌尉史忠封
E.P.F 50: 9
- ……燧長周育子病死取急歸…… E.P.T 22: 492
- 第卅六燧成父不幸死當以月廿二日葬詣官取急四月乙卯蚤食入 52·57

① 《文獻通考》卷一五〇《兵考二·兵制》注云：“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

②“EPT”指《居延新簡》“破城子探方”出土的漢簡。後面的數字爲探方號和簡號。後文同，不注。

燧長，西漢邊防部隊負責用烽燧示警的基層軍官。燧長的父母不幸去世，向上級長官請假回家料理喪事，假期不長，必須按上級規定的時間回到原屯戍地服役。如果按照周朝喪制，為父親服喪當服斬衰三年，為母親服喪則有兩種情況：父在，服疏衰期；父卒，服疏衰三年。上引居延漢簡告訴我們：在邊防部隊服役的基層長官，不得依周制為父母服喪。以簡52·57而言，其父當以月廿二日葬，但是軍隊長官指令這位燧長“四月乙卯蚤食入”，葬後服喪時間充其量在三個月左右。法令規定了具體的奔喪時限，但從現有的漢簡中還無法考知準確的合法天數。據上述取寧簡，戍卒的父、母、妻、子、同胞姊妹等親屬亡故都可以請喪假，從中我們看到了漢代社會對人間親情的重視，反映出對戍邊軍人的關懷。

三、優待戍邊吏卒家屬

漢代邊郡居民的兵役與內地郡國有所不同。邊郡居民服兵役，其主要職責就是在本地接受軍事訓練，戍守本郡邊境。漢代邊郡居民大多來自內地，專以屯田戍邊為職；居延地區的戍卒，大多來自中原地區。據統計，在居延漢簡中，載有籍貫的戍卒共計210餘人，其中祇有20人屬本郡——張掖郡，還不到總數的10%。其餘全部來自中原各郡國，大河、淮陽、魏郡居多，也有些人來自昌邑、趙國、梁國等封國。其中以“謫”及“贖罪”之類性質者為多，故兵役比內地郡國繁重。^①

居延漢簡所載邊戍卒在服兵役之前，基本上都是農民。屯戍吏卒的生活實行供給制。戍卒和戍吏在糧食品種和數量的供應上大致相同，差別很小。晁錯建議募民實邊，“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②。漢政府發給戍卒的衣服，大約也是冬夏衣都有。

戍卒帶家屬戍邊，吃住由國家負擔。漢代屯戍制度允許戍卒帶家屬戍邊，國家發給口糧和食鹽等基本的生活資料，給予家屬充足的生活保障，使戍卒在戍邊期間也能享受到天倫之樂，體現了對軍人家屬的優待。

關於卒家屬居署期間的糧食供應，簡文很多：

武成燧卒孫青肩 妻大女妣年卅四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女于年十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女足年六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五石 203·7
俱起燧卒王並 妻大女嚴年十七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毋知上二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三石三斗三升少 203·13

① 秦簡《秦律雜抄》，處以“謫”罰者，常要服一年以上的戍役，甚至有“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所”（《封診式·遷子》）的處罰。

② 《漢書》卷四九《晁錯傳》。

第廿三燧卒王音 妻大女食年廿 居署卅日用穀二石一斗 203·16

□李護宗 妻大女女足年廿九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男望年七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四石三斗三升少 203·19

□妻大女君至年廿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弟大女侍年廿三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使男相年十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203·32

止北燧卒王誼●妻大女君憲年廿四●子未使女女足年五歲●子小男益有年一歲皆居署廿九日用穀四石少 七月乙卯妻取 E.P.T 65: 119

制虜燧卒周賢 妻大女止氏年廿六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女捐之年八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使男並年七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六石 27·4

制虜燧卒張孝 妻大女弟年卅四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解事年六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三石三斗三升少 55·25

執胡燧卒富鳳 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女始年七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寄年三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凡用穀五石 161·1

上引漢簡簡文表明，根據戍卒家屬的年齡和性別，糧食供應分成不同的等次標準：

男性年齡	女性年齡	月供糧食
大男（十五歲以上）		三石
使男（七至十四歲）	大女（十五歲以上）	二石一斗六升大
未使男（六歲以下）	使女（七至十四歲）	一石六斗六升大
	未使女（六歲以下）	一石一斗六升大

大女和子使男至未使女月供糧食的數量依次相差五斗。未滿兩歲的嬰兒，則給一斗。但實際上發給戍卒全家的糧食，往往扣掉零頭，祇給一個整數。戍卒家屬的糧食供應標準，當然不反映他們每個人的實際吃糧數，這是屯戍組織規定的廩給標準。如果由於一些具體原因，戍卒沒有享受到這個待遇，可以向上級組織申訴，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下簡：

尉史臨白故第五燧卒司馬誼自言除沙殄北未得去年九月家屬食誼言部以移籍廩令史田忠不肯與誼食 89·2

第五燧卒司馬誼由於被抽調到殄北省作，沒有在自己的烽燧上，錯過了領取家屬口糧的時間，沒有領到上年九月家屬的糧食，向上級組織提出補發的要求。這枚簡說明，戍卒有權依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也就是說，卒家屬居署期間的生活問題，是受到法律保護的。

看來，屯戍組織對卒家屬居署期間的糧食供應，是基本充足的。

漢簡所載官府對邊塞吏卒及其家屬所供應的食鹽，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漢書·趙充國傳》載，趙充國為屯田事上書漢宣帝，談到其部下“萬二百八十一人”，每月需要“用鹽三百八斛”，每人食鹽 2.99 升，與漢簡所載三升相差無幾。

根據李振宏的研究，漢代政府對戍卒隨軍家屬的身份沒有嚴格限制，不像近代以來，在隨軍家屬的認定上，只承認直系親屬，如配偶、子女、父母等。^①漢代的卒家屬居署簡，涉及到的家屬成分廣泛，如下簡：

第四燧卒虞護 妻大女胥年十五 弟使女自如年十二 子未使女真省年五 見署用穀四石八斗一升少 194·20

第五燧卒徐誼 妻大女眇年卅五 子使女待年九 子未使男有年三 見署用穀五石三斗一升少 203·3

第六燧卒寧蓋邑 父大男偃年五十二 母大女請卿年卅九 妻大女女足年廿一

●見署用穀七石一斗八升大 203·12

俱起燧卒丁仁 母大女存年六十七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弟大女惡女年十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弟使女肩年十三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凡用穀六石 254·11

永光四年正月己酉棄佗吞胡燧長張彭祖符 妻大女昭武萬歲里□□年卅二

子大男輔年十九歲 子小男廣宗年十二歲 子小女女足年九歲 輔妻南來年十五

歲 皆黑色 29·2

□弟大男誼年廿二 弟大男政年十八 弟大男譚年十六 ●居署盡晦九石母威君取 E.P.T 40: 23

這些簡中，戍卒的家屬有父母、妻子、孩子、兄弟、姊妹，甚至還有兒媳婦（簡 29·2）。簡 254·11 中的戍卒，把六十七歲的老母親帶到了署上，簡 203·12 中的戍卒和父母妻子在一起生活。可以說，他們在戍守期間充分享受到了天倫之樂。特別是簡 40: 23 中的戍卒，他的三個弟弟都是大男，分別是二十二、十八、十六歲，正當青年有為時期，卻呆在署上，靠跟著哥哥，依靠國家的供應生活。國家對戍卒的關心和照顧，可以說是達到了相當的程度，體現了政府對軍人家屬的優待。

戍卒家屬的食糧由官府供應，有勞動能力的家屬不可能長期不勞而食，官府也可能組織成年戍卒家屬進行屯田或其它雜務勞作。對戍卒家屬進行管理的簡文，如：□卒家屬在署名籍（185·13），●右卒家屬見署名籍□□（194·3），●第廿三部建平三年七月家屬妻

① 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中華書局，2003，144—148 頁。

子居署省名籍（E. P. T40: 18）。

居延簡中還有婦女屯田的一些殘文，如：□□勝之夫妻當田之（38. 28），□孝婦苦田禾□□（478・30）。

男耕女織是中國傳統的性別分工，為居延屯戍軍隊縫補衣服也應是隨軍女性家屬從事的一項勞作。我們也可以從一些斷簡中窺見其端倪。如：□妻治裘□□（552・2A）。

綜上所述，西漢的優撫措施建立在軍功爵制基礎上，面向全體官兵，在論功行賞的原則下，對現役軍人及其家屬的優撫主要包括在給立功將士的賞賜中。軍功爵制有著嚴格的等級界限，士卒雖然可以通過軍功而獲得爵位，但很難獲得高爵。優撫措施自然也體現出顯著的等級差別，官兵不平等。論功行賞帶給軍人及其家屬的好處有：一、做官；二、獲爵。有爵者可以增加田宅，役使庶子，免除賦稅徭役等。陣亡將士由政府提供葬具安葬，將屍體送回死者家鄉；還撫恤其家屬，如錄用陣亡軍官的後嗣一人為吏，賜給奴婢等。戍邊將士享有料理親屬喪事的喪假。對戍邊軍人家屬的優待主要表現為：允許戍卒帶家屬戍邊，戍卒隨軍家屬的身份比現代的規定寬，不局限於父母、配偶和子女，國家發給隨軍家屬口糧和食鹽等基本的生活資料，給予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漢優待撫恤軍人及其家屬成為統治者治國治兵的一條常規，深入人心。與現代優撫相比，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比之先秦已有相當的發展，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於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漢代簡牘中的告地策資料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汪桂海

內容提要 出土漢代簡牘中有不少民間文書，是真實反映漢代社會生活的珍貴資料。本文專門就其中的冥間文書“告地策”作了系統的分析，具體分為移送隨葬物品的文書、通行證明文書、作為戶籍登記憑證的文書、祈禱求福文書等幾種類別。

關鍵詞 簡牘 文書 告地策

漢代人認為，人去世之後，其靈魂將轉到地下的世界。出土鎮墓文裏就有“生人上就陽，死人下歸陰”，或“[生人有]里，死人有鄉”之類的話。地下世界的社會結構與人世間完全相同，也設有郡守、縣令、游徼、亭長等各類大小官吏來管理一切事務。^①死人在地下的遭遇也與人世間類似。例如，漢代官府隨時掌握每個家庭的戶口、財產情況，人死後轉入地下世界，也要給地下官吏類似的報告文書，聲明死者的身份、財產。漢朝平民離開所居住鄉里，遷往他地，或去其它地方經商，通常需要從鄉里開具證明，到縣廷領取通行證之類的文書。他們認為，人去世後，前往死人所在的世界，也需要這樣的證明文書，否則就難以順利到達。這些文書的格式、用語與當時官府行政文書的基本格式和一般用語相同。

① 參見吳榮曾《鎮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巫婆關係》，收入《先秦兩漢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

學術界通常稱這種發給地下官吏的文書爲告地策。迄今爲止，告地策在漢墓中先後已出土過數件。按照內容，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種情況：

1. 移送隨葬物品的文書。例如，長沙馬王堆 3 號漢墓除出土四百餘枚竹簡遺冊外，還出土一枚木牘，釋文如下：

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家丞奮移主贊（藏）郎中：移贊（藏）物一編，書到，無選（撰）具素主贊（藏）君。^①

該墓的主人爲長沙丞相軼侯利倉之子。此木牘應是附屬於遺冊的一件文書，是以軼侯家丞的名義向主藏郎中發送的文書。文書告知主藏郎中，隨同軼侯的財產的清單已經送到，要求接收。“十二年”指文帝初元十二年，是該墓埋葬的時間。^②在當時人的意識裏，一個人死後，在地下的世界裏仍擁有與人世間完全相同的待遇，貴族仍擁有許多爲之服務的家吏和奴婢。因此，主藏郎中應是地下專門負責軼侯家產的小吏。

湖北江陵鳳凰山 10 號漢墓出土的一枚木牘，則將遺冊與移送遺冊的文書書寫在一起：

竹筭二	尺卑=一具	案一	脯二束
望筭一	會卑=一具	布囊食一	豚一
函一	食檢一具	縑囊米二	柯一具
大奴一人	橫一具	布帷一長丈四二福	赤杯三具
大婢二人	小於一具	瓦器凡十三物	黑杯五
□□卑=一具			

（以上爲正面）

酒□二斗一

四年後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偃偃[敢告]

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器物□令

□以律令從事。

（以上爲背面）

《散見簡牘合輯》66—67 頁，第 803 簡

據考證，牘文中的“四年後九月”，應是景帝四年後九月，知此木牘的年代屬於景帝時期。^③墓主名偃偃，當即同墓所出另一木牘所記載的“西鄉偃”。西鄉偃應指西鄉有秩偃

①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年第 7 期。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429 頁。

③ 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 年第 7 期。

或西鄉嗇夫偃之簡稱。偃的隨葬器物陪同偃轉入冥間時，需要有一件通知地下負責官吏的文書，這說明漢人的觀念認為，陰世間也設有負責管理個人財產的小吏。

漢代鄉官在地方上的權力很大。《續漢書·百官志》記載，漢於每個鄉皆設置有秩（或嗇夫）、三老、遊徼。其中有秩秩百石，由郡府署任，治大鄉。嗇夫由縣署任，治小鄉。有秩或嗇夫，“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全鄉民眾的賦稅徵收、徭役徵發，皆掌於其手，直接左右著普通民眾的生活與命運。墓主偃身為鄉吏，這種權力帶來的優勢在此木牘文書裏也有所體現，在向地下官吏移送偃的隨葬品清單時，文書直接以偃自己的口吻，而不是以其它官吏的語氣來表述。

2. 通行證明文書。武威磨咀子 15 號墓出土一件書寫文字的織品，釋文如下：

姑臧北鄉西夜里女

子□寧死下世，當歸塚次，

□□□□水社毋□河（苛）留

□□[有天]帝教如律令。

《武威漢簡》149 頁

此件告地下文書有“毋□苛留”之類的話語，即不要阻撓留難之意。表明此類告地下文書應屬於前往地下世界的墓主手持的證明文書。這是模仿當時人們出行時必須攜帶的證明文書而製作的，反映了漢代人的心目中關於人間與地下的關係狀況完全是人世間在不同地區之間來往的概念，死人到地下需要有出行證明，否則行途就會受阻。

甘肅武威五壩山 3 號漢墓出土一枚木牘，也是告地策：

張掖西鄉定武里田升寧，今過黃，過所毋留難也。故為□□□。

今升寧自小婦得綏，取升寧衣履燒祠，皆得

□過也。今升寧田地皆當歸得孫趙季平所可。

□升寧田地皆當歸得孫任□。今升寧田地皆當歸得

田地皆當歸得孫任胡開口，願皆自得綏禁之

（以上為正面）

物，復以得孫任胡亟語言□□□□□

在張昊天知曲直，故為信。

（以上為背面）

《散見簡牘合輯》25 頁，第 244 簡

黃即黃泉。黃泉本指地下的泉水，以其為地下深處，故也指葬身之地。《左傳》隱公元

年：“置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此處則指地下的死人世界。
“今過黃，過所毋留難”者，謂死者田升寧奔赴黃泉，沿途不要阻撓留難。

牘文云取死者的衣履燒祠，反映的是一種喪葬祭祀習俗。《後漢書·烏桓傳》記載，烏桓“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並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以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魏書·高允傳》：“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焚燒死者生前用過的衣物，為之送葬，在祭祀時，也將祭品焚燒掉，這是古代早期北方民族的習俗。武威漢墓木牘記載的燒祠習俗有可能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

該牘文表明，墓主田升寧死後，其田地分別轉歸孫趙季平、孫任口、孫任胡等人名下，告地策特意書寫明白，蓋意在聲明，死者生前的田地不得隨同死者的靈魂帶走，並聲稱“天知曲直，故為信”。讓天作證，這與一般的契約文書中找其它人作證人不同，是冥間文書的鮮明特點。

3. 作為戶籍登記憑證的文書。江蘇邗江胡場 5 號漢墓出土一件文書：

卅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廣陵宮司空長前丞口敬告

土主：廣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有獄事。事已，復故郡鄉

里，遣自致，移指穴。卅八年獄計，[承]書從事，如律令。

《散見簡牘合輯》102 頁，第 1060—1061 簡

該簡文有“卅七年”、“廣陵”等字樣，據考證，指廣陵王劉胥四十七年，劉胥乃漢武帝之子，元狩六年（前 117）封廣陵王，在位六十四年。宣帝五鳳四年，劉胥因罪自殺，諡厲王。廣陵王劉胥四十七年，即宣帝本始三年（前 71）。查陳垣《廿二史劄記》，此年十二月丙子朔，與簡文相合。^①

根據文書，墓主王奉世似乎是犯過刑律的人，此文書的用意是為了證明王奉世的獄事已經了結，取消刑徒身份，恢復為編戶齊民。現在是以編戶齊民的身份前往地下世界的，要求地下官吏按照編戶齊民來為王奉世登記戶籍。

江陵鳳凰山 168 號漢墓出土一枚竹牘，釋文如下：

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陽五

① 揚州博物館、邗江縣圖書館：《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文物》1981 年第 11 期。

大夫隧少言與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輜車
二乘、牛車一兩、駟馬四匹、驃馬二匹、騎馬四匹，
可，令吏以從事。敢告主

《散見簡牘合輯》77頁，第927簡

此墓葬的時代為西漢文帝時期，牘文之“十三年”應係文帝十三年。江陵為縣名，南郡郡治。市陽為里名，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木牘中，有多處提到市陽里，應是江陵縣某鄉的一個里。隧少言為人名，應是墓主。“敢告主”之“主”應指地下丞。此文書是以江陵縣丞的名義向地下的縣丞發出的，說市陽里五大夫隧少言及其奴婢、車馬各若干，一同到地下報到，告知地下丞如數登記。

湖北江陵高臺西漢墓出土過三枚木牘，也屬於向地下移報死者戶籍的文書及相關資料。其中第一枚木牘（編號甲）為該文書的封檢。第二枚木牘（編號丙）為江陵丞移安都丞的文書正文。第三枚木牘（編號乙）為文書正文之附件。其中第二、三枚木牘釋文如下：

木牘二：

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鄉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與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謁告安都，受[名]數，書到，為報，敢言之。

十月庚子，江陵龍氏丞敢移安都丞。亭手。

（以上為正面）

戶手。（以上為背面）

木牘三：

新安戶人大女燕，關內侯寡

大奴甲

大奴乙

大婢妨

家優不算、不黥^①

①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高臺18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8期；黃盛璋：《江陵高臺漢墓新出“告地策”、遣策與相關制度發復》，《江漢考古》1994年第2期；張俊民：《江陵高臺18號墓木牘釋文淺釋析》，《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木牘中的“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學者以為即文帝七年（前173）。^①查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文帝七年十月丙子朔，與此木牘的月朔正相合。大女燕，為某關內侯之妻或妾，應即墓主。中鄉應是燕戶籍所在鄉。江陵為南郡治所，此處借指南郡。龍氏當為南郡之縣名，史書不載。安都似是大女燕的故里，亦當為縣名。《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唐張守節《正義》云：“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唐之瀛州高陽縣即漢之涿郡高陽縣。牘文云安都，當為漢初之名，其曰高陽，應是後來所改。

古人客死異鄉魂歸故里，這是古代社會長期流行的風俗。燕死葬於江陵，而欲與其奴婢等移名數于安都，蓋亦此意。漢代，任何編戶齊民欲遷移戶口，需先持有本鄉有秩或嗇夫出具的證明，到縣廷領取正式的證明文書，持此文書即可辦理。此木牘文書正是該項制度的反映。木牘三羅列了大女燕以及她的奴婢的名字，當是木牘二之後附件，是交給安都縣丞為燕辦理戶籍登記的具體資料。^②

4. 祈禱求福文書。江蘇盱眙東陽西漢末期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枚墨書木札，上書寫三行文字：

王父母范當以錢自塞禱
園山高陵里吳王會稽鹽官諸鬼神
亦使至禱^③

牘文中“王父母”為祖靈的泛稱。“塞禱”即祈禱、祈願。“園山高陵里”則指墓地，或具體指某基地名。“至禱”表示深切地祈禱。此墨書木牘反映的是死者家屬向天上、地下諸神靈祈禱，求其佑助死者。

江蘇邗江胡場5號漢墓出土一枚木牘，上面書寫了許多神靈的名字，分作五欄：

① 張俊民：《江陵高臺18號墓木牘釋文淺釋》，《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② 關於此件文書的性質，黃盛璋、張俊民等文中都主張為冥間文書。李學勤先生的意見與此不同，他將此文書與湖南龍山里耶秦簡文書加以比較，二者格式相同，認為應是“一件實用的文書的副本”。（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筆者認為，學界此前對該文書的認識還是正確的。若此文書乃實用文書的副本，則墓主的戶口應當已經遷移至安都，其墓葬似乎不應在江陵。該文書為實用文書副本的可能性不大。

③ 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考古》1975年第5期。

江君 倉天
上蒲神君 天公
高郵君大王
滿君
盧相汜君
中外王父母
神魂

(以上为第一栏)

大翁
趙長夫所□
淮河
埡君
石里神杜(社)
城陽□君
(以上为第二栏)

石里里主
宮春姬所□君□
大王 宮中□池
吳王 □□神杜
(社)
□王
汜□神王
太后垂
(以上为第三栏)

當路君
荆主
奚丘君
水上
□君王
□杜(杜)
(以上为第四栏)

宮司空
杜(社)
□邑
塞
(以上为第五栏)

《散見簡牘合輯》100—101 頁，第 1058 號木牘

在這些神靈中，有的應是當時各地民眾所共同崇拜的神靈，如“倉天”、“天公”等，屬於天神；有的明顯帶有地方特點，如“江君”、“高郵君大王”、“淮河”、“石里神杜(社)”、“石里里主”、“大王”、“吳王”、“當路君”、“荆主”、“奚丘君”等，分別屬於自然神靈、里社的社神、地方神靈等；有的則應屬於死者的祖先神靈，如“中外王父母”、“神魂”等。死者的親人通過抄寫、呼稱他們所能知道的天、地兩界所有神靈的名位，來實現為墓主祈禱冥福的目的。這種祈禱文書發展到東漢時，演變成為書寫在鎮墓瓶上的鎮墓文。

長沙出土的簡牘及相關考察

長沙簡牘博物館 宋少華

內容提要 本文對 20 世紀 50 年代至本世紀初長沙出土簡牘的歷史、狀況、內容進行了簡要梳理與歸納，將長沙發現簡牘的歷史劃分為兩個階段，認為每個歷史階段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文章介紹了長沙簡牘的九次發現及簡牘所反映的主要內容。文章從長沙的自然地理環境、簡牘的保存條件、出土時代背景、形制特徵、年代序列、內容特點、埋藏方式等七個方面對長沙出土簡牘進行考察，得出初步的考察結論。

關鍵詞 長沙 簡牘 考察 特徵

一、考察說明

長沙是我國出土簡牘最多的城市，自 20 世紀 50 年代至本世紀初，見諸報導的發現達九次之多，數量從幾十枚到十余萬枚不等，出土數量之多迄今居全國之首。年代跨度上抵先秦下迄三國，幾乎涵蓋了我國簡牘流傳與使用的主要時期。出土簡牘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的方面非常廣泛。縱觀長沙出土簡牘的歷史，可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 世紀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中期。這一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建設時期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簡牘均出自城市郊區、農村的古代墓葬之中，皆因配合城鄉基本建設與特殊時代的軍事戰備工程而發現。

第二階段：20 世紀 70 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特別是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這一時期是我

國實行對外開放，實施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城市改造擴建時期，簡牘出土除墓葬之外，多見於城市的中心地段，那些因高層建築須深挖基礎方可見到的古代遺址之中。

今所見長沙出土簡牘大部分為簡牘行政文書，一小部分為喪禮專用的遺策，並包括少量的古佚書。出土於墓葬中的簡牘大部分為遺策文書，另有一小部分可視為古籍；出土於遺址中的簡牘則大都為行政文書與私人文書。本文對第一階段所出簡牘作簡要的敘述與歸納，對第二階段新出土簡牘，因大部分尚在整理之中，故根據已整理發表的狀況，擇要予以介紹。對長沙出土簡牘的一些特點進行了相關考察。

二、長沙 20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簡牘出土的情況

（一）1951—1952 年長沙出土楚漢簡牘

1951 年 10 月—1952 年 2 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配合長沙城郊建設工程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發掘的一百四十五座楚漢墓葬中，五里牌四〇六號墓發掘一組楚簡，徐家灣四〇一號墓發現一枚木牘，伍家嶺二〇三號墓發現十枚封檢。

1. 五里牌四〇六號楚墓，年代屬戰國中期（前 4 世紀）。墓壙呈長方形，口大底小，口長 5、寬 4.2、底長 48、寬 3.75、深 7.5 米。葬具係二槨二棺，內槨置棺，內槨與外槨之間的空隙為邊箱，用以放置隨葬物品。竹簡發現於北槨箱內偏西處，該墓 40 年代曾被盜擾，竹簡擺放的位置是根據當年盜掘者的口述。竹簡保存情況較差，出土時呈黑褐色，全部殘斷，計三十八枚。竹簡殘長 2—13.2 釐米，寬約 0.7 釐米，簡文書寫在竹黃面，每簡殘存一至六字不等。經中山大學楚簡整理小組拼綴，復原十八枚，內容屬隨葬物品的遺冊，所記物品重要有鼎、勺、杯、車、戈、弩、弓等，這批遺冊的特點是在竹簡的上半段記錄器物的名稱、數目，下半段記錄器物所在的位置。^{①②}

2. 徐家灣四〇一號墓，年代屬西漢晚期（前 1 世紀）。墓室分前後兩室，前室屬外藏，長 8.0、寬 13.7 米，分東西二室；後室屬正藏，長 12.34、寬 11.1 米。外藏主葬禮器及日用品。正藏主葬墓主棺槨，在棺室部位發現銀印一枚，上鑄“劉驕”二字。有專家推測該墓主“劉驕”係王族。外藏東室獲簽牌一枚，長 11.8、寬 3.1、厚 0.3—0.5 釐米，上書“被綈函”三字^③。有的學者釋為“被袴函”或“被綈（綯）函”^④。

①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7，54—57 頁，圖四九、五〇，圖版貳三。

②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72—175 頁。該書較全面地收集了 1951—2002 年五十年內長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蘇、安徽及周邊的河南等地簡牘出土、收藏情況及相關的研究成果，其中楚簡十九處，秦簡十處，漢簡二十八處，三國兩晉簡牘七處，唐代一處，南唐一處。在歸納性的章節中闡述了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

③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7，124 頁，圖版捌伍·二。

④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451 頁。

3. 伍家嶺二〇三號墓，年代亦屬西漢晚期。墓室全長 10.9 米，分為前、中、後三室。該墓經盜掘，後室器物所剩無幾，中室剩餘甚豐，前室保存情形最好。封泥匣編號為 203:201，出自前室，共計十枚。平面長方形，正面有一方形凹槽，用以嵌繩附泥，書字一面傾斜。其一枚墨書“魚鮓一斛”四字，長 5.8、寬 2.05、厚 1.35、凹缺長 2.5、深 0.93 釐米。出土時封泥匣附近有十個帶木蓋的印紋硬陶罐，推測係懸結於罐上，匣上所書文字，當係標明罐內所盛之物^①。

(二) 1953 年仰天湖二五號墓楚簡

仰天湖二五號墓，年代屬戰國晚期（前 4 世紀末），已被盜。長方形墓室，上大下小，上口長 4.48—4.75、寬 3.23、底長 4.40—4.58，寬 3.16—3.46、深 3.98 米。葬具係二槨二棺，內槨與外槨之間空隙，形成南、北、西三個邊箱。竹簡位於北邊箱內。經清理共得簡四十二枚。其中完整者十九枚，長 20.2—21.6、寬 0.9—1.1、厚 0.12 釐米。字大而清晰，書寫在竹黃上，簡中部的右側削有兩個契口，兩者相距 8—9 釐米，以編連成冊。每簡字數二至二十一不等，基本上一簡紀一事。這批簡冊有一特點，在簡文的末尾，常注有“已”或“句”，有學者認為“已”字是驗收的記號，表示已核對入葬，“句”字表示句銷（勾銷）而未入葬等。據傳世文獻，先秦喪禮有“讀贈”、“讀遣”的制度，簡文末尾之“已”或“句”，也許就是“讀贈”、“讀遣”時留的記錄。整理研究者認為，該批竹簡性質仍屬遣冊，所記內容為隨葬之物品清單，有服飾之物，日用之器，如衣、帽、屨、帶及銅、竹、陶製品等。除墓主人自置外，還有贈贈者的姓名。^{②③}

(三) 1954 年長沙楊家灣六號墓

楊家灣六號墓，年代屬戰國末年（前 3 世紀），未被盜。長方形墓室，長 3.65—3.7、寬 2.64—2.83、深 4.62 米。葬具係一槨一棺，棺與槨之間空隙隔成南、北、西三個邊箱。竹簡出土時裝在位於南邊箱的一個直徑 34 釐米的大漆奩中，共出七十二枚，簡長 13.5—13.7、寬 0.6 釐米，上端 4—4.1 釐米、下端 3.5—3.6 釐米處一側刻有繫繩的契口。能辨字跡者五十枚，其中十三枚文字模糊，三十七枚文字較為清晰。除四枚書寫兩字外，餘者每簡僅一字，簡文與隨葬品不能對號入座，又無數量記載，與一般遣冊不同。有學者認為是遣冊，也有的認為可能是占筮的人名，其性質仍待考。^{④⑤}

(四) 1972—1973 年，長沙馬王堆一、三號漢墓出土簡牘

①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124 頁，圖一〇四，圖版捌伍·1。

②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24 頁、420—427 頁，圖八、三三四、三三五，圖版一六一至一六四。

③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175—183 頁。

④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楚墓》，53 頁、57 頁，圖二七、二八、圖三三六至三三九，圖版一六五至一七〇。

⑤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184 頁。

兩墓葬年代屬西漢早期。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於1972年的“文革”時期，由當地某駐軍醫院挖鑿戰備防空醫療病室時所發現。發掘整理者推斷其年代約當文帝五年（前175）至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期間。墓口南北長19.5、東西寬17.8、深20米，斗形墓室分四層臺階。墓底長7.6、寬6.7米，一槨四棺，棺槨之間空隙分隔成東西南北四個邊箱。出土簡牘分兩類，一類是竹簡遺冊，一類是木牘。竹簡三百一十二枚，置於東邊箱。簡長27.6、寬0.7、厚約0.1釐米，書寫後用二道繩編聯成冊，每簡字多者二十五字，少者二字。簡文所記皆為隨葬物品。所述物品包括副食品、調味品、酒類、動植物、衣物、竹木器、明器等。木牘四十九枚，大部分出於西邊箱，出土時有些仍繫在竹簡之上，木牘頂部呈半圓形，有繫繩的小孔，長7.1—12、寬3.8—5.7、厚0.2釐米。所書文字主要標明竹簡所盛物品的名稱，與遺冊相類。

馬王堆三號墓發掘於1973年，整理者根據墓的東邊箱所出“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木牘，推斷墓主下葬的確切年代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該墓南北長16.3、東西寬15.45、深10.3米，斗形墓室，分三層臺階，墓底長5.8、寬5.06米，一槨三棺，東西南北四個邊箱。共出竹木簡牘六百一十枚，包括“遺策”一卷，醫書二卷。“遺策”計四百一十三枚，由六枚木牘和四百零四枚竹簡（另含三枚殘簡）組成。除紀年木牘出自東邊箱，餘者全部出自西邊箱北端。簡長27.5、寬1釐米，木牘長23—28、寬2.2—6釐米。簡文少則一字，多則二十四字；木牘文少則二十五字，多則九十二字。紀年木牘為軼侯家丞向陰間冥府官吏移交墓主隨葬品的文書，另五件木牘均是一組竹簡所記同類隨葬品的小結。“遺策”雖已散亂，但隨葬品前後次序大體清楚，起首為紀年木牘，然後依次為男、女明童，車馬，各種食物，漆器，土器，以及其它雜器和絲織物。醫書二百枚與帛書、地圖同出於東邊箱一漆奩內，分甲乙卷。甲卷簡長23、寬0.6—0.9釐米，每簡二十至二十七字，內容包括《十問》、《合陰陽方》兩部分；乙卷簡長22—29、寬0.5—1.2釐米，每簡十三至三十四字，內容包括《雜禁方》、《天下至道談》兩部分。竹簡“醫書”係彙編性資料，來源於抄本。^{①②③}

①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35頁、112—117頁、130—155頁，圖三六、三七、一〇一、一〇二，圖版二七〇至二九二；岳南：《西漢亡魂——馬王堆漢墓發掘之謎》，新世界出版社，1998。

②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43—87頁，圖二七、二八，圖版二〇至五一、圖版五三至六六。

③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382—443頁；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85—93頁；李均明：《古代簡牘》，文物出版社，2003，74—79頁；陳松長：《湖南簡帛的出土與研究》，《湖南大學學報》2005年9期。

三、長沙 20 世紀 90 年代至本世紀初簡牘的發現

（五）1993 年西漢長沙王后“漁陽”墓出土封檢、木牋

年代屬西漢早期。位於長沙湘江西岸古墳坑，墓葬規模宏大，長方形岩坑豎穴，墓口長 15.98、寬 13.1、深 10 米。使用葬具係“黃腸題湊”、“梓宮”、“便房”。題湊木 400 多塊，係楠木製作，壘築于槨外，達七層之多。二棺二槨，二槨之間用迴廊連通，並放置大量隨葬品。出土封檢 10 餘枚，長 5—7、寬 3—5 釐米，封檢上的封泥印有陽文篆書“長沙后府”四字，當為長沙王后府邸的簡稱。出土木牋一百二十餘枚，字數達三千餘字，大部分出土於東迴廊與南迴廊內。木牋形制與馬王堆漢墓相同，長 9—13、寬 6—7、厚 0.2 釐米，每牋字少者二字，多者達七百零六字，主要記錄隨葬品的名稱、數量、產地、質料等。其中最多的是絲織品的名稱，有帛、棉、襪、紗、錦、綺、縵、繡、絹、綾、羅等。除王后家丞自置外，還發現了皇帝、長沙王所贈贈的喪禮物品。引例：

1. 陛下所以贈物：青璧三，紺繒十一匹，熏繒九匹。

2. 青繒襪衣□，□□衣三，絹繒襪衣三，□襪衣一，白繒襪衣六，襪衣一，相繒襪衣四，凡廿六衣，王祝。

3. 素，練，白綺繒布襪襦卅五，青綺複襦裙一，練襪前襪四、青綺紅複要衣二，白綺襪紗裙二，緹合裙一，白綺，素襪襦裙六，練，帛，素襪裙六十六，布，素，練，帛襪□廿、素襪裙七、帛□□□一，凡百五十五。故第十一。

該墓眾多漆器上刻寫“漁陽”二字，發掘者認為是墓主對所屬物品的標識，“漁陽”有可能是墓主生前的封邑之稱或名字。這批木牋對漢代諸侯王喪葬禮儀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①②}

（六）1996 年長沙走馬樓出土三國吳簡

1996 年 10 月在長沙城市中心走馬樓街的一建設工地的編號為 22 號古井內發現。J22 號為不規則的圓形豎井，上口略小，中部寬大，底部收縮平緩。原井口以下兩米被破壞，現存井口直徑南北 3.2、東西 3.1、深 5.6 米，今地表 7.9 米。現存井口的二分之一（北部）遭施工破壞。

井內堆積物為四層：第一層為黃褐色土，第二層為簡牘，第三層為灰褐色土，第四層為方形小木壁豎井及四周填塞黃褐色土。簡牘呈坡狀堆積，中間厚，四周薄，厚薄不勻，

① 宋少華、李鄂權：《三次被盜挖的王后墓》，《中國十年百大考古新發現》（上、下），文物出版社，2002，484—489 頁。

② 宋少華：《三次被盜，獨有驚人發現的王后墓》，《最新中國考古大發現》，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120—124 頁。

最厚處達 56 釐米，最薄處僅 10 釐米。底部不平整。擺放順序為大木簡（吏民田家莧）在上，竹木簡牘在下。簡牘保存情況較差，除木牘尚可外，大部分竹簡因長年擠壓及井內堆積物的污染，粘連結塊，腐蝕嚴重，揭剝清理工作十分繁難。到目前為止，已全部剝離清洗完畢，經統計總數為十萬餘枚，其中有字簡七萬二千餘枚，帶字痕三萬餘枚，另有四萬餘枚無字。^{①②}

吳簡的形制分為大木簡、竹簡、木簡、木牘、木牘、封檢等。大木簡長 49.8—56、寬 2.6—5.5、厚 0.3—0.5 釐米；木簡長 24.2、寬 1.5—1.9、厚 0.4—0.5 釐米；竹簡長 22.2—29、寬 1.2—1.5、厚 0.15—0.18 釐米；木牘長 23—24.5、寬 6—9.6、厚 0.4—0.9 釐米；木牘長 7.5—11.2、寬 3.3、厚 0.3—0.4 釐米；封檢長 12—17.5、寬 5—6、厚 2—2.6 釐米。已整理部分所見最早年號為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最晚年號為孫吳嘉禾六年（237），其中建安年號順延至二十七年。唯有一枚年號為“中平二年”（185），此屬孤例。這批簡牘屬於吳臨湘縣（侯國）及長沙郡的行政文書。從目前已發表的資料看，吳簡的內容以戶籍、賦稅為主；從目前整理的情况看，亦大體如是。當然隨著整理的深入，還會有新的發現。僅就正戶民籍而言，由於清理揭剝十分注意其排列關係，其一戶家庭、里、鄉統計格式的基本輪廓漸已清晰。援例：

- | | |
|--------------------------|-------|
| (1) 大男鄭倬，年卅二。 | 30341 |
| 妻恩，年卅。 | 30340 |
| 子女汝，年七歲。 | 30339 |
| 汝男弟增，年四歲。 | 30338 |
| ●右倬家口食四人。 | 30337 |
| (2) 嘉禾六年東扶里戶人公乘李果，卅一，算一。 | 30406 |
| 果母小，五十七，算一。 | 30405 |
| 果妻世，年廿一，算[一] | 30404 |
| ●右果家口食三人，營五十 | 30410 |

此為家庭戶籍，戶主之上大多冠以里名，里名之上有的冠以年號、年序。戶主居首，依次列父母、妻、兄弟、子女及其它親屬，末尾為人口總數及嘗稅，有的還注明男女數。如：“右孫家口食九人，男四，女五”（31837）。家庭人口中從事各種職業者也一一署明，如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宋少華、何旭紅執筆）：《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上、下），文物出版社，1999。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者胡平生、李均明）：《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文物出版社，199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者王素、羅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上、中、下），文物出版社，2003。

“給州私學”(32081)、“給縣吏”(30462)、“給羽射”(32043)等，還有身體狀況和任役年齡的說明，如：“腹心病”、“踵足”、“盲一目”、“陽貴里戶人大女吳妾七十六，不任役”(31792)。

(3) 集凡五唐里魁周□領吏民五十戶，口食二百八十九人	30380
其一百六十二人男。	30379
其一百廿七人女。	30378
其四戶縣吏。	30377
其二戶郡吏。	30376
其□戶州吏。	30374
其五戶給新吏。	30373
其一戶縣卒。	30372
其一戶佃帥。	30371

此為某里所轄諸戶男女口數、任役情況的統計。

(4) □集凡中鄉領三百卅九戶，口食一千七十一人。	30899
(5) 廣成鄉謹列嘉禾六的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為簿。	21798

此為某鄉所轄諸里之吏民戶數、口食的統計。

戶籍統計的詳略各有不同，更為詳備的統計格式見《吳簡·竹簡壹》：“集凡樂鄉領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戶，口食七百九十五人口”(8482)，“右小武陵鄉領四年吏民一百九十四口，民口九百五十一人，吏口□□□，算一千三百卅四錢”(4985)。統計的主要內容為每戶的人名年紀口食數，這是提供計算吏民任役算賦賞稅的依據。^①

吳簡的發現至今已近十年，作為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考古界、史學界的一件盛事，倍受海內外關注。從最初的宣傳介紹報導，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專著《嘉禾吏民田家勘》、《竹簡·壹》、《竹簡·貳》的陸續出版，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暨簡帛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到中日兩國學者相繼成立吳簡研究會、吳簡研討班等學術團體，吳簡研究已有了鉅大的發展。各學研機構、大專院校的眾多學者紛紛撰寫文章，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討，相關論文多達二百四十餘篇，並有專著、專集等問世。吳簡的整理研究經歷了一個從最初的驚喜振奮到目前冷靜分析，深入思考的階段。雖然這一過程僅是漫長的學術探討路程的開始，但對前十年整理研究所涉及的眾多方面及存在的問題加以歸納，卻是十分必要的。王素先生三年前所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

①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有關簡文資料，待刊。

文對此做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歸納與總結。他提出的關於走馬樓三國吳簡的年代、性質與埋藏原因，關於“田家薪”及所涉及田地的性質，關於私學、巴西丘復民的身份與金民、還民、作部工師及吏民等問題的見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導參考作用。^{①②}當然還有一些基本問題，如戶籍、任役、賦稅制度、司法制度等，由於受資料的局限，對其探討還未充分展開。

長沙吳簡的保護整理工作，在經歷了2002—2003年近二年的保護整理專題專案申報、論證、審定的相對平靜期以後，自2004年起，明顯地加快了進度，預計在今明兩年會陸續推出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竹簡·三》、《竹簡·肆》。雖然我們無法斷言總冊數是多少，但相信隨著新資料的不斷公佈，“預計不久將會迎來一個吳簡研究的高潮，而‘吳簡學’的創立，也應該指日可待！”^③

（七）1997年九如齋（科文大廈）出土東漢簡牘

九如齋位於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西北角，與走馬樓對角相望，相距二百餘米。東漢簡牘出土於編號為J3、J4、J5、J18、J22六座古井中，各井數量不一，總計約200餘枚。簡牘木質，色呈黃褐色，長23、寬3—5、厚0.3—0.8釐米，形制分簡、牘、封檢、木牘等。其內容大致是官府文書、信件，伴隨不少習字簡。發現一枚有紀年的習字簡，簡文“延平元年二月甲辰朔十日庚申長沙太守君丞卿叩”。“延平元年”為漢殤帝劉隆的年號，即公元105年。^④

（八）2003年長沙走馬樓8號井出土西漢簡牘

簡牘出土於編號為J8號的古井中。J8東距走馬樓街80米，距出土吳簡的古井95米。圓錐形豎井，口徑88、深3.40米，底部收束呈圓尖狀。井內堆積物分為三層：第一層為黑褐色淤泥，出殘簡片六十餘枚；第二層為簡牘層，夾雜大量的竹屑殘篴；第三層為黃褐色泥土、少量竹簡及灰陶汲水罐。經清洗實際所得出土簡牘約兩千餘枚，形制分為四種：I型，長46、寬1.8—2.1、厚0.3釐米，兩行文書；II型，長23、寬2.7、厚0.3釐米，三行文書；III型，長2.3、寬1.8—2.1、厚0.3釐米，兩行文書；IV型，長23、寬0.8—0.9、厚0.3釐米，單行文書。簡牘發現四至九年紀年曆朔，據銀雀山漢墓出土西漢元光元年曆

① 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一期，注釋（1）—（95）列有詳盡的說明；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1—31頁，注釋[1]—[102]在前注的基礎上又增補7條。

② 李進：《長沙走馬樓吳簡研究論著目錄》，《吳簡研究》第一輯，344—361頁，其中中文論著118篇，日文論著34篇；陳爽：《長沙走馬樓吳簡研究論著目錄（續）》，《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292—303頁，剔除重複者，其中中文論文57篇，日文論文12篇；《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其中論文15篇；中國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 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31頁。

④ 宋少華、黃朴華：《長沙市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國考古學年鑒》1997年，科學出版社，1998，189—190頁。

譜推算，四～九年的曆朔均與漢武帝元朔、元狩的曆朔相合，其年代應在公元前 125—120 年左右。查《史記》，知公元前 128 年長沙康王劉庸即位，在位二十八年，簡文所見四至九年，推測當為劉庸自建的紀年。^①

出土簡牘大多為官府文書，一小部分為私人文書，內容大多涉及司法方面。其中有關於起訴的告劾文書及審理案件的爰書數量最多，每簡字數多達百字以上，罪名有“縱火”、“詐僞書”、“逃亡”、“縱罪人”、“劾不以實”等，徒刑有“髡、鉗、答、鉗左止”等。另有對傳舍的調查實錄及鄉級上計文書。援例：

1. 四年五月甲子朔庚寅案事長沙相史駕、武陵守卒史縱、辰陽令史野劾。六月丙申案事長沙相史駕、武陵守卒史縱，移辰陽以律令從事言史相府/相史駕率史縱
2. 案將田秦陵斤僮移運薪上粟作□券曰錢五千七百八十一，緇繒四匹一丈九尺二寸直錢千九百七十一，□□二匹一丈五尺七寸直錢千一百卅九，緇繒三丈五尺直錢四百五十五，素繒五尺五寸直錢卅九。
3. 五年八月丁亥朔戊申使侯相嘉移臨湘少府大僕江陵臨詛□□□夷道案贖罪。
4. 案傳舍二千右舍西南向馬廄二所，並袤丈五尺、廣八尺。杜(牡)牝(北)瓦各十九枚，竹馬仰四，井鹿車一具不見，磨壞敗。

走馬樓西漢簡牘的出土，對於研究漢長沙國的歷史、地理、法律、郡縣、疆域、以及古代文書制度、簡牘制度等增添了重要資料。該批簡牘由於泥垢粘結緊實，仍在清洗之中。^②

(九) 2004 年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東牌樓與走馬樓相鄰，僅一牆之隔。簡牘出土於編號為 J7 的古井中，J7 為圓形袋狀豎井，徑 1.2 米，現深 7.6 米，井內堆積自上而下分為一至五層。簡牘散亂分佈井內二至五層，共出簡牘四百二十六枚，其中二百六枚有字，二百二十枚無字，形制分為木簡、牘、封檢、封匣、簽牌、刺、異形簡等。木簡長 23—23.5、寬 1—2、厚 0.1—0.6 釐米，木牘長 20—24.5、寬 2.2—6.3、厚 0.1—1 釐米；封檢分為契形、船形、“F”形；簽牌、名刺、異形簡數量較少。簡牘寫於東漢靈帝時期，發現東漢靈帝“建寧”、“熹平”、“光和”、“中平”等四個紀年，最早為建寧四年（171），最晚為中平三年（186）。性質屬於長沙郡和臨湘縣通過郵亭收發的公私文書。內容分為公文、私信、雜文書、習字等類，其中具有明確紀年的《建寧四年益成里戶人公乘戶籍》、《光和六年（183 年）監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上言李建與精張諍田自相和從書》、《中平五年（188 年）臨湘守令臣肅上言荊南頻遇軍寇

①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華書局標點本，858 頁，表作“康王”。《漢書·景十三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24、27 頁作“戴王”。本文從《史記》。

② 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組：《2003 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重大考古發現》，《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7—64 頁。

文書》，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所見草書和新興的行書、正書的書法價值亦十分重要。^{①②}

四、長沙出土簡牘所見的一些特點

1. 長沙的自然地理條件

長沙位於我國東南部，屬於湖南中部丘陵中的一個山間盆地或稱丘陵性盆地。湘江從長沙盆地西緣自南而北穿過。湘江東岸大都是沖積平原，這是在最近的地質年代由河流沖積物長期堆積而成的地形，主要由棕紅色粘壤土與砂岩組成，海拔約40—60米，地勢低平。長沙市區主要分佈在這一區域內。長沙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溫暖濕潤的氣候為植物生長提供了優越的環境。代表性的植被類型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盛產毛竹、杉木、馬尾松等。長沙的自然地理環境適宜古代農業人群長期穩定居住，而這種穩定性一直保持到近代。長沙城市中心位置保持2000餘年而沒有變化的情況，在我國城市發展史上亦屬少有。考古發現證明，現長沙城市商貿中心區，自秦漢始一直是人口居住的稠密區，歷代官署、王宮均設置於此。這種自然與歷史因素的交互作用，為人們的物質與精神產品的生產提供了基本條件。

2. 簡牘出土地點保存條件

從簡牘出土地點的分佈狀況看，城區以外均出自墓葬，城區以內均出自遺址的井窖裏。墓葬因埋藏條件，如白膏泥、木炭、密封、深埋等原因使簡牘得以保存。井窖則因紅壤的質地緊實、酸性強、透水性差，以及地下水位高、深埋等因素使簡牘得以保存。

3. 簡牘出土的時代背景

長沙簡牘的出土的時代均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是配合城鄉建設工程、戰備工程，經考古專業人員科學發掘而獲得的。特別是進入90年代，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簡牘出土地點更多的由城外的郊區、鄉村轉入城市中心，由墓葬而轉入遺址。這一現象與我國城市現代化進程中所具有的早期階段的特徵密切相關。現代商區的建設往往首先選擇在有著悠久歷史的老城區內，尤其是繁華的鬧市中心，而這一區域恰又是在古代城市的基礎上承續發展起來的。在地下，保存著數百年甚至數千年內涵豐富的各類古代遺址、遺存。城市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與文物保護法規的滯後的狀況，在帶來重大考古發現驚喜的同時，所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7頁、21—28頁，圖三、一六至一八，圖版釋文三一至三十九。

② 王素：《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概述》，《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69—77頁；劉濤：《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的書體、書法與書寫者》，《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78—98頁。

產生的弊端則是造成了與簡牘密切相關的古代遺址、遺存的其它重要資訊的缺失與破壞。近十年長沙地下簡牘的不斷發現，一再證明了這一點。雖然這種建設性的破壞近幾年開始得到有效的遏制，但已經破壞了的卻已無法挽回。

4. 簡牘形制特徵

簡牘的形制，品類，總體上說與中國其它地區所出大同小異，其功用也基本一致，如簡、牘、封檢、楬、刺、簽等，唯獨大木簡（三國吏民田家莧）與大封檢（東漢諍田自相和從書）為全國僅見。

5. 長沙簡牘年代序列

歷史跨度長，年代相互銜接，自公元前 4 世紀至公元 3 世紀，時間跨越戰國、西漢、東漢、三國（缺秦、晉），基本上涵蓋了我國簡牘傳佈使用的時代。雖然根據典籍記載，簡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商周時期，但我們目前只能按考古已發現的材料來說話。

6. 長沙簡牘內容的特點

就基本內容而言，墓葬所出均為遺策與木楬，紀錄的內容多為隨葬物品的名稱、種類、數量，少見部分古籍。唯馬王堆三號墓出土 200 余枚醫簡。馬王堆漢墓雖未出簡冊典籍，其所出的帛書《老子》甲乙篇、《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等，可視為書寫材料的不同，其性質與簡牘是一樣的。有的學者認為馬王堆醫書簡中木簡《雜禁方》與帛書《養生方》、《雜療方》應當是一部^①。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部書也可用不同材料書寫，並沒有嚴格區分。典籍用帛或簡抄寫，反映的或是墓主人個人喜好，似無貴賤之分。其它地區所出典籍的簡冊如荊門《老子》^②、銀雀山《孫臏兵法》、《孫子兵法》^③、阜陽《詩經》、《周易》^④等亦可為證。遺址（井窖）所出大多為官府行政文書與私人文書，是當時的人們從事各項活動的思想行為方式的記錄。由此可見長沙墓葬與遺址所出簡書的性質有較大的區別。前者是遵循一定的規則，如按喪葬禮儀、制度來操作，內容格式固定，例如遺冊。且有的簡書內容產生的時間早，流傳時間跨度長，例如典籍。後者則無規律可循，隨意性很大，棄埋時雜亂交錯，但內容富於時代特徵，流傳時間跨度短，涉及面廣泛。因而兩者的研究價值各有側重。與湖北、安徽、江蘇等地漢墓出土簡牘相比，長沙墓葬出土簡牘缺乏反映當時的法律、戶籍、賦稅等行政活動的記錄，這種差別僅用墓葬遭盜掘來解釋尚缺乏說服力，其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①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410—411 頁。

② 荊門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

③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孫臏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5。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孫子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6。

④ 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詩經》，《文物》1984 年第 8 期。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7. 長沙簡牘埋藏特點

墓葬所出簡牘皆為人們按喪禮的規定事前準備，其擺放的位置事前似已有規劃設定，這類簡冊的埋藏有著固定的程式和位置。如馬王堆三號墓的遣冊是用絲帛等物包裹後，在舉行葬禮儀式過程中擺放進去，尤其擺放在東槨箱隨葬品第一層的“告地書”木牘，應是埋藏者（墓主家丞）在行將封埋之前代墓主向虛擬中冥府的官吏移交墓主隨葬品的文書。而遺址井窖所出則為人們所廢棄，只是廢棄的方式不同。從考古發掘的實際情況來看，走馬樓西漢簡、九如齋東漢簡、東牌樓東漢簡，出土於井內若干堆積層位中，與當時人們遺棄的生活垃圾，殘磚碎瓦，竹頭木屑混雜在一起，有的簡牘還有火燒的痕跡，有的則為習字的練習冊。這種被視為廢棄物的簡牘，常常是隨著井的廢棄而被一次性填埋。下面以東牌樓簡牘為例略作分析。該井最底層（第五層）發現“光和二年”（179）的紀年簡牘，然而在晚於它的第四層及更晚的第三層卻出現早於它的“建寧四年”（171）紀年簡，兩簡時間相距八年。同樣的情況，在第四層發現“中平五年”（188）紀年簡，而在晚於它的第三層、第二層也出現早於它的“光和三年”（180）紀年簡。兩簡時間相距亦八年。同為“光和三年”的紀年簡牘又分別出現在第二層與第三層中^①。這種多次出現的年代倒置的錯位混亂的狀態只能表明是一次性填埋。再以里耶秦簡為例，里耶秦簡劃分的堆積層位自六層以下至十七層，厚達十二層之多，然而簡牘整理的結果表明，秦簡層位並不存在早晚的年代學關係。據發掘者稱“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簡十分凌亂，裏面夾雜著大量的廢棄物品，極有可能是秦末戰亂時，檔案文書來不及銷毀而隨意地棄置于井中”。^②其廢棄的方式與東牌樓漢簡如出一轍。

然而吳簡的埋藏似與之有別，今存三種推測：“空倉封存”、“呂壹事件”、“過期廢棄”。從發掘的實際情況看，“簡牘的擺放有一定的順序，層層相疊，似有意為之。簡牘之上覆蓋一層竹篾席，已殘朽。從部面上看簡牘擺放時對其擺放的部位似未加修整，而是依原堆積的自然狀態擺放”^③。吳簡的放置似有意為之，並沒有散亂于井內各層之中（除施工破壞外），在整理經正式考古發掘清理的簡冊時，內容之間的連貫已顯現出來。按《周書·高昌傳》記高昌王國的檔案制度“平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和《唐令》所稱“文案不須常留者，每三年一揀除”的規定，我以為，戶籍包括各種名籍，吏籍以及各類賦稅簿籍等，應屬於古代“須常留”的重要文案，即便是過期作廢，對它的處理亦不同於上述方式。《唐令拾遺·戶令》二一云：“每歲一造計帳，里正責所部手實，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21—25頁，表四。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1期；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復活秦國歷史》，《中國國家地理》2002年第9期。

③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宋少華、何旭紅執筆）：《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籍》（上），4—5頁。

具注家口年紀。”^①二二云：“三年一造戶籍，起正月畢三月，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②二五丙云：“戶籍常留三比在州縣，留五比送省。”^③《通典》卷三云：“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④“三比”、“五比”即三年、五年之謂也。按唐代州縣一級對戶籍保留須滿三年以上，送至省部（尚書省）則保留五年以上。這裏只規定了保留的時間，保留期一過，必被揀除。走馬樓吳簡雖屬廢棄文案，但棄埋方式不同于前述秦漢簡，它並沒有與其它廢棄物填埋在不同的層位堆積中，而是單獨地放置，這在考古學上可視爲一獨立的層位。

至於吳簡廢棄的時間，《長沙走馬樓 J22 號發掘報告》認爲，“J22 使用年代始於東漢中晚期，廢棄於三國赤烏（公元 238 至 251 年）年後，最遲至寶鼎二年（公元 267 年）之後，簡牘埋放的時間應在此之後”^⑤。今天重新審視這些推論，雖不能說是十分準確，但爲吳簡棄埋於井的時間提供了一個相對準確的年代。從吳簡本身的年代觀察，其年號爲建安五年（200）到嘉禾六年（237）。羅新先生的研究認爲，竹簡上的“建安”紀年實際都是後來追記的，而且數量少，目前僅見六枚。^⑥“黃武”年號的竹簡也不多，主要爲“黃龍”、“嘉禾”年號竹簡^⑦。暫且不計“建安”、“黃武”年號，“黃龍”元年至“嘉禾”六年，時間長達九年，簡冊文案的累積可謂數量鉅大，即便是須常留的文案，對其保留不會稽延太久。我以爲揀除的時間約在赤烏年間。據此推測，吳國對重要文案的揀除可能會是十年左右一次。當然這僅是推測，仍不排除出現更晚年號的可能。

綜上考察，長沙的自然地理環境，提供了古代農業人群生產、生活長期居住與簡牘製作、保存的基本條件。長沙簡牘自 20 世紀 50 年代陸續出土，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均經科學的考古發掘獲取。它的年代序列基本完整，上至先秦下迄三國。形制、品類與我國其它省份如甘肅、湖北、安徽、江蘇等地相比小有差別。它出土的地點分佈在城市的歷史老街區與城郊、農村，並因不同的功用而記載著不同的內容。其被埋藏的原因有二：其一，作

①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戶令》，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刊。參見《舊唐書·食貨志》卷四八：“武德七年始定律令……每歲一造計帳。”《冊府元龜·邦計部戶籍》：“武德……六年三月令……是月令……每歲一造籍。”《唐六典·戶部郎中員外郎》卷三：“每歲一造計帳。”

② 參見《舊唐書·食貨志》卷四八：“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三年一造戶籍。”

③ 參見《舊唐書·食貨志》卷四八：“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三年一造戶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

④ [唐]杜佑：《通典》，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64 頁。

⑤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宋少華、何旭紅執筆）：《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券》（上），40—41 頁。《報告》認爲，“在二期地層中出土的青瓷水注及青瓷虎子殘片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水注造型簡單，僅在肩部飾一團花形的小紐，整體造型仍未脫出東漢水盂的影響。而吳晚期水注的造型，大多做成各種動物的形象，如南京光華門外的吳鳳凰二年（27）的蛙形小注。而青瓷虎子口部堆貼虎頭的裝飾在赤烏（238—249）之後逐漸盛行，此虎頭堆積裝飾手法粗糙，亦具有早期特點。綜上所述，J22 號出土遺物一期的年代約在東漢晚期至三國初年，二期的年代約在三國初年至吳中晚期之際”。

⑥ 羅新：《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 年第 10 期。

⑦ 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吳簡研究》第一輯，15 頁。

爲古代喪禮的內容，作爲墓主人隨葬物品而被埋藏；其二、作爲過期文案而被揀除與廢棄，而廢棄的方式可區分爲隨意廢棄與慎重棄置。

本人才疏識淺，所做歸納與考察只是站在簡牘學、史學的邊緣觀望，所談之論亦恐見笑於大方之家，疏漏紕繆之處，敬祈多多批評。

（附記：此文曾於 2006 年 9 月在日本吳簡研究會上宣讀與交流，此次發表前稍加修改。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王素、李均明、鄧文寬等先生的熱情幫助，深表謝忱。）

走馬樓吳簡人口管理初探

中國文物研究所 李均明

內容提要 人口與土地是國家存在的物質基礎。古代國家掌握人口的多少，直接關係到生產能力的大小、兵員的數量乃至國家的強弱。三國時期各國對人口的爭奪尤為激烈、掌控尤為嚴密，吳國亦然。據吳簡所見的有限資料，吳國的人口管理主要採取三個方面的措施：一為居地人口的登記，二是對流動人口的監督，三是防範人口流失。

關鍵詞：走馬樓吳簡 人口 登記 監督 防範

人口與土地是國家存在的物質基礎，尤其對古代國家而言，掌握人口的多少，直接關係到兵員的數量、賦稅的徵收、國力的強弱。徐幹《中論》專設《民數篇》，文云：“故民數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其惟審民數乎。”說的是人口管理的重要性。又云：“戶口漏於圖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損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奸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闡述的是疏於管理的嚴重危害。人口管理無疑是掌握人口的基本手段，尤其三國紛爭時期，對人口的爭奪尤為激烈，人口問題已列入各國政府必須考慮的重大議題，《三國志·吳書·駱統傳》記載，吳地民戶損耗時，駱統上疏文云：“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征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又云：“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

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涉及的不僅僅是人口的數量，還有人口的品質。駱統的建議，遂被孫權所採納。從走馬樓三國吳簡中，亦多少能反映出當時吳國對人口進行管理方面的一些手段，本文試析如下，有不妥當之處，望大家批評指正。

一、居地人口的登記

居地人口的登記是人口管理的基礎，主要以戶籍形式見存，《四卷》4490：“……諸郡生子受居比郡縣者及方遠客人皆應上戶籍。”^①表明申報戶口是所有國民的義務。當時的戶口以家庭為單位設立“戶籍”，簡牘所見如：

- | | |
|----------------------------|---------|
| （一）曼渡里戶人孫傳，年卅□，刑右足。 | 《四卷》452 |
| 傳妻汝，年卅，算一。 | 《四卷》451 |
| 傳男弟清，年□。 | 《四卷》450 |
| 傳男弟要，年十。 | 《四卷》448 |
| （二）嘉禾六年東□里戶人公乘李果，[年]卅一，算一。 | 《四卷》406 |
| 果母小，[年]五十七，算一。 | 《四卷》405 |
| 果妻世，年廿一，[算]一。 | 《四卷》404 |
| 右果家口食三人。訾五十。 | 《四卷》410 |

以上為二戶人家的戶籍。由於各個家庭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錄入的內容亦有些差別，其基本要素如下：

登記年份。如例（二）所見“嘉禾六年”，又《四卷》1963、2042、2043、2081等見“嘉禾四年”。但更多的情況是時間要素未冠於戶主名前，而體現在諸鄉戶口統計的標題或呈文中，如《一卷》8482：“集凡樂鄉領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戶，口食七百九十五人。”^①又《一卷》9088：“南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戶數（？）口食人名年紀簿。”

居住地。如例（一）“曼渡里”、例（二）“東□里”即是，又如《四卷》62：“小赤里戶人公乘呂尺，年卅七。”《四卷》693：“嘉禾五年緒中里公乘區忠，年卅七，算一。”有些戶籍未冠地名，如《四卷》328：“大男周文，年卅二。”《四卷》370：“大女周稚，年八十一。”並非省略居地要素，而是此要素已體現在以里為單位的小計中，如《一卷》10229：“右高遷里領吏民卅八戶，口食一百八十人。”《四卷》380：“·集凡

① 長沙市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四]》，文物出版社近期出版，本文簡稱《四卷》。

五唐里魁周口領吏民五十戶，口食二百八十九人。”

戶主爵位、姓名、年齡。如例（一）“孫傳，年卅口”、例（二）“公乘李果，[年]卅一”。

家庭成員姓名、年齡及其與戶主的關係等。如例（一）“傳妻汝，年卅”，例（二）“果母小，[年]五十七”，家庭成員通常祇名不書姓。同一戶籍中。戶主居首，其下依次為老父、母、子女、其它親屬，子女多者則長者居前。

交納算賦指標及戶訾。如例（一）傳妻汝“筭一”、例（二）戶主李果“筭一”，此指算賦份額。例（二）“訾五十”，此指戶訾稅。

戶籍之末尾為家庭人口小計，如例（一）“凡傳家口食四人”、例（二）“右果家口食三人”之類。

戶主及家庭成員的職業與健康狀況也是人口登記的重要內容，而職業往往是當局劃分戶類的依據，常見者如：

尚書吏。見《一卷》8416：“尚書吏劉露，年廿八。”《一卷》8642：“尚書吏惠己，年十八。”史籍作“郎吏”、“尚書郎”，《後漢書·和殤帝紀》：“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晉書·陳騫傳》：“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

州吏。見《二卷》1552：“州吏潘釘，年卅三。”^②《二卷》1714：“州吏呂政，年卅七。”州吏為供職於州政府機構者。

郡吏。見《二卷》2027：“郡吏黃烏，年十八。”郡吏供職於郡政府機構。

縣吏。見《二卷》1917：“縣吏朱蘭，年廿六。”《二卷》2161：“縣吏番宛，年卅一。”縣吏乃供職於縣政府之小吏。郡縣吏地位皆卑下，《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渥之。”

軍吏。見《二卷》1723：“軍吏朱謙，年卅五。”《二卷》2397：“軍吏口幼，年廿一。”軍吏，軍官，《三國志·吳書·張溫傳》：“其居位貪鄙，^①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

新吏。見《一卷》6650：“新吏南陽銅庭……”新吏乃新任官吏。

真吏。見《一卷》8962：“宜陽里戶人公乘區規，年廿二，真吏”、《一卷》9146：“宜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本文簡稱《一卷》。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二]》，文物出版社近期出版，本文簡稱《二卷》。

陽里戶人公乘黃高，年廿五，真吏。”“真吏”乃在位官吏之泛稱，大多見於宜陽里戶籍簡。《漢書·平帝紀》：“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注：“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賜真。”則吳簡所謂“真吏”可指代州吏、郡吏、縣吏、軍吏等。

以上所見爲具體戶籍中之吏戶，在鄉、里對戶口的統計中尚見“鄉吏”（如《四卷》4316）^①、“庫吏”（如《一卷》5472）、“佃吏”（如《四卷》765）、“佃帥”（如《四卷》371）、“朝丞”（如《二卷》1702）。

民戶中以男性爲戶主者不加說明，而以女性爲戶主者則在姓名前冠以“大女”二字，如《四卷》2685：“嘉禾四年廣成里戶人大女□□，年七十一。”《一卷》1818：“民大女郭恩，年八十三。”有職役者亦在姓名前或後署職役，如：

州卒。見《二卷》1822：“州卒蔡區，年卅二。”《二卷》2110：“州卒區汙，年卅三。”州卒服役於州級機構。

郡卒。見《二卷》1660：“郡卒吳利，年卅一。”《二卷》1708：“郡卒潘囊，年廿三。”郡卒服役於郡級機構。

縣卒。見《二卷》1698：“縣卒謝牛，年廿四。”《二卷》2119：“縣卒區象，年十八。”縣卒服役於本縣。

驛兵。見《二卷》1903：“民男子蔡喬，年六十二，給驛兵。”《二卷》1778：“民男子楊明，年八十六，給驛兵。”驛兵當服務於驛站。此外，尚見“郵卒”的稱謂，如《二卷》2614：“入桑鄉嘉禾二年郵卒限米……”“郵卒”或專事傳遞郵件者，與駐站之驛兵有區別。

鹽兵。見《二卷》2632：“廣成里戶人公乘蔡□，年廿六，給鹽兵。”“鹽兵”當與鹽業生產相關。

習射。見《四卷》2043：“嘉禾四年廣成里戶人公乘郭當，年廿七，給習射。”“習射”爲弩兵之類，《後漢書·馬防傳》：“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十三萬人擊之。”

關父。見《四卷》1924：“□年廣成里戶人公乘周車，年五十二，腹心病，給關父。”“父”通“夫”，“關父”即“關夫”，服役於關門者。

亭雜人、亭復人。見《四卷》2042：“嘉禾四年廣成里戶人公乘朱萇，年六十六、左足，給亭雜人。”《四卷》2633：“□成里戶人公乘周從，年廿三，給亭復人。”“亭雜人”、“亭復人”當爲諸亭雜役人，《漢書·高帝紀》：“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注：“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吳簡所

① 僅引所見稱謂及簡號，文略。

見則當爲享父之類。

以上所見爲戶籍登記所見民職役，鄉、里人口統計中又見“度卒”（見《一卷》537）、“倉父”（見《一卷》5435）、“縣市”（見《四卷》532）、“工師”（見《四卷》5182）、“鍛佐”（見《一卷》5440）、“炭民”（見《一卷》5335）等。

較特殊的身份有醫師、私學、子弟等。

醫。見《四卷》2666：“□□，年卅三，給郡醫。”醫，從醫者，社會地位高低不等，《三國志·吳書·顧雍傳》：“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

私學。見《二卷》2081：“嘉禾四年廣成里戶人公乘周符，年廿二，給州私學。”私學，猶後代私塾。

客、子弟。見《一卷》1264：“東扶里吏客朱設，年五十一，腫兩足。”《二卷》2034：“兄子男公乘蒯，[年]廿，雀左手，給子弟。”客、子弟當指衣食客、門下弟子之類，《三國志·吳書·呂範傳》：“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

戶籍中亦登錄居民的健康狀況，常見如：“腫兩足”（見《一卷》2896）、“刑右足”（見《一卷》2899）、“苦腹心病”（見《一卷》2979）、“聾兩耳”（見《一卷》2988）、“雀兩足”（見《一卷》9133）、“雀右足”（見《一卷》10200）、“害濕病”（見《一卷》9175）、“苦風矢病”（見《一卷》9365）、“盲兩目、風病”（見《一卷》9506）、“風病”（見《四卷》799）、“盲左目”（見《一卷》10061）、“苦狂病”（見《一卷》9744）、“刑歐背”（見《一卷》10467）、“屈兩足”（見《四卷》853）等。

鄉、里對戶籍進行統計時要劃分戶類、戶等、男女等，例如：

（三）·集凡五唐里魁周□領吏民五十戶，口食二百八十九人。《四卷》380

其一百六十二人男。	《四卷》379
其一百廿七人女。	《四卷》378
其四戶縣吏。	《四卷》377
其二戶郡吏。	《四卷》376
其□戶州吏。	《四卷》374
其五戶給新吏。	《四卷》373
其一戶縣卒。	《四卷》372
其一戶佃帥。	《四卷》371

此例所見爲五唐里的戶類與男女口數的小計。從上例及其它吳簡中可看出戶類的劃分

與戶籍登記之職業大部相合，但有些是在統計分項時才出現，典型者如：

尪羸老頓貧窮女戶。見《二卷》557：“其六戶窮獨女戶，下品，”《二卷》2036、2307：“其七戶尪羸老頓貧窮女戶。”“尪”通“尫”、“𡗗”，畸形屈曲，《說文》：“尫，曲脛也。從大，象偏曲之形。”《晉書·山濤傳》：“濤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尪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羸，瘦弱，《說文》：“羸，瘦也。”頓，遲頓，糊塗，《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師古注：“頓讀曰鈍。”“女戶”指寡婦爲戶主者。可見稱“尪羸老頓貧窮女戶”者爲當時社會之弱勢群體。

應役民，或作“使役民”、“事役民”，見《二卷》660：“領應役民十九戶”、《四卷》792：“定領應役民五戶”、《四卷》5302：“領事役民卅戶”，當指符合服役條件及正在服役的民戶。

歲伍、月伍。見《二卷》580：“領歲、月伍五戶，下品。”又《四卷》5283：“領月伍十一戶，下品。”“歲伍”、“月伍”之“伍”或指役伍，服役方式，具體制度待考。

新佔民、新戶、新還民。見《二卷》3186：“其廿戶新佔民戶。”《一卷》4198：“四戶下品之下，新戶。”“新還民”屢見於賦稅簡。佔，申報，《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又黃門豎宦，開立佔募，兵民怨役，遁逃入佔。”“新佔民”、“新戶”即新申報戶口的民戶。

吳簡所見戶籍統計按家庭資產的多少劃分戶等，今見分上、中、下三品。

上品。見《一卷》5324：“其二戶上品”、《二卷》571：“其一戶上品”、《四卷》5159：“其三戶上品”。

中品。見《一卷》5426：“其六戶中品”、《二卷》573：“其三戶中品”、《二卷》5282：“其二戶中品”。

下品。見《一卷》5499：“其卅二戶下品”、《二卷》521：“其廿八戶下品”、《二卷》588：“其廿一戶下品”。“下品”中還有“下品之下”的稱謂，見《一卷》5319：“其八十四戶下品之下”，乃指“下品”中尤窮者，史籍稱之爲“尤貧”、“下貧”等。

三品之綜合統計見《二卷》2897：“其四戶上品，七戶中品，十一戶下品。”呈金字塔結構。

三品的劃分與徵收戶稅直接相關，但同品之故戶與新戶徵收金額又不相同，故戶三品出錢如：

都鄉男子朱敬，故戶，上品，出錢一萬二千。侯相□

《一卷》172

模鄉男子蓋轉，故戶，中品，出錢八千。臨湘侯相□□

《一卷》1518

□□真，故戶，下品，出錢□千□百九十四。侯相□

《一卷》381

據上引簡文，可知故戶上品出錢一萬二千，故戶中品出錢八千。新戶三品出錢如：

模鄉大男黃欽，新戶，上品，出錢一萬三千。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模鄉典田橡烝若白。《四卷》1382

模鄉大男謝牒，新戶，中品，出錢九千。臨湘侯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鄉典
田橡烝若白。《四卷》1385

模鄉大女黃妾，新戶，下品，出錢五千五百九十四錢。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
十八日，模鄉典田橡烝若白。《四卷》1423

據上引簡文，可知新戶上品出錢一萬三千、中品出錢九千、下品出錢五千五百九十四。新戶上、中品皆較故戶上、中品多交一千錢。那麼，新戶下品比故戶下品多交一千錢的可能性也很大，則故戶下品或交四千五百九十四錢。

戶類的劃分也與執行國家政策息息相關，典型者如對州吏的優惠。《嘉禾吏民田家莧》4231：“利丘男子謝文，佃田十九町，凡七十九畝，皆二年常限。其六十九畝旱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爲米十二斛……”其它簡文所見，包括郡縣吏在內的一般人，畝收米皆爲一斛二斗，州吏則不同，《嘉禾吏民田家莧》4·230：“利丘州吏劉露，佃田廿町，凡卅畝，皆二年常限。租田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凡爲米廿三斛四斗四升……”其它簡文所見州吏賦稅，畝收米亦爲五斗八升六合，可見對州吏有優惠政策。對殘疾老弱貧困等弱勢群體，亦當繼承歷代之優撫政策。

二、流動人口的監督

三國時期差役繁多，人口流動量大，因此對流動人口的監督也是人口管理的重要內容。許多人口的流動是在政府的組織下進行的，師佐的調動最典型。

師佐爲技術工匠，他們在原居地都有戶籍（見前文），而一旦被調動，即立有師佐籍，明確顯示師佐家庭成員的去留情況。韓樹峰先生曾復原三戶師佐籍，^①今擇其中二戶錄如下：

（四）貫田師臨湘魯章，年卅一。

《一卷》6607

章妻姑，年廿七，見。

《一卷》5923

章子男伯，年三歲□

《一卷》6794

章侄子男世，年十歲，見。

《一卷》5838

① 韓樹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師佐籍考》，載《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167—189頁。

- (五) □□區表，年卅七，見。《一卷》5895
表妻汝，年卅，在本縣，留。《一卷》5896
表小妻姑，年卅一，見。《一卷》5852
表子女小，年十三，在本縣，留。《一卷》6011
表子女麥，年四歲，見。《一卷》6771

以上二戶師佐名籍的復原雖然不能肯定是絕對可靠，但能反映當時師佐登記的基本格式與內容。從例（五）中可看出，同一家庭中即有“見”、“留”兩種情形，“見”為隨師佐而流動者，即表之小妻及小女；而“留”為留住原籍不隨師佐流動者，即表之大妻及較大之女兒。其它簡文所見師佐家屬名下亦有此類去留標志，如：

- (六) 囊妻汝，年廿九，見。《一卷》5815
壬妻從，年廿四，見。《一卷》5919
章姪子男世，年十歲，見。《一卷》5938
此例所見，皆為與師佐從行之家屬。
(七) 表妻汝，年卅六，在本縣，留。《一卷》5896
正子男奇，年十三，在本縣，留。《一卷》5986
羅妻汝，年卅六，在本縣，留。《一卷》6628

此例所見，皆為師佐家屬之留在原籍者。除去、留之外，尚有其它情況也記錄在案，例如：

- (八) □男弟惟，年十五，別使。《一卷》6652
小妻姑，年廿七，在本縣，屯將行。《一卷》6705
□子男水，年廿一，別使行，屯將行。《一卷》6715

此例所見之師佐家屬，未從行亦未留原籍，而是另有差役，調往別處去了。“屯將行”指已集中到屯駐地點，將出發執行任務。

- (九) 陽子男山，年廿一，在本縣，嘉禾三年六月十一日物故。《一卷》5887
冉姪子男取，年廿四，在本縣，嘉禾元年十一月十日物故。《一卷》6023
碩妻汝，年五十五，在本縣，嘉禾二年十二月五日物故。《一卷》6070

此例為師佐家屬留原居未從行而死亡者。未攜家屬而單身出行之師佐，名籍中亦署明，如：

- (十) 觚慰佐永新雷奇，年廿三，單身，見。《一卷》6601
 乾鐵佐攸張元，年卅一，單身，見。《一卷》6602
 錢佐建寧黃取，年卅五，單身，見。《一卷》6604

在上述以戶為單位的師佐名籍登記的基礎上，吳簡中亦見以縣為單位的師佐統計，如：

- (十一) 右永新領師佐五人，妻子七人，合十二人。《一卷》5915
 凡吳昌領師佐十四人，弟妻子卅七人，合五十一人。《一卷》5908

此例所見為諸縣師佐及其家屬的合計數。由此亦知，當時師佐的流動是按縣為單位，由政府組織進行的。統計中亦見去、留人數的合計，如：

- (十二) 其師佐廿九人、妻子五十五人，今見，送。《一卷》5899
 其師佐十八人，母妻子廿五人，見，今送。《一卷》6671
 其十二人師佐，妻子十九人，見，今送。《一卷》6675

此例所見為諸縣出行師佐及其隨行家屬的合計。

- (十三) 其十六人弟妻子在本縣。《一卷》5978
 其兄弟妻子十六人在本縣。《一卷》5931
 其子二人在本縣。《一卷》5824

此例所見為諸縣師佐家屬留居原籍的合計。

上述所見數種登記統計方式，顯然已將師佐出行及其家屬去留情況掌控在政府手中，實現了對團體流動人口的監督。零散的流動人口，亦須履行嚴格的登記手續，如：

- (十四) 私學汝南陳穀，年廿，狀俗，白衣，居長沙縣□□《四卷》3982
 □□長沙李□，年廿，狀俗，白衣，居臨湘東鄉茗上丘，帥鄭各主。《四卷》3991
 私學長沙劉廣，年卅七，狀廣，白衣，居臨湘桑鄉□□丘，帥共……《四卷》4099
 私學長沙鄭狗，年□，狀狗，白衣，居臨湘樂鄉□□丘，帥黃……《四卷》5225

此例所見私學陳穀，原籍汝南郡，今居長沙縣，為客居無疑。其餘原籍長沙郡，現居臨湘，亦可能原籍為長沙郡某縣，非必為臨湘，所以才專門注明現居住地。由於零散流動人口不像團體流動者那麼容易掌控，故對其登記時專門設有對相貌氣質的描述，簡文所云“狀俗，白衣”之類即是，“狀”指外貌特徵，《說文》：“狀，犬形也。”段玉裁注：“引伸為形狀。”即指外貌形狀。最常見的“狀”即“俗”，猶今言普通的人，《三國志·蜀書·廖立傳》：“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俗”乃與“雅”相對，《晉書·武帝紀》：“謝

安可以鎮雅俗。”白衣，素色服飾，百姓著裝。狀客乃對零散流動人口採取的舉措，意在保障對其實行有效監督。

三、人口流失的防範

三國政局動盪，徭賦沉重，人口之流失叛亡頻頻發生，吳國亦然，《三國志·吳書·朱治傳》：“是時丹楊深地，頻有奸叛。”《三國志·吳書·賀邵傳》：“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邊遠地區尤甚，《三國志·吳書·華覈傳》：“交州諸郡，國之南土，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所以能穩定人心者，甚得當局重用，如《三國志·吳書·陳武傳》：“時諸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此時，防範人口流失已成為各國要務之一，吳國亦然，《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鳳皇三年，“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吳簡亦見以公開或秘密方式進行的人口流失調查，例如：

（十五）東鄉勸農掾殷達被書條例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為簿。輒料核鄉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戶民自代，謹列年紀，以（已）審，實，無有遺脫。若有他官所覺，達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荊保據。《嘉禾吏民田家荊·概況》

（十六）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被書條例州吏父兄子弟夥處人名年紀為簿。輒隱核鄉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聾聵病，一人夜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逸及隨本主在官，十二人細小，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給縣吏。隱核人名年紀相應，無有遺脫。若後為他官所覺，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荊保據。

《嘉禾吏民田家荊·概況》

料，核計、計量，《史記·周本紀》：“乃料民於太原”，《集解》引韋昭曰：“料，數也。”“料核”當指常規之核實調查。而“隱核”則為秘密調查。隱，隱蔽，《三國志·魏書·王脩傳》：“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癒乃去。”“隱核”指秘密核查，此做法見《晉書·何曾傳》：“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攬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迭代。”從以上二例亦可看出，當時對官吏尤其州吏以上家屬的控制尤為嚴謹，其家屬中如有人出走，即登記在案，製成叛走人員名籍，如：

（十七）縣吏毛章弟頌，年十五，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一卷》7865

縣吏毛車父青，年卅九，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一卷》7868

- 郡故吏史僦弟政，年十五，嘉禾四年四月十日叛走。《一卷》7882
 郡吏谷漢兄子□，年廿九，嘉禾三年二月十九日叛走。《一卷》7906
 軍故吏蒸□兄蓉，年卅九，嘉禾四年四月十八日叛走。《一卷》7903
 □□□文昭兄從，年卅八，嘉禾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叛走。《一卷》7906

以上所見為縣吏、郡吏、軍吏等官員家屬叛走的記錄，除直系親屬外，尚涉及兄弟之子弟等。簡文亦見諸鄉關於叛走人員的統計，如：

（十八）右□鄉郡縣吏兄弟合十五人，前後叛走□趣劉陽、吳昌、醴陵□

《一卷》7454

此例見叛走者趣之劉陽、吳昌、醴陵皆在吳國版圖中，故知所謂“叛走”指非法脫離原居地戶籍，非必盡指背叛國家。亦反映出當時叛走現象比較普遍，對官吏家屬之叛走進行登記，當起警示的作用，至於官吏本身是否連坐，尚待進一步考證，其對仕途的影響，應當是必然的。

綜上，吳國人口管理的重點是對居地人口的掌控，同時對流動人口也進行嚴密監督，為防範人口流失也採取相應措施。這些措施，對落實國家相應政策及發揮各類人員的專長發揮了積極作用。

關於長沙吳簡“刑”字解讀的意見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釋文探討之一

故宮博物院研究室 王素

內容提要 長沙吳簡特別是其中戶籍簡所見“刑手”、“刑足”中“刑”字的含義，國內外學術界頗多解讀，存在不同看法。本文對一些誤解進行了澄清，對不同看法進行了甄別。最後，基本贊同“刑”是肢體斷傷的解讀，認為：國家編制戶籍，是為了能夠有效控制課役人口，因而戶籍所記“殘疾病症”，都必須與能否免役有關。這些“殘疾病症”，雖然程度不同，但都應非常具體，都可以查驗和界定。因此，吳簡戶籍簡所見的“刑”，應是一種特指的“殘疾病症”。這種特指的“殘疾病症”的“刑”，應類似唐《三疾令》中的“一目盲”、“二目盲”的“盲”，“一肢廢”、“兩肢廢”的“廢”，有着可以查驗和界定的專門的含義。而像“創”這種詞語，含義模糊，難以查驗和界定，絕非國家編制戶籍可能採用的語言。

關鍵詞 長沙吳簡 “刑”字解讀 殘疾病症 戶籍與免役

長沙吳簡特別是其中戶籍簡所見“刑（左或右或兩）手”、“刑（左或右或兩）足”中“刑”字（該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寫作“刑”，祇有不到百分之五寫作“荆”）的含義，學術界頗多解讀，存在不同看法。本文的目的，在於討論和甄別這些解讀和看法。但在討論和甄別前，先須澄清一些誤解。

關於“刑”字解讀，最早提出問題者，是我與宋少華、羅新二先生聯名寫的《新收

穫》^①。那還是 1999 年，長沙吳簡出土未久。我們寫《新收穫》的目的，也僅是應國內外學術界的要求，介紹整理過程中的一些新發現，並借此提出問題。對於“刑”字也是如此。《新收穫》中，僅有兩處涉及“刑”字。第一處原文為：

“刑右手”和“刑右足”，亦不解其意。因為漢代已廢肉刑，則刑已被鈇刑代替。《史記·平準書》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集解》引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漢末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大臣名儒多欲恢復肉刑。但討論多次，均未通過。曹操當政時期，由於缺鐵，甚至改“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以木械趾，更難致殘（原注：見下）。則此處所見“刑右手”和“刑右足”，自然決非鈇刑（原刊 33 頁）。

此處意思非常清楚：首先就承認實際上“不解其意”。接着認為“漢代已廢肉刑”，直至漢末曹操當政時期也未恢復，實際上已表示不可能是肉刑。接着又認為也不可能是取代肉刑的鈇刑。第二處係針對“刑手”、“刑足”後常注“復”亦即免役一類問題，原文為：

至於刑手、刑足常常導致不得不免役，也足見此“刑”決非前述一般的鈇刑（原刊 34 頁）。

此處意思也非常清楚，也是認為“刑”不可能是取代肉刑的鈇刑。總之，這兩處談到“刑”字的文字，都清楚地表達了“刑”不是肉刑，也不是取代肉刑的鈇刑的見解。一言以蔽之，根本就不認為“刑”是刑罰。此後，我個人也還在一些文章中清楚地表達了“刑”不是刑罰的見解^②。

此後，2002 年，胡平生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對吳簡“刑”字的含義進行了解讀。^③我個人如前所說，由於對吳簡“刑”字“不解其意”，對有關吳簡“刑”字的解讀文章自然十分關注。胡平生先生這篇文章前面的“內容提要”分為二節，這裏先將第一節全文引錄如下：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有一個從並從刀的字，或寫作“刑”，因此也就被釋讀為“刑”，在簡文中以“刑右足”和“刑兩足”等文例出現，過去被解釋成是一種令人致殘的刑罰，但學者多有疑問。本文指出此字應當讀為“剗（創）”，並從形音義幾方面

① 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 年第 5 期，26—44 頁。此文被學術界簡稱為《新收穫》。

② 如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歷史文物》2004 年第 1 期，34 頁注[87]；《吳簡研究》第 1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38 頁注[92]。

③ 胡平生：《從走馬樓簡“刑（創）”字的釋讀談到戶籍的認定》，《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第 2 期，33—37 頁。

作了考證，指出簡文之“創”，可能有東吳方言的特點，並推想竹簡所舉“創”手足者可能是在對敵中受傷致殘並獲得爵位的退伍兵士，而不是舊說所認為的是受刑的罪犯（原刊 33 頁）。

讀罷此段，我首先對其中提到“刑”字“過去被解釋成是一種令人致殘的刑罰”，以及“舊說”認為刑手、刑足者“是受刑的罪犯”，感到十分驚訝。因為我一直非常留意收集有關吳簡的研究文章，特別是一直非常留意收集有關吳簡“刑”字的解讀文章。而這裏提到的“過去”的“解釋”，也就是所謂“舊說”，我居然茫然不知。然而，接着讀下去，就不僅僅是十分驚訝，可以說是大吃一驚了。這裏不嫌重複，將這篇文章正文有關二節全錄如下：

《新收穫》一文認定這是一種令人致殘的刑罰，說：“‘刑右手’和‘刑右足’，亦不解其意。因為漢代已廢肉刑，則刑已被鈇刑代替。……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漢末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大臣名儒多欲恢復肉刑。但討論多次，均未通過。曹操當政時期，由於缺鐵，甚至改‘定甲子科，犯左右趾者，易以木械’。以木械趾，更難致殘。則此處所見‘刑右手’和‘刑右足’，自然決非鈇刑。”又說：“至於刑手、刑足常常導致不得不免役，也足見此‘刑’決非前述一般的鈇刑。”（原刊 33、35 頁）

我們還對簡文記載的“創”手足者的情形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注意到那些手足有“創”者許多都是有爵的，如“公乘魯開”創左手，“公乘何著”創兩足，“公乘黃碩”創右足，“公乘何欽”創兩足，因而推想他們很可能是在對敵作戰中受傷致殘的兵士。正是由於有這樣的背景，他們被免除徭役才能夠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釋。要言之，他們可能是光榮的退伍軍人，而非《新收穫》所指認的受刑的罪犯（原刊 35 頁）。

原來，前引“內容提要”所說的“過去”的“解釋”，也就是所謂“舊說”，根據正文是指我們寫的《新收穫》。然而，《新收穫》談到“刑”字的兩處原文，已經一字不差地照錄如前。這裏所錄胡平生先生文章正文前一節，其引錄《新收穫》兩處原文，除節省“《史記·平準書》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集解》引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刖也。’”一段，“犯左右趾者”的“犯”下漏掉一個“鈇”字外，其餘也全同。顯然，《新收穫》既沒有“認定”刑手、刑足的“刑”是“一種令人致殘的刑罰”，也沒有“指認”刑手、刑足者是“受刑的罪犯”。我們感到：胡平生先生完全誤解了《新收穫》的看法。

按：在胡平生先生之前，2001年，徐世虹女士已有文章討論吳簡“刑”字。^①徐世虹女士雖然只採納了《新收穫》的一處見解，原文為：“誠如《新收穫》所云，此刑不是鈇刑，否則難以致殘而免役。”（原刊 527 頁）但她是正確理解了《新收穫》的本意的。因為她才是真正主張“肉刑說”的學者，她採納此處見解，是爲了說明此“刑”不是鈇刑，而是肉刑。在胡平生先生之後，于振波氏、張榮強氏、曹旅寧氏，也先後發表文章討論了吳簡“刑”字。于振波氏的文章最早發表於 2003 年^②。他在文章開頭就說：“走馬樓吳簡中有許多刑手、刑足的記錄，目前對這類記錄的解釋，主要有‘肉刑說’和‘作戰致殘說’兩種觀點。”然後注云：“‘肉刑說’參見徐世虹”前引文，“‘作戰致殘說’參見胡平生”前引文（均見原書 153 頁）。即將《新收穫》排除在“肉刑說”之外。接着，在評論“肉刑說”時，又特別指出：“其實，吳簡整理者最早撰文提到這些資料時，就對其中的刑手、刑足是否爲肉刑持懷疑態度。”然後全錄前引《新收穫》談到“刑”字的第一處原文（原書 158—159 頁）^③。張榮強氏的文章發表於 2004 年^④。他在文章第二節“‘刑手足’解”中特別指出：“王素等《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指出此‘刑’絕非肉刑或鈇刑。”（原刊 59 頁）曹旅寧氏的文章發表於 2006 年^⑤。他在進行學術史的追述時，談到“肉刑說”，只引了徐世虹女士的見解，沒有引《新收穫》的見解，也顯然沒有將《新收穫》歸入“肉刑說”（原刊 122 頁）。此外，還有日本學者福原啓郎先生，也發表文章討論了吳簡“刑”字^⑥。他的文章發表於 2004 年，其中節錄前引《新收穫》談到“刑”字的第一處原文，特別指出：《新收穫》云云，對於吳簡“刑”字，不僅“否定了是鈇刑的可能性”，實際上對“是否肉刑也予以了保留”（原刊 70 頁）。顯然，這幾位學者所引述的《新收穫》關於“刑”字的認識，才是《新收穫》的本意。

胡平生先生的這篇文章，對《新收穫》的誤解，實際上並不止這一處，其它就不多說了。^⑦這裏特別提出關於“刑”字解讀的這個誤解，是因爲這個誤解後來還在被胡平生先生

① 徐世虹：《走馬樓三國吳簡戶籍所見刑事制裁記錄》，《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523—529 頁。

②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刑手、刑足考——兼論歷史上禁止自殘的法律》，《簡帛研究》網站，2003 年 10 月 13 日首發；後改名《淺析走馬樓吳簡中“刑”的含義》，載《船山學刊》2004 年第 1 期，41—45 頁；又改名《苛政與自殘》，收入《走馬樓吳簡初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153—174 頁。此處根據《走馬樓吳簡初探》。

③ 按：于振波《2004 年以來的走馬樓吳簡研究》（《簡帛研究》網站，2006 年 10 月 16 日首發）亦稱：“〈關於‘刑’字〉《新收穫》最早提出問題，但沒有下結論。”

④ 張榮強：《說“罰估”——吳簡所見免役資料試釋》，《文物》2004 年第 12 期，57—65 頁。

⑤ 曹旅寧：《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刑手”、“刑足”考釋》，《廣東社會科學》2006 年第 1 期，122—125 頁。

⑥ 福原啓郎：《長沙吳簡に見る“刑”に関する初步的考察》，《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2 集，東京，2004，69—84 頁。

⑦ 譬如前引“內容提要”第二節開頭即說：“本文還對過去被列爲‘戶口簿籍’的走馬樓竹簡的性質進行了討論，他們大部分都不是戶籍。”（原刊 33 頁）正文中又說：“我們認爲：《新收穫》在‘戶口簿籍’一節所舉例簡大部分都不是戶籍，這樣歸類是錯誤的。”（原刊 36 頁）但“戶口簿籍”與“戶籍”不是一個概念應屬常識。我們當初特別統稱爲“戶口簿籍”，就是因爲“戶口簿籍”與“戶籍”不同，是一個較爲寬泛的概念，可以容納其它各類與戶籍有關的戶口帳簿。張榮強氏曾指出：“《新收穫》將戶籍以及這些戶口資料統稱之爲‘戶口名簿籍’，在當時不失爲審慎的做法。”見《說孫吳戶籍簡中的“事”》，《吳簡研究》第 1 輯，崇文書局，2004，217—218 頁注[3]。這才是《新收穫》的本意。

不斷重複，並且對一些初學者產生不應該的誤導。譬如胡平生先生 2004 年出版的一本介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的著作，引述我們整理的竹簡材料，均徑將“刑”改為“𠂔（創）”，如“𠂔（創）左手”、“𠂔（創）右足”等等，並說：“‘𠂔’字原整理者釋為‘刑’，王素《新收穫》一文認定‘這是一種令人致殘的刑罰’。”^①胡平生先生將自己誤解的話打上了引號，變成了《新收穫》的原話。又譬如楊小亮氏 2005 年發表的一篇解讀“刑”字的文章，先進行學術史介紹，說：“自走馬樓吳簡部分發表以來，有關戶籍簡中的‘刑手’、‘刑足’記錄的解釋文章雖不多，卻大致經歷了兩個討論階段。一、受‘刑’字字形的約束，解釋者或認為是‘肉刑’。二、打破字形束縛，認為‘刑’字應從他讀。”然後在第一個階段“受‘刑’字字形的約束，解釋者或認為是‘肉刑’”下加注云：“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 年第 5 期。認為此‘刑’非鈇刑（按：此處“鈇刑”之“鈇”，應為“鈇”之誤）。徐世虹《走馬樓三國吳簡戶籍所見刑事制裁記錄》，載《簡帛研究》2001。認為‘從受刑部分看，為人體的手足，應當屬於肉刑’。”^②將反對“肉刑說”的《新收穫》，與主張“肉刑說”的徐世虹女士，一併歸於了“肉刑說”類。這都更加違背了《新收穫》的本意。

在澄清了這些誤解之後，我們可以言歸正傳，談談“刑”字的解讀問題了。按照學術史的規範，《新收穫》之外，根據前述時間先後，應該先談徐世虹女士的解讀。但前面已經說明，徐世虹女士主張“肉刑說”，代表我們見解的《新收穫》一直反對“肉刑說”，這裏可以不再討論。這裏補充一點。2001 年，謝桂華先生也有文章涉及吳簡“刑”字^③。謝桂華先生認為：吳簡戶籍簡所見刑手、刑足之“刑”，與吳簡木牘所見“踵”、“聾”、“歐”等，均應為“殘疾病症”（原刊 557 頁）。這種解讀值得我們重視。接下來應該談談胡平生先生的解讀。關於胡平生先生對“刑”字的解讀，我一直是不同看法的。這裏結合前錄相關文字，重點談兩點：

（一）胡平生先生認為“刑（刑）”應讀為“𠂔（創）”，或者“刑（刑）”亦即“𠂔（創）”。先稱：“從字形而言，‘創’，《說文》本字作‘𠂔’，‘創’與‘𠂔’皆後起的形聲字。簡文此字左邊從‘並’，右旁從‘刀’。按，從‘並’乃從‘井’之訛變；從‘刀’與從‘刃’同意，兩種偏旁或互換。如劍，或從‘刃’。”後稱：“在走馬樓簡牘中，應視‘刑’為正寫，‘刑’為俗寫。‘刑’即《集韻》所列（創）異體‘刑’之變體。”（均見原刊 35 頁）按：首先，以“刑”為“創”，本身就違反字形學原理。因為據《說文》：

①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628 頁。

② 楊小亮：《走馬樓戶籍簡“刑（創）”字性質與成因簡析》，《出土文獻研究》第 7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6、151 頁。

③ 謝桂華：《中國出土魏晉以後漢文簡牘文書概述》，《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546—559 頁。

“刑”從“刀”部，而“創”從“刃”部^①。《類篇》等字書均同^②。部首不同，性質亦異，豈能隨意“互換”？否則乾脆合為一部，何苦多此一舉？其次，縱然“兩種偏旁或互換”，但從未見過“刑”字右“刀”換“刃”之例。況且所舉“劍”例根本無效。因為“劍”字本身在前引《說文》、《類篇》中就從“刃”部，並非“或從‘刃’”。最後，常見工具書《康熙字典》，實際上早已根據前代字書，解決了這一問題。譬如該書出“荆”字云：“[刑]古文。”又出“刑”字引《玉篇》云：“刑同荆。”又出“荆”字引《韻會》云：“《復古篇》云：‘刑從刀開，聲到也。荆從刀井，荆法也。今經史皆通作刑。’”^③此外，前引張榮強氏的文章也有正確的認識：“按刑罰之‘刑’，本字作‘荆’。”並引《說文·井部》云：“荆，罰舉也，從井，從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又引段玉裁《注》云：“按荆者，五荆也。凡荆罰、典荆、儀荆皆用之……俗字乃用刑為荆罰、典荆、儀荆字。”（均見原刊 60 頁）可見作為“荆”之本字的“荆”，原來也就是“刑”的本字。

（二）胡平生先生認為：有“公乘”爵的刑手、刑足者，是“對敵作戰中受傷致殘的兵士”和“光榮的退伍軍人”。按：首先，秦漢二十等爵，“公乘”為“民爵”，應為常識。如《續漢書·百官五》關內侯條注引劉劭《爵制》云：“吏民爵不得過公乘。”^④其次，即使魏晉（包括孫吳）以降，授爵情況更濫，“公乘”作為“民爵”，也沒有任何改變。^⑤據此，已可斷定：受“公乘”爵者，本就應該為“民”，與兵士、軍人根本就扯不上關係。譬如居延漢簡所見“戍卒梁國己氏高里公乘周市年卅”（50·29）、“河渠卒河東皮氏毋憂里公乘杜建年廿五”（140·15），等等，應理解為這些有公乘爵的民被征差為戍卒和河渠卒，而不是這些戍卒和河渠卒被授予公乘爵。又譬如長沙吳簡屢見“公乘恨年五歲”（2937 號）、“公乘見年六歲”（2895 號）、“公乘穆年十歲”（2561 號），等等。這些年僅五歲、六歲、十歲的有公乘爵的兒童，也顯然是民，而不是兵。前引于振波氏文章對已經出版的我們整理的《竹簡》[壹]^⑥進行統計，凡有刑手、刑足者 67 例，性別不明的 9 例除外，為：男性 49 例，年齡最小的祇有 5 歲，年齡最大的竟有 82 歲；女性 9 例，年齡最小的祇有 7 歲，年齡最大的也有 65 歲（前引原書 157 頁）。于振波氏曾經據此對胡平生先生的所謂“作

① 許慎：《說文解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宋本，1991，92、93 頁。

② 司馬光：《類篇》，中華書局重印本，2003，156、159 頁。

③ 張玉書等：《康熙字典·刀部》，中華書局重印本，2001，137 頁。

④ 關於秦漢二十等爵的研究論著甚多，最重要的為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制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1。另參河地重造《西嶋定生著〈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制の研究〉》，《史學雜誌》第 70 編第 11 號，1961，96—106 頁。

⑤ 參閱戶川貴行《魏晉南朝の民爵賜與について》，《東洋史論集》第 30 號，2003，61—85 頁。按：本文還在注[4]引述吳簡“公乘”資料，也認為是民爵。其實，《新收獲》早就指出：“‘公乘’為漢代民爵，漢簡戶口簿籍常見，可見吳承漢制。”（原刊 32 頁）。

⑥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上、中、下三冊，文物出版社，2003。

戰致殘說”進行了質疑：“這就需要回答，三國時期是否有女性參加作戰呢？”還要回答：“十歲以下的幼童及七八十歲的老人，是否也有能力參加作戰呢？”（均見原書 161—162 頁）不僅如此，在對公乘等民爵的濫授演變進行研究後，于振波氏還指出：“到了三國時期，孫吳政權竟然用公乘這種毫無價值的‘民爵’來獎賞‘光榮退伍’的傷殘軍人，……恐怕不符合史實。”（前引原書 163 頁）可見所謂“作戰致殘說”，是有悖常理和不符合史實的。

接下來再談談于振波氏、張榮強氏、曹旅寧氏、福原啓郎先生等對“刑”字的解讀。前引于振波氏的文章認為：“從漢唐到明清的歷朝法律中可知，某些貧苦百姓往往自殘肢體以‘避事’。”而長沙吳簡所謂“刑”，就是“貧苦百姓為逃避苛政的自殘行為。”（原書 174 頁）這種解讀雖有一定道理，但對於兒童刑手、刑足卻不具說服力。前引張榮強氏的文章認為：“‘刑’原意是斷頭，泛指截斷肢體、損毀肌膚。”（原刊 60 頁）前引曹旅寧氏的文章先據“刑”來源於“刑”，認為“‘刑’係指天生、原形之意，與漢律中的罷癯、天烏接近”；後據張家山漢簡“罷癯”包括戰爭致殘者，認為可以“基本認同‘殘疾病症’說，並部分認同‘作戰致殘’說”（原刊 122、125 頁）。前引福原啓郎先生的文章結合長沙吳簡戶籍簡還有“雀手”、“雀足”的記載，而“雀”意為“截”，是一種外傷，認為：“刑”應指一種與“雀”程度不同的外傷（原刊 79 頁）^①。其中，張榮強氏與福原啓郎先生的解讀沒有實質上的區別。我基本贊同張榮強氏與福原啓郎先生關於“刑”是肢體斷傷的解讀。

誠如張榮強氏所說：“國家編制戶籍的目的，是為了有效控制課役人口，掌握編戶承擔的賦役狀況。而傷殘的輕重程度，與所服官府課役多寡及是否享有給侍密切相關。”（原刊 60 頁）福原啓郎先生反對“肉刑說”時也曾斷言：“一言以蔽之，在為了確保勞役的戶籍、名籍一類簡牘中，是不會記載作為刑罰的肉刑的。”（原刊 79 頁）可見國家編制戶籍，是為了能夠有效控制課役人口，因而戶籍所記“殘疾病症”，都必須與能否免役有關。譬如唐代戶籍規定須記“三疾”。據《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九、疾三一引唐《三疾令》云：“戶令：諸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足無大拇指、禿瘡無發、久漏、下重、大癰腫之類，皆為殘疾。癡啞、侏儒、腰折、一肢廢，如此之類，皆為廢疾。癲狂、兩肢廢、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為篤疾。”列為“三疾”的各類“殘疾病症”，雖然程度不同，但都非

① 按：胡平生曾經指責福原啓郎“仍然將‘刑’解釋為肉刑的‘刑’”。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釋文校證》，原載《臺北第三屆簡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集》，2005 年，收入《出土文獻研究》第 7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3 頁注[13]。也是嚴重誤解。福原啓郎本是“肉刑說”的反對者。胡平生所謂福原啓郎云云，實際是福原啓郎對前引徐世虹“肉刑說”相關見解的學術史追述，並非福原啓郎自己的見解（見前引福原啓郎原刊 70 頁）。徐世虹原文為：“吳簡所見‘刑右足’、‘刑兩足’，不排除就是刑意義上的肉刑。”（見前引徐世虹原刊 529 頁）胡平生《〈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釋文校證》一文類似的誤解和曲解還有很多，參閱王素《關於長沙吳簡幾個專門辭彙的考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釋文探討之二》，《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258—269 頁。

常具體，都可以查驗和界定。因此，吳簡戶籍簡所見的“刑”，應是一種特指的“殘疾病症”。這種特指的“殘疾病症”的“刑”，應類似《三疾令》中的“一目盲”、“二目盲”的“盲”，“一肢廢”、“兩肢廢”的“廢”^①，有着可以查驗和界定的專門的含義。而像“創”這種詞語，含義模糊，難以查驗和界定，絕非國家編制戶籍可能採用的語言。

按：長沙吳簡特別是其中戶籍簡記載的“殘疾病症”種類繁多，除了上述刑手、刑足及雀手、雀足外，還有歐病、風病、癱病、瘖病、狂病、腫病、盲目、風矢病、腹心病等多種。關於這些“殘疾病症”，學術界也頗多解讀，但非常遺憾，絕大部分都是“望文生義”，推測臆想，牽強附會，令人難以認同。而真正的專家豬飼祥夫先生（專攻中國醫學史）反而出言謹慎，認為根據東漢《傷寒論》、《金匱要略》，這些“殘疾病症”，除了“腹心病”相當“心腹痛”外，其它都不能被確認。^②這種嚴肅負責的態度才是值得學習的。

① 按：長沙吳簡戶籍簡有與《三疾令》“一目盲”、“二目盲”相當的“盲左目”、“盲右目”、“盲兩目”，但未見與《三疾令》“一肢廢”、“兩肢廢”相當的“廢左肢”、“廢右肢”、“廢兩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② 豬飼祥夫：《〈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と〈傷寒論〉》，《日本醫史學雜誌》第51卷第2號，2005，312—313頁。

再說吳簡中的丘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于振波

內容提要 在吳簡中，里是居民區，丘是耕作區。吳簡中同類性質的單位統一用“丘”來命名，帶有明顯的行政烙印，這些“丘”的含義應該相當於“區”，而不是丘陵。吳簡中同姓名民戶與多丘並多鄉有對應關係的情況，與兩漢及隋唐時期相比，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不論是田家，還是繳納限米者，都不意味著他們的階級或階層有什麼不同，只是因為職業或特定徭役的關係，而使某些人具有了“特殊身份”，成為“非普通民戶”。那些擁有“特殊身份”的人，其實都來自於“普通民戶”，他們不是與“普通民戶”截然不同的封閉性的群體。“居在某丘”者不論是否擁有特殊身份，都是暫居在丘中的屯田者。

關鍵詞 丘 含義 對應關係 身份

關於吳簡中“丘”的性質，筆者曾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新公佈的吳簡資料，撰文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①此後，拙文引發了進一步爭論，也引起一些誤讀、曲解。不論是批評還是曲解，都促使筆者努力檢討自己的思路和結論。本文的撰寫，除了回應上述批評與曲解而外，主要是因為筆者又找到一些材料，這些材料在為筆者的觀點提供佐證的同時，也存在一些難解之處。各家對待這些材料的態度，往往是各取所需，有意無意間略過了那些對自己不利的内容。筆者感到，對這些材料的準確理解，有助於澄清“丘”的性質，因此，本文擬列出這些材料，並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思路，以期能夠拋磚引玉。

①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載《走馬樓吳簡初探》，文津出版社，2004，43—76頁。

一、“丘”義溯源

論者多將吳簡中的“丘”與長沙郡丘陵眾多的地理環境聯繫起來，認為這些“丘”都是自然形成的聚落，其命名在取義上或字數上也帶有自然特徵。^①

筆者已經指出：“具有人文色彩的丘名之大量存在，表明當時里、丘取名上並無差異；兩者都有根據自然狀態取名者，也有反映文化及社會觀念者。因此，從取名方式上分辨里與丘的差別，恐怕行不通。”^②這裏要補充說明的是，根據取名所用字數的多少來分辨里與丘的差別，也同樣行不通——秦漢魏晉時期有相當數量的郡、縣也是根據自然地貌或以單字命名的，難道可以說這些郡、縣也是自然聚落或剛剛從自然聚落轉變為行政單位嗎？

眾所周知，在長沙地區，自然地貌並不限於丘陵，還有眾多的河流、湖泊、陂塘、林地，而且每一種自然地貌的名稱也是多種多樣的。^③如果人們可能自由選擇居住地，那麼，本著趨利避害的原則，人們可以選擇平地或山間，也可以選擇林中或水畔，並無一定之規。可以斷言，在自然狀態下所形成的聚落，如果根據地理環境命名，絕不可能只限於“丘”。然而，我們從吳簡中看到的，除了“丘”之外，並無例外。如此整齊劃一以“丘”命名，如果沒有行政手段強力推行，恐怕是說不通的。可以說，吳簡中大量清一色的“丘”本身已足以說明，不論這些“丘”是居民區、耕作區，或是其它什麼性質的單位，從命名到管理，都早已不再是“自然”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先秦以來，“丘”字並非祇有“丘陵”一種含義。《王力古漢語字典》“丘”字條下列出四個義項：(1)小土山；(2)墳墓；(3)廢墟；(4)劃分土地的單位。^④這四個義項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太大變化。

“丘”的上述第四個義項後來引申為區域、區劃，與“區”同義。如《禮記·曲禮上》“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鄭玄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孔穎達疏：“禮不諱嫌名者，今謂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不諱。”^⑤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三“禹字

① 宋超：《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丘”與“里”》，《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77—85頁；《走馬樓吳簡中的“丘”與“里”再探討》，《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139—156頁。

②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46頁。

③ 參見《爾雅》和《廣雅》中“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各卷。

④ 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中華書局，2000，3頁。該書在“邱”字條下對“丘”與“邱”的音義加以辨析，指出：“依《說文》‘邱’應是地名用字，土山義應作‘丘’；但是今本先秦典籍一律作‘丘’，後世文獻‘丘’、‘邱’常互通，唯孔子名只作‘丘’。其實‘丘’、‘邱’音同義通，實同一詞。”（1468頁）

⑤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三《曲禮上》，《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86—87頁。

丘區”條則認為：“禹、宇二字，其音不別；丘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丘，亦古之遺音也。”^①

鑒於吳簡中同類性質的單位統一用“丘”來命名，筆者認為，在“某丘”或“某某丘”這一命名形式中，“某”或“某某”既可以是民間約定俗成的，也可以是官方確定的，取名的含義與字數都無關緊要，關鍵在於，“丘”字絕對是通過行政手段加上去的；同時，這些“丘”的含義應該相當於“區”，而不是丘陵。

二、丘與鄉、里

筆者認為吳簡中的“里”是居民區，是民戶編制單位，“丘”是耕作區，是土地區劃單位，二者分屬不同的行政系統。在討論“丘”與“里”的關係時，筆者曾引用秦漢名田制及唐代均田制的資料，旨在說明，“同一民戶的農田未必僅限於本里周邊地區，而是可能分散在本鄉乃至本縣的不同地方”，並指出吳簡中“同里居民未必都在同一丘中佔有土地，而在同一丘耕作的民戶，也可能屬於不同的里”。^②

侯旭東則將上述觀點引申爲：“于振波將丘視爲耕作區，而百姓交納各種賦稅時均注明所屬的‘丘’，若此，每戶百姓所耕作的土地應該全部集中在同一丘內才可如此運作，否則會滋生混亂。”進而又花費大量篇幅對他自己所引申出來的觀點加以反駁。^③

事實上，在吳簡中，很多民戶的田地分散在不同的丘中，對此，劉聰所編的《人名索引》早已爲我們提供了現成的答案，^④只要隨意翻閱一下，不難看到這些證據。筆者在撰寫《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一文時，當然也看到了這些證據。拙作之所以指出在秦漢名田制和唐代均田制下“同一民戶的農田未必僅限於本里周邊地區，而是可能分散在本鄉乃至本縣的不同地方”，只是爲了說明，在三國之前的秦漢時期和三國之後的唐代，也存在民戶土地分散在距離較遠的若干地區的情況，因此吳簡中很多民戶分散在不同丘中並不是三國時期特有的現象。拙作沒有對吳簡中的這一現象展開論述，其原因即在於此。顯然，侯旭東對拙作觀點所做的引申，已與拙作的基本觀點完全相反。

① 顏師古：《匡謬正俗》，《欽定四庫全書》第221冊《經部·小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文淵閣本影印，1987，卷三“禹字丘區”條，483頁。

②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62和72頁。

③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里”“丘”關係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學國際論壇”會議論文（北京，2006年11月5—6日）。對此，我曾在論壇小組討論中當面向侯旭東指出，會後又發Email給他，侯旭東在修改稿中已將我本人的觀點和他所引申的觀點加以區分。

④ 參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小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附錄二之《人名索引》，文物出版社，2003，1121—1149頁。

根據現有資料可知，漢代基層行政部門既存在與戶口有關的簿籍，也存在與田畝、宅園有關的簿籍。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①：

恆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雜案戶籍，副臧（藏）其廷。有移徙者，輒移戶及年籍爵細徙所，並封。

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令若丞、官嗇夫印封，獨別為府，封府戶……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財物，鄉部嗇夫身聽其令，皆參辨券書之，輒上如戶籍。有爭者，以券書從事；毋券書，勿聽。

漢代法律不允許一戶同時擁有多處住宅，卻允許一戶在本鄉乃至本縣的不同地方同時擁有多處田地。^②這些與戶口、宅園、田畝有關的各種簿籍，是長期基層行政實踐的成果，應該能夠保證避免出現混亂。

我想請教侯旭東，從我的觀點出發，怎麼就能推導出“每戶百姓所耕作的土地應該全部集中在同一丘內才可如此運作，否則會滋生混亂”這一結論？既然在三國之前或之後的時代民戶田地分散在不同地區並沒有“滋生混亂”，為什麼在三國時期的吳國民戶土地分散在各丘就會“滋生混亂”？事實上，恰恰是侯旭東對拙作觀點進行不適當的引申，才“滋生”出不必要的“混亂”！因此，他對他自己所引申出來的子虛烏有的觀點所做的反駁，完全是無的放矢，徒增紛擾。

如上所述，筆者已經指出，吳簡中“同里居民未必都在同一丘中佔有土地，而在同一丘耕作的民戶，也可能屬於不同的里”。侯旭東在這方面所做的論述（包括他所繪製的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的對應關係表），為我的上述觀點提供了具體的證據，在此，筆者應對他的勞動表示感謝！

不過，侯旭東所繪製的表好像遺漏了某些重要內容。侯旭東曾有一篇論文探討吳簡所見“鄉”與“鄉吏”，文中以圖、表的形式討論了丘與鄉的對應關係。^③而今，他在專門探討“丘”的性質時，卻對丘與鄉的關係避而不談。鑒於竹簡中多數與“丘”有關的記錄也同時提到了鄉，因此筆者認為，討論丘而忽略鄉，無論如何是不妥當的。

侯旭東所繪製的表中，就存在同一姓名與多丘、多鄉有對應關係的例子。筆者根據劉聰《地名索引·附錄》所列的鄉丘對應關係表^④，從侯旭東表中找到了一些這樣的例子，列為表1。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177—178頁。

②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58—62頁。

③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鄉”與“鄉吏”》，《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87—113頁。

④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附錄二之《地名索引·附錄》，1174—1175頁。

表1 吳簡同姓名民戶與多丘並多鄉對應關係表(一)

姓名	里	身份	丘	鄉	時間	簡號
張豫	谷陽	戶人				3978
		男子	石下	廣成	嘉禾五年	5.214
		男子	楊溪	西	嘉禾五年	5.750
鄧狗	平陽	戶人				2543
		男子	平陽	小武陵	嘉禾五年	5.141
		男子	榜	都	嘉禾五年	5.864
燕平	平陽	戶人				10480
		男子	壬丘	都鄉		4811
			下象		嘉禾二年	5559
		男子	莫		嘉禾五年	5.570
		男子	平支	小武陵		0.3

在《地名索引·附錄》中，劉聰大概出於穩妥的考慮，把“鄉與丘的明確對應”限定於簡文中鄉名與丘名相聯者，例如：

入小武陵鄉平陽丘潘□(6240)

入平鄉上和丘大男謝口嘉禾二年布一匹_三嘉禾二年九月廿九日燕弁付庫□(7360)

簡 6240 中的“小武陵鄉平陽丘”、簡 7360 中的“平鄉上和丘”，無疑存在著明確的鄉、丘對應關係。除了這種情況而外，筆者認為，在下列情況下，鄉名與丘名雖不相聯，也可視為有對應關係：

入桑鄉嘉禾二年稅米三斛青畢_三嘉禾二年十月十七日何丘縣吏謝芳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4870)

入西鄉嘉禾二年……_三嘉禾二年十月廿七日祖下丘男子廖鄧關邸閣董基付倉吏□(7459)

簡 4870 中何丘謝芳所繳納的是桑鄉嘉禾二年稅米，簡 7459 中祖下丘廖鄧所繳納的是西鄉嘉禾二年某種賦稅，因此可以認定，何丘與桑鄉、祖下丘與西鄉存在對應關係。按照這一思路，並參考劉聰《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附錄》，筆者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中找出同姓名民戶與多丘、多鄉有對應關係的例證，並根據原簡釋文補入租稅種類、時間兩項內容，繪製成表 2。

表2 吳簡同姓名民戶與多丘並多鄉對應關係表(二)

姓名	身份	丘	鄉	租稅種類	時間	簡號
鄧兒	縣吏?		小武陵	限米	嘉禾二年	3511
		三州	廣成	調布	嘉禾二年	8288
鄧盡	大男	復	廣成	稅米	嘉禾二年	7386
	故帥		平	限米	嘉禾二年	4838
鄧馬	男子	楊	廣成	布	嘉禾二年	7500
		楊	桑	梳米	嘉禾二年	4974
黃何	郡吏子弟	□	廣成	限米	嘉禾二年	7461
		盧	平			7067
黃元	男子	東扶	中	調布	嘉禾二年	7685
	州吏	柚	樂		嘉禾二年	2892
廖邨	男子	垣下	西		嘉禾二年	7459
	大男	邱下	平	稅米	嘉禾二年	4764
潘止		頃	樂	稅米	嘉禾二年	7472
		區李	小武陵	稅米	嘉禾二年	7293
		楊	廣成	稅米	嘉禾二年	7276
番張			廣成	布	嘉禾二年	8212
	男子	垣陵	廣成	布	嘉禾二年	7907
		於上	平	布	嘉禾三年	8253
謝芳	縣吏	何	桑	稅米	嘉禾二年	4870
		丈	小武陵	稅米	嘉禾二年	3245
謝奴	男子	單	西	稅米	嘉禾二年	3877
		露	桑	稅米	嘉禾二年	4476
		三州	廣成	稅米	嘉禾二年	7312
燕開		常樂				5872
		三州	廣成			4786
	新吏	柚	樂	限米准米	嘉禾二年	6000
		柚	樂			6190
	帥	柚	樂	布	嘉禾二年	6813

資料來源：《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

考慮到嘉禾吏民田家莧所反映的是嘉禾四年、五年的情況，而竹簡絕大部分例證屬於嘉禾二年，因此，表2沒有列出田家莧的資料。^①需要指出的是，同姓名者是否全都屬於同一人？這是一個有待求證的問題。例如，同在嘉禾二年的兩個黃元，無論身份還是所對應的丘或鄉，均不相同，是否屬於同一人？同在嘉禾二年的三個謝奴，同樣繳納稅米，身份可能相同，所對應的丘、鄉卻互不相同，對此又如何判斷？這些都頗不易證明。再如，同在嘉禾五年的兩個張豫，身份相同，所對應的丘、鄉各異，不能排除同一人的可能性；同在嘉禾五年的兩個鄧狗也是這種情況。還有烝闕，在簡6000和簡6813中身份雖不相同，但同在嘉禾二年，同樣與柏丘和樂鄉對應，似乎仍然屬於同一人。因此，兩表之例證中，與多丘、多鄉有對應關係的同姓名者確係同一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既然如此，那麼，如果丘是居住地，對於同時與兩個以上的鄉有對應關係的丘而言，固然可以說，該丘的不同居民分別隸屬於不同的鄉；問題是，如何解釋同一民戶與兩個以上的丘、進而與兩個以上的鄉有對應關係的現象呢？難道同一民戶可以有兩處甚至更多的住宅、進而可以有兩重甚至更多重的戶籍隸屬關係嗎？換句話說，難道當時的官府允許同一民戶的戶籍同時隸屬於不同的鄉嗎？看來，曾經對鄉、丘關係有較多研究的侯旭東，這次專門討論丘與里的關係而乾脆回避提及鄉與丘的關係，恐怕實在是為了避免“滋生混亂”、不得已而為之吧？然而，問題就擺在那裏，避而不談恐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吧？

筆者之所以把吳簡中的丘理解為耕作區，是因為：第一，不論是三國之前的兩漢，還是三國以後的隋唐，都存在這樣的情況：即同一民戶的農田未必僅限於本里周邊地區，而是可能分散在本鄉乃至本縣的不同地方。第二，里是有圍牆的封閉區域，其中祇有宅園，而不包括田地。^②因此，如果把丘理解為耕作區，就會發現，表1和表2所列出的這種同姓名民戶與多丘並多鄉有對應關係的情況，與兩漢及隋唐時期相比，既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也不難理解。

三、所謂“普通民戶”與“非普通民戶”

筆者認為，嘉禾吏民田家莧中所提到的“田家”，包括大男、大女、復民、士，以及州郡縣之吏卒和軍吏等等，這些人在本籍耕作，屬於“普通民戶”^③；而竹簡中所提到的繳

① 如果列出田家莧的資料，相關例證無疑會更多，但情況也會更複雜。

② 例如，在馬王堆帛書之《駐軍圖》上，“里”只是居民區，而不是行政區劃，不包括周圍的土地、河流、山林藪澤等。參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駐軍圖整理簡報》，《文物》1976年第1期，18—23頁。何雙全先生對里的佈局結構有較詳細的討論，參見何雙全《〈漢簡·鄉里志〉及其研究》，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145—235頁，相關論述見183—186頁。侯旭東也認為《駐軍圖》中的“里”為“聚落”。

③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所見佃田制度考略》，《走馬樓吳簡初探》，1—24頁，相關討論見2—3頁。

納“限米”者，包括州郡縣之吏卒、各種吏之子弟，以及佃卒、郵卒、衛士、私學、金民、叛士、還民等等，屬於流動性較強的人口，可能不在本籍，筆者稱其為“非普通民戶”或“特殊身份”^①。田家菑中的田家與繳納限米者的身份區別是很明顯的：田家以大男、大女佔大多數，州郡縣之吏卒等各種身份的人合計，所佔比例較小；而在繳納限米者中，幾乎全部屬於“特殊身份”，極少看到大男、大女。^②

有一個現象需要作出解釋，那就是，按照筆者的上述分析，州郡縣之吏卒既屬於“普通民戶”，又屬於“非普通民戶”（或“特殊身份”）。這樣的表述，看似前後矛盾，確實容易造成混亂，為此，筆者有必要加以澄清。

學術界一般認為，魏晉時期存在著具有特定含義、明顯不同於普通民籍的“吏戶”、“兵戶”（或“士家”）等特殊階層，這些階層的人處在官府的嚴格控制之下，父子相承，不得改業，婚配也只能限於同類。然而，在吳簡中，找不到這類特殊階層存在的證據。黎虎先生認為，吳簡中的“吏”與“民”一起編制於基層鄉里，同為國家編戶齊民，其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權利、義務相同，而“吏”稍優於普通編戶，並不存在獨立的“吏戶”。吳、蜀亡國時所獻簿籍中的“吏”數為全國總戶口數之內的吏員人數，並非另外之“吏戶”。吳簡中的“軍吏”屬於軍中下層吏員，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於普通農民和“卒”，而低於“士”、“復民”和“吏”，與劉宋時期的“大田武吏”無必然關係，“大田武吏”是地方武裝性質的“兵”而非“吏”。^③

筆者贊同黎虎先生的觀點，因此，在使用“非普通民戶”或“特殊身份”這類概念時，並不表示這些人具有類似“吏戶”、“兵戶”這種特殊階級或階層的身份，而只是說，因為職業或特定徭役的關係，而使他們具有了“特殊身份”，成為“非普通民戶”。

以漢代為例，郵人是一種專門職業，而不是定期服徭役。郵人的任期是終身的，甚至有可能是父子相繼的，一旦有人成為郵人，其本人將免服徭役，其家庭成員的戶籍也隨之發生變化，而有別於普通的民籍。但郵人在賦稅徭役方面所受的優待只是對他們從事郵人

①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中的“限米”與屯田》，《走馬樓吳簡初探》，25—42頁，相關討論見36—41頁。

②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繳納限米的記錄中，提到了“大男”或“男子”，例如：[私學限米州] [斛五斗] [口] [畢] [嘉禾二年五月十五日] [大男傅刀關] [口] (65)；入平鄉嘉禾二年郵卒限米六斛 [青畢] [嘉禾二年十月十七日] [桐丘監通關] [關董] [口] (4388)；入廣成鄉嘉禾二年郵卒限米廿五斛 [青畢] [嘉禾二年十月廿七日] [口] [山丘男子] [口] (4989)；[嘉禾二年鄉吏] [孫卿子] [弟限米一斛二斗] [青畢] [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恒坪丘男子] [李口關] [口] (6837)。侯旭東說這些記錄中所提到的“大男”、“男子”，就是“普通百姓”。眾所周知，“大男”、“男子”既可以表示身份，也可以單純表示性別，具體用法要根據上下文來確定。這些簡例中既然已經明確標明“私學限米”、“郵卒限米”、“子弟限米”，侯旭東仍然堅持說繳納限米者是“普通百姓”，恐怕並不妥當。參見侯旭東，《走馬樓竹簡的限米與田畝記錄——從“田”的類型與納“米”類型的關係說起》，《吳簡研究》第二輯，157—175頁。侯旭東此文對限米繳納者的身份與田畝類型的討論，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處，限於篇幅，容另文詳述。

③ 參見黎虎《“吏戶”獻疑——從長沙走馬樓吳簡談起》（《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53—68頁；《說“軍吏”——從長沙走馬樓吳簡談起》，《文史哲》2005年第2期，98—104頁）。

這一職役的補償，並不表明他們的身份地位與普通農民有什麼區別。^①再如，漢代的戍卒，他們在服役期間遠離家鄉而具有了“特殊身份”；根據居延漢簡，某些戍卒的家屬還隨同他們一起前往邊塞，作為“卒家屬”而成為“非普通民戶”。然而，不論是戍卒還是隨同他們前往邊塞的家屬，其身份地位與普通農民相比，也沒有什麼區別。

吳簡中的“非普通民戶”或“特殊身份”，也當如此理解。師佐可以應官府的需要，或留在本縣，或遠離家鄉。^②士卒或屯戍，或作戰，又何嘗不是如此？至於各種各樣的“吏”，成份非常複雜，職責不同，等級也有區別，更不可能一概而論。各種“吏”當中，有繳納“限米”者，也有繳納普通租稅者，更有享受某種程度優惠待遇者。他們會應官府的需要，而被安排從事各種工作，一部分人可能住在戶籍所在地，另一部分人則可能離開本籍去往較遠的地方。我們把這些職役性質的“吏”視為“特殊身份”，原因正在於此。具體到州郡縣之吏卒而言，由於他們所服的是特殊徭役或職役，官府會根據需要對他們加以調遣，有的留在本籍，與普通民戶一樣耕種土地，繳納賦稅；有的離開本籍，而從事屯田，繳納限米。^③因此，不論是田家，還是繳納限米者，都不意味著他們的階級或階層有什麼不同，只是因為職業或特定徭役的關係，而使某些人具有了“特殊身份”，成為“非普通民戶”。在吳簡戶籍文書中，我們看到，那些擁有“特殊身份”的人，其實都來自“普通民戶”，他們不是與“普通民戶”截然不同的封閉性的群體。

總之，筆者在使用“普通民戶”與“非普通民戶”或“特殊身份”這些概念時，並沒有賦予他們特定階級或階層的含義；筆者所說的“特殊身份”與通常所說的具有特定含義的“吏戶”、“兵戶”是不同的，這是需要加以說明的。

四、“居在某丘”者的身份

吳簡中關於“……取禾……居在某丘”這種形式的記錄，筆者在《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一文中曾有所討論。也許是因為行文過於簡略，以致引起誤讀，所以這裏只好不厭其煩，再加以說明。

下列這組簡文均提到“居在某丘”：

右平鄉□□□丘三人取禾三斛 居 在 □ 丘 (941)

大男□□二夫取禾一斛 居 在 □ 丘 (942)

① 參見于振波《秦漢時期的郵人》，《簡牘學研究》第4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28—33頁。

② 參見于振波《走馬樓吳簡師佐籍蓋測》，《漢學研究》24卷第2期，2006年12月，臺北。

③ 根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鄉是核查、登記並保存戶籍的最基層單位，因此，對於縣吏或縣卒而言，從此鄉到彼鄉，可視為離開本籍；對於郡吏或郡卒而言，從此縣到彼縣，可視為離開本籍；同樣，對於州吏或州卒而言，從此郡到彼郡，也可視為離開本籍。參見《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77頁。

郡口師口口二夫取禾一斛居在口丘(943)

新吏口口二夫取禾一斛口(949)

大女陳口取禾一斛居在口丘(958)

大男口口一夫取禾一斛居在口丘(963)

“大男”、“大女”多用作對普通百姓之成年人的稱呼，而“郡口師”、“新吏”等似乎不是普通民戶。“取禾”一詞當指從官府領取糧食或種子^①，而不是向官府繳納租稅。“一夫”、“二夫”這類用語也容易使人聯想到井田制或授田制。因此筆者認為，這類資料仍然與屯田有關：官府在組織屯田之初，向屯田者提供一些必需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屯田者與普通民戶不同，普通民戶的戶籍就在其現居住地，而屯田者的戶籍則可能不在現居住地。官府有可能將這些戶籍不在本地的屯田者安置在丘的廬舍中臨時居住。換句話說，普通民戶住在里中，戶籍由里進行管理，而流動性較強的人口則暫住於丘，在官府的管理下從事屯田。因此，不應因為丘中也有居住者，就混淆里與丘的區別。^②

至於這裏提到的“大男”、“大女”，即使他們確實是沒有“特殊身份”的普通農民，也不能排除他們臨時居住在丘中的可能性。據《魏略》載：

（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責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佔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③

以亭部、阡陌標明田地所在，漢代已經如此，曹魏仍然沿用，這或許是當時北方平原地區的普遍做法；長江流域水田農業區則可能用丘、町來標明田地所在。^④“廬”是田間臨時居所，先秦已然。楊沛貧困潦倒，在夕陽亭部開墾荒田，並臨時居住在瓜牛廬中，我們不應因此就把夕陽亭部視為居民區。明乎此，孫吳政權安排那些雖無“特殊身份”卻貧困無以為生的民戶從事屯田，在屯田之初，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生產、生活資料，也是可能的。

五、餘論

筆者在《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一文的第一部分，曾提出過幾個問題^⑤，迄今尚未見

①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學國際論壇”（北京，2006年11月5—6日）小組討論中，李均明先生提出，“禾”一般指未去殼的穀物，“取禾”可能是從官府領取種子。

② 上述議論被宋超誤讀為：凡“任吏”者都是暫居在丘中的流動性較強的人口。參見宋超，《走馬樓吳簡中的“丘”與“里”再探討》，《吳簡研究》第二輯，144頁。事實上，筆者從未對“任吏”者的居住地一概而論。

③ 《三國志》卷一五《魏書·賈逵傳》裴松之注引《魏略》，中華書局，1982，486—487頁。

④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62—68頁。

⑤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中的里與丘》，48—49頁。

到哪位批評者對這些提問有所回應，因此覺得有必要結合批評者的觀點在此重新提出。

宋超認為：

在三國孫吳這樣一個大亂後初定的特定時代，其社會基層組織雖然大體上沿襲了秦漢時代的鄉里制度，但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所謂鄉丘體制已經逐步取代傳統的鄉里制度，在經濟生活中日益發揮出極其重要的作用。^①

既然如此，那麼，里與丘在職能上就不應該存在太大差別。然而，大量戶籍以里為單位登記，卻無一例提到丘，當地官府如何對丘中的居民實施有效管理呢？另一方面，幾乎各種賦稅都以丘為單位徵收，提到里的例子極少，且存在疑問，那麼，里中居民的賦稅記錄都到哪裏去了？

侯旭東認為：

“丘”應是居住地，里目前看只是民戶戶籍的編制單位。

面對人口的持續增加，原有的空間顯然難以容納，出現新的聚落勢屬必然，至晚東漢後期出現“丘”是很正常的。而形成“里”與“丘”的複雜對應關係則是由於居民自由遷往新聚落，卻又要保持舊有鄉里名籍的結果。

居民遷往新的聚落，卻又要保持舊有鄉里名籍，導致里與丘之間呈現出複雜的對應關係（振波按：如本文表 1、表 2 所示，其實是一戶與多丘並多鄉的對應關係），這給基層行政部門造成的管理混亂暫且不論。按照侯旭東的上述說法，既然丘的居民仍然保持舊有的鄉里名籍，可以想見，當時里的民戶數量應該明顯多於丘，然而，吳簡所見，當時丘的田家數量與里的民戶數量之間並無太大區別。如果考慮到丘中除了“田家”之外，還有大量其它身份的耕作者，那麼，丘中耕作者的數量有可能多於里中民戶的數量。不知侯旭東如何解釋這一現象？

以上筆者對自己原來的觀點做了進一步論證。由於資料不足和筆者水平有限，本文的論證仍然存在種種缺點。例如，筆者關於“普通民戶”與“非普通民戶”或“特殊身份”的界定，是否符合吳簡所反映的史實，筆者並無把握；關於“居在某丘”者身份的認定，也有待直接材料的證明。這些問題，都關係到對“丘”的性質的認識，因此，筆者希望得到嚴肅的批評指正。

① 宋超：《走馬樓吳簡中的“丘”與“里”再探討》，《吳簡研究》第二輯，139—156 頁。

新發現的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遺址性質初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劉海旺

內容摘要 發現於 2003 年的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遺址經過近三年的考古發掘和勘探，在近百萬平方米的範圍內初步確定了十餘處漢代庭院及其在遺址的分佈特徵與大小範圍；通過對其中的四處庭院所進行的全部或部分考古發掘清理，對不同的庭院建築的佈局、房屋的數量、建築的方法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直觀瞭解；更主要的是所發現在田中建宅、宅間為田的佈局方式，第一次以直觀的形式展示了這一區域西漢末年農民的居住環境和條件等景象。從目前發現的情況判斷，該遺址屬於當時的農耕里聚遺存，其性質（包括定名等）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

關鍵詞 三楊莊 漢代遺址 庭院 農田 農耕里聚

2003 年夏，在河南省內黃縣南部的黃河故道中，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保存完整的西漢末期遺址（位於距現地表深約 5 米的黃河淤泥和淤沙層下）。經過近三年的考古發掘和勘探，目前在近 100 萬平方米的範圍內已有十餘處漢代庭院遺存得到確認。通過對其中四處的考古發掘，清理出包括屋舍瓦頂、牆體、水井、廁所、池塘、水溝、樹木等一些重要的漢代庭院遺跡，並出土了一批反映當時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狀況的遺物。特別是在庭院周圍發現了大面積的耕作農田遺跡，使得該遺址的性質初步得以確定：這是目前中國首次發現的保存較好的大規模漢代農業聚落（農業鄉里）遺址，是中國漢代農耕文明的全新考古發現。本文試圖結合有關的古代文獻記載和已經出土的漢代簡帛資料等，對遺址的性質進行稍為深入的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一、遺址的地理位置與發現經過

三楊莊漢代遺址位於河南省內黃縣梁莊鎮三楊莊北，東北距內黃縣城約 30 公里，東距濮陽市區約 20 公里，西距浚縣大伾山北魏大佛像約 21 公里。東南距現在的黃河河道最近約 45 公里。這裏地處黃河故道，沙土厚積，現地表沙崗連綿起伏，衛河的一條小支流——硝河（黃河改道南移後在原故道形成的河流）從三楊莊村北自西南向東北流經。硝河實際上在 20 年前已幾近斷流消失，只是原河道地勢仍稍為低窪，近年來甚至已被開闢為農田。因當地實施硝河疏浚工程，於 2003 年 6 月下旬先後在三楊莊村北的一段約 1500 米的開挖河道範圍內，在現地表下 4—5 米深處發現了三處漢代建築遺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 2003 年 7 月至 12 月對其中的西部兩處遺存進行了部分清理^①。清理後確認，這些遺存均為漢代庭院建築遺址，因黃河的一次大規模洪水泛濫而被整體淹沒。2005 年初，為就地保護已清理的兩處庭院建築遺存，當地水利部門在原開挖管道南約 50 米開挖新的管道，在新挖的管道內又發現了一處明顯的瓦頂建築遺存及部分漢代墓葬。2005 年 3 月至 12 月，河南省文物部門又對新發現的該處漢代庭院遺存進行了發掘清理，同時，對以前的第二處庭院遺存的尚未清理區域進行了補充清理。兩次清理面積總計約 9000 平方米，對四處庭院遺存進行了平面揭露（清理止於瓦屋頂坍塌原狀，尚未揭取瓦頂向下清理）（圖 1）^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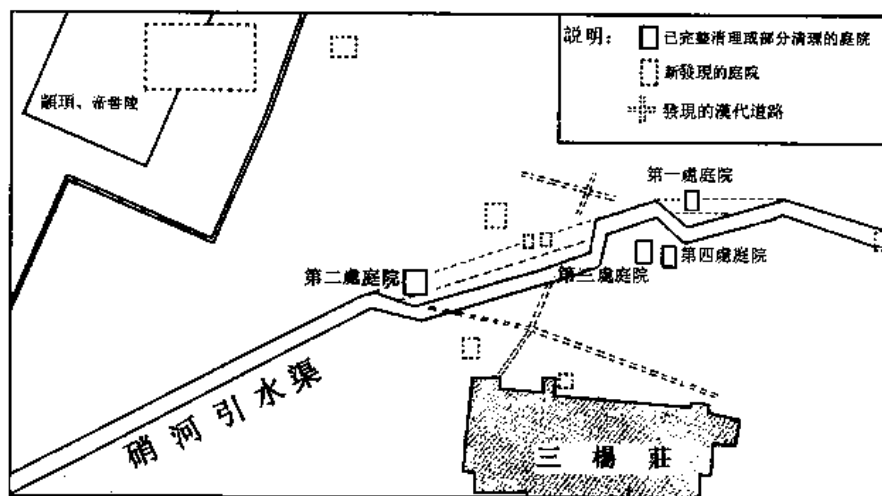


圖 1 三楊莊遺址遺蹟（部分）分佈示意圖（上為北）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內黃縣三楊莊漢代庭院遺址》，《考古》2004 年第 7 期。

② 劉海旺、朱汝生：《河南內黃三楊莊發掘多處西漢庭院民居》，《中國文物報》2006 年 1 月 13 日第二版；劉海旺、朱汝生：《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田宅遺存》，《2005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6。

根據文獻記載，在西漢末期以前，三楊莊遺址應當處於黃河北岸，黃澤東側，或緊瀕黃河與黃澤（《漢書·溝洫志》），黃河河道在這裏形成一個明顯的折彎點流向東北方向（圖2）。西漢末期及東漢以後黃河河道則從這裏東向流去（圖3），河道在此處較前平直並較為固定，遺址位於河道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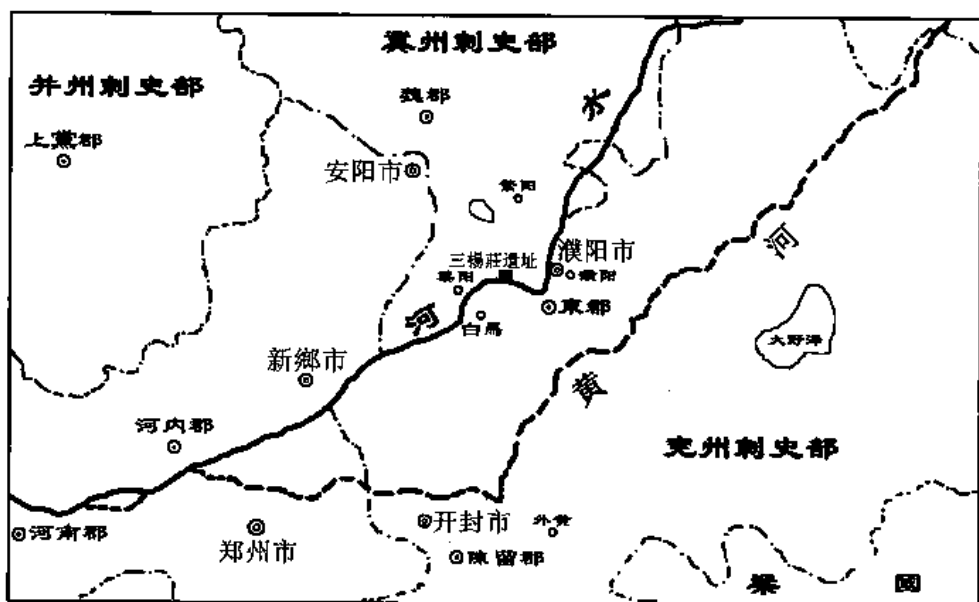


圖2 西漢時期的黃河與三楊莊遺址位置



圖3 東漢時期的黃河與三楊莊遺址位置

綜合遺址的整體發掘概況，並結合文獻記載，目前推測該遺址形成於王莽後期的一次大水災，後來又長時間處於黃河河道的範圍內，河床內的淤泥與淤沙越積越厚，所以最終形成遺址現在的保存狀況。

二、遺址的基本內涵

到目前為止，在已經過考古勘探的近百萬平方米範圍內，發現了十三處當時的庭院，發掘清理工作涉及了其中的四處，並且祇有二處得到了較為完整的揭露，發掘面積總計約 9000 平方米。這裏還需要說明的是，迄今祇是對這四處庭院遺存的坍塌原貌進行了平面揭露，尚未作單體或局部解剖工作。

第一處庭院遺存（已發掘清理的庭院編號按發掘時間先後排序）位於三楊莊村北約 500 米。僅對已暴露於河道內的庭院部分進行了初步發掘清理，清理面積 400 餘平方米。清理出的庭院建築遺跡有庭院圍牆，主房的瓦屋頂、牆體磚基礎、坍塌的夯土牆、未使用的板瓦和筒瓦、堆積在一起的建築廢棄物、拌泥池、灶、灰坑等。出土有一些輪盤、盆、甕等陶器。該庭院的其它部分目前仍未揭露。從已清理部分的情況看，應當為整座庭院（應為二進庭院）的第二進院落的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尚未使用的板瓦、筒瓦仍被整齊地疊擱在第二進院落的東部，結合主房東北側有一堆筒板瓦碎塊（為建築廢棄物），西南側有一小的拌泥池，推測，主房正在維修過程中洪水來臨，維修工作沒能完成。維修時的原狀得以保存下來。

第二處庭院遺存位於三楊莊村西北，東距第一處庭院遺存約 500 米。該處庭院遺存揭露較為完整，遺存總面積近 2000 平方米。庭院的平面佈局從南向北依次為：第一進院南牆及南大門、東廂房、西門房，第二進院南牆、南門、西廂房、正房等。南大門外偏東南約 5 米處有一眼水井及通往水井的用碎瓦鋪設的便道，水井壁係小磚（與房基用磚相同）圈砌，井口周圍用同樣的磚鋪砌成近方形的低井臺；水井的周圍分佈有較多的水槽、盆、甕等陶器（有的可能是因殘破而被廢棄），石磨等石器；水井西側約 5 米處，有一處特殊的編織遺存，遺跡四角為三塊磚擱成的四個分佈呈長方形的磚垛，磚垛內堆積有較多的長寬為 10×5 釐米的磚塊，磚塊的中部刻有可以纏繞（或細繩）的凹槽，故此，推測該處可能為編制竹席或草席類物品的遺跡。庭院西北角有一帶瓦頂的廁所。在庭院的西側，還清理出一座形狀規範的大致呈圓形的水池。在該庭院遺址內及南大門外、水池內，清理出有大石臼、小石臼、石磨、石滾等較大件石器，水槽、碗、甑、盆、罐、豆、甕、輪盤等陶器，釜、犁、斧、鐮、削、刀等鐵器；鐵鋌銅鏃；主房瓦頂東側還初步清理出帶有“益壽萬歲”字樣瓦當的筒瓦數件；二進院內西部地面清出三枚“貨泉”銅錢等。

第三處庭院遺存東北距第一處庭院遺存近 100 米。該庭院遺存揭露得也較為完整，面積大致為 30×30 平方米，庭院的平面佈局從南向北依次為：第一進院南牆及南大門、南廂房、東西兩側院牆，第二進院南牆、正房、院牆等。庭院東西牆外分別有一條寬窄、長度大致相同的水溝，西側水溝分為南北兩段。南門外西側有水井一眼，井壁的用磚及砌法與第二處庭院的水井相同，只是沒有磚鋪的井臺。庭院後附有一小的建築遺存，目前推測可能為廁所。庭院後（北側）還發現有兩排樹木殘存遺跡，從清理出的殘存的樹葉痕蹟初步判斷，多為桑樹，也有榆樹。南廂房版築夯土南牆（也為整個宅院的南牆，已經倒塌）的塊狀大小清晰可辨。特別是在該庭院的東西兩側水溝外和後面（北側）清理出了大面積排列整齊的、十分明晰的高低相間的田壟遺跡，田壟的走向有東西向的，但多為南北向，田壟的寬度大致在 60 釐米左右。有跡象表明，在南門外不大的活動場地南側，也為農田，且有一條不寬的南北向與外界相通的道路。在庭院內外的地面上散落有石碓、小石臼、陶甕、陶盆等遺物，同時還發現有半枚“貨泉”銅錢。

第四處庭院遺存位於第三處庭院遺存東 25 米，大致東西並列，尚未完整清理與揭露。平面佈局接近第三處庭院遺存，只是西側沒有邊溝，代之的是一行南北向的樹木；院後有一附屬遺跡，與第三處庭院同位置遺存類似，可能為廁所。廁所後也種植有樹木，並有一方形坑。

第三處庭院與第四處庭院之間沒有發現明顯的相通道路，為有田壟的農田，田地內發現有車轍痕蹟及牛蹄痕蹟，田壟高低相比不如第三處庭院西側和北側的清晰。

經過考古鑽探，在遺址內還發現有若干條漢代道路，這些道路根據寬窄，可分為主幹道（最寬約 14 米）、次幹道（寬約 5 米）、小道（庭院與主幹道相通的獨家使用的道路，寬約 3 米）。至於整個遺址的面積，估計在 10 平方公里以上。

另外，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在原發掘區（第二處庭院）的西北約 500 米處經考古勘探新發現的面積超過 1 萬平方米的建築遺存，該遺存究係何性質的建築，尚有待於進一步工作。

三、遺址的性質探討

1. 遺址的定名

從目前遺址的發現情況看，該處遺址的性質無疑是一處農業類的漢代遺址。但遺址定什麼名稱，也就是它最確切的性質是什麼，是否是聚落？

“聚，會也。一曰：邑落曰聚。”（《說文解字》）段注中引文：“平帝紀，立學官；

郡國曰學，縣、道、邑、侯曰校，鄉曰庠，聚曰序。張晏曰，聚，邑落名也。韋昭曰：小鄉曰聚。按，邑落，謂邑中村落。”

西漢哀帝時，關於黃河治理問題，待詔賈讓曾上奏：“（戰國時期，黃河水）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堤，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漢書·溝洫志》）

由上述記述看，稱為聚落也應該符合當時的人們對此類居址的認知。所以，從學術意義上講，將三楊莊遺址命名為“漢代聚落遺址”是比較準確的。只是該區域戰國時期的聚落內室宅的空間分佈形式與西漢晚期的廬舍空間分佈形式是否相同，尚難以斷定。而且，聚落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學術性較強，一般人較難理解。在考古學上一般稱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的範圍較小的居住遺址為聚落。

實際上，三楊莊遺址是一個古代農耕類居住遺址。是否可稱之為“村落”呢？村，在小篆中寫作“邨”，為屯聚之意。在三國初期，已經出現“村落”一詞。

鄭渾（三國曹魏時期，河南開封人）為魏郡太守時，“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三國志·鄭渾傳》）。從這段文字的記述看，當時魏郡的村落在鄭渾的指導下，規劃一致，排列有序，已經具有後期村莊的雛形，村中農民居住也已較為集中，不散不亂。

而西漢時也屬於魏郡的三楊莊遺址內的農民居住庭院的空間分佈特點是有序而散，甚至可以稱為星羅棋佈，顯然與上述三國時魏郡的村落區別明顯，也與漢代以後村落內農民居室宅院的相接相鄰的空間分佈形式不同。所以，稱三楊莊遺址為“村落”，概念上似乎不夠貼切。

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為確切的名稱來命名三楊莊遺址？也許，我們可以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的農業氏族聚落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尋找到答案。

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氏族或以農業為主的氏族聚居點，應當是聚族而居。隨著人口的增多，聚居區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整個氏族（包括所有的家庭）居住於一些單一的、僅供居住的小的區域的方式始終未變，即氏族的居住區是與農作物種植區相分離的；每一個家庭的居室之間相距很近或毗鄰，沒有形成一個個單獨而相對隔離封閉的小的空間。當農業氏族逐漸擴展並分解為一個個大的家族後，到春秋戰國之時（可能早到夏商），在聚族而居的聚落基礎上，流行著一種新的社會組織管理形式——閭里制度。當然，隨著手工業和商業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並發展壯大，這些行業的從業者逐漸聚集於城邑（國家各級治理機構所在地）之中，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居住形式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城邑內也實行閭里制度，但內涵明顯不同於純農業耕作區。西漢建立後，國家遠離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混戰狀況，使

城邑內的閭里制度與純農業耕作區的里制區別更加明顯。

西漢繼承戰國及秦制，施行郡、縣、鄉、亭、里的行政管理體系，里是最基層的社會組織。

里，也稱里閭或閭里，有時也稱閭伍、閭巷、閭閭、閭井等，泛指鄉里。里，存在城邑內的里，也有農耕區的里。究竟哪一種是農業耕作區的名稱，值得研究。

不過，在文獻中出現有一種名稱。漢武帝時，“（汲）黯恥爲令，稱疾歸田里”（《漢書·汲黯傳》）。“田里”這一組合詞在漢代文獻中的出現並不是孤例。

所以，三楊莊漢代遺址是否可以稱爲“田里遺址”？

2. 遺址內庭院等遺跡的佈局

既爲田里遺址，那麼，每一里面積會有多大？每一里會有多少戶人家？

《周禮·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周禮·地官·遂人》也說：“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可見，春秋戰國時期規定，一般一個閭或里由二十五家組成。這是與井田制（歷史記載，夏商周均實行井田制）這種分配土地制度相適應，每家（戶）一般種田一百畝。當然，還有一里五十家、八十家、一百家等不同的記載。這裏面是否有城邑內閭里與田野內閭里（田里）的差別，尚需進一步研究。

漢代對里的管理也繼承了秦代的制度，實行編戶齊民，什伍制，即五家爲伍，十家爲什。從江陵鳳凰山約屬於漢景帝初年的十號墓出土的漢簡記載的情況看，所記載農戶聚居的鄭里也是二十五戶爲一里^①。東漢明、章之間的侍廷里也是二十五戶爲一里^②。鄭里和侍廷里無疑屬於純農業里，即田里。所以，是否可以推測當時的田里一里二十五戶較爲普遍？但二十五戶在里中的居住、分佈形式不清楚。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鄭里和侍廷里屬於丘陵地區，三楊莊遺址則屬於平原地區，里內居民庭院的空間分佈形式會有所不同。

從內黃三楊莊遺址目前的發現看，已經發現了十餘處漢代的庭院，也就是說十餘戶，遺址內的“一里”究竟有多少戶，現在仍在勘探之中。

就目前的發現來看，這些庭院均經過統一的規定或約定俗成，它們均爲坐北朝南，方向一致（南偏西約10°）；均爲二進院佈局，佔地面積大致相同；前後左右相距的距離有遠有近，最近的相距爲25米，遠的可能超過500米，相互之間均被農田相隔。五家爲鄰，應當可信，但這裏的“鄰”，不是緊鄰，而是近鄰。每家的庭院均在自己的田中。由這些發

① 《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6期，41—61頁；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文物》1974年第6期，66—77頁；弘一：《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簡牘初探》，《文物》1974年第6期，78—84頁；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49—63頁。

② 黃士斌：《河南偃師縣發現漢代買田約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17—20頁；寧可：《關於〈漢侍廷里父老儼買田約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21—27頁；邢義田：《漢代的父老、儼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儼買田約束石券〉讀記》，《城市與鄉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27—51頁。

現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若干（二十五戶）農戶組成的里，對每家的庭院的大小、佈局、朝向等均有大致統一的規定，而且，每家的庭院均建在自己的田中。與鄰居的相鄰是田地的相鄰相接，庭院之間具有相當的距離。里中的農田由較寬的公用大道（阡陌）分隔成社區，田中的各家庭院均有單獨的小路與大道相接。這就是當時的這一區域田里空間分佈方面的大致景象。

3. 遺址庭院內居民的身份

如果從三楊莊遺址目前發掘的庭院情況看，四處庭院具有許多方面的相同性，例如：均為封閉型的兩進院；坐北朝南；佔地面積大致相當（第二處庭院西側有較大面積的水塘，較為特殊）。如果加上門前的活動場地，面積在近 2000 平方米；主房屋頂全部用瓦，牆基砌磚，牆體為夯土或土坯築成；門前有一定面積的活動場地，各有自己的水井；院後有廁所；庭院周圍植樹，特別是庭院後面（北面）植的樹更多。庭院外就是自己的農田。

當然，這四處庭院又存在一些差異性。從庭院的建築品質、屋舍的數量等方面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如第二處，建築品質較高，佈局較為複雜，有正房（主房或堂屋）、西廂房、東廂房、西門房四座屋舍，正房樑柱承重結構，可能為三開間，其中的東廂房為廚房，西門房可能多用於堆放農具等用具物品；另一類如第三處，佈局較簡單，僅有主房（堂屋）、南廂房兩座房舍，主房沒有使用立柱，係牆體承重，為兩開間，南廂房為廚房，可能兼作它用。前一類目前是孤例，其它三處均屬後一類。另外，除第二處庭院主房（堂屋）坐北朝南，且使用有“益壽萬歲”瓦當外，其餘三處庭院主房可能坐西朝東，不見使用瓦當。

關於漢代的民居（有人稱之為小康之家）形式，漢初的晁錯曾談及：“營邑立城，制里割宅，返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漢書·袁盎晁錯傳》）可見，“一堂二內”是漢代平民的典型住宅。《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封守”中也曾提到“士伍”的房屋為“一字二內，各有戶，內室皆瓦蓋，本大具。”其中的“一字”即堂屋一，“二內”即臥室二間。《封診式》中另一處“穴盜”中亦記有“一堂二內”。不同者是“二內”中有一為正房，正房東有側室，有門相通，而堂前小堂在側房之後。這樣其平面即成曲尺形^①。這也是對於秦漢時期“一堂二內”的一般理解，堂即堂屋，內即臥室，一所堂屋，兩間臥室。

三楊莊遺址內發現的第二類庭院（第一、第三、第四處庭院）居址與上述文獻記載較為吻合。所以，綜合各種跡象分析，這些庭院的居住者應為當時普通的農民。他們就是小康之家。

①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92 頁。

第二處庭院內的居住者可能身份較高，但高到什麼程度，目前尚難以斷言。

那麼，每處庭院一般能居住多少人口呢？從各庭院的房間數量、大小等基本情況分析，除第二處宅院能夠居住超過五口以上的家庭成員外，其它的宅院最多能夠容納 5 口人。這又與文獻記載相吻合。

據文獻記載，秦漢時期的家庭多為五口之家。秦自商鞅變法以後，強制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史記·商君列傳》）這就形成了人口較少的核心家庭結構。漢承秦制，西漢初年晁錯上書中曾提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漢書·食貨志》）”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墓出土一批漢初文景年間的簡牘中，記述的一里全部二十五家，除“其奴”一家口數模糊外，其餘二十四家共計一百一十二口，平均每家 4.67 人；每家少則一二口，多則七八口，但都是特例，最常見的卻是三至六口，不論家數或口數皆幾佔全部家、口數的 80%^①。西漢晚期的全國民戶是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六十二（12 233 062），人口是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59 594 978）（《漢書·地理志》）；如果加以平均，則每戶約為 4.87 口人。東漢中期全國的民戶是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9 698 630），人口是四千九百一十五萬零二百二十（49 150 220）（《續漢書·郡國志》）；若加以平均，則每戶約為 5.07 口人。可見兩漢時期每個平民家庭通常多為五口人，一般為一對夫婦帶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

四、結語

三楊莊遺址是我國首次考古發現的真正意義上的漢代農耕類居住（田里）遺址，保存較為完好，面積廣大。遺址無疑包含了漢代中原地區當時作為社會基礎的單個家庭的居住環境與條件、房屋建築技術及思想意識、農業生產、社會生活等多方面的新穎的實物信息，同時，也包含有由這些家庭組成的社會最基層的管理組織——里的組成、規劃、佈局、土地分配、耕作制度等方面豐富的信息，因而，該遺址具有多學科、多方面的研究價值。同時，也需要採取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揭示和研究。

由於考古發掘工作還遠未結束，發掘者目前對遺址的認識也只能是初步的、不系統的，有些甚至是錯誤的，需要在以後的工作中進行糾正。謹以此文拋磚引玉，以求教於大方之家，能夠對遺址今後的工作給與及時的指導、啟發和幫助。

① 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文物》1974 年第 6 期，66—77 頁。

追悼謝桂華先生^①

[日]京都大學 永田英正

6月12日早晨8時剛過，富谷至打來電話，富谷來電話極為尋常，但往往是在中午，早晨這麼早時間打電話來，是從來沒有的，恐有什麼不祥之事，懷著忐忑不安，接著電話得知今日凌晨謝桂華逝世。

曾經聽說過，謝桂華在2003年末因病入院，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後出院，在家邊休息邊工作，為此甚為安心，因為我本身也有同樣入院的經歷。今聽了訃告，一時不能相信，據富谷告知，其女兒謝向斌還在大阪，隨即打去電話，接電話的是向斌的丈夫陳波，即向他表示，對謝桂華逝世深表哀悼，但是對他的親生女兒，不知怎樣表示哀悼，是否在電話中，確切地表達了我的哀悼之意，真費盡了用詞。回想當時打完電話，頓時一種寂虛感涌上心頭。在中國眾多學者中，我與他特別意氣相投，且有多年交往，對尊敬的友人謝桂華早逝我不能不寫悼詞。

謝桂華1938年出生於湖南省新化縣，1963年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是一生從事研究的學者，其專攻是秦漢史，但從事秦漢簡牘的研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等，在中國可以說是第一線研究者。

謝桂華的秦漢簡牘研究成果主要是整理出版新發現的簡牘及其釋文。從事內容及主要出版物有：

整理1972—1974年新發現的居延漢簡（約二萬枚），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合著，文物出版社，1990）、《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合著，中華書局，1994）。

^① 原載《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七號，2006年11月。

還有從事整理 1993 年江蘇省尹灣漢墓簡牘（木牘三十三枚，竹簡一百三十三枚），並有高質量的成果《尹灣漢墓簡牘》出版（合著，中華書局，1997）。

這些工作，雖說是簡牘研究的基礎部分，但必須具備深厚學術知識與經驗才有可能幹好，並非任何人都可勝任的，謝桂華是出色地履行了重任。尤其值得一說的是，尹灣漢墓簡牘，出土後僅用了四年時間，即出版了《尹灣漢墓簡牘》，使新史料及時成為全世界研究學者的共同財富。當然，有鑒於出土簡牘數量問題，及其保存狀態等理由，如果想一想，居延新簡從出土到公佈出版花了十六年至二十年時間，張家山漢墓竹簡花了十八年時間，可以比較，尹灣漢墓簡的公佈出版是何等迅速，對此不能不說是出於謝桂華的優秀本質，同時也必須指出，他能正視各方研究者希望新出土資料早日公佈，體現了謝桂華作為研究者的基本素養，對此向他表示敬意。

如前所述，謝桂華論著有居延漢簡、尹灣漢墓簡等研究，特別想要記一筆的是，《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合著，文物出版社，1987，以下簡稱《合校本》）即為 1930 年—1931 年出土約一萬枚居延舊簡釋文，可以認為，是至今為止最好的釋文。

衆所周知，居延舊簡出土以來，直至近年，尚有多數關連出版物問世，例如，居延漢簡研究先驅者勞榦釋文，為最基本的出版物。但其版本有三種：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商務印書館鉛印本（1949）、臺灣重訂本（1960）。還有《圖版》（1957）。另外，北京出版《甲編》（1959）及《甲乙編》（1960）。出版物多多益善，但也有使人感到不便之處，這不便即是，居延漢簡排列順序不統一，各出版者均自以為是，例如，單就勞榦釋文而言，石印本和鉛印本排列雖為一樣，而與《圖版》排列不同，與《圖版》排列可以對應的僅是臺北重訂本。又，北京出版《甲編》、《甲乙編》，均是按居延漢簡簡號順序排列，此是與前述各出版物不同之處。可以想見，各種出版物與木簡照片不容易對照，而《合校本》，首先以《甲乙編》為基礎，列出與《圖版》的對照表，使各出版物相互對照成為可能，同時將《甲乙編》再校釋文附後，列出《甲乙編》誤釋及其與《甲編》、《考釋》異同，並詳加注記，為使利用者感到方便。可以說《合校本》是居延舊簡釋文集大成者，可以說是至今為止最好校本，似不為過言。不能不說參加《合校本》工作的謝桂華為漢簡研究事業發展，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可以認為不容易察覺到《合校本》出版所含苦勞與努力，而我即是以此為契機，與謝桂華實現初次晤面。

我與謝桂華初次見面時，他是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日本學術振興會交換學者，來訪關西大學期間，1989 年 5 月 29 日，大庭脩邀請我，是否來邊吃飯邊談話呢，我接受邀請，十一時左右，來到大庭脩研究室，在裏邊的一間房間裏，看著《圖版》正用筆寫著的謝桂華，一見到我，滿面笑容，伸出雙手歡迎我，此景象，至今深印腦中。

用完午飯後，再請當時是關西大學博士生大原良通擔任翻譯，繼續交談。話要說到以

前去，我知道謝桂華的名字，如前述《合校本》之外，是另有人告訴我，我的拙文《居延漢簡集成——破城子出土簡》中譯本刊載於《簡牘研究譯叢》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自然而然，話題就從《居延漢簡集成》開始，漸漸地談到居延漢簡綴合問題。謝桂華長期從事居延漢簡研究，十分熟悉漢簡，而且對我拙論《集成》詳加推敲是毋庸置疑的。可以理解，他也在從事漢簡集成，也考慮如何將斷簡零墨加以綴合後盡可能使其恢復到原來狀態。他翻開《圖版》，開始具體說明，而且有關綴合問題，並非是單純地直接將二枚斷簡綴合，還有這樣的情況，斷簡之間尚有數段缺欠。還談到木簡形狀、斷裂狀況、記載內容、筆蹟等，他所說均為我所理解同意。我自身在集成研究過程中，考慮到綴合研究問題，但是並沒有多大建樹，抱著先賢已將研究做到了盡頭之緣故，不得不坦率地承認，此是過於單純的觀點，我坦然直言，對他深感欽佩，同時也大為吃驚，聽著他的解說，我感到在謝桂華腦中居延漢簡大概能全部記住背誦。

原先打算與謝桂華進行一小時晤談，由於極有內涵加上雙方辯論，把時間都忘記了，看看手錶已經過了四點，再看看大原良通已經相當累了，想了想今天只能到此為止了，即向二位表示敬意之後，離開了關西大學，在歸途的電車中，反復回想交談內容，興奮得不能自禁，這些景象至今仍深印腦海。

再要敘述的是，在與謝桂華晤談六天後，即6月4日謝桂華接到了回國通知，定於6月20日回國，飛機下午3點30分起飛，我於下午一時抵伊丹國際機場時，大庭脩先生夫婦、關西大學西川和男、大原良通已經在場，對看上去有點疲勞的謝桂華，大家熱情鼓勵，為他送行，此景象至今不能忘懷。

任何事情都有開始也有終結，此後，我在日本、在中國曾有幾次晤見謝桂華，最後一次是2000年12月，是在京都女子大學研究室，他和陳波一起來訪，邀請我參加2001年在長沙舉行的“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此次會議的負責人之一，儘早將邀請書及時送到我手中，我接受了邀請，表示決定出席研討會，可是翌年4月突然身體不好，使我不得不取消原定計劃，真是對不起謝桂華。等我身體康健後，想再當面致歉，但已經無法實現了，此成為我心中的唯一遺憾。

享年六十八歲 祈念冥福 合掌

2006年8月6日記

（陳波 譯）

奮鬥不止

——憶謝桂華先生二、三事

中國文物研究所 李均明

三十年前即與謝桂華先生有工作交往，先生那開朗的性格、平易近人的姿態、談吐中顯露的湖南新化鄉音時時浮現腦際，對其不畏艱辛的品質印象尤深：先生幼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罹病，經歷坎坷，無論處境有多艱難，卻都能樂觀地面對，並無時不在執著地追求事業，從不言棄，給後人展現了一道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人生軌迹。

勇於開局。大學畢業後，先生一直從事歷史研究工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大家採用的是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要花不少時間參與各項政治運動，亦遭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至1978年間，在國家文物局的協調組織下，由甘肅省博物館（後分為甘肅省博物館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文物研究所前身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有關人員組成整理小組，聯合整理1972年以來新出土的居延漢簡，歷史所即派謝先生來參加，從此我們有了更密切的交往。謝桂華先生固然有著深厚的歷史學功底，但接觸出土文獻整理工作尚屬首次，困難是不言而喻的，曾有人退縮，先生卻毅然開局，首先以謙虛的態度再學習，反復閱讀了王國維、羅振玉、勞幹、嚴耕望、陳直、陳夢家等前輩有關簡牘整理與研究方面的著作，在豪亮等先生的指導下，邊幹邊學，綜合整理能力很快得以提高，於是順利完成了居延新簡破城子與第四隧部分的釋文工作。此後，我們還一起對20世紀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逐字進行核對，校正了原釋文及綴合方面的不少錯漏，並在發表《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補正舉隅》、《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質疑》、《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評議》等論文之後，又發表了《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一書，以方便同仁

使用。多年來，此書作為可信的簡牘史料，曾被讀者廣泛引用。

協作典範。1995 年間，謝先生接受整理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出土簡牘的任務，立即和連雲港市博物館館長劉洪石先生一起找裘錫圭先生及我，共同商議整理事宜，成立了整理小組。整理過程中，大家常常針對個別字的釋文進行充分的討論乃至激烈的辯論，氣氛卻始終和諧，從不傷和氣。有些木牘字體細小，肉眼極難辨認，整理組便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文博學院和物理二系的專家，組裝了紅外線閱讀儀，又將木牘原件從連雲港運抵上海，用紅外線閱讀儀逐件釋讀，結果在已定稿的基礎上又訂正補充了七百多字。為了提高圖版的質量，又專門請浙江省博物館的攝影師拍攝高清晰度的照片。在謝先生提議下，出版方中華書局的李解民先生不僅作為編輯，亦作為整理組成員參加具體的整理，現場解決許多問題。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整理組成員之一的劉軍女士還騰出一處私宅免費供連雲港來京人員住宿兼作工作室。上述作為，都是謝先生運作協調的結果。通過這次大協作，使尹灣漢墓簡牘能在兩年時間內高質量地完成從整理到出版的全過程，不愧為簡牘整理史上的奇跡，日本著名學者大庭脩先生曾撰文稱此次整理方式為“尹灣模式”，此模式充分體現了謝先生很強的組織協調能力及大家的通力合作。上述能力與模式在近年整理額濟納漢簡時再次被應用：額濟納漢簡數量並不多，為保證質量，謝先生仍堅持採用大協作方式，由內蒙古考古研究所、內蒙師大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聯合進行整理，又讓我把紅外閱讀儀帶到內蒙現場，工作過程還得到廣西師大出版社的資助，質量與進度都有保障，亦很快完成。值得一提的是謝先生雖然做了大量不可替代的工作，卻不計較排名座次，以高質量完成任務為榮。

吃苦耐勞。居延新簡的整理工作主要在上世紀 80 年代進行，當時各行各業正處於恢復期，國家的經濟狀況尚不理想，用於學術研究的經費較少，西部尤甚，當時我們在蘭州工作，一日三餐以拉麵為主，每碗才一元多錢，謝先生為湖南人，習慣於吃米飯，卻一連個把月都吃拉麵也不叫苦，還風趣地說麵湯裏的紅辣椒油正合湘人口味。乘火車往返蘭州北京間，多次因趕時間而等不及買臥鋪票，就買了經寧夏、內蒙的北綫硬座票，一坐就是一日兩夜，謝先生一路談的大多是關於簡牘的事，偶而打打盹，實在太困倦才抽支煙，卻無怨言。1991 年在蘭州召開“中國簡牘學首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前夕，我們提前數日到蘭州參與籌備，其中有數日為了方便工作乾脆就睡在會議室的長條椅上，記得臨開會前的兩個夜晚，謝先生幾乎通宵張羅，協助校對來賓尤其是外賓名單、安排日程等。2001 年在長沙召開“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食宿條件雖然優越，工作人員也不少，但出於高度的責任感，開幕前夕謝先生仍然通宵達旦幫助主辦單位考慮相關議程及名單，確保會議萬無一失。2002 年初冬，謝先生身體狀況已不甚佳，工作熱情卻絲毫未減，曾和我們一起冒著漫天雪花赴內蒙烏蘭察布盟右前旗的廟子溝文物工作站進行額濟納漢簡

的整理。工作站所在是一個祇有十幾戶人家的衰落山村，住的是簡陋的平房，喝井水，燒煤塊取暖，粗茶淡飯，沒有城裏的喧鬧，大家不僅無怨言，還以這裏寂靜無干擾、空氣好、接地氣之類的說道相鼓勵，尤其看到謝先生聚精會神、終日不知疲倦的姿態，皆為之感動，工作效率因之大幅提高，不到半個月就做完五百餘枚簡牘的初步釋文。

不懈求索。數十年間，謝先生一直以不懈的努力從事學術研究，在簡牘基礎研究領域多有建樹，尤其在冊書復原方面常有獨到之處，今見代表作有《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及其續篇《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等，對簡牘文書與行政運作關係的研究亦相當深入，較突出者如《漢簡與漢代西北屯戍鹽政考述》、《居延漢簡所見秋射及相關文書考述》、《尹灣漢墓所見東海郡行政文書考述》、《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制度》等。除擅長簡牘行政文書研究外，謝先生亦在不斷地擴展自己的研究範圍，如近年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荊門郭店楚簡研究”課題；赴韓國訪問發表《中國出土的魏晉以後簡紙文書概述》，又對韓國咸安、城山山城遺址出土的木簡詳談見解；赴英國倫敦提交《西北邊塞散見醫藥簡牘與敦煌醫藥寫本的比較》的論文，又作了《陵陽子解題》的講演；赴日本京都大學輔導有關三國吳簡和三國碑帖的研究；等等。

此外，多輯《簡帛研究》、《簡帛研究譯叢》及《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書刊，皆經過謝先生認真的審校，做了許多具體的編輯工作，默默付出的汗水最多，正如于振波先生所云，謝先生是“一位淡泊名利，甘做人梯的實幹家”，因此他給後人留下的不僅是學術成果，更可貴的是那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

謝桂華先生與大庭脩先生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徐世虹

初知謝桂華先生，是1989年在日本關西大學大庭脩先生研究室留學之時。兩位先生同治簡牘，神交已久。1980年大庭先生第三次訪華，謝桂華先生在首都機場與大庭先生第一次見面，此後學術情誼漸篤。作為名重簡牘學界的學者，謝先生是大庭脩先生邀請訪問關西大學的第三位大陸學者（1985年李學勤、林劍鳴先生相繼應邀訪問關大）。在關西大學千里山公寓，謝先生度過了一段閑適寧靜的生活。孰料六月風雲突變，謝先生匆匆回國。此後九月，筆者至大庭先生門下，結識了關大漢簡研究會的諸多成員，日常時時聞聽研究會的成員讚歎謝先生的學識與為人。研究會的初期成員、目前亦活躍於日本中國簡牘學界的吉村昌之先生，更是稱謝先生為“中國之師”。

1990年夏，謝先生與何雙全先生、胡平生先生陪同大庭先生考察河西四郡，一路高溫炎熱，汽車顛簸，起居簡陋，粗茶淡飯，但二先生卻於此獲得珍貴體驗，交往愈加深厚。此次考察，令大庭先生“充滿了親切”的懷念，亦令謝先生言及則感觸良多。

冊書復原是簡牘研究的基礎，素為治簡牘者所重。二先生於此亦用力至深，佳作時見。大庭先生之作《漢簡研究》第一篇“冊書研究”，彙集了作者多年來復原簡牘冊書的成果，其中的《元康五年詔書冊》為學界所認同，被謝先生稱為“最完整的範例”。謝先生亦撰有《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元康四年賜給民爵名籍殘冊再釋》等文，體現了深厚的學術功底。二先生的學術旨趣，志同於簡牘，道合於冊書，歷久彌醇。

二先生不僅潛心簡牘之學，於承先賢而進後學亦身體力行。大庭先生於20世紀70年代即於關西大學創辦了漢簡研究會，以讀書會的方式指導培養簡牘研究愛好者。大庭先生

的友人、曾參加過閩大漢簡研究會的來新夏先生言：“目睹師生逐簡研讀，古風陶冶，若飲醇醪，不醉自醉，益知蘭園獎掖後學之不遺餘力也。”謝先生於此亦勉力而為，除指導在籍學生外，也主持各種讀簡班，口授言傳，令人獲益良多。2002年3月，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面世未足半載，在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考古與文獻研究中心的倡議下，謝先生與李均明先生共同發起組織研讀班，筆者亦忝列其間。研讀班每周一次，最初半日，後至整天。謝先生每每堅持始終，其間辨析簡文功力之深，令人折服。如戶律 384 簡首句，釋文作“女子為父母後而出嫁者”，謝先生則據簡影、文意、用例，指出“父”字形作“户”，“母”字形作“毋”，該句當釋為“女子為户，毋後而出嫁者”。其釋讀既得 379 簡影支持，又得 345 簡律文規定印證，信實有力，功力畢現。2005年3月，居延漢簡第三次發掘成果《額濟納漢簡》出版，謝先生為釋文作者之一。2005年9月25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辦的讀簡班開始活動。是日謝先生到場，心情頗不平靜，言20世紀是簡帛大發現的時代，簡帛學已成為顯學；21世紀則將成為大研究時代。隨後率先就近十處釋文進行校正，細密之處，兼備各學。

2003年11月，為紀念沈家本先生逝世90周年，筆者供職的中國政法大學與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沈家本與中國法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謝先生應邀與會，並擔任法律文獻分組召集人。會議期間，無論分組討論還是大會發言，謝先生始終認真謹嚴，真誠對待學術。不意自湖州返京後，謝先生即臥於病榻。而此次於人大讀簡班再見謝先生，雖愈發清瘦，病容猶現，卻情緒飽滿，心態樂觀，也許對於一位終生從事簡牘學研究的學者而言，心之所系，莫甚於簡牘。

上蒼於簡牘學者實大有不公。2002年8月，大庭脩先生不幸患急性白血病，料理一切事務後遂入院治療。其間仍篤志簡牘，在醫生的許可下，以病榻為書桌，囑夫人將家中簡牘藏書拍成照片，指認取運，在住院治療的三個月時間裏筆耕不輟。2002年10月，筆者訪日期間承大庭先生夫人及吉村昌之先生帶領，入病室探望大庭先生，見病室書齋而肅然起敬，聞爽朗笑語而心生僥倖。然而僅僅月餘，大庭先生即駕鶴仙逝，以一部《寫在木片上的文字——中國木簡的世界》為半個世紀的簡牘學生涯畫上句號。大庭先生自用印有一鈕名為“木簡癡”，凝聚了大庭先生一生“以中國為第二故鄉，以中國為研究主題”的歷程。

謝先生是大庭先生“最尊敬的中國學者之一”。2004年9月，大庭先生門人陳波先生將大庭先生自用印匯總為《蘭園大庭脩自用印集》，編號刊行。時謝先生為之作序，稱大庭先生是“結識最早和最敬佩的海外學者之一”。孰料一載之余，謝先生亦身染沈疴，康健不再。然而和畢生以學術為生命的學者一樣，縱是疴恙彌流，縈繞於心的仍是簡牘學。2006年春，筆者與友人吉村昌之先生前去回龍觀謝先生的住處探望。相隔數月再見謝先生，恍若二人，但謝先生精神尚好，依舊保持著學者的端莊與尊嚴。吉村先生贈以日本武士造形，

寓意謝先生與疾病搏鬥必勝。謝先生受之動容，再次回憶起與大庭先生的友情，談起自己簡牘學的研究歷程，計劃著能儘快將學術文集編輯而成。交談中語調平穩，卻可察內心並不平靜。伴隨著謝先生的敘述，憶及謝先生為筆者職稱評審撰寫專家意見時的熱忱，為筆者所譯大庭先生之作《漢簡研究》逐頁審閱的嚴謹，為《簡帛研究二〇〇一》的出版而持續數周每日前往排版公司親為排版事務的辛勞，為籌辦長沙國際學術會議事無鉅細的忙碌，不免悲從中來。

辭別謝先生後，見戶外春光明媚，萬物新綠，內心祈禱著謝先生能戰勝病魔，重新帶領簡牘學後學再讀張家山三三六號墓漢簡、懸泉置漢簡，於辨字析意中追隨雋遠……

然而一切只是希望了。6月的一個清晨，傳來了謝先生辭世的消息。

大庭先生與謝先生的相繼離去，使中日兩國簡牘學界痛失雙峰，但二先生的學識、人品、情誼必將留華章於學術史。

（徵引、參考文獻：大庭脩：《昭和元年生まれた達》，同朋舍，1997；陳波：《蘭園大庭脩自用印集》，垂柳草堂，2004。）

回憶岳父謝桂華先生二三事

閩西大學非常勤講師 陳波

我知道謝桂華先生大名，是在復旦分校任職時，當時我編寫書法基礎教學講義，漢簡內容是必需而且作為重要一節，因為是二千年前的漢人墨蹟，在書法史上是一等史料，嘉定孫祖白先生曾對著臺北圖版，為我臨寫漢人盤銘木簡三紙，有急就章殘簡、樂浪出土漢漆盤等，並對我說：此書上海圖書館也沒有，是國家用外匯，為上海中國畫院買的。不久，我在上海古籍書店看到了謝桂華等先生編著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從中受益不少。

但是我晤識謝桂華先生，則是緣於蘭園大庭脩先生。1989年春，大庭脩先生告訴我：北京謝桂華將來閩西大學訪問，他是日本學術振興會的交換學者，但他選擇來這兒居延漢簡研讀班，你可多多向他請教，同時，在語言交流上，生活瑣事上亦請多多照料，拜託了。言談之間，可見對謝桂華先生格外尊重。大庭還補充說：中日建交後，他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在北京機場貴賓室第一位迎接他的就是謝桂華先生。我沒有想到，居然在國外在日本能晤見久仰大名的學者，可謂是喜出望外，異常興奮。在短短數月中，除了研讀漢簡之外，還陪他訪問了奈良橿原考古研究所，參觀了日本木簡脫水裝置實驗室等。在交往中，他待人和藹，學問淵博，道德高尚。“六四事件”發生時，他正在日本訪問，有人說正好可以延長，大庭也會批准同意，再待幾個月後回國也不算遲。但他還是按期回國，此事給我印象極深，因為當時可以借此暫緩回國，並可以獲取相關滯留費用。大庭先生曾私下對我表示，對謝先生此舉有特別贊賞之意，此是學者態度。回國前，在千里山閩西大學訪問學者寓所，舉行了歡送會，謝先生委託我做菜，他連夜包了餃子。那天，大庭先生及漢簡研讀班全體成員都來了，兩間小屋，從臥室到客廳裏，坐滿了十幾位客人，可見他為人甚有人

情。

自此之後，我與謝先生交往頻繁，因為大庭先生幾乎每年都要訪華，路過北京次數也多，還有其他日本學者訪華時，亦要請謝先生提供紹介等。例如1994年夏，吉村昌之、鶴飼昌男、門田明等欲去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遺址考察，謝先生專門寄來介紹信，各方聯繫，熱情協助，在京廣鐵路的路基處，得以看到出土遺址，還在湖北省博物館看到了秦簡原簡，致使這次考察如願以償。

同年10月，為有甘肅懸泉置簡牘赴日展覽事，因主辦單位清點造冊，辦理報關手續較多，使我逗留北京時間較長。晚上無事，多次晤見謝先生，並得到指教。他還帶我拜訪了張政烺先生，請教了漢代“唯印”等問題，獲益甚多。另外值得一說的是，當時我不小心扭傷了腰，他還特地請人煮了中藥送來，使我倍感溫暖。

1998年夏，其女兒向斌去江蘇連雲港探望父親，因為正舉辦尹灣漢簡國際學術研討會，他亦不忘將有關資料帶給我，同時附了連雲港市博物館書法藏品資料，供我參考。1999年夏，他曾囑咐我將下述內容轉告有關方面：大庭脩著《漢簡研究》中譯本已經列入出版計劃；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中譯事，將由他直接去信聯繫；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研究》中譯需要本人親自過目定稿；另外門田明論文未能全部刊載於尹灣簡牘論文集，是因為篇幅有限，望能予以解釋等，可見他與人辦事極為細心周到。2000年9月，他為出席我和向斌的婚禮，專程來大阪，在婚禮上，他對我們表示了祝福，並說：向斌交給你了。當時我緊張得說不出一句話，但我至今銘記著他的臉容，是慈祥，是愛護。在此段時間，他出席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富谷至主持的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角谷常子等先生還專門在天滿橋老字號餐館設宴招待了他。東京西林昭一先生特地郵寄所編《江蘇連雲港揚州新出土簡牘選》（每日新聞社、每日書道會，2000.7.1）一書，囑我轉贈給他。

2003年7月19日，對我和向斌來說，真是激動萬分的一天，兒子就實在日本大阪鐵道病院平安出生。就實這名字，是向斌為他起的。同年底，我們想帶著就實去見外公，因考慮到北京冬天寒冷，沒有帶著他。在就實二歲時，那是2005年夏天，我和向斌帶著就實，去北京昌平看望了外公和向東。他剛出院不久，顯得消瘦，但是看到外孫就實，十分高興，一起合影留念了，小就實並不知道，這是他與外公的唯一合影。前幾天，外公的友人永田英正先生將悼文寄來時，還在附信中說：今年春節，對他來說是極為寂寞的春節，相信好好地就把實扯大成人，是對其外公的真正供養。我們會教育就實記住外公的，也會記住永田先生的話。

話還要說到以前去，2003年冬，大庭博子為紀念亡夫大庭脩，要製作大庭脩自用印集，為此，我和向斌、就實去箕面拜訪了博子夫人，並整理蘭園遺印五十多方，除自用印之外，另有漢銅官印、封泥等，我將此事告訴岳父時，他說：自己雖是大病在身，也要為大庭寫

悼文，其它如有需要，也一定盡力。我轉告他，大庭博子懇求李學勤先生寫序言，也希望饒宗頤先生能為印集題耑，知道他生病，不必操勞了，但他帶病將這些事都辦好了，託向東寄來了饒先生題簽“蘭園大庭脩自用印集”，此印集製作完成，全靠岳父支持。今年春，日本皇學館大學籌備的大庭脩文庫正式公開，荆木先生曾在介紹文中說：此是學生諸君值得一讀的書。

今年元旦，我和向斌、就實一起回滬省親，向斌看到牆上挂著江蘇南京林散之先生二十三年前為我所書：“舊夢餘多少，江山認故居，一年寒雨過，空憶謝將軍”，指著謝將軍問為何意，我說南朝謝氏多出文武之才，林老眷念故舊甚重，當時我是通過其摯友求他墨寶的，才会有此作，此詩不是指你父親，但寄託了我對岳父的思念，才挂起來讀。

斯人雖逝，德業常存

——懷念謝桂華先生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張德芳

2006年6月12日，我正在湖北鄖陽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舉辦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突然接到鄔文玲女士關於謝桂華先生逝世的電話，初爲之愕然、繼之則黯然、隨之又不禁潸然。謝桂華先生是簡牘學界的前輩，是國內外有影響的學者。我與謝先生相知相識已有十多年之久，尤其近年來，多有過從，情誼日篤。聽到他身染重病的信息後，心裏牽挂，時常爲他擔憂。一旦噩耗傳來，則又倍感意外，深感悲痛。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在眼前，同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像過電影般清晰如昨，歷歷在目。

謝先生半生攻治漢簡，其人生和學業同甘肅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1972—1974年間，甘肅有關部門在額濟納旗調查發掘了近2萬枚漢簡，這是繼上世紀30年代後又一次在居延地區的重大發現，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山東銀雀山漢簡的發現成爲當時極爲轟動的事件。從1978年起，國家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在唐長孺、張政烺等先生的主持下，統一組織人力對這三批出土文獻分組進行集中整理，謝桂華先生從此即投入了居延漢簡的釋讀研究。當時他年屆不惑，正當壯年。此後一直到2006年逝世的二十八年裏，始終耕耘在這片園地裏。他對簡牘研究的執著與熱愛，對甘肅歷史的瞭解與熟悉，對河西走廊溢於言表的向往，都緣於此。他對甘肅這塊土地、民情、文化、歷史和朋友、同事的濃情厚誼也緣於此。

認識謝桂華先生是在1991年8月的蘭州會議上。當時，第一次國際簡牘學學術研討會在蘭州召開，許多前輩學者、國內外名家雲集蘭州，何茲全、裘錫圭、林劍鳴等先生、臺

灣馬先醒先生、日本大庭脩先生等都來參加會議，可謂盛況空前。謝先生作為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既要參加會議的組織工作，又要主持分組討論，忙前忙後，不亦樂乎。他清瘦幹練，精力充沛，熱情奔溢，為人謙和。他那滔滔不絕而又濃重的湖南口音給人留下了十分難忘的印象。後來多次接觸才發現，先生並不完全是那種讀死書、死讀書的書呆子，他不僅醉心於簡牘的研究，還關心政治時事，善於組織協調，一段時間還擔任過社科院歷史所的黨支部書記！先生善飲，三杯過後，談興驟起，大凡學問、人生、政治、世情都有很多真知灼見，能趁興發表一系列對晚輩們具有指導意義的意見，性格之豪爽，於此可見。但他說話又極有分寸，尤其不談論別人的是非長短。

居延新簡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四家單位參加，集衆人之手經多年努力，完成了整理釋讀工作，原計劃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和《居延新簡——肩水金關》兩書，前者為方便讀者需要先於1990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簡裝簡字本，後又由中華書局於1994年12月出版了包括釋文、圖版在內的精裝本，共收錄甲渠候官、第四隧和後來採集的一些零星散簡，包括釋文和圖版共8420枚簡。而後者即《居延新簡——肩水金關》計劃收錄金關等地出土的10800多枚簡，但該書的出版卻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期進行。

1999年夏，為了把此事推進一步，我們請謝先生和李均明先生再次來蘭州對釋文和原簡進行校核。初釋稿是當年的原稿，于豪亮先生的字蹟，極為工整秀麗，藍色墨水，鋼筆豎寫，一簡一條，旁邊時有後來作過批改的地方。紙色已微微發黃，邊角處多有卷折殘損的地方。時過境遷，睹物思人，不禁感慨繫之。

校核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是在蘭州最熱的七、八月進行的。當時驕陽似火，每天都是三十多度。樓板曬燙了，我們在頂樓的工作室裏就像蒸籠一般。一起工作的除謝、李二先生外，還有初世賓、何雙全、張俊民諸先生，加上我，還有幾個學生，總共八、九個人。大家穿著背心短褲仍大汗淋漓。每天從上午8點到下午6點一直工作八、九個小時。有記者中間採訪，居然對我們深表憐憫和同情，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單調乏味的工作。可我們不以為然，有時為了一個字、一個符號，隨時都有交流切磋甚至熱烈的爭論，有時誰開個玩笑，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一個多月悶熱酷暑，誰都不以為苦反倒樂在其中。工作結束了，如釋重負，像是結束了一次了不起的經歷。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是那樣的愉快、親切和令人懷念。我知道，先生是帶著莫大的遺憾離開人世的，因為他沒有看到《甲渠候官》的姊妹篇《肩水金關》的出版，他沒有看到他為之追求奮鬥了後半生的整個事業最後能有個圓滿的句號。可是，責任不在他自己。每次召開有關秦漢史的學術研討會，他都在會上主動檢討，為居延新簡的長期不能出版而承擔責任，我等在場每每如坐針氈，深感汗顏。他是用這種方式敦促我們，批評我們。幾次去北京開會見到他，他都語重

心長地叮囑，希望能夠抓緊這項工作。2005年12月去北京，其時他已身染重疾，而且到了後期。我曾專程去回龍觀他的寓所看望他，臨走時，他拉著我的手還在說，他的一大心願就是希望生前能看到金關漢簡的出版。每想及此，無言以對。

除了居延新簡的整理釋讀外，先生還參加了懸泉漢簡釋文的最後審定工作。懸泉漢簡是1990年至1992年間在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當時在一個漢晉時期的遺址上一共出土了35000多枚漢簡，除12000多枚素簡外，有字簡有23000多枚，後經整理編號者18000多枚。這批漢簡就其數量、內容、價值和特色來講在歷次河西走廊發現的漢簡中都是空前的，1991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簡文的釋讀整理工作從1993年開始，主要由甘肅考古所的同志承擔。斷斷續續，時輟時作，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爲了提高簡文釋讀質量，最大限度地減少差錯，2002年底，我們又請謝桂華、李均明和胡平生先生來蘭州，對全部懸泉漢簡的釋文進行通讀通校。韓國學者尹在碩先生當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訪問學者，也隨謝先生來蘭州參加了這項工作。兩個多月，跨了兩個年頭，2003年的元旦就是一起在蘭州度過的。參加校讀的同志三、四人一組，共分三個組，每組承擔一部分。利用紅外線設備，一邊看實物，一邊看釋文，一簡一簡校讀訂正，一條一條進行修改。有問題有爭議，三個組的同志立即聚首一處集中討論，一些看似比較疑難的問題經過大家廣思集益，很快就有了答案。2003年的第一天，我們薄酒一席共度元旦，大家圍攏一起如同家人，那種友好、信賴和親密的氣氛至今讓人難忘。謝先生多喝了幾杯，話題仍然是簡牘學的人才、未來，談得相當興奮。古人那種“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感覺倒沒有讓我們得到深刻的體驗。後來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及此次審校懸泉漢簡的三點經驗，其中一條這樣寫道：

一是班子的組建很有特色。審校班子包括北京的學者和甘肅的學者，兩地的學者，都長期從事西北簡牘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從年齡看，老中青三結合，60歲以上3人，50—60歲3人，40—50歲3人，30—40歲1人，20—30歲1人。不同年齡與閱歷的人思維方式與考慮問題的角度往往不同，在審校工作中能夠開闊視野，很有助益。從知識結構看，大家各有專精，便於優勢互補。有的有較強的識辨簡牘草書的能力，有的對邊塞軍事防務器具與資料很熟悉，有的對各類器物名稱掌握較多，有的對簡文內在的文例、詞例和書寫規律爛熟於心。這樣一批人，就整體能力而言，可以當之無愧地說，無論是在全國範圍內還是全世界範圍內，都算是釋讀西北簡牘能力最強的班子。經過這個班子“過濾”過的釋文，雖然不能保證完全沒有錯誤，但至少可以說，已經把錯誤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見《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後記）

十多年的接觸交往，謝桂華先生讓人印象最深、終身難忘、堪稱人格楷模者是他那種

對後輩的關懷、獎掖和提攜。一次有同事去北京回來帶來一本剛剛出版的《簡牘學譯叢》第二輯，是謝先生專門送給我的，上面還題了字。當時跟先生不過蘭州會議一面之交，沒有想到他還記得我。聞著書香，看著他那蒼勁的題字，心裏自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激。

2000年8月，由李學勤、李伯謙、艾蘭三先生召集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達園召開，得知此消息後給謝先生打電話，希望能得到邀請參加會議，先生二話不說即同主辦方聯繫發來了邀請。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認識了不少前輩，認識了不少朋友，後來的很多學術活動都與此有關，每想及此，心裏又平添了一份感激。

2001年“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沙召開，胡平生先生和我合寫的小冊子《敦煌懸泉漢簡釋粹》想在會上交流，聽取大家的意見，但贈送有困難，希望會上拿點經費購買後發給大家。謝先生慨然允諾，經他多方協調，最後如願以償。心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感激。

記得有一次，我需要劉樂賢先生的大作《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可是此書是臺灣出版的，大陸買不到，平素同劉先生又未打過交道，不便貿然索求。便給謝先生打電話，希望他幫我向劉先生問一聲。後來他告訴我，劉先生確實再無存書，但答應將他的新著《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寄給我。不久我就接到了劉先生的寄書。現在每當見到這本書，就想起這個過程，想起謝先生不憚煩勞、架橋鋪路、為同行之間建立聯繫的情景。當然《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後來也由胡平生先生委託陳文豪先生從臺灣寄來了。這些師友之間的友誼總是讓人倍感人間溫暖。

對晚輩如此，對師長則是真誠的推崇愛戴。2002年底來蘭州校閱懸泉漢簡時，張政烺先生已臥病多年。歷史所想給張先生出紀念文集，臨來時張先生的夫人傅先生有託，早年張先生曾給趙儺生先生送過一幅條幅，用篆書寫的，可代表張先生的篆書風格，想請謝先生借回去收在文集裏。謝先生與趙先生不熟，想輾轉找別人，又怕趙先生不肯借，頗為犯難。正巧我和妻子郝樹聲都是趙先生的學生，而且多年來時常奔走在先生門下，於是由郝樹聲帶著謝先生徑往蘭州大學趙先生的府上，居然很順利地借到了，不僅謝先生喜出望外，就連趙先生也因謝先生的到來給他帶來了不少故人老友的信息而十分高興。他問這問那，問長問短，問了張先生不少近年來的事情和病況。還特別問到楊向奎先生的紀念文集，很關心楊先生的紀念文集是怎麼編的，編了些什麼，涉及到哪些人和事，再三叮囑謝先生回北京後給他捎來一本。印象中謝先生辦事不太細心，可這件事卻辦得極認真極仔細。東西借來後認真包裝，怕賓館不安全，先放在辦公室，臨走時再小心翼翼地拿出來裝好，物不離人，隨身帶到北京。等拍照製版後，東西放在張永山先生家，過了一段時間我去北京，原物帶回來完璧歸趙。又後來，他託人帶來了楊向奎先生的紀念文集，郝樹聲便很快送到趙先生處。從這件事上，我們看到了謝先生為人處世的又一個側面。

與人相處，真誠、善良而且重友誼。與他合作過的同事朋友很少有跟他中途翻臉的。搞秦漢史和簡牘學的同志都知道，謝先生和李均明先生雖不在一個單位，可兩人從一開始讀簡到謝先生辭世，合作共事近三十年。很多論著兩個人的名字是一起出現，很多場合兩個人的身影總是一起晃動，形同兄弟，情同手足。我作為旁觀者看來，近三十年的親密合作，固然不能不與均明先生那種謙虛下人、不計名利得失的處世態度有關，但也可看出謝先生對同事對朋友真誠善良的為人是始終一貫的。當前社會人心澆薄，學術界追逐名利甚於其它。今天還是很好的合作夥伴，明天就可能因為一件小事而反目成仇。一個項目，一個課題，本來多年的朋友往往因為署名的位置、稿費的多少、甚至一次拋頭露面的機會或者一點其它的小事，就不歡而散，情誼斷絕，從此成了路人。相形之下，謝、李二位近三十年的無私合作給我們樹立了楷模。

2005年8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學術年會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召開，會上我帶去兩大包《簡牘學研究》第四輯，是甘肅考古所和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合編的不定期學術刊物。本來想在會上發放，因為數量不夠，謝先生就把大部分留在他那裏，一本一本本地分送，先滿足日、韓等國外學者的需要，然後再送確實需要的同仁。我知道他是想通過這種方式為大家建立一種聯繫，擴大影響，讓國外學者多瞭解我們，讓簡牘學研究在國內外得到一體發展。可是他當時已病入晚期，孱弱的身軀，瘦削的面孔，連上樓的力氣都不夠了。

2000年，甘肅方面組織編寫《中國簡牘集成》，第一輯十二冊，全收甘肅出土的簡牘，其它各省出土簡牘編為第二輯。當時商定的體例是將過去發表的釋文保持原來的書寫格式，再經校核、斷句標點並加注釋，配上簡要的出土說明和內容提要，旨在以全本的形式提供給研究者，減少搜求簡文的麻煩。以“居延漢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等為單元，分工合作，幾個人承擔一個單元，各負其責。謝桂華先生等三位承擔的是“居延漢簡”，即上世紀30年代出土的那部分居延舊簡的校注任務。書出來後，發現合作的同志最後沒按他們一起商定的意見辦，以致標點校注出現了不少錯誤，再加上善後工作沒有處理好，先生對此十分氣惱。2004年10月在居延開會時提及此事，他居然怒不可遏，把這件事提到了人格品質和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高度。接觸十多年，我還很少見過他如此激動，從而也使我看到了他怒目金剛式的一面。

對親人的愛和眷戀以及無私的奉獻也是謝先生一個突出的特點。先生的原配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一直有病，他既要給夫人熬湯煮藥，又要照顧兩個孩子的衣食上學。而此時的他，正是需要在事業上加以拼搏的年齡。他常常不得不把孩子帶到單位，先把他們安排好之後才能進入工作，中午吃飯更是胡亂湊和。後來夫人逝世，他更是又當爹又當媽，加上夜以繼日地讀簡釋簡，其情其景其苦其累，確實令人酸鼻。儘管如此，他無怨無悔始終充滿著對親人的愛。

先生半生治簡，有兩句名言，他說我們治簡要爬兩個坡，“一個是文字釋讀的坡，一個是深入研究的坡”。釋讀和研究是一個過程的兩個階段，釋讀是研究的前提和條件，研究是釋讀的目的和深入，兩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並且釋讀中有研究，研究中有釋讀，兩者又相互滲透，不可截然分開。縱觀先生的學術生涯，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簡文的辨認釋讀上。哪里出了新簡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各地出土的簡牘，大部分都經過他的最後審閱。他和李均明、朱國炤先生合作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至今仍是治簡者必讀的經典之作。釋讀簡牘是一項十分艱辛枯燥的工作，並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樣，只是辨形識字，把認識的簡文逐錄在紙本上。它需要扎實的文字學功底和文獻學功底，還要熟悉典章文物、天文曆法、方技術數和歷史考古知識。這還不夠，還要有長期的釋讀經驗和對簡文格式、一般習語和各種書體的瞭解積累。簡牘埋藏數千年，不僅當時出自不同的書手，魚魯亥豕，篆隸俗草，斷裂刮削，而且兩千多年風雨浸蝕，漫漶磨滅，褪色變型，散亂遺棄，所有這些都給今人的釋讀造成極大困難。一些簡文似是而非，隱隱約約，若有若無，缺筆少劃，殘半字蹟，最耗神費力，最難琢磨。謝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徜徉在簡牘文字的海洋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大量的相關知識。有些別人不能辨認的字，他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很多從字蹟本身不認識的字，他根據所熟悉的制度、習語從上下文即可推導出來。這些都是最基礎的工作，它雖不需要深邃的哲理和洋溢的才華，但需要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學風、一絲不苟的態度和長期默默無聞的工作。他所發表的簡文釋讀的系列論文，為我們建立了文字釋讀的範式。

邊塞烽燧遺址和墓葬出土的簡牘有一個最大不同就是，墓葬出土物在當時入葬時就是放在一定位置的（當然有些也經過盜墓者擾亂），而邊塞烽燧的簡大多是作為廢棄物隨意丟棄的。這些丟棄的簡牘有些身首分離斷成數截；有些當時本是一個內容完整的冊子丟棄後散亂得面目全非了；有些可能是一些內容相關的同類簿籍，丟棄後失去了原有的次序。如果按照已有的認識，根據一定的規則把殘斷的簡聯綴起來，把一些內容聯貫的冊書復原了，把一些內容相關和相近的記錄輯錄在一起，其信息含量和研究價值就不同了。這方面，繼英國學者魯惟一、日本學者大庭脩和永田英正之後，謝先生做了艱苦的工作。他的一組簡冊聯綴和復原方面的論文做了有益探索。

另外，通過漢簡，他對當時政治法律制度、取庸代戍制度、邸與閭、西北社祭、屯戍鹽政等方面的研究，都闡發了自己的不少新見解。除西北簡外，他對張家山《二年律令》的研究、對尹灣漢簡的研究都是該領域的重要成果。

我們知道，謝先生生前曾把大量的精力投到了組織協調和編刊出書上。多次簡牘學方面的重要會議，他都是組織者之一。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編輯出版了《簡牘研究譯叢》第一、第二輯；《簡帛研究譯叢》第一、第二輯；《簡帛研究》第一、二、三、四輯。

此外還聯繫廣西師大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簡帛研究叢書”。這些工作爲人作嫁，耗時費力，一般人不屑一顧，而先生則不然。他不計名利得失，甘爲人梯，以大量默默無聞的工作爲簡牘學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全國性的平臺，爲耕耘在這塊土地上的晚輩後學提供了一個學術陣地。今天的簡牘學能有這樣一個強勁勢頭和良好局面，與先生長期以來的無私奉獻和勤奮工作是分不開的。

從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在甘肅敦煌、酒泉的漢代烽燧遺址中掘得大批漢簡到現在，整整一百年了（當然此前還有1901年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分別在樓蘭、尼雅的發掘）。一百年中，王國維、羅振玉先生可謂近代簡牘學研究的開山之祖，後繼者有勞幹先生。1949年以後，大陸學者在簡牘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者主要是陳夢家和陳直先生。謝桂華先生是“文革”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簡牘學家。當年與他一起涉入簡牘學領域的同齡人甚至比同年長的學者至今仍活躍在學術舞臺上，而他卻因長期的辛苦奔波、繁忙工作、生活操勞以及病痛折磨而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每想及此，無盡的哀痛、無限的懷念。然斯人雖逝，德業常存，前輩們留下的精神品質和學術成就一定會激勵我們加倍努力，作出成績，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

與謝先生一起走過的日子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卜憲群

今天是中國傳統的清明節，2006年我失去了自己敬愛的父親，也失去了尊敬的師長謝桂華先生。今夜雖無細雨紛紛寄託哀思，卻也薄雲低垂，令人倍感惆悵。人生固有生死，可是自己至親至近的人的離去，卻不是能用此類哲理語句可以寬解的，那份思念的情感只能永遠默默存於內心。情感固然不必渲染，亦非我的個性，可是他們所做的事情還是要後人來總結、傳承的，紀念的意義是否在此呢！謝先生去世後我讀了海內外一些先生的紀念文章，談到了他對簡帛事業的奉獻，他對年輕人的關愛和扶持，特別是在引導他們走上簡帛學研究之路的感人事跡，我也是深有同感的。

謝先生是我人生中至近的人之一。我還沒有來歷史所讀書之前已和謝先生相識，而來所讀書後他是我的博士生導師組成員之一，畢業留所工作後謝先生又是我所在研究室的主任。與日俱增的交往使我從謝先生那裏學習了許多東西，也對他在後半生傾心從事的簡帛事業有了更多的瞭解。正是在他的影響下自己開始對簡帛材料發生興趣，並把簡帛材料與秦漢史研究相結合。在今天研究秦漢史的年輕人看來重視簡帛材料在秦漢史研究中的運用已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甚至是基本常識，但是我們只要翻閱一下十幾年前秦漢史研究的選題目錄，瞭解到那時簡帛出土與整理出版的狀況，就不難體會到這種積極的倡導包含著謝先生對學科發展的前瞻性認識，而這種認識對於秦漢史的研究又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

大家知道謝先生是簡帛研究的著名專家，但我還要說他是一位倡導簡帛學研究的宣傳家。他從不把簡帛研究作為他個人的事，而是希望越來越多的人來從事這項工作，並為之鼓與呼。記得求學時導師林甘泉先生告訴我，畢業論文中關於簡帛材料的運用正確與否要

請謝先生最後把關，當我去謝先生家把畢業論文的初稿交給先生時，他不僅愉快的接受，而且用他一貫的激情表達方式向我講述簡帛學的意義及發展前景，臨別時還贈送給我一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今夜我翻閱了先生的題款，那是1994年7月29日。後來我的畢業論文中一些重要的簡帛材料的運用都與謝先生的提示分不開。此後，謝先生還贈與我幾部他參與整理的簡帛著作，並且時常與我談新出簡帛的價值和意義。先生的悉心幫助和對簡帛學的熱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也使我日後對簡帛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像我這樣經先生的引導和幫助而對簡帛研究產生興趣的人還有很多，我想這種感受是大體相同的，我就不多說了。值得一提的是我說他是簡帛學研究的宣傳家並不僅僅是他對專業人員的宣傳，在簡帛學還不是像今天這麼熱門學科的十幾年前，他的宣傳對象包括科研管理人員、新聞出版界、政府官員等各類人物，他這樣做當然不是無的放矢，更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簡帛學的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也正是這種宣傳爲先生的簡帛學建設事業創造了更爲廣闊的空間。但其中的甘苦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對簡帛研究一向是很重視的。當年歷史所的賀昌群先生是居延漢簡的早期整理者之一。張政烺、李學勤、馬雍諸先生爲馬王堆帛書整理作出過重要貢獻。1981年歷史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開始編輯海外簡帛的研究狀況，當時的歷史所副所長兼戰國秦漢史研究室主任林甘泉先生就請謝先生負責編輯《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後又出版第二輯，至今仍有廣泛影響），在編輯過程中，謝先生產生了編輯《簡帛研究》的想法，這個想法在林劍鳴先生調任法律出版社總編輯後得到了法律出版社領導的支持，理想始成爲現實。在短短的三個月之內謝先生就基本完成了組稿任務，組建了編委會，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那時我還在研究生院讀書，承蒙先生不棄，囑我翻譯魯惟一先生的稿子，雖是翻譯，卻又使我對簡帛研究又有了一次近距離的接近，現在想起來豈不是謝先生的良苦用心？《簡帛研究》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第一、二輯後，反響很好，至今還常有人打電話來索取，後因某種原因法律出版社不能繼續出版，《簡帛研究》面臨斷檔的危險。那時我的一個朋友江淳正在廣西教育出版社任負責人，她也是學秦漢史出身，我把情況向她說明之後，她很快認識到其中的價值並慨然同意出版，這樣我們又有了《簡帛研究》第三輯，謝先生懸著的心也放下了。可是不久江淳同志又調離了效益比較好的教育出版社，《簡帛研究》的出版又遇到危機，好在江淳同志與我們一樣對《簡帛研究》高度負責，她調離前又把我們介紹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何林夏總編輯，何總編一向對學術研究著作出版持扶持態度，又加其對新文獻的發現有高度興趣，合作事宜很快落實。從此《簡帛研究》才有了一個穩定的家。今天，《簡帛研究》與《簡帛研究譯叢》合併爲《簡帛研究》，各類論著、翻譯著作合併爲《簡帛研究文庫》，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影響，並且沒有要院所一分錢的補貼，這都與謝先生的辛勤勞動分不開。學術研究需要的平臺之一是學術組織，這是費

心費力往往還不被人理解的工作，謝先生傾心於此，完全是對簡帛學的熱愛，是爲了歷史所簡帛學的研究香火不絕，後繼有人。俗話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們簡帛中心的諸位先生今天不敢說是在“乘涼”，但我們是在謝先生奠定的基礎上往前走的。在歷史所數十年簡帛研究的道路上，謝先生是承前啓後的領軍人物之一。

與謝先生密切相關的還有簡帛研究中心的建設。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謝先生就經常說起要辦一個研究中心，把所內、院內乃至全國、海外簡帛學研究的同仁凝聚在一起，共同爲簡帛學的繁榮與發展做貢獻。經過數年的努力，1995 年 3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宣告成立。中心是一個虛體，既無經費又無編制。我記得成立之初，中心活動十分困難。正好我的一個前輩，也是一位著名的愛國僑胞，美國普渡大學教授朱永棠先生來中國（朱先生當時受聘爲清華大學歷史系研究顧問），我向他提出中心的困難，他當即捐款 5000 元人民幣給中心，這便是中心啓動時唯一的一點經費。朱先生研究的是管理學，但他對中國歷史十分熱愛，這就是他願意資助的原因。我們不能忘記他的滴水之恩。有了中心這個平臺，謝先生更加投入對簡帛事業的工作，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來形容是不爲過的。^①祇說一件事，他除了編輯《簡帛研究》外，還積極推動海內外學人對簡帛研究的關注。2001 年適逢簡帛發現一百周年，歷史所等單位與長沙市人民政府爲配合吳簡的發現，召開了“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大陸、香港、臺灣及日本、韓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的近二百位學者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的很多代表都是他的朋友，會議又需要做多方協調，事務很多。我與謝先生同住在會務組房間，幾乎夜以繼日的工作使他聲音嘶啞，講不出話來，但他卻全然不顧自己的身體，忘我地投入工作。這次會議圓滿的召開與謝先生的默默奉獻是分不開的。他爲簡帛中心、爲培養人才所做的工作還有很多，是與他相處的同事、朋友、學生都可以見到的事實，大家談了很多，我就不多說了。

謝先生生前常和我談三件事，一是要以簡帛的冊書復原爲基礎促進秦漢史的研究，二是要以中心名義召開一次國際研討會，三是要編輯《簡帛研究文獻集成》。如今第一項事業他的弟子鄔文玲女士在繼承弘揚，國際研討會也於去年成功召開，《簡帛研究文獻集成》也在積極籌備之中，我想謝先生的在天之靈也能得到些許安慰吧！

一個人一輩子做不了多少事，推動歷史所簡帛事業發展的當然也不是謝先生一個人，但祇要全心全意去爲大家做奉獻，人們是不會忘記他的。謝先生有激情，有事業心，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給後學很大的感染力，這是簡帛學界許多朋友對謝先生懷念至深的原因。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謝先生是在十分困難的境況下從事簡帛學研究和許多工作的。但只要他一投入工作，其它的事情他都可以捨棄不顧，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從我個人來

① 歷史所的簡帛研究及中心工作可參見謝先生所著《櫛風沐雨，成就斐然》，載《求真務實五十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說，雖然忝居中心主任，但與謝先生相比，無論學識還是奉獻精神上差距都還很大。我時常回想起他的教誨，不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深感自己做得不夠，他的教誨激勵著我要更加努力為簡帛中心工作，與中心的先生們乃至海內外有志於簡帛研究的同仁們一起共同為簡帛學科的建設盡一點綿薄之力，能夠如此，心已足矣！

懷念謝桂華先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劉樂賢

謝桂華先生是我到歷史研究所工作後接觸最多的一位前輩和同行。十幾年來，我們一起編過《簡帛研究》、《簡帛研究譯叢》，一起參加過尹灣漢墓簡牘的整理工作，還多次一起外出開會或訪問。在這些活動中，我經常得到謝先生的關照和鼓勵，並且從他那兒學到了許多東西。謝先生的逝世，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深感悲痛。

謝先生去世以後，我經常回想起和他相處時的一些情景，特別懷念和他一起編輯《簡帛研究》和《簡帛研究譯叢》的日子。

記得我在1992年到歷史研究所報到的第一天，就去秦漢史研究室拜訪謝桂華先生。知道我的畢業論文做的是“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後，謝桂華先生十分興奮地說：簡帛研究大有發展前途，你的這個選題很好，今後一定要繼續研究簡牘帛書。他興致勃勃地向我介紹正在編輯中的《簡帛研究》第一輯，向我描述建設簡帛研究學科的宏偉計劃。那天我們談得十分投機，他仔細詢問了我的博士論文內容和今後的研究計劃，當即要求我儘快從博士論文中選出一篇稿子給《簡帛研究》第一輯，邀請我參加《簡帛研究》的編輯工作，並希望我以後多參加他的簡帛研究計劃。他還一再強調，他的計劃是與我的老師李學勤先生一起商定的，《簡帛研究》也是在李先生的指導和支持下籌辦的，叫我一定參加。當時簡帛研究遠沒有現在熱鬧，歷史研究所有心專攻簡帛的人也很少，我們都很需要對方的支持與鼓勵。於是，共同的興趣使我們互相欣賞，我們的關係日漸密切。那時我們每周要上兩次班，我每次到辦公室後總是要去他那裏坐一坐，主要是談《簡帛研究》的約稿、審稿和校稿之類的事情，有時也聊一些別的。由於我經常與他在一起談話，幾乎參與了他組織的所

有學術活動，後來不少所裏的同仁和所外的同行都誤以為我是謝先生他們秦漢史研究室的一員。實際上，我一直在文化史研究室工作。

那時候社科院的食堂很糟，大家都不樂意在那兒吃午飯。我和謝先生經常在辦公室聊到中午，然後騎自行車去他在光華路的家裏，並在路上順便買些菜帶上。到家後，謝先生一邊和我說話，一邊做飯炒菜，我則偶爾打打下手。很快，我們就能飽餐一頓地道的湖南飯菜。那時我到北京的時間不長，還不怎麼習慣北方的飯菜。在謝先生那兒，我經常能夠品嚐到家鄉的風味，真是開心極了。飯前飯後，謝先生除了講整理簡牘的心得和研究簡帛的計劃外，還經常以過來人的身份教我如何處理各種問題。現在想來，他的一些意見對我後來的成長很有幫助。例如，我的博士論文的及時出版，就與謝先生的勸說頗有關係。我是1992年畢業的，正好趕上了學術書籍出版最為困難的時候。雖然得到許多師友的熱心推薦，但一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我的博士論文。這時，有同學建議交付臺灣文津出版社的“大陸地區博士文庫”出版。我覺得該書的讀者主要在大陸，對是否應該在臺灣出版頗有疑慮。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我向謝先生徵求意見，謝先生給我仔細分析了形勢，極力主張我立即將書稿交給臺灣的出版社出版。後來，我聽從了他的意見，將學位論文增補修訂後交給文津出版社出版了。這本小書雖然很不成熟，但出版後在同行中的反映還算不錯，後來在我申報副研究員的職稱時也起了重要作用。我想，以我當時的書生意氣，如果沒有謝先生以過來人的身份反復勸說，我恐怕是不會那麼快就出版這部博士論文的。

1993年我奉命下鄉鍛煉，次年回所後，謝先生已移居他處，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塊做午飯吃了。但是，合作的機會並未減少，仍然繼續編輯《簡帛研究》，後來又編了兩輯《簡帛研究譯叢》。照樣，我們還是在每周的上班日交換意見。

在李學勤先生的推動下，謝先生後來又組建了簡帛研究中心，並做了幾件大事，如主持尹灣漢簡的整理出版，與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合辦“簡帛研讀班”，策劃“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一度將歷史所的簡帛學科辦得有聲有色。這段時間，可以說是歷史研究所簡帛研究學科的極盛時期，也是謝桂華先生一生事業的高峰期。在我的印象中，那時的謝先生精力旺盛、雄心勃勃，一心想將歷史所的簡帛學科做強做大。可是，謝先生很快就到了退休的年齡，沒有了用武之地。退休以後，他仍然不能忘情於簡帛研究，還在繼續編輯《簡帛研究》，盡力運作簡帛研究中心，後來又參加了額濟納漢簡的整理工作。不過，這個時候的形勢已經發生變化，簡帛研究已經“熱”了起來，歷史研究所的簡帛研究中心由於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資助，工作開展起來越來越難。尤為嚴重的是，這時謝桂華先生的身體已經開始出現險情。可是，他對這些都不以為意，仍然像往常一樣工作，繼續經營他的簡帛事業。

辦理退休手續以後，他不再每周都來辦公室了，我們見面和聊天的機會少了，但他仍

然關心我的工作。他在整理額濟納漢簡時看到一些數術殘簡，以為我會很感興趣，便先將釋文給我，建議我寫一篇考釋文章，和他們幾個整理者的考釋文章一起附在即將出版的整理報告中發表。我那段時間由於事情特別多，精力也不好，沒有按時完成任務。後來，他建議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舉辦額濟納漢簡讀書班，又一次叫我寫一篇考釋數術簡的文章。這一次我才抽出時間寫成一篇短文，與他的文章一起發表了，他很高興，說我解決了一些問題。從這以後，謝先生幾次進出醫院，我們只能在病床邊跟他說話，再也沒有機會從容論學了。

謝先生逝世後，我常常想起他，總覺得他可能是帶著遺憾走的。他肯定沒有料到自己會這麼快就離開人世，以至沒有來得及整理好自己的文稿。其實，早在謝先生退休前，我們在聊天中就談到了一些這一方面的問題。我直率地說：你在第一手材料的整理釋讀和簡帛學的組織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在簡帛研究方面的成果還嫌不夠多，特別是如果不寫一本專著傳世，將令人遺憾。他同意我的看法，也想以後少做一些組織工作，多寫一些研究心得。後來，李學勤先生請他為紫禁城出版社撰寫一本《漢晉簡牘通論》，他答應了。我知道後十分高興，慶幸他一生整理和研究簡牘的心得終於有機會結集出版了。可是，由於做了太多的編輯和組織工作，他竟未能抽出時間完成這本專著的寫作，後來已將主要任務交給了汪桂海先生。他退休後，有出版社表示願意為他出版一本學術文集，我們所裏幾個關心他的同仁聽說後都很高興，催促他停下其它工作，集中精力編好自己的文集。這次他比較配合，表示願意立即著手編輯。但是，他仍未停止做簡帛學的組織工作，加上後來病情漸漸惡化，編輯工作進展緩慢。期間，他曾讓我幫他複印過個別文章，說一定要快些交稿。我從這裏知道他已經真正上心，滿以為這部論文集很快就能夠出版。誰知不久他的病情突然惡化，這本論文集竟未能在他的生前編好，真是令人遺憾。可以告慰於謝先生的是，他的學生和簡帛研究中心的同仁正在努力，爭取儘快將謝先生的這部文集編輯出版。我想，這肯定符合謝先生的心願，也是我們對謝先生最好的紀念。

深切悼念我的老師謝桂華先生

韓國慶北大學歷史系 尹在碩

人生之中無論是在學習方面，還是其它方面，都會遇見自己的老師。特別是當我們處於困難環境的時候，老師都會成為我們照亮黑暗的明燈和指明前路的羅盤針。在我的人生寥寥無幾的老師中，與謝老師的相遇始終讓我心存感激。我是在中國留學那個特殊時期與謝老師相結識的，無論是從研究領域還是從人生觀上講，謝老師都教給了我許多寶貴的知識。

在記憶中，我和謝老師的初次見面是在1994年的2月。當時，我結束了在北京師範大學為期6個月的語言研修之後，通過齊克琛女士的介紹，作為謝桂華老師與李學勤老師的進修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進行學習。與謝老師初次見面時，謝老師給我留下了非常樸素的印象。起初我認為，那時謝老師無論是在韓國還是在簡牘學研究領域之中，都是非常著名的專家級人物，鑒於專家特有的嚴謹和自信心，所以相處起來也許會很困難。但是，自從與謝老師的初次見面開始，由於謝老師灑脫與直率的對待，使得作為外國人的我，感動得無以言表。謝老師和我每星期二在歷史研究所的秦漢史室見面，謝老師會針對每個星期我所學習的內容進行指導。特別是對於《居延漢簡》、《尹灣漢簡》、《張家山漢簡》等內容的指導，那是在韓國國內完全無法學習到的知識，這為我的學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記得那時候，每次結束簡牘學習之後都會和謝老師一起吃晚飯，有時候還會一起喝上一杯，老師非常喜歡邊抽煙邊喝酒。因為在韓國年輕人在老人面前抽煙喝酒是非常無禮的行為，所以我在和謝老師一起喝酒的時候就把身子轉過去喝酒，也不在老師面前抽煙。然而謝老師卻說，這裏是中國，不要那麼拘謹，因此，無論何時都是和老師一起抽煙。這體現了謝

老師不論國籍和年齡都率直待人的品行。但是現在想想，不禁後悔當初怎麼沒有勸老師戒煙戒酒，如果是那樣的話，也許現在就不用寫下這樣的字句了。一起喝酒的時候，我們除了談論秦簡以外，還會談及秦漢史研究相關聯的中國學界的整體概況，郭沫若、顧頡剛、張政烺等知名學者的研究思想和傾向，以及謝老師開始研究簡牘的背景等等話題。尤其是，由於謝老師喜歡張政烺老師的研究成果，謝老師特地帶著我一起去了張政烺老師的宅第，參觀了張老師的書齋並與張老師共進了晚餐。隨後 2001 年 10 月在北京，張老師因病入院，謝老師和我還一同去探了病。

謝老師對於我在中國發表的關於“秦漢時代家庭歷史”的論文給予了極大的幫助。特別是我以《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戰國末期秦的家族類型》這篇論文向《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三期投稿的時候，謝老師與劉樂賢先生一起為我修改論文原稿。對於我當時粗拙的中文，謝老師給予了相當大的幫助。隨後，謝老師也對於我在中國發表的大約 5 篇論文都進行了認真的矯正和補充。除此之外，在 1994 年到 2005 年間每當召開關於秦漢史和簡牘學會議的時候，謝老師都會熱情地邀請我一同參加；進而，2002 年 11 月謝老師還帶領我去參觀了在甘肅省考古研究所，李均明老師和胡平生老師進行的懸泉置漢簡的釋讀作業，這對於外國人來講是相當優待的事。為了徹底地研究簡牘，首先要對簡牘實物進行正確的釋讀，這是謝老師一貫的宗旨，也是老師教給我的很重要的一點。我和謝老師最後一次共同參加的學會是 2005 年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召開的秦漢史學會。似乎那個時候謝老師的病勢就已經有了加深的趨勢，不光是戒掉了平時喜歡的煙和酒，而且記憶力明顯下降，身體狀況已經很是虛弱了。在結束秦漢史學會之後 5 天的額濟納旗考察之後，由於我請求謝老師為我講解當時出版的《額濟納漢簡》，所以和謝老師在北京又再次見面了。謝老師不僅沒有因為身體不適而拒絕我的要求，還在那樣悶熱的天氣特地來到我當時下榻的朝陽區 21 世紀飯店，四天的時間裏，我們一起吃住，從早到晚為我講解了《額濟納漢簡》的全部內容。這大概是謝老師去世前十個月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謝老師對於研究的熱情和對弟子的關愛是相當深厚的。雖然是那樣，我那時沒有想到老師的身體狀況已經差到了十個月之後便去世的程度，還請求老師為我講解漢簡，對於這一點，讓我深深地感覺到了一種罪責感。

謝老師對韓國和韓國人有特別深厚的感情，這不僅僅是因為兩國的緊密關係，還因為 20 世紀中韓兩國有著相似的歷史經驗。由於謝老師的專業關係和以簡牘為媒介的中、韓、日三國相同的文化觀，謝老師還曾努力創造在中國介紹韓國木簡的機會。為此，我特地製造了可以比較兩國木簡的機會，邀請謝老師到韓國。1999 年 12 月，謝老師在韓國的金海博物館發表了《韓國咸安城山山城木簡初探》這篇關於在韓國城山山城出土的木簡的文章，不光對此提出了作為中國學者的見解，還引起了不少韓國和日本學者的興趣。這篇論文不

光是中國學者對於韓國木簡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其卓越的學術內涵，至今為止還被韓國學者們廣泛的參考應用著。另外，謝老師還讓我在2001年長沙國際簡牘學會上介紹了韓國木簡，那篇文章還同時被發表在《簡帛研究》和臺灣的《國際簡牘學會會刊》上。2002年2、3月，還讓我在中國文物研究所和清華大學發表了關於韓國木簡的文章。而且，通過與韓國進行的學術交流，對於韓國研究秦漢史的教授、大學生（碩士、博士）來講，謝老師是非常有威信的學者。謝老師與韓國的金燁教授也有很深的交情，在2002年8月還與金燁教授和我三人一同遊覽了漢中、成都、峨眉山、三星堆、都江堰等地。不僅如此，對於在歷史研究所裏研究學習的韓國學者和大學生都非常地關心，其中金慶浩、李佑成、李晟遠、金鎮宇等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韓國學生。最後一次與老師見面，是在2006年2月，老師北京郊外的家中。當時我在北京出差，聽說老師的病情加重了，便與卜憲群、鄔文玲一起去探望了謝老師。當時老師的病情已經到了最差的狀態，不光是看不到老師原來的樣子，由於肝硬化腹部積水已經到了無法起床的地步。即便是那樣，謝老師不僅對於我的探訪深表感謝，還和我們談論關於簡牘研究的話題，使得我們還以為老師的健康可以在短期內恢復過來。作為老師的學生，我也祇能說是希望老師快點好起來，那樣才能繼續針對簡牘對我進行指導。而在那寒冷冬天裏，清冷的書房前的客廳中躺著一位年邁的學者，雖然祇剩下勞累卻在其眼中閃現著智慧的光芒。

2006年6月，卜憲群、蔡萬進兩位先生到訪我所就職的慶北大學，並轉達給我謝老師去世的消息，這似乎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樣。難以置信的是，轉瞬之間，謝老師已經去世一周年了。謝老師雖然已經遠離我們，但是謝老師所追求的學術自由和對真理無止境的探索對於我們這些後生來講都是寶貴的啓迪。更加希望謝老師那超越人與國界的無限信賴與崇高思想，都可以成為明世的明燈。

銘記從未失去笑容的謝桂華老師，在老師靈前為老師祈福。

我永遠的老師——謝桂華大師

韓國成均館大學 金慶浩

即將到來的 6 月是老師永遠離開歷史研究所一周年的日子。雖然老師在這之前就已經退休，離開研究所，但是對我而言，老師根本就沒有離開過那裏。在我學問的歷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史研究室，是最寶貴的研究室之一。因為那裏有謝老師，還有那些通過老師所結識的、至今為止對我有很大幫助的、我無法忘記的朋友們。

第一次跟老師接觸是在 1986 年我讀研究生的時候。那次我並沒有直接見到老師，而只是通過《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認識了謝老師。我這算是在書桌上認識了老師。自從那開始，直到我寫博士論文，我一直通過書本傾聽老師的聲音。但是到 1999 年 10 月，在韓國的金浦機場我終於第一次真正見到了老師。當時我就跟老師表達了想在老師那裏念博士後的樸素心願。2000 年 2 月，我終於獲得了在歷史研究所裏跟老師學習的機會。

我覺得老師是一位非常和藹可親的老人。剛到北京的那會兒，我還不知道做些什麼，比較彷徨。當時的我只會說“你好！”“對不起！”我平生第一次在以歷史和傳統著稱的歷史研究所的二樓一個小小的研究室裏，跟老師學習《尹灣漢簡》。那時的學習非常艱辛。老師那湖南口音即使中國人也不大聽得懂，而我又根本不大會說漢語，可想而知那時的交談非常辛苦。但是語言根本無法阻礙我們的交流，我們兩個人用筆談的方式整整聊了三四個小時。後來老師給我介紹了他的學生鄔文玲（當時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就讀博士學位），讓她幫我。

老師那時首先問我想學什麼，我說想學秦漢時期的簡牘。從那以後老師對我的指導算是達到了過分的程度。一周一次見面指導我以外，老師還強調與中國學者交流的重要性，並積極給我介紹了許多優秀的研究學者。不僅如此，一有機會就給我介紹了簡牘出土的地方。最讓我難忘的是在2000年4月的時候，和老師一起去湖南長沙考察。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時的情景。2000年4月的某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了老師的電話。那時我漢語說得還不太好，所以一旦有中國人給我打電話，我就會有不少壓力。老師用他那一貫特有的高調認真而又快速地和我說話，但是我還沒太聽懂老師的話。只聽懂了一句明天叫我去一趟研究室裏。我通過鄔文玲同學得知老師要去長沙，老師極想知道我是否願意跟他同行。老師想讓我親自體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並想給我介紹那裏的考古學者。更讓我吃驚的是還讓我跟他住同一間，他好教我漢語。現在我每當想起這件事，就覺得既感動又抱歉（雖然最後由同行的劉榮軍副所長教我）。

放假的時候我打算去西北地區，所以跟老師商量了一下。老師當場給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簡牘的張德芳研究員寫了封介紹信。我拿著那張介紹信，直奔甘肅省。通過那次寶貴的機會和交流，我跟那裏結下了不解之緣。

但是後來我不得不結束那短短一年的留學生活，踏上了回國的路。在離開中國之前的最後一個晚上，我跟老師共進晚餐。記得在北京，第一次跟老師一起光顧的飯店，就是坐落於歷史研究所後面的仿膳食堂，在那裏老師問我喜歡吃什麼，我當時還不知道名稱跟味道，就隨便點了一道菜，那道菜就是鐵板牛肉。從那以後跟老師一起吃飯的時候，老師必點那道菜。這就是老師對我的照顧。老師還認為我總喜歡吃那道菜……

回國後，我在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就職，老師得知這一消息以後很為我高興。那年8月，在湖南省長沙舉辦的“簡帛出土10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上，時隔6個月以後我又見到了老師。看到老師健康，我還以為老師能一直跟我們在一起。2001年回韓國以後，至今為止我幾乎平均每年四五次去北京等地。但是以繁忙為藉口，很多次都沒有見到老師就回韓國去了。

2005年聽到老師病危的消息，我立即去中國看望老師。幸好那年我可以在北京逗留一個月，所以能多次看望老師。看到老師那變得憔悴的臉，我不知道說什麼。老師喜歡抽煙、喝酒，而且經常面帶微笑，當我孤獨和寂寞的時候，他總能成為我學業和為人處世方面堅實的精神支柱。但是老師突然一下子變得很勞累，就好像辛辛苦苦把子女養大成人後，雙肩肩負世間所有重任的年邁的父親一樣。看老師酒量明顯減少，我只能留下一句“請您多保重”，就離開了那裏。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沒用。在回國的路上，心情別說有多沉重。

那年8月，我聽到老師要出席在內蒙古呼和浩特舉辦的中國秦漢史學會。我以為老師已經痊愈。他似乎已經恢復了健康，但是看到他那面龐，又難免讓人擔心。由於與會者非常

多，飯店裏面簡直人山人海。在那種情況下老師還爲我保留了座席，照顧我這個弟子，很讓人感動。我仍然是老師的弟子。那次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2006年6月從訪問韓國的中國學者那裏得知老師噩耗的時候，我不禁驚呆了。那時我跟廖名春和陳偉先生一起坐汽車，我許久說不出話來。老師永遠離開了我們。我從老師那裏得到了很多關愛和教導，但是沒等我來得及報答，您就這樣永遠離開了人世。現在我有一些能力爲您做些事情，但是您卻沒能等到今天。您當年爲我點鐵板牛肉，我現在有一些能力爲老師您買啤酒，可是……在飯館裏，我爲您點了鐵板牛肉和啤酒，但是怎麼等，您也不來……

很多人說您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的身邊，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爲老師您只是不在我們的眼前而已，您卻總是站在我們身邊守護着我們。

我覺得我是個幸運兒。去中國，我可以跟那裏的學者們度過愉快的時光。我覺得他們都是老師您給我介紹的優秀的學者。如果沒有老師，這一切都將是不可能的。跟學者們一起思念您的時候，您永遠活在我心裏。

老師，我希望您在那個世界裏不要太爲健康擔心，您可以在那裏盡情享受精美的食物、煙和酒，快樂地度過每一天……

懷念謝桂華先生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 于振波

在與病魔進行長期的抗爭之後，謝桂華先生告別了他熱愛的簡牘研究事業，離我們而去了，留下的，是一筆豐厚的學術遺產，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

作為深得謝先生關愛的一名學生，讓我把記憶中的一些片段寫下來，寄託自己的一份哀思吧。

記得在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讀書時，我對秦漢史很有興趣。想讀研究生，入學考試卻名落孫山。因為不甘失敗，決心兩年後再考，仍然把研究方向定在秦漢史，所以見到相關的書就買。畢業前夕（大約是1988年6月），買到了謝先生主編的《簡牘研究譯叢》第一、二輯。當時這兩本書對我來說，實在太艱深了，但我由此知道了謝先生的名字和他的研究領域，並對他油然而生敬意。

兩年後，我幸運地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張傳璽先生指導下學習秦漢史。張先生再三強調考古資料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加之北大圖書館豐富的藏書，使我貿然闖入簡牘學這一領域。翻閱簡牘資料，拜讀前輩時賢的相關論著，逐漸成為我課外閱讀的主要內容。此時，我又找出久違的兩冊《簡牘研究譯叢》，細讀再三，茅塞漸開。

在此期間，謝先生的成果不斷進入我的視野，他參與編著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更是我受益至今的重要工具。當年從書店裏淘到這兩本書時的興奮，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我的碩士畢業論文主要是根據居延漢簡寫成的，謝先生的上述成果正是我撰寫論文的

基礎，因此，在畢業論文答辯時，導師張先生指定請謝先生做校外評議人。按照張先生的指示，我把論文帶到歷史所，交給謝先生，便匆匆告辭了。印象中，謝先生待人很隨和。又過了一個星期，我去歷史所取評議書，心中忐忑不安，等待接受批評。謝先生熱情地接待了我，稱贊論文寫得好，接下來，便耐心細緻地指出其中的不足之處，包括引文的失誤以及論證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謝先生始終和顏悅色，毫無責備的意思，更無居高臨下的姿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我從中受到了啓發，知道以後如何完善這篇論文，因此不但沒有感到窘迫，反而如釋重負，這種感覺在我是平生第一次。後來，謝先生經常向別人提到我的這篇論文，稱贊有加，而對其中的不足之處卻隻字不提。

北大畢業後，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在林甘泉先生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謝桂華先生和李祖德先生作為培養小組成員給了我很多指導。林先生在家中給我上課，每兩周一次。我去歷史所，主要是請教謝桂華先生。謝先生不論當時有多忙，總是放下案頭的工作，為我解惑釋疑，向我講述他的研究心得，介紹國外簡牘研究動態，不厭其煩，誨人不倦。

在此期間，謝先生為簡帛研究中心的成立投入大量精力。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謝先生為創辦《簡帛研究》而聯絡作者，聯繫出版社，審稿，編輯，校對……事無鉅細，任勞任怨。他最大的感慨是人手不夠，在我臨近畢業時，幾次提出要留我在他身邊工作，但我最終選擇了離開歷史所，離開北京。我當時有種種考慮，坦白地說，我缺乏謝先生的那種獻身精神。

1996年，長沙走馬樓吳簡大量出土。我於1998年年初攜家來長沙，既有生計方面的考慮，也是為了能與吳簡拉近距離。1999年12月，謝先生為籌備“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來到長沙。工作之餘，特意來看望我，詢問我的工作、生活情況。謝先生得知我仍然沒有放棄簡牘研究，非常高興，他帶我到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把我引見給宋少華所長（現為簡牘博物館館長），我也因此結識了黎石生、李鄂權、何佳等年輕朋友。黎石生和我都是在謝先生的鼓勵和推動下而從事走馬樓吳簡研究的，我們所取得的每一點進步，都與謝先生的殷切期望分不開。

這次見面，為了使我更好地學習海外簡牘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謝先生提出讓我翻譯英國劍橋大學著名漢學家魯惟一先生的漢簡研究名著《漢代行政記錄》，並收入他主編的“簡帛研究叢書”中。按照謝先生的設想，這套叢書將分批出版，首先推出國外和港臺地區的學術名著，進而推出大陸學者的優秀著作。謝先生認為，從事簡帛研究也應提倡“拿來主義”，不能閉門造車，不要夜郎自大，祇有博採衆家之長，才能推陳出新，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因此，這套叢書的初衷，就是要為大陸的簡帛研究打開一個窗口，為有志於簡帛研究的年輕人找到治學的門徑，從而為這一學術領域培養、積蓄後備力量。

《漢代行政記錄》的翻譯工作於2000年12月完成，直到2005年12月正式出版，在這五年時間裏，總共校對了四次。每次在我校對之前，謝先生先都已仔細看過校樣，然後才轉寄給我，校樣上滿是謝先生校閱的文字和標記。後面的兩次校對，都是在謝先生生病之後，一次在2004年7月，一次在2004年12月，謝先生在病情稍稍穩定之後，堅持校閱。我幾次在電話中勸他好好休息，並向他保證自己一定認真校對，但無濟於事……2005年12月，《漢代行政記錄》中文版正式出版，而此時，謝桂華先生又一次住進了醫院。

從1999年12月到2001年8月，爲了籌備一次國際性的簡帛研究盛會，謝先生多次來到長沙，在各相關機構、部門之間溝通、協調，制定詳細方案，募集經費……其中辛苦，難以盡述，而他卻很少爲自己考慮，食宿因陋就簡，從不挑剔。記得2001年春，謝先生再一次來到長沙，此時我剛好遷入新居不久，住房比較寬裕，於是與妻子商定，邀請謝先生住在家中，以便能對他在生活上有所照顧。然而，謝先生早出晚歸，因過度勞累，嗓音都有些沙啞了，我們都爲他的健康擔心。有一天晚飯後，我忍不住勸他休息一天再去跑，他回答說做事情要趁熱打鐵，一氣呵成。謝先生不止一次講到，他希望通過這樣一次簡帛研究的盛會促進海內外學術交流，爲大陸簡帛研究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從而增強國內簡帛研究的整體實力。這些道理，我固然明白，可是，作爲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這樣奔波勞累，到底能從中得到什麼？事實上，謝先生從中得到的，除了辛苦，還是辛苦，也許，他從來就沒有考慮到他自己。

2001年8月16—19日，“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湖南賓館隆重召開。熟悉謝先生的人都知道，謝先生此時已極度疲勞，嗓子完全沙啞了，祇是一種毅力、一種信念，在支撐著他……

會議結束後，我和黎石生都勸謝先生保重身體，不要再拼命爲他人做嫁衣了。謝先生說，會議結束了，還要編會議文集，還要編《簡帛研究》，還要編張政烺文集，還要編“簡帛研究叢書”……等這些事情告一段落，他會好好休息一下。可是，這些事情哪裏是短時間能夠完成的？！實際上，除了上面提到的計劃而外，謝先生後來還參加了額濟納漢簡的釋讀與《額濟納漢簡》一書的編輯出版工作，並促成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屆年會在呼和浩特召開。

謝先生非常推崇張政烺先生，佩服他學問功底之深，稱贊他論證縝密嚴謹，說他的文章，就像剝筍子，層層深入，直達問題的本質，並爲他不能把滿腹的學問寫出來留給後人而深深惋惜——謝先生說，自己是帶著這份崇敬與惋惜的感情而參與整理張政烺文集的。就在《張政烺文史論集》即將出版的時候，謝先生卻因患肝硬化於2003年底住進了醫院。

2004年7月初，謝先生剛出院不久，給我來電話，從說話聲音判斷，他的身體還很虛弱。謝先生很高興地告訴我，《張政烺文史論集》出版了，他了卻一樁心事，還清了一筆

“債”——謝先生把自己生病之前計劃要做的事都叫作“債”，把這些事當作自己的責任和使命，一定要完成。可是，在他所開列的計劃中，有長沙簡帛會議文集，有《簡帛研究》，有“簡帛研究叢書”……惟獨沒有考慮他自己。我勸他，身體要緊，那些事根本不是什麼“債”，完全可以交給別人去做……然而，謝先生是一旦下定決心就會堅持到底的人，我祇有默默爲他祈禱……

此後幾次給謝先生打電話，感覺他的身體狀況在逐漸好轉，由衷地感到高興，並不住地提醒他不要過度勞累，謝先生也一再答應會注意的，我自然也信以爲真。可事實上，他一進入工作狀態，就忘記了自己。

2005年7月，我去北京出差，順便去拜訪謝先生。一見面，謝先生就高興地對我說，他的“債”就要還清了，《額濟納漢簡》、《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已經出版，《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已經發排，“簡帛研究叢書”中有的書已經出版，其餘的書也已經或即將發排……從2004年出院以來，短短一年的時間，謝先生忍受病痛的折磨，卻完成了常人都難以勝任的工作。

我想，既然還清了“債”，這回總該安心休養一下了吧？然而，2005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開中國秦漢史第十屆年會，謝先生的身影也出現在會場——據說因爲訂不上臥鋪，他祇好連夜坐十幾個小時的硬座！我在休息時去看謝先生，得知他又背上了新“債”——參與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籌備工作。我勸他祇做一些指導性的工作，不要再拼命了，謝先生也滿口答應，可我深深地知道，只要是對簡帛研究事業有利的事，他會滿腔熱情地全身心投入，勸說幾乎沒有多大意義。

2006年元旦，我給謝先生打電話，向他祝賀新年，他的家人告訴我，謝先生又住進了醫院……

2006年3月，我把《漢代行政記錄》中文版樣書寄給吳榮曾先生，吳先生在回信中這樣評價謝先生：

他爲中國的簡牘事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爲名，不爲利，純粹是一種奉獻。這種精神非常偉大，今天如先生者有幾人？他提挈後進也是憑著自己熱誠的心，這點也令人欽佩和值得學習！

2006年5月中旬，我因一點私事去北京。5月13日，與李均明先生相約去看望謝先生。謝先生在家中休養，由他的兒子謝向東陪護。走進臥室，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謝先生躺在床上，腹部因肝腹水已嚴重隆起，臉上、雙臂瘦得皮包骨，說話非常吃力而且含混，身體虛弱到了極點……這就是曾經那麼矍鑠、那麼樂觀、那麼健談的謝先生嗎？！

爲了減輕他的痛苦，李先生和我都儘量不讓他多說話。在幾句簡短的交談中，謝先生

沒有談自己的病痛，卻問起我的工作情況，還提醒我去看看導師林先生和張先生。

這時，鄔文玲也來了，緊接著，謝向東叫來了救護車，於是，我們一起把謝先生送到寬街醫院。因病情嚴重，寬街醫院不敢留，我們又去地壇醫院。在診室裏，醫生讓我把體溫計放到謝先生腋下，我放了幾次，體溫計都滑落到衣服裏，這時我才發現，謝先生腋下已經瘦成一個空洞，即使體溫計再粗上幾倍，也未必夾得住。我不知所措，腦袋裏一片空白。後來是李先生接過體溫計，一直扶著，才勉強測完體溫。

謝先生很堅強，在我們相處的這幾個小時裏，幾乎沒有聽到他痛苦的呻吟，儘管腹水已壓迫得他呼吸困難。

沒想到，這次見面竟成了訣別。

2006年6月12日凌晨，謝先生因醫治無效，不幸去世。學術界失去了一位作風正派、治學嚴謹的學者，一位淡泊名利、甘做人梯的實幹家，一位誨人不倦、不遺餘力獎掖後進的師長……

2006年6月13日下午，謝桂華先生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先生的生前同事、朋友、學生前來做最後的告別……

哀樂低回，蒼天也為之動容，雨，在淅淅瀝瀝地下……

安息吧，謝先生！

回憶謝桂華先生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汪桂海

謝桂華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師長，2006 年不幸因病去世，至今已將近半年多了。他離開了我們，留給我們無盡的思念，他的音容笑貌時時浮現於眼前，他充滿熱情的談話也仿佛仍在耳邊縈繞。

對謝先生的名字，我很早就有所知曉。我喜歡逛書店，在大學讀書時，偶爾買到兩冊《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開始對地下出土的簡牘資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現在，簡牘學成為我一個研究方向。通過這部至今使學術界深為受益的書，我知道了謝先生，並開始注意先生的文字。不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一直沒有任何機會與謝先生謀面。

真正見到謝先生已經是遲至六七年之後。那是 1997 年，我在北大攻讀博士學位即將畢業，畢業前舉行學位論文答辯，在確定論文評閱人和答辯委員會名單時，鑒於我的論文大量使用了簡牘資料，導師吳榮曾先生把謝先生列入其中，並安排作答辯委員會主席。這當然是很合適的選擇。先生此時身為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簡帛研究中心主任，正為簡帛研究事業的發展壯大而忘我地奔忙。通過事先電話聯繫，在一個星期二的上午，我去歷史所與謝先生見面。當時歷史所辦公的地點是在社科院大樓後面的一座兩層小樓內，樓房較破舊，如今已經拆除了。就是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謝先生。他身材瘦削，但精神不錯，為人很是和藹可親。謝先生說話帶有濃重的湖南口音，初次與先生交談，有個別語詞我聽不大明白，只能連聽帶猜。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之後，先生爽快地答應審閱我的論文，同意參加論文答辯，並約定一周後來歷史所取論文評議書。

舉行論文答辯那天，先生冒著酷暑前來參加，論文答辯順利完成。中午，例行宴請參

加答辯的幾位先生，地點是勺園餐廳。席間，謝先生提到他正在組織籌辦的《簡帛研究》和《簡帛研究譯叢》，大家都很感興趣。事後，先生寄給吳師《簡帛研究》和《簡帛研究譯叢》各兩冊，其中一份是給我的。接到這兩冊書，我在欣喜之餘，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的熱誠。

先生始終特別關心簡帛研究力量的發展壯大，對有志於此項事業的年輕人總是不遺餘力地給予幫助，不管是否他的及門弟子，他都一視同仁，這在今天真是不多見。先生自己單獨培養的學生祇有一位，而得到過先生關心、照顧的年輕後輩則多得很。他們當中既有先生熟悉的，也有先生並不熟悉的。許多人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得到先生的提攜，而且在工作、生活等方面都曾得到先生的關照。先生多次為剛剛博士畢業的年輕人的工作安排而奔走、聯繫，希望他們能夠找到一個可以在簡帛研究方面繼續發展的位置。不瞭解的人也許會認為先生在多操閒心，但我深深地知道，先生這樣做的時候毫無個人考慮，他的心裏祇有中國簡帛學研究這一件事，他是在為簡帛研究這塊園地培養人才、積蓄後備力量。

先生曾多次對我說：“我們這一代人都老了，過去因為時代的原因，也沒有多少時間作研究。如今，簡帛出土日益增多，新的資料不斷問世，需要有一批人獻身於這一項事業。簡帛學作為一門新的學問，前途無量，這需要年輕人來做。今後，年輕人是要挑大梁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參與。我現在要做的事是，多幫助年輕人，幫助他們解決找工作的困難；另外，辦好《簡帛研究》，為有志於該項事業的人提供一個學術園地。”先生在去世前的幾年裏，所忙碌的幾乎全部是這些方面的事情。他全身心地投入這項事業，可以說是在玩命地幹。我親眼看到先生為《簡帛研究》的組稿、編輯、校對，乃至製版印刷等事宜而奔忙。

《簡帛研究》在出版了第三輯之後，開始將原來的《簡帛研究》與《簡帛研究譯叢》合併為一種，並按照編輯年份作為各輯的編號，因此第三輯之後的第四輯改為二〇〇一輯。這應當是謝先生考慮到出版方面的問題，與出版社商量之後的決定。當時，為了趕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前能夠將《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正式出版，以便在會議上向與會專家學者發送，先生拉上鄒文玲、沈頌金等幾個年輕人，利用周末時間，到中華書局進行會戰式的編校工作，我也被先生喊來參與其事。編校工作完成之後，過了些日子，聽說先生又為了趕時間，在深夜三四點鐘，親自拿著書稿的膠片到印刷廠敲開大門，交給廠方，以便儘快印刷出書。在那一夜，先生一定是熬了個通宵達旦。一個年過六旬的人，像年輕人一樣在拼命，真不知道先生哪里來的勁頭。為了我國的簡帛研究事業，先生就是這樣一點點地透支著自己的生命。

2001年，“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沙如期舉辦，為這次會議的籌辦，先生自一開始就前前後後忙碌，聯繫籌措會議經費，聯絡並確定參會人員，等等。一直到會議結束，又為會議論文集的編輯、出版而操勞，甚至在病中也

沒有停止。對這些事情，于振波先生曾在《懷念謝桂華先生》一文中已經有所提及，相信凡是親眼目睹的人一定會有同感。

我是一個不善於交往的人，和謝先生原本也沒有多少來往，自從因為論文答辯而與謝先生相識，謝先生就經常關心我的研究情況。他一度想把我引入簡帛研究中心工作，只是因為客觀存在的困難而未果。我的《漢代官文書制度》一書得以出版，亦完全仰賴先生引介，若沒有先生的熱心幫助，恐怕至今仍無緣面世。先生對像我這樣涉足簡帛研究領域的年輕人不遺餘力地給予關照，不是為了別的，純粹是出於對簡帛研究學術隊伍建設的關心，他希望年輕人能夠很快作出成績，擔當起重任。每當與先生見面，先生總是告訴我學術界又發現什麼新的材料，或者又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公佈，問我有何看法，相互探討，有時還為我提供最新的材料。這些年來，我在簡帛學方面之所以還作了一點東西，離不開謝先生的鼓勵和幫助。

謝先生生前積極與出版社聯繫，為簡帛學界創造一個出版研究成果的條件。現在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簡帛研究叢書”，就是謝先生努力的結果。關於這套叢書的設想，先生曾與我交談過。我當時建議分為兩類，一類是海外研究著作的翻譯，一類是大陸及港臺學者的著作，既有新作，也可以包括曾經出版過的重要著作。先生虛心接受了我的建議。作為第一步，首先組織了幾部海外著作的翻譯、出版，如今已經有幾種譯作出版。希望這套叢書能夠繼續做下去。

謝先生曾經應出版社之邀撰寫《漢晉簡牘通論》一書，因忙於各種事務，沒有精力撰寫，後來就將此事交由我來做。這是先生生前特別關心的事情之一。由於我所從事工作的特點，難以全力以赴地投入此書的撰寫，只能利用工作空餘，斷斷續續地來做，目前已經完成了計劃中的三分之二，部分章節曾經先生審定。沒能讓先生看到此書完篇，是我無法彌補的遺憾。

先生病情診斷出來之後，多次住院治療。我每次去看望，他談論的總是與簡帛研究有關的事。最後一次去家中看望謝先生是在2006年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那時先生已經病情極為沉重，說話的力氣幾乎都沒有了。即便這樣，先生關心的還不是自己，而是在考慮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簡帛研究所的發展事宜（謝先生當時兼任研究所的工作），他向我談了自己的計劃，打算邀請哪些學者作某幾個方面的專題授課。可惜，先生再也不能把自己的這些計劃付諸實施了。

謝先生極富感恩之心，對於曾經幫助過他的人，他生前多次對我提及，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他為《張政烺文史論集》的編輯、出版而做的一切，就是出於對張政烺先生的感佩之心。這一點，劉源先生《樸實無華 關愛青年——紀念謝桂華先生》一文有較為翔實的回憶。先生通過言傳身教，影響著我，教我做人做事。

謝先生一生嚴格要求自己，熱心幫助他人，熱情培植後輩，鍾情於簡帛事業，成為簡帛學界衆所公認的領軍人物。以年齡而言，先生才六十多歲，本應該還繼續做至少一二十年的工作。先生過早地離開我們，離開他為之獻身的簡帛事業，是簡帛學界的一大損失。

謹草此文，以表達對謝先生永遠的懷念。

憶謝桂華先生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黎石生

流年似水，生命如風。轉眼間，簡牘名家謝桂華先生辭世又已半年了。

我與先生的相識，緣於先生來所裏籌備“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生住在所裏一處簡陋的小房間裏。當時，我正在收集資料，對長沙吳簡裏的“邸閣”擬作探討，自然也就收集到了先生的大作。得知先生來所，我當然喜出望外，便不揣冒昧，前去請教。

晚上七點半，我去拜會先生。大約過了半點鐘，先生從外面回來了。寒暄時，先生說他剛從湖南師大歷史系回來。師大是我的母校，我便問先生與歷史系哪位老師相熟。先生告訴我，系裏的李福泉教授是他武漢大學時的校友。而李教授正好是我本科時的業師，研究生時也給我講授過秦漢史課程，師生感情很好。於是，我與先生的距離一下子便近了許多。本來是揣著敬畏之心向來自最高研究機構的大學者請教的，現在自然就變成了請師叔指導。先生和藹而健談。我和先生越談越起勁，對自己不懂的問題，便不管深淺，一股腦兒地問。不知不覺中，便到了十一點鐘。先生看了下時間，對我說：“小黎，我們去吃了晚飯再談吧。”這時，我才知道先生還未吃晚飯。我知道，先生是不想中途打斷我的興致，故而如此的。我心裏很是感動。這是先生令我難以忘懷的一件事。

我趕忙陪先生到附近的一家小吃店裏去用餐。問先生喝不喝酒，先生客氣起來。我便坦言自己好酒，啤酒、紅酒、白酒、低度酒、高度酒、混合酒，一概來者不拒。先生聽了，便說喝點勁酒即可。席間，我問先生老家是哪里人，先生說是湖南新化。而我是湖南寧遠人，來自地道的永州之野。於是，我便以家鄉的習慣執弟子禮向先生敬酒。此後，先生和我成了忘年交，不再稱我為“小黎”了，而是直呼名字。這令我倍感親切，而先生的關心

和鼓勵也一直陪伴著我。

待到2001年簡帛研討會在長沙召開，與先生再見時，我已經不能陪先生喝酒了。因我患鼻咽癌，出院剛一年，必須戒酒。先生知我獨自一人帶著幼子在長沙，妻子還在老家寧遠任教，未能調來長沙，又知我酒癮極大，便再三囑我保重身體，挺過難關。其後又每每在電話中間起我的身體和妻子調動一事，關切之情令我永銘於心。

本科時我學的是歷史專業，研究生時雖然學的是中國古代史專業，但導師卻是一個正宗的考古專業的學者，給我定的研究方向是湖南秦漢考古。因此，對於簡牘研究，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門外漢。正是先生和來長整理吳簡的北京諸師的悉心指導，我才得以跨進吳簡研究的門檻。在長沙，潛心於吳簡研究的人實在不多，難以切磋交流。閉門造車，研究水平自然難以提高。雖然遇有問題時可向北京諸師請教，但畢竟距離太遠，多有不便。於是，先生又引薦我結識了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于振波兄。于兄亦潛心簡牘研究，且離我最近，便於交流。先生之關心，無微不至矣。

得知先生患肝病的消息後，我的心便懸了起來。我知道，以先生的年紀，患上這種病怕是凶多吉少。我自幼多病，患過包括鼻咽癌、黃疸性肝炎、慢性腎炎在內的十幾種不同的疾病，深知病魔的可怕。於是，我便在電話裏告訴先生一些緩解病症痛苦的點穴按摩保健方法，並懇請先生以身體為重，暫時放下手頭的工作，專心療養，最好每天抽時間練練太極拳。先生究竟聽了沒有，我不得而知。竊自忖度，先生的病後來出現反復，可能還是有放不下工作的原因罷。

先生的公子向東兄在電話裏將噩訊告知我。我聽到先生走了，頓時大哭起來。前一天向東兄在醫院裏跟我通話時，我還在電話中聽到先生微弱的聲音。我怎麼也不願相信，這竟是我聽到的先生最後的聲音。人生天地間，斷腸之事莫過於生離死別。若有自己的親人、敬重的師長、貼心的至友猝然離去，自己得知噩訊卻不能前去送別，則更為之甚。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這樣的淚我彈過三次了。1997年夏，正當我研究生畢業答辯之時，一位亦師亦父亦友的中學恩師猝然辭世，等我趕回去時，祇有對著恩師遺像上那慈祥的目光跪地痛哭。2000年夏，正當我患癌症，在湖南省腫瘤醫院住院做放療時，年近八旬的老父親猝然辭世，我無法回家奔喪，祇有跪地痛哭。先生走了，我孤身帶著幼子在長，不能抽身北上去為先生送行，只好囑前去送別的于振波兄一定把追悼會的時間告訴我。追悼會的時間到了，我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面向北方，跪地三叩頭，遙送先生。我仿佛看見先生在低回的哀樂中，駕著仙鶴，緩緩離去。

先生走了。我知道，先生走得很痛苦。先生很累，身累，心也並不輕鬆。先生啊，我在鬼門關前玩了幾回，都挺過來了。而您卻在學術研究正入巔峰之年走了。蒼天不公啊！

往事伴雨逐塵去，故人隨風入夢來。先生走了，再怎麼追憶也見不到先生的音容笑貌了。只盼先生有靈，時常隨風入夢而來。在夢裏，再聆先生之教誨。

博學的良師 ——憶謝桂華先生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張小鋒

在我的記憶深處，有兩個志趣相同的學術同道的名字我是最不願觸及，也是最難以忘懷的。一個是熱衷於簡帛研究的青年才俊沈頌金君，另一位是著名簡帛研究專家、秦漢史專家謝桂華先生，二人幾乎為同一病魔奪去生命。沈君頌金病逝於 2003 年 8 月，享年 37 歲，其英年早逝，深為學界同仁扼腕歎惜。我作為其摯友，久久難以忘懷與其交遊、切磋的點點滴滴，正當我完全走出了摯友沈君病逝的苦痛時，卻傳來了謝先生的噩耗。我與謝先生頗為投緣，交往與接觸頗多，感情也十分真摯。謝先生向來身體硬朗，然而 2006 年 6 月卻傳來了先生的噩耗。謝先生的突然離去，是對他的親人和好友的一次沉重打擊，更是簡帛研究和學術界的巨大損失。我——一個與沈君、謝老結緣甚深的摯友、後學——走出沈君的陰影，幾乎用了三年的時間，而今要從謝先生辭世的悲痛中擺脫出來，不知又要用多長的時間？

最早知道謝先生的名字，是在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1995—1998），當時我的主攻方向是簡牘學，通過學習謝先生的論著和導師何雙全等人的介紹，對謝先生仰慕之情與日俱增。1998 年，我負笈京師，拜入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楊生民先生門下，攻讀秦漢史博士研究生。楊先生與謝先生交往頗深，知道我對簡牘研究有一定基礎，積極支持和鼓勵我繼續這一研究，並將我介紹到謝先生那裏。當我懷著一種敬畏的心情見到這位簡帛大師時，卻被他的平易近人和獎掖後學的精神所感染，很快師生間那種距離感就煙消雲散了，我們成了無所不談的“朋友”。此後，我不斷地前往社科院，向先生請益和問學，每次，先生都是耐心

釋惑，傾囊相授。

1998 尹灣漢墓簡牘釋讀完畢並公開出版，這是學界的一大幸事，也是學術關注的熱點。謝先生由於參加了尹灣漢墓簡牘的整理工作，對該簡的內容和學術價值了如指掌，於是為他的學生鄒文玲女士開了專題講座課程，沈頌金君（時於北京師範大學史學所攻讀博士學位）獲知這一好消息後，邀我一同前往旁聽，謝先生見我們二人對簡帛研究如此執著，十分高興。從此，在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的小屋裏，謝先生專為我們三人開起了尹灣漢簡講座的“小竈”課程。他的講授，既有對簡帛基礎知識的介紹，也有對簡帛研究方法的探討，使我們幾位後學受益匪淺。

郭店楚簡出版後，在清華大學舉辦了郭店楚簡研讀班，這個班雲集了幾十位京師學者和清華大學的學生，我和沈頌金也前往旁聽，謝先生帶領學生鄒文玲也每次前來參加，從不間斷。謝先生作為簡帛研究領域中的權威人物，為人十分謙虛，他從來不以權威的身份出現，常常坐在台下聽講、學習，而且學得十分認真。

張家山漢簡出版後，李均明先生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的徐世虹女士在中國文物研究所舉辦了張家山漢簡研讀班，謝先生作為發起和組織人之一，我則作為研讀班成員之一，所以每個周末我們都有見面的機會。在研讀班上，謝先生憑著自己的“火眼金睛”，識別出了一些別人未能識別的文字。之所以說其是火眼金睛，是因為《張家山漢墓竹簡》一書在文字釋讀上，對能識別的字幾乎做到了不留空白的釋讀，儘管如此，謝先生還是憑著自己多年的釋讀經驗，憑著圖版上的筆墨殘存，將一些漫漶不清的字釋讀了出來。每當此時，我們都稱讚謝先生有一雙火眼金睛，比現代化的先進識別儀器——紅外線識別還厲害，謝先生聽後，總是報以朗聲大笑。

其實，謝先生的火眼金睛我早先就見識過。記得 2001 年夏我博士論文答辯時，謝先生是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那天一大早，我打車前往先生寓所迎接，在車上，我向先生請益。先生說，漢代政治史是一塊熟耕地，很難出新意，但你在這方面下了功夫，也寫出了一定的新意，很難得。但是你的論文校對，不夠仔細。我說，我已校對了五六遍了。於是他拿出我的博士論文《西漢中後期政局演變探微》，從頭至尾，翻出十六七處因校對不慎而出現的錯誤。只可惜，當時由於時間短促，我沒有將這些錯誤一一記錄下來。現在，我的這本博士論文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我又進行了多次校對，但不知先生當年指出的錯誤，是否全部得到了校正？

謝先生一生鍾情於簡帛研究，默默耕耘，默默奉獻。身體上的病痛，家庭上的壓力，並不能動搖他對簡帛研究的癡愛。謝先生 2003 年底罹病住院，我和蔡萬進、尹在碩前去探望，儘管他身體孱弱，但依然很樂觀。在病情基本得到控制之後，旋即出院。2005 年 8 月，第十屆秦漢史年會在內蒙古師範大學召開，由於車票緊張，先生為了按時到會，竟至一路

坐火車硬座顛簸而至，其對學術執著之精神，令人感佩。

謝先生對青年學子，極為關心，倍加鼓勵。在他的鼓勵和感召之下，出現了一批有志於簡帛研究的青年同道，並逐漸成長為簡帛研究領域的新秀。還有許多青年學子也正熱忱地投身於簡帛的學習和鑽研之中。我想，謝先生若泉下有知，應當欣然，因為他生前最為擔心的簡帛研究後繼乏人的問題已有正解。

謝桂華先生，一位樂觀、堅強的長者，一位執著、博學、充滿愛心和善意的良師。

我所認識的謝桂華先生

華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 曹旅寧

我最後一次見到謝桂華先生，是在2005年8月內蒙呼和浩特召開的秦漢史年會上。當時他因肝硬化治療好轉，剛出院不久，但精神卻很好，祇是人瘦得厲害。

謝先生治秦漢史，又是簡牘專家，曾參加居延新簡、尹灣漢簡、額濟納漢簡的整理。他治學的刻苦認真、對年輕人的扶植，為簡牘學科的建設發展，都是不遺餘力的。謝先生的著作不多，屬於厚積薄發一路，流傳最廣的當是《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其他的論文我讀過的有《漢簡與漢代西北屯戍鹽政考述》、《元康四年賜給民爵名籍殘冊再釋》、《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制度》、《初讀額濟納漢簡》等。其中鹽政一篇雖然自謙是對臺灣盧瑞琴女士論文的補充，但對當地食鹽的用途，戍卒食鹽的稟給及相應的文書制度，侯官的食鹽來源均有所論述，其資料之嫻熟、功力之深，這裏無需我置評。元康一文是在日本宣讀的，致力於冊書綴合復原，這是謝先生最引以為自豪的拿手本領，考據頗有乾嘉遺風，文末所引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論賜爵的信劄，還有對張政烺先生審讀的謝辭給人印象深刻。而且我還看過謝先生一篇記張政烺先生學行的文章，兩人在學術上的來往是相當密切的。

我雖然在秦漢史年會上多次見過先生，但真正面對面打交道還是2001年長沙的吳簡會上，他帶我去見張家山漢簡的發掘整理人彭浩先生，口口聲聲“彭大將軍”，真是幽默得出奇。到了晚上主持書法筆會時，更是談笑風生。我自己的學位論文出版，送給同行前輩指教，謝先生自然也收到了一本。所以內蒙年會後組織的旅遊中，我遇到謝先生，談論的話題自然是由此開始的，他鼓勵我說，你寫的東西還是蠻有思想的，意思是有些深度。他的話很誠懇，不像是時下無原則的好話。由於我祖籍湖南益陽，謝先生是湖南新化人，具

有湖南人的爽朗與強勁，因此談起話來十分親切。八、九月間，是蒙古高原最好的季節，天湛藍湛藍的。蒙古人形容他們的好心情時，常用這時的天空打比方。在藍天的襯映下，在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旁的草地上，我、鄔文玲、張小鋒與謝先生拍照留念。

會後回到廣州，我還接到過謝先生打來的電話，是為了郵寄發表有我文章的《簡帛研究》而打聽我的詳細住址的。不久，我收到了謝先生親手包紮並掛號寄來的樣書及稿費。謝先生辦事的認真由此可見一斑。我將信封上謝先生北京昌平回龍觀社區新住所的地址仔細抄在通訊錄上，準備有機會到北京再拜訪先生，不想卻再也無法實現了！

2006年6月謝先生去世後，我所遇到的同行師友中，大家都對他的早逝表示惋惜，對他治學的專注表示欽佩，對他生活條件的不盡如人意、積勞成疾表示同情。一個這樣熱愛生活，熱愛學術的人，而且經過多年積累，正是要出成果的時候，卻因病離開了我們，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其痛心的事。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留下的學術論著即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將成為從事秦漢簡牘研究的必讀書，將在我國文化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而他對年輕人的提攜扶助，他勤懇治學的精神，也將會永遠留在我們這些後學的記憶中。

我的老師不曾離去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鄭文玲

雖然謝桂華師去世快一年了，可是我覺得他仍然活著，好像從來不曾離開過一樣。他爽朗的笑聲依舊在耳邊回響，他慈祥的面容時常在眼前浮現，似乎只要一轉身、一擡頭就能像往日那樣看見他清瘦的身影，聽到他熱情的談話。

1998年冬天，我第一次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見到了謝老師，當時歷史所位於院北的二層舊樓，現在已改建為餐廳。去見謝老師是因為打算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當時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跟隨孫家洲師讀碩士，最初沒有讀博的想法，打算碩士畢業找一份工作安頓下來，可是沒想到當年的就業形勢非常不樂觀，只好做考博和找工作的兩手準備。出於就業的考慮，我甚至想過考博的時候換一個非歷史的專業。在臨近報名的時候，孫老師有一天找我談話，說從徐世虹老師那裏得到消息，社科院歷史所的謝桂華先生要招收秦漢簡帛方向的博士生，建議我報考，希望我將來能在這一領域有所發展。我聽從孫老師的建議，決定報考。11月6日，徐世虹老師正好有事跟謝老師商談，於是帶我一起去見謝老師。謝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和藹可親，爽朗樂觀。我記得當時我問他，我沒有簡帛方面的基礎，將來我能學會嗎？他肯定地回答，只要肯用功，就一定能學會。為了鼓勵我，他還給我講述了自己是如何從零開始走上簡帛研究道路的歷程。最後叮囑我在準備專業課程考試的同時，一定要認真準備外語考試。因為根據所裏以往考生的情況來看，通常專業成績都不錯，但外語能考過的不多。臨走時謝老師題贈了簡裝本《居延新簡》一書給我，以示鼓勵。後來我順利考上謝老師的博士，在人生道路上多了一位恩師。

因為家事，在博士入學幾個月之後，才得到謝老師的召見。謝老師在北太平莊塔院有

些簡陋的家中接待我，他非常健談，也很坦率。一開始就跟我說，他自己沒有念過碩士、博士，以前也沒有正式帶過博士生，沒有經驗，我是第一個，不知道該如何帶我，問我有什麼建議。這一問把我愣住了，覺得老師怎麼一瞬間顛倒了師生的位置呢？不過我很快弄明白，謝老師所問主要是針對一些程序性的問題，比如填寫培養方案，需要開設多少課程等。填完培養方案，已近中午。謝老師親自下廚，做午飯招待我，他的廚藝不錯，其中一道菜是香菇燒雞，至今還記得那撲鼻的香味。兩人邊吃邊談，謝老師詳細講述了自己的從學、治學經歷，以及生活經歷，既談了學問，也談了家事，酸甜苦辣都和盤託出。不覺談到傍晚，師母下班回來，堅持留我吃晚飯，一直到晚上8點左右我才離開。看著茫茫夜色，才意識到，師徒兩人聊了整整一天。坦誠的交流讓我明白，謝老師一開始就沒有把我僅僅當作一個學生，也是當作朋友，當作家裏人，當作女兒了。謝老師在我心裏亦不再僅僅是有學問的老師，也是歷盡艱難生活磨礪的長者，是父親般的家人，這也許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師父”了。因為祇有我一個學生，後來我跟謝老師開玩笑，說我是“獨生女兒”，他哈哈笑著表示認可。以後在向別的先生介紹我的時候，他有時也會幽默地補充說，我就帶了這一個學生，“獨生女兒”。

讀博士第一年，英語和政治等公共課程佔去了大部分時間，第二年謝老師給我開設了專業課，每周到所裏聽課，當時一同聽課的還有沈頌金、張小峰和金慶浩等。我因為暈車，加上有熬夜的不良生活習慣，有時聽課都顯得精神不振，覺得很過意不去，可是謝老師總是寬容有加，慈愛有加，讓我注意身體。第三年我獲得去哈佛大學交流學習的機會，但同時會失去很多跟隨謝老師學習專業、參與簡牘整理的機會，心裏有點猶豫。謝老師說凡事都會有得有失，他覺得出去開闊開闊視野有好處，支持我去。到了那裏才知道，這個項目其實是可以申請推遲一年半載再去的，每次想起來，心中都很後悔自己沒有安排好時間，尤其回來之後，看到謝老師蒼老了很多，門牙也鬆動了，才知道我不在的這段時間謝老師特別繁忙，經常沒日沒夜地工作，家裏也有很多讓他操心的事，而我不但無法為他分擔一絲一毫，反倒讓他惦記操心。雖然遠隔重洋，卻能時時得到謝老師的關心，2002年《張家山漢簡》出版後，他還特地委託前來哈佛大學探親的侯旭東的妻子富賓女士給我捎來一本，以便讓我及時看到新出版的簡牘資料，讓我感動不已。

我一直覺得對不起謝老師的是，擅自改變博士論文題目，最初的選題是張家山漢簡研究，後來由於書出版得稍晚，加上遠在美國，無法得到謝老師的現場指點，如果等到回國再做論文的話，就來不及了。於是我擅自改做漢代的赦免制度研究。回國後又遭遇非典，無法自由出入校園，在寫作過程中也少有機會跟謝老師交流，基本上是自己閉門造車。寫完初稿，在學校專門車輛的護送下，把稿子送到謝老師住的地方。他拿到稿子後連夜審讀，提了很多修改意見，還幫我補充不少相關的簡牘資料。雖然他寬容地默許了我的自作主張，

同意我答辯。不過他也委婉地表示了遺憾，覺得如果我的博士論文是純粹簡帛學方面的選題，更有利於今後在這一領域的發展。

在讀書期間，我的很多同學都說自己的老師太忙，一個學期也見不到老師幾次面，要想見自己的老師一面，得瞅准一切機會去“逮”老師，相比之下，我真是太幸福了，謝老師會時常主動給我打來電話，詳細詢問學習、生活情況，有什麼學術活動總是安排我參加，他常跟我說，祇有幹活才能長進。平素他很少給我硬性的讀書或者學習任務，只是告訴我一些原則性的東西，要求我在閱讀簡牘材料之外，一定要熟悉傳世文獻資料，最好是能把前四史看得爛熟於心。見面的時候，他時常會隨手拿出一本簡來，或者是居延漢簡，或者是尹灣漢簡，隨機翻到某一頁某一枚簡的圖版，跟我說：“文玲，來看看，這枚簡的字你能讀出來嗎？”我便嘗試著辨認，要是讀對了，謝老師會非常高興，開心得像是自己解決了什麼疑難問題似的，要是其中有不認識的或者讀錯的，謝老師也很寬和，從來沒有批評之詞，仍舊樂呵呵地給我分析字形，叮囑我記住這個字的書寫特徵。謝老師經常鼓勵我多提問題，他常說多提問題的學生才是好學生。所以我在他面前毫無顧忌，什麼問題都問，哪怕是很幼稚的問題也問，不論我問什麼樣的問題，他都很開心，總是詳細地給我解答，碰到他自己沒有把握的問題，他也毫不隱諱，總是直言相告。他認為學生一定要超過老師才是好學生，學生要能做到老師做不到的事。他說“我希望我没有做到和做不到的事，將來你都能做到”，常常以此來激勵我。有時，謝老師也會像孩子一樣，開心地給我“展示”一下他的識字功夫，他會找出一些僅僅殘留部分筆畫的簡牘圖版，讓我嘗試釋讀，當然十有八九我都會失敗，要麼想當然胡亂認一通，要麼望簡興歎，這時，謝老師就會“得意”地告訴我這些字怎麼讀。當然“展示”完了，他也會坦率地跟我說，這也沒有神奇之處，看得多了，自然經驗豐富，而且文書簡中有很多用語都有固定的格式，熟悉之後，自然一眼就能辨識出來。不過他認為草書至今仍然是簡牘釋讀中的難點。

謝老師謙遜隨和，一點兒也沒有老師的架子。他每寫完一篇文章，通常都會給我一份，在讓我學習的同時，也要求我提修改意見。他給我文章的時候通常會說：“文玲，你幫我看看，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幫我改改。”謝老師寫文章非常嚴謹，也這樣要求我。我曾寫了一篇關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釋文商榷的文章，我的初稿中對三十餘枚簡的部分釋文提出了商榷意見，謝老師看了之後，說沒有把握的不要談、證據不充分的不要談、意義不大的不要談，經過一番砍削，最後祇有十餘枚簡的校補意見得到了他的首肯。原來我的標題中有“校正”字樣，他建議改為“補遺”，認為這樣顯得謙虛得體，既不張揚，也表達了對整理者的充分尊重，讓我深受教育。謝老師每次為我修改文章，都非常認真仔細，不辭勞苦，補充資料，推敲行文，看著他在空白處寫下的長長的工整的校正文字，時常感慨萬千。

除了學習之外，謝老師在生活方面也給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謝老師知道當時我跟我的丈夫都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念博士，每人每月祇有不到 300 元的生活費，經濟上比較困難，儘管他自己也不富裕，卻時常關照我，每次在餐館吃飯他都堅持由他付賬，還不時送我一些富餘的書籍，也千方百計地給我創造一些參與學術活動的機會，比如 2001 年在長沙召開“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他讓我參與前期籌備工作，實際上我能做的事並不是太多，但我知道他的一片苦心，把我安排為會議工作人員，固然有鍛煉我的意圖，而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能夠減少我自己的費用負擔。謝老師細心周到，他知道我暈車，每次只要跟他同乘出租車，他都堅持讓我坐前面。尤其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額濟納漢簡研讀班開班期間，當時他已經患病在身，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孫家洲老師特地讓他每次乘出租車往返，給他報銷交通費。他總是惦記著我，時常順路捎上我，每次仍然堅持讓我坐前面的位置。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他得由兒子攙扶進車裏，如果我坐前面，他就得艱難地挪到後排靠裏面的位置，我於心不忍，加上住處有一定的距離，後來我堅持去的時候分頭行動。但是回來的時候，他怎麼也不讓我自己去乘公交車，一定要捎上我。有時我不得不撒謊騙他，說我有別的事，晚點再走。

謝老師是一個率真的人，他愛交朋友，哪怕祇有一面之緣，或者僅僅通過電話，只要談得比較投機，他都一律視為朋友甚至好朋友。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祇有朋友，沒有仇怨之人，他時常把自己敬重的或者有恩於自己的師長、朋友挂在嘴邊，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談論過別人的不是或者他跟別人之間有什麼過節。後來病重時，他的孩子曾經問過他什麼是幸福和快樂，他說“自己對別人好，別人也對自己好，就是最大的幸福和快樂”。當然遇到不平事或者多喝了兩杯他也會罵娘，甚至拍桌子，但也只是聊以發泄一下自己的情緒而已，並不會針對某個具體的人。謝老師也有“貪玩”的時候，記得在 2000 年，他說要學習使用電腦，當時師母正好在電腦城上班，就給他購買了一台電腦，還開通了網絡。後來我去他家，師母當著謝老師的面向我“控告”，說你的老師騙我，買了電腦不學打字，只學會了上網玩麻將，每天晚上玩到兩、三點鐘還不睡覺，有時玩通宵。我沒辦法，就只好把 Modem 給卸走了，讓他没法上網。謝老師就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樣在一旁陪著笑臉。謝老師也有做事計劃性不是很強的時候，常有臨陣磨槍的情形。我記得 2000 年秋天，他要去英國做學術訪問，但是有一篇稿子必須在走之前完成交付出版。在出發前一天晚上，他給我打電話，說他明天上午 11 點過的飛機，讓我早上 8 點到他家取稿子幫他交。於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到家發現謝老師還沒寫完，師母在一旁著急地幫他準備行裝，師母說謝老師幾乎一夜沒睡，眼看接他的車就快到樓下了，可他仍然不慌不忙地說還要寫個結尾，寫完後還要到樓下復印。等到把稿子的事忙完，差不多快 10 點的時候謝老師才上車趕往機場，我都擔心他會錯過航班，不過還好一路順利。

2003年謝老師從歷史所退休後，仍然孜孜不倦從事簡帛研究事業。他曾多次跟我談起，說退休後打算儘快把手裏的幾件事情做完，然後集中精力做一些研究工作，寫幾本研究專著，要不然做了一輩子的研究，卻沒有寫一本專著，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我非常贊成和支持他的計劃，可是沒想到年底他就生病了。好在經過治療，病情暫時得到控制。出院之後，雖然大家都時常提醒他注意身體，他自己也表示不像以前那樣拼命了。可是我發現他實際上加快了工作的節奏，他時常說手裏還有幾件事情沒有做完，無論如何也要完成，不能欠債。可見雖然他在樂觀地跟病魔抗爭，同時心裏也有所預感和準備。我見他的事情總也忙不完，加上患病，便建議他先出一本文集。他表示可以考慮，但似乎也不是很積極。2005年底他的病情再次反復，不得不住院治療。2006年初，在醫院治療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謝老師堅持出院回家修養，接受中醫治療。謝老師生性樂觀，並不懼怕死，但他也明確表示了對生的眷念，他說“我不怕死，但現在我還不想死，因為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我明白，與其說他眷念生命，不如說他眷念自己熱愛的事業和放心不下的家人。可是中醫在努力了一段時間之後，也無能為力。謝老師的病情日益加重，逐漸臥床不起，情況越來越糟糕，腹水越積越多，以至後來無法坐起，幾乎失去行動能力，由於腹水壓迫，呼吸也很困難。每次看到他在痛苦中煎熬，自己卻無能為力，心裏難過極了，只恨自己沒有學醫，覺得自己要是一個醫術精湛的醫生，能夠幫老師解除病痛該有多好啊！後來我想如果讓他腦子裏想點事情也許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日子也不那麼枯燥乏味，於是我跟謝老師說，您要是精神好的時候，可以考慮考慮文集的事，列出目錄，謝老師表示同意。沒過幾天，謝老師就列出了比較詳細的目錄，委託馬怡老師和我做文集的編輯工作。本來我以為謝老師能夠親眼看到自己文集的出版，可是沒想到僅僅一個月之後他就離開了。

2006年6月12日，當謝老師去世的消息最終得到證實後，我頭腦中一片茫然，似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好一陣大腦都處於空白狀態。心裏祇有一個固執的念頭：謝老師怎麼會去世呢，不可能！一直到第二天下午的遺體告別儀式上，看到謝老師安臥在鮮花叢中，哀樂低鳴，悲傷的人們依次告別，那一刻，突然真切地意識到我的老師真的去世了，真的走了，深深的悲痛最終徹底籠罩了我。可是等到儀式結束，前來吊唁的人紛紛離去後，守望著靜靜躺臥的老師，我沒有感受到任何死亡的氣息，覺得他只是累了，睡著了，他隨時都會醒來。後來的日子，我不時會夢見謝老師，有時夢見謝老師讓我把《額濟納漢簡》或者《居延漢簡》拿給他看看，有時夢見突然找不到謝老師了，心裏很著急，可是沒過幾天他又回來了，原來他只是出門迷路了。是的，我的老師不可能去世，我的老師從來不曾離去，在我心裏，他永遠活著！

徵稿簡約

一、本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專業性學術刊物，歡迎與下述內容相關的論文投稿：

1.出土簡帛的辨識、考證；2.根據出土簡帛考辨史實，研究中國古代各種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狀況；3.有代表性的國外簡帛研究譯文；4.簡帛研究綜述；5.簡帛研究著作書評；6.簡帛研究論著索引。

二、本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本刊發表的文章均不代表本刊的意見，由作者文責自負。

三、來稿請提交一份文本稿，一份電子文稿（電子郵件或磁盤）。

四、本刊採用繁體橫排。

五、本刊實行頁下注。注釋中所引專著，務請注明著者、書名、卷數、出版社名稱、出版時間和頁碼；所引論文請注明篇名、刊物名稱和期數。如果引用書目為外文，請用原文，不必譯成中文。

六、投稿者（書評、索引、譯文除外）請附300字以內的中文摘要和3—5個關鍵詞。

七、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稿件中請勿出現作者個人資訊。有關作者姓名、單位、聯繫方式等，請另紙提供。

八、本刊對刊登的稿件擁有為期兩年的專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和特殊要求，請於投稿時聲明。請勿一稿兩投。

九、本刊處理來稿期限為60個法定工作日。逾期未接到通知，作者有權對自己的稿件另行安排。因本刊經費緊張，來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十、來稿請寫明作者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工作單位、職稱或職務、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以便聯係。

來函請寄：

北京建內大街五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 戴衛紅收

郵編：100732

電子郵件請寄：jbyj2005@yahoo.com.cn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璣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張政烺



ISBN 978-7-5633-7819-7



9 787563 378197 >

定價：98.00元